深圳民俗寻踪

◉廖虹雷／著



海天出版社

深圳，拥有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

——乌丙安

ISBN 978-7-80747-197-4

9 787807 471974

定价：36.00元

温馨提示
爱护图书
珍惜资源

深圳民俗寻踪

◉廖虹雷／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民俗寻踪／廖虹雷著．—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747-197-4

Ⅰ.深… Ⅱ.廖… Ⅲ.风俗习惯—简介—深圳市 Ⅳ.K892.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1309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胡小跃 徐丹娜
责任技编：蔡梅琴 装帧设计：蒋南松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开 印张：22.875
字数：260千字 印数：1-5000册
定价：36.00元

深圳市太阳律师事务所刘汉星为本书法律顾问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PREFACE



作者和乌丙安教授合照

乌丙安

近些年来，专攻民俗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在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常常以自己家乡故里的民俗调查研究作为选题，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自以为对那里的民俗生活十分熟悉的缘故。但是，当他们带着问题回乡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发现其实并不了解家乡的民俗生活百科知识和深厚的民俗文化传统。因为他们在现代化教育体制里，既没有投身于原民俗文化生态的习俗中进行体验的时间，城乡社会群体也很少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空间。所以，他们在“生我养我”的故土，只能经过表面肤浅的田野调查写出干巴巴的缺少生动鲜活内容的文章来。为此，我曾建议他们要在民俗文化生活的实践中切实完成民俗学人的自身“习俗化”体验；并建议他们要在民俗调查中多练习写作“民俗随笔”，把自身的民俗体验和感受连同调查材料如实地记录下来，因为这是民俗学人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训练。此前我本人就有过这样的实践，1983 年 6 月和 1999 年 9 月先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民俗学丛话》《生灵叹息》两本民俗随笔，对于我把民俗研究做深做细做扎实大有裨益。正因为如此，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好的民俗随笔，用来增长知识和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

最近，我读了这部题名为《深圳民俗寻踪》的书稿，不仅让我情趣盎然，而且精神也为之一振。作者廖虹雷先生以他朴实无华的叙事风格和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积累，运用翔实的田野考察和文献典籍的搜索钩沉，为读者描绘了一幅鲜活生动的万花筒式的深圳民俗画卷。阅读起来，令人爱不释手，喜不胜收。书中有血有肉、关切民生的民俗事象，活灵活现、充满动感的民俗形态，深刻睿智、令人思考的民俗内涵，激动人心、引人入胜的民俗情趣，考究独到、解读清晰的民俗探微等等，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说到深圳民俗，这在以往较长的时间里曾经被看作是天方夜谭的陌生话题。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和域外的华人或外国人，只要听到深圳这个地名，立刻就会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一座崭新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飞速兴建拔地而起的特区城市；又由于在最短时间内全国各地大批人口的流入前来参加特区建设，于是就把深圳的独特文化认定为新兴都市文化或所谓的特区文化。甚至在2003年国家文化部发动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经在全国得到热烈响应时，那些认为深圳只有新兴城市文化没有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观点在当地或全国文化界还很有市场。只有少数民俗学者，特别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民俗学者却依然坚持从事民俗、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而且乐此不疲。

随着深圳市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效进展和深得人心，深圳的许多民俗文化遗产的优秀项目被纷纷挖掘和抢救出来，成为省、市认定的珍贵遗产，甚至受到国家的关注。深圳的民俗学家也因此振奋精神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俗民艺项目付出很大的辛劳，做出了公认的突出贡献。

廖虹雷正是这样的出生和成长在深圳并为家乡文化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民俗学家之一，他以他的民间文艺实践和民俗调查研究实践，以及他作为文学作家独具的文学创作实践，撰写了大量的民俗文化随笔和民俗遗产研究论文，雄辩地证明了深圳并不是一座突然冒出来的传统文化一无所有的新城市，相反，深圳拥有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

廖虹雷的民俗随笔和民俗论文有其鲜明的创作特色。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民俗题材的把握上，既关注了深圳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或文化空间，也关注了细微的深圳城乡民众日常生活风俗习惯。通常民俗学人的学术视野中更多的是瞄准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动进行研究，对民间日常生活习俗即“常民习俗”或“常俗”很少予以关顾。这本来是民俗学研究中很大的弊病，因为民间日常习俗才是民俗文化的真正根基所在。廖虹雷不仅对大型的岁时节日、信仰祭典、婚嫁礼仪、游艺表演等作了充分翔实的评说描述，而且还对深圳民间衣食住行的民俗细节作了探索和叙写，饶有情趣。

第二，在表现方法的运用上，他既运用了文学散文的叙事笔法对深圳民俗生活加以生动朴实的描述，又在介绍和解读深圳大型民俗文化艺术活动时运用了学术论文的见证和考证的方法，以确凿的文献典籍资料和亲身调查的材料为证据展开论述和说明。散文描述和科学论述穿插使用，交相呼应，相得益彰，引人入胜。

第三，在民俗内涵的解读上，既有作者从自观角度叙述的独到的民俗文化

体验，把作者自身的民俗情结融入深圳民俗文化生活之中，又能从调查研究者的他观角度进行考察，做出客观的论证，对深圳民俗给予客观的评价。例如，作者在论述深圳人穿着香云纱的习俗中，开篇先讲述了一段自己小时候穿着香云纱对襟衫的往事，颇有童趣且含义深刻，接下来再详尽地论证和解说香云纱的来历和精致的原生态工艺。作者在文中跳出跳进，来去自如，让科学考察的民俗事物和作者的民俗体验形成水乳交融的互动，使书中的民俗文化事物顿时有血有肉，有了灵魂，跃然纸上，令人深刻感受到民俗文化的真实价值。

以上三种突出的特色在本书中处处生辉，令人时时眼亮，过目难忘。

如今，年逾花甲的作者依然站在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岗位上，为守护精神家园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

我坚信这是一部读者很喜爱的好书，不仅原住深圳的人和外地移居深圳的人会喜欢读，而且深圳以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凡是知道深圳的人和想知道深圳的人都会喜欢读；凡是去过深圳的人和想去深圳的人也都会喜欢读。因为，读了这本书就会了解深圳人的民俗文化情感该有多么深！更会知道深圳民俗文化的根基该有多么深！

2007 年中秋节

（乌丙安是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目录

CONTENTS

序 / 乌丙安

生活习俗记忆

深圳解放日 /001
南头古城 /008
东门老井 /015
百年罗湖桥 /019
岭南风情上大街 /026
千年蚝乡 /032
人民桥古今 /037
小巷穿戴流行色 /041
文化名人深圳踪迹 /047
宝安是个古盐场 /056
红树林与五百年银叶树 /064
深圳自古出珍珠 /069
香寮、茶寮、糖寮与酒坊 /074
田头地尾乡土野趣 /080
乡村民间小工匠 /085
屐、鸡公车与现代出行 /091
香云纱与老深圳人穿着 /097
深圳人宅舍与客家围拢屋 /103

邑之谷米与粥品 / 110
百年小吃云片糕 / 115
农家咸茶与擂茶 / 119
羊台山狗肉 / 124
三洲田绿茶与饮茶 / 128
羊台山名果沙梨和柿子 / 134
南头荔枝南山桃 / 138
坪山金龟桔与年桔 / 143
大鹏鲍鱼与海胆 / 147
龙岗鸡与吃鸡 / 152

节庆习俗传承

做冬大过年 / 157
深圳过年的“年味” / 160
元宵节与“开丁茶” / 167
清明拜山与“鸡屎藤粄” / 172
五月节与“扒龙舟” / 177
深圳“七姐节” / 183
八月半与孔明灯 / 188
重阳节与爬山 / 192
十月朝，糍粑“碌碌烧” / 197
深圳岁时节令与民谚 / 201

文化习俗寻踪

小宋帝与新安大盆菜 / 207
深圳麒麟舞 / 216
深圳客家凉帽 / 223
大鹏古城“将军宴” / 231
大鹏清醮探秘 / 236
香港清醮文化 / 244
乌石岩与熊家嫲 / 250
南澳草龙舞 / 257
深圳客家山歌 / 265
鱼灯舞与沙头角中英街 / 271
公明陈仙姑的传说与古迹 / 278

天后宫“辞沙”与赤湾 / 284
深圳也流行粤剧 / 291
大鹏千音山歌 / 298
深圳咸水歌与盲佬歌 / 304
深圳新旧婚俗 / 310
坟、墓与二次殓葬风俗 / 318
乡间墟集也是种文化 / 323

相关链接

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深圳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通知 / 331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并公布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通知 / 333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 / 335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连结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 / 337

后记 / 343

参考书目 / 348

解放前的深圳有两个中心，今罗湖区东门老街一带叫做深圳墟，是商业经济中心；今南山区南头中学一带是宝安县城所在地，为政治中心。因此，1949年10月16日解放县城南头和10月19日解放深圳墟，中间相隔了三天。深圳毗邻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个敏感城市，上级专门成立沙（头角）深（圳）宝（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没费一枪一弹就接管深圳；一个边陲小县先后开过两次庆祝解放大会，这在全国县级解放史上实为少见。

深圳解放日

深圳市前身是宝安县，古称新安县。深圳历史上主要有两大民系广府人和客家人，也有少量的潮汕、闽南语系的福佬人。地理地域上以深圳墟（今东门老街）为中轴线，往西从蔡屋围、上下沙、南头、西乡、沙井、福永、松岗到公明等镇，俗称深圳西路片，属珠江口鱼米之乡，讲粤语。深圳墟往东的莲塘、沙头角、沙湾、布吉、石岩、平湖、龙华、观澜、盐田、横岗、龙岗、坪山、坪地、葵涌、大鹏、南澳等镇，俗称深圳东路片，讲客家话。

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领导的抗日武装，活跃在深圳东路片，俗称路东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领导的抗日武装，活跃在深圳西路片，俗称路西队。路东队在客家地区打游击，如鱼得水，但是一旦进入西路片粤语地区，就“鸡和鸭讲”，互相语言不通，误时误事误战机，万一被敌人包围，不会当地方言，容易暴露。同样，路西队原则上在广九铁路线以西，和日伪打游击战，语言通，地形熟，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解放前的深圳有两个中心，今天罗湖区东门老街一带叫做深圳墟，是商业经济中心；今天南山区南头中学一带是宝安县城所在地，为政治中心。因此，解放县城南头和解放深圳墟相隔三天，深圳毗邻英国殖民地香港，是个敏感城市，上级专门成立沙（头角）深（圳）宝（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深圳，一个边陲小县先后开过两次庆祝解放大会，这在全国县级解放史上也是少见的。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我偶然翻到30多年前采访深圳革命斗争史实的笔记，骤然心潮难平，思绪一下子飞向那艰苦的岁月……我一页一页地翻阅1974年5月和1978年2月先后两次连续半个多月走访东江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周伯鸣、彭沃、曾洪文、罗雨中、邱伯寿、罗欧峰、张军、李和、谭刚（原名谢枫）、罗喜月以及刘仁、邓斌等老同志口述记下的记录，我随着歪歪扭扭的字句，眼前闪耀着解放深圳的战斗情景……



解放深圳时的人民武装用品（摄自深圳市博物馆）

古城新生

南头城，是民国时期的县政府，也是明洪武年间建城以来，有600多年历史的历朝县衙门。

经历了八年的浴血抗战，又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的解放战争，宝安人民多么盼望早日解放啊。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丧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成立，尹林平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支由1946年北撤山东的东江纵队留下坚持武装斗争的英雄部队，发展壮大到光是东江第一支队就拥有7个团共一万多人。边纵一成立，便接到中共南方分局的指示："目前任务主要是在于依靠现有力量逐步有计划地不断歼灭敌人，整训部队，建立主力，创造根据地，以配合南下主力迅速进军并准备迎接大军，彻底解放华南。"

这一号令，让长期坚持艰苦岁月顽强斗争的东江人民，见到了曙光。8月下旬，中共江南地委副书记祁烽在东莞梅塘召开东宝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会，传达华南分局的指示和决定，全面做好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早前两个月，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从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中抽调干部，成

立了“东宝县人民政府”，两个月就发展共产党员250名、筹措粮食10万担，特别是闻名东江地区的“两虎队”——三虎队和金虎队，像猛虎一样在全县范围内出击，先后拔掉了盘踞在龙华、石岩、沙河等地敌人据点，很快把活动区扩大到黄田、固戍、长圳、玉律、观澜等地，建立宝安、长胡、大岭山三个完整的区政府。解放区占东宝两县地区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两个月后，根据江南地委决定，又将县政权划一为二，分成东莞和宝安两个县人民政府。同年8月29日至9月3日在石岩坭光村成立宝安县委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建立健全县委和县政府机构：黄永光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县委常委黄永光、周吉、曾劲夫（均兼副县长）、张辉，宣传部长王纪平，青妇书记黄蔚霞；宝安县人民政府秘书黄哲，公安局长刘鸣周，民政科长张子修，军事科长何赋儒，粮食科长梁耀宗，财政科长龚锡贤，建设科长任洪，教育科长王纪平（兼），公安局秘书曾鸿文，深圳镇长陈虹。同时成立的沙深宝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由刘汝深、黄永光担任正副主任。会上县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当即研究布署解放全县的工作。



解放军边总集结进城（选自《深圳全记录》）

黎明前黑夜的斗争是残酷的。当时宝安县并存着国民党、共产党和港英当局三种势力：国民党仍然盘踞深圳镇与南头的宝安县城等少数重要地区，共产党则解放了周围大片乡村，港英当局则通过控制九龙海关影响着西起大铲岛、东到三门岛的大片地区。以当时中共香港分局调查史料来看，国民党在广东总兵力约8万多人，而共产党只有中共粤赣湘边纵队东一支三团等少数地方部队，宝安新组建9个武工队，约有900多名武工队员，从人数和武装来说，国民党力量仍然大大强于共产党。至于深圳，不是国共主力交战的“前线”和战略要地，国民党无法顾及，没有派“国防军”重兵把守，只有“保安司令部”下辖的一个保安师和一些地方警察等，数量大概数千人。这些部队苟延残喘曾经数次出动，想凭借优势兵力消灭我地方武装，但由于不得民心，都无法成功，国民党被迫退守沿海沙井、西乡、南头县城和深圳镇等几个据点。

1949年7月25日，以北撤上去的东江纵队为基础成立的两广纵队，参加豫东、济南、淮海三大战役后，奉命南下解放华南，作为进攻广东之南路军。“打回广东去！”两广纵队健儿群情激奋，誓师出发于襄城，沿平

汉铁路复经大别山，出黄岗，于黄石港横渡长江，越紫荆山，过南昌赣州，沿粤赣公路直追广东境内，取道和平、连平，直扑惠州。10月14日二野4兵团、四野15兵团一举解放广东首府广州。10月15日南下大军攻克惠州，考虑到深圳是通往香港和国外的重要口岸与通道，根据上级指示，为避免与港英当局引起边界冲突，发生国际纠纷，我大军未越过宝安平湖一线。

势如破竹的大军南下，国民党反动军警闻风丧胆，纷纷南逃伶仃岛、万山群岛、海南岛和台湾等地；结果南头县城、沙井和西乡一带只剩下一些国民党警察队、保二营和沙井“联防队”共300多人，深圳镇也只剩国民党税警二团和护路大队共1400余人驻防。



解放那天的深圳镇政府

一直活跃在东宝地区的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三团，正在羊台山下龙华窑下村开展阶级教育、纪律教育、三大技术教育，学习瓦解敌军、争取敌军起义和解放城镇、接管城镇等方面政策规定的整训活动。10月13日，县委书记、三团政治部主任黄永光，副县长兼保安大队教导员周吉，率粤赣湘边纵队和武工队开进沙井乡，对敌展开政治攻势，未发一枪，解决了沙井联防队员五六十人，缴获轻机枪3挺、长短枪30余支。15日部队开赴西乡，在地下党员梁仓的协助下，接受了县警察第二大队李振昌等230余人的起义，即日西乡镇解放了。

16日清晨，黄永光按原布署，调集驻守在观澜白花洞、龙华窑下、布吉八约村等人民武装，带着宝安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沿着被炸弹轰得坑坑洼洼的公路，急行军至坂田小学校球场，休息片刻，再次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取道白石龙、长岭皮、沙河（今西丽），直插南头县城。在县城地下党员温巩章和西乡、沙河等地武工队配合下，歼灭了南头城中百余残敌，伪警察局缴械投降，我部队闪电式占领了伪县政府（今南头城九街宝丰押），顺利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机关和军警武装。古城宣告解放！南头人民自发挑着米、薯、萝卜、青菜，从各乡蜂拥南头慰问部队，各界人士挥舞小旗、标语热烈欢迎我解放部队入城，随后，军民在南山村祠堂大坪召开了庆祝南头解放大会，部队文化宣传队表演了《兄妹开荒》《红军回来了》等文艺节目。县委在南头地区成立了联乡办事处，温巩章任联乡办事处主任。

边城希望

深圳当时虽不是县城，但它是南方重要门户，历来有国民党重兵把守。南头城解放后，对于国民党驻广九铁路沿线一个旅、虎门要塞驻深圳总队、国民党县政府驻深圳警察大队、税警团、联防大队、护路（铁路）大队和梁杞团、肖天来大队等地方军队震撼很大，纷纷四处逃溃。护路大队、税警团在10月10日向我投诚起义。经在布吉上下坪谈判后，我们接受起义并指令他们退出深圳营区，迁至黄贝岭听候改编。

根据上级指示，解放深圳，切实注意与一河之隔香港的影响，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因此，部队解放了南头县城后，用3天时间演练和准备，在地下党配合下争取不发一枪。我们部队做出周密方案，甚至演练时什么队伍在前面，什么队伍走后面，走哪条线路，怎么走，逐一落实。



解放前的罗湖关——海关（黎德奎供稿）

10月19日下午一时许，沙深宝边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刘汝深（后由祁烽继任），率我人民武装100多人由解放军军装换上警察服装，佩戴“人民警察”臂章，和60多位干部佩戴“政工队”袖章，从布吉乘坐货运火车直落深圳，接管深圳镇和九龙海关。

我军事接管人员一到站（今解放路市集邮公司对面、原铁路闸口榕树头铁路小站，大站在今罗湖火车站），“人民警察”迅速占领国民党伪警察所（今解放路东门老街比萨店东侧）和伪镇政府（原是安仁善堂，今废），接着，很快接管了火力发电厂（今迎宾馆对面）、铁路东站、深圳商会、银行等重要部门。上千各界人士和群众闻讯赶来，挥动彩旗，鸣放鞭炮，击鼓舞狮，欢迎大军进城。简单的入城仪式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红旗队，接着是腰鼓队，后面是整齐的方队。当时香港有10多个记者采访和拍摄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当晚，我军管会在民乐戏院（今老街人民北路电影院）召开各界人士和群众大会，刘汝深主任宣布深圳镇人民政府成立，号召工商界人士迅速恢复营业，维护交通、水电和社会秩序正常运作。庆祝大会上，军民举行联欢晚会，部队文化宣传队又表演了《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

刚解放的深圳镇，才2万人左右，街道只有西和街、上大街、鸭仔街、谷行街、北门街、南庆街、新圩（今和平路）和新市场（今海关宿舍附近），几条又短又窄的街道，周围搭满低矮潮湿的木板房或草棚，满目疮痍，人民饱经战火蹂躏，群众生活贫病交加。罗湖桥侧（今火车站对面）的大滩，有当时南天王陈济棠投建的大赌场，兼营妓馆、烟馆和食肆，黄赌毒俱全，因而乞丐多、暗妓多、赌博多成为困扰深圳的三根绳索；加上深圳和香港边界没遮没拦，香港巴士直驶深圳，边境上人员可以自由来往，致使黑社会组织猖獗，民不聊生；这时，国民党反动势力仍作垂死挣扎，从海南岛派遣飞机天天来投弹扫射。文锦渡及火车小站（今解放路口、市集邮公司对面榕树下）露天汽油桶中弹着火。残留和暗藏在深圳的国民党散兵、特务、土匪及流氓、烂仔、黄牛党、TU党、三合会常于午夜出来骚扰、放冷枪，威胁群众生命安全。我军管会大力组织民兵、纠察队巡逻，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



解放军边总进入深圳墟（选自《深圳全记录》）

九龙海关英国人“起义”

设在深圳罗湖桥边的九龙海关，管辖着西起珠江口大铲岛，垃圾尾岛、南头桂庙、白石洲、沙头、罗湖、文锦渡、莲塘、沙头角、大鹏南澳、沙鱼涌、澳头至东边的三门岛沿海岸线16个海关支关，名义上归属国民党领导，但实际上拥有自己的武装，控制权掌握在“税务司”（关长）经伟菲——一个英国人的手中。全关为1600人，其中武装关警500余人，配备着英式手枪、步枪、轻重机枪甚至航空机枪和武装缉私艇，其总部设在香港中环，关员在香港生活、深圳上班，情况很特殊。

早在南头和深圳镇解放之前，10月13日，九龙海关“关长”经伟菲就在我地下党工作下，提出愿带领全关起义。10月14日解放军抵达东莞樟木头，深圳罗湖山顶的九龙海关缉私总部就已经升起了五星红旗，这是在深圳地界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10月21日，经伟菲顺应历史潮流，在香港中环的九龙海关总办公室通电北京，宣布起义，受到国务院海关总署的复电嘉奖。同日，我“九龙海关军事接管委员会”顺利接管了九龙海关。

1950年2月25日，经伟菲和其他外籍职员主动向北京海关总署提出辞

职，海关总署准辞之后，还发给经伟菲 6 个月的薪金作为奖励。九龙海关回归祖国怀抱，为新中国保护和接管了海关大批黄金、货币、枪支等财产，对促进国民党其他经济机构投向新中国怀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全县陆地上解放后，接着积极筹粮练兵，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深大铲岛、三门岛和内伶仃岛等岛屿。1950 年 4 月 18 日，在解放海南岛登陆战役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炮团团长袁庚（深圳大鹏人、后蛇口工业区副指挥长）指挥著名的解放内伶仃岛战役，解放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用 5 艘商船与敌军 27 艘炮艇对阵，结果我用木船击沉 2 艘敌军炮艇，100 多敌兵葬身海底，吓得余敌仓皇逃窜。其他岛屿也一举解放。此时为止，全县除了香港、九龙和新界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割据和“租借”外，其余均插上鲜艳的五星红旗！

宝安，这个南国边陲小县，1979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深圳市，1980 年 8 月成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深圳人民又迎来前所未有的解放?——思想大解放和经济建设的大飞跃，

深圳，你是一座美丽的城，光荣的城，英雄的城！



深圳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城（选自《深圳全记录》）

南头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晋书·地理志》载，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析分南海郡设立东官郡，下设宝安等6县，郡治设在南头城子冈。

东官郡设置历时259年，在南头设郡治、县治合一约为170多年。以后历朝，南头古城处在“扼外洋要害之冲，为省会之门户”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海上陶瓷之路”，是为岭南重镇、深港两地历史之根。

深圳民俗寻踪

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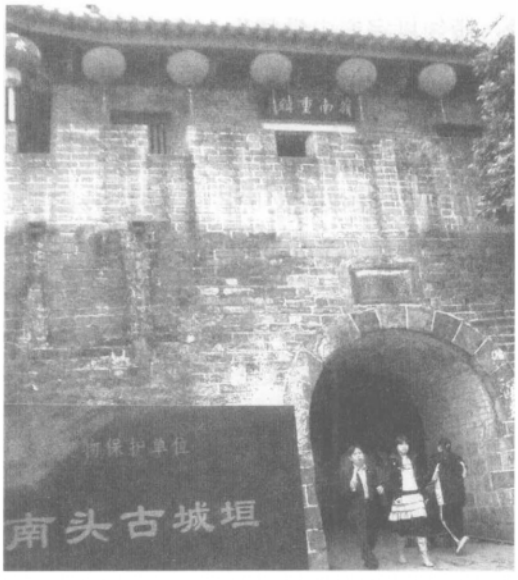
南头古城

上世纪60年代头，我在南山区南头中学耕读几年，在往后的几十年岁月中，时不时浮现令人难以忘却的那校、那城、那街……

百年学校

南头中学是深圳市最老的一所中学，坐落在珠江口南山半岛的南头古城里，相伴中山公园，环境清幽，绿树成荫。南头中学古称凤冈书院，又历称凤冈学校、宝安县立初级中学（清光绪乙巳年）、宝安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民国十七年）、宝安第一中学（1950年）和宝安县南头中学（1958年，简称“南中”）。南头中学办学沿革上溯到清朝嘉庆七年（1802年）新安县建立的凤冈书院，但以新式学校的标准考察，可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计，至今足有100年之历史。

据清嘉庆年间编修《新安县志》里《新建凤冈书院碑文》记载：宝安书院已久废，而城西南隅文冈书院（雍正二年建）亦因年久倾圮，基址仅存。嘉庆壬戌年（1802年）县衙奉准裁汰东莞场署（即现“海防公署”，



南头古城南门


古新安县衙


新安古牌楼

彩虹幼儿园园址一带），改建凤冈书院，嘉庆癸亥年（1803 年）动工，广东布政使康基田题写“凤冈书院”石匾（现立存南头中学大门门厅处），嘉庆丙寅年（1806 年）落成。建成后的凤冈书院是一座四进式的院舍，前座为大门，二座为讲堂，兼有露台，三座为先贤堂，后座是魁星楼，左右列书舍 8 间，两厢有东西两斋，建筑颇为堂皇。嘉庆二十四年（1815 年）有生员 102 人，时设文府、武府、岁试、科试等教学。

清光绪癸卯年（1903 年），清廷颁准“癸卯学制”，仿照欧美国家办学，采用日本学制，1905 年诏令废除科举制，确立了中国近代学校的基本模式。1906 年改名为“凤冈学校”，实行新学制，讲授新课程，进入了近代新式教育的轨道。

100 多年来，南头中学是一所有悠久革命斗争历史的学校。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曾涌现出一批坚强的共产党员和优秀的革命青年，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进行英勇的斗争，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亦有不少优秀学子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1938 年 1 月，日本侵略者的战舰驶进宝安县城南头附近海面，炮轰宝安县城。国民党宝安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校长临难逃跑。中共地下党员梁金生（原籍深圳布吉草埔村人）受党组织派遣，趁机就任校长，以学校为阵地积极发展党组织，组织农会、农民抗日自卫团、全县抗日青年联

合会，出版进步刊物《宝安青年》，带领以宝安中学师生为骨干的抗日宣传队，深入南头、深圳、龙华、盐田、凤岗等地，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救国主张，推动了宝安县抗日运动的发展。

梁金生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注意。上级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于1938年7月让他和八岁的女儿梁汉莲及5名师生秘密转移到延安。

梁金生1915年从越南归国，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成长为我党的优秀干部。1945年梁金生应越南劳动党的邀请到越南从事革命活动，行前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谈话。梁金生1946年在越南不幸牺牲，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黄文欢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原国家主席杨尚昆曾题词纪念他。（以上据《深圳党史通讯》1987年第一期刊载）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梁金生的夫人姚淑平女士，慰问先烈家属。



南头古城海防公署（照片选自《深圳全记录》）

南头古城

南头中学位于南头古城里。南头古城是1983年5月深圳市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我一直保存的《深圳市文物普查简报》（1982年12月10日第四期）刊载，深圳市在1980年和1981年先后两次在南头考古发掘，出土唐宋元清各个历史时期文物一批，其中陶瓷器达150件。对研究南头“扼外洋要害之冲，为省会之门户”的战略地位，和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海上陶瓷之路”，非常有参考价值。

南头古城，建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清代《新安县志》记载，明朝初年，我国东南沿海倭患猖獗。1384年，朝廷决定在沿海地区设卫所，以防倭寇（日本海盗）。“卫所”是明代地方军事防卫机构，上属省“都司”，下辖千户所，千户所辖百户所。粤东地区设南海卫，卫辖二所：一为屯门（今香港新界）之西设东莞守御千户所，所城设南头；另为大鹏守御千户所，所城设大鹏。

1394年，广州左卫千户所崔皓奉命建筑南头“守御所城”。其城池形

势雄伟：周围莲子城共578.5丈，高2丈，城宽1丈，城基宽2丈，有4个城门，东门为聚奎、西门为镇海、南门为宁南、北门为振辰。正门南门外，还有一外门为迎恩。1984年深圳市文化局调查测量，整个古城占地33公顷。城址东西最长距离为680米，南北最宽为500米。现南北城墙尚存基址，唯南门保存完好，高4.5米的城楼在拱形城门上阴刻“宁南”二字。

南头古城，别称“莲子城”，于康熙年间被改名为“九街”。所谓“九街”，顾名思义是根据古城内有六纵三横的九条街而得名的。这九条街分别名叫县前街、和阳、迎恩、聚秀、显宁、五通、永迎、新街和牌楼街，俗称“南头九街”。街名无不烙下古代知县府一些印记，我们在读书时，穿行在迷宫似的九街，几年下来只记得常走的那几条街，其他街名相信许多人都说不清了。



南头古城鸦片馆（照片选自《深圳全记录》）

古城内的九街，以前驿馆、客栈、食肆、商行等古建筑比比皆是。县志载下的建置就有知县官署、典史厅、教谕署、训导署、守备署、军装库、火药局，东莞场盐课司署、铳台、屯仓、漕运仓、盐谷仓，学宫、文冈书院，关帝庙、城隍庙、武安王庙、节寿祠、文山祠、报德祠、观音阁、北帝庙、康王庙、三官堂和五显庙等。如今有不少官署、庙宇早已名存实亡，或改作民居或开张店铺的，存下的也破旧不堪。我们最有印象的是关帝庙，1960年那年月南头中学校舍不够，住进好几个班的女生，好几十人。庙里少窗，阴暗潮湿，但当时因为住的人多没有恐怖感觉。当然周末或寒暑假期，女生却不敢单独留宿。

九街里现在尚存的古建筑，只剩下当年“含珠银灯通仙域，卧云香榻吐春风”的新安鸦片烟馆；典当、抵押、放高利贷机构“义利押当铺”；早年金融信用机构“陶朱公钱庄”；修于晋咸和六年，辖宝安、兴宁、海丰、海安、怀安、海宁六县，区域西至珠江口两岸，东至福建交界的“东莞会馆”；接待来往官员的“接官厅”；打响中国人民反英帝国殖民者侵略第一枪的“海防公署”；奉祀天后的祀庙及列“有功于民者”牌位的报德祠；以及纪念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信国公文天祥祠”等。

近年为适应旅游业发展，当地政府拨款修葺部分古城墙、南城门、东莞

会馆、海防公署和信国公文天祥祠等。古城墙外侧、南头中学大门外深南大道旁新建了一个古色古香牌楼——“新安古城”。南城门顶的琉璃建筑上“岭南重镇”几个字，绝对是今人加上去的，古时没有。一新一旧，像件唐衫加了块新化纤补丁，有不协调之味道。

岭南重镇

“岭南重镇”几个字虽然是后人贴上去，但说起历史，南头古城确是岭南重镇，是深港两地历史之根。

据深圳市南山鹦歌山、赤湾、南山、铁岗山等古遗址出土的文物，足以证明5000年前就有原始人在南头沿海一带劳动、生息、繁衍，过着渔猎、捕捞、农耕和采集的生活，开创了这一地区的早期文明。



百年老校——南头中学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南头这一带属岭南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央集权国家的版图。公元前215年，在南越境设置了闽中、桂林、象、南海4郡。南海郡治在广州，下辖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6县。南头地区属南海郡番禺辖地。

西汉实行郡国并置之制。南海尉赵佗趁秦末之乱，击并桂林、象两郡，在岭南自立为南越王93年，都番禺，获汉高祖承认。公元前112年岭南分设南海、苍梧、交趾、合浦、珠崖等9个郡。南头地区改属南海郡博罗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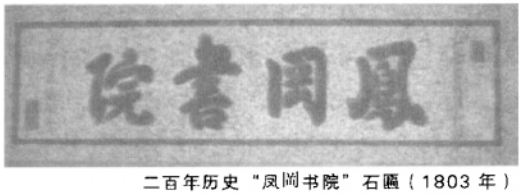
开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官办盐铁的建议，在全国28个郡设立“均输盐铁官”，南头是南海郡最大的盐场之一，水路运输极为方便，据说南头前海湾水面漫及今蛇口、宝安区新城一带。河流深而阔，从下沙河（今南山区大涌）可以乘货船直到西丽白芒村，故县志载有白芒渡口等。今南头、白芒、白石、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及罗湖上埗、下埗、沙头、赤尾等地均可航船。南头是汉朝在广东设立东、西两处盐官之一，后来被称“东官盐场”。

《晋书·地理志》载，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郡设立东官郡，辖地西至珠江口两岸，东至福建交界，下设宝安、怀安、海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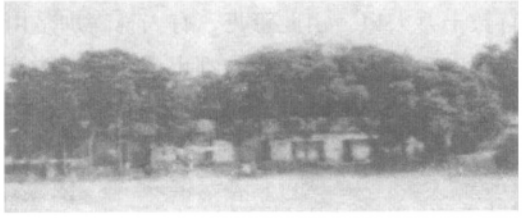
6 县，郡治设在宝安城子冈，即今南头城东门外芒果园一带。

东官郡首县宝安，首次出现在史书上立县，地域比如今的深圳市大得多，辖区大致包括清代的东莞县、香山（今中山、珠海市、澳门）和新安县（含香港地区）。为什么称作“宝安”？有三种说法。《广州府志》载：“宝山在城北八十里，宝安县以此得名”。“宝山”实是银矿，古代曾设炼银场，此为一说。古代人视盐为宝，人无盐不活，有盐则安，故名“宝安”，此为其二。其三是因这里“山辉泽美，珍宝之气彰焉，故郡名以宝安”，此“珍宝”指元朝时期盛产珍珠、香料也。

隋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废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南海郡。东官郡设置历时259年，在南头设郡治约为170多年。



二百年历史“凤冈书院”石匾（1803年）


20世纪60年代南头中学足球场

唐代，因为南头距广州较远，不比东莞经济发展迅速，公元757年将县城迁至涌（今东莞市），县名改为东莞。此后800年中，宝安地区一直属东莞，县城北移后，南头从行政和经济中心变为海防交通要塞。清代著名堪舆学家顾祖禹说广东海防形势为三路：左路是惠州、潮州，右路是雷州，中路是广州，三路中以中路最为重要，“东莞南头，古之屯门镇，乃中路也”。南头颇多良港，尤以赤湾著名，为历朝对外贸易集散地，“海上丝绸之路”直达大食（阿拉伯）、暹罗（泰国）、爪哇、占城（越南）、麻逸（菲律宾）、三佛齐（苏门答腊）等国家。北宋时在南头设立“巡海水师营堂”。

明洪武二十七年建起南头城后，距东莞县城百里之遥，倭寇侵扰，东莞鞭长莫及，百姓苦不堪言，多次请求分县治理。公元1572年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巡行至南头，当地长者吴祚代表百姓再次恳求立县。刘稳征得东莞知县董裕同意，当年夏天奏报朝廷，万历元年（1572年）准奏，赐名“新安”，取其“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义，县治为南头城，首任县令吴大训主持邑事，明朝期间共有26任知县，治县45年。

清顺治十八年（1662年），为对付台湾抗清的郑成功，推行凶恶的海禁政策，沿海五十里居民一律迁徙内地。新安县大部沿海属“重灾区”，全县被迁三分之二；迁界手段十分残忍，屋拆船烧，人荒地芜。据此康熙五

年（1666 年）将新安县撤销，剩余地区交东莞县。整个新安县成一片废墟，从晋以来历经千余年开发而成的繁华古城，此时几乎荡然无存。

目睹百姓的深重灾难，广东巡抚王来任在临终前遗疏康熙皇帝，痛陈内迁利弊，要求复界。康熙八年解禁复界，并重新设立宝安县，新任知县李可成采取一切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巩固海防，使古城逐渐复苏。清道光和咸丰年间，香港、九龙和新界相继被英帝国主义割让和“租借”，新安县被割去大面积富庶的沿海和海岛。

1900 年 10 月 6 日，孙中山组织领导了新安三洲田“庚子革命首义”，（又叫惠州三洲田起义，因三洲田曾属惠州）打响了反清第一枪。1911 年清王朝覆灭后，1913 年民国当局因河南省已有新安县，于是复名宝安县。

1949 年 10 月 16 日我人民武装解放了南头，自此从东晋开始有 1600 多年历史的古城获得了新生。1953 年宝安县城从南头搬迁到深圳，南头城结束了千多年的“郡治”、“县治”地位，成为宝安县辖下的一个镇（公社）。1979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

深圳市，是由宝安县城的深圳镇得名的。深圳市的地域是整个宝安县，有数十万人口。由此可见，有人说深圳是由一个小渔村的 2 万人，发展成今天有上千万人的现代化大都市；也有人说深圳是“一夜城”是文化沙漠，没有多少历史的沉淀。至此，我想不用多说，大家自然明白了。

深圳有几口奇特的古井。清嘉庆二十四年修订的《新安县志·井泉》里记载："渔仔井，在南山涌口头，每潮长则咸水浸之，常有小鱼游泳其中，潮退味仍清冽洵，奇泉也。""甜胡石井，在七都平湖乡左，汲之仅容一瓢，日夜不竭。""汤井，在玉勒村治，温煖如汤。"东门老街的几口老井，没有像欧洲一些古城那样幸运，一砖一瓦被保护起来，也没有像深圳华侨城深圳湾大酒店的机遇，整个酒店被拆剩一截旧墙而被原始保留着。东门老井，被无情的商业大潮淹没，已被现代大厦深深地掩埋在地下……

东门老井

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是否假日，我在东门老街行走，总像被人山人海的"潮水"推着走。天气酷热，刚换上一件干爽衣服，没走几步路就汗流浃背，很快洇湿了腋下，也洇湿了裤头。这时仿佛走在沙漠路上，渴望一泓湖水、一条溪流；我习惯性地幻想找条小河溪，找一口井。"咚"的一声，我忽然被人撞了一下，才想起此时是走在深圳东门步行街上。

我有点不甘心，在著名老街密密麻麻的商铺周围，熟悉而又陌生地四处转悠，寻觅着似乎逝去不很久远的岁月。噢，以前穿城而过的深圳布吉河被盖了顶，成了新园路，河水在华城底下汩汩流淌；东门的那几口老井呢，它们又在哪里？

老东门就那么几条小街，上大街、北门街、养生街、谷行街、鸭子街、猪仔街、鱼街、南庆街、陶兴街等，立新街、永新街是近几十年发展的；解放路、人民路明显烙上时代印记。解放路是解放后将西和街、谷行街和东升街贯通扩建后才换路名，算大的了，成十字状东西南北贯穿城

东门老街原貌



东门步行街



区，所以称之为路。建设路、和平路虽说是路，但它沿着广深铁路两边往罗湖桥延伸而去，路两旁尽是稻田和鱼塘，没几间建筑，有点像城郊了。除了城郊和附近湖贝、蔡屋围、向西等村子以外，我知道镇上几条小街的市民吃水，在未通自来水之前，全靠十字街口“伦记”左侧（今陶兴巷前）、北门街（今西华宫）、养生街（今九龙旺角城后）、鱼街（今中威商业城）和南塘（今太阳城后面）等五口井。解放前城西烟馆、赌馆那一带吃水，只有从油榨头流经新园路、工人文化宫往渔民村出海的布吉河水了。

清嘉庆二十四年编纂的《新安县志》就有深圳墟的记载。早在明朝中期由湖贝村、向西村、黄贝岭村、水贝村张姓人氏建起商铺，后来罗湖村袁氏、蔡屋围蔡氏、福田沙头石厦欧姓赵姓潘姓等，也在这些商铺周围聚集起卖米卖油卖布卖鱼卖猪仔鸡仔鸭仔，逐渐发展成行成市，热闹的深圳圩就自然形成。清初，为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反清复明势力，两次迁海，将新安（含今香港地区）居民迁至他乡。康熙七年，新安县全县人口仅剩2千余人。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是边防地区，人口发展严格控制，加上外逃香港不少人，原宝安全县不足30万人，县城深圳镇“国家粮”居民仅两万余人了。这几口老井，供给镇上几条小街人家食水绰绰有余，当然，此时已用上了自来水。

深圳有几口奇特的古井。清嘉庆二十四年修订的《新安县志·井泉》里记载：“渔仔井，在南山涌口头，每潮长则咸水浸之，常有小鱼游泳其中，

潮退味仍清冽洵，奇泉也。”“瓢胡石井，在七都平湖乡左，汲之以[illegible]瓢，日夜不竭。”“汤井，在玉勒村治，温煖如汤，能疗疮疾，秋冬[illegible]有烟气，海防周希尹命砌以石。”“九架梯井，在南头城西门外，泉水甘美，隆冬不竭。”“龙井泉，在鹏城东山麓，横开一穴，泉流不竭，其水夏寒冬温，甘美与他异泉。”“太极井，在南头城北门，井中有一巨石，如太极形。”“沙井，在西乡村，水甘，四时汲之不竭，古传有罗隐迹。”以及“仙人井，在长洲（今香港离岛）山麓，泉出石上，隆冬不竭，甘冽异常”等等。

深圳墟镇的几口老井，不奇，不特，不上志，但镇上老百姓“上心”，因为它清澈、甘甜，是“生命之泉”。也许是布吉河水擦边而过，水源异常丰富。井很深，但井水充足，水面离井口大多三几尺。雨水充足时，井水几近井边。井口由花岗石砌成四方形，可容两三人同时汲水。每逢早上和傍晚，姑娘、大嫂鱼贯挑水，穿梭弯弯曲曲的小巷，水花溅洒在青石板上，留下迷人的身影，飘洒笑声一串。石板铺成两丈宽阔的井台，蹲着不少女人在洗衫搓衣，淘米洗菜，说说镇上趣闻和小巷逸事，用如今时尚话来说，是小街交流信息的平台，都市风情浓极了。



在古井汲水

我最欣赏老井的一景，是嫂子们用“桶吊”在井里娴熟汲水的情景。女人们弯着腰，腰肢随着打水动作摆动，刹那间以为是美人鱼游上岸来到井边；她们用桶打水，木桶没有绑着绳子，而是在一根扁担两头固定着两节带绞圈的铁钩，把浮在井水的木桶钩住，让已进有小半桶水的木桶用力再次沉入井水里，待桶灌满了水后，就提起竖着的扁担，一节一节连扁担带桶水提上井边。如果技术不过硬，桶在井里浮动直打转，“桶吊”钩不到桶，耽误后面的人打水，会遭到善意的催促，越催促越手忙脚乱。“桶吊”打水，挺欺负人的。后来可能各家各户到井里汲水，桶底容易污染井水，被人们改作井边放着两三个公用铁桶，“桶吊”的功能退化为只挑水之用。再后来，镇上装上了自来水，“吊桶”就慢慢消失了。

挑水的人少了，但井水仍有许多人用。井水清澈可镜，甘凉爽口，冬暖夏凉。记得那时要吃冰镇西瓜，没冰箱，就到老井汲取满满一桶水，把西瓜泡上一个晚上，第二天冰凉的西瓜就非常诱人，吃了，令人久久难以忘

怀。

老井的水，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正午时分，老街的人纷纷去挑水，据说就这一天的水放在水罐瓦瓮里，三几年都不生虫，不会变质，老街人称之为“七月七水”，又叫“七姐水”。用“七月七水”腌咸柿、腌酸梅，腌柠檬。腌出的柿子爽脆，清甜；咸酸梅、咸柠檬色泽金黄，味道甘香。用瓶子密封的“七姐水”还可以解暑退烧呢，特别是小孩子生痄腮，用这井里的“七姐水”磨犀角涂之，立马见效。

记得一次不知哪条小巷水管爆裂，自来水厂工人关了水闸修水管，时值黄昏做饭时间，老街的女人和男人便挑起久已不用的木桶、铁桶、胶桶，一齐涌到养生街老井挑水。

霎那间，狭窄细长的养生街，人气骤旺，五颜六色的胶桶、木桶在弯曲的小巷里“蜿蜒”。我忽然想到先人们太犀利了，睿智和聪慧老早就把这条小街叫做养生街。

养生街这口古井，涵养了这老街的居民啊。

当然，我无法知道是先有古井，还是先有老街。我伫立在老街骑楼下，似乎站在历史的接口点上。小巷仍然幽幽深邃，隐约传来老井清泉叮咚的回声。

这日，我随着在东门步行街潮水般涌动的人群，徜徉在琳琅满目的商店里，无意购物，也无心欣赏名牌，我似乎在顽固地寻觅那几口古井。

小街的几口老井，就那么少得可怜的三几口老井，就没有欧洲的古城那样幸运，一砖一瓦被保护起来，也没有深圳华侨城深圳湾大酒店的机遇，整个酒店被拆剩一截旧墙而被原始保留着。

东门老井，被无情的商业大潮淹没，被现代大厦深深地掩埋在地下。它背负着历史的沧桑，来不及为现代都市文明发挥“余热”，就委屈地“退隐”地底，继续着它的历史文物岁月。也许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按照他们的宏图规划，再一次改造东门老街的时候，挖土机一铲往下挖掘，嘿！发现了这几口古井，被填埋的古井里说不定会出土一些秦砖汉瓦，或者明陶清瓷，甚至我们现代人用过的塑胶桶、桶吊钩……

哦，子孙们兴奋地发现：原来我们还有“源”，还有“根”，还有古老的井文化……

据《罗湖铁路历史》和《九广铁路的历史》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龙）广（州）铁路开筑，由詹天佑担任顾问，中国人自行修建。九龙至罗湖港英段全长35公里，1910年10月1日通车；深圳罗湖至广州全长146公里，于光绪三十三年8月开筑，1911年3月建成通车。罗湖桥桥长44米、宽20米，包括铁路桥和人行桥两部分；桥面有一条红色油漆作为香港和深圳的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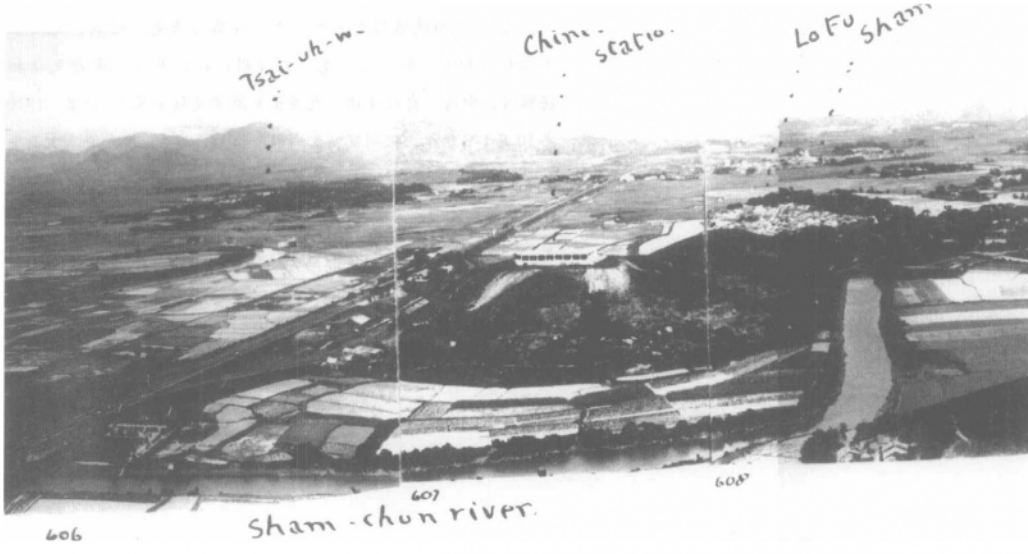
百年罗湖桥

罗湖桥，横跨小小的深圳河，连接香港和深圳，桥不长，也不险峻，更不雄伟，但在世界上名气不小。

我对罗湖桥最早的印象，是从《羊城暗哨》《跟踪追击》《秘密图纸》等反特斗争故事片中了解的。那时，罗湖桥似乎当了“反派”的角儿，觉得那是条很多可憎的狗特务的通道。上世纪60年代末，我多次陪北京和省里的文化名人参观罗湖口岸和九龙海关（深圳海关前称），站在距离罗湖桥20多米远的“边防禁区”，看着一人一半的桥上，站着港英当局“差佬”和我边防军哨兵，眺望桥南边罗湖山上“差馆”（港英守军哨楼），“差馆”楼顶上飘着英国的米字旗，除了新奇感外，特别有种神秘、萧瑟的感受。一股想了解这平常而又不平凡的边境小桥的强烈愿望，顿时油然而生。

沧桑之桥

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深圳在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建墟。罗湖桥几百年前是梧桐河上一座小石桥，后来变成30来米长的小木桥，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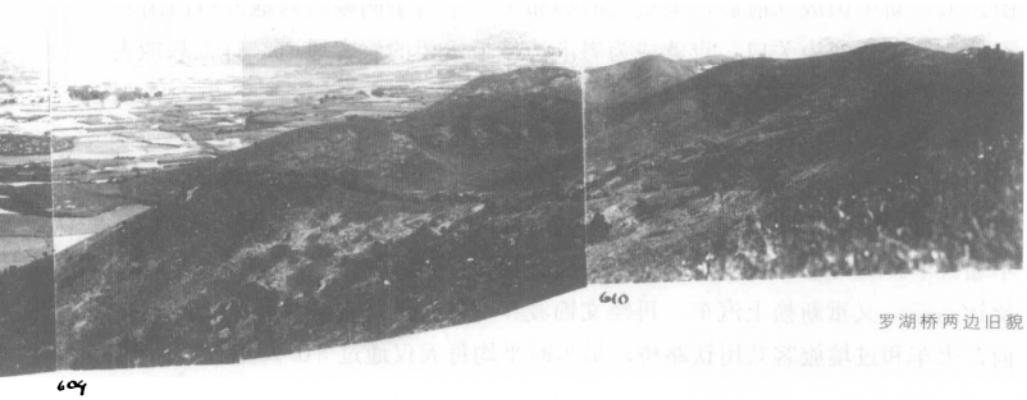


1906 年九（龙）广（州）铁路开筑，罗湖桥建成桥长 44 米、宽 20 米，包括铁路桥和人行桥两部分；桥面有一条红色油漆作为香港和深圳的分界。

说起罗湖铁路桥，不能不说九广铁路筑路风云。香港九龙至广州铁路全长 181 公里，是我国早期建成通车的几条铁路之一，也是在风雨飘摇岁月中建成。大家知道，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没落的清王朝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争夺中国沿海港口、海关、财政控制权和铁路建筑权面前，束手无策。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绳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列宁语）。”美国以合兴公司名义，跟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合同”；英国以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组成中英公司，跟清政府签订“九广铁路的草约合同”，写明与粤汉铁路连接。这样一来，美英两国控制了湖南、湖北、广东 3 省的铁路权。

“九广铁路的草约合同”合作条件非常不公平，《东莞县志·卷三十六》载：九广铁路“议借英金一百五十万镑，照虚数九四折纳年息五厘，以本路作抵押，三十年为期满。”换言之铁路未建成，利息照付，可从铁路抵押借款中支付利息，英国根本不用掏钱。铁路工程师、车务总管全是英



罗湖桥两边旧貌

国人，材料也是用英国的。整个合同没有一项对中国有利。这强盗式的筑路，引起国内提出商办铁路的民族资本家不满，引发由粤汉铁路开始的全国人民争夺铁路权的斗争风潮，广州等地报界纷纷撰文强烈要求废约。美国见状，要回已筑好 10 来公里铁路价钱 400 万美元后，放弃粤汉铁路。至于英国却决不放弃，1904 年马上派出只有 42 岁、皇家工程师出身的马太·弥敦，到香港就任港督，抢先在 1906 年主持九广铁路罗湖至九龙段动工兴建。

当初，九广铁路是经过惠州的，因惠州一带地形、地层复杂，改经樟木头、石龙。这样既缩短距离，又节省费用。一百多年来，惠州市无缘广九铁路，直至 21 世纪修成大京九铁路，惠州才改写没有铁路的历史。话说回来，九广铁路港英段全长 35 公里，1910 年 10 月 1 日通车。而深圳罗湖至广州全线长 146 公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8 月）开筑，1911 年 3 月建成通车。

据《罗湖铁路历史》和《九广铁路的历史》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建罗湖铁路桥时，由詹天佑担任顾问，中国人自行修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为阻止日军进攻，曾于 1941 年拆毁罗湖铁路桥及九广铁路，但日军还是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开始进攻，12 月 11 日九龙失陷；12 月 25 日，香港沦陷。日军占领期间，对罗湖铁路桥及九广铁路进行了重建，日军离开时，又拆毁了罗湖铁路桥。

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香港的长时间内，虽然从沙头角到福田下沙村，以

弯弯曲曲的深圳河为界，但深圳和香港并无边境封锁，粤港两地人民仍可自由往来。新中国成立前后，港英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条例限制内地人自由出入香港，罗湖桥变为关口，也就成为粤港边境最主要的旅客通道，行人只能走铁路桥，粤港往来旅客人数十分稀少。

现在的罗湖桥是1957年重建的，桥长32米，宽12米。由于五六十年代，受“政治边防”和“军事边防”政策的影响，深港边境线上的罗湖桥也始终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在1979年以前，深港两地虽有铁路，但并不通火车。从内地运往香港的鸡鸭鹅猪及水果蔬菜等都是用火车运到深圳笋岗货运站后，又重新换上汽车，再经文锦渡和罗湖桥运往香港，在1981年以前，火车和过境旅客共用铁路桥，最少时平均每天仅通过50人左右。2003年9月28日，为适应深港两地经济建设和深圳河防洪需要，重建罗湖桥。原百年老桥，已沿轨道平移到旁边10多米处的香港路段，作为文物永久安置。

罗湖铁路桥是祖国大陆通往香港、九龙的惟一铁路大动脉，它见证了深圳河两岸的风雨沧桑，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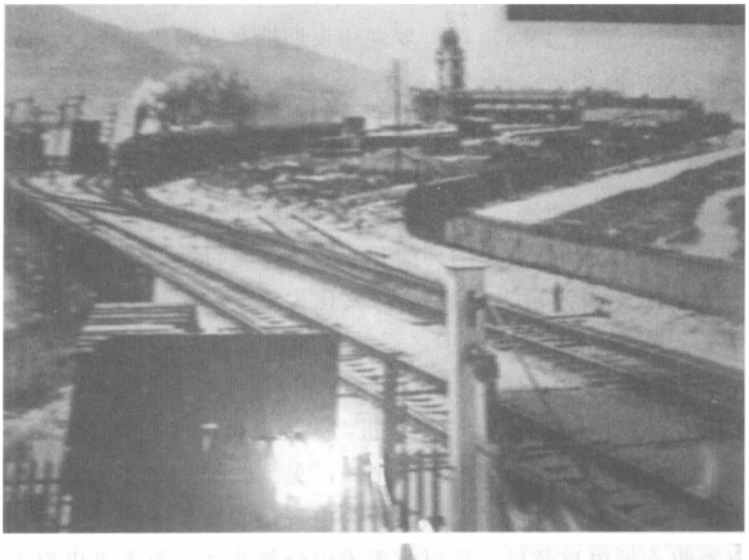
望夫之桥

从港方罗湖海关坐电气化火车去九龙，途经大帽山时可清晰望见一座望夫石。这里有一个凄美动人的传说，关于这个传说在这不赘言了。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二三十年里，每逢周末或民间重大节日，从打早到黄昏（香港方面过境“关闸”前），罗湖桥边的深圳火车站周围，聚集成千上万的深圳人，引颈张望罗湖桥，一等五六个钟头，迎接自己的香港亲人。由于接人的多数是背着孩子的妇女，等到老公大包小包挑着衣物食品，疲惫过关来到面前，才甜甜蜜蜜相拥回家。其时，因深港两地关系紧张，内地群众极少能赴港探亲，唯有等丈夫回乡团聚。日积月累，老百姓就把罗湖桥称之为望夫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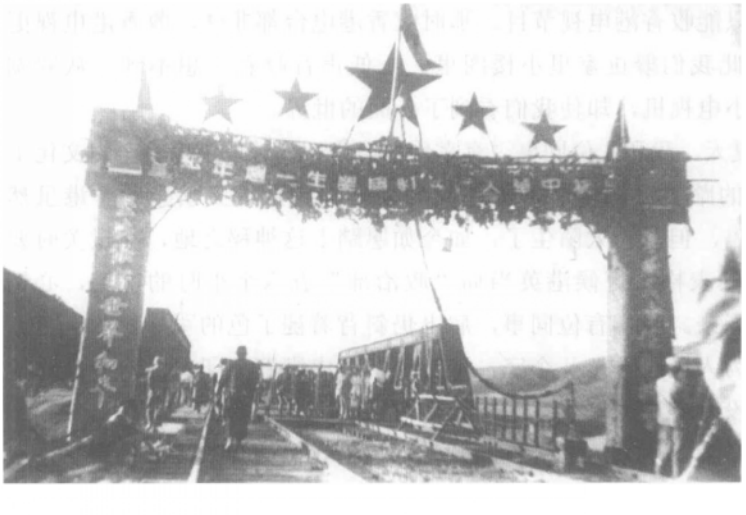
我记忆中，1960年开始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深圳周边的老百姓蜂拥罗湖、文锦渡、沙头角边境河口“非法移民香港”，光宝安县境内就达十万之众。1978年底，传言港英当局“封河口”（即停止给到达香港的非法移民办理身份证），深圳及周边县市农村再次出现“偷渡”去香港的高潮。尽管边境双方守得很严，抓到后各种惩罚措施也很严厉，但仍然刹不住这股“外逃风”。后来我赴港时，在香港听到一位朋友说起他从罗湖桥附近偷渡到港的故事，很是精彩刺激。那年，他“活学活用”“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最安全”的经典，选准罗湖桥左侧的边防检查总站卫生所旁边（今联检大楼东侧20米河边），黄昏前就躲藏草丛中，天黑了看见边防哨兵走远，丢



广九铁路首列火车（摄自深圳市博物馆）



香港九龙车站（摄自深圳市博物馆）



罗湖桥庆祝解放一周年（黎德奎供稿）

了几块小石子没动静，便下河游过10来米宽的水面，摸黑爬过铁丝网，来到靠近上水（今深港供水管）附近的菜园里，在菜园放工具的无人铁皮屋里偷偷洗个澡，换上衣服等到天麻麻亮；发现铁皮屋里有电话，就按香港亲戚地址拨去，想叫他们来接。谁知他没拿起电话筒来拨号码，而是像在乡下按住话筒那样摇电话，香港电话打不通，只好走出菜园，被小村子路口的几条狗发现狂吠，惊动了在附近巡逻的“叽喀兵”（雇佣军），赶过来把他捉住。当即解往文锦渡“差馆”登记后，移交给深圳方面的“收容站”。偷渡被抓了回来，什么政治前途都没了，只能再搏一次运气，隔了半年，他终于从南头大涌方向游泳成功偷渡到港。

那年头，凡能“过五关斩六将”逃出港的都是机灵的青壮男人，所以许多农村剩下的多数是老人、小孩和妇女。长时间严格限制内地群众赴港探亲，只有“香港客”回乡团聚，带回猪油、糖果、饼干食品和衣服、日用品，接济贫困的亲人。直至1985年，罗湖桥头迎港客人潮仍然不减，成为深圳当年的奇特景观。

希望之桥

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罗湖桥成为连结港澳、国外的开放之桥，老百姓的希望之桥。

1979年元旦，我到罗湖桥去接亲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亲戚害怕国内政策，不敢贸然踏过罗湖桥，回一步之遥的深圳镇。元旦前一天，他听到新闻说大陆从1979年1月1日起，港澳同胞每人完税可带一件电器。我亲戚马上抱起正在使用的12寸万年牌黑白电视机，坐上火车，过了罗湖海关，交了50元税款后，来到人山人海的火车站出口，见到我们。我非常幸运，成为深圳镇上大街第一个拥有电视的人家。因为电视接收系统不同，收不到祖国大陆台，只能收香港电视节目。那时收香港电台都非法，收香港电视更不在话下；因此我们躲进家里小楼阁里，压低声音收看。想不到，从罗湖关带进来的小小电视机，却使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1982年夏天，我和几位同事，有幸受邀请第一次赴香港考察学习文化工作。当我们真的踏上罗湖桥时，刹那间既兴奋、新奇，又紧张。香港虽然和深圳一河之隔，但对它太陌生了；如今如愿踏上这神秘之地，在过关时要填写各种复杂的表格，等候港英当局“政治部”五六个小时的审查，心情一阵阵紧张和无奈。我们有位同事，肩上仍斜背着褪了色的军绿色的卡包，卡包上印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卡包用白毛巾绑着个印着奖给劳模的搪瓷口盅。那时没有矿泉水这玩意儿，他用口盅续上军用水壶里的水喝着。他的一身打扮和举动，引来一些奇怪的目光，也使我们一行人一身不自在。我

想，深港两地多么需要沟通和交流啊。

自此，我因工作关系，10 多年赴港达 180 多次，平均每个月都去一两次。我每次跨过罗湖桥时，都感到有不同的变化。以前坐的是柴油机车头，车厢狭窄，硬木座椅，罗湖至九龙全程 7 块港币。1983 年 7 月港段全线电气化，票价从 11 元逐年直涨至 30 多元。1994 年 12 月 22 日深圳至广州建成三线铁路通车，成为我国第一条三线并行、全程封闭的准高速铁路。1993 年电气化工程开工，1998 年建成我国第一条城际旅客列车公交化准高速铁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通了已经停止近 30 年的由九龙至广州“直通车”，大大方便粤港人员往来。罗湖桥由单层桥变成双层桥，火车道与出入境人行天桥分开。双方海关、证件查验不断简化手续，排队过关时间从以前几个小时，缩短到几分钟，“回乡卡”自助通关 8 秒，直至最近“指模通关”的 3 秒钟。旅客从以前香港入境比大陆出境多，到如今大陆出境游剧增，每年出入境人次达 1 亿多，占全国出入境总数 4 成多，成为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入境旅客从最初普遍带食品衣物，到电视、冰箱、摩托车等电器，到如今相反，香港同胞在深圳购物，携带服装、食品甚至国产空调、DVD 机、音响等电器返港。

1997 年香港回归，风雨沧桑的罗湖桥，焕发出活力青春，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有诗人形容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罗湖桥，像个问号，背弯屈辱，老泪横滴；香港回归祖国，罗湖桥像个叹号，腰杆挺直，扬眉吐气；香港回归 10 周年，罗湖桥像个破折号，连结海外，迎四方客人；像道绚丽的彩虹，把港、深、穗甚至“大珠三角”串连一起，装点得璀璨美丽。

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深圳就“立墟”，这一立，上大街说少也有近600年历史。上大街不要以为很大，其实刚够旧时县衙的“大轿”通过。那年月没有电视，没有音响，只有县广播站一个入室喇叭，除了定时听听新闻外，还听些革命歌曲。街上没有卡拉OK舞厅，也没有美容洗脚屋。小街巷窄人多，天气炎热，每到黄昏，一缕夕阳照进，人们趿着木屐或穿着人字胶拖鞋，扇着葵扇在自家门口石条上纳凉、聊天、下棋；有的拿把二胡、秦琴弹奏广东音乐，有的在木板楼阁上哼唱着清绵委婉的粤曲，乐韵随着晚风中沿着青石板小街悠然漫去……

026

岭南风情上大街

深圳东门老街没有改造之前，有条小街叫上大街，上大街是我的家，准确地说是我老婆的家。我老家在乡下，而我在县政府机关工作，单位没有房子，上世纪60年代末我“嫁”给了老婆，也就“嫁”到上大街，一住就住了近20年，直至上大街拆迁，我才离开这具有岭南特色、最具深圳风情的青石板小街。

上大街本来不是住宅民居，它曾经是深圳历史上最辉煌最多店铺的商业老街。据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深圳就“立墟”，这一立，上大街说少也有近600年历史了。

上大街在东门老街的“猪仔街”、“鸭仔街”、“鱼街”等街巷中，居然敢称“上”且“大”，没有点“斤两”那是不敢称老大的。上大街最“威水”的日子是解放前后那段时间，它是集中买卖布匹丝绸、印染布料，加工成衣、蚊帐、被褥、枕套之类的布匹专业商街。小街东西走向，街头到街尾上百号店铺，鳞次栉比，檐飞瓦叠，青砖墙，灰黑瓦，一间接一间，一座连一座，没有间隙，没有巷罅。有的两间铺，中间只一堵

墙，省去了一边墙的人工和钱财。小街里头的房子，一般比较高，多数有二层或一个阁楼，好用作住家或货物仓库。当年已有名气的“东生源”百年老店，店铺有400多平方米，里面有染布淀池和打磨工场，光是淀池，就长宽七八米，深达十米，每天印染外，还批发丝、绸、缎、纱、布和香云纱等布料。

上大街不要以为它很大，其实最宽处也就五六米，最窄的不足三米，刚够旧时县衙的“大轿”通过，也足够商贾挑担货物进出。店铺门面，三至五米不等。开铺时，把一块块高两米、宽一米的门板卸下来，拢叠靠墙一角，用麻绳子圈一圈。门板用了几十年，油漆早就老化斑剥，上门槽的顶端和下脚门椽都霉烂，剩下犬牙似的少许木头顶着。记不得哪间店铺，有块门板突然往街心倒去，险些压着行人。

街两边的屋，瓦檐对瓦檐，门窗对门窗，几乎伸个手就能搭到对面房子的窗椽，从底下往天上望，抵得上“小街一线天”的雅号。屋对屋的檐近了，野猫常常在屋顶跳来跳去。好端端的瓦筒，被蹭得东歪西扭。屋瓦顶被滚动得“嗦嗦”作响，接着撒下泡尿，顺着瓦槽往下流，不注意的人还以为是下雨呢。到了夜里，雌猫发情，散发出骚味，嗷嗷寻偶，酷似婴孩夜哭。雄猫听声，闻骚味，相聚，腾跳，滚动，两边瓦背顶被搅动得令人难以寝睡，只好个个从小窗户里探出个头，厉声喝道：“死猫，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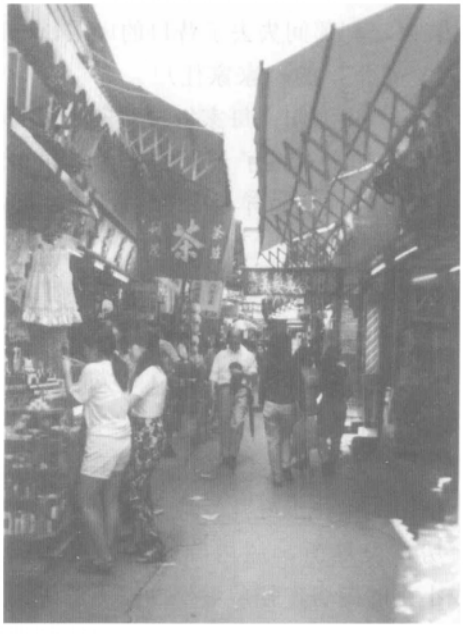
上世纪50年代深圳墟拆了西和街、谷行街等几条小街，打通建成了解放路。上大街的店铺纷纷迁往解放路、人民路。上大街顿时失去了商业功能，像时髦女郎卸下耳环首饰粉脂和时髦装束，刹那间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间间热热闹闹的商铺，成为城镇居民“静雀雀”的一家家住户。

这条小街住的人多了，下了几天雨，一出太阳，每家每户翻出潮湿的被单、床褥、蚊帐、棉被及不常穿的厚衣，加上有孩子人家的裤衩、尿布和姑娘们的艳丽连衣裙、袜裤、通花内裤等晾在横竹竿上，你伸过来，我搭过去，一行行，一排排，密密麻麻，随风飘扬，几乎把那从“一线天”檐缝透进来的阳光遮住了。有好几次，好些外国游客，钻进这街巷里，专门猎拍这充满生活情趣的市井风情，吓得那些探出头晒衣服的妇女，赶紧把头缩回去。有哪家女人，衣服拧得不干，水老往下一滴一滴地淌，人们从这衣服滴水中穿过，以为是“大街太阳小街雨”景象中下着的“太阳雨”。

上大街岭南景致独特，市井风味的人情味也特浓。1969年底我住进上大街31号时，这条凹凸不平的青石板小街，已住上好几百户人家。由于店铺变住宅，先天“设计”不足，没厨房，没厕所，屋内临时用木板间隔，楼阁楼下挤住三四家人。那些改造成小小的厨房，摆放着三四家人的蜂窝煤炉和三四套砧板、锅、煲，一天三餐你煮我烹，一刻也没停过炊烟，但是



上大街口叶挺将军建立的东江游击指挥总部旧址（原鸿兴酒家）



上世纪80年代的上大街



1996 年拆迁时的上大街

很奇怪，大家少有争吵。有谁家煤炉早上要“起燃”，把轻便蜂窝炉从厨房提到门外，在小街这头用柴草点燃，浓烟顺着风向往街那头窜去，恰似农村院落飘着袅袅炊烟，刚出门口被浓烟呛着的人，尽管掩鼻抹眼而过，也绝没有谁骂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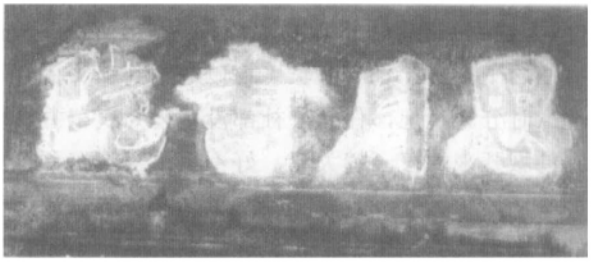
我和邻居张嫂、魏叔、陈姨、黄伯和李大娘儿家人左右相邻，对门而居，白天从没关门闭户，我家干什么，你家吃什么，“单眼仔看老婆，一眼望尽”。大家不仅不避忌，相反当时物质奇缺还“互通有无”，大有“远亲不如近邻”之感。

我当时在县机关工作，经常下到各乡村住队，搞政治边防、反外逃、学大寨、开荒造田，一项运动接着一项运动，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三同”，没一年半载不回城。1971 年 6 月的一天，我老婆怀孕快下产，她身边没有亲人，很着急；我即将首任父亲了，却“任务紧”不能请假回来，在农村干着急，整天心烦意燥。我老婆肚子疼的那天，街坊邻居告诉我单位，我单位打电话告诉我“三同”的公社，公社通知大队，大队派人找到我住的生产队，生产队长飞也似地跑到田头找到了我，折腾了大半天，已是晚上时分。晚上，任何公社都没有公共汽车去县城，我眼巴巴等到天亮，等到县城开来的仅一趟大巴，好不容易买了车票挤上去，摇摇晃晃返回县城深圳，已过了大半晌。赶到医院见到产房门口的魏叔老婆和张嫂两邻居，是她们昨天用人力三轮车把我老婆送来医院，办了住院手续，又送汤又送饭，照顾到我从乡下赶回来。在医院，听医生说我老婆早早“破了羊水”，十多个小时难产，正有气无力，我六神无主，脑里一片空白。忽然，见到街坊李大娘坐着她儿子的单车尾，从医院走廊颤颤巍巍过来，把一个口盅里暖着的一个小茶杯递给我，说：“这是高丽参汤，对生孩子有用。”我接过这珍贵的人参汤，马上由护士带进去给我老婆喝。我回过神来找李大娘，李大娘却又坐上她儿子的单车尾，一颠一颠地回老街去了。我责备自己没有向李大娘道一声谢，不应该就让李大娘这样悄悄走了。要知道，这高丽参，是老人的家人从香港带回来给她补身子的，而她一听到我老婆难产，舍不得自己吃，去帮助一个邻居，一个非亲非故的邻居！此时此刻，我感激得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老人不辞劳苦送来贵重的人参汤，还没听到半句新生婴儿降生的啼声，也不图街坊邻里的半句道谢，以一个女性的母爱，无私地温暖着邻里。李大娘佝偻的身影和这一小杯人参汤，在我心灵深处久久激荡了数十个岁月。

以后，孩子稍有头烧脑热、病痛哭闹，临时接送托幼、看管关照，都少不了邻里们的帮忙。上大街家家户户门对门，谁家开饭，孩子嘴馋，“隔壁叔婆饭菜香”，不请自到，“登登登”蹭上人家饭桌，喝东家粥吃西家

饭。张嫂对孩子打趣道："你到我家吃饭，要带米来喔。"小家伙一本正经地趴在桌上："我家没米。"逗得大人们都笑出泪水。要知道那时米、油、糖、肉、布，甚至肥皂都定量供应，家家不宽裕呀。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里，谁家拿出自家几条番薯、芋头、玉米或自制糕点或几只熟鸡蛋分送邻居，胜过如今送给一盒盒"黄金搭档"和鸡精口服液……

上大街从东到西没有拐角，只有小巷中间有个岔口通往鸭仔街。那时没有电视，没有音响，只有县广播站一个入室喇叭，除了定时听新闻外，还听些革命歌曲广播。街上没有卡拉OK舞厅，也没有美容洗脚屋。那年头，巷窄人多，天气炎热，每到黄昏，一缕夕阳照进街巷，大家饭后在家门口石板上，趿着木屐或穿着人字胶拖鞋，扇着葵扇在自家门口石条上纳凉、聊天、下棋；有的拿把二胡弹奏广东音乐，有的在木板楼阁上吹奏悠扬的笛子、唱粤曲，乐韵随着晚风沿着青石板小街悠然漫去。女人在家门口石条上打毛衣，孩子们踢毽子、打玻璃珠子，男女老少，各有所乐。上大街街头街尾和中间共有三个公用水龙头，不用收费，大家自觉排队轮流装水，没有人争先插队，没有人浪费用水。



百年石刻匾——思月书院

街上洗菜洗衣，谁家遗忘一盒肥皂，过了一夜没人拿，家家日不关门夜不闭户，没人偷东西。就是有了这些日复一日的买菜、淘米、洗衣、挑水、喝茶、聊天的生活细节，才积淀了老街浓郁的市井风情；也就是有了无数日出日落，邻里一针一线、一茶一水的相互关照，才沉淀了老街深厚的民情文化，孕育出岭南小街那种沉静、古朴、诚实和温润的气质。

1996年5月东门动工改造步行街，现代化的挖掘机一砸下去，上大街没了，冒出个太阳城。从此，狭窄低矮的瓦檐相掩的、晾满衣服滴着水珠的长长小巷没了，变成六七层高的太阳城百货广场。但是，"太阳"一点也照不亮我心里。

南塘街、鸭仔街、猪仔街、南庆街拆了，东门老井填埋了，"思月书院"拆改翻新了，"鸿安旅馆"择地重建了，尽管一些"文物建筑"乍一看跟原样差不多，但没感觉，没味道。

百年老街，岭南气质，转眼间说没就没了。

东门还是东门，老街还是老街，地理位置没变，但整体环境变了。步行街变宽了，楼房变高了，街景现代化了，东门从古代的乡镇集市，走向



1925年省港大罢工接待站原址——思月书院

今天的商业都市，整天弥漫着繁华的喧嚣、时尚和自豪，却也掺了几分浮躁和妩媚做作。有人说过，灯的发明，使白天越来越多地侵占了黑夜。东门的商业价值提升了，老街生态的人文价值却流失了。

时间是个过滤器，时间也是个沉淀剂。蓦然发现，真正让人留恋一辈子难以磨灭的不是钢筋水泥垒成的高楼大厦，不是五光十色的街景、琳琅满目的货物、摩肩接踵的观光购物人流；而是那凝聚着岭南风情的青石板、旧屋檐、粤语粤曲以及街坊邻里悠闲的小街情愫。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那段生活，是那个年代的历史切片。面对时代的步伐，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对老街民情风俗流逝生出几分遗憾：为什么东门改造时非得要“不破不立”？难道世上真的没有“甘蔗两头甜”的兼顾？唉，“遗憾”永远不会回头，如今那弥漫古老风情的上大街，拆了；它，只能永远藏掖在我那辈人的记忆里。

清嘉庆《新安县志·物产》载："蚝出合澜海中及白鹤滩，土人分地种之，曰蚝田，其法烧石令红投之海中，蚝辄生石上，或以蚝房投海中种之，一房一肉，潮长房开以取食，潮退房阖以自固。壳可以砌墙、可烧灰；肉最甘美，晒干曰蚝豉。"北宋诗人梅尧臣《食蚝》一诗就记载着深圳沙井人养蚝的史实："薄宦游海乡，雅闻归蜻蚝，宿昔思一饱，钻灼苦未高……"

千年蚝乡

小时候，我就在南头珠江口滩涂"打过蚝仔"。也就是带个小篓、蚝啄，到海边石堤长得密密麻麻、拇指般大小的蚝仔，或去河涌边大人开了蚝剩在大串"蚝树"里的小蚝，撬去硬壳，取里面的蚝仔肉，拿回家煮蚝仔粥、烙蚝仔饼，那味道，够鲜，够香。后来吃过大盆菜宴会，里头有一道"酿蚝豉"，味道甘香，印象深刻。长大后，吃过几次"蚝宴"，也就是"八菜一汤"清一色由鲜蚝的材料做成：白灼鲜蚝、姜葱焖蚝、蒜蓉蒸蚝、红烧金蚝、酥炸生蚝、猪网油酿蚝、香甜煎蚝、砂窝蚝仔粥，加上金银菜蚝汤。至今，眯上眼睛，嘴巴还咂个直响，口水流淌。

广东人爱吃蚝，中国人爱吃蚝，日本和欧美人也爱吃蚝。据记载，古罗马人就视蚝为珍品，要在奢侈的宴会上能吃上生蚝，顿时觉得身份尊荣高贵，饭后会处处向人炫耀。我读过著名作家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他在小说中的描述"两位打扮得很漂亮的太太在吃牡蛎。她们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微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巴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我吃蚝没小说写得雅，但那感受一样，我甚至

把手指上的香汁也吮得干干净净。在那寒风中大排档宵夜，吃着烤羊肉串支架上滋滋地烤出带壳的烤蚝，恨不得连汁带壳吃下去。那架势有点像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赞叹："谁拥有牡蛎，谁就拥有世界。"

不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喜欢吃蚝。蚝，属贝类，学名牡蛎，因蚝肉含蛋白质高达57%而被称为"海底牛奶"，锌、钾等微量元素和氨基酸含量丰富。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牡蛎肉"能细洁皮肤，补肾壮阳，治虚，解丹毒"。现代医学则认为蚝肉有降血压和滋阴养血的功效。

由于珠江口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咸淡水适度，终年气温相宜，海上浮游生物丰沛，因而广东养蚝全国最多，广东又以深圳的沙井和中山的唐家湾最为著名。深圳蛇口、西乡、福永、沙井都养殖蚝，但多为沙井人经营养殖。沙井人养殖蚝很有研究，历史上养出来的蚝，个大肥美，俗称"玻璃肚"，远近闻名。当地有吃蚝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老人的长寿果，小孩的智力库"之说。历史上，本地人嫁娶礼单中，一定有蚝豉多少这一项，有的大户人家过礼，以蚝豉论担计，蚝豉越多，礼越重，越体面。也许"蚝豉"在广东话读音近"好市"，讲究"意头"的广东人，逢年过节、庆典祭祀，或生意人开张大吉，少不了蚝豉、生菜、猪手，祈求"好市生财就手"。尤其港澳地区、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华人，除了祈求生意"好市"之外，还有"想唐山""念蚝情"的情结。这种延绵几百年的民风习俗，长久积淀了这种岭南独特的"蚝文化"。


沙井蚝民开蚝

蚝不仅好吃，蚝的外壳也是个宝。蚝壳烧成蚝灰，既可以当石灰建房用，又可以撒下水田改良土质、中和酸碱，当肥料使用。蚝壳成个垒砌外墙，坚固耐用，百年不倒。沙井有两间古老的祠堂外墙，用一个个蚝壳砌垒，几百年坚实如初，风格独特。最近，还发现废弃蚝壳能起到净化污水的作用，在深圳红树林保护区凤塘河口，建起了一个科研性的蚝壳生物膜污水反应池。反应池分三个水池，分别盛有大块蚝壳、细块蚝壳和颗粒蚝壳，当污水流经三个水池时，分别与附着在蚝壳上的生物膜发生反应。在出口处，污染源被生态净化，流出的是纯净的清水。

蚝壳是宝，鲜蚝好吃，但养蚝不易。蚝是很娇贵的生物，既怕台风日光，又怕大潮和雨水。养蚝人最怕连续不断的倾盆大雨，因为雨水一时落得

太多，使蚝田的水立刻变质，导致蚝大量死亡。蚝田要有污泥，没有污泥，蚝长不肥；污泥多了，又妨碍繁殖。水太深不长蚝，水太浅，暴露在阳光下也不行；蚝附着生长的水泥桩在浅海水里，若是被海潮冲倒埋在污泥里更不行。所以天天要出海，当地蚝民说“一块鲜蚝一滴血”，一点不假。一块蚝，从投下“蚝卵附着器”采苗、育蚝、“列蚝”、寄肥到收蚝，要经过三四年。这三四年间，不管酷暑寒冬，不管潮涨潮落，也不管白天黑夜，他们都在耕海。

清代诗人屈大均编纂的《广东新语》中记载：“打蚝之工具，以木制成，如上字形。上挂一筐，妇女以一足踏横木，一足踏泥，手扶直木，稍推即动，行涉坦上，其势轻疾。既至蚝田，取蚝敲开，得肉筐中，潮涨乃返。” 三百多年来，深圳蚝民们就像屈大均描述的那样：天不亮就冒着凛冽的北风，踩着“泥连板”滑行在蚝田泥泞里，把被海潮推倒的蚝桩，一根根列好插稳。上百亩蚝田，一桩一桩地拨弄，一只脚跪在泥板上，一只脚踩在深深的滩涂泥浆里，一不小心，赤脚和双手被锋利的蚝壳划破流血。血被泥浆抹住，看不见，但心里头知道，真痛……天黑下来，蚝田列好了，潮涨了，他们踩着连板迅速撤离，与海潮赛跑上岸。每年冬至到清明，是收蚝季节，蚝民们又用蚝船将蚝从海里钳起运上岸，用宽大的腰背背着一筐筐蚝到开蚝场，用一把鹰嘴钳将蚝壳撬开并剔出蚝肉来。天气越冷，蚝只越肥，价钱越高，而劳动也最为辛苦。蚝民们戏称自己“三开口”：好收成笑开口，水泡脚冻裂口，手开蚝划伤口。


蚝民列蚝

谁发现这深藏在海水里，又躲藏在丑陋的硬壳里的东西，竟然是雪白娇嫩的生蚝？传说很久以前，有一艘满载缸瓦的木船，航经珠江口的大海湾，遇上了飓风，沉没在深圳沙井附近海底，船上的缸瓦器皿全都落入海中。几年后，当地渔民偶然从海底捞起缸瓦片，发现上面都长着又肥又大的蚝，食之鲜味无比。

这船缸瓦附着长蚝的传说，暂且不去考证。早在晋代，刘恂的《岭表录异》确实有“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卢循背踞广州，战败后余党逃入海岛野居，唯食蚝蛎，垒壳为墙壁”的记载。如今沙井有间祠堂和好些古代民居，用蚝壳做墙的仍数百年不倒。

再往后，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食蚝》一诗就记载着深圳沙井人养蚝的史实：“薄宦游海乡，雅闻归靖蚝，宿昔思一饱，钻灼苦未高。

传闻巨浪中，碾碥如六鳌。六复有泗民，并海施行牢。掇石种其间，冲激恣风涛。咸卤日与滋，藩息依江皋，中厨烈焰炭，燎以莱与蒿，要质以就烹，键闭犹遁逃。稍稍窥其户，清澜流玉膏……”归靖，就是现在深圳沙井一带的古称。上千年前，官宦就“雅闻”沙井蚝，极想饱吃一顿。古人比我们还嘴馋，还讲究营养，讲究享受。

南宋理学家陈朝举，这位朱熹的高足、淳熙进士，由福州府侯官回原籍洛阳时，突遇金兵，被迫南迁，辗转至广东南雄的珠玑巷，晚年迁徙珠江口的沙井定居。沙井的蚝民大多姓陈，都是他的后裔。陈氏家族起初主要从事煮海为盐，以盐为业。后来珠江口泥沙淤积，盐田荒弃，盐场的官衙关闭。陈氏子孙就在家门口捕鱼、打蚝、捞虾，以海为生。

从那时候起，沙井蚝民将养蚝的地方叫蚝田，懂得“插竹养蚝”，在海中插上竹竿作为标志，投石养蚝。从沙井、西乡、南山后海，到香港新界流浮山的半月形海域，宽阔逶迤的珠江口滩涂，随着潮涨潮落，一井井的蚝田，时隐时显，绵延而去。

70 多岁的原沙井蚝业合作社社长陈淦池说，经过世代蚝民的辛勤耕耘，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蚝民不断改良投放养蚝附着器，从缸瓦、陶片、石头、水泥桩柱，到筏式吊养，沙井养蚝业发展了鼎盛时期，蚝产量最高，蚝质量最好。仅沙井一个镇的蚝产量占全广东省三分之一，沙井“科学养蚝”进入广东水产展览馆和北京农业展览馆展出。沙井蚝业社被国家评为“模范集体”、“先进合作社”，先后两次赴京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大会接见并留影。老蚝工陈木根被国家作为养蚝专家先后到北方大连等地和出国越南传授养蚝技术和经验。

正当蚝业生产如日中天、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珠江口蚝区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淤泥积厚，滩涂变迁，水质污染，生蚝死亡。据统计，当年全宝安县死蚝达 65659 井，一井为 3.7 立方米，占总蚝产 72%，年收购量下跌到 1 万担以下，比最高年收购量 7 万担，减收了 6 倍。沙井蚝民由 1 万多人锐减至 200 人，蚝田从 6 万亩剧减至 1.6 万亩。南山后海蚝田因深圳香港跨海大桥建设需要，被国家征用，全部废除填海。祖传几代的老蚝民坐在被清拆蚝田的岸边，热泪纵横：老祖宗辛勤开拓出来的“蚝路”，怎能消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千年蚝乡，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蚝田和蚝市场摸爬滚打了 40 多年的沙井水产公司总经理陈沛忠，他难过得比谁都心痛。他想，“蚝路”必须走下去，要开辟“两场”：一是养殖场，二是营销市场。

面对海浪，心潮难平。老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珠

江口沙井浅海水质不行，何不到其他县市走走，“借船出海”，“借鸡生蛋”？陈沛忠和蚝业村干部拜访广西、广东沿海以往来沙井购买蚝种的老客户，逐地考察养蚝水质和条件。当他们来到台山市汶村、下川镇和惠东县铁冲镇时，激动地说：“这里仿佛就是20多年前沙井的翻版。”三镇均为近海，几乎没有污染的原生态海湾。而且，当地农户都有养蚝的历史，只是都停留在家庭式小打小闹放养阶段，缺乏技术、资金、销路等方面支持。而这恰恰是沙井人的优势，于是，1991年开始他们带资金和技术与台山下川镇合作养蚝2000多亩，1995年增加到2万亩，2002年仅该公司在台山一处养蚝基地达10多万亩。2005年陈沛忠他们水产公司从各基地收购生蚝加工成蚝豉5000担，蚝油2000吨，蚝罐头20万罐。“沙香牌蚝油”1991年获第二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上海市场优秀食品消费者奖”。2004年获“广东省名牌产品奖”（农业类唯一品牌）。许多老客户和侨居海外的华人吃过后，连说沙井蚝的味道还是那么好，百年老品牌又闪闪发亮了。有了广大的蚝基地，有了充足的生蚝货源，有了知名的蚝产品，陈沛忠他们又是跑广州，去香港，闯印尼、新加坡，开拓新市场。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内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云南、四川等省市打开了销路。国外的通过香港一间蚝油公司等几家批发商，远销东南亚、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市场。许多水产界专家多次考察后，沙井人以异地养殖为突破口，将传统品牌完好保存下来，“堪称广东水产史上的奇迹”，“是科学发展观的证例”。



沙井蚝场在晒蚝

我站在厚厚积淀着历史的蚝田蚝壳山旁，蓦然，我记起明代的《蚝田》和清代的《打蚝歌》：“一岁蚝田两种蚝，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迭成山十丈高。”“冬月珍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鬟在白波。”

深圳人从发现蚝，试食蚝，广种蚝，到吃蚝宴，筑蚝壳墙，“蚝文化”穿越千年时空，源源流传，蚝香飘飘……

清康熙年间重修的《新安县志·地理》记载："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海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8年）巡检廖膺庞建造古桥，名曰'惠民'。"

人民桥古今

深圳，也许没有波浪滔滔的大江，市区内也没有烟波浩渺的大河，因此，就没有雄伟的虎门大桥和秀丽的广州珠江大桥那样的景色。

然而，深圳有著名的边境罗湖桥和深圳人引以为豪的新落成西部通道深（圳）——（香）港跨海大桥。

罗湖桥和深港跨海大桥，曾引起文人墨客抒怀，也吸引不少摄影家、画家的礼赞。唯独有座小桥，历经300余年的岁月沧桑和人事升沉，今天仍然默默无闻地躺在罗湖老城区里，为繁忙的都市和匆忙的人们"尽忠职守"。

这座小桥，就是东门老街解放路上、电影大厦旁边的人民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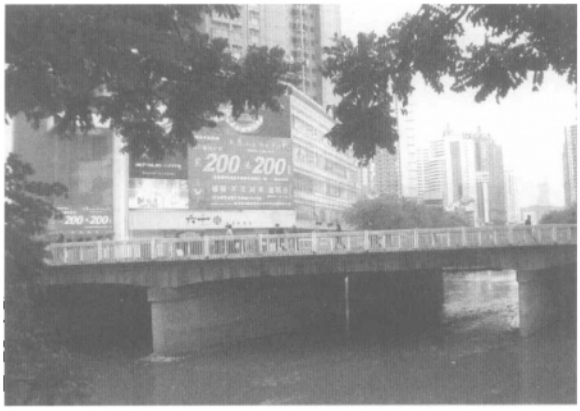
据深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证，人民桥就是古时的惠民桥。清嘉庆年间重修的《新安县志·地理》记载："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海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8年）巡检廖膺庞建造古桥，名曰'惠民'。"

惠民桥下，是源自布吉笔架山的深圳河，流经渔民村、赤尾村、沙嘴村、沙头村，入深圳湾大海。深圳河古称滘水河。《新安县志》云："滘

水河在城东（南头县城，笔者注）四十里，发源于梧桐，右甫隔（今布吉），左龙跃双鱼（今香港新界上水圩）诸山，西流曰钊日河，北出曰大沙河，二支分流至滘山，合流而西曰滘水，经黄（皇）岗，逶迤四十里入后海（今深圳湾的蛇口后海）。”

300 多年前官富（今深圳罗湖、香港一带辖区古称官富司）巡检司廖大人，在这条河上建了这座惠民桥，着实惠及乡民，为子孙后代造了福，三百载仍留芳名，遗憾的是廖大人造的石板桥，那时只能过人，过不了八人大轿，更过不了马车，后人把石桥拓宽两边成木桥。再后来木桥过得了县太爷的轿，过得了马车，但载重不成，仍然过不了汽车，后人的后人只好再次改建成水泥钢筋桥。

据考，桥，古称为梁，所以《说文》云：“桥，水梁也。”其初除小桥外，大抵以舟作浮桥，如《诗经·大明》云：“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朱注：“造作梁桥也，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于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桥也。”


人民桥

桥之称谓，始于秦。《史记·秦本纪》里云：“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桥。”　汉代以后通称为桥，称梁已很少了。最古用舟，次用木，后又用石了，这是造桥上个大进步。梁任昉《述异记》云：“秦始皇作石桥于海上，欲过观日出处。”

明朝嘉靖年间深圳南头古城也有座古桥，是用青麻石拱筑的，叫“广惠桥”，“在崇镇沙铺涌下直街，旧以木架，名南头埠桥，嘉靖年间参将汤克宽易以石，名广惠桥，乾隆丙戌年重修，新造两旁栏杆。”（见《新安县志》）沙井、福永、新桥、西乡河、观澜河、石岩河、龙岗河等，过去都有古老的石板桥，但是跟我国著名的大石桥——赵州桥相比，无论是历史悠久还是建造规模，实在是渺小。赵州桥已有1300 年历史，被誉为“天下雄胜”，至今仍保存完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奇迹。

当年筑造惠民桥，古人的眼光是短浅的，因为他只造不能过马车的小石桥。但古人的眼光又是长远的，因为他为子孙后代造了桥。

深圳人民桥，从石板桥，到解放前的木板桥，到解放后的石墩木桥，

如今深南路上的钢筋水泥桥，是个进步，是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进步的见证。

看来，我们有桥过，大可不必苛刻地“弹”古人。

尽管人民桥只有长30米，宽20米，但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创办初期，深南大道没开通之前，它仍然算是比较大的一座桥，是深圳交通的一段“咽喉”。往西，它通向南头、蛇口、西乡、松岗、东莞、广州；往东，它连接沙湾、盐田、龙岗、惠州、汕头。那时，广深铁路从广州过来，贴着地面驰向罗湖桥，延伸至香港九龙红磡，没有凌空高架起来，像一把长长的马刀，把深圳老城分作两半。铁路和马路平面交叉。铁路两侧的和平路与建设路，每天成百成千的汽车，要在解放路铁路闸口上拥挤，要通过人民桥。适逢上下班，人车高峰，火车又要通过，极其认真负责的闸口道班早早把道口闸杆放下，瞬间，人民桥便挤着长长的车队、黑压压一片自行车流和人群。深圳人形容这个小小的铁路闸口和连着这闸口小小的人民桥，是交通“油瓶颈”。性子好的人，这时也会被憋出火来。从东往西，或者从西往东的人，面对这唯一的过道小桥，一天来来回回，不知要骂骂咧咧多少趟。

别看这座桥这么小，但它在三十多年前是由深圳人用肩挑手垒一把土一块石地加宽起来的。肩挑？手垒？有没有搞错呀，推土机呢？挖泥机呢？说到这，我们不能拿现在的眼光衡量过去，同样，也不能拿今天的思维去想象那过去的“革命”年代。

说来也巧。1970年的元旦，是我结婚的日子，想不到连结婚的几天假期，也全被“征用”去修人民桥了。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天，我本来打算请亲戚、同事和好友、街坊在家中摆摆喜酒，热闹一番，然后回乡下过几天恬静的蜜月。谁知，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领导，用口吃的语言动员“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学、学大寨，赶、赶昔阳”，用实际行动，扩、扩建好人民桥，快步迈、迈进七十年代。军代表还未等我表态同意，就迫不及待地“抓、抓典型，树、树榜样”，说某某某结婚也不休假，不摆筵席，硬是在人民桥工、工地上过一个“革命化、化、化的婚礼”。接着，工地上临时广播站广播了这条“消息”。第二天，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小何，即时编段说唱，拉着手风琴，伴着小黄、小丘打竹板，用竹板歌唱起这段“七十年代新郎歌”。我的意愿被“强奸”了，真实情感被歪曲了，我在那“强词夺理”的岁月里，不敢怒，不敢言，摇摇晃晃地挑着碎石泥沙，混在上千名机关干部、居民和学生的劳动人群中，滑稽地过了“革命化婚礼”。30多年过去了，有时踏上人民桥，仍仿佛摇摇晃晃地挑着泥土走着。心里头欠下同事们的“喜酒债”，使我至

今仍然不时地老悸疚着。

《深圳市地名志》记载着人民桥，在1980年扩建成长30米、宽20米的钢架水泥结构桥。那次扩建有段“古”。

记得1979年深圳市刚由宝安县升格为市，就遭遇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雨袭击，凶猛的洪水直泻深圳河，人民桥下河水暴涨，偏偏遇上深圳湾潮水顶托，这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体育场（今嘉宾路金威大厦附近）侧的河闸，不知怎么搞的，电动绞索就是绞不动，提不上闸，加上深圳水库库满溢洪。瞬间，洪水漫出河堤，吞噬桂木园、工人文化宫、侨社、渔民村和罗湖村一带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和街道。东门老街顿变泽国，人民桥受淹，交通一度中断。最“惊险”的是市委在新园四幢临时办公的铁皮房，被风雨吹倒，倒下的门缝里渗出血一般的雨水，工作人员大吃一惊，撬门冲进去，原来是打翻了一瓶红墨水……

人民桥受到这次“创伤”，引起刚成立的市政府高度重视，马上把桥两侧临时用钢板加宽加固，铺上沥青，拉上简易栏杆，权作单车和人行道。以后把铁路和公路交通分隔开来，将笋岗至罗湖火车站段的铁路建成高架桥，火车、汽车不用争道了；深南大道拉直建好通车，笋岗路、泥岗路、沿河滨海路陆续建成投入使用，把人民桥的车流量压力分担了，解放路上的人民桥才清悠闲静了一阵子。

又十年过去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元旦，人民桥拆掉重建，桥面加宽，桥两边的水泥栏杆，漆上非常醒目的蓝白相间的胶漆，加上桥面上插了几十面彩旗，人民桥最壮观、最体面的算是那些天了。如果300多年前官富巡检司廖大人泉下有知，定会赞叹不已。再后来，深南大道上供电大厦那截桥，被公共汽车集团公司设立“人民桥站”，深南路的“人民桥”就被人们叫开了。而解放路电影大厦前那座正宗的“人民桥”，却为许多外地人所不知。

人民桥，尽管它不能与罗湖桥和深港跨海大桥相媲美，但是它在老深圳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会遗忘。正如一个城市，纵然有上千幢高楼大厦，也要有亭台水榭；即便有繁华宽敞的马路街道，也要有幽悠弯曲的石板小巷。人和环境，人与自然，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老祖宗老早非常注重的和谐，也许就是今天我们所强调的环境生态和文明生态……

深圳，别看挨着东方之珠的香港那么近，可在以前都是一个流行色，非黑即蓝，男女一样，男人没胸，女人也不凸，男人没屁股，女人也没线条。曾经有过一阵子由河对岸的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吹过来的“香风臭气”，女人们花俏了一些日子，后来被“文化大革命”的“扫香风”运动“革”了。好在这单调的流行色才“流”了十来年，坑了我们小半辈子，让我这辈人在下半生还能逮个青春的尾巴，大街小巷又恢复了老百姓生活的“原生态”，处处万紫千红。现在的人真是不得了，递根竿子就势往上爬。人们流行身外的色还不算，还要流行身里……

小巷穿戴流行色

深圳有个罗湖，罗湖有个东门，东门老街的小巷里以前都是一个流行色，非黑即蓝，男女一样。曾经有过一阵子由河对岸的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吹过来的“香风臭气”，女人们花俏了一些日子，后来被“文化大革命”“批小资”、“扫香风”运动，一夜间扫得无影无踪。

那时，不仅“革”的是文化的命，而且连老百姓穿的戴的都“革”了。好在这单调的流行色才“流”了十来年，坑了我们小半辈子，让我们在下半生还能逮个青春的尾巴，看着大街小巷又恢复了老百姓生活的“原生态”，万紫千红，百花斗艳。

现在的人真是不得了，递根竿子就势往上爬。人们流行身外的色还不算，还要流行身里。这不，你看小翠开在楼梯拐角的针眼小店，就略知大千世界的流行色。

且说人气极旺的东门老街，有条小巷，小巷里头有间小店，小店主人叫翠子。翠子姓孔，广东话里，“孔”、“空”、“胸”发音差别不大。巧得很，孔翠子小店做的生意总与“胸”有关。早在上世纪



上世纪80年代东门老街二横巷人气旺

80年代，她小本生意，全卖的是胸针、头饰、手链小玩意儿什么的，那时潮流代替了上个世纪70年代红胶绳、蝴蝶结之类饰物，翠子赚了些钱，与时俱进地改做文胸专卖店。人家笑她，一个大姑娘做这时尚生意，让人“挺胸露背”的好意思？再说，小巷太偏了，有人光顾？不“执笠”（倒闭）才怪呢。

谁知，地点太偏，“错有错着”。那时从农村来了许多打工妹，很少人用过这么漂亮的文胸，见小巷翠子店里各式文胸，琳琅满目，又喜又爱又羞涩。踏进小店，拿起乳罩对胸比试着，一见有男人在店门口路过，马上放下，脸红红地转身走开。如此进出店门几次，翠子悟出了什么来，马上扯上几尺花布，在店铺角落拉出布帘，后来发展成更衣室，让打工妹们隐蔽试戴。有了布帘，她的文胸生意出奇的好。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打工妹，嘻嘻哈哈地每人挑上两三对文胸，然后高高兴兴回厂子去，只是在布帘里面留下一片片布条。原来她们在乡下是“祖传”的用布条束缚双乳的。这偏僻的小巷小店正好适应打工妹们的羞涩心理，翠子的生意着实火了一把。有个打工妹回头告诉翠子一个笑话，说她那年过年回到边远山区的老家，奶奶把她换下来的衣服拿去河溪里洗的时候，惊奇地拎起孙女的文胸，对其他一起洗衣的大妈说：“瞧！这背心才两指宽，怎么穿？两个圈圈，羞死人哟！”笑话，把店里的人都逗乐了。

翠子“淘到了第一碗金”，在文胸店又增设化妆品柜台，还是突出与“胸”有关的生意——售卖丰乳霜，原来扯布帘的小室，扩展成美容丰乳护理室。让女顾客对着那心爱的乳房光涂光抹还不够，翠子又扩展了柜台，卖吃的丰乳胶囊、丰乳吸杯、丰乳按摩器材……

妇女们怀疑，这涂涂抹抹的就能大么？忽然间，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初宝安人都听说过一个真实的笑话。龙岗有个农村老伯，来深圳罗湖火车站接香港客，香港的亲人没接到，倒在地上捡了一支洋牙膏，他一辈子都少用牙膏，带回家后就开了个“洋浑”用起来，谁知道早上第一次用洋牙膏擦了牙以后，没多久，整个嘴巴肿成猪嘴。他马上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想了老半天，他回家拿来了一支全是洋文的牙膏，会诊的几个医生一看，笑得前仰后合，原来老阿伯捡了一支外国产的女人专用丰乳剂。这下子，毗邻港澳的深圳人长见识了，足足比国内的人早10多年知道，还有“牙膏的药”可以让乳房增大。

想当初，男士们见到女人都不大敢正视，尤其忌讳直瞧人家胸脯，生怕涉嫌“咸湿”。女人呢，自己也选择着大襟衫，穿平底胶鞋，一出家门，平胸收臀，越像男人越好，生怕涉嫌“荡妇”。世事轮流转，如今贼男人看女人专看人家胸脯和屁股。俗话说，女人看头，男人看脚。也就是看女人看她的头发发式打理，看脸蛋护理保养；看男人看他的脚板走路是否有力，皮鞋擦得是否锃亮，有精神。咳，如今那些臭男人今日不同往时，“贼心贼胆”，可长本事了。这年头，不仅看头，还“视线下移”，目光灼人，逼得女人非“胸前重视”不可。尤其是不久前，报载“平胸的女子”被外资老板拒绝招工，新婚之夜“没胸的新娘”被丈夫当即休掉，引起女性震撼！女人们史无前例地琢磨着“胸前领域”，平的怎样弄突，小的怎样整大，垂的怎样拉挺，皱的怎样鼓圆。这潮流真潮流起来不得了，大“半边天”火红，令男人们目瞪口呆，让商人们兴奋不已。

商家抓住这贼男人的“目标转移”，商机“高峰”，不断制造吸引眼球的噱头，在大型商场举行胸围、内衣模特“真人秀”。迷人的身材，诱人的胸围产品，使商场人气大增。相邻隔壁的大超市，不甘后人，也搞了个“互动平台”，让妙龄女子现场戴着他们提供的文胸出场，只要绕着大超市楼上楼下走两遭，价值五六百元一副的名牌文胸，立刻归她享有。重赏之下有“勇女”。果然不乏有胸怀胆量的少女少妇争相上场。那些文胸制造商，也急了眼，对着“胸前领域”也想分一杯羹，立马瞄准市场效应，与商家联手，更大胆地推出胸乳“体彩展”，在人潮涌涌的商场平台上，天仙般的美女体彩，让平头百姓领略一回近距离美的接触，差点儿没让血脉贲

张的男人当场晕倒，回到家里足足几个夜晚，还“眼今今（即眼睁睁）”地胡思乱想，早晨起来床垫湿了。

于是乎，翠子们乐了，小巷乐了，老街乐了，世界流行“胸文化”。围绕着丰乳，硬生生形成一种产业。《中国文化报》曾经刊载一条消息，说有数据显示，隆胸产业使英捷尔法勒一年在浙江的总销售额超过一个亿。如果加上其他产品的销量，数字将更为惊人。这仅仅是一个省，全国呢，全球呢？

旅游业也不甘寂寞，千方百计从“胸文化”做点文章，挖掘旅游资源。贵州省的黔西南某个州，由州长、旅游局局长、文化局长率一个艺术团来深圳推广旅游，从旅游广告到文艺演出，突出一个卖点就是双乳山景点风情。资料上双乳山照片，在大自然蓝天白水之间，两座乳峰，两个乳晕确实逼真，天造地设，鬼斧神工，让人产生无限遐想。舞台上，漂亮的少数民族演员，婀娜多姿，艳丽水灵。旅游推广取得成功，



小巷流行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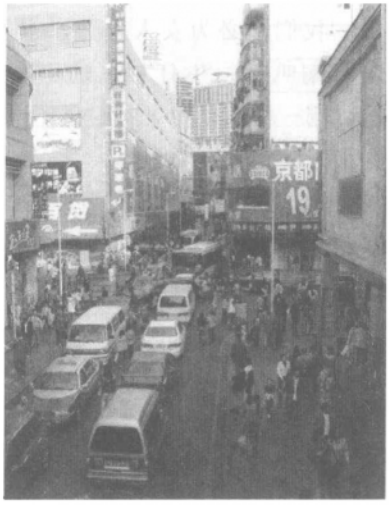
当下，影视发达，网络便捷，荧屏上丰乳产品目不暇接，网上购物丰乳产品应有尽有。媒体上“你想要多大就多大”，“你想要多挺就多挺”，“一穿就挺，一挺就大”，“让男人难以一手掌握”等等“广”“告”，日夜轰炸，你不看也得看，你不信也得信。电视屏幕上真人双乳坚挺，勾魂的乳沟隐现，乳房模特瞬间涨大挺立的演绎，引发失控的男人出格。报道说有收押的男犯人指控，无不受这“画面”引入歧途。说到这里当属影视管理范畴，留给社会学家去研究解决。

看来，“丰乳产业”是硬币的两面。经过10多年不懈的努力，丰乳产业做大了；中国权威专家给国人又一个惊喜，我国女性乳房比10多年前“增大了一厘米”。别看这仅仅一厘米，这可是我们迈向健康、文明的一大步。我们的女同胞可以抬头挺胸，走向国际时尚行列了。

这“增大了一厘米”，确实令妇女们自信起来，在“做女人挺好”，“让男人把握不住”煽情广告下，挺着大了一厘米的双乳，自豪于各种公共场合，傲视男人空间。天下，霎时间仿佛是女人的。

21 世纪以来，女性热衷于突出自身美丽和性感，坚韧不拔地实践美乳，有点使其身体几乎蜕变为一种外在于自我的敌对物。一些男人们呢，则追求和迷恋女性外在形象，情不自禁地为女性突出的美丽和性感而兴奋。正是男人们前所未有地重视女人外部美感，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围绕着女人乳房展开的种种创意和创造，哪怕是痛苦的手术隆胸、莫名注射有害的填充物等，女人们啊！上演了层出不穷的悲剧。多少隆胸美容院，“隆出了”女人奶子的一个个大窟窿？多少女人被动辄付出成千上万金钱，换来填充进去却是终生含有副作用的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物质？这一出出悲剧，仍然丝毫没有影响和遏止女人们深层次的心理追求。

乳房，天生千人各异，千姿百态，既有饱满圆润，又有干瘪松垂，既有哺乳之用，又展示性感魅力。有本叫《乳房的历史》的书，曾经阐述着乳房的方方面面。从历史上看，人们对美乳的评判标准一直是变幻不定的。古希腊男人喜欢女人发达的胸部，以便劳作和哺乳。中世纪欧洲的男人欣赏小巧结实的乳房，认为小杯型的乳房，秀丽，浪漫。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男人赞美绵软而下垂的乳房，悠悠晃荡，觉得自己很有征服感。20 世纪 20 年代流行小伙子式的平胸，女人胸脯像“飞机场”平坦，有种异样的骨质俊美。50 年代人们来个“三级跳”，追求美国好莱坞式的肉弹乳房，性感动人。70 年代风靡无约束的乳房，一段时间崇尚不戴乳罩，穿件薄薄的衬衣，少扣一两颗钮扣，走起路来，随着高跟鞋双乳在衣内无牵无挂，一晃一颠，风情万种。到了 90 年代则流行“碗型”圆润饱满、高耸挺拔的乳房，“做女人挺好”应运而生，“波波丽”胶囊、丰乳杯、丰乳器等产品，更是推波助澜。



车水马龙的老街

我们被“流行”牵着走，我们做了商家的“钱奴”。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少女想永远美丽，少妇想保持美丽，中年妇女想留住美丽，老年妇女想追回美丽。人类史上，美所激荡的那种不安的情绪，是创世之母。因为美的评价不同，激化出了矛盾；因为争夺美，而导致了战争。在罗马时代、大亚历山大时代、在恺撒时代，都曾上演过惊天地泣鬼神、甚至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戏。有人说，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美，是征服者；美，也是战败者。世界上大美人，影视大明星，也对抗不过时间。再长寿的美人，也会香消玉殒；精神上的美，母体的爱才是永恒。母亲是伟大的，乳房是崇高的，母亲的乳汁是神圣的。西方有幅著名油画《哺乳的圣母玛丽亚》，展现襁褓中的孩子正抓住母亲的乳房吮吸乳汁。这是一幅泛着温情与母性色彩的乳房而受到极其崇拜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当代美国学者雅茏大力标榜和宣扬“自由乳房”的观念，保持和维护这种爹妈给的、与生俱来的、不加雕饰的乳房“自然美”。

“自然美”是一种美，发育不良、产后下垂进行“雕饰美”，也是一种美。为了美，有能力去“雕饰美”，也未尝不可，谁也不可横加指责。我们不必为女人操劳，也不必为市场伤神。试想改革开放之初，烫头发、喇叭裤、牛仔衫、迪士高等等，哪一样不受责难？最后还是一一被时间宽容过来。


美轮美奂的内衣秀

宽容过来，时代又进了一步。

宽容归宽容，人们还是担心，隆胸假乳多了，真的也成假了。这年头，头发花白的固然染成黑色，黑色的却人为染成银白色、红色、黄色、绿色。眼眉剃去了，刺上另一堂“人工青眉”。鼻子扁平，重新手术隆直。牙齿不白，换牙造瓷。嘴巴太小，手术割大。下巴太短，手术拉长。脸皮太皱，手术拉平。躲在衣服里的乳房，虽然看不见，也要隆胸造乳。肚皮肥突，抽脂平腹。处女膜没了，造假修补。屁股没肉，可安装个假臀……到那时，一不小心讨个老婆，不要埋怨没多少个“零件”是原装的。要找一个原汁原味的真人，那非要到博物馆去找不可了。

当然，这是个笑话。面对“胸文化产业”大行其道的时下，突发奇想的荒诞笑话。希望，这仅仅是个笑话而已。

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宝安曾有从宋代、元代至明代初年的诗集，可惜未传下来。该书曰："宝安诗录，明兴，东莞(其时深圳属东莞，笔者注)有凤台、南园二诗社，其诗颇得源流之正。琴轩陈公涟尝为《宝安诗录》，自宋元以至国初。其后祁方伯（笔者：万历十一年任南头守御所总兵）颇增损为《前集》。自琴轩至方伯时得数十人，为《后集》。外郡士大夫有为宝安作者，亦因其旧增附焉。"更早期有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到新安，写下了《沓潮歌》。古新安屯门镇的杯渡山，有南朝杯渡山高僧遗址和唐代大诗人韩愈名句及摩崖石刻"高山第一"的手笔。新中国成立前后，更有不少文化名人在深圳留下题词、诗文和足迹……

文化名人深圳踪迹

深圳古代的文化人

深圳地处祖国南疆，濒临海洋，山青水秀，属岭南文化地域，自古地灵人杰。

清嘉庆二十四年《新安县志》记载：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到新安沿海，写下了《沓潮歌》："海门积日无风飓，沧波不归成沓潮，轰如鞭石屹且摇，亘空欲驾鼋鼍桥，惊湍蹙缩悍而骄，大陵高岸失岩嶢，四边无阻音响调，背负元气掀重霄，介鲸得性方逍遥，仰鼻嘘吸扬硃翘，海人狂顾迭相招，翳衣髽首声嘵嘵，征南将军登丽谯，赤旗指麾不敢嚣，翌日风回沴气消，归德纳纳景昭昭，乌泥白沙复满海，海色不动如琼瑶。"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食蚝》一诗流传千年："薄宦游海乡，雅闻归靖蚝，宿昔思一饱，钻灼苦未高……""归靖"就是今天宝安区沙井镇古称，沙井蚝那时就非常出名。南宋丞相文天祥一诗《过零丁洋》更是千古绝唱，"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

励一代又一代后人。宋咸淳十五年进士（深圳松岗罗田村人）曾宋珍在《魁星阁上梁文》亦说道“靖康之境名胜，所居昔建医帝堂，乃欲医文人之俗，今增魁星阁……按旧志载谶云沙头圆出状元。”

诗人汪鋐、明朝正德十六年的巡道（为明代广东驻深圳海域防卫长官），亲自率兵在屯门（今香港新界）抗击“番彝佛郎机”（葡萄牙海盗）有功，“旋升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民立祠于崇镇里以报公德。”（《新安县志》）这位深圳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写下《驻节南头，喜乡耆吴湲、郑志锐画攻屯门夷之策赋之》诗：“辚辚车马出城东，揽辔欣逢二老同，万里奔驰筋力在，一生精洁鬼神通，灶田拨卤当秋日，渔艇牵篷向晚风，回首长歌无尽兴，天高海阔月明中。”

明隆庆六年（1572年）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在新安视察两个多月后，留下诗词一组《入新安喜而有感》《祷天妃庙喜诸生会集》《嘉树亭成偶述》《别邑父老》等，明朝知县黄成元（南头人）、李可成、周希曜、郑文炳等一批父母官“邑自明为东莞分地（笔者注：万历元年从东莞析出置新安县）官斯土者政声卓卓代不乏人我”，他们在深圳为政时，也写下《赤湾晚眺》《祭风文》《捐修城垣告竣》《飓风即事》《秋日游凤凰岩》《杯渡山》等诗文。香港新界屯门镇的杯渡山，留下南朝杯渡高僧遗址和唐大诗人韩愈题屯门诗一首及摩崖石刻“高山第一”的手笔。

据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宝安曾有从宋代、元代至明代初年的诗集，可惜未传下来。屈大均曰：“宝安诗录，明兴，东莞（其时深圳属东莞，笔者注）有凤台、南园二诗社，其诗颇得源流之正。琴轩陈公琏尝为《宝安诗录》，自宋元以至国初。其后祁方伯（笔者注：万历十一年任南头守御所总兵）顺增损为《前集》。自琴轩至方伯时得数十人，为《后集》。外郡士大夫有为宝安作者，亦因其旧增附焉。吾粤诸邑，惟东莞诗有合集，区启图尝梓同乡先辈选诗曰《峤雅》，凡五百余家，其书未成。予撰《岭南诗选》前后集，前集自唐开元至明万历，后集自万历至今，人各有传，仿《列朝诗集》之体。积二十年亦未有成书，可叹也。”

清末鸦片战争的伟大爱国者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九月间面对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多次无理抗拒和破坏禁烟禁毒运动，先后6次率领军舰闯入珠江口，进犯驻有中国水师的官涌（今九龙尖沙咀以北的一座小山）。指挥关天培、赖恩爵等将士打退了英国侵略者的几次进攻。这次战役后，林则徐写了一首词《高阳台》，抒发了在穿鼻洋大捷的喜悦心情和鞭挞侵略者用鸦片对我国人的毒害：

“玉粟收余，金丝种后，番航别有蛮烟。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不知呼吸成滋味，爱挑灯，夜永如年。最堪怜，是一丸泥，捐万缗钱。

春雷歙破零丁穴，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然。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园。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

晚清诗人朱琦(1803～1861年)，对民族英雄关天培率部400余人孤立无援，英勇抗英，为国捐躯的壮举，写下一首荡气回肠的《关将军挽歌》：“飓风昼卷阴云昏，巨舶如山驱火轮，番儿船头擂大鼓，碧眼鬼奴出杀人。粤关守卒走相告，防海夜遣关将军。将军料敌有胆略，楼橹万艘屯虎门。虎门粤咽喉，险要无比伦。峭壁东西峡，下临不测渊。涛泷阻绝八万里，彼虏深入孤无援。鹿角相倚断归路，漏网欲脱愁鲸鲲。惜哉！大府畏懦坐失策，犬羊自古终难驯。海波沸涌黯落日，群鬼叫嚣气益振。我军虽众无斗志，荷戈却立不敢前；赣兵昔时号骁勇，今胡望风同溃奔。将军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臣有老母年九十，眼下一孙未成立，诏书哀痛为雨泣。吾闻父子战死有陈连升，炳炳大节同峻嶒，猿鹤幻化那忍论，我为剪纸招忠魂。”

深圳的文化名人不仅留下诗文，还留下许多让老百姓流传的故事。清顺治年间进士陈隽藁就是其中的一位。话说清政府为了斩断东南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式发布“迁界令”。当年12月颁布的《严禁通海敕谕》称：“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

随后，朝廷派官员到东南沿海各村张贴告示，但老百姓哪能说走就走，有的老百姓念着庄稼需要收割，有的想着台湾的战火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烧到这里来，有的还心存侥幸以为皇帝会改主意。于是，清廷派出大批官兵强行驱赶，并强行毁坏田舍、村镇、城廓，令百姓限期搬出，违者以军法论处。初迁时，只限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被迫北迁的深港百姓只能随身携带的小家当仓促上路。

被迫离乡的百姓开始还指望很快就能回迁，但官府动用军队，挖界沟，筑界墙，设烟墩，严禁任何人进入界内，越界者死。回迁无期，随身携带的银两也用尽了，生活无着，出现了“夫弃其妻，父别其子，兄别其弟”的悲惨场面。丈夫哭着送妻子“跟他人去做婢女，免得大家都饿死”，做父亲和兄长的眼含泪水让儿子或兄弟“暂且到人家去打工养活自己”，即使是一些大富人家，有的也被迫转做奴婢，有的无处安身只能去投军，还有一些年老体衰最后毙命曝尸路边，惨不忍睹。

到康熙年间，“迁界令”仍一道又一道地颁发。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新安县居民已内迁50里，迁出区域占整个新安县域的三分之二。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渔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

再内迁 30 里，新安县境内的居民几乎迁完。最后在当时广东广西总督的求情下，曾保留了 24 个乡。但康熙四年(1665 年)三月，剩余的 24 个乡也不能保，近的撤到东莞，远的不知所终。及至康熙六年(1667 年)，由于新安县百姓已经全部北迁，堂堂一县衙门没有百姓可管，时任知县张璞奏请撤销新安并入东莞县，朝廷钦准。康熙迁海令涉及中国所有沿海地区，而因迁界而被迫撤县的，新安县是绝无仅有的。”

据考证，在新安县大规模迁界过程中，还有少数幸存的“钉子户”，其中一户就在今天的深圳沙井镇一带。当地恩德乡有一个三都衙边村，村里有位年轻人叫陈隽蕙，他在顺治十八年(1661 年)赴京师参加辛丑科会试，登马世俊榜第二甲，赐进士出身。迁界之时，他正在家里等候皇帝任命，眼看靠晒盐为生的父老乡亲就要失业，他恳求迁界官员给一条活路。考虑到他可能前途无量，迁界官员给了他一个面子，同意这个村里的人可以凭借一道特许的腰牌进出，但只能晒盐，不能在村里居住。还有一户是香港新界地区的邓氏家族，他们虽然没有陈隽蕙这样的进士，但是家族势力不小，或许是打通了官府的某些关节，这个邓氏家族被准许撤到最靠近边界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深圳沙井茅洲河一带。据说，后来再次迁回今天的香港新界地区后，邓氏家族还把茅洲的南海洪圣大王请到了今天的香港元朗。



1977 年省作家李门、黄培尧等和深圳作者在罗湖桥九龙海关

“迁界令”一直持续了将近 8 年。当时的广东巡抚王来任，非常同情新安北迁居民的悲惨遭遇，于康熙六年冒死奏疏请求复界。他在《展界复乡疏》中写道：“沿海边民，惨被荼毒，或被戮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星分，或被横征而典妻儿，颠连万状，罄竹难书”。并指出“迁界”政策不仅给民间造成深重灾难，还使全省每年减少地丁钱粮 30 多万两，几十万失去生路的边民成为盗贼。然而，王来任很快被罢官，病死在广州；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也受牵连被革职。随后，山东巡抚周有德升任广东广西总督，内国史院学士刘秉权任广东巡抚，这两位官员也对迁海政策提出质疑，

继续上疏朝廷，痛陈“迁界”之害。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清廷终于取消“迁界令”，准许康熙三年迁界地区居民回迁恢复原籍。同年七月，康熙皇帝下诏恢复新安县。至此，长达8年的北迁浩劫终告一段落。

为老百姓做了点好事的沙井陈进士，家乡建祠纪念他。王来任巡抚和周有德两广总督，在县志留有艺文数篇，新安人民更是不忘二公功德，南头、西乡、香港新界上水乡就建有纪念王来任、周有德的报德祠，除了年节祭奉以外，在当地太平清醮醮会上还抬着王周神像全城巡游，场面盛大热闹。

文化名人厚爱深圳

解放后，也许是毗邻香港，开国元勋朱德、董必武、陈毅元帅及陶铸、廖承志等视察深圳，留下诗篇或题词。在开放改革年代，也许深圳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特区，我国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多次亲临深圳，为特区的发展指明方向；文化名人周扬、刘海粟、李可染、吴冠中、黄胄、朱屺瞻、关山月、王蒙、冯牧、冯至、孙犁、陈残云、秦牧、沈西蒙、冯骥才、蒋子龙、刘心武、余秋雨、陈忠实等，或视察、或参访、或与深圳文化人座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的热土上，留下足迹，留下风采。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作家陈残云来到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挂职县委副书记，在一年多时间里，他走遍了深圳边防线，结交了不少农民群众、民兵和干部，创作了家喻户晓的反特题材电影《羊城暗哨》。深圳经济特区一建立，他满腔热情地支持特区、讴歌特区。1982年12月12日至17日，他和梁信（广州军区作家、电影《红色娘子军》作者）、韦丘（著名诗人）等到深圳，在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宝安县委书记方苞陪同下，走访了好几个公社，旧地重游，感慨万千。17日晚在宝安县委常委会议室（今解放路深圳大学成教学院），和深圳业余作家陈荣光、朱崇山、林雨纯、廖虹雷、邓维新、丘云等10多位同志座谈。会上，他说深圳是社会主义特区，是新事物，我热烈拥护，并寄于希望。去年我写了篇特区农村琐记，说了农村的变化，不敢写那么好。最近，附城公社皇岗村庄启新写信告诉我，农民收入提高了，我住过的“三同户”陈礼明走私了。我觉得他走私，在文章里写了几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一些同志到了深圳写了点文章，同志们有意见。可能文章写得不准确，了解不深，也有30年形成的一种观念，妇女穿得稍好一点，抹点口红就是资本主义。（梁信插话：富了就不革命。）广东是姓社还是姓资，《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央肯定了。有人写深圳走私，走私不是深圳的主流。文学作品要多赞扬新事物，深圳建设速度、管理先进，影响深远。深圳的文章很能引起全国注意，我有一个

看法，广东的文艺杂志在全国销路比较大，为什么？是我们水平高？不是，是人们关心广东，希望从刊物了解广东，了解深圳。最后，他和梁信、韦丘对深圳新观念、新气象以及许多新的生活细节，与当地作家交流了创作体会。

20世纪70年代宝安县的文艺创作在广东省内比较活跃，许多作品获惠阳地区和省文艺汇演奖。1976年初，由宝安县文化馆曾文炳、廖虹雷创作的8场粤剧《边防枪声》，在广东省文艺调演获创作、演出优秀节目奖，被省内外60多个剧团移植演出。1977年省作协《广东文艺》杂志破例刊载《边防枪声》全剧。之前，为修改提高这个作品，省文联副主席、剧协主席李门，省作协副主席、《广东文艺》主编黄培亮以及作家秦牧、苏晨、秋耘、芦狄、曾炜、欧阳翎、易准、于逢、黄树森、易征、贺朗、沈仁康、范怀烈及导演王守一等先后多次来深圳，参加创作会议或作品研讨会，辅导作者，关心深圳文化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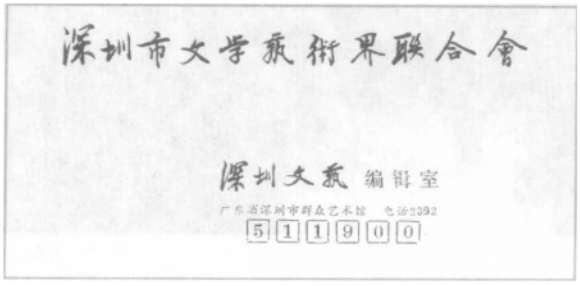
20年前秦牧和罗湖文艺作者

深圳特区创建初期，著名散文作家秦牧，十分关注这块生机勃勃的热土，也十分关爱罗湖这帮虎虎生气的文学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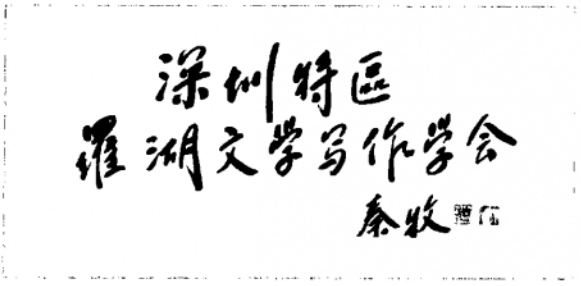
1985年12月1日，我终于收到秦牧老师从广州寄来的信，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信里写道“虹雷同志：在深圳承你们热情接待，谢谢。承约寄‘罗湖文学写作学会’招牌，我的字并不好，勉强应约，如不合用，弃之最好。名字也尽可不要。总之，由你们决定好了。字幅附上请收。问好。秦牧　12月1日。”秦牧老师太谦虚了。秦牧原名林觉夫，广东澄海县人。1919年出生于香港，后随父母在新加坡生活，13岁回国，辗转国内各地，后来写了不少著名的散文，从此秦牧这个笔名响彻中国文坛。陶铸曾说广东有“三宝”：红线女、秦牧和《羊城晚报》。个把月前，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陈残云，省作协副主席秦牧和他的夫人紫风作家等到罗湖采风，罗湖区委副书记张玉诚向他们汇报了要成立罗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事，得到两位文学前辈的赞许。负责接待的区宣传文化部门同志趁机请两老为区文联题词，两老笑称自己的字写得不好，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乐呵呵地不肯留墨宝。区委领导见状，请两老回广州后再考虑考虑，尽量满足文学青年的愿望。秦牧问除了题写区文联还题写什么，我马上递上便条纸：“深圳特区罗湖文学写作学会”。秦牧同志说什么不叫罗湖作家协会？区委领导笑笑说道，罗湖区刚成立5年，文学艺术刚起步，全区200来个文艺骨干除了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外，文学作者才62人，其中加入广东省、深圳市作家协会的只有7人，大部分是文学青年。秦老连声说：“好，

好，好！罗湖文学青年朝气蓬勃，就像深圳经济特区一样充满希望。”陈残云、秦牧等老作家和罗湖作者座谈，热情辅导，然后参观了国贸商业区、罗湖口岸和沙头角中英街等地。

12 月 14 日，我又收到秦牧同志寄来的信，他在我给他写有“深圳特区罗湖文学写作学会”的便条纸上，写“虹雷同志：相片收到。谢谢。所需题辞，随函附上，请酌处。秦牧　12 月 14 日。”他又在另一张稿纸工整地题辞：“只有在练好文字基本功的前提下，一切的写作才能、文学技巧才有所附依。先学爬，后学走，先学走，然后学跑。在这个意义上的写作学的研习，对一切文字工作者来说，都是重要的。文学工作者尤其必须过好这一关。消灭错别字，通顺流畅，琅琅上口、条理井然的文笔，不经过一番辛勤努力，是难以掌握的。深圳特区罗湖文学写作学会嘱题。秦牧 1985.12.广州。”



茅盾题词



秦牧题词

看着秦老工整、清丽的题辞，仿佛重读秦牧《艺海拾贝》名著中的循循善诱、悉心教导。《艺海拾贝》教育了一代文学爱好者，成就了一代文学青年。罗湖文学艺术工作在秦牧等老前辈关心下，于 1986 年 3 月 29 日隆重成立罗湖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省、市文艺界、新闻界嘉宾及罗湖文学艺术界代表 200 多人出席大会。从此，罗湖出了一批文化艺术人才，也出了一大批好作品。

茅盾题词与深圳市文联成立

1980 年初，根据市委黄施民副书记指示筹备成立市文联，这项工作主要由市文化局负责，具体由市群众艺术馆筹办。由于我时任市群艺馆副馆长，负责全市文艺创作近 10 年，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前期筹备工作的《关于筹备深圳市文联的方案请示》《深圳市文学艺术工作报告》《市文联章程》等文件起草由我具体组织撰写。一天，我和馆里一起筹备的邓维新、何玉生



1985 年作家秦牧、紫风夫妇和罗湖作者在沙头角

等几位同志，乘火车上广州，来到文德路的省文联汇报请示有关筹备工作，回深后，在市文化局（原罗湖东门新安酒家旁边的老博雅画廊旧址，今拆）讨论说到邀请嘉宾时，我忽然提出请我国著名文化前辈茅盾同志为深圳文联题词。

当时一位局领导闻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说有可能，为什么？一是1942年1月香港沦陷期间，茅盾、邹韬奋、沈志远、胡绳、戈宝权等60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受困香港九龙，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和宝安大队秘密营救，分东西两条路线安全转移到深圳羊台山下白石龙村，然后再护送到解放区。茅盾同志与深圳有缘。二是深圳建立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举世瞩目，茅盾同志会热情支持。三是郭沫若刚为深圳美术展览馆题写馆名，经办此事的是深圳美术展览馆馆长雷子源。市文化局副局长张玉诚和雷子源馆长，近日将去北京联系展览业务，正好通过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请茅盾题词。大家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你一言我一句地马上起草打印一份函件，恳请茅盾前辈为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当时由我馆编印的《深圳文艺》杂志题词。

一个星期过去，张副局长和雷馆长从北京回来，当拿出茅盾题词时，可把我们乐坏了。文化馆搞美术的黄松鹏、陈德兴、陈宏新、林为农等同志买来上好的木料，小心而认真地制成幻灯片，放大到木料上，一刀一刀地镂刻，上漆，然后用红绸盖住，等着市文代会的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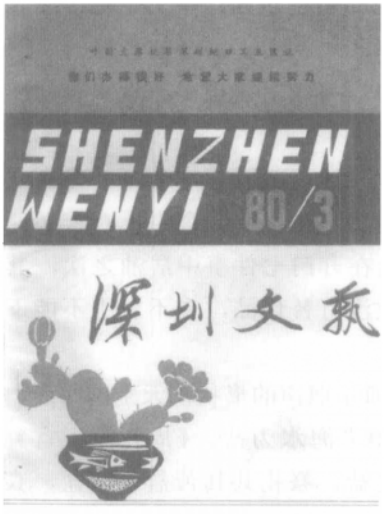


1980年茅盾题词



茅盾同志像

1981年7月12日至13日在深圳戏院隆重召开深圳市文学艺术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文代会的有我市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文艺工作者；省、港著名作家、艺术家陈残云、秦牧、关山月、黎雄才、曾敏之；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昌谦及省文联各协会、出版社各大型文艺杂志负责同志专程赴会；广州、珠海、中山、惠州、东莞及我市各有关部门特邀代表共215人。市委领导黄施民、方苞等出席了大会并讲话。大会选出首届市文联领导和各协会负责人。在一长串鞭炮声和热烈掌声中，茅盾题词的市文联牌匾被徐徐揭开……老一辈无产阶级文艺家关心特区文化事业的精神，深深地鼓舞着我们。



1980年《深圳文艺》杂志

史料记载，开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官办盐铁建议，在全国28个郡设立“均输盐铁官”，宝安是南海郡最大的盐场之一。西汉期间，朝廷在广东设立东、西两处盐官，宝安盐业发达，被称“东官盐场”。后来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以东路盐官之名设立“东官郡”。东官郡所辖6县中第一个就是宝安，自此宝安置县，宋元明清一直成为大盐场。

056

宝安是个古盐场

深圳以盐取名的村落不少

盐，今天看来是一种极其普通的调味品，在超市花一块来钱就可以买到一斤，吃它一头半个月；但在古时却是个非常金贵的东西，中央电视台播放《咸的历史》大型记录片中，就说到许多部落和民族为了争夺盐资源，而刀光剑影，大动干戈。宝安始东晋设县，1600多年来，盐既是当地主要的产业，也是政界官衙重要的税源。

盐，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钠离子和维系生命必不可少的矿物质，没有吃盐，人就没有力气。盐还是个不可替代的物质。在日常饮食中，有食必须有盐，否则便淡而无味，不能下咽，所以盐在开门七件事中居油之次，其实应在油之上，没有油则可用替代品，甚至没有替代品，也不至于不能下咽。

盐的文字，古人造得非常妙，它极像器皿中煎卤的形状，天生的叫卤，人造的叫盐，相传黄帝之臣宿沙氏，就懂得煮海水为盐。《周礼·天官》一书中曰：“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礼共其苦盐、散盐，宾



盐场工人在忙碌晒盐

客共其形盐，王之膳馐共其饴盐。”据注：“苦盐出于池，盐为颗未炼治，味咸苦。散盐即末盐，出于海及井，并煮碱而成者，盐皆散末也。形盐即印盐，积卤所结，形如虎也。饴盐以饴杂和，或云生戎地，味甘美也。”

深圳是个沿海城市，从东部的南澳镇到西部的松岗镇，海岸线足有257.3公里，毫不夸张地说一句“开门见海”，且海之水皆咸。

由此可见，古深圳是个有条件产盐的地方，古代人视盐为宝，人无盐不活，有盐则安，故县名称作“宝安”；也因此以盐取名的村落不少，比如清嘉庆二十四年重修的《新安县志》里，就记载有盐田圩、盐田村（今属盐田区）、盐寮下村（今属大鹏镇）、盐灶村、盐排村（今属葵涌镇）、盐田田寮下村（今属布吉、南湾一带）、沙井盐田村和盐灶下村（今属香港新界）等。

这些村名，依稀遗留古时人们或晒盐或煮盐的烙印。“盐灶”、“盐寮”分明是煮盐的地方，“盐田”、“盐排”分明是晒盐的地方。明末清初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粤有生盐、熟盐，熟盐产归德（笔者注：归德为宝安区沙井福永镇一带的古称）等场，成于火煎，性柔易融化，味咸而甘，便于调和，水居之民喜食之。生盐产海水等场，成于日晒，性刚能耐久，其味倍咸，食之多力，山居之民喜食之。贫者以得盐难，可以省用，尤利之。旧制，生、熟盐惟商所运，从无销生滞熟之虞。自藩下奸商霸夺熟场，欲其多售增价，熟引较生引课轻，承生引之埠者，又欲轻

饷漏课，乃不论土俗之宜否，径于广、肇、惠、罗各埠，生三熟七，配搭强行。究之民俗之喜生者七，引之熟亦照全生；民俗之喜熟者三，引之生亦照全熟。厂官创为免盘之陋规，竟置生熟于不问，此非商之好作其奸，乃法令之不便于民也。”

为方便盐场管理，课征税饷，朝廷就层层设立机构，任命盐官。《新安县志·盐政》载：“明洪武二年设广东、海北二提举司，广东盐课提举司领十二场，在县境者旧有四场，曰东莞（笔者注：县治设今南头城），曰归德，曰黄田，曰官富，迨元改官富为巡司，其盐课册籍附入黄田场。明嘉靖二十一年又裁革黄田场入场止，东莞、归德二场隶于广东盐课提举司。”

新安县盐政管理机关有“归德场盐课司”（今福永一带）和“东莞场盐课司”（今南山一带），这两司或许地点重要，或许产盐多，或许征税足，时而收归广东直管，时而又放权地方。除黄田外，也曾增设官富（今香港九龙）为盐课巡司。产盐后进行贸易的地方有新安埠（今西乡一带），彭城埠（南头冈子城外石围塘汎侧），固戍埠（今宝安机场一带），白石埠（今南山区大冲一带），盐田埠（今盐田区）、沙鱼涌埠（今葵涌镇），长洲埠（今香港新界长洲岛）等七处，遍布新安县沿海。

二千年前宝安是“东官盐场”

《新安县志·沿革志》载：“自昔南交之命朔南之暨而交州一域，由来旧矣。秦始皇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汉定越地，置交州，刺史令持节治苍梧、南海郡，领县六，次博罗，邑之地属焉。晋置宝安，唐更东莞，至明而新安之名始著，历代以来兴废互异，一地之制沿革不同。”

南虞时期，深圳属南交“交州一域”，交州是什么地方？屈大均《广东新语》有释：“南交者，粤也，陶唐之南裔也，故举南交而可以概粤矣……汉称粤为交州，盖本于唐，秦分粤地为南海郡，盖本于周。然扬雄《交州箴》有曰：‘南海之宇，圣武是恢。’又曰：‘交州荒裔，水与天际。’则举交州而南海在其中矣，举交州亦可以概粤矣。其称曰交趾，交州之趾也。粤趾于中原，而交趾趾于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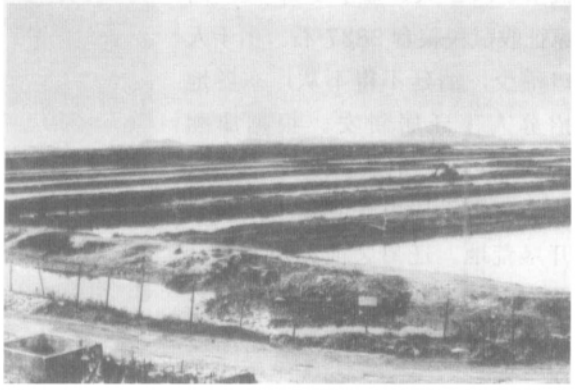
也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宝安这一带属岭南地区，被正式纳入中央集权国家的版图。公元前215年，在南越境设置了闽中、桂林、象、南海4郡。南海郡治在广州，下辖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6县。宝安地区属南海郡番禺辖地。

西汉实行郡国并置之制。南海尉赵佗趁秦末之乱，击并桂林、象两郡，在岭南自立为南越王93年，都城设番禺，获汉高祖承认。公元前112年岭

南分设南海、苍梧、交趾、合浦、珠崖等9 个郡。宝安地区改属南海郡博罗县。

史料记载，开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官办盐、铁的建议，在全国28 个郡设立“均输盐铁官”，宝安是南海郡最大的盐场之一，水路运输极为方便。据说南头城前海湾水面漫及如今蛇口、宝安区新城一带。河流深而阔，从下沙河（今南山区华侨城侧的大涌）可以乘货船直到西丽白芒村。三百年前的新安县志记载仍有白芒渡口。说及今南头、白芒、白石、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及罗湖上步、下步、沙头、赤尾等地均可航船。

西汉期间，朝廷在广东设立东、西两处盐官之一，宝安盐业发达，南头城是后来被称“东官盐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东晋时宝安独立置县。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 年）拆分南海郡，以东路盐官为名设立“东官郡”。东官郡所辖6 县中第一个就是宝安，其次是怀安、海安等县，郡治与县治同设在宝安城子冈（即今南头城东门外芒果园一带）。辖地西至珠江口两岸，东至闽潮地区（《晋书·地理志》）。



明清时期的大鹏盐场（选自《深圳全记录》）

到了宋、元朝，宝安已是中国南方海路通商贸易的枢纽，不仅是食盐主要产区，这里出产的珍珠和香料，已十分著名。

南宋理学家陈朝举，这位朱熹的高足、淳熙进士，由福州府侯官回原籍洛阳时，突遇金兵，被迫南迁，辗转至广东南雄的珠玑巷，晚年迁徙珠江口的宝安沙井定居。后来沙井本地盐、蚝民的陈姓，大多是他的后裔。陈氏家族从宋、元、明、清几朝代代主要从事煮海为盐，以盐为业。后来清朝的“迁界政策”，迫使他们使荒弃盐田，盐场的官衙也关闭了。陈氏子孙只好在家门口捕鱼、打蚝、捞虾，以海为生。

说起清朝一纸“迁界令”，使新安延续上千年的盐业遭受致命打击，可谓史无前例。顺治十八年(1661 年)，清政府为了斩断东南沿海居民与郑成功的联系，正式发布“迁界令”。康熙元年(1662 年)三月，新安县居民已内迁50 里，迁出区域占整个新安县域的三分之二。康熙二年(1664 年)五月，清廷“时以迁民窃出渔盐，恐其仍通海舶”，又下令再内迁30 里，新安县

境内的居民几乎迁完。最后在当时广东广西总督的求情下，曾保留了24个乡。但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剩余的24个乡也不能保，近的撤到东莞，远的不知所终。及至康熙六年(1667年)，由于新安县百姓已经全部北迁，堂堂一县衙门没有百姓可管，时任知县张璞奏请撤销新安并入东莞县，朝廷批准。康熙迁海令涉及中国东南沿海所有地区，而因“迁界”而被迫撤县的，新安县是“绝无仅有。”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清廷在当地官民屡屡奏请下，终于取消“迁界令”，准许居民回迁恢复原籍。同年七月，康熙皇帝下诏恢复新安县。至此，长达8年的北迁浩劫终告一段落。

新安百姓被迫北迁，当地沿海农业生产、盐渔蚝业、对外贸易遭到巨大的破坏。迁界前，新安县人口6851人，盐丁3818人，国家征收赋税粮食11652石；迁界后，新安人口锐减至2172人，盐丁127人，国家征收赋税粮食2837石。由于人口稀少，清廷不得不从广东各地招募人丁迁居新安。根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每年都招入数十至数百居民来到这里，重新开垦荒地。迁界之前，新安县盐业发达，因迁界致盐业长期荒废，再加上珠江口海水逐渐变淡，盐质量大不如前，大部分回迁盐民不得已转以捕鱼、养蚝为生。



盐场出盐

盐丁苦，盐丁苦事应难数

宝安之海，昼潮夜汐，天地呼吸之气。俗语说初一十五，水上日午；初九二十三，水大牛归栏。半月潮长则西流，半月潮消则东流。民谚：“半月西流半月东，乘潮不必更乘风。”

古人云，南海之水，其大洋以北者，清而绀；大洋以南者，碧而黑。西边大雨暴涨下则黄浊，黄浊故淤泥壅积以成沙田。碧而黑，则性劲味咸，水卤所生，火膏所发，鬻之可成盐末。故凡海水，秋冬咸而春夏淡，咸则益清见底。谚云：“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言淡者虽浊而可食也。珠江口虎门外之水重，咸也。虎门内之水轻，淡也。舟入虎门，则低五寸，出虎门，则高五寸，水咸故有力也。凡下海之船日以轻者，水咸且劲，入木而木质坚，故轻也。上江之船日以重者，水淡且柔，入木而木质松，故重也。

屈大均曰："凡江阳而海阴，阴故海水重而沉，阳故江水轻而浮。新安灶丁煮盐，俟潮至取注缸中，以饭粒试焉，饭粒之所止，乃可分其咸淡，咸则留之，淡则去之。盖海水阴，有力而能任重，故饭粒止而不沉，能胜饭粒，则可以为盐也。盐与火同类，咸故生火，火故生盐，火者盐之本也，阳也；盐者火之末也，阴也。凡人食淡则血红，淡阳也。阳纯故红。食咸则血黑，咸阴也，阴纯故黑。水者天地之血也。"

300多年前，新安县超过半数子民为盐民，他们身上肩负盐税极其之重，当地县志记载，归德场盐课司管辖16社，灶田在册缴交额税831顷30亩零5分6厘7毫，应征饷银253两2钱9分9厘。灶丁名册原额1421人，应征丁课银778两7钱8厘，平均每人交18两银。康熙二十一年，归德场灶田分上中下三类，则每亩加征银2分。户口食盐折征原额价银18两1钱1厘，通场共征税饷丁课银990两8钱8分4厘。仅仅一个归德盐场，一年应完税纳饷银2263两4钱9分1厘。

当地古籍所载，邑近盐场者，其盐引之饷，宜均派之粮丁，听民自便买食场盐，其邑引多者，按之钱粮不过十五而加一，引少者，不过三十而加一。民易办，县亦易征，责成本县解饷，而领引埠商，可以汰去矣。今归善（即惠州）、龙川无埠商，而民无扰，东莞埠商犹存，以致额外复有加派，以为商之费用。商仍冒称拆引行盐，高取数倍之价，专勒渔船，仍设仔埠帮饷，商收其利。民受其害，故商不可以不汰。商既汰，则卖私盐可以无禁，夫所谓禁卖私盐者，为其有妨于商而赚国饷也。若饷派之粮丁，而上无缺饷，听民自行买卖，而下无私盐矣。善乎李雯之言曰：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

由此可见，盐丁除官税外，还要受盐奸商盘剥。靠天吃饭的盐丁遇上和风日丽，还能混口饭吃，若是碰上绵绵阴雨，或是暴雨飓风，盐场顷刻化水，盐工欲哭无泪。清康熙《新安县志》刊载明朝署名"曼叟"写的一首诗——《盐丁叹》：

煎盐苦，煎盐苦，煎盐日日遇阴雨。
爬硷打草向锅烧，点散无成孤积卤。
旧时叔伯十余家，今日逃亡三四五。
晒盐苦，晒盐苦，皮毛落尽空遗股。
晒盐兄望济吾贫，谁知抽竿无虚土！
年年医得他人疮，心头肉尽应无补。
公婆枵腹缺常餐，儿女全身无全缕。
场役沿例不复怜，世间谁念盐丁苦？

盐丁苦，盐丁苦，盐丁苦事应难数。

豪商得课醉且歌，总催得钱歌且舞。

盐丁苦状类圈羊，群恶宣骄猛如虎。

何时无悯涸辙鱼，清波一挽沧溟溥！

沿海盐丁煮盐、晒盐苦，内陆采掘岩盐、井盐亦苦。

现在各地所用的盐，则沿海诸省多用海盐，西北诸省多用池盐，西南诸省多用井盐，巴山还有泉盐，此外也有刮取碱土煎炼而成的叫碱盐，生于土崖中的叫崖盐，生于石中的叫石盐，生于树中的叫木盐，生于草中的叫蓬盐，只要有咸味的地方，都可取之煎盐矣。

盐的颜色大多为白色，其不纯粹的则带黄色。但据古籍所载则盐的别种颜色殊多，有红盐，如唐段公璐《北户录》云："恩州有盐场，色如绛雪，验之即由煎时染成，差可爱也。郑公虔云，琴湖池桃花盐色如桃花，随月盈缩，在张掖西北。"

"恩州"，在今广东恩平县，"张掖"在今甘肃。惟恩州以煎时染成，是原来未必为红色的。至于西北则确有此盐，医药上称为戎盐。又有一种青色的盐，如李时珍《本草纲目》云：

"青盐、赤盐皆戎盐也。《西凉记》云：青盐池出盐正方半寸，其形如石，甚甜美。《真腊记》云：山间有石味胜于盐，可琢为器。《梁杰公传》言：交河之间，掘碛下数尺有紫盐，如红如紫，色鲜而甘。此二盐即戎盐之青赤二色者，医方但用青盐而不用红盐。"

这样的盐，据《本草》本经所载，有"明目益气，坚肌骨，去毒蛊"之效。此外还有绿盐，为眼药的要品，出伊朗国，亦可以用人工制造，以铜醋相和而成。

盐除了调味和药用以外，还可以腌菜、腌鱼、腌肉等等，使之久藏不腐。在那没有冰箱冷冻肉类的年月，用盐腌制肉菜保鲜，作用不小。古人腌鱼腌肉故多称之为鲊，腌菜多称为菹。如后魏贾思勰《齐氏要术》有作鱼鲊及作猪肉鲊法。但鲊除盐以外，实尚和米，如《释名》所谓："鲊，滓也，以盐米酿之，如菹熟而食之也。"现今的腌法，则又有两种，一种为鲍，是腌而湿的，一种为鲞，是腌而干的，大多属于鱼类，俗称咸鱼或咸鱼干。但肉亦有鲍腌肉，是鲍亦可称肉，唯普通多称为咸肉。鲍腌亦叫做暴腌，因其腌而未久，故称为暴。

至于菹，《释名》所谓："菹，阻也，生酿之，遂使阻于寒温之间不得烂也。"也就是如今的盐菜，凡是蔬菜都可以菹的。《周礼·天官·醢人》有"七菹"之说，据注为韭青茆葵芹箈笋。有用盐渍的，有用酱浸的，酱浸的今人称之为酱菜，滋味较盐渍为佳。广州有间百年老酱菜店

叫致美斋，北京有著名的六必居和天源老店，他们酱出来的头菜、青瓜、萝卜、蒜头、辣椒、杂锦菜等，十分美味，吃之很“管饭”（开胃），经过其店铺门口，远远就闻到一阵酱香味，令人馋涎欲滴。

除了在商店可以买到酱菜、咸肉外，宝安的农家人都会自己腌制几味。当地人喜欢吃的咸菜有两种，一是客家咸菜，较干身，菜叶多，不太咸；另一种是潮州咸菜，长年用盐水浸渍，菜叶少，偏咸。至于盐肉，就制成咸肉或腊肉，腊肉炒荷豆，是粤菜特色呢。

我们现在吃盐，都是各级盐业专卖局经营，凡私盐都会遭到打击和严处。有人说我们天天吃盐，就见不到盐场晒盐，更见不到盐灶盐寮煮盐，现在的“盐田”、“盐灶”、“盐寮”均剩下地名而已。上世纪60年代我曾去大鹏还见过东山一带，是一片白皑皑的盐田，后来就改作珍珠场了。

至于沙井、福永、固戍、白石、大冲、官富等古盐场，近百年已不见。是不是像《新安县志》里载的：“乾隆五十四年，奉行改埠为纲，其归靖场、东莞场具奉裁撤，饬将盐田池漏拆毁，净尽养淡，改作稻田，升科起征银两，以补场课，如不敷，归于纲局，羡余缴足，经前县胡会同东莞县史查勘……”

是否两三百年前就将宝安的盐田改作稻田？我暂未去查根究底，也许这是留给我们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去研究的一个好选题。但是我想，宝安古盐场有近二千年的历史，这是不容置疑的。

红树林是以红树科植物为主组成的海洋木本植物群落，因树干呈淡红色而得名。新发现的坝光盐灶村海边约有50亩数百棵茂盛的银叶树，是红树林原始“家族”中，弥足珍贵的“海洋生态森林”——它可以防台风，防海浪，防赤潮；这稀有濒危树种银叶树，在我国沿海亚热带地区，已是不可多得能保存下来的海洋生态乔木群。

红树林与五百年银叶树

红树林与海荫树

红树林，深圳当地人称作“海荫树”，生长在咸海潮滩涂和海岸“围坐”边，为海堤防风挡浪，为滩涂除污，改良水质。

红树林，属亚热带林木，分布在我国福建、台湾、香港、广东、广西沿海。我曾去过福建厦门、台湾最北部的台北市淡水镇和最南端的鹅銮鼻、香港新界米铺乡以及广西北海等地见过红树林。早年我在深圳的西乡镇固戍村、翻身村、南头湾海、内伶仃岛、大铲岛和福田沙头村等地当“县工作队帮耕”和防洪抢险时见识过海荫树；特别是小时候还进过南头海荫树里抓鱼、虾、蟹，在海荫树树桠的鸟巢掏过鸟蛋。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那“疯狂的革命年代”，为了“多打粮，围海造田”，我眼看着“瞎指挥”硬是毁坏了成片的野生红树林，而无能为力。

那时遭人为毁坏的有南头、西乡、福永海滩的红树林，还有上沙、下沙、沙嘴、沙尾等沿海的红树林，连深圳湾边的渔民村那点红树林也未能幸免。硬要渔民村渔民清除红树林，围滩涂，造水田，种稻谷。渔民只会打



深圳湾红树林

鱼，哪会种稻？加上海水、海泥非常咸，种出来的水稻只长禾苗不长谷粒，成为当时讽刺“瞎指挥”官僚主义作风的大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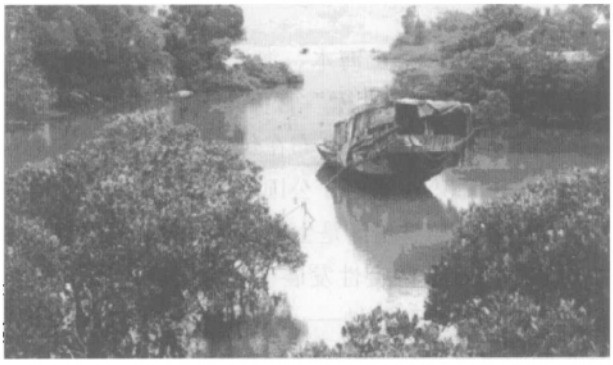
深圳市的湿地主要分布在包括滨海湿地、河流湿地及湖泊湿地（水库）三类共15种，面积共15848公顷，占深圳总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的8.12%。其中河口湾和红树林沼泽是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地方，湿地在维持深圳城市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位于深圳湾畔的红树林，毗邻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香港米埔保护区，是全国唯一一处在城市腹地、面积最小的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红树林是以红树科植物为主组成的海洋木本植物群落，因树干呈淡红色而得名。这里红树林植物具有“胎生”、“泌盐”及“特殊根系”等奇特的生态特征；福田保护内自然生长的红树植物有9科22种，主要是海漆、木榄、秋茄、桐花树、白骨壤、海桑等珍稀树种。茂密的红树林东起新洲河口，西至海滨生态公园，形成沿海岸线长约9公里的“绿色长城”，总面积达367.64公顷，是城市的“天然绿肺”，具有防浪固堤和净化污水的作用，福田红树林1988年就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福田红树林有鸟类194种，其中卷羽鹈鹕、白肩雕、黑脸琵鹭、黑嘴鸥等23种属于国际、国内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物种，每年有10万只以上长途迁徙的候鸟在深圳湾停歇，是东半球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栖息地和中途歇脚点，是国家级的鸟类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内地势平坦、开阔，有沼泽、浅水和林木等多种自然景观，在此可观赏到落霞与千鸟齐飞、静水共长天一色的自然美景。1982年10月6日，来自12个国家的联合国“利用生态平衡学术座谈会”的12名生态专家，专门考察了这片红树林。此后，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已被“国

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列为国际重要保护组成单位之一，同时也是我国“人与生物圈”网络组成单位之一。

以前的“瞎指挥”之所以敢毁坏红树林，是因为对红树林一无所知。上世纪80年代开始，深圳河南岸的香港新界米埔红树林湿地保护得很好，人们才知道红树林是个宝。后来我市在1984年特意划地保护福田野生红树林，又专门设立内伶仃岛红树林保护区。被传为佳话的是，九十年代修筑罗湖通往蛇口的滨海大道，为福田红树林绕了道；为了不惊扰红树林的珍贵鸟类，还建了500米防噪音墙。如今建成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组建红树林巡逻执法队，在海上巡视保护珍稀动植物；盖了观鸟亭，辟小道曲径，成为市民一个游览、休息的好去处。深圳河畔的红树林和珍稀鸟禽，从来未有得到如此“待遇”，在喧嚣的都市里，静静地得以繁衍生息。

除了福田和内伶仃岛红树林保护区外，想不到在寸土寸金、城市快速发展的深圳，竟然还有个近乎原始的坝光村红树林。


坝光红树林

夏日，葵涌籍的市民间文艺家老蓝，邀请市文物考古专家彭先生、植物研究专家老李和我等几位朋友，驱车前往大鹏半岛的葵涌镇坝光村盐灶自然村，专门观看坝光原生态红树林。

60多公里的路程，上了盐(田)坝(光)高速公路，个把小时就到了。老蓝说，几年前没通高速公路时，车子翻山越岭需走四五个小时；二十几年前没通公路时，他走路到龙岗中学读书，要走大半天时间。随着城市的发展，坝光盐灶村大部分村民已搬迁到市、区或葵涌圩镇居住。村里几十间老屋除了剩下几户老人小孩坚守着外，其余的房子被外地人租下来，一边种菜，一边打鱼，过着半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也许是高速公路晚了十多年才通向这偏僻海边山村，房地产商没有“杀”过来，我国沿海已不多见的坝光原生态红树林才得以保存下来。

坝光五百年银叶树

市植物专家惊喜发现坝光这片原始的红树林“家族”中，是弥足珍贵的“海洋森林”——银叶树生态群落。

稀有濒危树种银叶树，高十数十米，树干粗如盆桶，它长在咸海水岸边滩涂上，属海洋环保卫士——红树林家族中的一种胎生树。它可以防台风，防海浪，防赤潮，有“海洋生态森林”之称。坝光盐灶村海边约有50亩数百棵茂盛的银叶树，是我国沿海亚热带地区，已不可多得能保存下来的海洋生态森林乔木群。

龙岗区农业林业局早年组织专家考证，确认盐灶村此50多亩海边银叶树群落树龄，有不少已达500多年历史。

这种银叶胎生树，它的繁殖靠一颗颗像小鸡蛋大小的纺锤果，在树上成熟掉下来，搁在滩涂上，没几天就暴芽，伸出根丝似的根和小叶子，扎在盐碱潮湿的泥巴里。根扎稳了，就不怕海浪冲刷了，随着年岁慢慢长大。我们在参天大树下，看到地上许多宗褐色的纺锤果子，有的发芽，有的长出叶子，有的已长了尺把高。老蓝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和村里的小伙伴，捡上一把银叶果，在沙滩上用火煨熟，剥开外壳，像吃栗子一样吃里头的果肉，挺香。我们一行中有人好奇，也捡了几颗果子，是带回去纪念、种植还是煨着吃？他们扮了个酷相，诡秘不说。



坝光银叶古树的板根像板墙

银叶树还有一样东西非常奇特，就是它的树根有“土下根”和“土上根”两种。这长在泥土下面的根以汲取营养为主，为土下根；长在泥土面上的“土上根”像板墙，竖起拳头厚的根板，可能是它的“分工”负责扶住大树，免招海浪狂风吹袭。因此，在长年风吹浪打的年月里，这根板墙有的弯弯曲曲，有的层错叠加，有的尺把高，有的近人腰；板根墙奇形怪状，有的长成像山丘峡谷，有的像河道弯弯，有的像间小屋，有的更似山神庙，可供人烧香膜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盐灶村生产队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跳忠字舞、评工分、开大会，甚至批斗“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活动，全在这银叶树底下泥地坪进行。各位社员村民，各自找棵银叶树根板墙，坐着，靠着；厌烦这种政治运动的社员，采取“闷不作声”暗地里对抗着。性急的社员见“批斗会”冷场，没人发言批斗村里的同伴，诙谐地说：“你们批不批？你们不批我批，我批完好为猪崽去镇里买糠。”幽

默的人更是躲在根板墙里悄悄打呼噜，以示当时农民对这年月过火整人的举动，智慧地表达“不满”和“抵制”。

我看着这片高大的银叶树林，发现有一棵双手可合抱的老树倒卧在湖水边。据老蓝说，在2003年一次13级台风正面袭击大亚湾时，这棵大树，为抵挡吹向村子的烈风，被刮倒了，而村子上百年的瓦砖屋没事。银叶树“奋勇挡身”的精神，让盐灶村民肃然起敬。树倒了，村里没有任何人对它有“不尊”的举动——或砍枝，或剥皮，或锯截回去当柴火，诸如此类。

如今，它靠那一半的根植在土里，横栽侧卧，挣扎着活下去。像一位诗人说的：给我一缕阳光，就能长出新枝。

我忽然想起台湾阿里山著名景区森林里，不也倒着一些大树，近百年来没有人破坏过，粗大的树干长满青苔藤蔓，其中有一棵直指云天的两人合抱的千多年枯树，当地人冠名为“神木”。还有一株“三代木”，第一代树木已枯死，根茎都风化了，但仍然傲骨挺立着，于是在其上又生出第二代，虽也枯老却不失当年的蓊郁；左边一棵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第三代树，枝杈暴出青青嫩芽，生机盎然。三代木同一根株，两代枯竭托起最后一代繁荣，堪称奇迹。神木、三代树和姐妹树，二十几年来吸引一拨又一拨游客，不远千里前来观光留影。

现在盐灶村这棵风骨横卧的银叶树，完全可以保护起来，成为旅游的一个景点。

盐灶村远离市区，以前交通不便，经济较为落后。村里老村民没建一间工厂，没办一家企业，只有数户人家从事海上养鱼养虾，没有工业污染。

随着盐（田）坝（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往东部海岸旅游热了起来。葵涌至盐灶小段崆崎山路目前没有通高速，盐灶小村仍较为平静。村里有经营头脑的三五户人家，办起小店食肆，做生猛海鲜的特色餐厅生意，在节假日旅游旺季里，着实火了一把。

老蓝带我们绕村子和海边走了一圈，高山林密，青翠葱茏；天空深邃，净云万里；海水湛蓝，浪拍礁石；海美，树美，村美，空气清甜。只可惜岸边偶尔被海浪冲上个易拉罐、可乐胶瓶，塑胶袋或泡沫饭盒什么的，被银叶树或礁石群搁着，土著老蓝眼里搁不下，心里藏不住，除不时弯腰拾捡起来外，口里还对这种不环保的行为骂骂咧咧，恨不得当面把这些人狠狠批评一顿。

别怪老蓝小气，我们这些“外乡人”，对这片“海洋森林”和生态小渔村也深爱不舍，情感上也容不得有半点东西污染我们的家园。

1959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深圳南澳东山岛建立起我国三大国营海水养殖基地之一的珍珠养殖场。其实深圳产珠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东莞县志》载：南汉时（959 ～ 971 年），“邑属大步海（大步，今香港新界大埔的旧称）有湄川池，产雅珍珠……又县之后海（今蛇口后海湾）、龙歧（今大鹏湾内）、青螺角、荔枝庄一十三处，皆产珠母蠃及珠蠃树……”

深圳自古出珍珠

一千多年前的残酷采珠法

珍珠亦名真珠，属石决明科。珍珠有数色，南珠色红，西洋珠色白，北珠色微青。

说起南珠，多数人知道广东廉州、合浦、北海一带产地。因为广为人知的《岭表录异》载之：“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合浦县海中亦有三池，曰梅池、青池、婴池，是为珍珠也。

然而，1535 年的《广东通志》载：“今东莞（古时深圳市曾属东莞县）之珠，前代亦或设掌厉禁明饰……盖采之者，始秦尉屠睢，而宋之者，始宋熙宁也”。又云：“蜑民采珠，宫廷权贵者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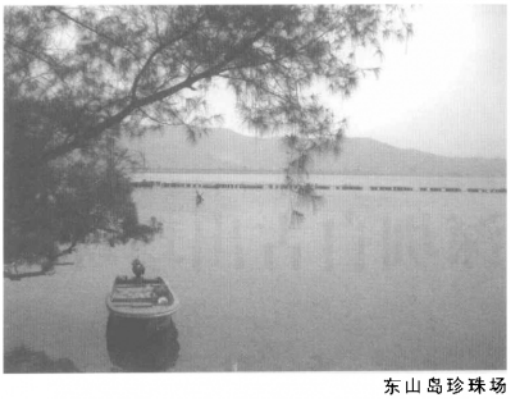
《东莞县志》记载：南汉时(959 ～ 971 年)，“邑属大步海(大步，今香港新界大埔的旧称)有湄川池，产雅珍珠……又县之后海(今蛇口后海湾)、龙歧(今大鹏湾内)、青螺角、荔枝庄一十三处，皆产珠母蠃及珠蠃树，今皆母之。”

珍珠长在“珠蠃树”？是的。古代珍珠天然生长在深海的崖石礁林里，蜑民每以长绳系腰，再绑个篓篮入海采珠，如篓篮满载了珍珠，即拉扯震动

吊绳通知船上同行采珠人，将篓篮扯起取蚌。往往野生珍珠几十年生长，其树如枝桠，蚌生于枝桠，而“海树”则栖生于岩石上，蜑民凿石取“树”而得蚌，剖开海蚌而取珠。船上的人见到越大越老的海树，越有机会采到大珍珠，就越兴奋。如果见到海面有血丝浮起，则会慌乱无神，因为入海者发生十之八九葬身鱼腹之悲剧。

这种悲剧，远在“五代时期”的大宝六年（公元963年），屡有发生，甚至有动用了数千名士兵采珠的史实；采珠时，士兵脚上系上大石头，沉入深海，遇溺窒息丧生者十分常见。此种野蛮采珠法，持续339年，引起沿海兵民不满。

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当地官员张惟寅奏疏《上宣慰司采珠不便状》：“宋大学士陈均著宋朝编年载，宋赵太祖开宝五年五月，废媚（湄）川都一事附注云，刘鋹（五代时伪南汉主）于海门镇募兵能采珠者三千人，号媚川都，岁溺死甚众……五代之所谓都，即今日之所谓军翼也，善没水者皆采珠，何必置三千兵于此驱人于死地，不得不以军法从事也。夫珠生于蚌，深在数十丈水中，珠之所聚，必有水怪恶鱼以护之。取之之法，引石缒人而下，欲其没水疾也没水者，采捞蚌蛤或得与不得，气欲绝者，即掣动其绳，舟中之人，疾引而出，之稍迟则没水，七窍流血而死，或值恶鱼水怪必为所噬，无所回避，而况刳蚌，逾百十得珠仅一二乎，且珠池本处蜑蛮日与珠居，而饥寒褴褛甚于他处。……按元史延佑六年罢采珠，则此状为功不少矣。”


东山岛珍珠场

此志记载的草菅人命之采珠法，直至元朝泰定元年才罢止，张惟寅奏状确实“为功不少”。同时可见贪利者，丧心病狂到不惧“军法从事”。清朝时代，大鹏龙歧、香港大埔海的珍珠已很出名，因产于媚川一带，故名曰“媚珠”。大埔樟树滩对外海面亦称为珍珠江，其所产之珍珠多为贡品，因此新安县衙一直派有兵船镇守，禁止渔民采珠。其后因官方经常大量采购，也监守自盗，遂使媚珠池之珍珠枯竭，珍珠江之美名成为陈迹。

珍珠以翠绿晶莹者为上品，黄泥色为下品。珠蚌有特性，闻雷声则瘦而孕珠。其孕珠如人怀孕，故称之珠胎。今人常说“珠胎暗结”，即出于此也。

珍珠，是海水贝类或淡水贝类（如马氏珠母贝、三角帆蚌、褶纹冠蚌、背角无齿蚌等），在一定外界条件的刺激下，所分泌并形成颗粒圆珠状。由海产贝类生成的称为“海水珍珠”，淡水贝类生成的称“淡水珍珠”。

珍珠，具有明亮艳丽的光泽，自古多为宝贵饰物，其次则多用于入药。珍珠在药用方面颇广，将珍珠磨成粉末，即“珍珠粉”，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性寒、味甘咸，功能定惊安神、清热益阴。主治镇心、点目，惊痫神昏、心悸不寐；外治目赤翳障、痈疽溃疡等症。“珍珠母”系珠蚌科的几种蚌的贝壳煅制而成，性寒、味甘咸，功能平肝潜阳，主治头晕目眩、惊风心烦等症。今人将珍珠粉末，再广而用之，既可做成高级润肤乳剂润泽肌肤，养颜健美外，又可医治遗精、清白浊、解痘疔毒、妇女难产、胎死腹中及胞衣不下等疾病。

珍珠蚌剔出珠子后，珍珠肉也美味可口，珍珠肉又叫珍珠贝贻，可炒菜可煮汤，鲜甜无比。珍珠外壳，还是烧制建筑用的好材料。

天然珍珠蚌产珠量不高。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首先在香港赤门海峡、凤凰笏两地创设珍珠场，将人造珠植入蚌内，并注射化学液体，然后把珠蚌用铁笼装着放入海里，再系于一排排的竹排吊养。这样养殖，果然使蚌珠成长快，颗粒匀，珠色亮，产量高。

千年采珠遗址上养珍珠

古语云：“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

在古湄川和龙歧海域里的深圳东山珍珠岛，仍然延伸着珍珠养殖的历史。

深圳东部的南澳东山湾，坐落大亚湾，紧连浩瀚南海，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差变化不大，年平均气温22.2摄氏度，雨量充沛，年平均日照时间为1814小时，属高盐性海域，水质清新，是养殖海水珍珠的天然港湾。这里出产的海水珍珠珠粒大、圆度好、瑕疵少、光洁度高、质地细密、色泽均匀，属优质的“南珠”体系。

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深圳南澳东山岛建立起我国三大国营海水养殖基地之一的珍珠养殖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成功掌握和提高珍珠科学养殖、加工的先进工艺，成为著名“南珠”的主要产地之一。

早在1969年，东山珍珠养殖场发明了“2＃塑料网笼封闭式采苗法”，其技术超过了日本当时最先进的提包式采苗法，天然采苗量达到了3300万只；1970年珍珠养殖贝达到了1600万只。1981年至1996年的十五年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东珍牌”南珠王系列化妆品字号响亮，影响力直抵香港，1995年年营业额达500万，创新了东山珍珠场的历史纪录。

“东山珍珠”积极走科学养珠之路。他们除大规模养殖常规的马氏珠母贝外，还大量繁殖企鹅贝优良品种，试验性养殖黑蝶贝、白蝶贝、大珠母贝等稀有品种。科研人员和养殖师傅在长期的实践中也发现珍珠贝的幼体并不像日本洋书上写的那样附着在阴面，而是恰恰相反，首先在阳面附着，随着个体的生长然后才向阴面移动营附着生活的习性。这一规律的发现，终于解决了我国在珍珠养殖海区自然采苗技术上为什么上不去的原因。

紧接着，他们设计了一种能使珍珠贝幼体“自投罗网”的附着器，幼体的附着量比日本人高15倍的“封闭式采苗法”。这一方法的创立使我国的珍珠养殖自然海区采苗技术，处于领先的地位，专家认为超世界水平。苗种技术的解决，大大推动了珍珠养殖的迅速发展。

在此基础上，东山岛珍珠场又引进了美国海湾扇贝，取得了南移广东沿海的成功，并在珍珠场安家落户养殖下来在我省我市属于首次。从海南岛北移大珠母贝在东山珍珠场养殖，并培育出一颗18.1毫米的大珍珠，价值10万元，为当地有记载以来所罕见。

1997年至2001年受国内外市场的冲击，珍珠生产出现“危机”，产量严重下滑。在危机面前，迫使“东山珍珠人”走上了改制的新路。2002年“东山珍珠”从省属国营企业，摇身变为民营的“东山珍珠岛实业有限公司”。东山珍珠岛养殖场现有生产配套建设用地近51000平方米，海上养殖面积，包括白石牌海区1991亩，虎头山海区225亩，东家湾海区326亩的一片养殖基地。

为适应经济发展，深圳市将南澳、葵涌和大鹏三镇，规划建成东部海洋生物高科技产业区。这一区域按照总体功能划为A、B、C片区，其中C片区是重要和核心的地带，功能包括海洋生物高科技区、海洋生物精细深加工区和都市休闲渔业观光区。东山珍珠养殖场，就位于C片区。

2003年7月，“东山珍珠”又迎来一个发展机遇。一块崭新的招牌“南海海洋生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化基地”在东山珍珠岛悬挂起来，这意味着“东山珍珠”的经营理念，从纯粹的珍珠养殖迈进到高科技的海洋生物产业。这是东山珍珠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致力合作的一次结晶。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徐安龙院长说，在“东山珍珠岛”挂出的是他们惟一的一块海洋生物产业化基地招牌：“这里将建成我国现代海水养殖业的窗口，并优先占据海洋生物高新科技的制高点，包括具有高度发达和先进的海洋生物技术产业，如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新材料基地等，海洋名优水产品的工厂化生产与健康养殖业，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与水产品加工业，注重海洋生物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发展海洋休闲观光业。”

如今，　在同行业中，东山场的珍珠以颗粒大，珠层厚，光亮度好而著

称，珍珠的价值几倍地提高。因此，珍珠首饰工艺品厂也就在10多年前办了起来。珍珠加工包括珍珠工艺品、珍珠保健品、珍珠药品和珍珠生物制品等。珍珠化妆品厂发展了五个品种，形成了南珠王系列珍珠化妆品，经深圳市有关产品质量部门检测批准生产上市，现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从养殖到珍珠加工到销售一条龙。以珍珠为名的珍珠酒家、夜明珠宾馆、珍珠产品展销部、珍珠陈列室、珍珠为题材的动物标本室，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旅游购物，参观访问。企业社会知名度日益提高，经济效益明显增长。

我曾几次到过东山珍珠养殖场。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许多“东山珍珠人”是广州、深圳等城市下放的知识青年，她们在简陋的工场，把一颗颗珠蚌小心剖开，经过消毒，植入人工珠核，然后再放入海中吊养。她们靠着一双手，人力搬运蚌母，装船出海，风吹日晒，雨淋浪打，遇到台风，要抢搬竹排和吊蚌上岸，时时处处危险。也许是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条件清苦，工薪低，待遇差，场里有不少的青年人非法泅海偷渡去了香港。



珍珠项链熠熠生辉

30多年过去了，东山珍珠养殖场变了个样。如今在风景如画的海湾一个现代化园区里，绿树掩映中看到育苗室、植珠室、海上养贝、育珠场、珍珠系列产品加工车间的操作过程；还享受到珍珠餐厅里面烹饪深圳独一无二的“珍珠全席”、琳琅满目的珍珠商场、舒适惬意的珍珠宾馆、珍珠休闲吧的特色服务。信步浏览珍珠研究室、大亚湾生物标本室、珍珠保健疗养中心等，一身舟车劳顿的疲惫，顿然消失。

此时，我站在千年采珠的遗迹上，无法想象古时坠石深海残酷采珠的情景，由此担心狂风巨浪吞噬采珠人命的悲剧发生。我慨叹星移斗换，人事沧桑！如今，在这现代化的养殖基地，处处感受到人类文明和科学发展成果的实惠，享受着珍珠首饰、珍珠美容、珍珠美食等方面带来现代生活的惬意……

从前，深圳人抹香油、搽香粉、喝山茶、吃蔗糖及饮米酒，全是乡间制造，因而香寮、茶寮、糖寮与酒坊遍及村镇。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小有名气。拿香寮来说，清嘉庆《新安县志》载："香树邑内多植之，东路以出于沥源（今香港沙田）、沙螺湾等处为佳，西路以出于燕村（今公明镇燕川村）、李松蓢等处为佳。叶似黄杨，凌寒不落，子如连翘而黑，落地则生，经手摘则香气积久而愈盛。正干为'白木香'，出土尺许为'香头'，必经十余载始如马牙形，俗呼为'牙香'。凡种香家妇女，潜取佳者藏之，名'女儿香'，岁时供神以此为敬。"

香寮、茶寮、糖寮与酒坊

香寮

深圳人旧时用香料熏蚊虫、驱邪气，用香料制成药油搽太阳穴门提神醒脑、治舟车昏眩和肚子痛，更有用香料做成香包和香粉、香油涂抹身上，还有大量用香粉做成的一支支神香，拜祭神明和祖先之用。

这种香料，就取之樟树和香树。古时新安的樟树和香树很有名气，并且和东莞的莞香、香港的名字由来有关。

樟树分布在石岩、龙华、观澜、平湖、布吉、深圳圩、横岗、盐田、龙岗、坪山及葵涌等地，至今石岩圩镇原中心小学大门还有一株四五百年的老樟树，树冠遮盖一个半篮球场，树干粗得要三四人合抱。树心已空，但仍枝繁叶茂。樟树洞藏进两三个小孩没问题。世事巧合挺多。《宋书·符瑞志》云："豫章（今江西豫章县）有大樟树大三十五围。"《闽部疏》云："建宁都司后园多大樟，皆十许人合抱。一树中空，可容五六人坐。槎桠下垂，俨如岩洞，不知为树也。"深圳特区内最古老的樟树，位于盐田坳背村（今明珠社区）和罗湖区罗芳村的两棵"樟树王"，2004 年市

古树普查时测定为506岁。

樟树，通常用于建筑造船及衣箱书厨文房具等，惟香气太多，故不适于食器；制箱柜最佳，以避虫蛀。我家有个老樟木笼，是外祖母传给母亲的嫁妆，常年存放毛织冬衣，既清香干爽又无虫蚁。樟木可制樟脑，及制造无烟火药。我小时候见过家乡人“逼”樟脑油。即将老樟木锯成薄片，置密封容器中加热蒸之，蒸气升于盖上，经管子遇冷出油或凝而结晶。胡演在《升炼方》一文记载另一种“煎樟脑法：用樟木新者切片，以井水浸三日三夜，入锅煎之，柳木频搅，待汁减半，柳上有白霜，即滤去渣，倾汁入瓦盆内，经宿自然结成块也。”

古新安在大步（今香港新界大埔）、沙田、香港仔、离岛和公明、松岗等地有香树和用香树做香粉的“香粉寮”。清嘉庆《新安县志》载：“香树邑内多植之，东路以出于沥源（今香港沙田）、沙螺湾等处为佳，西路以出于燕村（今公明镇燕川村）、李松蓢等处为佳。叶似黄杨，凌寒不落，子如连翘而黑，落地则生，经手摘则香气积久而愈盛。正干为‘白木香’，出土尺许为‘香头’，必经十余载始如马牙形，俗呼为‘牙香’。凡种香家妇女，潜取佳者藏之，名‘女儿香’，岁时供神以此为敬。”

香树造香粉的作坊叫做“香粉寮”。香粉寮一般靠近河边，拦坝分流，引来湍急的河溪水冲向水轮，水轮推动木制齿轮，齿轮带动木碓，木碓铁嘴一上一下舂粹香树木块，成粉末后筛过，再舂成幼细香粉，然后晒干批发给家庭作坊制造神香。

制神香工序简单，只要将裁好长短大小均匀之竹篾染红，蘸上树胶，在香粉上滚动压实，然后检查每支香的香粉厚薄均匀后，就摊在“窝栏”（簸箕）里让日头曝晒干；几十至一百支左右包装，贴上带吉利的招牌红纸，就成盒装香或袋装香了。香寮通常做神香外，还做长寿香、环香、塔香等。

香港新界沙田、大埔、香港仔和深圳公明、松岗一带香寮做的香粉，都是有名气的产品。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些产品逐渐消失，香寮也逐渐没落；而东莞却发展成规模生产香烛、蚊香、炮竹、烟花，几乎占领珠三角市场，并且出口港澳和东南亚地区。

茶寮

茶寮，是乡民在山坳顶，或村前村尾方便挑担之人歇息时设立的茶水歇脚点。

这茶水点之所以称之茶寮，因为它非常简陋，是间茅草搭起稍能挡风遮阳的草棚；村前村后的茶寮好一点，还有张八仙桌、四张长凳供人歇息；要是在山坳顶的，连凳都没有，只有石头石墩石凳了。

挑担赶路的人，长途跋涉，爬到山坳顶，气喘吁吁，喉干舌燥，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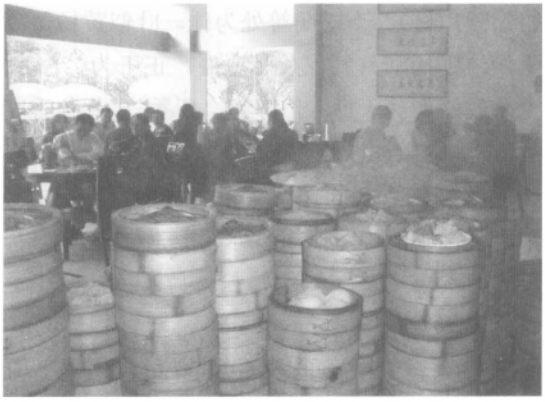
时喝碗茶水，歇歇脚，再往前行。所以，茶寮再简陋也无人计较。

茶寮的茶通常是当地山茶，或是主人自摘自制的咸茶，阴冷雨天时还有姜茶。盛茶的是只大碗公，一碗喝下去，够喉，过瘾，即便花它一文几厘的，也值得。

至于在圩镇或村头村尾的茶寮，主要方便过路客人歇息打听问路和村里闲人聊天聚脚之用。后来，这样的茶寮不只提供茶水，还顺便卖点土产地豆、瓜仁、本土糕点、麻糖和烟草什么的。

再后来，圩镇的茶寮慢慢变成既有茶可饮、有饭可食，还有酒肴供应的茶楼，但数量不多，每个乡镇才有那么两三间，并且都是小型简陋的，最大者也只容四五张八仙桌，多为小商小贩或过路客人光顾。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广州、香港等地影响，深圳的茶楼跟着称为“茶居”或“高楼”，去饮茶叫“上高楼”，吃饭则“吃高楼饭”。



深圳人饮茶，既叹茶，又吃点心

早期深圳茶楼供应食品跟今天大同小异，所没有的是凤爪、牛仔骨之类。乡镇的每日多数只开午晚两市，圩日时午市较旺，晚市只有零星食客，比如石岩圩有间“同福茶楼”，茶水免费，多数卖狗肉饭、烧鹅饭、烧鸭饭、叉烧饭。南头、深圳、西乡、沙井、松岗等较大的圩镇，每日开设早午晚三市。早市在天麻麻亮时就开市，大多是来往客商、赶圩场的小商贩及有闲有钱之人士，一大早到茶楼吃一茶一饭或“一盅（茶）两件（蒸排骨和叉烧包）”，然后各自忙去。

深圳圩早年在南庆街有间“鸿安茶楼”，它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曾经是接待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西和街（今解放路）有“陆记茶楼”和“伦记茶楼”，直至后来划归宝安县饮食服务公司，20世纪70年代末改做糖水店，80年代初改为“比萨饼店”。

深圳最“威水”的茶楼数新安酒家，1958年由中南局书记陶铸奠基，1961年大年初一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开业剪彩。建立经济特区后，最早为香港商人在罗湖火车站附近投资建起“新兴餐厅”、“友谊餐厅”和“春园酒家”，接着广州、上海、重庆等地来深圳合资建起“泮溪酒家”“上海酒家”和“重庆酒家”。以

后，深圳茶楼酒家如雨后春笋，星罗棋布。

深圳的茶馆，虽然不像成都和北京那样只有喝茶，兼说书唱戏的娱乐休闲功能，但它跟食肆结合得很有特色。纯粹喝茶并有茶艺表演的茶室茶馆，也就是在八九十年代才时兴起来的。喝茗茶，嗑瓜子，吃小食，谈生意，或朋友叙旧，确是个清静悠然的好去处，绝不像茶楼那样嘈杂和热闹。

这年头茶座开多了，竞争激烈，有生意头脑的人增设搓麻将房，至此，茶馆有点偏了，离休闲、歇息的茶寮、茶馆、茶楼的本来特色远了些。

糖寮

“西乡糖厂大大镬”，是深圳本土俗语，俏皮话。广东人在这里说的“镬”，是“麻烦”或者“闯祸”的意思。整句俗语形容的是“惹了个麻烦”或是“闯了一个大祸”。

“惹了祸”怎样会跟西乡糖厂扯上呢？这也是一个比喻句，因为西乡糖厂煮糖的镬很大很大，比家里的镬大好几十倍，一次能煮几十桶甘蔗汁。



甘蔗榨汁磨(罗湖文化馆摄)

深圳是个亚热带地区，盛产甘蔗。清嘉庆《新安县志》载：“蔗有二种，曰白蔗，曰竹蔗。而邑中惟竹蔗长丈余，颇似竹。种蔗用蔗种尺余斜而种之，多蔗出蔗尤甘，冬时榨汁煮炼成糖，其浊而黑者曰黑片糖，清而黄者曰黄片糖，其凸而细者曰白沙糖。”

旧时乡间喜欢种蔗，一是深圳的丘陵、山地、稻田均适宜种植，二是毋须花太多人工管理，种下去稍微施施肥，即自长自大，且收获长年不绝，不受季节气候影响。所以深圳东从大鹏、南澳起，西至公明、松岗的全部乡村，都有大量种植甘蔗的传统。

甘蔗要变成糖，就要把甘蔗榨成汁，然后煮熬成糖。于是乎，村村几乎有“绞寮”、“糖寮”，自榨自煮蔗糖。为了多出糖，一般等甘蔗长到中秋时分，一来雨水少，甘蔗含糖分高，二来稻谷已收割入仓，大田农事稍闲，可以抽出人力干砍蔗、榨糖等重活。

糖寮开榨，村里大人小孩都像过节般高兴。家家户户砍下的甘蔗，自己要吃哪根就挑那根，几天下来，牙都咬累了，嘴咬损了。到绞寮和糖寮去，也很

好玩。糖寮里柴火烧得旺旺的，既暖和，又充满糖香。面对一口口煮糖的糖镬里，嘴馋的小孩子，吵嚷着吃糖，煮糖师傅就在糖浆未成糖前，用筷子挑点软糖卷着递过来，孩子们个个举着筷子上的软糖，就蹦蹦跳跳出去玩了。

早时榨甘蔗汁，是用类似石磨的两个磨轮，把一根根甘蔗伸进去相绞挤压，硬把甘蔗汁榨出，这石磨轮有用人力推，也有用牛拉。龙岗罗瑞合围屋客家民俗博物馆里，至今还保留和展出一个榨甘蔗石磨机。后来有了电动榨汁机，大大减轻了劳力，提高了效率，甘蔗的出汁率也有很大的提高。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整合资源，宝安县就在东片的龙岗和西片的西乡，分别建了两个糖厂，机械化搬运、输送、压榨、煮糖、品质检验和分级包装，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有了质的飞跃。



上世纪 70 年代的西乡糖厂（何煌友 摄）

从此，遍布乡间的小小糖寮也消失了，糖香味闻不到了，软糖也吃不上，山村野趣也就没了。

据说龙岗糖厂和西乡糖厂，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关停并转，没了。如今，只剩下“西乡糖厂大大镬”这句俏皮上话流传乡间。

酒坊

旧时乡下人饮酒，多为土酒坊造酒，抑或自酿黄酒。

深圳当地人用土法酿酒，客家话叫做“逼酒”，“逼出来”的酒，形象地被戏称为“倒汗水”。因为这种小酒坊，用蒸馏法造酒，一滴一滴地出酒，非常像汗水流滴一样。

这样的小酒坊，一间小屋或一个草棚，几只盛放发酵米饭用的大笪箕、一口大锅和一个蒸炉，加上几十个窄口的瓦瓮，基本家档可就齐全了。师傅和下手也只有三两个人，因此夫妻档的酒坊不少。“逼酒”选用上好冬米，此米少水分，淀粉足。先煮熟二三百斤米饭，在笪箕上拌上“酒娘”（即酒饼）发酵，几天后发酵成有酒味，就盛进密封的蒸炉里，蒸炉是由一口锅和高三四尺的“企

桶”（大木桶）组成，蒸炉下柴火烧旺，蒸馏出酒气，通过冷却，从一根小指头般细小的竹竿子，一滴一滴地流出高浓度的米酒。

别看这样的酒是“土炮”，但制作时全是米粮，不参入任何杂质，酒色晶莹剔透，入口醇甘清香，既不割喉，又不上脑，很受欢迎。此酒产量不多，每期只五六十斤而已。仅满足村里为数不多的酒客，或有人用酒当药时，应付临时急需；至于婚娶喜事或村里寿宴之大量要酒，则要提前预订。

市场上需要供应大量米酒，县在西乡就建了个大酒厂，造出的米酒也很纯正。记得当时花一斤二两粮票和七角八分钱，可在糖烟酒门市部购得一斤西乡米酒。回家再炒小碟花生，便是一大享受矣。

在上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短缺，没有米造酒怎么办？那时用木薯、甘蔗渣、糖泡（收集糖厂煮糖的泡沫）代替，叫做“木薯酒”、“糖泡酒”。这酒呛喉、焗鼻、冲脑，很难喝。

乡间另一种造酒，就是家家都会酿的黄酒。这种酒全用糯米酿造，香，甜，度数不高，是妇人坐月子最好补身的酒。用它煮姜，是姜酒，除瘀祛月子风；用它煮鸡煮蛋，是鸡酒，行气补血。

黄酒制作很简单，是“浸酒”，先将糯米三五十斤蒸熟，摊冷，撒入酒饼拌匀，放入窄口的瓦埕，稍加适量开水，然后密封，七八天后就有酒味发出，芬芳诱人。若嫌酒味太淡，可加几斤纯正米酒，使其在埕中再度发酵，三数天后，用酒篓筛隔去酒渣，汲取净酒，经过煮滚，便可饮用。注意，这酒很“娇嫩”，容不得大力搬动，如过分摇晃，酒味则变酸。

此酒色泽黄白，酒质粘稠，味道甜香。如在发酵浸酒时加入红糟米，其酒色即变淡红，色香味更佳。若果用黑糯米浸酿，对产妇更为补益。

乡间产妇坐月子是件大事，不管大家还是娘家都早早提前浸酿，所以有的妇女以饮了几埕酒，为攀比荣耀富贵。这种酒客家人做得最好，所以俗称客家黄酒。由于黄酒度数低，好入口，男女皆宜，现在遍布深圳的客家餐厅多有备用，供客人选购，可惜店家追求利润，加了些白酒，没那么正宗和好喝了。

土地，乃乡人世代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命根子。数百年来，村民在田地耕耘中除了填饱肚子，还在田头地尾找到许多生计和乐趣，窖番薯、捉草蛙、养红虫、卖稻草。老百姓对土地的情感，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与朝廷的《严禁通海敕谕》“迁界令”斗争中可见一斑。新安人在残忍的8年“迁界”中失去了家园和土地，饿死他乡不计其数。后为王巡抚和两广周总督、前仆后继冒死谏言，最终得回迁复县，乡人对此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建立多处“巡抚祠”、报德祠纪念之。

田头地尾乡土野趣

田地有别

田和地，深圳本土人分得很清。有水的耕地为田，依山开垦而无水耕种的地为“崌”，崌即是旱地，故俗语有“耕田”“种地”之说。

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之前，乃是珠江三角洲鱼米之乡。因此地名田心、田贝、田面、水田、官田、黄田、薯田、马田、田寮、田尾等带田字的村子挺多；崌有上崌、下崌、崌坑、崌沥、崌下、崌岭、坪崌、禾崌等村落。

说田，细分有稻田、菜田、薯田、桑田及沙田、坑田等，稻田、菜田、薯田、桑田不用说都知道是由所种植物而冠名。沙田是指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一望无际的稻田，每一块田少则几十亩，多则数百亩，如西乡、沙井、福永、松岗都有连片的大沙田。坑田是指在山边有山坑水灌溉的一小块一小块梯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许多青壮年劳动力“非法偷渡”到香港，村里劳动力少，每年逢春插、夏收夏种和秋收割稻子，黄贝岭村、罗芳村、莲塘村以及西乡镇翻身村、共乐村，沙井镇和平村、新桥村，松岗镇江边村、东方村等，为赶季

节，忙不过来，都由机关、驻军和学校派出大量人员去帮耕收割。

深圳不论水田还是崔地，物产均极为丰富。清嘉庆《新安县志》载："邑地广二百七十里，袤三百八十里。"又："邑中宜稻，名类最多，曰早禾仔，曰海丰早，曰黄谷仔，曰红头早，曰大桂早此头造之早禾也。曰甲子周，曰饭罗黏，曰不知春，此头造之迟禾也。曰莆菱，曰赤谷仔，曰鹧鸪来，曰白壳赤，此头造之赤米谷也。曰红糯，曰晌糯，此头造之糯谷也。曰竹粘，曰岗粘，此末造之早禾也。曰白谷，曰矮苗，曰圆黏，曰乌笃黏，此又末造之迟禾也。曰竹黏糯，曰羊角钮，曰乌臀糯，曰白糯，此又末造糯谷之种类也。"这里说"造"就是深圳一年种两季稻谷，上半年收成的为早季稻，俗称头造、早禾，下半年收成的为晚季稻，又叫末造、迟禾。

崔地则种植"杂粮"狗尾粟、鸭脚粟、大粟麦、包粟、高粱、番薯、木薯、白薯、葛薯和花生、黄豆、眉豆、绿豆、红豆、甘蔗等。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都市化建设的迅速发展，许多山地被移平，不少水田被填平建了高楼。罗湖国贸大厦一带商业圈就是罗湖村、向西村的成片稻田；地王大厦、红岭及八卦岭工业区是蔡屋围、笋岗村的连片山地；华强商业街一带则是田面村、上埗村等村庄的水田和崔地。

出生于20世纪80代的青年人走在繁华、时尚的商业大街上，全然不知脚下曾是养育着一辈又一辈深圳人的田和地，也无从分别田与地的差异，更难辨认出禾苗和韭菜、粳米和黏糯、狗尾粟和鸭脚粟等农作物了。

当然，你叫老年人去辨认数码高科技之类的时尚东西，同样也是个难事，时代不同了，不可太过强求也。

草蜢红虫禾秆草

东北有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深圳古有三件宝，珍珠鲍鱼沙井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曾有新三宝："草蜢红虫禾秆草。"

草蜢是蚱蜢的土称，红虫是类似蚯蚓的小虫，禾秆草大家知道就是稻草。这"新三宝"不是用来吃，而是出口换外汇。

中国人自古有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的雅兴。香港和由香港移居外国唐人街的同胞，很喜欢养鸟和养金鱼。香港旺角就有著名的一条雀仔街和一条金鱼街。这两条街历史悠久，售卖的雀仔和金鱼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店铺老板饲养和销售也挺专业。

这成行成市的雀仔街，成千上万的鸟天天要吃；数十万尾的大小金鱼日日要喂，那时还没有专门生产鸟和鱼的饲料，即便有，也比不上那天然饲料——草蜢、红虫。鸟吃了草蜢，毛色特别漂亮，叫声特别清脆；金鱼吃了红虫，色

泽特别光鲜，游姿特别生猛可爱。

香港日益都市化，哪来大量的草蜢和红虫？因此，香港进口商就把目光投向一河之隔的深圳。那时深圳没有开发，原生态的乡村有太多草蜢、红虫、蚯蚓、禾虫、土别等小昆虫什么的。

经过深圳土产出口公司的组织收购，石岩、龙华、观澜、平湖、布吉、横岗和附城等公社，有不少的青年男女去捉草蜢，他们人手一杆用纱布做成的竹网兜，腰系一只竹篓，在山村田埂上捕捉草蜢，一天下来捉一篓半篓是没问题的。天黑之前赶到当地土产收购站，一只卖二三厘钱，一天白捡一元几角的，当时比出大田做工一天劳动工分才得一角几分钱的报酬高得多；当然这钱不是个人全得，要交一半给生产队。收购站集腋成裘，第二天马上出口香港。这项“副业”延续十多年，至八十年代头一两年才慢慢消失。

红虫，也叫水蛐，就不能满田埂去捕捉了，而是由土产出口公司签约定点的村庄，辟出几亩坑田“培养”。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两年，已经萌芽出现“三来一补”的引进项目形式。具体是村里组织一支红虫生产专业队，把在村里捡到的牛屎、猪屎，集中倒在几块田里，蓄水耙匀，十来天后，田里就长出一条条像缝衣针大小的小红虫，然后把这些小虫捞起，洗净牛屎和泥浆，集中卖给土产公司，土产公司收集到各个生产队交来的红虫，第二天装车出口。我当时采访过深圳附城公社布心村等村庄，了解了他们试养两个月很快成为“万元村”，第三年光红虫一项收入23.9万港元的情况，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省级文学杂志上。

禾秆草，深圳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由附城、南头、西乡、沙井和松岗公社用船运出口香港。香港要那么多禾秆草干什么？香港政府允许赌马，一年有两季的跑马赛事，有钱人也喜欢养马，马要吃优质稻草，就从深圳进口。据说还把深圳的优质禾秆草打包，销往英国等地。当时沙头角一个生产队一百斤禾秆草卖28港元，仅一造就收入一万多港元。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乡村都市化，草蜢、红虫、禾秆草这“新三宝”，才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的过去。

窑番薯

窑番薯，是农家孩子的一种田园之乐。

番薯，北方叫做地瓜，也称作红薯、甘薯，深圳人则称为番薯，因为它是“番埠”（外国）物种。明朝徐光启著之《农政全书》云：“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两种茎叶多类似，但山薯植

援附树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垒，番薯形圆而长。其味则番薯甚甘，山薯为劣耳。盖中土诸书所言薯者皆山薯也。”《闽书》亦载：“万历中闽人得之吕宋国。”这一句说得更清楚，番薯是在400年前的明朝万历年间传自菲律宾。

番薯生吃，可当水果，特别是吃了没刮干净狗毛的红烧狗肉，屙“狗痢”时，可当验方药，生番薯即吃即止。番薯可与米同煮，成番薯饭，或番薯粥，耐饱，通便。番薯搓和米粉、面粉亦可煎成番薯饼。番薯煲糖水，既可解渴，又可充饥。番薯还可以晒干，磨成粉，做各种食品加工原料和美食。

最有风味的吃法，莫过于我们孩提时“窑番薯”的乐趣。

冬至前后，早已收割完毕的“尾造禾”，一大片的稻田放敛水，被“犁冬”晒田，冬天干燥的北风把犁翻过来的土坯吹得干生生，白花花。我们农家孩子相约去放牛、牧鹅或打草蜢（蚱蜢），各人从家里带来十几条番薯，来到田里挑几块大泥坯垒成一个灶窑，然后分头去捡柴火和抱来大把禾秆草，点火把灶窑的泥坯烧红，直至烧成带白炽热状，接着扒出窑里烧剩的柴火，把十几条番薯放进窑里，用温度很高的泥坯把番薯严严实实地盖住。类似杭州著名的“叫化鸡”烤法。叫化鸡是用纸裹着糊上一层泥浆烧烤，而窑番薯则不用泥浆，直接由高热的泥巴闷熟。

这时，大家团团围着番薯窑讲故事，说笑话，唱山歌，“揽腰跤”（摔跤），打玻珠或“打芦除”（击棍子比赛）。二三十分钟后，番薯被焖熟了，大家小心翼翼地用树枝扒去泥坯土块，把一条条煨得香气袭人的熟番薯挖出土窑，剥开薯皮，露出金黄黄、软绵绵、香喷喷的番薯，顺着流出来的口水，“窸窸窣窣”咬将下去，哪怕烫着嘴唇也在所不辞。一口滚热的番薯吞进肚子，在寒冷的北风中即时一阵舒坦，那情那景，胜似如今的“叹下午茶”。有了番薯垫肚，黄昏大伙分别牵着耕牛、赶着鹅仔、挑着柴火，得意洋洋，凯旋回家。

这种窑番薯，绝对原生态和环保，比起如今城里头在小街小巷推着大油桶烤番薯的“地下游击队”，来得安全卫生。要知道这油桶是汽油桶还是漆油桶？烤出来的番薯有没有残留毒素，我等小民只能闻香却步，望薯叹之。

纪念迁界复县功臣的“报德祠”

新安县内南头古城、西乡圩、沙头圩和香港新界石湖圩均建有报德祠，这些报德祠又称巡抚祠。

深圳东晋咸和6年（公元331年）置县，历任官臣无数，巡抚祠纪念谁？是纪念清康熙年间广东巡抚王来任和两广总督周有德也。

新安人为什么纪念这两位官爷？

话说清朝初年，反清复明志士退守东南沿海继续抵抗，其中力量最强大

的是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将军，他拥有强大的水师，很多士兵来自福建和广东沿海，亲戚间往来十分频繁。他们除交换生活必需品外，还到东南沿海岸边种庄稼。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底，为切断东南沿海居民与郑成功部的联系，发布了《严禁通海敕谕》“迁界令”。

随后，朝廷派员到东南沿海各村张贴告示，并出动大批官兵强行驱赶，迁界手段十分残忍。官到之处屋拆船烧，边民被强走他乡，违者以军法论处。“三日内尽夷其地，空其人”，无数村落顿成荒野。堂堂新安县衙门没百姓可管，知县张璞无奈奏请撤县。康熙五年（1666）批准撤消新安县，剩余些少地区并入东莞县。因迁界而被迫撤县的，除新安外，史上绝无仅有。

被迫离乡的百姓指望能很快回迁，但官府动用军队，挖界沟，筑界墙，设烟墩，严禁任何人进入界内，越界者死。回迁无期，随身携带的银两也用尽，生活无着，出现了暴尸路边惨不忍睹的场面。

当时广东巡抚王来任，非常同情新安子民的悲惨遭遇，于康熙六年冒死上疏请求复界。他在《展界复乡疏》中写道：“沿海边民，惨被荼毒，或被戮而尸骸遍野，或被掳而骨肉分离，或被横征而典妻儿，颠连万状……臣请将原迁之界，急弛其禁，招徕迁民复业耕种与煎晒盐斤，将港内河撤去其桩，听民采捕……”然而，王来任很快被罢官，郁郁病死在广州，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也受牵连革职。随后，山东巡抚周有德升任两广总督，内国史院学士刘秉权任广东巡抚，这两位官员也对迁海之策提出质疑，继续上疏朝廷，痛陈“迁界”之害。康熙八年正月，清廷终于取消“迁界令”，准许居民回迁恢复原籍。同年七月，康熙皇帝下诏恢复新安县。至此，长达 8 年的北迁浩劫，终告一段落。

乡民为感谢王巡抚大恩，好几个地方立祠祀奉，名“巡抚祠”。香港一带，受害最深，村民对王巡抚和周总督最为感恩。因此，由“新界五大家族”，即上水廖万石堂及廖允升堂、粉岭彭氏大德堂、龙跃头邓萃云堂、大埔头邓众兴堂、太亨文公众堂、河上乡金钱燕岗侯氏家族，及新田文亨裕堂等共同筹款建起“巡抚祠”。

后来因同奉祀周有德与王来任二公，改称“报德祠”。石湖圩也设“巡抚街”至今。两年前，我去上水石湖圩参加香港廖氏太平清醮，还见过“巡抚祠”和当地巡游行香队伍中抬着王周公神像巡游呢。

可见，新安人民知恩图报的传统，自古传承不断。

古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人们生存本能的反映，也形成了一地一域的独特习俗。深圳旧日农村许多民间小匠理发修眉、剃鸡剃猪、打锡整灯、打石烧砖、烧陶缸瓦、补锅箩斗、斗木盆桶、编筐织帽、修理帽伞、裁缝补衣、水磨较剪、剧菜刀、打棉被、玩把戏、卖膏药、做麻糖等等，形形色色，穿村过巷，便民周到。

乡村民间小工匠

理发匠

深圳当地到了挨年近晚，有“年廿七八，乱刨乱刮”之说。

“年廿七八，乱刨乱刮”，是民间习俗“年廿八，洗邋遢”引申过来的。洗邋遢，指过年前家里清扫门庭、布置新年的家务活动。“乱刨乱刨”是指打理个人卫生，剪头发。也另有一层暗喻：“别在忙乱时添乱”。

剪头发，怎会“乱刨乱刮”呢？按乡俗，过年期间的那些天是不剃头的，因此必须在年廿八前搞掂。腊月初剃头，太早，还没过年头发长了，需再次修发，时间和经济上都不划算。所以大家都挤在年前的十来天左右剪头发。

那年头乡镇理发店极少，一个大的村庄有一名理发匠就算不错了，小的村子是没有理发师傅的，需要到大的村庄或圩镇剃头。大家都在这个时段理发，人多了，自然就要从早到晚轮候。候着的人等久了，不耐烦，加上小孩子剃头时又不情愿，往往要家长抓住手脚、按住脑瓜才能停住吵闹。这时，理发小店里，或巷头巷尾或村头榕树头下临时理发摊里，有人催，有人闹，

成为乡村繁忙准备过节时的热闹一景。理发匠在这烦躁的环境中理发，不自觉加快手脚，甚至“偷工减料”，只要把头发剪短或磨光就行了，平时为客人修发脚、刮脸毛、剪鼻毛、掏耳朵、拖眼皮等细活，统统省去了。

乡人把这种“偷工减料”的剃头活，称之为“乱刨乱刮”。

剃头又不是“斗木”，怎能说像刨木屑那样刨刮？你不知道，乡村理发匠拎着个油腻的破旧藤夹，全部“家当”就是一把手工磨剪、一把剃刀、一块围布、一只肥皂擦扫和一把软毛扫了。没有电动发剪，只靠手工磨剪，“格格格”地推磨，头发像刨木花一样翻落地下，这“乱刨”说得非常形象；“乱刮”则是用剃刀在脑袋上削发，刮个精亮精亮。

尽管是乱刨乱刮，也得两毫子费用，折合当时消费，可买一斤多米或三四斤青菜或到高楼吃一碗烧鹅饭了。农人如果没有现钱，给一筒米或一把番薯或两三个钵仔糕点也成。这种原始的交易和纯朴的民风，至今仍令俗人陶醉。



民国初年民间耍艺

过年男人剃头扮靓，女人也不“输蚀”，她们通常是互相修面，也就是拿两根细棉绳，用双手的手指弓直，在脸面上由上至下“绞拔”汗毛和“绞修”眉毛。这样“绞面”有一点点痛，所以，女人们首先用爽身粉或香粉团扑面，一来不让绞绳打滑，二来除去脸面油脂，三来带点粉香，免去“绞面”人与被“绞面”人脸贴脸带来口气之尴尬。这种修面活，后来在南头、西乡、沙井、公明、松岗、深圳、大鹏等较大的圩镇，有专门的修面婆兼职营生。文化大革命后中断了几十年，近年随着美容店铺开，人们追求美丽，深圳东门老街和罗湖口岸商业城，偶尔会有一两摊妇人为深圳当地或香港过来的女人修面。

不过，这种修面，挺花时间，也来不得半点马虎。所以，“年廿七八，乱刨乱刮”对这种活就不适用了。

头刨二补三打铁

深圳旧时“头刨二补三打铁”的俗语，是指这三类工匠的手艺，相对于耕田来说“过手不过肩”，少些日晒雨淋，而且“好搵”（赚钱）一点，因为它不用本钱或少用本钱，靠手艺就能搵食。

“头刨”，是排在第一位手艺的刨猪、刨鸡、刨牛。刨就是摘割，把

“鸡核”（核即睾丸，下同）、“猪核”、“牛核”用小手术刀割掉，农村称以此营生的人为“刨鸡佬”。刨鸡活一个人能完成，先把鸡的双爪绑住，鸡翼用脚踩住，再用小手术刀在鸡腹部划开小口，伸进一根丝线左拉右扯几下把鸡核拉出来切掉，然后用碘酒擦拭伤口，喂两口水，就把鸡松绑放脱。刨一只鸡能赚几毫子工钱，一天到一个村子，一年到头各村走一圈，能养家糊口；同时，刨了一天鸡，也得到不少鸡核带回去煮熟吃，既补肾又壮阳。大凡刨鸡佬都吃得红嘴白鼻、“雄蹄蹄”的。

刨猪、刨牛就需要主人家好几个人帮忙了，刨牛不是动刀摘除，而是用锤“夹生锤坏”牛牯阴囊，使牛失去生殖功能，工钱也稍贵。猪核、牛核是不吃的，通常当垃圾丢掉。



磨绞剪菜刀

“二补”，是指小工匠们到围村上门补铁锅补铝煲、打锡做灯、斗木盆桶、修洋伞、补箩斗、磨铰剪、铲菜刀、打棉被等，这“补”虽花较多时间，且比不上“刨”赚钱快，但也可搵两餐。补锅稍为复杂，挑担煤炭、铁砧、风箱和自带小高炉融生铁水，先将铁锅的裂缝或小孔稍凿开一点，然后勺起一滴烧得通红的铁水，滴在一块垫了灰的厚皮上，随即从锅底往上塞住烂锅的小孔，再以粗布扫压平，补漏处底面涂抹泥浆，冷却洗净后就不漏了。

打铁，因为乡间家家户户都有铁锄、反钉、犁头、耙齿、禾镰、斧头、柴刀和铁钎，用久磨损了、崩缺了都要铁匠开炉修理，所以一年长不愁没工做。上围村若果揽不到修补活，也可以回来打铁铺打锄头、做菜刀卖。古人说，有门手艺傍身，哪怕走到天边，也不怕没口饭吃。

这些手艺人上围村服务，穿街过巷，敲击吆喝，很有特色，一听就估摸是哪个行当的师傅来了。“磨铰剪啰！”“整洋遮（伞）补箩斗！”吆喝声像唱歌一样；打棉花的把弓弹得“咚，弹弹！”很有节奏，吸引顾客；卖膏药丸散的拍竹筒，土称“打鼕鼕”，声音清脆；染衫染布卖绒线百货的不停用手摇小皮鼓；卖罗浮山百草油和广西罗汉果就摇“铃铃”；玩把戏卖铁打药的敲响铜锣“打嘭嘭”；卖白榄吹唢呐“的的哒哒”；卖缸瓦打碗柝；卖花生糖、麦芽糖就敲铁斩凿，“笃叮，笃叮！”老远就知道卖麻糖的来了。

头刨二补三打铁的工匠和货郎担，穿梭乡村田野，给村民带来生活方便，也绘成一幅原乡风味的风俗画。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分工细化和各行各业专业化，货物新奇实用、琳琅满目的超市开进了农村，这种流传几百年的民间工艺已淡出我们的生活，“头刨二补三打铁”，只成为我们口头一句俗语，或只成为老一辈人的集体记忆。

鹤佬、蜑家佬和嘎叽楞

深圳除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以外，还有两个小小的族群，这就是鹤佬和蜑家人，他们是捕鱼、跑船运输的行家里手。

鹤佬和蜑家人不仅语言跟广州话、客家话有很大的差异，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不同。



鹤佬“大眼鸡船”

先说“蜑民”，土称“蜑家佬”。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云：“诸蜑以艇为家，是曰蜑家。”清康熙《新安县志》载：“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蜑户，即猺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粤民视蜑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促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蜑家人现为水上人家，旧时地位最低微，自称“水流柴”。他们多数从珠江口的番禺、顺德、中山、珠海和东莞等地飘泊过来，先前捕鱼，后在内河运输，再后来开垦珠江滩涂种稻、养鱼，像罗湖的渔民村，西乡镇的翻身村、共乐村，沙井镇的和平村等围海垦滩变成大沙田种稻，又称为“基围佬”。基围佬口音很特别，全把带“凉”说成“狼”、“上”说成“商”等音。

“鹤佬”，是当地人凭他们的口音直译而称呼的，实际上鹤佬是“福建佬”的“福”说成“鹤”音，香港、深圳和广州一带也就“相约俗成”称之为“鹤佬”了。也有许多人和文字写成“福佬”。

鹤佬有人称海陆丰人为“鹤佬仔”，其实溯源是从福建一路飘泊过来，多数在海上打鱼和运输。鹤佬船的船身高且较短，常泊于南澳、大鹏、盐田、沙头角、香港、九龙、蛇口等地。蜑家船则较长而扁，多泊于深圳河渔民村、渔农村、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等地内河。

过去没有机帆船，而且无风扬帆时，蜑家船是划桨，鹤佬船则多用摇橹。鹤佬船之特征就是在船头画上一只大眼，故一般人都称其为“大眼鸡”，而蜑家船则多在船尾写上“顺风得利”，以期平安吉利。

以往鹤佬所用之船只构造较为复杂，因为海上风浪大，特别需要坚固耐用，同时它的船尾部分多留作住宅，船仓内分设有厨房与睡房，有些还有祖先神位及天后娘娘的神台等。住宅部分，上盖牢固，风雨不侵，故鹤佬人妇女多数皮肤嫩白，衣着也较为新潮，若与蜑家女人一比，一眼即能分辨。

因为长年生活在船上摇橹划桨，所以蜑家和鹤佬的女人骨盆大、屁股大、脚板也大；俗话说屁股大好生养，因此以前每个女人都生四五个甚至六七个孩子。对孩子起名，习惯也各不同，非常有趣。蜑家人孩子名字多带金带银，带娣带妹，如银生、金运、福娣、禄妹等，希望家里金银满屋，“带”来子女，人丁兴旺。鹤佬人家则命名为初一、十五、十二、十三、虾仔、虾头、妹头等等，意为“贱名”好生长，少病痛，不夭折。

“嘎叽楞”是潮汕音“自己人”的意思。早期深圳的潮汕人做搬运工为多，也有以捕鱼为生。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为小商小贩，市场卖菜和大排档小吃店几乎被垄断。他们起早贪黑，吃苦耐劳，乡里团结，头脑灵活，生意一点一点做大，到后来出了不少潮商和富人，被本地人誉为“广东犹太人”。“潮汕人”也就成为勤奋、精明的代名词。

能工巧手，烹调行家

深圳人除了能干之外，还会做来吃。食在广东，并非空有其名。

深圳傍山面海，山珍海味极为丰富。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有林、竹、木、藤、花、果及香樟、沉香、楸桫等珍奇植物，老虎、猕猴、黄猄、地陇猪、箭猪、水獭獭、蟒蛇、穿山甲、虎蛙等珍贵动物。海上产卤盐、珍珠、响螺、江鸥、海鳅、海豚、海猪、海牛、鳜鱼、锯鱼、马鬃鱼、鲚鱼、蒲鱼、鲨鱼、仓鱼、芒鱼、马鲛、黄花鱼及虾、蟹、蚝、蚬、蛤、贝等海产。

依山者，除开垦山地种粮种果外，用木、竹、藤做各种农具家具为生。近海者，捕鱼、采珠、晒盐、行船、运输为业。

耕山者，米菜瓜果，四时不断；下海者，鱼虾蟹贝，皆有收成。

汪洋大海，季节不同，捕到的鱼也不尽相同。春季为鱼类产卵和幼鱼出生之季节，此间小鱼为多，泥蜈仔、金边仔、青鳞仔、白春仔、吹筒仔、红鳞仔、石狗公仔等。往往鱼卵孵出的小鱼成群结队生长，用灯光围捕，通常一网下去，满船满舱。

夏天鱼长大，多是池鱼仔，有黄池、青池、烧狗池、铁甲池等，此为下价鱼。初秋时分是鱼获季节，横泽、红衫、布刀、海河、马友、带

鱼、赖尿虾、铁屎虾、花蟹、红蟹、三点蟹等，会看海里鱼群的渔民，往往“网无虚撒”，网网千斤。

秋冬时节，除了上述各种鱼虾蟹外，正是石斑、苏眉、海鳗、龙鲉、龙虾、白鲳、老鼠斑、芝麻斑、黄花、狗棍、大地鱼、海底鸡项、左口、鲈鱼、章鱼、墨鱼、鱿鱼和八爪鱼等高中价格的鱼获上市。

深圳人吃鱼，讲究新鲜，首选游水鱼，再贵也买。没有游水活鱼，冰鲜也很讲究，一看鱼眼是晶亮还是混浊，二看鱼鳞是整齐还是脱落，三看鱼腮是否鲜红还是黯灰，肠穿肚烂一般不要。虾蟹更是，俗话说死蛇烂蟹，一死很快变质腐臭，绝对不吃。

吃活鱼，以往嗜好“鱼生”，民谚云：“冬至鱼生，夏至狗肉。”就是把活蹦活跳的斑鱼、鲩鱼、鲈鱼、墨鱼、章鱼等洗净，切成薄鱼片，蘸上柠檬汁、姜汁、或豉油、浙醋生吃。熟吃，也讲究整条清蒸、豉汁蒸鱼、煎鱼、红烧鱼等。吃鱼，最好的部位是“不见天”，深圳人称为“鱼腩”。此鱼腩嫩滑且少骨刺，鱼油多，养皮肤，有益心血管。

吃鱼下箸时，常常是从吃鱼腩开始，尊敬长老，也是先挟奉鱼腩。斑鱼头、苏眉鱼头也有人用来孝敬长辈。吃鱼头，大凡也把鱼尾挟上，以取“好头好尾”之意。

吃鱼的部位也要看那一种鱼，当地谚曰：“松鱼（即大头鱼）头，鲩鱼尾，鲢鱼肚腩够肥美。”鲮鱼皮韧，但肉刺多，所以鲮鱼多剥取整张皮，把鱼肉和猪肉加冬菇、虾米等配料剁烂，再塞进鱼皮里煎熟，变成整条鲮鱼上碟，这叫“酿鲮鱼”。

过去有“头仓鱼二芒鱼第三第四马鲛鱼”之俗语，指这几种鱼肉多、刺少、味道鲜，如今这几种鱼海上较少捕到，而斑鱼类、桂花鱼和龙虾则逐渐取代之，因为这些品种容易网箱饲养，源源上市，雄霸了渔市和海鲜酒家。

清初屈大均曰："古人皆著屐。"深圳乡人朴实，也多数穿木屐。石岩、龙华、观澜、横岗、龙岗、葵涌等几个乡镇，有点木工手艺的农民，农闲时锯些树回来做，自己穿不完就拿去卖，帮补家计。这木屐虽粗糙，但实用，木屐平底，按脚掌形状做，屐板高约一寸半，前小半截钉上一块小胶皮，让脚趾套入走路。我小时怕木屐走路"格格"响吵人，在屐板底部自己再钉上一块单车胶皮垫，除了声音小了外，还比其他木屐耐穿一倍以上。上世纪50年代，能从香港带进一双日本"人字海绵胶拖鞋"，那够"金贵"和时尚的了。

屐、鸡公车与现代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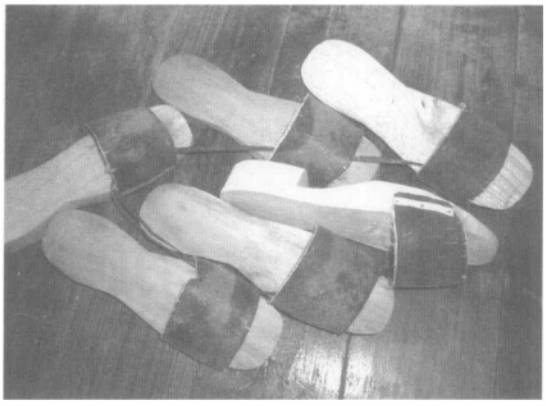
木屐、鸡公车和轿

上世纪初期，当皮革没有流行、塑胶拖鞋还没有面市的时候，深圳人通常穿的是布鞋、草鞋、木屐；到了五十年代，能从香港带进一双日本"人字海绵胶拖鞋"，那可够"金贵"和时尚的了。

布鞋是用穿过的破旧衣服裁剪成"脚印样"，一层层糊上浆糊，干了后包上一块新的"家织布"，再用针麻线纳成。那时乡人衣服都不多几件，故穿布鞋的人不多。草鞋开始是用较韧的山草或禾秆草编结的，因为"打脚"，不太好穿，后来用旧单车轮胎按脚形剪成一双，安上"脚指耳"和"胶绊带"穿着，也沿用叫"草鞋"，专为上山割草、走远路以防草头或小石子刺脚才穿。平时乡人多是"打赤脚"（光脚）。木屐是晚上冲完凉睡觉前穿一下，平时在寒冷的冬天或下雨天才穿一穿，其他时间简直舍不得穿。

屐，追溯起来，历史久远。据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著述："古人皆著屐。《异苑》云：晋文公哀介子推，拊木视其屐曰：'悲乎足下'。"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说，晋文公多次请隐居于绵山的功臣介子推出仕不从，便采用焚山燎木之法迫他出来。不料，介子推却抱住一棵树被烧至死。晋文公悲痛万分，令人用那棵树制成一双木头鞋，每天穿着对叹曰："悲乎，足下。"以示永念难忘。屈大均在该书续云："《孔丛子》云：孔穿振方屐见平原君。晋延嘉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作漆画屐，五色彩为系。《汝南先贤传》云：戴良嫁女，布裳木屐。吴时粤有赵妪，常著金蹋屐，或著金箱齿屐，居象头斗战。今粤中婢媵，多著红皮木屐。士大夫亦皆尚屐，沐浴乘凉时，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散屐以潮州所制拖皮为雅。或以抱木为之，抱木附水松根而生，香而柔韧，可作履，曰抱香履。潮人将木刳之，轻而薄，是曰潮屐。或以黄桑、苦楝，亦良。香山土地卑湿，尤宜屐。其良贱至异其制以别之。新会尚朱漆屐，东莞尚花绣屐，以轻为贵。史称邯郸女子，喜屣蹑利屣。利者，轻也。广州男子轻薄者，多长裙散屐，人贱之，呼为裙屐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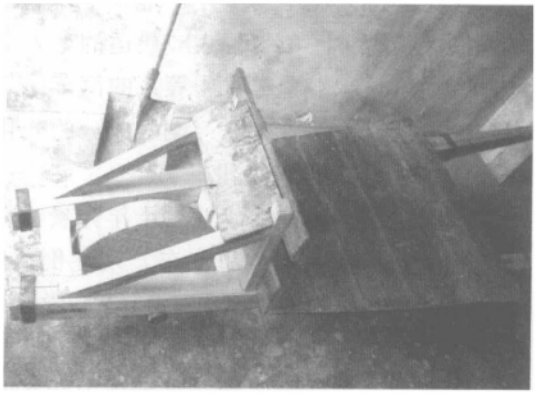

木屐

深圳乡人扑实，多数穿苦楝树、鸭脚桠树做成的木屐。做得较好的有石岩、龙华、观澜、横岗、龙岗等几个乡镇，做屐师傅多是有点木工手艺的农民，农闲时锯些树回来做，自己穿不完就拿到圩集去卖，六七毫子一对，三日为一圩，卖了钱帮补家计。这木屐工艺较为粗糙，但实用，好穿，木屐平底，按脚掌形状做，屐底中间凹陷有跡，屐板高约一寸半，前小半截钉上一块约一寸宽的胶皮，让脚趾套入就可以走路了。我小时怕木屐走路"格格"响吵人，在屐板底部自己再钉上一小块胶皮垫，除了声音小了外，还比其他木屐耐穿一倍以上。待胶皮磨完了，才磨木屐，当木屐板磨薄了，不能再穿时木屐完成了它的"使命"，便丢进炉灶当柴火烧掉。

那时，老百姓走路靠双脚，挑担靠肩挑，碰到担谷、挑肥、卖肥猪等重的功夫，只好用"鸡公车"。鸡公车类似北方的独轮车，轮子、车身、车把全是木头做的，但车型比独轮车小。长长的车把有条绳子挽在推车人的肩膀，承起重载，双手只管推车。载重的木头车，由于没有轴承滑轮，走起来木头磨擦发出"叽咯叽咯"的响声，乡人就形象地把这木头车叫做"鸡公车"。

“鸡公车”载重量不大，后来多数用牛车，用木头做一个两米多宽、三米多长的车斗，装上木轮子，用牛轭和绳子套在牛背上驮着走，就成了拉泥、拉沙、拉肥粪的牛车。别小看牛车，史书记载晋时将相，最早亦乘牛车，后至宋代才渐用马车，牛车才只用于乡间载物而已。

官人和有钱人家出行，大家都知道他们会坐轿。轿，在唐朝时称为“檐”，“檐”通“担”，盖肩上负担之意。南宋以前统称为“舆”，南宋后才称为轿，一直至今。当地轿有三种，分别为“兜轿”、“扇轿”和“大花轿”。“兜轿”很简易，用竹竿制成有靠背的椅子形的座位，人坐上去竹竿往下坠像个“兜”一样，就叫上兜轿。兜轿座位上方有用竹枝拱成架，再盖上红毡子，以遮风挡雨。“扇轿”用木制，上有顶下有板，三面开窗前面挂帘的房式轿子，比兜轿高贵。非富即贵者或官员多坐此轿。


鸡公车

600多年前的大鹏，处在穷山恶岭的“荒蛮之地”。清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志》记载：县丞坐轿从南头县城去大鹏二百里路程，“高山峻岭如弁鸟鹰三转，大小梅沙尖、九顿岭等处轿马难走，必步行越，横涌海港无渡，伺潮退以涉，无大风雨四日可至，遇有风雨，高山难越，海潮难沓不退，路期不定。”也就是说有轿坐，晴天走四天，遇有风雨，浪掩海滩小路，六七天也未必抵达。

“大花轿”大家更为熟悉，是用红布制成绣有龙凤图案围着轿子上下四周的“大红花轿”，专接新娘办喜事的。如果架上盖的是白布或黑布，表明乘轿人是病者或伤号。如不拱架不加盖，则是做丧事时和尚或做法事的人所乘，亦有神会打醮人员所乘的“无蓬轿”，又称“敞轿”。

现代人出行的烦恼

那时走路，羡慕坐轿，坐轿羡慕坐车；打赤脚羡慕穿草鞋，穿上草鞋羡慕穿胶皮鞋。如今却坐小汽车，觉得比不上坐轿空气清新，穿胶皮鞋比不上穿草鞋环保。

人在出行时感受到越来越方便时，但同时也觉得对环境资源的浪费和破坏，越来越烦恼，越来越不安。

我搬了几次家，都逃不脱窗口脚下是大马路。换句话说，我住到哪，马路就追到哪。

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倒霉。

这次搬家，住了下来，天哪，这花园小区的高层楼宇窗口底下，竟然还是横贯市东西的主干道。这车，从早上到晚上，从晚上到天亮，整天车流声像闷雷滚动；我窗口外刚好是高架桥引桥斜坡，旁边又开出个岔道，分流其他不上桥方向的车辆，汽车转道喇叭声、急刹车声，说是震耳欲聋，一点不为过。白天不关窗，电视机声音无法听见；晚上关了窗拉了窗帘，声音小了一点，但床却在颤抖，令家人日坐不安，夜难寝眠。车流卷起的尘埃，无孔不入。关窗久了，空气不对流，闷死了；打开窗子，不消两天，灰尘铺盖，烦死了。日子一久，不止我一人讨厌起车来了。

在花园小区住不到一年，地下车库和地面行道，像一夜之间钻出许多屎甲虫，爬满小区，给行人、晨运的老人、玩耍的小孩带来不便。汽车废气，特别是开着引擎长时间等人的汽车尾气，在密匝匝的高楼群中散不出去，热浪呛行人；含有醛、酮等成分的光化学烟雾污染，危害健康。日子一久，小区的人对车主没好感。

我不明白，就这么十几二十年光景，就像人们当年喜欢吃肥肉，现在讨厌肥肉一样；当年羡慕汽车，现在倒反感泛滥的汽车来了。

小时候，我到南头（今南山）上中学，我家在羊台山下的小镇往南头没通公共汽车，在23公里的路上，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每个星期六日两天，都要回家来回走两趟，每趟跋山涉水四五个小时。在大半天的山区泥路上，偶尔看见一辆解放牌货车跑来，我们欣喜不已，冒着滚滚泥尘，在车屁股后追逐着。有一回，我们在回家的半路上，这十二三岁的孩子走了大半天，又累又渴又饿，多么想路过的顺风车捎带一下，但是，尽管你怎么扬手，汽车却呼啸而过，甩卷着弥漫的泥尘，把我们弄得灰头土脸。那一刻，我心想长大后，坐汽车坐个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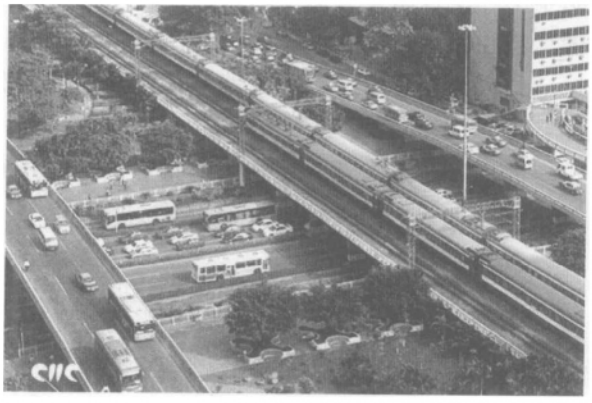
没想到，我参加了工作，经常需要下乡，有一回坐运货的卡车去大鹏南澳，一路上颠簸，摇摇晃晃走了六七十公里，腰骨被颠痛，屁股被颠裂，难受死了。特别有一回，老母亲在老家病了，我想回小镇去看看。小镇通车了，但是深圳往小镇的公共汽车一天才来回开一趟，到处找朋友帮忙，那时极少私家车。这一刻，我梦想拥有一部小车……

没想到，改革开放才10来年，我在市机关单位工作就有了一部小车，上下班、到区镇办事、或外出开会，自己开车，快捷、方便、惬意。那时，车辆不多，道路宽广，开起来真爽。记得有好几年春节，大年初一至初六，人们像候鸟一样飞回各地过年，深南大道只有冷冷落落几辆车，车子在大

马路简直可以横行。开着虽然不是进口豪华名贵房车，但进出住宅小区，有这国产合资小车，也像当时拿着块砖头般粗重的大哥大威风，着实令人羡慕好一阵子。

踏入新世纪，驾车学校、培训中心如雨后春笋；贸易车行成行成市。私家车成几何级数增长。城市大小马路、各式停车场、各个住宅小区、酒楼商场门口，甚至街角巷口有块巴掌空地，都停满车辆。

我邻居马小姐，结了婚，生了小孩成为全职太太，她女儿在住宅区附近上幼儿园。一天，我看她刚买了小车考了个新牌，载着她女儿去幼儿园，我好奇上前聊了几句。马小姐说，这孩子路不肯走，坐单车嫌丢人，见到个个小朋友都有爹地妈咪小车接送，哭着闹着要我用车送她。她爹要上班，忙不过来，这不逼着我买车学车？


繁忙的深南大道

就这么半里路，用得着每天开车接送么，先不说娇惯了孩子性格，就是对锻炼孩子骨骼成长也没有什么益处。明里说是孩子“逼”她学车买车，我说暗地里是“面子”、“攀富”在“逼”她学车买车。像马小姐这“新车一族”的师奶，开车去附近打麻将，开车去美容，舍近求远去仓储式超市疯狂购物的，不在少数。有环保人士说，每开动一辆汽车，城市就增加一条排污烟囱；每增多一辆汽车，地球就长多一颗青春痘。

我无意践约环保人士减少“一条排污烟囱”，消除“一颗青春痘”的倡议。从我自己身体出发，几年前，我从网上读到国内几位著名保健专家文章，说最好的健身是走路。我就开始少开车，少坐车，多走路。腰带别着个计步器，强逼自己每天走一万步，实在太忙也要在早上晚上完成五千步。家里人在福田华强北吃完晚饭，他们坐公车回去，我坚持走一个半小时的路，回到东湖公园附近的家。以报纸报道怡景花园那位女同志，风雨无阻，走路到晶都的银行上班的“事迹”为榜样，几年下来，仿如某广告词“高血脂冒晒（意思不见了），高血压冒晒”，身体即时ＦＩＴ（瘦身）了许多。

２０多年来，我们的生活像车道弯弯，兜兜转转。

开始搬家时，往闹市里搬，往交通方便、买菜方便、小孩就读方便的繁华地段搬；而现在呢？购房搬家，往有山有水有海有绿化有公园的住宅小区搬。旅游也是，人们开始时往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大城市跑，后来就去泰山黄山庐山张家界跑，再后来就往九寨沟海螺沟青海湖新疆西藏跑。

开车呢？现在人们还在过把车瘾的兴头上，像当年手拿大哥大显示身份不一般那样，把车子当爱人当孩子，又毫无耐性地忍守着塞车挤车、无地泊车和环境污染的痛苦。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依“深圳速度”，不用三十年、二十年，恐怕十年八年，有许多人会放弃开私家车，改坐地铁，坐公汽，骑单车，步行路。有更多的人选择到无污染、无噪音、无车患的“步行王国”里生活。

我想离开窗口底下大马路的花园住宅，再次寻觅“无车患”的地方居住，追求“步行王国”的生活。

然而，车道弯弯，就像山道弯弯一样，兜来兜去；我能达到心目中的绿色居住地么？这个追求，会不会过分呢？

我没把握。

薯莨衫”由土名“薯莨布（绸）”做的，也叫“莨绸”。穿上它走路会发出“沙沙”响声，民间就形象地叫做“响云纱”，后来人们取其谐音，雅称香云纱。屈大均《广东新语》曰：“又有蕃布，出新安南头”，“蕃布”即是苎麻所治薯莨布。“出新安南头”，即今深圳市南山区的古称，也就是说三四百年前，深圳人就用薯莨、苎麻和丝纱制作名贵的香云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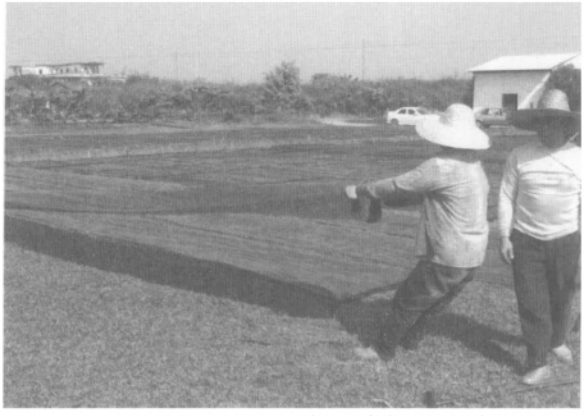
香云纱与老深圳人穿着

小时候，我老爸是镇上有点小名气的裁缝，有钱人家往往自带一种金贵的布料，来加工做衫裤，月积日累，老爸把裁剩二三指宽的边脚布，缝成一件小小的没袖子对襟衫给我穿。我穿在身上很不舒服，不是被硬梆梆布边缝口“割肉”，就是走动起来“沙沙”作响，招惹人笑话。穿了一两次后就不肯穿，老爸瞪眼说：“贵野（重）来的，有靓衫不穿，贱骨头。”长大后，看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南霸天、《怒潮》里典型南方财主佬的装束，看了张爱玲小说里的描写，才知道这是有钱人才穿得起的“薯莨丝绸衫”。

薯莨布与香云纱

“薯莨衫”由土名“薯莨布（绸）”做的，也叫“莨绸”。穿上它走路会发出“沙沙”响声，民间就形象地叫做“响云纱”，后来人们取其谐音，雅称香云纱。它贵比黄金，曾经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豪门贵族酷爱和炫耀之物，也是外国人梦寐以求的高级衣料。

香云纱，是一种用广东特色植物——薯莨的汁水，对桑蚕丝织物涂层，再用珠三角地区特有的河涌塘泥覆盖，经日晒加工而成的昂贵纱绸制品。早在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本草》所论赭魁（即薯莨），皆未详审。今赭魁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靴"。明末清初著名风土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古时无木绵，皆以细麻为布，惟粤之苎则自上古已有。《禹贡》曰：岛夷卉服。《传》曰：岛夷，南海岛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薯莨）越（苎麻）也。葛越，南方之布，以葛为之，以其产于越，故曰葛越也。左思曰：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正义》曰：卉服葛越，蕉竹之属，越即苎祁也。《汉书》云：粤地多果布之凑。韦昭曰：布，葛布也……外有藤布、芙蓉布，以木芙蓉皮织丝为之，能除热汗。又有罂布，出新安南头。罂本苎麻所治。渔妇以其破敝者剪之为条，缕之为纬，以棉纱线经之，煮以石灰，漂以溪水，去其旧染薯莨之色，使莹然雪白。布成，分为双单，双者表里有大小絮头，单者一面有之。絮头以长者为贵，摩挲之久，葳蕤然若西毡起绒。更或染以薯莨，则其丝劲爽，可为夏服。不染则柔以御寒，粤人甚贵之，亦奇布也。"


浸染成的香云纱拿去曝晒（韦晓东　摄）

屈大均说到"又有罂布，出新安南头"，说"罂布"即是苎麻所治薯莨布。"薯莨，产北江者良。其白者不中用，用必以红，红者多胶液，渔人以染鱼罂，使苎麻爽劲，既利水又耐咸潮不易腐。而薯莨胶液本红，见水则黑，诸鱼属火而喜水，水之以黑，故与鱼性相得，染鱼罂使黑，则诸鱼望之而聚云。"又说"出新安南头"，即今深圳市南山区的旧称，也就是说三四百年前，深圳人就用薯莨、苎麻和丝纱制作"甚贵之""奇布"。

"奇布"薯莨纱绸，奇在何处？奇在用天然植物薯莨和塘泥加工纱绸的民间土办法，制作出纱绸珍品。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有记述："薯莨生于南国丘陵山坡，蔓生，叶如豆，其根圆如卵，如芋，可观赏，可入药，可膳食。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止血的功效。"薯莨很贱生，在深圳羊台山、梧桐山、七娘山等周围乡村都有野生和种植。小时候我在乡下就见过染制薯莨布。如今深圳名牌服装"香云纱"，完全沿袭古代薯莨纱

绸的原始制作方法。首先将山薯莨绞榨成汁水作为天然染料，对坯绸反复多次浸染，染得棕黄色的半成品后，再拿富含矿物质的黑色塘泥对其单面涂抹，放到烈日下反复进行 30 多次曝晒、抹泥、再曝晒。待泥质中的铁离子和其它生物化学成分与薯莨汁中的鞣酸充分反应，生成了黑色的鞣酸亚铁之后，抖脱塘泥，清洗干净，就成了面黑里黄、油光闪烁的香云纱。黑色的成份就是鞣酸亚铁、棕色成份是氧化变性了的鞣酸。整个生产过程不仅全靠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而且是“靠天吃饭”，因为要曝晒，一般只能在 5 月至 11 月间进行，那时阳光最猛，也少雨水。一年局限于 7 个月生产，决定了薯莨纱绸生产量不大。从反复浸染到曝晒，整个染制过程足需半个月左右。新做出来的薯莨布比较硬，早时有钱人做成衫裤后有时会先拿给下人穿，由于这种薯莨纱绸喜欢酸性环境，所以越容易出汗的人穿出来的“效果”越好，当首位“试衣人”把薯莨衫裤穿得柔软而细亮后，自己穿上感觉才最好。怪不得我小时候穿得“割肉”，原来没有经汗水渍洗过。据说薯莨纱绸有个怪特点，穿洗越多越久，越柔软舒服越值钱。深圳葵涌籍人欧阳小战，得家传创办深圳市香云纱服饰有限公司并任总经理，他介绍说染成的香云纱面料，还需保存“发色”6 个月甚至数年后才能使用，保存得越久越柔软。这样的面料阴阳两色，富有身骨和弹性，乌光亮泽，平滑不沾皮肤，冬暖夏凉，易洗快干，也就是脏了，搓洗一下稍为晾一会就干了；并有效防烧伤、防敏感、防霉、除菌、除臭、防紫外线、防虫、防蛀等多种天然生态保健功能，非常适合潮湿闷热的南方天气穿着。欧阳总经理小心翼翼地拿出他们存有 16 年的面料，说：“由于它是桑蚕丝织物，又经过薯莨汁和塘泥的浸染，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年它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颜色越来



民国初年版式　　清末时期大襟衫

越浅，纹理越来越细，如同有生命一样。”据称，现在他们公司做的香云纱衣服，使用了磨砂技术，再不用请“下人试穿”就非常柔软和舒服。这，就是奇布。

那么古人说的“甚贵之”呢？古时薯莨布“十钱一尺”，今天香云纱250元一米，一件香云纱上衣，市场售价为750元左右，欧阳总他们生产的产品80%出口，供不应求。为何香云纱如黄金这般昂贵？一为产量小，二为产地少。香云纱只能在珠江三角洲的三几个县出产，解放后，曾有一些丝绸公司想把香云纱制作技术带到丝绸厂颇多的辽宁丹东，于是用火车、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把制作技术中关键所需的河泥带过去，但无论如何也制不成如此高质量的香云纱。以前也有国外工程师研究香云纱的化学成份，但仍旧无法在异地“复制”。就是在国内，目前为止大概只有3家企业生产香云纱，2005年欧阳总经理申请注册“香云莎”牌香云纱，获得深圳首家、广东省第二家“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称号，这也是我国纺织行业中惟一一家获得“原产地地理标志”的产品，这个称号是严格这种产品的来源地（生产地、出生地、出土地或生产、加工、制造地），是国际贸易中产品的“经济护照”。香云纱作为消费“奢侈品”，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销声匿迹，这项古老的原生态印染生产工艺也几近失传。欧阳小战不失为自己的家乡——深圳做出贡献，目前香云纱整个制作技术工艺，正在由罗湖区整理、拍摄DVD存档并申报深圳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据文化部公示，广东顺德市申报的香云纱织染工艺，已入选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老深圳人的穿着

旧时深圳人的穿着非常简单朴素，除有钱人穿“薯莨纱绸”、“丝麻”和进口“白洋布”衫裤外，一般人多数穿由自家纺线和苎麻（有的用剑麻）织成的“家织土布”衫；这样的土布，因为“土织机”规格宽一尺，所以织出的土布宽一尺，长三丈（约43.2市尺），刚好够成年人裁剪一套衣服。土布纺线很粗，线头也多，衫裤较粗糙。土布开始只有染成黑色，后来有了“薯莨”、“乌臼树”、“土珠”植物汁和土制“靛粉”染色，男女老少穿的衣服颜色才多了几种色彩。但仍然不是黑色、蓝色、靛青、深褐、士林蓝就是深灰色，大鹏地区的中青年妇女较特别，穿“姣婆蓝”衫，也就是海蓝色。衫裤的款式也较单一，除有钱人穿“长袍马褂”、绫罗绸缎唐装、旗袍外，普通劳动人民穿的都是“唐衫唐裤”。直至解放初至开放改革时期，才由唐装、中山装、列宁装、“夏威夷”装、“西装吊带”、“解放军装”（四个暗口袋）、“直筒裤”（裤脚宽4至6寸）、“喇叭裤”（裤裆、裤腿很窄，膝盖往下呈喇叭口，裤脚宽尺余）、“蝙蝠衫”（衣衫非常宽

阔，双袖宽一尺以上扎袖口，像蝙蝠展翅）、“裤裙”（外面是裙但里头连着条紧身小短裤），慢慢发展到如今的“牛仔衫裤”、“松紧衫裤”、“6寸裤”、“T 恤”和“露脐装”、“高腰裤”等时装。深圳靠近港澳，历来较早接受海外服饰潮流的影响，服装颜色和款式更新较快。

解放前到解放初期，深圳“本地人”（通常指讲广府话的人）和客家人的穿着，最典型的要数“唐装衫”，也就是男人穿对襟衫，女人穿大襟衫，男女都穿着大裆裤，又称“摄裤头裤”、“交头裤”。对襟衫，分夏天对襟短衫和秋冬对襟长衫。男装样式上窄下宽，正面开胸，钉布钮或骨钮扣，无领或浅领，袖围和胸围宽阔，方便出门劳动，也适应深圳炎热天气，宽敞凉爽。妇女大襟衫，其样式是企领，从领口到右腋下开襟，俗称“右衽”，钉布钮或“啪钮”，但领口和腋下那两颗必须钉布纽扣，才不容易松扣“走光”。衫襟内有暗小口袋。广府妇女和客家妇女大襟衫最大的区别，在于广府妇女穿着大襟衫还在讲究身段，腋下稍为“收腰”，斜襟和衫脚有“捆边”或装饰绣带。右腋下的布钮扣常常挂条小手帕，既装饰，又方便擦手擦汗。客家妇女很平实，穿的大襟衫较宽阔，袖子较短，袖口、襟脚自然褶边半寸，衫的长度盖过大半个臀部，方便弯腰劳动、做家务，也方便撩起衣襟让婴儿吮奶。出门“做细”（做工）和家中灶头细务，系上“围身”（围裙），这时，才突显妇女那么一点曲线。



20 世纪 60 年代客家妇女穿着（廖碧兰 摄）

客家人、“本地人”、男人和女人，常见穿着一样的“大裆裤”，俗称“大裤裆”，只不过男女高矮肥瘦不一，裤的长短不同而已。由于裤裆深，裤头长且无绳无带，裤脚（即裤管）宽尺八至二尺。穿着时，把宽松的裤头左右交叉褶紧往内“摄”（即掖紧），再用“裤头带”（即纱布带子）在腰部扎紧，所以大裆裤，又称“摄裤头裤”、“交头裤”。

旧时男女都不穿“底裤”（内裤），讲究者内面加穿一条较短的裤就是了，实质上跟我们现在加穿一条睡裤一样，但一般都穿内衣，无领薄衫，俗称“褂哩”、“底衫”。

现代人说“不穿内裤”会觉得很好笑，但追溯起来却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裤在古时并不视为重要服装之一，甚至有不穿的，尤穷人亦多如此。”今人作裤，实为褌字之误，古时裤长而褌短，褌字音昆，与裩同。裤无裆，而褌有裆，后世一概统称为裤。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云：“裩，三代不见所述。周文王所制，裩长至膝，谓之弊衣。至魏文帝赐宫人绯交裆，即今之裩也。裤，盖古之裳也（笔者注：古称上为衣，下为裳），周武王以布为之，名曰褶；敬王以缯为之，名曰裤，但不缝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这里说得很清楚，裩为周文王所制，裤为周敬王所制。《汉书·外戚传》：“霍后令宫人皆为穷裤。”注云：“即今裩裆袴，多用带，有前后裆，不得交通。”又按：《史记》“今时武士大口裤，是魏文上马裤也。裤，褹衣也。汉司马相如著犊鼻裤，晋阮咸七夕晒犊鼻裤，以三尺布为之，前后各一幅，中裁两尖裆交凑之。今吴中（江浙一带）妇女多穿大脚开裆裤，独浦城妇人不穿裤，广西土官妇女亦不穿裤，着裙五六层，其后曳地四五尺，盖夷俗也。”唐宋以后，已不为然，人们重视衣裳了，今人则视裤为重要，宁可有裤而无外衣，否则将视为淫邪之流矣。



上世纪 70 年代沙田妇女服饰(何煌友　摄)

说着说远了，但是我觉得深圳人从染制薯莨布，发展到现代工艺制作复杂的香云纱，从“不穿内裤”到如今霓裳百变，这传承和积淀着多么令人骄傲的文化，展示和演绎多么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和历史悠长的劳动人民手工技艺。

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民多重农桑而后商贾，农人种田一年两收，不事淫巧。房屋多土墙，但蔽风雨。今尚黝垩砌以砖石。”深圳有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由于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自然条件不同，所以居住房宅也各有特色。现留下较有文物价值的，分别为广府建筑特点的沙井蚝桥村、石岩浪心村、观澜圩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民居”；客家建筑特点的龙岗罗瑞合“鹤湖世居”，坪山“大万世居”和坑梓“龙田世居”；以及大鹏古城赖恩爵、刘起龙等几处显赫的“振威将军第”。

深圳人宅舍与客家围拢屋

房屋宅第和“基围棚”

深圳当地有句土话：“宁可食少的，也要瓦遮头。”也就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宿”，不能没上盖的，最衰也要有草盖顶的茅草房。

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民多重农桑而后商贾，农人种田一年两收，不事淫巧。房屋多土墙，但蔽风雨。今尚黝垩砌以砖石。”旧时，深圳许多在山里种田的农人，多数住在自搭的茅寮和自建的泥砖屋里。沿海和珠江口一带的村落较为富裕的，盖有青砖屋。沙井、福永、南头、西乡等地，有就地取材，用蚝壳垒墙，现在仍保留完好的“蚝墙屋”有沙井大村江氏大宗祠、步涌村和松岗碧头村。更有用蚝壳灰、红泥、草纸、红糖、猪血混合“舂”（夯）墙的，多数做成“华侨大屋”，或者四五层楼高的土楼，当地人亦称“碉楼”。大的村子往往在村口或东南西北角建有三几间“碉楼”，作全村人避难、防匪防盗之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权作抵抗敌人的碉堡。观澜、龙华、石岩、布吉、公明、松岗、沙井、福永、西乡、南头、深圳圩、横岗、平湖、龙岗、坪山、坪地、

盐田、葵涌、大鹏等圩镇许多村庄都有。现碉楼保留比较完整和数量较多的数观澜圩镇。

深圳有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由于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自然条件等情况不同，所以居住房屋宅舍也有各自特色。现存留下来有文物价值的，分别是广府建筑特点的有沙井镇新桥村、石岩镇浪心村、观澜圩镇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民居”；客家建筑特点的为龙岗镇罗瑞合村“鹤湖世居”，坪山镇“大万世居”和坑梓镇的龙田世居；以及大鹏镇大鹏古城赖恩爵、刘起龙等几处显赫的“振威将军第”。

深圳人说住宅，常常房、宅、屋、寮、舍、庐、第，公馆不分。

《说文》云：“宅，所托也，市居曰舍”，则宅为总称，舍专指市居。也就是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舍于中舍息也。”又或称“弟”，据晋代周处先生所著《风土记》：“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第次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魏王奏事》云：“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由此看来，“第”较“宅”为上一级，非一般住宅所，不能随便称之。深圳大鹏半岛的大鹏古城，是在600多年前的明朝洪武二十七年，为抵抗倭寇而由朝廷颁旨建城的。明清时期出了刘起龙、赖恩爵等10多个将军，其中道光皇帝面见封赏的有刘起龙将军，御题赐匾额“振威将军第”的有赖恩爵将军等；刘起龙将军第、赖恩爵将军第至今在大鹏城内保存完好。

第，是屋舍的高级，低级的恐怕是南头、西乡、福永、沙井及深圳河边的渔民村“基围棚”，也就是用竹木和茅草搭在河涌边的“吊脚楼”，说它是楼，未免抬举它了，充其量只是间茅棚。以前西乡镇翻身村、三围村、沙井和平村、深圳河渔民村、渔农村等，全村都是搭在河涌水面上的基围茅棚。基围是什么呢？是围在滩涂的海堤，海堤有个闸口，可让海水涨、退潮时流动到河涌里养鱼和行艇船。“基围佬”就是生活在海堤上种田、打鱼的人家。所以，基围茅棚旁边拴着一条舢舨，方便出行和运送东西。住在吊脚楼的“基围佬”，地位和“蜑家佬”（水上渔民）差不多一样低微。

屋，房屋，为现代人所称。庐，是暂住居所，《说文》：“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 庐，大家熟识的有庐山风景区内，蒋介石为夫人宋美龄盖了一幢别墅称作“美庐”，纯粹是为避暑之居所。公馆，顾名思义，是公家花钱盖的旅馆，《礼·曾子问》注：“公馆若今县官舍也。”又云：“谓公家所造之馆，及公之所使为命停舍之处。”有人将私人盖的住宅或别墅，冠以某某公馆，实为一知半解，引人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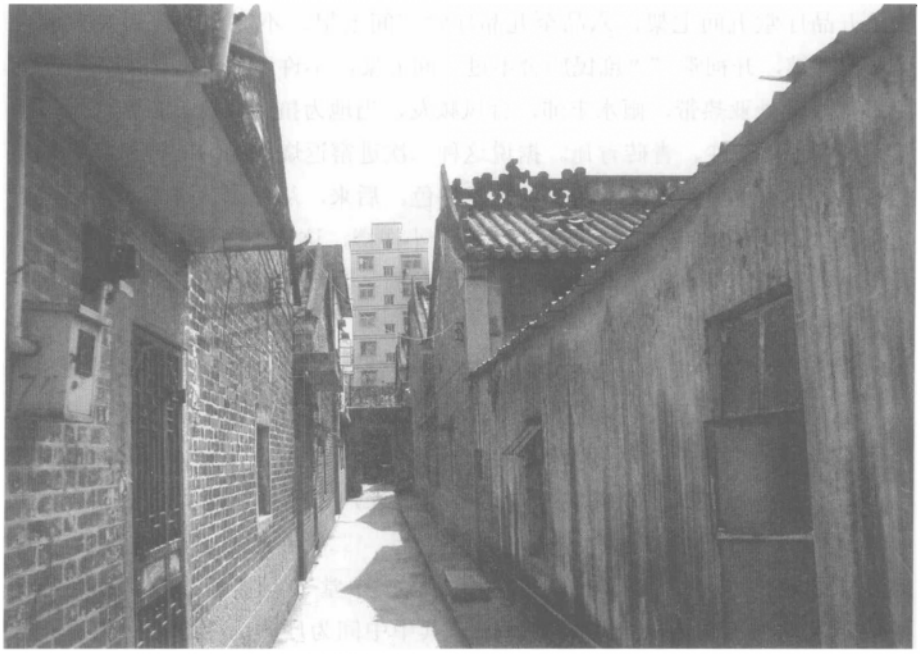
古时盖屋舍不是想盖多大就能盖多大。往往由权势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住宅等级制度，明代《舆服志四·室屋制度》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

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不许在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祠堂。”“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棋，饰彩色。”

深圳地处亚热带，雨水丰沛，台风频发，当地为抗击台风，抵挡雨水，房屋后来多使用灰沙、青砖青瓦。据说这种二次进窑返烧成的青砖青瓦，特别坚实耐用，建筑也显得深沉、清雅的艺术特色。后来，从外国传进了“红毛泥”（洋水泥），加石屎（碎石）、铁枝，盖起了小洋楼，这种小洋楼多数是华侨屋，或圩镇市集里的带“骑楼”的店铺，除了坚固、耐用、洋气以外，也很实用，方便人们防雨防晒。

早期深圳的移民，多数由粤北南雄珠矶巷或粤东梅州等地迁徙而来，更早一点的是来自江西、福建甚至河南中原地区。因而建筑特色带有中原和赣、闽、粤东风味。从建城材料上分，有寮、棚、屋、楼等。从规模上分，大型的家族式聚所为祠堂屋，小型的独户家庭式居所为单家园屋。从结构上分，有正屋、横屋、围屋、照墙屋、二字屋之分。其中正屋为主体。正屋也有大小之分。大型正屋由上堂、中堂、下堂再加左右横屋组合而成。上堂由三间或五间房排列而成，其中中间为厅称为上厅，因其是摆设祖神之处，故又称作祖公厅。祖公厅后由屏风隔开的空间，因视为宗族龙脉龙神进出之通道，故又称龙神厅。中堂的厅称为中厅，下堂的厅称为下厅。下厅入口处即为整座正屋的大门开设处。横屋，是排列在正屋左右两边的房间。横屋间的通道叫天街。传统的天街不独立设门，后来人们为了生活方便，也开了小门。左右横屋所立之门，相对于中间的大门而称之为正屋的小门。如果家族繁衍，围绕正屋不断加盖房间，这种以正屋为中心围拢起来的一圈一圈的屋，就叫围拢屋。围拢屋有圆型和方型两种。深圳的多为方型，且全部集中在龙岗、坪山、坪地、坑梓几个地方，其他地方的客家村落少见，深圳西片的广府一带更是没有。

除了客家围拢屋外，市内其他客家、广府人的民居大致单家独户，一间一间排列成小巷，一条条小巷组成一个村。各自独立的房屋小的 7 桁，大的 21 桁，所谓“桁”，是指瓦顶上一行一行瓦的木行数。旧时人们盖屋，受木材的限制，屋的跨度不能太大。常常屋的宽阔度取决于杉木的长度。屋顶上的杉木横栋梁一般不能驳口，所以一条横梁可以钉多少根桷，铺多少行瓦，就决定房子的大小。有钱人家住大一点的“21 桁屋”，折算成约 40 平方米；钱少一点的住小一点的“7 桁屋”，约有 15 平方米。盖房子天面的桁子一定要放单数，桷子要放双数，但桷子的数字不能被三和六整除。这是据“天地人宝贵贫”这六个字眼排出来的。三和六是“人”和“贫”字，住房的人口是不断要增加的，不能“订定”，贫则“贫穷”，故避之。清末民国初年平常人家住宅，正门进去为天井，通风采光，同时下雨时水往屋内天井流，广东人以水为财，暗喻聚水聚财。



保存完整的石岩镇浪心村清代民居

天井右厢边为右厢房，人口少的没盖右厢房间就为灶间，左厢边为左厢房或水缸、澡间。迈过天井为中厅，日常活动和吃饭多在中厅，今人土称饭厅。饭厅后屏风设祖宗神案，屏风后为主人卧室，小阁楼为长大成人的子女住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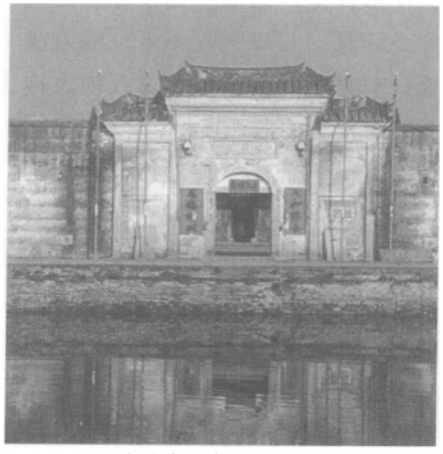
龙岗客家“围拢屋”

深圳至今保留比较完整而且富有特色的民居，是龙岗区几个村镇的客家围拢屋。最典型的是鹤湖新居、大万世居、茂盛世居、龙田世居和丰田世居等等。

说鹤湖新居，也不“新”了，足有190多年历史。它位于龙岗镇罗瑞合村，距深圳市中心区28公里，为罗氏家族聚居地，呈方型城堡式围拢屋，据说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客家民居建筑之一。是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被市政府兼辟为客家民俗博物馆，馆内基本保存着原貌。鹤湖新居奠基人叫罗瑞凤，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间，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从河南辗转迁徙到深圳，在龙岗河的冲积平原上发现了“鹤湖山”，此山被周围的大小7个岭岗包围，围屋自居于中间的小土墩之上，构成“七星伴月”的格局。罗瑞凤很满意鹤湖山这块风水地，觉得“鹤”，松鹤千年意头好，会给家族带来长安久居，于是便选择在此兴建家园，取名鹤湖新居。老屋大门横额上“聚族于斯”的镌刻，仍然向我们昭示着罗氏家族当年兴建围屋的愿望。

“鹤湖世居”历三代人，数十年建成。占地近2.5公顷，建筑面积14530平方米，南北宽166米，东西长109米。共有179个居住单元，每个居住单元有数间房屋、灶间构成，如今有几百间灶间足以证明当时“生火人家”就有数百间，鼎盛的时候，庞大的围屋里居住着千余罗氏子孙。整座围拢屋建筑由内外两围相套而成，内外两围设有八个碉楼，鸟瞰拢屋呈梯形，前宽后窄，内围有高墙与外围相隔，平面呈方形。内部建筑主体为三堂两横结构，屋宇，厅，堂，房，井，廊院布局错落有致，天街复杂，像座迷宫，易守难攻，有“九天十八井，十阁走马廊”之称，是典型的客家建筑艺术的结晶。

走近围屋，虽然作了一些修葺，但在残旧中你仍可以看到一口如镜的“半月形”功名池，池边有一坪偌大的晒谷场，场边白色高墙上模糊的壁画，檀木屏风上依稀可辨的雕刻，宽大祠堂中雄伟的麻石立柱讲述着当年热闹的场景。明显不同于其他围屋的是：门前多了两座清朝时期留下来的炮台，标志着围屋主人曾经的显赫的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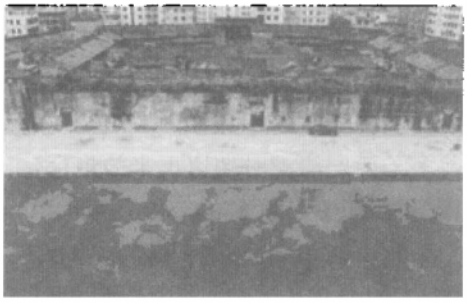
坪山大万世居〔罗湖区文化馆供稿〕

坪山镇“大万世居”围拢屋为曾氏族人所建，曾氏认春秋鲁国孔子儒家后人曾参为祖。该世居位于坪山街道中心西南约1公里处，建于乾隆三十二年，竣工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建筑面积1.66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为全国最大的客家围屋之一，是广东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客家古代建筑群。由于该围屋布局造型独特、建筑宏大，很有古建筑研究价值。1984年被列为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列为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万世居以宗祠为中心，最多时居住了曾姓100多户人家300多人。

在坪山镇“茂盛世居”围拢屋里，既有客家围堡的重要成分，又加注了欧式风格的构建和单元，还有广府民居的一些排列。反映出深圳地处沿海接受海外文化影响的痕迹，也体现了当时的客家人善于包容接纳不同文化的品性。茂盛世居的创始者是一对来自兴宁的何氏兄弟：何维松、何维柏，他们大约在清乾隆年间中后期（约1780年前后），从原籍兴宁县永和乡炉铺岭村来到横岗创业，在横岗圩创办“茂盛”商号，经商发家并于清嘉庆初年（1800年前后）动工兴建茂盛大屋，历时十三载建成。

坑梓镇龙田世居为古堡式客家围拢屋建筑，围拢屋前有类似护城河的池塘，半圆形的河岸与外墙形成“龟背状”图案，当地老人说，这龟背表示金汤永固，寓意长生不老。为各地土楼所少见。龙田世居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由梅县迁来的黄氏族人所建。其规模和气势宏大。现该围屋仍聚居60多人，另有10多户旅居港澳及海外。走进龙田世居，才知道还有一道一道的大门，一个一个的天井，连环相套，就连围墙其实也是一大排的房屋，整个龙田世居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城市”。

深圳龙岗区的客家“围拢屋”，就其建筑渊源而言，属于梅州客家民居一系。从功能上看，除栖身外，还偏重于防御。举族而居，高墙合围，墙上设有哨口和枪眼，墙顶辟有巡道，类似于城墙，四角筑碉楼；1943年，一小队日军来到鹤湖新居烧杀掠夺，罗氏子孙顽强反抗，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土枪终究不敌洋炮，最后罗氏子孙全部退守龙天顶。日军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一把火将历来被客家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龙天顶付之一炬。



龙岗罗瑞合客家围屋

龙岗客家围拢屋是中国典型的防御式民居，也是家族式起居、管理的自然村落。它的建造者有长远的眼光，也有现实的严格要求，尤其在选址上，既讲究天人合一，又兼顾风水。客家人向来重视“天人感应”。龙岗、坪山一带为丘陵地区，丘陵是建造围拢屋的最佳地形。在建造围拢屋之前，要请堪舆师将小丘陵依八卦分二十四个朝向，所选的宅基地要按照建宅人的生辰八字，依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选择最适合宅主人的方位。另外，据说在不同的月份建宅，朝向上也有变化。但重要的是，丘陵为宅基后部要有依托之物，原则是有山靠山，无山靠岗，假如没有丘陵，只有平地，远山也可以作为宅子的背衬。客家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上应苍天，下合大地，达到吉祥如意的目的。

在建筑结构上，围拢屋承袭了中原传统民居的架构、墙体和斜坡屋顶，根据南方气候特点，以“四扇三间”为基本建筑单位，形成“三堂两横”为核心的家居单元。平面布局上，层次分明，左右对称，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主要的建筑屋都在中轴在线布置，陪衬建筑均设于主建筑物的两旁。然而，龙岗客家围屋，其建筑时间毕竟距历史上的“第三次迁徙”有几百年历史，因而，其建筑结构及风格都有了微妙的变化。

龙岗客家围屋具体的建筑结构及风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墙内的建筑立面上，不再是清一色的平房建造，有的在上堂或正堂间造成二层楼

房，也有的在中堂的正堂内加半层阁楼；二是横屋与正屋间，横屋与横屋间，用天井和巷道分隔的立意更为鲜明，天井成了堂的框架，也有“四水归堂”的作用，巷道成了围内的交通网络；人在其中行走，到处都有连廊和开敞的厅堂，晴天挡日，雨天遮水，十分方便。三是有的民居防御功能渐次淡化，更为讲究美观舒适。坪山的鹿岭世居等，带有浓郁的侨乡风格，堪称围屋形制向现代居宅过渡的版本。四是宗祠作为结构围屋的核心，不再像法则一样得到强调，也允许建于围屋之外，如：坑梓镇的新乔世居，它的宗祠——江厦堂，就建于围屋外；五是雕刻、壁画、彩绘等这类装饰艺术在建筑中越来越得到重视。举凡瓦檐、梁栋、屏门、窗匾、廊墙均有工匠的巧夺天工的赋形，令人叹为观止。

总之，深圳民居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山寮、草棚、泥砖屋、砖瓦房、土墙碉楼、围拢屋、小洋房到如今的高楼大厦、别墅等高尚住宅，呈现出不同风格的民居气韵，蕴涵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是深圳“移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岭南住宅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客家围屋（罗湖区文化馆供稿）

清康熙《新安县志》：“邑中宜稻，名类最多……”深圳地处亚热带，气候酷热，而且炎热的季节和白天热的时间长，人们口干舌燥，粥是很好的主食。旧时吃粥，可分贫富；如今吃粥，是种享受。就连许多筵席或请客宴会，最后也上一锅“煲够火路”的粥，佐以一小碟榄菜、咸菜，代替米饭主食，足使外地人引以为奇。

邑之谷米与粥品

稻谷和米饭

深圳，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经济特区之前，乃是珠江三角洲鱼米之乡。

清康熙《新安县志》：“邑中宜稻，名类最多，曰早禾仔，曰海丰早，曰黄谷仔，曰红头早，曰大桂早此头造之早禾也。曰甲子周，曰饭罗黏，曰不知春，此头造之迟禾也。曰莆菱，曰赤谷仔，曰鹧鸪来，曰白壳赤，此头造之赤米谷也。曰红糯，曰响糯，此头造之糯谷也。曰竹粘，曰岗粘，此末造之早禾也。曰白谷，曰矮苗，曰圆黏，曰乌笃黏，此又末造之迟禾也。曰竹黏糯，曰羊角钮，曰乌臀糯，曰白糯，此又末造糯谷之种类也。”这里说“造”就是深圳一年种两季稻谷，上半年收成的为早季稻，农历九月底收成的为晚季稻。

如今后生吃惯暹罗（泰国）米、江西米、东北大米，不知道稻谷如何变成米。旧时，没有电动碾米机之前，农家把收割的稻谷晒干收藏，要吃时才用人力脱谷壳。首先将谷倒进用竹篾和黄泥做成的“隆磨”里，用力推磨，将谷粒碾破，然后用簸箕扬去谷壳，再用石造之碓舂米去米皮，用

米筛过净米糠，再扬去米末，就成为香喷喷而有饭味之白米。

后来有了机械碾米机，每个圩镇都设“火绞”（大米加工厂），为各乡村农家加工碾米，大大解放了劳力，“隆磨”和“碓”才日渐退出。那时挑谷去“火绞”碾米，一担谷碾出八成多米，只交几元钱加工费就可以把米挑回去，当然，你若要“肉糠”（米皮）回去喂猪，还是可以无偿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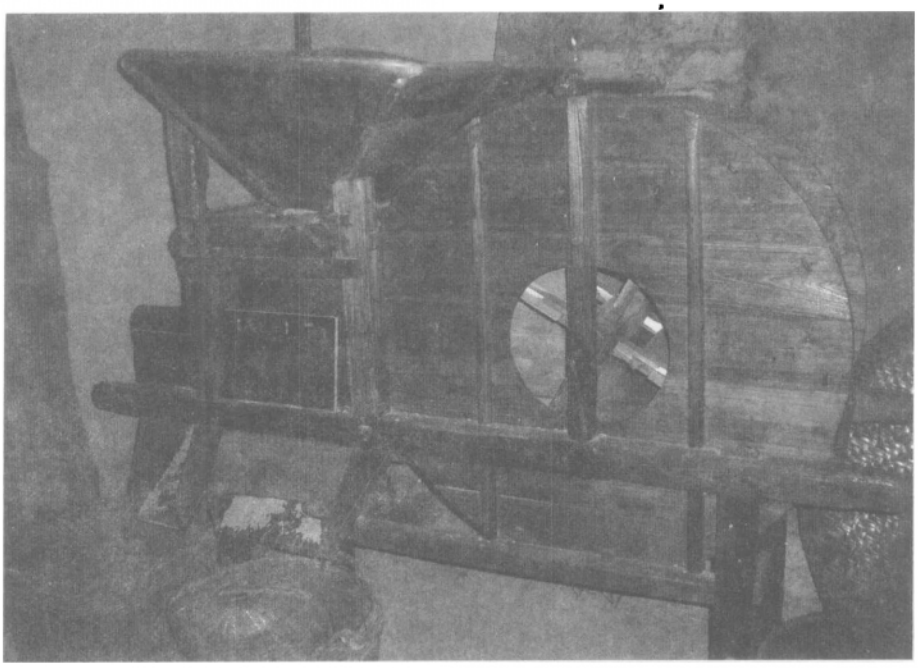
稻米之外，还有粟、高粱、番薯、芋头，俗称“杂粮”。高粱少种。粟较普遍，当地为狗尾粟、鸭脚粟、大粟麦。农人用碓或石磨将粟磨碎，经箩斗筛过，加糖煮食。至于薯，有番薯、木薯、白薯、葛薯和竹薯，其中番薯品种，有过夜香番薯、禾田薯、铁骨仔、石薯仔、红皮白肉、白皮黄肉、花心薯、红心薯、白皮白肉薯等，旧时欠收缺米，可顶主粮。番薯丰收吃不完时，可晒干制成番薯干、碾成番薯粉、制成薯丝（粉丝）。芋头有黄芋、青芋、银芋等，其中有两种较出名，为槟榔芋与红芽芋；芋头除可以当饭吃外，亦可以制芋角、芋头糕、香芋扣肉、油鸭芋头煲等糕食名菜。

稻米，通常可做成“米饭”、“米粥”、糕点和米粉。

旧时深圳人吃饭吃粥，一般可知其家庭贫穷或富裕情况。富人家一日三餐干饭或两饭一粥；中等人家一日两粥一饭，多为早晚吃粥，中午吃干饭，主要是白天劳动要“耐饱”；贫穷人家三餐皆粥，或辅以番薯、芋仔杂粮，更差的用粟类、薯类磨成粉“煮羹（糊）”。灾荒年月或青黄不接“四月荒”，穷人只用瓜菜煲粥水充饥，俗称“吃粥水”；说粥水，其实见不到多少粒米。

干饭因渗入材料不同，有番薯饭、南瓜饭、红豆饭、油鸭饭和海南鸡饭。以前粮食不够，加入杂粮一起煮“见饭”（多饭）耐饱。至于现代人在吃饱的基础上追求吃好，在饭快好时放入腊鸭腊肠或白斩鸡等料，“闷熟”几分钟，就是如今闻名“腊味煲仔饭”和海南鸡饭了。

干饭因制作方法不同，有双蒸饭、饭钵饭、焖饭、捞饭、饭焦饭和饭甑饭等。双蒸饭就是蒸熟了的饭，打松再加水重蒸一次，使饭粒吸水膨胀“见饭”，此饭是缺少粮食而为之，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我们吃了多年这样的双蒸饭。饭钵饭是用瓦钵盛上米，加水蒸熟，现在的客家餐厅多用此饭钵饭，一是有“原汁饭味”，二是干净卫生，三没有焦饭浪费。“焖饭”是用适量的米和水，拌以生油、盐或肉等，用锅煮熟。“捞饭”是以大米放入锅里，放够水煮开，再把熟饭用箩舀起盛于另一煲里，加微火稍烘而成的米饭；这样，饭可以吃，米汁水可当汤饮，老人小孩或吃不了饭粥的病人，喝此米汁水也有营养。“饭焦饭”，有点像现在四川的“锅巴”，山里水带辛寒，把锅里饭铲起后，有意把烧焦的饭加点水烧开，这种饭焦水也叫“饭焦茶”，比白开水好喝，又能治脾胃虚寒。在那“三年自然灾害”年月，香港亲人见家乡人没饭吃，过海关港英又不准带米，



碾米之前先要“风谷”除去稗和瘪谷等杂质

聪明的香港人就把饭煮熟并故意带一点焦，然后晒干带回来，过关时应付检查：“这是饭焦饭。”至于“饭甑饭”，是把洗好的米倒进煮沸的水中煮至半熟，然后捞起来倒进甑内蒸熟，这种“甑”在中间腰层有一块穿着许多小孔的隔板，锅里蒸气通过小孔把米饭蒸熟。这样甑出来的米饭粒粒不相粘，又十分松软，大家庭或饭店多用饭甑饭。当然，现在的家庭和饭店绝大多数用电饭煲，省时省力又好吃了。

粥品和“吃夜粥”

深圳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而且炎热的季节和白天热的时间长，人们口干舌燥，粥是很好的主食。旧时吃粥，可分贫富；如今吃粥，是种享受，就连许多筵席或请客宴会，最后亦可以上一锅粥，佐以一小碟榄菜、咸菜，代替米饭主食，足使外地人引以为奇。

深圳人，爱吃粥，而且吃粥品种颇多，做法上也有许多不同。从地区上分有潮州粥，广府粥。潮州粥，就是仅仅把米煮熟，米粒基本成一颗颗，水很“渲”，几乎跟上海泡饭差不多；广府粥、客家粥，一定要把米粒煮烂，古时亦称为糜，稠的粥叫“饘”，“渲”的叫“酏”。从时节上分，一为腊八粥，于农历十二月八日以菜果入米煮粥，因为在腊八日，故名。一为口数粥，于十二月二十五月夜用赤豆煮粥，一家大小均得分食，所以叫做口数粥。腊月廿五旧俗已进入“年架”，吃赤豆粥讲究意头，书载

此粥宋时已很盛行，但深圳较少人吃。

从药用功能上分，有“八宝粥”，里面放红枣、桂圆、莲子、红豆、银耳等八种药材和米熬成的粥，大补元气。宋人张耒《粥纪》云：“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诀。” 还有消滞祛湿的淮山粥、健脾胃的莲子、枸杞粥，消暑解热的冬瓜绿豆粥，降火气的菜干蚝豉粥，活血生肌、对手术后愈合伤口的生鱼粥和妇女“坐月子的”小米粥。但乡下“坐月子”妇人忌吃糯米粥，谓之凉性食物，有伤身子。

大约因为粥的水分较多，可利肠胃，所以《礼记·月令》有：“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古人曾有“茗粥”、“梅粥”至今已未见。“茗粥”，据明陈继儒《珍珠船》一书叙述：“茶古不闻食，晋宋已降，吴(今江浙)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梅粥，据宋林洪《山家清供》云：“梅落英净洗，用雪水煮，候白粥熟同煮。”据说，此两粥只取其清高，未见得有特别作用和滋味，因而未流传下来。

广为流传的倒是既有营养，又味道极佳的“味粥”。所谓“味粥”即是猪骨粥、柴鱼花生粥、及第粥、艇仔粥、猪腰肝粥、猪红粥、白果粥、窝蛋粥、鱼腩粥、脆鲩粥、鱼骨粥、鱼嘴粥、黄鳝粥、田鸡粥、皮蛋瘦肉粥、牛肉粥、牛杂粥、虾粥、蟹粥、滑鸡粥、紫姜鸭粥、鲍鱼粥等48种之多。现挑几种略为介绍一下，首先是白粥。白粥不“白”，它要选用当造新鲜香米，洗净拌少许油盐，用“企身”瓦罉来煲；放够水烧开，才放米、腐竹，大火烧至米粒开花，然后把火关小，文火熬至糜烂，此时米水交融，香滑可口。早上和“油炸鬼”、肠米粉、“炸两”(用一层米粉裹着油条)一起吃之，别有一番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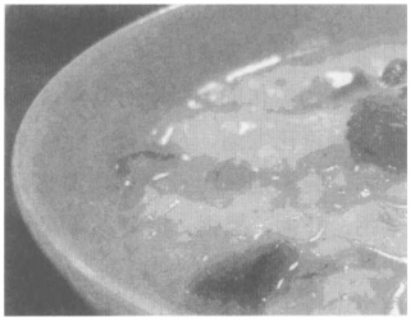
煲各种味粥，很重要一环是煲好“粥底”，除了米、水、油盐外，上者放“瑶柱”海味(上等干带子)，中者放“地鱼”又称“火炙鱼”，下者才是猪骨头，也最为大众化。三种材料任选一种熬出的粥，加上用生抽、麻油、酒料稍稍腌制的牛肉、牛杂或鱼片、鱼腩、鱼云(鱼头)、鱼嘴，放进粥底“滚几滚”，调上鸡精、姜丝、葱花和胡椒粉就成为地道的“牛肉粥”、“鱼腩粥”、“鱼云粥”了。香港人头脑聪明，把粥做大，做成“粥皇集团”，连锁店好几十间，也跨过罗湖桥做到深圳、广州，吃一碗粥皇粥，在香港为32元，在深圳也要20多元。

说起“及第粥”和“艇仔粥”却有段“古”，也富含地方文化。

“及第粥”，全名为“三及第粥”，因科举时代殿试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简称“三元”。传说广东状元林召棠中状元之前最喜欢食肉丸猪肝、猪粉肠做的粥品，后来他中了状元，即“及第”了，所以把这种粥叫做“及第粥”。粥里放肉丸比喻状元，猪肝(原用牛脾，广东人称

为“牛膀”，“膀”与“榜”音近）比喻榜眼，猪粉肠（做时切上刀花，煮熟后呈花纹状）比喻探花。它喻意吉利，表达百姓良好愿望，加上选料大众化，制作简单，味道鲜美，故很快流传开来，成为岭南一款名粥。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上猪心片和鱼片，称为“文武及第粥”，再加些海蛰皮、姜丝、葱丝等，称为“七彩及第粥”。时至今日，在广东的家庭、酒楼、粥店，是群众最受欢迎的粥品。

“艇仔粥”，广东人说艇仔是小舢板船，珠江三角洲河涌和沿海码头一带，有许多小船抓到河鲜海鲜，加工为粥料，味道鲜美，又利用他们行驶灵活的优势，到处兜售，人们称之为“艇仔粥”。原来经营艇仔粥的多数为水上人家，因此粥大受百姓欢迎，故有些小摊贩仿制，后来酒楼茶市也做艇仔粥卖了。艇仔粥用料以海鲜为主，煲好粥底后，加上鱼片、鱼饼、海蛰、鱿鱼、炸花生、炸粉丝、煎蛋丝、葱花和姜丝等，香脆爽滑，鲜美可口。近年由于河涌污染，既没有河鲜，又环境不佳，艇仔来往却没有艇仔粥卖，而酒楼有艇仔粥卖却又没有艇仔游弋、海风习习的惬意境至，这，不无令人遗憾。



皮蛋瘦肉粥

吃“及第粥”、“艇仔粥”、“鲍鱼粥”等，不光享受美味佳肴，而且还在感受一种岭南文化。如今吃粥不仅限于早午晚餐填饱肚子，许多人还喜欢宵夜。除了上夜班的人们吃夜宵外，平常人也喜欢邀上三五知己吃夜宵，聊聊天。广东人把吃夜宵吃得多引申出“吃夜粥”这个词，意思成为夸赞此人是有经验、有能耐的人。

《宝安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福田人黄果等制成中外闻名的深圳云片糕正式投产。"解放前，罗湖火车站驶来广州火车，车还未停稳，"云片糕，云片糕"的叫卖声在站台上响成一片。火车上的人就纷纷打开车窗，在停靠二三分钟时间内抓紧买卖。从香港过境来的旅客，也无不买上云片糕、猪油糕、沙井蚝豉蚝油，当手信送给内地亲友。

百年小吃云片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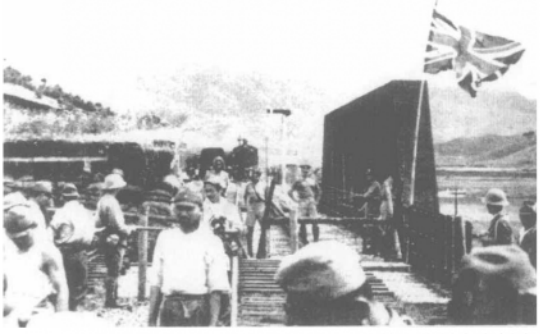
《宝安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福田人黄果等制成中外闻名的深圳云片糕正式投产。"这样算来，深圳云片糕有百多年历史的小吃。

深圳历史上聚居着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地方糕点小吃也带有这三大民系生活习俗的特色。广府人喜欢做马拉糕、千层糕、腊肠卷、萝卜糕、炸角仔、炸糖环、老婆饼、鸡仔饼、核桃酥、白糖饼、沓米饼、松糕、"素粉"等，客家人喜欢做云片糕、牛筋糕、猪油糕、菊花糕、钵仔糕、圆笼粄、喜（起）粄、甜粄、"聂粄"、"勃粄"、艾叶粄、"鸡屎藤粄（一种植物藤做的）"、"仙人粄（凉粉草做的）"、米珥、糍粑、拗（音坳）饼等，潮汕人则喜欢做潮州粉果、糖芋泥、番薯沙等。

深圳最有名气是云片糕和猪油糕。深圳云片糕"清朝末年为深圳圩'合成号'饼店黄果创制。每14片（包）用佛山产一级糕粉220克、白糖500克、猪油80克等材料混合搓匀落格精制而成，爽口清香，驰名中外。"（《宝安县志》）一条22厘米长的云片糕条，至少切成120多片，多的成130至140片，几乎跟

纸一样薄。

黄果创制的“合成号”云片糕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七年，足有107年历史。深圳圩东门老街还有一间“富华店”云片糕，是在民国一十三年（1924年）由温初平、朱和珍和李荣腾3人合股开办的，也有74年岁月。温初平是广东梅县人，1920年到深圳圩打工，有做云片糕的手艺，是小股东，还有一个小股东是笋岗附近的坭岗村人。“富华店”最大的股东是一个在香港开“鸿昌商馆”的商人李荣腾，李荣腾原籍深圳横岗。“富华店”主要经营糖果饼食制作，零售油米和烹饪配料。“富华店”生产的饼食糕点最出名的是“富华牌云片糕”。“富华牌”云片糕的主要原材料是台湾幼沙糖和猪油。云片糕分“冰化云片糕”和“玫瑰云片糕”，一个以形状薄得透亮，像结的冰晶莹透亮，入口即爽口不腻取名；另一个则以淡淡的玫瑰香型取名。当地精明的食客，为辨明是否真正的深圳云片糕，除了拿出一块看是否像四川灯影牛肉干那样透出影来外，还掏出火柴，“咔嚓”一声划亮点云片糕，当看着它“滋滋”地烧着了，就竖起大拇指：“好正！好正！”（意思正宗），马上付钱购之。



深圳沦陷，深圳人“走日本仔”，自然云片糕店老板也关门逃难

据载，云片糕在广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都有，在明代已负盛名，清乾隆期间已成为贡品。1938年春，毛志远在延安见到伯父毛泽东，她拿出母亲托她带来的云片糕，毛主席非常高兴，吃得很香，可惜那时还是个稀罕物。

我到粤东旅游，看见云片糕在梅州也有得卖。《客家民俗》（房学嘉著）：“云片糕又叫夹心糕，选优质糯米磨成粉后，掺入猪油、白糖、榛糖、芝麻、榄仁等，装盘、压实，蒸熟、切片，然后进行包装。主要产地是丰顺县堺隍一带，所以又叫‘堺隍糕’。”这样看来，深圳云片糕和梅州云片糕主要材料是一样，但深圳云片糕没有芝麻、榄仁、榛糖一类“馅料”，同时深圳利用靠近港澳、广州、佛山的有利条件，选用台湾幼沙糖、佛山一级糕粉等原料，比梅州优质，再者在具体制作配方和工艺程序较为精工讲究，所以质量和名气比丰顺的“堺隍糕”胜一些。

说起名气，也许深圳圩地理位置，处在香港和广州的广九（龙）铁路线上，流动人员频密，当地名优特产容易销售流通出去的缘故。深圳“富华牌”云片糕店创始人之一的温初平，他的儿子温中华1926年在东门老街出生。今年82

岁的温中华老先生说起深圳火车站台上叫卖“云片糕”的情景，一脸兴奋、怀旧和留恋神色。他说，解放前深圳有两个火车站，老街对面的布吉河边（今工人文化宫门口铁路旁、市集邮公司对面榕树头），叫深圳圩站，人们常称“小站”。现在的深圳火车站，当时叫罗湖站，人们称为“大站”。

许多深圳小贩都在脖子上挎一个小篮子，一看到火车停靠小站，车还未停稳，“云片糕，云片糕！富华牌云片糕，合成牌云片糕”的叫卖声在站台上响成一片。火车上的人就纷纷打开车窗，在停靠二三分钟时间内抓紧买卖。罗湖站那边，因为火车不直接通香港，从香港过境来的旅客，步行过罗湖桥，来到大站。大站周围也有许多云片糕叫卖，旅客买上云片糕、猪油糕、沙井蚝豉蚝油，当手信送给内地亲友。当时“深圳云片糕”用油纸包装，面上贴块招牌红纸，小贩从店里三毛五分一块批发出来，到火车站卖五毛钱一块，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10蚊（元）钱。那时，深圳用的都是港币，不用民国的法定币和金圆券。铁路警察如见人多，秩序有点乱，就抓小贩，卖云片糕的见势不对就“走鬼”。万一被抓到后，主动塞给警察一块云片糕，就可以没事走人。



云片糕

小时候，我也在穿街过巷的叫卖声中，买过深圳云片糕。用父亲给的买纸笔零用钱，数了又数才拿出五毫子买了一块。这一块云片糕还未吃，就香到喉咙，甜入心胃。为了留住香味，先用小手指一丁点一丁点掐一个小角，放进嘴里；不想一两口吃完。手掐，怕不小心掉了点在地上，改用牙齿小口小口地咬着吃。吃的时候，还不让它马上吞下去，先在口腔里转一圈，停留一会，让齿颊过了瘾，才不舍得地嚼吃进去。

上世纪60年代物质困难时期，我们很喜欢路过深圳圩的北门街（今东门步行街西华宫位置），因为这条小街有个糖果饼干加工场，这工场生产的云片糕、猪油糕市场上见不着，据说都出口港澳等地去了。买不到吃不上云片糕，但工场飘荡出来的糖果饼干香味，弥漫整个街巷。这香味，满足不了口却满足了鼻的享受，而且不用花钱。

温中华老人说，解放后工商界公私合营后，深圳糖果饼干厂生产的云片糕，没有用“富华牌”和“合成牌”两个商标，统称“深圳云片糕”。其实早在1938年11月2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26日深圳失守，老百姓慌忙逃难，富华店就歇业了。温中华老爸温初平也带着家人去了香港。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温家又回到深圳东门老街开米店。云片糕由其

他人开的饼店生产，沿袭到解放后的深圳糖果饼干厂。上世纪80年代，市场上受到大量进口糖果饼干的冲击，加上北门街糖果饼干工场纳入东门步行街“华城”统一改造，工场一拆迁，老师傅一退休，工人被遣散，深圳云片糕等名优小吃，也随之消失。

《宝安县志》记述：“百多年来，云片糕几经演变，原制作技术已失传。入80年代后，有饼家仿制，但质地较前稍逊。”

云片糕属“高糖、高脂肪”食品，如今讲究饮食的人较少吃。据说香港继续有云片糕生产，是否由深圳原老师傅去香港的生产工艺，不得而知。但是，他们适应现代人的健康食品理念和口味，改革材料和制作方法，用植物油代替猪油，糖分含量也偏低。然而，销售市场如何，可未作深入调查。湖北黄石市在云片糕基础上，开发了桃片糕、瓜仁糕、杏仁糕、花生糕、薄荷糕等投放市场，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最近，我们国家将采取措施抢救、恢复一批“中华传统老字号”店家商品，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新闻媒体，也呼吁恢复深圳云片糕等名优土特产，不知什么原因，就“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一块云片糕，含满了那个时代孩提的童趣，也浸润了我们老一辈人的集体记忆。我想，无论如何，百年小吃，不能在我们这一代继续消失……

咸茶，一般是在清明节采摘腌制的，因此又叫清明茶。清嘉庆《新安县志卷之三·物产》载有："茶产邑中者甚多，其出于杯渡山绝壁上者有类蒙山茶，烹之作幽兰茉莉气，缘山势高得雾露以滋润之故，味益甘芳，但不易得耳。若凤凰山之凤凰茶、担竿山之担竿茶消食退热，以及竹仔林之清明茶，亦邑中之最著者也。"

农家咸茶与擂茶

咸茶，顾名思义是咸的茶，也就是大碗茶中的一种。这里说的"大碗茶"，固然有北方用大粗碗喝茶之意，也有当地用树叶、瓜果自制粗茶的含义，如"萝卜干茶"、"芥菜干茶"、"黄皮果树茶"、"布棕树叶茶"、"拔仔(或称番石榴)树叶茶"等等。咸茶，都是在清明节采摘腌制的，因此又叫清明茶。

咸茶，是深圳当地农家一宝，家家用来"掌门"的，也就是看家的。谁一时发烧感冒，热症封喉，顺手执一撮，开水泡之，几碗下肚，茶到病除。咸茶，是旧时"粗人"、"穷人"喝的茶，没想到几十年后，也成为现代都市人追求亲近大自然生活的保健茶。尤其是"拔仔茶"（番石榴茶）有非常好的降糖效果，许多糖尿病病人自己采摘来泡水饮，没地方采摘的就去商场买来饮，当做辅助饮料，特别是香港人，过罗湖关，就买几十盒带回去。

夏令时节，我和几位好友，携眷结伴游了一趟云南丽江。路上舟车劳顿，山路颠簸，加上天气酷热，有位阿姨团友在大家欢乐笑闹中，却一言不发，无精打采，望之嘴红脸烧，细问之下，才知道是感冒发烧了。

出门在外，最怕碰上头烧脑热，小病小痛什么的；在前不到村，后不

着店的路上，缺医没药，真难搞。阿姨尽管吃了几粒自备丸药，好几个小时了，却没点动静。好不容易车子停在途中一个餐厅，吃饭前，只见旅游团团友老李冲了壶“茶”走过来，斟出一碗酡葛色的茶递过给感冒的阿姨，说这是家乡羊台山咸茶。

“羊台山咸茶？”有位年轻人奇怪地瞪大了眼。我们几位在羊台山下长大的老人，望着青年人疑问的目光，点了点头。

清嘉庆《新安县志·卷之三物产》载有：“茶产邑中者甚多，其出于杯渡山绝壁上者有类蒙山茶，烹之作幽兰茉莉气，缘山势高得雾露以滋润之故，味益甘芳，但不易得耳。若凤凰山之凤凰茶，担竿山之担竿茶消食退热，以及竹仔林之清明茶，亦邑中之最著者也。”该县志续云：“凤凰山在大奚山帐内，双峰插霄，形如凤阁，与杯渡山对峙，中有神茶一株，能消食退暑，但不可多得，土人于清明日上山采之，名曰凤凰茶。”


客家妹擂茶

几百年前，我邑地的杯渡山（今香港新界屯门市镇辖区）和凤凰山（今宝安区福永镇内），就有“土人清明日上山采之”“消食退暑”的“神茶”、“担竿茶”、“清明茶”、“凤凰茶”。由此可见，“土人”制作的农家咸茶历史还蛮久的呢。

自从参加工作进了城，我40多年没喝过这正宗的家乡咸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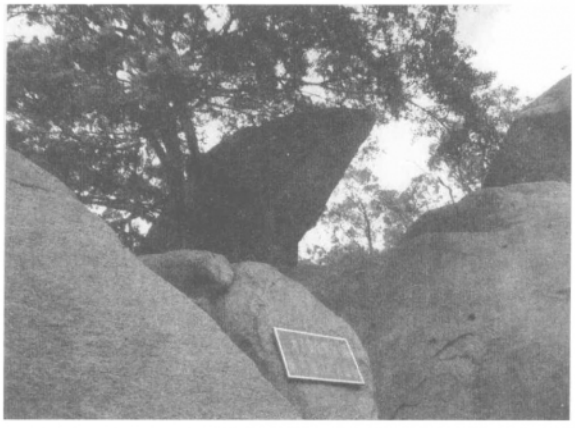
这咸茶，城里没有，药店不见，超市买不到，只有农家特有。味道咸咸的，半苦半辣，带点山草药香味。老李说，这咸茶有病治病，没病健身。我从小就喝过这咸茶，知道它对大热症、中暑、咽炎、白喉、牙齿上火、口舌生疮、肚胀肚痛、消化不良等很有功效。没事喝了也能生津止渴，解暑祛火、除湿消滞。平时乡村小镇的人，时不时用它代替中药草药苦汤，当山茶、绿茶、保健茶饮。你别说，还挺管用的。

说话间，发烧的阿姨喝了两大碗羊台山咸茶后，自己感觉口没那么干，唇没那么红，手没那么烫，人也精神了许多。其他团友因为在路途车上，吃了不少花生、酥饼、炸麻花、香瓜子、蜜饯和糖果，肚子油腻饱滞，喝了这咸茶，不知谁马上放了个响屁，惹来一片笑骂声。笑骂声刚刚落地，笑骂别人的人因为他喝了咸茶，也放起屁来，男的女的一个个轮着放，霎时，

屁声像连珠炮一样，啪啦啪啦响了一串。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好像在说，这年头你笑我，我笑谁了，我怕谁了我！紧张了几秒，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嘿！奇了，肚子叽里咕噜叫了一阵，瘴气释放出来，顺了，人人轻松了，大家胃口顿开。

这时李伯说了，肚子胀滞，喝了咸茶有个功能，就是有屁放屁，没屁造屁。大伙听了，想起刚才尴尬场面突然又大笑起来，爆发出掌声，齐声向老李道谢："李伯好人！李老伯你好'抵惜'（方言为值得亲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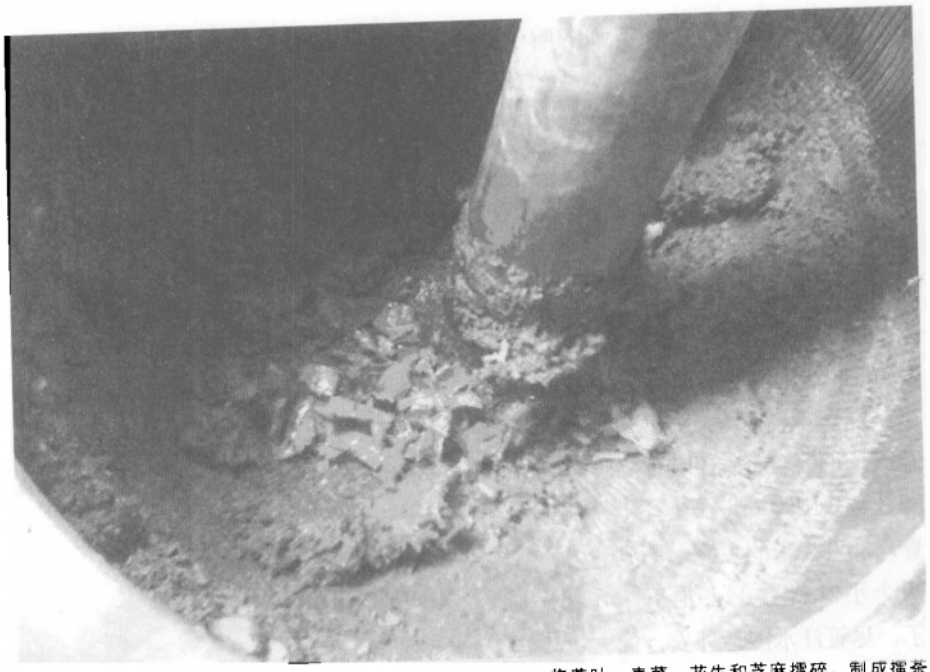
大家哄得老李毛发翘起，飘飘然。老李原来家住在羊台山下的小镇上，30多年前移居香港。几年前又从香港退休，返回羊台山脚下的老村居住，颐养天年。老李年轻时好动，现在退休后还是喜欢登山。60多岁了，身板直直，脚步健捷，面容红润，目光有神。他说，每天都和晨练友登山。从村子走到羊台山脚，又从山脚一步一步往上登，587.3米的主峰，不到两个小时就登上去走下来了。尽管汗水湿透外衣，像小溪一样流湿裤头，洇湿裤裆，但他全然不觉。下了山，那种苦后舒畅和满足感，回眸沿路奇山秀水、树木葱茏给人的美感和愉悦，他说，"外人无法体会"。



相传宝安区福永凤凰岩上有凤凰茶

李伯每每在行山中，喜欢"拈花惹草"，认药树，辨花草。什么糖樱树、黄脚筋浸酒可治什么风湿跌打；洗衫仔根、山甘草根可适用于风火牙痛和生牙痰；五指毛桃、硬饭头（土茯苓）、苦梅根煲汤水能除去湿热毒；岗油麻根是治绞肠痛之圣药……这不，他行山时就采摘山茶做起咸茶来了。

说起做咸茶，只有清明前后两三天才有功效；据说过了这几天，效果大打折扣。这一天，按当地风俗，在凌晨太阳还未出来，雾水还未散去，就到羊台山"见青"采摘，意思是这一天什么叶子都没毒，可入药。像李伯那样有点草药常识的，不会什么树叶都要，而是选择水安树叶、金银花、板蓝根、狗肝菜、白花仔、红花仔、五指毛桃、梅子叶、毛茶、黄枝子、狗脚迹、凤尾草、车前草、地胆头、土伏苓叶、两面针、金丝草、半边莲、苦梅根、鹅掌软、淡竹叶等采摘。摘回来后，用清水洗净，晾干，然后切碎，用盐搓软，加上咸梅、咸榄、咸柠檬、葱头、生姜等一起放进瓦缸腌制，只需密封两三个月，就制成了



将茶叶、青菜、花生和芝麻擂碎，制成擂茶

清明咸茶。这咸茶用现在的药理分析，都是一些清热解毒、去湿利尿、发汗疏表和消炎祛痛等功效。李伯曾用这咸茶，救过几位中暑的外地民工呢。

李伯不是职业郎中，却是个对医药保健有心人。像李伯这样略知山草药用的村民，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对着羊台山下这个草药库，谁都有几下“散手”。李伯说，他去了香港那30多年，没有家乡大山草药采摘很不习惯。偶尔有个病痛，动不动看西医，西药吃好了这病，又生出别的病来，简单的病闹出复杂的病，小病整出个不小的病来。搞得他每逢回乡探亲，都到山上采摘一把带回香港去，惹得海关抽查盘问：“这是什么东西？”让他费了不少气力解释了好半天。

这次，李伯有心用个玻璃瓶子带上新制好的咸茶来旅游，想不到派上用场了。在丽江、大理旅游景点回昆明的长途汽车上，大家又困又渴，李伯把泡好的咸茶从大保温瓶里斟出，从车头往后传去，一人一小杯。像功夫茶杯般大小的咸茶，啜进干苦的嘴里，滋润着燥涩冒火的咽腔，在口里咸、苦、辣、甘、香慢慢溶化、渗透、弥漫开去，什么叫做久旱遇甘霖，这时候的感受是最好的注释了。

感冒好了的那位阿姨，她饮了这小杯咸茶说，大理民族风情看了，丽江古城风韵浏览了，玉龙雪山的旖旎风光体验了，在途中又品尝了家乡正宗的咸茶风味，解除病痛和疲劳，这次旅游的乐趣，久久难忘。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山头出一种山歌。

深圳一些村镇乡民，除了自制咸茶以外，还有食“擂茶”的习惯。

擂茶，有人亦称之为咸茶，但绝不是上述说的草药、树叶子和咸梅、柠檬、葱头等腌制的咸茶。这里说的“咸茶”是“食”，而非“喝”非“饮”。既然是食，就跟“咸茶”的材料不一样了。

擂茶，不用腌制，即做即食。首先将花生、芝麻、黄豆炒熟，加上茶叶在“辗钵”（带螺纹的陶钵）里，用一根像擀面杖的木棍擂成粉末，调上盐巴、味精，泡上开水，然后把在锅里炒好的虾米、鱿鱼、肉粒、豆腐干、爆米花、荷兰豆、芥兰、生菜、萝卜、芹菜、大葱等碎粒菜料，盛在汤碗里，浇拌上擂好的花生、芝麻、黄豆茶，这就是香、咸、鲜、甜、美味可口的擂茶。

这擂茶，消食，祛滞，开胃，健脾。有人吃五六碗，也有人“闲闲地”吃十几碗。好客的人家，在农闲时邀亲戚朋友来食“擂茶”，沿海一带的大鹏、葵冲、盐田、蛇口、西乡、南头等地都喜欢食擂茶。尤其是南山区蛇口渔二村，百多年来流传每逢过年的正月十三举办“开丁节”习俗，家家户户都做“擂茶”，当地渔民称为“开丁茶”。

“开丁节”这一天，哪怕是不相熟的路人经过家门口，都会被邀请进家里“斗食”擂茶，祝贺主人“添丁”、“纳福”；主人客人互相道贺平安、祝福来年好运。同时，深圳一带乡村民间信奉三国的“刘关张”，相传擂茶源自张飞将士喝来祛风的“三友汤”，因此对吃擂茶的这种地方风味，喜爱有加，一直沿袭至今。

深圳羊台山下有句俗话：“夏至狗，没处走。”不是说夏天酷热，狗没地方避暑；而是夏天都没停止过吃狗肉，家家宰，天天宰，狗没处藏身。乡下人说“卖了棉被吃狗肉”，说的是冬天吃了狗肉，全身暖洋洋，晚上不用盖棉被。《风俗通义》所记：“古人夏至磔狗，起初是为了‘祭四门’的，祭后食之，只是顺便，不料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风俗。”

羊台山狗肉

我老家深圳羊台山下有句俗话：“夏至狗，没处走。”不是说夏天酷热，狗没地方避暑；而是夏天都没停止过吃狗肉，家家宰，天天宰，狗没处藏身。羊台下是讲客家话地区，客家历有“夏至狗肉”的谚语，早在秦朝客家人未大举南迁时就有此嗜好，《史记·秦本纪》有载：“秦人以狗御蛊”为证　。

有没有搞错，夏天吃狗肉不怕上火？怪，羊台山下石岩、龙华、观澜等几个镇的人，长年吃狗肉，没听说上火、牙痛、长疮，甚至青春痘也不多长几粒。个中原因，盖因喝羊台山的水，饮羊台山茶。羊台山水性寒，天天喝，年年喝，长年累月地喝，是座火山都会被浇灭。我就是这样被搞得没底子了，在男人中汕笑自己“老柴头没火”。难怪乡下人说“卖了棉被吃狗肉”，说的是冬天吃了狗肉，全身暖洋洋，晚上不用盖棉被。其实广东民俗专家叶春生考究出号一个原因：“因为盛夏暑天，蛊毒攻心，双夏大忙在即，而狗肉又能御蛊解疟，所以磔而食之，以补身体。据《风俗通义》所记，古人夏至磔狗，起初是为了‘祭四门’的，祭后食之，只是顺便，不料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风俗。”

年年吃狗肉，四季不断狗肉，嘿嘿，就吃出个“石岩狗肉”、“观澜狗肉”、

“龙华狗肉”品牌，远近出名。我常有朋友搭着肩膀：“什么时间去你老家吃狗肉？”我当然不能推辞，“舍命陪君子”吃个够。这狗肉，不仅当地人爱吃，附近的平湖、布吉，公明、西乡、南头人爱吃，甚至香港、深圳、横岗、龙岗、葵冲，连东莞的凤岗、天堂围、樟木头人也爱吃。有人专门开车去吃，有人托亲朋去打包回来吃，我开车送客人去宝安机场乘机后，也要抄近路到石岩吃个痛快，然后再买几斤打包回来和朋友喝几杯。

狗肉，有人称为香肉。老话说，“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这形容红焖（烧）狗肉的香气，下巷焖，上巷香，村头焖，村尾香。谁家煮狗肉，村里见者有份，男人们闻到香味，自动坐下来吃，一边喝酒、吃狗肉，一边说着村里趣闻，夹着男人们爱说的几句黄段子，一大锅狗肉，从中午吃到下午，从下午吃到晚上，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乡下把这种吃法，叫做“打豆豉”（又称“打斗市”即聚餐、大吃会）。

石岩狗肉、观澜狗肉、龙华狗肉有什么特别呢？一是选狗，外形要像“砧板头、陈皮耳、筷子脚、辣椒尾”；上好的是20来斤的小狗牯，老狗、雌狗次之。宰了狗的血千万别倒掉，留作煮好时起锅前“埋胶”。二是用“广东三件宝——陈皮、老姜、禾杆草”制作，宰好的狗要用“禾杆草”或松树针叶，点火烧掉狗身上的细茸毛，因为吃了带茸毛的狗会“痴狗痢”；被烧过的狗皮金黄金黄的，炆煮起来很香，“弹牙”有嚼头。三是讲究炒功。油锅烧红后，倒进沥干了水斩成一块块的狗肉，反复翻炒，炒至水干了，重新倒水浸至狗肉面上，加小茴、八角、生姜、柠檬叶，大火红烧10多分钟，改中火文火慢慢煮至肉软。再放生盐、老抽、红糖调味，倒狗血“埋胶”起锅。

深圳有一间小吃店，打有“石岩狗肉”招牌吸引吃客。我心中一喜，约上两三位朋友，带壶靓糯米酒，去吃顿家乡狗肉。吃狗肉，再吃鱼虾蟹会无味道。所以只点了主菜3斤狗肉，外叫一碟青菜、一锅萝卜猪骨汤就够了。坐将下来，狗肉上桌，果然香气诱人。我筷子一下去，吃了第一块狗肉，说这不是正宗石岩狗肉。朋友问我怎会不是，我说这狗肉放了“南乳”（红豆腐乳），石岩、观澜、龙华狗肉是不放“霸道”的“南乳”的，这“南乳”夺狗肉原味。我第二筷子下去，说师傅没放柠檬叶，朋友问我怎么吃出来，我说这狗肉少了柠檬叶的香气。我第三筷子下去，说这狗是一条母狗，不是上好的“狗牯仔”。我这一说，惊动了店老板，他说是“狗牯”，不是母狗。我坚持说是母狗，店老板说煮熟了狗肉，你怎么吃得出？我卖了个关子，说你先进厨房问过师傅，是母狗了我才告诉你。店老板将信将疑，一会从厨房出来说给我说对了。他谦虚地问我诀窍在哪？我夹起一块狗肉示意老板说，如果是“狗牯仔”煮熟的肉，肉饱满、结实，狗皮缩成一点点；这块母狗煮熟的肉，狗皮几乎包着肉，肉不结实，且肉小。店老板经我这一点拨，当即说开店以来，碰到第一位狗肉高手吃客，连

忙嚷道："打个八折，打个八折！"

说我是高手，不敢当；说我吃得多，这就不谦让了。记得我小时候，家乡有间很地道的"同福狗肉店"。上世纪50年代初，家里穷，想吃碗狗肉饭都想疯了。好不容易跟我爹要到了一毫子，去"同福狗肉店"买了一碗只有狗肉汁的饭；要知道，饭面上要带有几块狗肉的，可就要加多一毫为两毫子一碗呢。

后来长大工作了，下乡到客家地区的布吉、平湖、龙岗、坪地一带，想在饭店吃狗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吃饭凭粮票，吃肉就难得一求。怎么办？朋友就买条狗回来自己宰，自己炆，"打豆豉"解馋。改革开放后，小吃店如雨后春笋，狗肉店也多起来，但是只有冬天才有狗肉卖；一年四季有狗肉卖，偌大深圳恐怕只有石岩、观澜两地了。


香味诱得"神仙都站不稳"的狗肉

后来到广州、湛江，吃过雷州狗肉，那是白切狗肉，沾酱料吃，不是红烧狗肉。有一年我去了趟牡丹江，朝鲜族乡亲热情欢迎来自全国各省的会议代表，支起四口大锅，忙乎了一天，做起朝鲜族特色的狗肉，皮跟肉分开煮，也挺香。据说在寒冷的牡丹江，朝鲜族朋友也酷爱吃狗肉。我吃朝鲜族风味的狗肉，印象中跟雷州狗肉差不多，还是没红烧。近年，深圳雷州狗肉火锅店多起来，但吃起来，没石岩狗肉香、够味、过瘾。

香港没有回归前，英国人颁布不准杀狗、吃狗。他们大概以为狗都是宠物狗。宠物狗我们也不吃。香港人也是我们宝安人，宝安人嗜好狗肉。那时，香港人想吃狗肉，非得过来深圳不可，吃的人多了，还有人专门组织吃狗肉旅游团。后来，深圳籍的华侨、台湾同胞也喜欢回来吃家乡狗肉，聊解乡愁。

深圳家乡狗肉越吃越出名。不仅享誉香港、台湾同胞之间，而且东南亚、英国、法国、牙买加、荷兰等地深圳籍华侨，也无不知晓。甚至谁也想不到，67年前"深圳石岩狗肉"竟也与中国文化大名人有缘，还上了报，拍了电视，进了博物馆，有茅盾文章、何香凝和柳亚子诗词传下为证。

话说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香港，暂居在香港沦陷区的何香凝、邹韬奋、茅盾、胡风、乔冠华、柳亚子、廖沫沙等著名文化人和民



被营救的文化人转移到白石龙村

主人士，处境非常危险。党中央和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指示东江抗日纵队秘密营救这批文化人。1942 年元旦开始秘密大营救，历时 200 多天，通过水陆两路从虎口成功解救了这 600 多位文化精英，然后再转送延安解放区。1 月 13 日晚首批文化名人 10 多人，由东纵秘密护送越过敌人封锁线，经新界元朗过深圳河走梅林坳到达宝安阳台山脚下的白石龙村。他们在山村受到东纵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副司令员王作尧的热情接待，吃了一顿客家焖狗肉。经过一段惊险的路程劳累，到了游击区后方欢聚一堂，吃狗肉，喝烧酒，文化人高兴异常，酒酣耳热，唱起抗日革命歌曲。胡绳、沈志远、张友渔、萨空了、于伶、丁聪等文化人士为东纵指战员讲授了新闻、哲学、文学等文化课。何香凝和柳亚子一家脱离虎口后赋诗一首："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柳亚子也赋诗道："芦中亡士气犹哗，一叶扁舟逐浪花，叵岁羁魂宋台石，连宵乡梦洞庭茶。轰轰炮火惩倭寇，落落乾坤复汉家。挈妇将雏宁失计，红妆季布更清华。"茅盾于 6 年以后在《脱险杂记》的回忆录中，也专门记载这段脱险经历和吃狗肉逸闻，这珍贵的历史场面和吃狗肉的欢乐情景，永远流传青史，也定格在英雄羊台山人民心里。

我老家羊台山人说起这段"狗肉威水史（自豪史）"，无不津津乐道。有人说狗年不吃狗肉，难道鸡年不吃鸡，牛年不吃牛肉？说狗通性，看门、守猎、忠于主人、智救养狗人等等，只能另文叙述，本文只写当地风俗，吃狗肉。

清嘉庆《新安县志·卷三物产》载有："茶产邑中者甚多，其出于杯渡山绝壁上者有类蒙山茶，烹之作幽兰茉莉气，缘山势高得雾露以滋润之故，味益甘芳，但不易得耳。若凤凰山之凤凰茶，担竿山之担竿茶消食退热，以及竹仔林之清明茶，亦邑中之最著者也。"三洲田地处深圳梧桐山的余脉，连绵数里，面对浩瀚的南海，终年雾霭缭绕，非常适合茶叶生长。三洲田茶，是山茶，即摘即炒，不发酵，属绿茶类，很有香气，茶汤色泽清绿，耐泡，喝后甘甜，滑舌，凉喉，那时在深圳小有名气。

三洲田绿茶与饮茶

深圳人说喝茶，非常斯文地称作"饮茶"。"饮茶"有两层意思，一为解渴，饮茶壶茶叶泡的茶；二为喝早茶，吃点心，通常说的食早餐。改革开放后，广东饮早茶的习俗风行大江南北，广东人钟爱的"凤爪"、烧卖、腐竹卷、鱼云、肠粉、及第粥、艇仔粥、鱿鱼须、叉烧包之类的小吃和点心，走向全国各地的"广式酒楼"。

旧时深圳人饮不饮茶？深圳有没有产茶？

清嘉庆《新安县志·卷三物产》载有："茶产邑中者甚多，其出于杯渡山绝壁上者有类蒙山茶，烹之作幽兰茉莉气，缘山势高得雾露以滋润之故，味益甘芳，但不易得耳。若凤凰山之凤凰茶，担竿山之担竿茶消食退热，以及竹仔林之清明茶，亦邑中之最著者也。"

"杯渡山"在什么地方？该县志又云："杯渡山在县南四十里，高峻插天，原名羊坑山，一名圣山，南汉时封为瑞应山。"县南四十里，即古代南头城南面四十里，即今蛇口海湾对面的今香港新界屯门辖区，如今屯门市镇亦有座"杯渡禅寺"。杯渡禅寺在杯渡山，因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公

元428年），高僧杯渡和尚从西域历经万水千山，到此驻跸建寺、传经，最后圆寂而出名。“凤凰山”呢？县志续云：“凤凰山在大奚山帐内，双峰插霄，形如凤阁，与杯渡山对峙，中有神茶一株，能消食退暑，但不可多得，土人于清明日上山采之，名曰凤凰茶。顶有小石，祈雨多应。”与杯渡山对峙，应为与新界屯门隔海相望的我市宝安区福永镇凤凰山，凤凰山古有著名凤凰岩，宋元时期就建有香火鼎盛的凤凰庙，清代新安县知县郑文炳还留下《秋日游凤凰岩》和《杯渡山》两首诗词。不过，“神茶一株”，我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甚至近几年多次游凤凰山，却一直未见。

凤凰山神茶未见过，杯渡山的蒙山茶亦未饮过，所以无法知晓“幽兰茉莉气”，何以“味益甘芳”。也许此茶，在数百年间发生了变迁，如明朝时期的《茶谱》记载着各地名茶，就没有提到浙江龙井、福建武夷、安徽祁门和云南普洱一样，专研究茶叶史的学者都慨叹：“古今名茶常有变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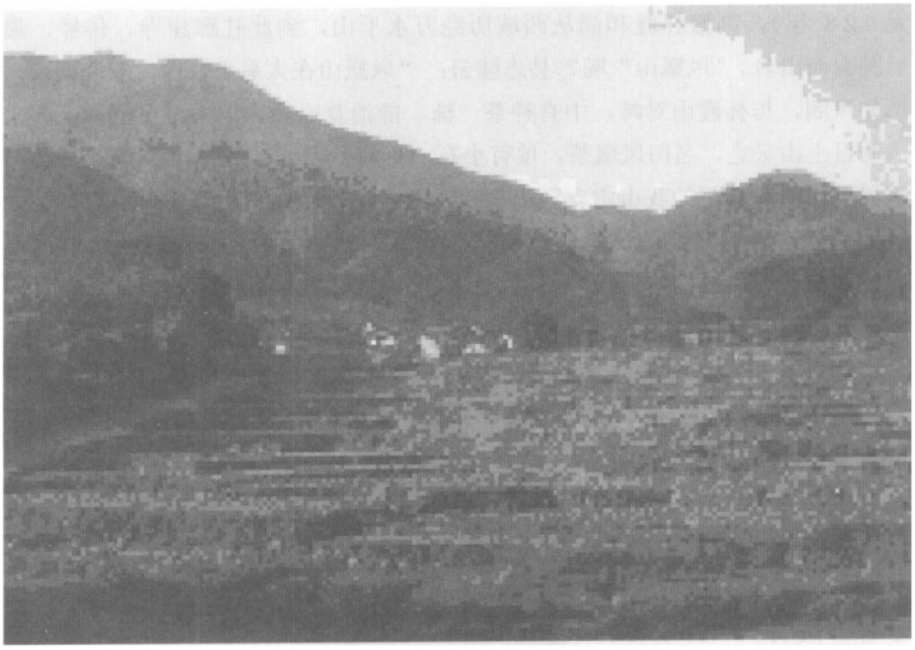
深圳人饮茶，喜欢吃上凤爪、烧卖、腐竹卷等点心

茶字，最早写作荼，自唐朝以后，始变作茶字。因为荼有三义：一是苦菜，二是茅秀，三才是我们今天的茶，大概是太容易混错了，故所以唐人改荼为茶，以作专称。

茶，还有许多别称，唐代茶圣陆羽《茶经》中说：“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此槚子见于《尔雅》，蔎是蜀西南的人称茶为蔎，茗是晚收的茶，或叫做荈，与茶是早收有别。现在称茶只有茶茗两字，已不分为早收或晚收了。

茶最早产生大约是在蜀地，自秦人取蜀以后，茶便移植各地了。所以饮茶是始于秦汉，据说此前是没有饮茶这回事的。如《周礼天官·膳夫》“凡王饮六清”，它的注释说：六清是水、浆、醴、涼、医、酏而没有茶。水即水，浆是米汁，醴是淡酒，涼是凉汤，医是浊浆，酏是薄粥。你看，王者都没有茶喝，民间更不用说了。

茶遍及各地，因各地气候、土质、水分有别，所以各地茶品有上下之分。陆羽《茶经》，山南以峡州，淮南以光州，浙西以湖州，剑南以彭州，浙东以越州所产为最上品，其他黔中、岭南未详。大抵最早的古人饮茶，并不怎样讲究



茶山

茶叶，至唐陆羽著《茶经》后，方才讲究起来，喝名茶，喝上品茶。到了清代，茶又有红绿茶之分，红茶以武夷山的乌龙，绿茶以龙井的雨前为最负盛名。

品茶的上下，不仅讲究茶叶产地，还讲究煎茶用的水。这又是陆羽首创其法，他以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又判各地的水，以楚水为第一，无锡居二，晋水为最下，共分为二十水。讲究茶叶，讲究水质，还须讲究煮法。《茶经》说及：“其火用炭，次用劫薪。”又说：“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以上水老，不可食也。” 意思是煮时只可三沸，不可再多，否则便老不可饮。文人雅士除自斟自饮外，客来访也必请以茶；有时客不来，也前去邀他三五知己，边品茗茶，边琴棋书画，悠然自得，享受人生。

我等一干人是上班一族，对这种桃花源幽居生活，羡之又羡。曾几何时，喝了几十年的茶，正而巴经用全套茶具泡工夫茶来喝，可以屈指可数。因为上班，都是匆匆忙忙抓把茶叶往怀里头一放，冲上开水，就这么喝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要是哪天用上小茶壶，不是来了朋友，就是光临贵客；要是用上大茶壶，肯定是开会，不是我泡给人喝，而是人泡给我喝。

我喝什么茶，是看身体和经济条件而定。后生时，身体有本钱，可荷包没钱。那时多在家乡自摘山茶，自制农家咸茶；石岩羊台山是座天然“茶场”，采之不尽，摘之不竭。大凡头烧脑热，口臭生疮，感冒头痛，风



饮功夫茶

寒风热；家乡的山茶、咸茶一泡，茶到病除。此时，“喝茶”实际上被喝药功能代替。乡人嫌喝药不吉利，喝凉茶既有茶的好名声，又含有药用功效，一举两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深圳这座县城县机关工作时，我有机会出差下乡到大鹏七娘山、葵涌排牙山、龙岗红花岭、坪山马峦山、盐田三洲田、横岗梧桐山、西丽塘朗山、石岩羊台山、观澜青湖等地乡村大队，带回当地自种自摘自炒的绿茶，和几位朋友欣赏、品味。如今最有印象的数坪山马峦茶和盐田三洲田茶。

三洲田，是深圳最高山峰梧桐山的余脉，座落在盐田、沙头角境内，山不太高，但连绵数里，面对浩瀚的南海，湿气重，终年雾霭缭绕，非常适合茶叶生长。三洲田茶，是山茶，即摘即炒，不发酵，所以归属绿茶类，很有香气，茶汤色泽清绿，耐泡，喝后甘甜，滑舌，凉喉，在深圳小有名气。

那时以粮为纲，茶场不在发展之列。人们要喝茶，只能在山前屋后，抑或“崩岗坑肚”贫瘠地小面积种一些，农家自摘自制，茶做得好的不外乎三几家。他们采茶心细，搓茶细腻，工序火候到位，茶条样好，色香味俱佳。但是，深圳市面上是没有三洲田茶、马峦茶售卖的。能喝上深圳当地这两款名茶，多数是亲戚朋友送的，或者干部落乡由当地农家盛情相送的。如果在清明前后，得到三几两，那可够金贵的了，执上一小撮，泡在茶壶里，叫来几位文友慢慢啜

情还舒坦了一整天。

随着改革开放年月的推进，也学起香港人喝红茶，加奶加糖，是西人说的“奶茶”。奶茶不是正宗“茶”，喝不惯。随后，又跟香港人时兴喝普洱茶。普洱茶味道怪怪的，泡浓了，像喝药，深褐色茶汤，涩中带苦；泡淡了，没有茶香味。喝多了，牙齿渍黄，也喝不惯。十几年后，兜兜转转，不知从哪刮来一阵风，说普洱茶保健，人们又时髦起普洱茶了。然而，我和家人在酒楼饮早茶，多数喝铁观音，喝习惯了。一上茶楼，甫一坐下，侍应小姐问喝什么茶，当然是福建铁观音、潮州凤凰茶、梅州单丛之类了，那神态，一点儿也用不着犹豫、思索。

近些年，喝茶喝得最深印象的有那么三几次。一次是好几年前，随市农业考察交流团到了台湾，在著名的阿里山上参观考察了几个冻顶乌龙茶茶场。茶场以茶农户为单位自占山头，自家种植，自家采摘，自家制作。茶叶由茶农自由组织起来的茶合作社协助收购销售，几十户茶场连成一片，蔚为壮观；高山流水，云雾缭绕，吸引一批又一批的观光游客。我们被领进一个茶庄，庄主老婆、儿子、媳妇、女儿各自忙碌现场做茶，挑拣茶叶分等级等。庄主拿出分别在1千多米、800多米等高山采摘制作的冻顶乌龙茶，让我们品尝。我首次尝到万多元台币（约2500元人民币）一斤的冻顶乌龙极

茶客常说，新茶是宝，隔年是草。我们收到朋友相赠或自己买的新茶，都邀请老友来“叹一叹”，聚一聚，尝尝新。老茶、陈茶、隔年茶，不好意思叫人家来饮，只有像往年一样，抓撮茶叶往杯里泡，自个自喝。最近，我跟家人去了一趟云南，旅行社导游一路领我们“顺路”进了几个茶庄，“免费”看茶道表演，喝了云南普洱茶，特别见识了一棵千年树龄高40多米的“茶王”照片。我印象茶树是灌木不是乔木，采茶姑娘背着背篓采茶，很有田园诗意；云南普洱茶这么高，怎采摘？更没想到云南的普洱茶，越陈越值钱。据报载，鲁迅收藏的几块普洱茶砖，后人只拿出一两块拍卖，小小一块茶砖竟然卖出一万多元天价。

喝了几十年茶，如今喝糊涂了。茶，越喝越贵，越买越不敢买。三两百元的无法喝，七八百元的不能常喝。在外旅游途中茶庄上喝的味道不错，买了同一款的，盯着她包装，小心带回到家里一泡，还是走了样；而价格呢？在产地买却出奇地比深圳贵了许多。

还有，茶本来就是天然的，现在这年头，人们怕化学肥料，怕农药，喝上怕坏了身体。精明的商家灵机一动，“以人为本”，在茶叶包装显著的位置上，打上“天然”旗号，过段时间怕人家怀疑不是天然，便加上“纯天然”的字样，过段时间又加上“纯天然绿色环保”茶。

过了段时间不怎么好卖，商家便加上“正宗天然绿色环保”招纸，过段时间再加上“极品正宗纯天然绿色环保”茶，如此加法，恐怕最后得冠于“人类放心极品正宗纯天然绿色环保”茶了。

幸亏，我身体没本钱，虚寒底子受不住浓茶，悄然改饮无色无味的白开水了。喝茶，成为回忆。回忆也是种享受……

清嘉庆《新安县志·物产卷》记载："沙梨叶如柿叶而大，二三月开花，六七月子熟，其大如瓶，其小如杯，肉白无渣滓，其甘如蜜，可疗热症。有青梨、黄梨、蜜梨三种，产乌石岩者佳。"石岩出产的柿子，果大、味甜、品种多，最大的特点就是柿子红熟了，它的蒂仍然青绿色，邑人甚至省港澳市民在中秋赏月，抑或初一、十五拜神祭祀，尤其喜欢这蒂绿果红的石岩柿子做供品。

羊台山名果沙梨和柿子

深圳市宝安区羊台山北麓的石岩、龙华一带，历史上有三大名果——沙梨、柿子和李子。

180 年前记载的石岩沙梨

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 1819 年）重修的《新安县志·物产卷》记载："沙梨叶如柿叶而大，二三月开花，六七月子熟，其大如瓶，其小如杯，肉白无渣滓，其甘如蜜，可疗热症。有青梨、黄梨、蜜梨三种，产乌石岩者佳。"

不知古人说的"瓶"和"杯"的概念是指哪种瓶哪种杯，形状有多大。我在乡下时，小的梨有如成年人拳头般大，大的梨有如碗口般粗，最大的跟旧时漱口盅大，重达半斤至八九两。

羊台山的梨，有青梨、黄梨和蜜梨三种。石岩大面积种植的是黄梨。黄梨的皮跟红土壤一样暗褐红色，隐有浅浅的白花点，像点缀了一层沙点，由此当地人称之为沙梨，也有人叫红梨。沙梨多种在羊台山沟壑坡地上，沙质土，加上光照时间长，梨多果大。别看皮红"其貌不扬"，但皮薄，轻轻削去

外皮后，雪白雪白的梨肉，松脆，多汁，甘甜。小时候放暑假，我们一帮孩童结伴攀登羊台山，在梨园里偷摘几个大沙梨，丢到山潭里泡。然后，在山潭里游泳半把个时辰，大家“扎猛子”潜到山潭底捞起沙梨，坐在潭边礁石上吃着如“冰镇过”的沙梨，甜到肚，凉入心，暑热顿消。

清人屈大均著有《广东新语》描述：“予所居覆船山下曰沙梨园，地皆黄细沙，多井气，掘地尺许，水泉上溢。天大雨，水迸出庭际。所食井深四尺许，冬不干涸，味甘冽。上有梨一株，根得美泉滋沃，结实独异，以二月花者八月熟，九月花者正月熟，岁凡两熟。正月熟者曰雪梨，稍小，味益清。叶凡二落，落于七月者深红，于正月者色微紫，予斋中煮茗多用之。树甚古，作五大柯，横直者半，直者高出檐端。月夕布影扶疏，叶丹花白，离离相间，若在罗浮老梅之下。予诗云：‘春来始落叶，叶尽梨花开。’”



羊台山牌楼

羊台山沙梨，只有羊台山才有。深圳梧桐山、大鹏七娘山、葵冲排牙山没有。据我所知公明、松岗、福永、沙井、西乡到蛇口一带平原沙田没有种植；盐田、横岗、龙岗、坪山、坪山、坑梓一带丘陵山岭都少见梨园耕种。深圳中部的布吉、观澜、龙华、石岩属羊台山脉系，都有种植沙梨，其中布吉坂田村较有名气。最出名的还是近一百多年前《新安县志》记载的“产乌石岩者佳”。

乌石岩，是石岩镇古称，源之其境内有许多黑色的花岗岩巨石。石岩沙梨不仅质优，而且产量大，种植面积广。那时，一到开春，水田、官田、泥光、罗租、龙眼山、应人石、白芒、麻勘等近十多条村，把羊台山北面围了个小半圈，每个山头都开满梨花、李花、梅花和桃花，一层一层，从坡地漫入山坑，像北方大雪层层铺盖，白皑皑一片，十分壮观。夏天收稻谷前后，李子、沙梨、柿子相继结果，挂满果树。供销社收购到的果子，几个篮球场都装不下，要每天及时调拨大货车，运往深圳镇县城，出口港澳地区，同时一部分由石岩凉果场加工，腌制成各种蜜饯、干果，源源投放市场。

梨，有“果宗”、“蜜父”之称。《宋书·张邵传》：“梨为百果之宗。”宋陶谷《清异录》有“建业野人种梨者，诧其味曰蜜父。”也许古人囿于自然条件，尝果有限，未知果王榴梿、果后山竹；今人面对琳琅满目的百果，对梨说成是“果宗”、“蜜父”，有可能不予认同。但不管如何，梨是可口水果，含丰富

维生素，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据元朝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云：“梨者利也，其性下行流利也。”是梨因利而得名。又宋罗愿《尔雅翼》云：“梨，果之适口者，剖裂以食，故古人言剖裂为剖梨。”是梨又有剖的意思。梁陶弘景《本草注》云：“梨种殊多，并皆冷利，多食损人，不入药用。”李时珍却反对其说，他在《本草纲目》中云：“陶隐居言梨不入药。盖古人论病，多主风寒，用药皆是桂附，故不知梨有治风热、润肺、凉心、清痰、降火、解毒之功也。”羊台山乡人，对热症咳嗽，或冬季天气干燥，盛火攻心，多数会取将梨两个，削皮，切块，放冰糖，或加雪耳，隔水炖两碗水饮之，热症消除，热咳自愈。

红柿熟透蒂仍绿

羊台山下石岩、龙华镇出产的柿子，除了果大、味甜、品种多等特点外，最大的不同就是柿子红熟了，它的蒂仍然青绿色，当地人、广府人甚至港澳同胞在中秋赏月，抑或初一、十五拜神祭祀，尤其钟爱这蒂绿果红的石岩柿子。所以，市场果摊上如果几个产地的熟红柿子一起摆卖，人们就一眼就会把石岩柿子区别出来，抢先购买。


硕果累累的沙梨树

因而，石岩柿子曾畅销港澳和广州、佛山、东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

石岩柿子按形状分有方柿、花箩柿和红团仔柿。顾名思义，方柿就是柿子带扁身方形；花箩柿子和红团仔柿像雪梨一样果型稍长，花箩柿和红团仔区别在于：花箩柿底部有一圈圈像竹箩一样的花纹，而红团仔柿没有。三种柿子一样鲜甜。当地人习惯多数用方柿“藏熟”，让它变成熟透红软柿，拜神作供果。因为方柿方形底平，放在供桌供盘里平稳、色靓、大红吉利。花箩柿和红团仔柿多数腌制，叫咸柿，也叫水柿。

柿子带有一种果胶，生摘下来不能像其他水果马上可吃，必须加工“藏熟”或腌制，才能除去涩味。石岩柿子按制作方法分有“藏柿”、“腌柿”和做“柿饼”三种。“藏柿”，旧时石岩果农家家都有二三个巨型木笼，每个约长宽二三米高一米多的木笼可装二三担柿子。首先将木笼底铺层薄薄的棉絮，然后把摘下来的柿子一个个整齐地排列箱笼里，一层层垒叠，垒叠到笼面再铺一层棉被，箱子里四个角点燃几炷香，盖上箱笼盖子，“闷”它五六天，青柿子变成黄

柿子，再由黄柿子变成红柿子。这种“藏柿”也叫香火藏柿。这是民间家庭式做法。以后供销社大量收购加工，就改为用一间屋子，堵住所有门窗，将一箩箩一筐筐的柿子层层叠好，在屋子里用炭火或电热器加温“藏柿”。柿子红熟透，软绵甜美。

“腌柿”有两种，一种是用盐水泡腌，这是一般家庭少量腌制做法，先把瓦瓮洗净，用七月初七挑来的“七姐水”放盐拌匀，然后把青柿子放进去泡它十天左右，柿子去掉涩味，变成生脆鲜甜。另一种是镇供销社凉果场大量腌制，就用水泥筑几个大水池，每个水池兑着盐水或石灰水，倒进几百斤柿子腌泡十天半月，制好的“腌柿”就投放市场。做“柿饼”较为费劲，要用大量人力将每个柿子的皮削去，要看天气好坏拿出晒场翻晒，晒成半干湿，压扁，上米粉防黏，就制作完成。当然，后来凉果场就不用靠天吃饭，改用烘炉烘干加工了。

据宋苏颂《本草图经》记述：“柿南北皆有之，其种亦多。‘红柿’所在皆有，‘黄柿’生汴洛诸州，‘朱柿’出华山，似红柿而圆小，皮薄可爱，味更甘珍；‘稗柿’色青可生啖。诸柿食之皆美而益人；又有小柿谓之‘软枣’，俗呼为‘牛乳柿’。今又以青柿置器中自红的叫‘烘柿’，曰干的叫‘白柿’，也称‘柿饼’，火干的叫‘乌柿’，软枣的也叫‘猴枣’。柿性寒，所以医家相传，不可与蟹同食，因两物皆寒，否则使人腹痛作泻，但用木香可解。”



石岩柿子和沙梨

在北方，柿子又有凌霜侯之称，并流传一个与明太祖相关的故事。明人《在田录》云：“高皇徽时，过剩柴村，已经二日不食矣。行渐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园，垣缺树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叹久之。缓步周视，东北隅有一树，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饱，又惆怅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经于此，树犹在。上指树以前事语左右，因下马以赤袍加之曰：‘封尔为凌霜长者’，或曰凌霜侯。”

想不到普普通通的一种柿子，还有几百年的典故；我想，明太祖肯定没吃过石岩柿子，但在抗日战争年代，坚守在羊台山革命根据地的东江纵队健儿，不少吃过当地的红柿、沙梨或野果，渡过那艰难的岁月，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清康熙《新安县志·物产》记载："荔枝树高丈余，或三四丈，绿叶蓬蓬，青花朱实。实大如卵，肉白如肪，甘而多汁，乃果之最珍者。故苏玉局诗云：啖得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其种不一，曰大荔，曰黑叶，曰小华山，曰状元红。俱于仲夏成熟。"南山桃最有名气的叫鹰嘴甜桃，"尾笃像鹰嘴"桃个大，纯属良种，卖相像仙桃，如水蜜桃般大小，吃起来口感爽脆、鲜甜，不同吃水蜜桃软绵多汁的感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别的桃咬几口不吃，一会就变枯黄色，嚼烂吐在地上，一两天就长出小虫；而南山桃吃了一半，放半天不变色，有人试验嚼烂桃子粘在白墙上，只会阴干不见长虫。因此，港澳地区和当地人，喜欢南山桃做寿，拜神作供果。

南头荔枝南山桃

荔枝是岭南的古老佳果。古老到何等程度？深圳曾发现有一棵千年荔枝王树。百多二百年的荔枝树，俯拾即是。早在300多年前清康熙年间编的《新安县志·物产》就有记载："荔枝树高丈余，或三四丈，绿叶蓬蓬，青花朱实。实大如卵，肉白如肪，甘而多汁，乃果之最珍者。故苏玉局诗云：啖得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其种不一，曰大荔，曰黑叶，曰小华山，曰状元红。俱于仲夏成熟。"

深圳荔枝除个别镇没有种植外，从东部的龙岗到西边的松岗，从南面的蛇口至北面的光明农场都有分布，最负盛名的首当南头荔枝。上世纪80年代开放改革后，南头属经济特区内，土地被大量开发，荔枝园被占，荔枝树锐减，相反宝安区公明镇楼村大力发展优质荔枝，种植几十万棵，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号称"中国荔枝第一村"。

南头荔枝

为什么叫南头荔枝？当时宝安有民谚："龙岗鸡，大鹏鲍，南头荔枝

沙井蚝，石岩沙梨金龟桔，还有深圳云片糕。”之所以叫南头荔枝，因为过去南头管辖范围比南山大，南山仅指大南山、小南山一带几个小村，而南头则包括赤湾、南头城、西丽一大片。

说起南头荔枝就要说“南头”的来历，南头是指南头城。南头建城有600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恩准南粤平定海匪大将花茂的奏章，在深圳南头、大鹏两地设“守御千户所”，派广州左卫千户崔皓监工筑城，同年完工。清嘉庆《新安县志·卷七》：“邑城在城子岗……周围连子城共578.5丈，高2丈，面宽1丈，址广2丈，门四东曰聚奎，西曰镇海，南曰宁南，外曰迎恩，北曰拱辰。万历元年首任知县吴大训谓北门当县治之背，正对来脉，开门非宜，因塞之，只通东西南三门。”

这座城之所以叫南头，据民间相传，认为此城面南向海而建，城南有南山，山下有南山村、南园村，而城坐向南的山头上，故名南头。

南头坐落南山半岛，东面是阳光充沛的丘陵，西面是土地肥沃的珠江口滩涂，气候适宜，雨量充足，非常适合荔枝生长。据上世纪80年代统计，南头荔枝种植面积1.2万亩，荔枝树21万株，其中20年以上挂果荔枝树8万多株，正常年景总产量适2.5万担。尚存百年以上老荔枝树300多株，有株糯米糍“荔枝王”至少有210年树龄；南山区大堪村也有株200多年的“荔枝后”，树的围径6米多，需4个人合抱。南山南头半岛到处是浓荫墨绿的荔林，挂果时红红的荔枝压满枝头，远望似一片红霞，马路穿林而过，路旁伸手可摘。


著名的南头桂味荔枝

荔枝，古称离支，司马相如《上林赋》作荔枝为“离支”。唐白居易《荔枝图序》：“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说得荔枝得当日吃，过后不新鲜。此离支之名或取其义，离荔音相同焉。

朱应《扶南记》：“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必以刀斧割取其枝，故以为名。”《本草》亦谓荔枝木坚，子熟时须刀割下。今琼州、粤人当荔枝熟，率以刀连枝砍取，使明岁嫩枝复生，其实益美。故汉时皆以为离支，言离其树之支，子离其枝，枝复离其支也。

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云：“南方离火之所出，荔枝得离火多，故一名离支，亦曰丽支。丽，离也。日出于离，离尽午中，故丽支以夏至熟。离为坤之中，其色黄，故曰黄离。丽支之核，外赤而内黄，则黄离之美也。坤之中其味甘，故曰甘节，丽支之肉，少酸而多甘，则甘节之

吉也。又荔枝核之小者名节核。”

荔枝品种有十多种，越早上市，生长时间短，果质越欠佳，大部分为核大、肉薄，味略酸。比如农历三月熟者曰三月青，俗称“三月红”，深圳少产，多是产于海南、湛江高州。“四月熟者曰犀角子，七夕曰七夕红，而大熟于小至。以蝉鸣为候应，此时熟者曰金钗子，实大核小，昔人解金钗而得其种，或谓即黑叶也。荔支叶青绿，此独黑，故曰黑叶。”（屈大均语）深圳农历四五月“大荔”、“状元红”、“妃子笑”、“黑叶”登场。杜牧《华清宫》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妃子笑”扬名千古，许多人误会岭南“妃子笑”进贡长安，其实应该是四川“妃子笑”，那里路途比广东近，如果是广东荔枝即便“五百里加急”进朝廷，运到长安，荔枝已变坏了，怎能让妃子笑？

深圳最有名气的荔枝，数南头的“桂味”和“糯米糍”两个珍品，果大、皮薄、肉厚、核小（俗称如米粒般小的“椒核仔”），非常甘甜，“桂味”比“糯米糍”还多一个特点，味道略带桂花香味，果肉口感带爽脆。一般“糯米糍”比“桂味”果大，七八个就有一斤，市面价格也比一般荔枝贵近一倍。“桂味”外壳带小“钉刺”，有点“顶手”。“糯米糍”外壳较“平滑”，有一条沟痕，这是区别“黑叶”、“妃子笑”等荔枝的主要外形特点，剥去外壳后，有一层蝉羽般白衣裹着冰脂似的果肉，如果用一小片卷烟纸包裹着，一天长达十多个小时此“衣”不干不黄，水灵灵，里面肉质不变，这就是正宗的南头荔枝！



上世纪 70 年代南头荔枝丰收 （何煌友 摄）

“桂味”和“糯米糍”摘果期也就十天半月，过了这十来天就“过趟”，“收水”了，荔枝没摘也会在树上自动“裂果”，“溜枝”掉地上烂掉，再也吃不到这优质果；要吃就只有“禾枝”、“怀枝”登场。“禾枝”顾名思义是在“割禾”时才成熟，“怀枝”全名为“尚书怀”，《广东通志》载：明朝尚书湛若水，从枫亭怀颗荔枝核回来，最初种于南海县西樵山上，当地人纪念他称它为“怀枝”。清代两广总督阮元（1763-1849）著有咏《怀枝》一诗：“不须夸署尚书衔，怀核归来味共参。此是白沙真种子，甘泉浸得水枝甘。”“怀枝”和“禾枝”均非珍品，但在整个荔枝品种中最为迟熟，在所有荔枝快要“过趟”消失时，还能吃上荔枝确

不失为怀念之“怀枝”罢了。

哪里的荔枝为最好？历史上就有文人相议，宋代蔡君谟在《荔枝谱》中认为天下荔枝，以福建为第一，四川居二，广东为三。他说广南所产的荔枝，早熟而肉薄，味甘酸，连福建中下等的也不如，自然也较四川低下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对蔡君谟予以驳斥：“以予论之，粤中所产‘挂绿’，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敌岭南之‘黑叶’，而蔡君谟谱乃云，广南州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蔡君谟断估没想到几百年后被人说成“乡下人没见识。”

说到荔枝最为名贵的世人公认是增城所产的“挂绿”，是封建社会专献给皇帝的贡品，极少人吃得到。据说现仅存半株，用铁丝网围住，一年产量极少，曾经有一年一位商人花5万元拍卖买到一个“挂绿”荔枝，说孝敬他的母亲。迄今为止，据我所闻最昂贵的荔枝，就算是这一颗增城“挂绿”了。

荔枝吃法除鲜吃外，又可用盐渍的咸荔枝、生晒荔枝干、做荔枝罐头三法，方便久藏。当年宝安县南头罐头厂生产荔枝罐头、鲜桃罐头、蚝豉罐头等系列产品曾名噪一时，蜚声海外。还有一种食法叫“宿井”浸荔枝，今人已没有此举，只有屈大均《广东新语》曰：“荔枝惜花，龙眼惜子。”“荔枝十花一子，龙眼一花十子。”“荔枝宜肥，龙眼宜瘠。”又“荔枝之阳子甜，龙眼之阴子甜”。语曰：“当日荔枝，背日龙眼。”予诗：“龙眼独从阴处长，荔枝先向日边红。广南人当摘时宿之井中，沃以寒泉，火气既去，金液斯纯，以正阳精蕊，斯为神仙之食。”予诗云：“露井寒泉百尺深，摘来经宿井中沈。日精化作月华冷，多食令人补太阴。”

谚云：“饥食荔枝，饱食黄皮。”深圳多荔枝，正值酷夏炎热，荔枝多食，上火伤人，俗称得“荔枝病”，饮蜜一杯即解，或以生盐调白开水饮，或以荔枝壳煲水饮，民间又有吃饭时吃多几块咸鱼的治法。所以，每逢荔枝上市旺季，医生和家人多嘱“一颗荔枝三把火”，切不可开怀痛吃之。

南山桃

早时，有人说南山桃比南头荔枝还要出名，你问何以见得？他们就以那句民谚为证：“大鹏鲍，沙井蚝，南山桃，还有深圳猪油糕。”

南山桃出名出在哪？有什么特点？据我所知，南山桃品系列最有名气的叫鹰嘴甜桃，“尾笃像鹰嘴”，桃个大，有如北方水蜜桃般大小，要知道以前人们种桃没有现在的科学嫁接、化肥和种植方法，当地其他村镇种的桃个小、味淡、毛多，而南山桃纯属良种，卖相像仙桃，吃起来口感爽脆、鲜甜，它完全不同吃水蜜桃软绵多汁的感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别的桃咬几口不吃，一会就变枯黄色，嚼烂吐在地上，一两天就长出小虫；而南山桃吃了一半，放半天不会

变色，有人试验嚼烂桃子粘在白墙上，只会阴干不见长虫。这就是正宗南山桃。因此，港澳地区和当地人，非常喜欢买南山桃做寿，拜神作供果。

桃字从木从兆，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解释道："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后人对于桃字，确如李时珍所说，含有多的意思，所以诞辰宴客，称为桃樽；送人寿礼，称为桃仪；还有送寿用的馒头，称为寿桃。

民间把桃称作寿桃，可能出自《汉武帝内传》里的一个传说："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命侍女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吃。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自周朝开始，认桃为仙木。

既然桃为仙木，自然能制鬼，避邪驱疫。《典术》一书云："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故压伏邪气，制百鬼。"庄子亦说："插桃枝于户，运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桃在果木之中，本来是最普通的，不足为其，可是古人把它当做仙木，当作仙果，有学者认为是方士道家附会出来的，因为桃道同音，道家特别钟爱的果子。不管怎么说，南山桃长在南山，古有"寿比南山"说法，所以正宗的南山桃为世人所喜欢，希望沾点"仙气"，长寿。

我吃过不少南山桃，虽没沾上什么仙气，但吃桃有营养，这却是千真万确。我除了吃过南山桃，还在1981年去北京吃过水蜜桃，记得当时卖2元一斤，我一下子买了10斤，几个人游长城，坐在长城垛口吃，多汁甘甜，直沁心扉，二十多年仍印象深刻。也吃过天津、上海、山东、浙江奉化的桃，它们都要等熟透、软绵才吃，不像深圳南山桃，脆生生，甜津津。

据古书记载，桃品甚多，以色分有红桃、绯桃、碧桃、缃桃、白桃、乌桃、金桃、银桃和胭脂桃。以形分有绵桃、油桃、御桃、方桃、扁桃、偏核桃。以时名者分有五月早桃、十月冬桃、秋桃、霜桃等。我生在南国，也许孤陋寡闻，觉得这里头许多品种也许已逐渐消亡。就算南山桃，在1978年，一场大虫害侵袭大小南山，南山桃"染"上流胶病、桃穿孔病、炭疽病和蚧壳虫害等，果农纷纷把2000多棵病死桃树挖起毁灭，种上荔枝树。就这样鹰嘴甜桃树已找不到一棵，南山桃名果已名存实亡。尽管2001年当地抢救当地名种，在山旮旯里找到幸存的一棵，经嫁接试种30亩，但已元气大伤，一时难以振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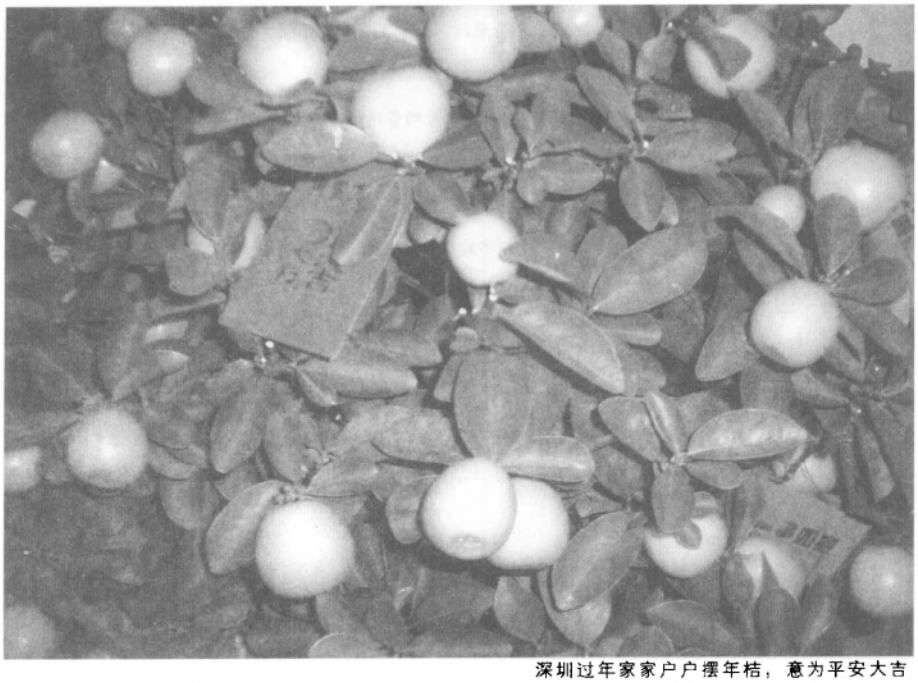
金龟桔，产于龙岗区坪山镇，此桔外皮有自然龟裂的花纹，金黄黄的桔皮点缀褐色的龟纹，所以叫金龟桔。龟，在民间被视为有灵性和长寿的吉祥物；金龟桔自然成为人们寿宴、拜神和送礼佳品。金龟桔，皮薄、水多、肉厚、籽少、汁甜。改革开放之初，金龟桔售价不高，果林发生病虫害，农民可能废枝不种，加上经济建设迅速，征用这一大片桔林地，果园没了，金龟桔也只有名无实了。

坪山金龟桔与年桔

坪山金龟桔，跟南山荔枝、石岩沙梨、大鹏鲍鱼、沙井蚝、云片糕齐名，都是深圳名优特产。

金龟桔，产于龙岗区坪山镇，此桔外皮有自然龟裂的花纹，金黄黄的桔皮点缀褐色的龟纹，所以叫金龟桔。龟，在民间被视为有灵性和长寿的吉祥物；金龟桔自然成为人们寿宴、拜神和送礼佳品。金龟桔，皮薄、水多、肉厚、籽少、汁甜，但产量不高，种植面积不大，仅限于坪山至坑梓一带山旱地，葵冲、大鹏、盐田一带海风大，常把刚开的花、刚结的小果吹得掉下来，种不了。所以能吃上金龟桔的人不很多，说实话我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去坪山时吃过，改革开放后，金龟桔售价不高，农民无心种，果林发生病虫害，可能废枝不种，加上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交通和建立工业区，征用这一大片林地，果园没了，金龟桔也只有名无实了。

桔、柑、橙、柚，许多外地人混淆不清，粤人称蜜橘为“柑”，而粤中真正的柑，沪人又称之为“广橘”，相反粤人却分得清清楚楚。据当地人经验，果实外形正圆，色黄赤，皮松纹细，多汁甘甜的叫柑。正所谓



深圳过年家家户户摆年桔，意为平安大吉

柑字言其果味“甘”，故字从甘。柑，论种植历史，当数惠州市博罗县，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唐有御柑园，在罗浮。按罗浮柑子，开元中，始有僧种于南楼，其后常资进献，其属有赭、黄二色，大三寸者，黄者柑，红者橘也。化州有橘一株在署中，月生一子，以其皮为橘红，瀹汤饮之，痰立释。襄亦进御，今为大风所拔，新种一株，味不及。化州故多橘红，售于岭内，而产署中者独异其类。”柑，论好吃，数外皮皱巴巴的“槽皮”柑——“潮州柑”，产于潮汕地区。“潮州柑”宛如杯碗一般大，比桔子大两三倍，手一掰，皮厚肉也厚，一瓣瓣吃之，甜津津。深圳没有哪个村镇大面积种植的柑园，所以名气不大。桔子则不然，坪山、坑梓、葵冲、布吉、龙华、观澜、石岩、公明、松岗、南头均有种桔，但都没有像博罗柑桔场（县级建制果场，解放初我宝安县副县长、粤赣湘边纵队老领导周吉任场长）、上千亩几十万棵那样上规模的柑桔园。

桔子，外形较扁圆，色淡红偏黄，皮薄而光滑，易剥，味道甘酸。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有云：“橘实小，其瓣味微酸，其皮薄而红，味辛而苦；柑大于橘，其瓣味甘，其皮稍厚而黄，味辛而甘。”他又解“橘”字之用意：“橘从矞，音鹬，谐声也。又云五色为庆，二色为矞。矞云外赤内黄，非烟非雾，郁郁纷纷之象。橘实外赤内黄，剖之香雾纷郁，有似乎矞云。橘之从矞，又取此意也。”据宋韩彦直《橘录》，橘种有十四，即黄橘、塌橘、包橘、绵橘、沙橘、荔枝橘、软条穿橘、油橘、

绿橘、乳橘、金橘、自然橘、旱黄橘、冻橘。这些橘，历经近千年，有的听过名，没见过橘，有的连名带果都没听过没见过，可能异化，也可能消亡了。时至今日，深圳人时兴的就有那么几种，按颜色分有朱砂桔、金桔仔，按形状分如食指般大小的叫四季桔，按酸甜度分有砂糖桔、酸桔仔，按观赏性分有盆桔，也叫年桔，专供春节期间家庭和酒楼、商场、宾馆和写字楼摆放装饰。

粤人有“高身橙，扁身柑”之说，也就是外形虽然都是圆，但相对来说，橙比柑长圆形，柑比橙扁身，也就是广东人说的较“企身”（高身）。其实，最容易分的是看剥皮，柑桔用手轻轻一剥就成；橙就较难剥皮，多数用小刀切成4至8片剥来吃。橙的味道较柑桔清香，但比柑稍酸，特别是从美国加州进口的金山“新奇士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兴了一时，后来因为较酸，逐渐被国内改良过较甜的“脐橙”占领市场份额。

广东较有名气的橙，当数“新会橙”和“红江橙”。

柑比桔大，橙比柑大，而柚又比橙大。柚，据陆佃《埤雅》云：“橙，柚属也，可登而成，故字从登；又谐声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述：“柚色油然，其状如卣，故名。”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大者曰柚，最大者曰锺柚，小曰逻柚，熟于早禾时曰禾虋，以其极圆，故曰逻曰虋也。”柚子论优质当属广西容县沙田中的“沙田柚”和广东梅州市的“沙田柚”。正宗沙田柚笃有一小圈凹印痕，柚肉微淡桃红色，水分多，甜夹爽，核籽小且少。旧时深圳没有像样的柚子园，只有农家在屋前屋后、菜园村边，偶种十棵八棵，结果自食；柚子开花香一片，柚子叶驱蚊虫，柚子叶还有一个用途，就是过年过节用它煮水洗澡祛邪，香港也有“入栅”（坐牢）出来的人用柚叶水冲凉，以图去“霉气”。

吃完柑橙柚后，柑皮、橙皮和柚皮，广东人舍不得丢弃，柑皮橙皮通常放在窗台、灶边或串成一串吊在屋檐下风干，晒制“陈皮”。陈皮“辛性温，主消肠胃中恶气，兼醒宿酲。”（屈大均语），是广东“陈皮、老姜、禾杆草三件宝”之一。陈皮用作蒸鱼、煲粥、煮红豆沙、绿豆沙的上等配料，香味独特。我曾两次到新会旅游，都买回著名的新会陈皮作家中自用，或馈赠亲友。不要以为陈皮价钱很贱，一般的也就是晒、藏三两年的陈皮为四五十元一斤，上十年二十年的陈皮要二三百元一斤，最贵的为六七百元一斤。皮比柑橙果贵几十倍到一百倍。至于被食品厂腌制成的“九制陈皮”是旅游佳品，被药厂制成“蛇胆陈皮末”或“川贝陈皮末”则是居家必备良药，价值更为可观。柚皮，则用糖做成蜜饯，和柑桔皮蜜饯一样，是广东名小吃。

买年桔，是粤人一道风俗。深圳、香港和广州人一样爱花，过年都特别喜欢逛“花街”，除了买切花、桃花回家插外，还家家户户买盆年桔摆在大厅显眼

的地方，象征“大吉大利”。家庭买的盆桔，带泥带盆树高五六十厘米，多数是金桔、四季桔，果多叶绿，树冠婆娑造型好，价钱通常五十元至一百元不等。商场、酒楼、宾馆、大公司写字楼等空间大，喜欢买一米五至二米经过修剪成圆柱型的朱砂桔树，结满数百颗红红果子的年桔，很有气派。买桔人，很讲究果子多，密密实实；最怕稀稀拉拉挂果，因为空隙多，广东话，空、凶同音，成为“凶多吉少”之意，犯忌。果多造型好的大盆桔，六七百元至一千多元一棵。不管是家庭买的小盆桔，还是商铺买的大盆桔，桔树都挂有内装崭新一元两元纸币的利市封，年桔树周围摆些芍药花、黄菊花和一品红等，生气盎然，把春节装扮得喜气洋洋，具有岭南的“年味”。

应节的年桔有那么广阔的市场，我不明白却没有人种植金龟桔，恢复这地方特产。10 多年前，台湾果农不顾岛上当局禁令，跨海来到深圳坪山镇碧岭村搞了一个生态果场，成功引进台湾莲雾、凤梨、芒果、杨桃等名果。我想，许多海（国）外花果在深圳引进培植成功，市场上又充斥美国、加拿大、澳洲和东南亚进口的水果，在这百果园中，多么希望坪山金龟橘出现在市场上销售，让这百年名果香飘鹏城，供我们子孙后代代代享用。

鲍鱼古称鳆鱼，属贝类海产食物。《宝安县志》载："宝安县盛产鲍鱼的地方，在大亚湾和大鹏湾的南澳镇、大鹏镇。鲍鱼生活在海底岩礁，过去靠人入海潜捕。"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海胆状圆而扁，围寸许，周身皆刺。破其壳，内皆红膏，烹食甘香异常，腌之亦佳。"海胆，有海洋古化石之称，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12亿年的生存史，在我国西藏高原，就曾发现海胆的生存遗迹。

大鹏鲍鱼与海胆

深圳，面临南海，拥有257.3公里海岸线和1145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历史上是广东省一个颇有名气的渔业重镇，盛产的鲍鱼、海胆、珍珠、生蚝、紫菜等名优水产品，一度名扬海内外。

捉摸鲍鱼和烹饪鲍鱼

深圳东部的大鹏半岛有天然优良水质和众多礁林石缝，历来盛产野生鲍鱼。

野生鲍鱼不能用网捕，不能用钩钓，不能用罾兜，更不能像紫菜海带那样方便采割，而是潜入深海中在礁岩里摸捉。鲍鱼吸附力很强，捉摸鲍鱼诀窍在于：发现鲍鱼在海底石壁上，看准了就一手用小铁铲迅速铲撬，一手托捉，要不然触动了它，再怎么弄，也掰不脱了。捉摸鲍鱼不仅考手疾眼快，还要考水性好。

夏天捉摸鲍鱼，光着身子潜水还挺爽的，要是冬季海水寒冷，北风呼呼，就不那么惬意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圳市面上没有鲜活鲍鱼卖，

要想药用或病愈补身子，就托朋友去大鹏买。大鹏街上亦没有得买，就要到东涌、西涌海边，等着下海的渔民把鲍鱼捉够一小篓了，才在岸上购买，那时是120元一斤(连肉带壳)，刚好是一只上海牌手表的价钱，相当于我当年工资的三倍多。由于价钱可观，引起许多人去捕捉。与大鹏不远的香港塔门岛情况一样，“塔门岛早期也盛产鲍鱼，而且还驰名远近，一般酒楼食肆无不慕名抢购，以飨嘉宾。鲍鱼之价格由此而抬高，乡民因鲍鱼有价，也就不分季节，日夜捉摸，同时引起很多外人加入，还动用‘潜水铜人’(初期之潜水工具)，日夜不停摸捉，使塔门海之鲍鱼，日益减少。”(《新界风物与民情》，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宝安县志》载有：“宝安县盛产鲍鱼的地方，在大亚湾和大鹏湾的南澳镇、大鹏镇。鲍鱼生活在海底岩礁，过去靠人入海潜捕。据称，上世纪50年代初期，宝安采捕鲍鱼180担以上。后因滥捕，资源破坏严重，鲍鱼产量日趋减少。1987年宝安县政府根据国家《渔业法》等，加强海政管理，并在南澳镇东山鹿咀、大鹏镇岭坳、下沙等地建立鲍鱼增养殖场，面积达2000余亩，1990年产量120担。1989年台湾商人在南澳镇兴办陆上的工厂人工养殖鲍鱼。1990年正式投产，并孵育了一批鲍鱼养殖。”


清蒸鲍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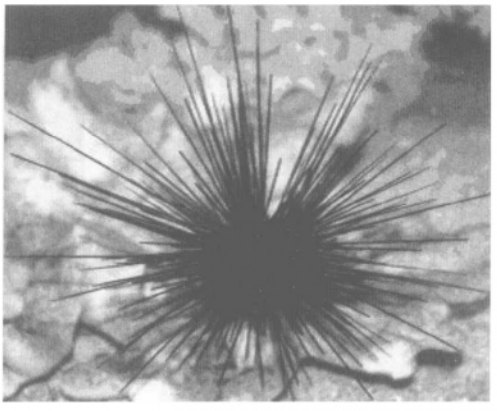
野生鲍鱼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人工养殖后，鲍鱼才走进平常百姓家，我等俗人方有了口福。鲍鱼人工养殖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参观过，看过台湾带过来的技术，吃过养殖场出品的鲍鱼，知道鲍鱼养殖对海水水质、温度、咸度要求很高。台湾商人投资前先来考察环境，汲几瓶海水回去化验研究，确认大鹏一带的海水胜过台湾上世纪70年代的海水，就过来合作办鲍鱼场。鲍鱼场里几百个水泥砌的养殖池，分有种苗孵化池、像粟米粒小的种苗池、黄豆般大小的幼鲍池、栗子一样大的成年鲍鱼池和小鸡蛋差不多大的成熟鲍鱼池。

鲍鱼古称鳆鱼，属贝类海产食物。鲍鱼为海产软体动物，其肉可供食用，其贝壳即为中药的石决明。鲍鱼可煮食亦可煲汤，“鲍参翅肚”，鲍列首

位，每日食之，有滋养强壮之功。可治肺结核，潮热盗汗，瘰疬。生石决明和地骨皮、银柴胡用水煎服，治肺结核低烧不退。

鲍鱼的产地，其实并非仅限于中国，目前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品种约达100余种，其中澳洲鲍、南非鲍、日本鲍、墨西哥鲍和中国鲍较著名。鲍鱼亦分为新鲜鲍鱼、干鲍鱼与罐头鲍鱼等多种。鲍鱼有7孔鲍、9孔鲍和13孔鲍，9孔鲍较常见，13孔鲍价格较高。鲍鱼有公与母之分，深圳当地人吃鲍鱼，认为公鲍补阳，母鲍偏寒，滋阴。

说起吃鲍，自古以来，鲍鱼就在中国菜肴中史占有“唯我独尊”的地位。西汉末年(约公元9～23年间)开朝皇帝王莽，就很喜欢吃鲍鱼；三国时代(公元220～280年)的枭雄曹操，也是鲍鱼的热烈拥护者。乃至南宋(公元1127～1279年)，诗人苏东坡更在嗜吃鲍鱼之余，专门为这种美味佳肴写下了《鳆鱼行》的诗句，盛赞鲍鱼之珍贵和味道鲜美。此后，鲍鱼作为珍贵的名菜，经常出现在达官贵人的筵席之上，民国初年，北京著名的“谭家菜”，就有两道著名的菜式“红烧鲍鱼”和“蚝油鲍鱼”，成为了现代鲍鱼的典范之作，直到现在，香港、深圳、广州等高级粤菜馆都以“阿一鲍鱼”为招牌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多次国宴及各地大小宴会中，鲍鱼更成为中国经典名菜之一。



长刺海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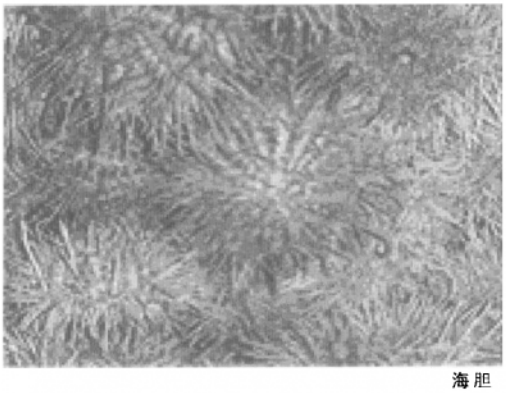
吃鲍鱼，最高级享受是红烧干鲍，在深圳著名大饭店吃还要预先订做。这种红烧干鲍(经过干制加工程序的鲍鱼)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极其复杂的烹饪手段才能完成。吃时，像西餐一样用刀叉切成薄薄一小片吃，然后啜一小口名贵红酒，慢慢体味。在中国的食家眼中，它的价钱，与它的名气成正比，一份（如小碗大一个）500元至700元；因为一斤干鲍鱼，需上千元至万多元；而最贵的干鲍鱼，每只价格更可高达二万五千元。所以，民间多认为，制作干鲍菜式的厨师肯定是大厨师；常年供应干鲍鱼菜式的食肆肯定是高级食府；经常光顾食肆吃干鲍鱼者，肯定是非富则贵。当然，普罗大众吃不起这么昂贵的的鲍鱼宴，鲍鱼进入平民生活的是家常菜，10元一只的清蒸鲍鱼，运气好的在大排档或小餐馆碰上特价鲍鱼，一元一只，招徕顾客；一碟10只才收10元，消费者实惠，餐馆老板做旺生意，这叫双赢。

海胆和海胆吃法

深圳人吃海胆，多数吃海胆炒饭、海胆蒸蛋、煎海胆和冰镇海胆；海胆是道名菜，口感好，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海胆亦有较广泛的药用功能，它的药用部位为全壳，壳呈石灰质，药材名就叫“海胆”。

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海胆状圆而扁，围寸许，周身皆刺。破其壳，内皆红膏，烹食甘香异常，腌之亦佳。”海胆，别名刺锅子、海刺猬，体形呈圆球状，就像一个个带刺的紫色仙人球，因而有人称它为“海底刺球”、“龙宫刺猬”。世界上现存的海胆约有850多种，我国沿海约有100多种。常见的如马粪海胆、心形海胆、大连紫海胆、刻肋海胆等。

海胆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由于沧海桑田的缘故，在我国的西藏高原，就曾发现过海胆的化石。


海胆

海胆喜欢栖息在海藻丰富的潮间带以下的海区礁林间或石缝中，以及较坚硬的泥沙质浅海地带，躲在石缝、礁石、泥沙间或珊瑚礁里。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靠棘刺防御敌害。海胆的刺有长有短，有尖有钝；种类不同，刺的结构也不一样。大鹏海胆，大如拳头，小如鸡蛋，布满尖刺，每根刺约一寸至两寸长；尽管海胆浑身有刺，但有些海洋动物例如绿鳞龟屯还是愿意以海胆为食。海南岛珊瑚礁中盛产另一种石笔海胆，状如盛开的花，俗称烟嘴海胆，因其刺甚粗壮，可做烟嘴用。有的种类刺甚长，可达20多厘米。

海胆是雌雄异体，雌体可终年怀卵，一年排卵数次。生长3年的海胆达到了它的成熟阶段，开始履行繁殖后代的重任。它们是群居性动物，在繁殖上，它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在一个局部海区内，一旦有一只海胆把生殖细胞，无论精子或卵子排到水里，就会像广播一样把信息传给附近的每一个海胆，刺激这一区域所有性成熟的海胆都排精或排卵。这种怪现象被形容为“生殖传染病”。

海胆尽管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但因浑身是刺，令人生畏，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与烹饪。要想剥开长刺的海胆，通常的方法是：取生海胆洗净，用剪刀在海胆周围剪一个可以放进小匙子的圆口，倒出海胆壳子里的水、杂

物，并挖净里头的黑膜，剩下五星状的海胆卵，这才是海胆的可食部分。此时不能再用水洗，洗后海胆卵散了，掺进水就没味了。

海胆烹饪方法有如下几种：一、清煮海胆：取胆卵，加水，辅之生姜或蒜片、葱白或香菇，烧开后即可食用。二、生炒海胆：取海胆卵肉，加盐、酒、糖、姜末等调料，油热时，下料爆炒，熟时加淀粉勾芡。三、油煎海胆：取海胆卵肉，加配料，兑蛋清、淀粉，用明火油锅煎熟即可。四、海胆炒饭：将炒熟的海胆，加上煮熟的饭、葱花、酱油炒拌上碟。五、海胆蒸蛋：将海胆肉、加鸡蛋、盐、鸡粉调味，盛在碟里拌匀蒸熟即可。六、冰镇海胆：取海胆卵肉，用冷开水清净，装在碎冰垫底的盛器（盆、碟）上，冰与海胆隔层薄膜，食时蘸上调料，与生吃龙虾、赤贝、象拔蚌等类似，尤其别有风味。

当然，去大鹏吃海胆最为新鲜。在罗湖、福田、南山、宝安是吃不到海胆的，即使吃得到，也没有原产地大鹏、南澳正宗和鲜味。

曾经风靡深港地区的龙岗鸡，许多人以为是“鸡项仔”（小母鸡），殊不知是公鸡，是阉割了的公鸡，每只重3至5斤的“肥阉鸡”。按当地饲养习惯，这小公鸡养成差不多一斤来重时，拿去阉割后放养至3斤来重，就用鸡笼子“藏养”、喂吃的是谷糠、豆饼、骨碎、菜渣、青草、蛋壳、泥沙。虽然长至四五斤重，但肉嫩、结实、骨酥、不腻、口感爽滑，味道清香，是深圳市的名优特产。

龙岗鸡与吃鸡

龙岗鸡，曾经风靡港澳、惠阳、东莞地区，是深圳市的名优特产。

广东有句俗话：“无鸡不成宴”。酒楼食肆，大小筵席，家庭饭菜，饮宴小酌，都喜欢有鸡；婚姻嫁娶、酬神祭祖那可少不了鸡；坐月妇娘不能不吃鸡；甚至小孩满月探亲，亲戚朋友都要送个“带路鸡”，长大后好认路、认门、认亲。

好多人以为龙岗鸡是“鸡项仔”（小母鸡），殊不知是公鸡，是阉割了的公鸡，每只重3至5斤的“肥阉鸡”。按当地饲养习惯，这小公鸡养成差不多一斤来重时，拿去阉割后放养至3斤来重，就用笼子“藏养”，喂吃的是谷糠、豆饼、骨碎、菜渣、青草、蛋壳、泥沙。虽然长至四五斤重，但肉嫩、骨酥、不腻、不绵，口感爽滑，味道清香。也许那年月缺油少肉，客家人多数三代四代同堂，人口多，逢年过节，非得宰上一只龙岗鸡，每人才能吃上三几块。

其实，龙岗鸡不只龙岗镇才喂养这种阉鸡，整个龙岗区的横岗、布吉、平湖、坪山、坑梓、坪地、葵冲、大鹏、南澳等乡镇，甚至盐田、沙头角、观澜、龙华、石岩等镇的客家人，家家户户都会饲养几只阉鸡，供过年过节自己吃用，

有余的拿到市集去卖，或由供销社“出口站”统一收购，供应港澳市场。近年，由于生活环境改变，已很少人饲养鸡，更没有人“阉鸡”，自然“藏养”的龙岗鸡也不见踪影了。

旧时，深圳许多农村自养“三黄鸡”，也就是通常说的黄毛、黄脚、黄肉的“三黄鸡”。三黄鸡一定要一斤来重的小母鸡才好吃，很少人养小公鸡的，吃公鸡燥火，当地人称容易得“热毒”。与“三黄鸡”齐名的还有“胡须鸡”，也就是小母鸡的下巴有一小撮约 2 厘米长的黄毛，俗称“胡须鸡”。此鸡还有个特点，最重长到斤把两斤，脚爪细小，肉质嫩滑，吃起来明显“弹牙”，鸡骨都酥香。坐月子人家，在分娩前就常常养它十几二十只，以备月娘天天吃鸡补身子。

深圳人吃鸡，做法很多，也很讲究。归纳起来，按蒸、炒、炸、卤、炖等方法来做，有如下几种做法和吃法。

蒸　做法有白斩鸡、水晶鸡、桶子鸡、贵妃鸡、盐　鸡和冬菇蒸鸡等。

白斩鸡　顾名思义，就是不放任何材料，只将沥干水的光鸡整只蒸熟，斩件上碟；有的为使白斩鸡色香味诱人，用少许生抽、生油、生盐涂抹一下鸡内（腔）外（皮），蒸 18 分钟即可。第二种做法，是烧开白开水，把光鸡放进开水里煮几分钟，用筷子能插穿鸡腿，不见大量血水渗出，就熟了，拿上来斩件上碟，这种吃法方便快捷，但鲜味被开水“煮”走了。因此，第三种方法是煮沸了上汤，将光鸡放进汤里，熄炉火，让上汤的高温把鸡“浸”熟。这样的白斩鸡，保持了鸡的原味，肉质鲜嫩、香滑，如果斩出来的两腿鸡骨仍渗出一点点血水，说明火候掌握到家了。过生不熟，过老肉韧，失去鸡味。斩成一块块按鸡头鸡尾、两边鸡腿摆成鸡的形状上碟，再以沙姜末、红葱头、芫荽、生抽和香油为佐料蘸着吃。这道白斩鸡菜色，不管家庭还是酒楼做的，都是正宗的广东风味家常菜，连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食单》里都把它视为鸡菜十款之首，入诗称道：“自是太羹元酒之味。”

水晶鸡　水晶鸡和桶子鸡做法上差不多，都是用党参、北芪、杞子、红枣、元肉等高级药材煲出浓汤，把光鸡放进去汤里用文火煮透，捞起药材，连鸡带汤盛在陶盅里即是水晶鸡，盛在如汤碗大的小木桶里上席，就是桶子鸡。水晶鸡为整个原鸡，晶莹黄亮，筷子一夹，骨肉分离，鸡肉软而不糜，骨汤药材味香而扑鼻；若在寒冬腊月天连肉带汤吃下去，全身马上暖融融。

文昌鸡　我到过海南吃文昌鸡，文昌鸡之所以出名，据说此鸡在果园放养时专门啄食掉在地上的松果和小虫。鸡只个大皮薄，肉质特别结实和幼滑。制作时像白斩鸡一样煮熟，去骨起肉，斩成整齐的“日”字形，每碟 24 块，大小一样，然后切金华火腿片，每两块鸡肉之间夹一块，拼成鸡形上碟，勾淋上汤芡，吃时夹一块鸡肉一片火腿，特有风味。

盐焗鸡 盐焗鸡是客家名菜，起源于东江惠阳海边一带盐场，所以又叫东江盐焗鸡。做法是选用约一斤来重的“三黄鸡项仔”，褪毛去内脏，沥干水后用草纸包二至三层，然后旺火烧热锅，放几斤粗生盐炒至变色成为高温，将纸包鸡“埋”进盐堆里，加上锅盖小火焗15至20分钟便熟。这样用盐“焗”出味的盐焗鸡，皮爽肉嫩，骨也酥香。如果将骨肉分离，再把鸡肉撕成条状，撒上炒熟的芝麻，相拌香油、葱花上碟，也叫“手撕鸡”。

冬菇蒸鸡 就是把光鸡斩成一小块一小块，把洗干净的冬菇、红枣、黄花菜切段，拌上盐、鸡精、生抽、香油、生粉，然后烧开锅里的水，将调好料的冬菇红枣鸡连碟放进猛火蒸15分钟，就成为原汁原味、香甜爽滑的冬菇蒸鸡。

炒 炒鸡有姜葱炒鸡、香芹鸡柳、咖喱鸡和姜酒炒鸡。


龙岗三黄鸡

姜酒炒鸡 最适合虚寒的人吃补，客家妇娘坐月期间，也会习惯吃足一个月的鸡酒。临盆前，家人就酿好一两埕黄酒、买回十几斤生姜、自养二三十只鸡项。一生下孩子，就用鲜嫩的鸡项肉和去皮的姜片在锅里炒成半熟，然后倒两碗糯米酒，煮熟后连鸡带酒吃完，此时酒精已大部分挥发，酒味不是太浓，但既有酒香、鸡香，又有姜汁微辣，鲜甜味美。

咖喱鸡 取嫩鸡项一只，切成一块块，在油锅中和姜片翻炒至干潋血水，加水、咖喱粉、盐、糖一起“炆”10多分钟，鸡肉变软了，咖喱香味飘散出来了，再加鸡精、葱花上碟，就是一味香辣可口的咖喱鸡菜色。

炸 就是用高温油锅烹调，酥炸鸡块等菜色。

炸子鸡 婚宴、寿宴或满月酒席，都喜爱上炸子鸡这道名菜。炸子鸡，不是把鸡丢进油锅里炸，而是先用南乳、生抽、糖捣成酱汁，涂抹光鸡外皮和内腔，待10多分钟入味后，提着鸡在油锅上，舀起沸腾的油一勺一勺地往鸡身上淋，一边淋一边转换鸡的位置，使鸡从头至脚都被高温的油“浇熟”。这样“炸”出来的鸡，皮带红黄颜色，符合中国人喜庆的审美习俗，所以民间又叫做“当

红炸子鸡”，为喜宴必备菜色。由于热油“夹硬”淋熟，因此鸡肉特嫩，鸡皮特脆，吃起来特别酥香甘滑。

卤　是用料酒、八角小茴桂皮等香料、生抽、老抽、糖、盐等配料精制成卤汁。由卤汁制作的鸡有著名的脆皮鸡、太爷鸡、清平鸡。此外，深圳人喜欢做“三杯鸡”、“豉油鸡”、咸鸡、盐水鸡等。

太爷鸡　传说由清末新会知县周桂生创制，辛亥革命后，他全家迁至广州，弃官经商，开了一间小食店。他把其家乡江苏薰菜的风味，和广东的卤味结合起来，制成了一种酱茶色的鸡菜；它既有北京“酱鸡”醇香爽滑风味，又有白切鸡鲜嫩原汁的味道，深受广东人欢迎。因创制人做过县太爷，故称为“太爷鸡”。

脆皮鸡　脆皮鸡和清平鸡一样出名，制法与白切鸡差不多，只不过不用开水煮，也不用高汤泡熟，而是用卤水浸熟，再用凉卤水“过冷河”，使卤水的味道自然渗透。用过的卤水，经久不弃，同时不断补充材料，保持卤汁浓厚，成为陈年老卤。越老的卤水，所浸之鸡越皮脆肉滑，异常鲜美。

三杯鸡　乡人特别爱吃，取材方便，制作简单。取一只沥干水的鸡项，用一小茶杯黄酒、一小茶杯生油、一小杯生抽酱油，一起放进砂锅猛火烧开，即改小火炆10来分钟即可。三杯鸡比白斩鸡酱味醇厚，比卤味鸡清纯。

豉油鸡　是把光鸡整只在上好的生抽和少许冰片糖的酱汁里“滚”熟，成为鸡皮金黄、鸡肉酱香的豉油鸡。咸鸡、盐水鸡，是过去没有冰箱保鲜的日子里，人们把鸡整只煮熟，用生盐腌渍一夜，或用盐水泡一两天；要吃时，拿出斩件，蘸些姜末或葱白香油，就成了另一种风味的咸鸡或盐水鸡吃法。

炖　就是以鸡为主，辅以药材或其他肉料，用仝身瓦罉慢慢炖成老火汤，通常有参芪炖鸡汤、龙凤虎烩、人参鸡龟汤和炖鸡汁数种。

参芪鸡汤　取上等鸡一只，党参、北芪各50克药材，洗净，一起和冷水放进瓦罉，先大火烧沸，改用文火炖至两三个小时，汤色变浓，香气扑鼻，特别是汤面上结一层“薄皮”，为上好。这叫老火鸡汤，行血补气。这种炖汤办法不小心容易把水炖干，汤味也过于浓郁。另外一种是“隔水炖”，方法是用一个有盖的炖盅，把鸡斩件，和党参、北芪、杞子、淮山、红枣、桂圆肉放进去，倒入开水，盖上炖盅盖子，然后把整个炖盅放进一个锅里“隔水炖”三个多小时。这样炖出来的汤清澈见底，非常清香，不油腻，不浓郁，但营养和汤汁保留得很好，适合口味清淡的人和病愈康复的人食用。

龙凤虎烩汤　就是取一条宰杀干净的毒蛇、一只老鸡、一只老猫，加上滋补药材一起放进瓦罉炖三几个小时，汤好后，取蛇肉、鸡肉、猫肉一起用佐料煨烩一下，勾点汤芡为“羹”，既吃肉，又喝汤，是大餐中滋补汤类之极品。

人参鸡龟汤　用人参一条，切片；光鸡一只，去内脏的金钱龟一个，均切成一块块，和一碗开水（一个人吃的分量，二三个人吃放2小碗水，注意别放太多水）一起放进炖盅，盖上炖盅盖，然后再放进锅里隔水炖二至三个小时。如果大补血气就放高丽参或红参或开河参，如果滋润清热补心肺，就放花旗参。炖出来的汤，没有油镜，蜡黄蜡黄，但清甜醇香，为滋补之上品。

炖鸡汁　取两斤左右嫩鸡项一只，斩成四五大块，用一个带盖的炖盅，炖盅里放着一个倒扣的饭碗，把鸡肉一块一块地排在瓷碗的边上，（千万别放水）。然后把整个炖盅放进锅里炖二三个小时，让鸡汁炖出来。收火后，将炖盅里的鸡肉夹出，取出空饭碗，炖盅里大约有大半碗鸡汁，这是鸡的精华，对大病一场的人康复大有益处，若一周内炖吃两三次，大见成效。

鸡脚花生木瓜汤　将500克鸡脚去趾甲，洗净、淖水去腥，和花生米100克、削皮去籽木瓜一个、蜜枣一颗、干章鱼一只，烧开水后一起放进瓦罉煲约两小时，加盐调味，即成为老少咸宜的大众化鸡脚汤。此汤生津补神，同时最适合哺育妇女，兼具催奶和丰奶之作用。


白斩鸡

鸡脚除了煲汤外，还可以卤制成凤爪、鲍汁凤爪、蚝油凤爪，用浙醋和糖烹制的白云凤爪，都是广东早上茶市的名点心。

鸡内脏炒菜是深圳人至爱。鸡心、鸡肝、鸡胗、鸡肠洗净，用生抽腌制10来分钟，和丝瓜猛火快炒，勾芡，撒葱花，上碟，这就是鸡杂炒丝瓜。如果用淖过水的草菇和鸡胗暴炒，就是草菇炒鸡胗。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大众化经典小炒。

有人粗略统计，用鸡做成的菜式可达210多种，仅窥此一豹，足见深圳民间饮食文化之丰富。

清嘉庆《新安县志·风俗》曰："十一月冬至晴百物成。""冬至日，祀祖必以宰鸭为敬，重阳扫墓与清明同余节大略与荆楚岁时无异。"当地民谚："做冬大过年"，并不是说它重要过"年"，也不是隆重过"年"，而是过特别的"冬节"，是春节节前的"热身节"。乡人自古有吃了冬至夜饭，就长了一岁的说法。

做冬大过年

深圳当地人过冬至节，称作"做冬"。

当地民谚："做冬大过年"，并不是说它重要过"年"，也不是隆重过"年"，而是过冬节，是春节节前的"热身节"，也是"长至节"、"亚岁节"，古时有吃了冬至夜饭长一岁的说法。清朝嘉庆二十四年修纂的《新安县志》云："十一月冬至晴百物成"。农耕时代，冬至到春节这段时间，大部分农作物已收获，人、畜、田、地是休耕时候，人们在这休耕农闲时节有欢庆丰收、准备转入下一年的习俗，所以，吃冬至夜饭民间称为"添岁"。清代学人顾禄的《清嘉录》就有"冬至大过年"之记载。

过冬这个节令，追溯起来，早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古历就测定出冬至，在一年24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节令。冬至这一天，北半球昼最短，夜最长，加上这天是阳气初萌而冬尽春回的日子，古人称之为"冬至"。东周时代就以十一月为正，冬至便作为岁首，曾作为"元旦"热闹过一个时期。秦朝沿袭其制，冬至亦视为小年。到了汉朝把冬至定为"冬节"，官府上下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方便官员和



冬至到了，去菜场买菜

百姓千里赶回家团聚，祭祀同贺。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祖的日子，百姓在这一天，感谢苍天和祖先神庇护佑，获得丰收，人丁兴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再有好年景。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为冬至写下诗句："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节令文化。生活在深圳的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的土著，其先祖都是来自中原，因而把冬至节令习俗带下来，数百年沿袭至今："做冬大过年"。

清嘉庆《新安县志·风俗》"冬至日，祀祖必以宰鸭为敬，重阳扫墓与清明同余节大略与荆楚岁时无异。"旧时深圳人家家在冬至日宰鸭，主要是当时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所致。每年夏收夏种期间，乡人就到市集买回鸭苗，下田劳作时，一头挑着农具，一头挑着竹鸭笼里的几十只鸭苗，来到稻田里放养，日出下田，日落拢回鸭苗，百多天后鸭苗长成大鸭，特别在秋收前后，鸭子在稻子收割时吃了掉下来的谷粒，养得特别肥美。用肥鸭、嫩鸡以及和稻米做成各种糕点，燃烧香烛衣纸祭天祭祖，人们用一年的劳动成果借冬至拜祭的仪式，回报祖先神灵关照。

当地客家人有句俚语："春羊、夏狗、秋鸭、冬鸡。"也就是春天青草鲜嫩，羊肉特肥嫩。"夏至狗，吃了满山走。"狗肉补了身子，壮了腰，再远的山路也不怕。秋季的鸭子和冬天的肥鸡特肥美好吃。北方有不少的地方，在冬至这一天有吃狗肉和羊肉进补的习惯。深圳不养羊，吃羊肉的较少，吃狗肉的较普遍，特别是龙岗、宝安、罗湖、南山一带。农历中"数九"寒天的"一九"就是以冬至开始的，九九八十一天后才为冬日的结束。常吃狗肉可治胃脾虚寒、腹脘冷痛、膝腰酸软、遗尿遗精等疾病。乡俗说"卖掉棉被吃狗肉"，固然是说为吃顿狗肉不顾没棉被盖的后果，同时也认为吃狗肉温补暖身，再寒冷的天气也不

用盖棉被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据说从汉代开始，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狗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绝口。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冬至的习俗也多样。大多数地方，每逢冬至这天过节，不论贫富，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饭。古谚说："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也说："冬至馄饨夏至面。"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子样，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食之以求平息战乱。因最初制成馄饨这一天刚好是冬至，所以形成了在冬至这一天家家户户吃馄饨。深圳客家人在南方种的水稻，吃的是大米，没种小麦磨面，较少吃饺子馄饨。但是磨黄豆，做豆腐，剁肉馅，"酿豆腐"，仍像中原地区吃饺子、馄饨习俗一样过冬至。

在南澳、大鹏、葵冲、盐田到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等沿海村镇，过冬至仍有吃汤圆和吃赤豆粥的风俗。民谣唱："家家沓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在我国江浙一带的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全家欢聚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相传有一位叫共工氏的人，他的儿子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残害百姓。但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糯米饭，用以防灾祛病。相信如今许多人都不知道吃赤豆糯米饭的来历，也不知道有个叫共工氏的人，然而吃赤豆糯米饭粥，补身益气，人们还是保留传承下来了。

冬至节，大人们忙着宰鸭杀鸡、做糕点拜神等活儿，作为孩提的我们，最乐的不过是到稻田里"窑番薯"。冬至前后，早收割完毕的稻田，被"犁冬"晒田，冬天干燥的北风也把犁翻过来的土坯吹得干生生的。我们农家孩子各人从家里带来十几条番薯，来到稻田把几块大泥坯垒成一个灶窑，然后分头去捡柴火和干稻草，点火把灶窑的泥坯烧红，再烧减结成白霜状，就把窑里的烧剩的柴火耙出来，把十几条番薯放进窑里，跟着把烧得温度很高的泥坯捅入窑中，把番薯严严实实地盖住。大家围着番薯窑讲故事，说笑话，唱山歌，十几二十分钟后，番薯被烤焖熟了，大家小心翼翼地用树枝扒去泥坯土块，把一条条煨得香气袭人的熟番薯挖出土窑，剥开薯皮，露出金黄黄、软绵绵、香喷喷的番薯，顺着流出来的口水，"窸窸窣窣"咬将下去，烫着嘴唇也在所不辞，一口滚热的番薯吞进肚子，在寒冷的北风中一阵舒坦，那情那景胜似如今叹下午茶。有了一两条番薯垫肚，大伙分别牵着耕牛，挑着柴火，凯旋回家，然后等着晚饭时分，和家里人做冬至，吃大餐。

春节，深圳人称作“做年”。旧时为准备过年，离春节还有百多天，就买条中猪来养至过年时宰；还有七八十天时就买鹅苗、鸭苗、鸡苗，养至春节宰食或送亲戚；甚至为了做年糕，早在半年前夏收夏种时，就匀出两分田专种糯谷，辟出一亩几分地种甘蔗、花生，以作榨糖、榨油过年食用；提前几个月上山“砍柴头”，因为过年要蒸“圆笼粄”，需蒸一日一夜十多个时辰，“老柴头”才耐燃烧，所以乡下有“打柴头蒸圆笼”的民间俗语。总之，为了做年，家家户户做足了工夫……

深圳过年的“年味”

春节，深圳人称作“做年”。过年，这个中国最盛大隆重的民间节庆，正在一点一滴地回归传统。春节，全世界华人都重视这个古老而喜庆的日子，深圳也毫不例外。

按照我国的习俗，春节是从“五豆节”（腊月初五祭后稷）或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长达二十多天至一个多月。深圳的广府人和客家人则是从腊月二十五开始，俗称“入年架”。从这天起青年人敲锣打鼓，练麒麟、舞狮子、习龙舞，处处喜气洋洋；而大人们则忙于办年货，兴高采烈。春节这一“节”，历时那么长，相传古代一种叫“年”的魔鬼，专在腊月二十五日至正月初四骚扰民众。人们为了抗击“年”的骚扰，家家户户点燃火光，日夜敲击各种器具，发出响声，使“年”的骚扰无法得逞，最终被赶走。现在“过年”时守岁、放鞭炮、贴红联、挂红灯，源于这个传说。《诗经·七月》中曾记载西周时期旧岁新年交替这个节庆风俗。真正萌芽新年习俗的在先秦时期，定型于汉代，南北朝开始，正月初一过年，燃爆竹、换桃符、饮屠苏酒、守岁阳、游乐赏灯等活动，逐渐演化成为我国的第一大节日。



深圳新年习俗逛花市

说起来不怕笑话，旧时深圳人为准备过年，筹备的时间更早。无论是西路片的南头、西乡、沙井、松岗广府人，还是东路片的横岗、龙岗、坪山、大鹏客家人，农家人早早掐着手指头，当盘算离春节还有一百多天时，就买条中猪来养至过年时宰；还有七八十天时就到圩集捉鹅仔、买鸭苗、孵鸡仔，到春节养大后自己宰食或送亲戚。甚至为了做年糕，早在半年前夏收夏种时，就匀出两分田专种糯谷，辟出一亩几分地专种甘蔗、花生，以作榨糖、榨油过年食用。提前三几个月上山砍柴割草“打柴头”，因为过年要蒸“圆笼粄”，蒸一夜十多个时辰，“老柴头”才耐燃烧，所以乡下有“打柴头蒸圆笼”的民间谚语。总之，为了过年，家家户户做足了工夫。

“年晚煎堆，人有我有”

越挨年近晚，入了“入年架”，“年味”就越来越浓。在除夕夜前，必须把过年用的、吃的、穿的全都要置办好，年初一后连续几天纯属拜年、探亲和娱乐了。广府人家与客家人办的年货也不完全相同，深圳的广府人世居珠江口沿岸鱼米之乡，办的年货多是蚝豉、鳝干、鱿鱼、海参、发菜、腊肠、腊鸭等海产品、腊味食品；各家各户自己蒸制的年糕年点，多是九层糕、炸煎堆、炸糖环、炸角仔，糖莲子、糖莲藕等。九层糕就是“长长久久、步步高升”之意。炸煎堆就是把糯米粉做成空心“铅球”状，外沾花生、芝麻用油炸，表示生机盎然、团圆兴旺，爆谷从里到外，寓意花

开富贵。广府人俗语“年晚煎堆，人有我有”。相传煎堆从中原传来，被珠玑巷胡妃一案牵连的58个村庄33个姓氏的人，在逃走时匆忙间无法制作干粮，只好拿现成的，于是把供奉玉皇大帝的仙果都拿上路了，一路上果然事事逢凶化吉。因此，多是从珠玑巷南迁的广府人，将千年小吃——煎堆仍流传至今。

深圳的客家人多为靠山，即使盐田、葵冲、大鹏靠海，旧时也属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所以他们办的年货，多是自晒腊肉、鱼干，自制腊鸭、腐竹、豆干、笋干，自酿糯米黄酒等；家家户户普遍做的年糕茶果，是蒸喜糕、蒸甜粄、“打拗饼”（广府人叫“沓米饼”）、“打米埕”、“蒸圆笼糕”等，希望日子“步步登高”、“一年甜到底”。“打米埕”就是用糖浆拌爆米花，冷却切成方形小块，成糖米花。“打拗饼”是将米粉、糖、花生拌好压进像做月饼的饼模里，然后进炉烤熟，吃时用力拗一小块吃，形象地称拗饼。“蒸圆笼糕”是将二三十斤糯米粉、红糖五六斤拌匀，倒在一个大圆笼里蒸，因为它直径二三尺、糕厚一尺五多，连蒸一个夜晚才能蒸熟。以上年糕茶果，是大年初一敬神必具的斋祭品，也是过年招待客人的糖果食品，当然也是探亲访友赠送的礼品。



写挥春贴对联是过年风俗之一

“年廿八，洗邋遢”

“入年架”后，在年廿四晚，以前私人工厂、门店老板把雇请的工人、伙计、佣人叫来吃顿“年架饭”，又称“年假饭”。深圳和港澳台地区又称这顿饭为“尾牙”。工人和雇员吃了这顿饭，老板宣布“明天年廿五入年假，各人回去过年”。老板此时结清工人工薪，打赏优秀伙计，其他人也赠予一些礼物，表示犒劳。对第二年将要辞退的员工则婉转暗示，比如老板在大家吃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亲自夹个鸡爪给解雇人员，意思你“鸡脚甘走”，也有的夹个鸡头，广东话“鸡”与“街”谐音。被炒鱿鱼的雇员心中自然明白，次日“静乖乖”卷铺盖回老家。

北方“腊月廿三，家具给外搬，里外扫一遍”，意思跟广东“年廿

八，洗邋遢”一个样：整修房屋，打扫庭院，张灯结彩，贴门神对联，逛花市，买盆桔、桃花、水仙花等装扮。清扫尘土，洗澡净身，为的是“房、几、人净，消灾免病”。深圳当地人在“洗邋遢”中，用龙眼或九里香枝叶制成扫帚，扫屋“驱邪”，有意打烂瓦药煲，祈求来年无病无痛，不用求医吃药。男人们在年廿八前理个发，女人“拉面毛”，光光鲜鲜过新年。除夕那天，主人们全力以赴准备过年的重头戏——年夜饭。杀猪、宰鸡鹅鸭，磨豆腐，炸油豆腐等。午饭后一般三点来钟开始，全家男女老少洗“年香水”，俗称“大吉水”。“香浴”实际是药浴，常见是将带香味的石姜蒲、柚子叶、香茅草和青竹叶，加清水用大锅烧开，再用凉水兑温洗身；也有用樟树叶、柚子叶、松树叶、柏树叶，或多种混合烧水洗澡。“大吉水”洗后醒神，清爽。我家一直坚持几十年。现在“大吉水”香料叶多数到农贸集市可买到；家家户户已没有大锅大灶，可用较大的水煲煲“大吉水”，然后将热水器的温水在桶里兑着洗。先洗小孩，洗完穿新衫新裤新鞋袜，出去玩；后到大人，洗完后男的不论老少由长辈率领，挑着“三牲”到祠堂或老祖公厅或就在家的神祖台敬祖神。言传身教子孙后代不忘祖宗，尊师重辈。敬毕祖神即开席吃团圆饭。



到祠堂敬祖神是深圳数百年的本土民俗

“恭喜发财，利是兜来”

团圆饭，顾名思义全家团圆吃饭，哪怕出门千里之外，也要赶上团圆饭；团圆饭必须全家一起饮酒吃饭，不得分食，有的兄弟已分立家室，仍以健在的祖父母或父母长辈为中心，几兄弟带家室一起过来吃团圆饭。因此，现代人没大锅大灶，没有大台桌椅吃饭，时兴到大酒楼订餐，在酒楼吃团圆饭。吃完去逛花市，回家看央视春节晚会。

大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所谓“月穷岁尽”，也是新年的前夕，二千多年来，中国人在这除旧迎新夜，灯火通明，全家围炉夜话，通宵不眠，晋人周处的《风土记》说“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俗称“点年光”。大鹏城原是明清海防要塞，士兵家眷来自全国各地，也带来内地除夕夜至年初四用盏小油灯“点长年灯”的习俗，有“一年中光明遂愿”之

意。观澜、龙华、石岩以及龙岗的客家人，家里的米缸要“常满”，床头小杯的碎银也要“满财”。白天从田里砍回的甘蔗，放一把在门边，有的扎成拱门竖在厅屋当眼地方，到年初七才可以吃，寓意有头有尾，日子甜过蔗，粮多钱多，还可外借，因为“借”和“蔗”同音。“守岁”时一家人喝浓茶，嗑瓜子，拉家常，看电视，一过零时，鞭炮齐鸣，“爆竹声中除旧岁”。有不少人到仙湖弘法寺争着烧头炷香，香港蜂涌黄大仙、车公庙抢烧第一炷香，以求转运。

年初一，早时深圳的妇女起得特别早，去井口河边挑满缸水，取“新水活力”之意。这一天，不扫地，庭院门口满地炮仗衣屑也不能扫；不进菜园摘菜，更不能挑尿桶去浇菜；不赤脚，不讲不吉利的话。是日三餐吃斋，“吃斋”征兆“消灾”，广东话“斋”“灾”谐音，用现代医学保健观点来看也很对，除夕团圆饭大鱼大肉，第二天多吃青菜和斋素，清肠胃。大年初一有人去拜年，但我老家羊台山下几个镇的习俗，是年初二才出门拜年，出嫁女则携婿郎、子女“转外家”；也有的地方风俗年初四才“转外家”，初二去跟公公婆婆拜年。初三赤口日也是“送穷日”，这一天不到别人家中串门，更少有上门拜年。

“恭喜发财，利是兜(拿)来！”这是深圳当地人一见面的幽默拜年流行语。“利是”就是古代拜年时大人给小孩的“压岁钱”，也叫“押岁钱”、“压祟钱”、“压胜钱”。相传古代有一个叫“祟”的小妖怪，每逢年三十夜惊吓小孩，触摸睡熟小孩的脑门，凡被摸过的孩子发高烧，几天后变得呆头呆脑。人们都怕了，整夜点灯不睡，谓之“守祟”。当时嘉兴府有户姓管人家，老来得子，十分珍爱。年三十夜，老爷陪孩子在床上玩铜钱，玩着玩着睡着了，结果用红纸包的铜钱撒落枕边。半夜时分，“祟”妖怪溜进来，突见枕边迸射一道金光，“祟”尖叫了几声逃窜了。事后传开，人们纷纷仿效，用红纸包铜钱压在孩子枕头旁，果然“祟”再也不敢来侵害孩子。从此，人们叫做“压祟钱”，后称“压岁钱”。穷人家压几个小铜钱，富裕人家却把压岁铜钱增至百个，寓意长命百岁。清人吴曼云《压岁钱》诗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饧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

深圳人拜年派利是，不像北方只给小孩，连未婚青年都给。给自己的孩子封三五百，甚至一千元，而且父母各给一封；三代以内的堂、表兄弟姐妹亲戚的子女给五十、一百，夫妇俩也要各给一封；一般朋友、同事、熟人的孩子拜年给一十、二十元。因此，出门拜年，除带上贺年手信、糕点、礼品外，利是也要准备几十上百封，而且因分量不同而放在不同的口袋里。这是近十年八年时兴的拜年做法。其实，早时因经济条件所限，非常朴实。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头两年，我封的利是一般为两元，给自己孩子也就是五元、十元。一次我在东门老街碰上一个多年不见的从香港回来的老

同学，祝贺几句后给他的孩子一封利是，他也礼貌地回了一封给我身旁的儿子。老同学离开几步远，他的孩子打开利是封说："才两元！"我的儿子也看利是："是十元港币。"我脸上马上涨红，心像被刺了一下，一种复杂的情感袭来，让我内疚了二十多年。据说，在深圳经济拮据的一些新婚年轻人，供房供车"月光族"，选择春节旅游，很大程度为的是避开这些"派利是"耗费。

麒麟狮龙舞　文化年味足

深圳过年的年味，不仅在丰富的吃文化中，而在于震天价响的爆竹声和"嚓嚓梆！嚓嚓梆！"锣鼓声的"闹文化"中。讲粤语的公明、松岗、沙井、福永、西乡、南头、大鹏、皇岗、沙头和罗芳等镇村，历史上在春节就喜欢看大戏。这里说"看大戏"就是看粤剧，春节前，许多村就搭好"戏棚"，请来广州、深圳戏班大佬倌，"嚓嚓梆！嚓嚓梆！"大锣大鼓震得全村喜气洋洋，《宝莲灯》、《怒劈花山》、《八仙贺寿》、《帝女花》、《薛仁贵征西》等粤剧，连演五六晚。据载，沙井镇万丰村300多年前的明朝，就有村粤剧戏班子，自演自娱，据说这是全国最早的村级粤剧戏班子，已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口头禅"客家舞麒麟，白话舞狮子"，是说深圳广府人和客家人分别表演两种不同的民间舞蹈。也就是深圳西片的广府村落，过年过节舞狮子，跟北方舞狮子不同，这里是舞"南狮"，打南拳，走七星步，踩梅花桩等。深圳从石岩、布吉、水库新村、龙华、观澜到龙岗一带的东片客家地区，从年初二开始，就开始舞麒麟，一条村一条村地去拜年、表演，"嚓嚓梆！嚓嚓梆！"锣鼓声和炮仗声，把各个村镇闹得热气腾腾，直到盐田，从沙头角舞到香港新界，走一圈回到村里已是正月十五了。无论麒麟还是舞狮，带来吉祥喜庆，很受欢迎。

坪山、龙岗、坪地、坑梓、葵冲和大鹏的客家人，喜欢新年对山歌，"赶歌圩"摆山歌擂台。龙岗圩还有独特的"龙岗皆歌"唱法，热烈动听的皆歌衬词"一朵鸳鸯牡丹花罗哩"，有成百上千人加入和唱，顿时把"歌圩"闹得沸沸腾腾。沙头角渔灯舞，也在春节期间表演。当地渔民100多年前就用竹扎渔灯、创作出30多人同时欢跳的渔灯舞。南澳镇的水上渔民，把水上迎亲习俗变成陆上大众的迎亲舞蹈，在春节期间巡游表演，吸引全镇群众一同欢乐。南澳镇渔民在二百年前，创造出"草龙舞"。也就是在新的一年出海打鱼前，组织男人们上山割草扎成草龙，插上香火，燃放鞭炮，朝海尽舞。舞毕，将草龙焚烧投向大海，祈求风平浪静，渔汛满舱。

大鹏古城每5年在春节至元宵节前，举办连续7天的太平清醮，几千群众酬谢神灵护佑，祈望来年风调雨顺。清醮完毕，举行三千人的"将军宴"。"将军宴"源于纪念清朝"大鹏御所"军事要塞连续被皇上册封十多个爱国将军，赖恩爵等将军逢年过节或打仗凯旋时设家宴宴请将士和四方乡



福田区下沙村民舞起长龙，使过年的年味更浓，更传统

邻，由于喝的黄酒又名“将军酒”，后来人们怀念这些爱国将领，就称这春节大型宴会为“将军宴”，沿习至今。

说起深圳的“年味”，不能忽视的深圳独特“大盆菜”。这源于南宋末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在新安九龙城吃到要的“百家饭”，700 多年来深圳人演变成在春节期间盛大的祭祖宴席。深圳圩的湖贝村、向西村、水贝村、黄贝岭村张姓族人在春节举行祭祖仪式，全村成百上千人吃大盆菜。最上规模的是福田下沙村，2002 年春节，黄氏宗亲从海外和祖国各地回乡，聚村祭祖，同时舞龙、舞狮、唱大戏连闹三天，村里共动用了 100 名厨师、300 名帮厨，用了 150 多个铁锅制成了一次 3800 桌大盆菜，宴请了近 5 万人同时赴宴，成功刷新了民间宴会的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下沙黄氏宗亲祭祖习俗成为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元宵节在旧时深圳人心目中是个民俗大节。深圳人除了点花灯、猜灯谜外，还有一个“上灯”的习俗，比如，有500多年历史的向西、湖贝、水贝和黄贝岭4个村子为例，每逢农历正月初九到族人祠堂点（开）灯日，正月十五为完灯日。龙岗、坪山、葵冲、大鹏及观澜、龙华、石岩、布吉一带客家人，凡添丁者也在元宵节到老祖屋的祖公厅点花灯。蛇口街道渔二村等潮州语系人，又有个延续近600多年的“开丁茶节”习俗，每逢正月十三，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用各种蔬菜、肉类和花生、芝麻香料煮“开丁茶”，隆重举行传统的“开丁茶节”。此节，于2007年被列入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元宵节与“开丁茶”

元宵节在旧时深圳人心目中是个民俗大节，它有悠久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一系列传统欢闹活动。

元宵节的“元”，即开始，一年之始为元月；“宵”，即夜。“元宵”意指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相传西汉初期，汉文帝戡平叛乱即位，那天恰是正月十五。以后每逢正月十五夜晚，汉文帝就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并确定此日为元宵节。

元宵节也称为上元节。道教文化中有所谓“三元”神之说，认为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诞辰，因此，这三个日子分别为上元、中元、下元，在这“三元”之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南北朝时，元宵欢庆活动比汉代热闹，梁简文帝曾作《列灯赋》，描写元宵张灯景象。隋朝隋炀帝多次微服观赏元宵灯市，写下一首《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唐明皇时正值盛世，下旨正月十五前后三天张灯游玩，唐代诗人苏味道写有元宵节万人狂欢的著名诗作《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宋元明

清元宵节依然传承，发展成熟为闹元宵。

闹元宵少不了张灯观赏习俗，因此，元宵节也称“灯节”。灯节里的花灯琳琅满目，在样式上有带穗的挂灯，美观的座灯，秀丽的壁灯，精巧的提竹，玲珑的走马灯等；在造型上有山水人物灯，有花鸟鱼竹松灯；有常见的羊角灯、金鱼灯、绣球灯、百花灯、长生灯、长明灯、荷花灯、九莲灯、龙灯、云灯、宫灯，著名的东莞千角灯；深圳乡间野趣的柚子灯、萝卜灯、白菜灯、纸壳灯和竹筒灯。

有了赏灯，还有一项高雅的民俗游艺——猜灯谜，也就是将丰富多彩的谜语贴在灯上，供游人猜度，猜对者扯下谜纸，领取谜赠，哪怕是获得一条毛巾、一支牙膏、一小包糖果奖品，猜中者都心满意足。

随着深圳建设的发展，全国各地移民深圳，也带来东西南北的闹元宵风俗，踩高跷、扭秧歌、打腰鼓、逛庙会、变脸技艺、化装巡游，加上本地舞麒麟、猜灯谜、赏花灯、耍龙灯、包括沙头角的鱼灯舞、蛇口渔工村的开丁（灯）节等等，都赋予元宵节浓郁的文化意味。



元宵节猜灯谜

过元宵节，各地风俗都少不了吃汤圆，清代符曾在《上元竹枝词》中把汤圆称作“元宵”：“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

元宵节期间，深圳的客家人、香港新界人和广府人除了放花灯、猜灯谜外，还有一个“上灯”的习俗。比如，有500多年历史的罗湖区向西村为例，向西、湖贝、水贝和黄贝岭4个村子同宗姓张，为广府语系，每逢农历正月初九是张氏祠堂点（开）灯日，正月十五为完灯日。凡生男丁的家庭必备红头绳1条、煎堆1盘、上肉1块、生葱芹菜各1棵，茨菇、芋仔、发菜、蚝豉各少许，以及香烛、白酒、茶水等物品，到祠堂拜祭祖先和土地公。祠堂里唱礼的“礼生”告知祖先谁家添丁，报上男丁姓名和出生日期。男丁家人祈求祖先庇护子孙，族人丁财两旺，并至完灯日止，每天上午到祠堂上香、添油、斟茶，让祠堂里走马灯油灯不能熄灭。男丁自此记入族谱。

龙岗、坪山、葵冲、大鹏及观澜、龙华、布吉、石岩一带客家人，凡添新丁者也是到老祖屋的祖公厅点花灯，这种灯笼叫“百子灯”。各家要

点灯的灯笼写上男丁姓名，灯油添足，燃至十五，中途不能熄灭。点灯日要宴请亲友，叫“丁酒”。客家人沿袭下来用“九大簋”，即以九味馓菜用九个大碗上席，三碗一斜排，象征长长久久，乡人称之为“九子碟”，取“九子登科”之意。亲友饮宴祝贺时要送的礼物为衣料、食品、玩具和甘蔗或柏树叶，意思祝愿男丁节节高。宴席间，亲友对男婴抱一抱，亲一亲，说吉利祝福话语。傍晚，将灯点亮系于祖公厅副梁上，在族长主持下敬祭祖神，放鞭炮，甚至请戏班唱大戏；“上灯”点至十五才结束。

在深圳潮州语系的南山区蛇口街道渔二村，又有个“开丁茶节”习俗。每逢过大年期间的正月十三那天，蛇口渔民二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按照延续近600多年的传统，用各种蔬菜和肉类煮好了“开丁茶”，隆重举行传统的节日“开丁茶节”。



祠堂上副梁点灯



开丁茶

蛇口渔二村社区有居民7000多人是祖祖辈辈的渔民，清朝时期，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红草、梅陇、联安一带迁徙而来，常年在海上漂泊，打鱼为生，自称过着“水流柴”生活。老话说，欺山莫欺水。船出大海三分险。“水流柴”自古期盼人丁兴旺，后来上岸定居，非常重视族人“添丁”，谁家生了男孩，就在船头点盏灯，后来到陆地上定居，就到族人祠堂“添灯”，人们聚到他家吃“开丁茶”。“开丁茶”代表着吉祥和祝福，亲人来吃，熟人来吃，连过路的人都邀请进来吃一碗，越多人吃，这家人就越兴旺。渔二村独特的传统节日，据说比过春节年初一都隆重、热闹和重要。

据传“开丁茶节”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年间。在当时，皇朝统治者对汉人十分警惕，取消了汉人的集会权利，甚至规定每十户人家只能共用一把菜刀。人们生活艰难，怨声载道。利用哪家添了丁（即生了小孩），人们就聚到那家吃“开丁茶”的机会，亲友、乡邻相聚，相互问候，倾吐苦水。广东海丰沿海渔民长年出海远途劳作，春汛捕鱼回来已到年十三，渔民们就在这一天相约既互相道贺“渔获丰收”，又做“添丁”礼俗。经年累月，每年的正月十三，“开丁茶节”就延续下来。

“开丁茶”是用来吃的，而不是用来喝的。它是一种菜茶，是由菠菜、芹菜、荷兰豆、鱿鱼、元贝、虾米、腊肉、木耳、冬菇、粉丝、芝麻、花生、爆米花等13种蔬菜、海鲜、肉类等小吃，炒熟以后依次混合在一起，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茶水制成。也许因为茶水有点苦涩，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渐渐用鲜美肉汤代替了茶水。



开丁节

正月十三这一天，蛇口街道渔二村社区搭起彩色门楼，挂起大红灯笼、彩旗、彩灯、气球、风车装饰得喜庆热闹，家家户户桃花、年桔、对联装扮喜气洋洋。女人们早早就到菜市场选购备料，然后在家里又摘又洗，又切又煮，用猪骨肉慢慢熬汤。这一天，在外地的亲人都赶回来，最远的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澳门、香港回来，近的从广州、汕头、北海、湛江、东莞、惠州回来，附近的深圳、龙岗、宝安、南山的湾厦、南水、渔一村的过来捧场。72岁的柳城老人，他的外孙子郑智忠在2001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机械学院，这是南山土生的第一个清华学子，他也在这个喜庆日子回外公家吃“开丁茶”。年近50的渔二村社区居委会原主任周伟明家里，年年开丁节都特别热闹，他小时记得梳着长辫子的爷爷亲自制作开丁茶。这些年轮到周伟明操办，都要备很多料，用四口锅来煮、煎、炒、煲汤，准备足够300多碗的分量。周伟明说，亲戚、朋友来了，每人至少要添二碗三碗。熟人、路人来吃，可以斗吃，谁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谁家客人越多，谁家越有面子，来年越兴旺，客人带去的祝福也越多。周伟明年轻的时候胃口好，可以一口气“斗吃”20碗，现在每年也要吃9碗呢。

我跟蛇口渔二村股份公司董事长吴宜巧是中学时的老同学，我们几位老同

学受邀参加渔二村的“开丁茶节”。一进社区，欢乐祥和的气氛扑面而来。社区搭了彩门楼，几百个灯笼一排排高挂，彩旗迎风飘扬，小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舞狮子，社区腰鼓队、秧歌队在民俗巡游，广场舞台上社区文艺演出队在表演喜庆歌舞、渔家弹唱、丝弦唢呐、杂技魔术等精彩节目。市、区、街道政府官员和社区工厂企业负责人、各地嘉宾、新闻媒体几百人，济济一堂参加“开丁节”。黄昏6时多，我们看完节目表演，便和嘉宾一样到各家各户登门拜访，祝福他们幸福吉祥。渔二社区家家欢迎，个个热情好客。每家客厅都迎进十多二十人，主人用一次性纸碗盛上煮得香喷喷的蔬菜、海味和花生等，倒上热辣辣的猪骨汤，一口吃下去，果然鲜美可口。按风俗，添了一碗，不敢恋战“斗吃”，下面要依次拜访几家，每家吃两碗，好几家下来，小小肚子岂能受得了？吴宜巧、周伟明家忙得不可开交，准备好的二三百碗“开丁茶”，一会就被“斗吃”得差不多。



元宵节吃汤圆

从一户户渔家出来，齿颊留香。我想，“开丁茶”没有大鱼大肉，没有斗酒暴饮，全是家常小吃，有营养又健康的食品。人们注重传统“开丁茶”“纵走千里也要回家团圆”的理念，族人、熟人、路人互相祝福的和谐氛围，在串门吃开丁茶的间隙，参与民俗文娱节目，“开丁节”真成了“开心节”。

除了蛇口渔村“开丁茶节”外，深圳其他地区都有过元宵节吃汤圆的习俗。现代人干脆把吃汤圆叫做吃元宵。宋朝周必大《元宵浮圆子》诗：“时节三吴重，圆匀万里同。”在宋时已盛行此风，取起团圆之意。始于宋朝陆续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深圳人，自然将此习俗延续至今。

《宝安县志》云："清明是春祭日，本县多在这一天上山扫墓，俗称'拜山'，先除草，后用三牲、饭、菜、果品、茶酒等拜祭。"又云："乡村有做清明茶果的习惯，用艾叶或鸡屎藤捣碎与米粉搓匀，芝麻、花生、糖作馅制作，也有其他材料作馅或无馅，款式多种。农家大门门楣挂大艾或柳条避邪。"数百年来，乡间"有后人，挂清明；无后人，一光坟"、"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的谚语，老百姓口头禅也说："有添丁，好拜山。"于是，民间一直自发形成一种习俗压力，人们通过扫墓祭祖，在感念先人的族根同时，又深感后代血脉兴旺。

清明拜山与"鸡屎藤粄"

老深圳人清明节上山扫墓祭祖，非常形象地称作"拜山"。《宝安县志》云："清明是春祭日，本县多在这一天上山扫墓，俗称'拜山'，先除草，后用三牲、饭、菜、果品、茶酒等拜祭。"拜山按当地习俗，多数清明节是家庭式拜祭祖先，重阳节是家族式（全村或全姓氏）拜祭祖先；当然，也有一些村民在中秋节去拜山，比如坪山、龙岗、坪地一带的少数村子。

当地人对拜山很重视，在港澳台、海外的侨胞和亲属都赶回来拜祭。所以，清明节前后两三天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平均每天上百万人次。拜山前，隔天就到酒楼订购烧乳猪一只，备好水果、茶、酒、米饭、糖果、"鸡屎藤粄"糕点、饼干、香烛、炮仗、金银纸钱，金银纸钱中有"美金"、"港元"、"人民币"和先人喜欢或者未享用过的"皮鞋"、"西装"、"手表"、"手机"、"小车"等祭品。第二天一大早吃过饭，全家或兄弟几家男女老少数十人，以前还要带上锄头、铁铲到坟山为先人坟墓除草、培土；如今殡葬改革，就乘车到沙湾殡仪馆保管室领取先人骨灰盒，到一级级水泥砌成的平台拜祭；抑或到西丽报恩福地、溪涌背仔角华侨墓园、南湾吉田墓园及各村镇的墓场，在先人墓碑前，摆上祭品，

敬上茶酒，以年长者开始顺至子孙，每人点燃三炷香，虔诚地向先人跪拜，口中诉说："我们来看你了，带来你喜欢吃的用的穿的，希望祖先保佑子子孙孙平安大吉，事业有成。"然后，烧纸，续茶续酒，燃放炮仗。

过去传统拜山祭毕完，就地在山头挖坑垒灶，拾柴做饭，土称"吃山头"。过去交通不便，一来一回花太长时间，只好在山上解决午饭。如今交通便利，大家很快就回到家围在一起吃饭。回家时，其他祭品留下，只带回烧乳猪、苹果回去，把拜过山的烧乳猪和苹果分给兄弟各家吃，沿袭过去的风俗："分太公猪肉"；吃拜过山的烧乳猪，会得到祖先庇佑，各方面都会顺顺利利，平安无事。路上每人还吃上一两颗拜过山的糖仔，回味亲人生前给后人的关爱、和带来本族本房"枝繁叶旺"以及幸福的生活。


清明节拜山

自古以来，在中国人心中很在意清明扫墓祭祖这个习俗。唐代诗人王建曾有诗句："但有陇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由墓上有无新土判断墓主有无子孙的存在。现在农村仍以清明祭墓活动的有无作为家族是否绵延的标识，乡间有"有后人，拄清明；无后人，一光坟"、"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的谚语，老百姓口头禅也说："有添丁，好拜山。"意思是说生个儿子，老（死）了好有后人拜山。于是，民间一直自发形成一种习俗压力。人们通过扫墓祭祖，在感念先人的恩惠同时，又深感后代繁衍兴旺。据说祖先在坟墓里安住，关系到子孙的繁荣，子孙的兴旺又能保证祖先的安宁与香火的延续。因此，祖先墓地不仅是生命之根，同时也是情感之结，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无论走到哪里，一到清明节都牵挂着回乡拜山。

相信这是一种民族的心理文化，是历史悠久的一种良好传统。平时，忙于工作，如果没有特别的事，谁会到坟场墓地来？就是在清明、重阳两节，民间相约俗成才到此祭祖扫墓。偌大一个坟场，人山人海，香火鼎盛，鞭炮此起彼落，但不失庄严、凝重。拜山，重在感恩、缅怀和思念，而不像亲人刚逝世时那种嚎啕大哭、悲痛欲绝的场面。

清明，是我国所有的民俗节日中，唯一是以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作为二十四个节气之一，清明最初主要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107日、春分后15日，公历的4月5日前后。《淮南子·天文训》说：春分后十

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古称八风之一，它温暖清爽，在和煦的春风之下，天地明净，空气清新，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清明”节气，由此得名。

汉魏以前，清明主要为自然节气，它是与农事活动密切关联的一般节令，后来清明成为了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但此前由另一民俗节日承载，这就是“寒食节”。寒食在清明前两天或一天，禁火冷食、墓祭及巫术性游戏等构成寒食节俗的特殊景观。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

清明真正成为民俗节日是在唐宋之后，清明在唐宋后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并且其节俗意义日渐增强。民间渐将寒食节的节俗与清明合而为一。《唐书》载云：“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寖以成俗，宜许上墓同拜扫礼。”


拜山供品

清明虽然较其他节令晚出，但它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是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对于祖先的祭祀中国古人就有此举，当时尚无墓祭的礼俗，要祭逝去的先人，就立一个神主牌位在宗庙祭祀。春秋战国始有墓祭，汉代上墓祭扫之风转盛。唐人沿袭前代祭墓风俗，并扩大到整个社会。由于寒食与清明节气日前后一两天相连，“寒食禁火，清明取火，”扫墓亦由寒食扩展到清明，唐人已将寒食、清明并称。唐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清明不仅从寒食中分担了祭墓的功能，同时它也将一些原本属于寒食节日的游戏娱乐也纳了进来，比如秋千、放纸鸢、拔河、蹴鞠等是寒食的著名节俗，这时也已成为清明节的娱乐，唐代大诗人杜甫《清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如果说唐朝寒食与清明并列的话，那么宋朝时清明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寒食的置代。扫墓作为清明节的重要内容，一直被延续下来，直至明朝清朝期间，风气更盛。清顾禄《清嘉录》记述：“士庶并出祭祖先坟墓，谓之上坟。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止。”

古人扫墓以清明前一日至立夏日止，前后历时足足一个月。按深圳当地风俗，历时也较长，因为从迁居地的开村始祖开始，依次上冢除草、培土

清理，由于不断迁徙，先祖、太公和较近的祖父、父辈可能不葬在一起，这样祭扫就需时日，延至清明后，但最迟不超过农历四月初八，民间认为从这一天开始，“就闭墓门了”。解放后不断推进殡葬改革，许多坟山被迁，人们就集中各位先人的骨灰于一个墓园，省却了分散拜祭的时间。

拜山有个“压纸钱”，也叫“挂纸钱”习俗。也就是把几张冥纸压在坟头、墓碑顶或挂在墓树上，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费用。因为古时寒食节禁火，连墓地拜祭也不能火化纸钱，人们只好将纸钱插、挂在坟头或撒在墓地四周，这种习惯随着寒食节历经数代，已经形成特定的民俗传统。直至明代清朝期间，寒食节基本消失，也早已不禁火了，但烧纸钱和压纸钱的习俗仍然并存，流传下来，“神前新火一炉香”，还清明“本来就是钻取新火的日子”原意。



解放前，村人“烧金猪”拜山祭祖。

清明节，当地人也借此机会行山“郊游”，古人是在这“梅雨季节”避“秽气”，今人也趁这春光明媚的清明节气，到野外踏青，呼吸新鲜空气。在这节令里，不忘在山上“就地取材”，形成做“清明粄（米糕）”的习俗，较为普遍的是“鸡屎藤粄”、“艾粄”和“苎叶粄”。《宝安县志·时节习俗》：“有做清明茶果的习惯，用艾叶或鸡屎藤捣碎与米粉搓匀，芝麻、花生、糖作馅制作，也有其他材料作馅或无馅，款式多种。农家大门门楣挂大艾或柳条避邪。”

“鸡屎藤”，是一种藤草植物，和艾草、苎麻叶、白头翁、狗耳草等可食用。每年过了立春，万物更新，清明前后，草叶新绿，乡人上山将“鸡屎藤”等植物采摘回来，洗干净，晾干水，煮熟，拌在预先浸透滤干的糯米、粘米中，用石碓臼舂成粄团，按比例掺上红糖等搓匀，捏成指头般大小，一小颗一小颗排列在巴掌大的蕉叶上，放在蒸笼上蒸熟，就制作成甜“鸡屎藤粄”，如果拌上盐就是咸“鸡屎藤粄”。用艾草叶做的叫“艾粄”、苎麻叶做的叫“苎叶粄”，颜色草绿、清香可口，风味独特。民间说法，吃了清明“鸡屎藤粄”等米粄，清祛湿毒，在来近的夏天，不会生疮疖。“鸡屎藤粄”除了自家吃外，还是馈赠亲友的佳品。

“清明粄”的食俗，追溯起来，仍然与寒食节有关。宋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一书中记载了寒食节食品“青隋饭”，与清明粄类似。“青隋饭”：“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道家谓之青精饭，石饥饭。”寒食清明染青饭的习俗在南方一向较为流行。郎瑛在《七修类稿》卷四十三就提到寒食节吃“青团子”。这种青团子是在糯米中加入雀麦草汁舂合而成，馅料多为豆沙或枣泥。放入蒸笼之前，先以新芦叶垫底，蒸熟后色泽翠绿可爱，又带芦叶清香，是很受欢迎的清明节食品。青团子的制作方法，也跟“鸡屎藤粄”相似。

综观这些清明节食品的共同特色，是“就地取草”，可吃，可入药，且皆可热食冷食。顾禄《清嘉录》卷三按语中说：“今俗用青团、红藕皆可冷食。犹循禁火遗。”还是“禁火三日”的遗风。苏杭等地也盛行清明节吃青团和红藕两种冷食习俗。四川成都一带，人们习惯用米粉做成团，用线串起来，在清明这天拿到欢喜庵前来卖，称之为“欢喜团”，有诗赞曰：“欢喜庵前欢喜团，村郊买食百忧宽。”



由于旧时交通不便，拜完山后，就地做午饭，习俗叫做“吃山头”

“百忧宽”，清明时节扫了墓，祭了祖，还了心愿，吃了应节粄食，也郊游踏青了一趟，真是“百心宽”。

我想，几百年间深圳人从中原几度迁徙至此，带来各地习俗；如今，在宝安、龙岗两地的村民，能采到鸡屎藤等植物的，仍没有中断这种地方糕点的习俗。民俗足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晋《风土记》载：粽子“以象阴阳相包裹”，吃绿豆馅粽、灰水粽确能祛暑。到大江、河海洗“龙舟水”，扒龙舟，能解暑气。熏艾草、挂菖蒲、涂雄黄，去毒避邪。深圳人过五月节，初一、初二就开始割芦箬叶、麻竹叶、芦苇叶、笋叶等做粽叶，然后削掉叶刺，用水泡浸一两昼夜，再煮一下去掉苦涩草腥味，裁剪成一定尺寸规格，晾干。第三四天就把泡浸好的糯米、粘米、绿豆、红豆、莲子等，用粽叶包上冬菇、虾米、烧肉、火腿、咸蛋黄、五花肉腩等材料，用水草扎紧，一个个放在蒸笼蒸煮3个多钟头，做成香喷喷的咸粽。

五月节与“扒龙舟”

五月节，裹蒸粽

端午节，深圳客家人叫“五月节”，广府人叫端阳节。

端，古人意思是“初”、“始也”，端午也就是初五。五月是毒月，初五是毒日，初五日的中午又是毒时，居“三毒”之端，亦为全年大热天开始，五毒蛇虫开始活跃。民谚云“一过端阳，棉被入箱”，处于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为适应这炎热的天气，很早就在“五月端”这一天，采取各种措施防毒、消暑、避灾，逐渐形成形各种各样的风俗。

其实，端午节是我国多民族的民俗大节，除了汉族，还有26个少数民族都举行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端午节作为五月五日的节名，始于魏晋时期。晋人周处的《风土记》记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夏历的五月五日，后人用数字记时体制取代干支记时体制，以“重五”取代“重午”，但唐代以前“端五”、“端午”混称；唐玄宗李隆基生于八月初五，为避讳，以后便正式将“端五”改为“端午”，沿用至今。

端午节有说是纪念屈原，也有说是纪念春秋吴国伍子胥、东汉的介子推和

汉安帝时期浙江的曹娥。现代学者闻一多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地区的龙图腾崇拜。流传影响最广的，还是附会于端午节关于屈原的一则美丽的传说。

据《史记》记载，屈原当时是楚国的大臣，他很有才华，得到了楚怀王的器重，但是也因此引起了同僚中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嫉妒，他们在楚怀王以及后来的继位者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昏庸的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最后受到奸臣的离间将屈原放逐。屈原悲愤满腔，写下绝笔《怀沙》后，怀抱大石投入了汨罗江。楚国也在屈原死后的数十年被秦国所灭。屈原的自尽震惊了楚国，百姓们非常悲伤，纷纷前往江边凭吊。渔夫们竞赛似的在江上打捞屈原尸首，这就是以后赛龙舟的风俗由来。有一位渔夫还拿出用叶子裹着的饭团和鸡蛋丢入江中，让鱼虾吃饱以后不会再去咬噬屈原尸首，吃粽子的习俗就这样流传开了。还有一位老医师向江中倒入一坛雄黄酒，想迷晕蛟龙，不让蛟龙伤害屈原。结果，传说没过多久，水面上浮起一条晕蛟龙，龙须上面还挑着一片屈原的衣襟。人们愤怒了，大家一起把蛟龙拉上岸，抽其筋，并把这些龙筋缠绕在小孩的手上和脖子上。

南北朝吴均在《续齐谐记》有这样一段叙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所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江之遗风也。"

深圳人过端阳节，在五月初一、初二就开始裹粽的准备工作，首先割粽叶，有的到河边割两三尺长三寸宽、叶边长满硬刺的芦糍叶，有的到竹林采摘比巴掌大的麻竹叶，有的割芒草叶、芦苇叶、箬叶等；采回来后削掉叶刺，用水泡浸一昼夜，再煮一下去掉苦涩草腥味，裁剪成一定尺寸规格，晾干。第二天就泡浸糯米、粘米、绿豆、红豆、莲子、冬菇、虾米，准备好咸蛋黄、五花肉腩等材料，用粽叶包上糯米、粘米绿豆或红豆，馅料放莲子、冬菇、虾米、烧肉、火腿、蛋黄等，用水草扎紧，一个个放在蒸笼蒸煮 3 个多钟头，便做成咸粽。如果做碱水粽，还要把草木灰拌水泡浸，然后沉淀滤灰，取"灰水"泡浸糯米蒸煮，这样做成的碱水粽也叫灰水粽。灰水粽没馅料，最多只包进几颗红枣，蒸熟后要蘸白砂糖或糖浆吃，所以也称作甜粽。

粽子按味道分为咸粽、甜粽；按形状分为三角粽和长条粽。以前人们为方便分辨咸粽、甜粽，就把甜粽（灰水粽）包成三角粽，把咸粽包成长条形，因为长条粽每只 5 寸至 8 寸不等，直径 3 至 4 寸，容量大，能裹馅料多，通常每条粽半斤至 2 斤左右。现在裹的粽子除肇庆粽保持 1 斤重外，其他都在半斤以下的"袖珍粽"。初四或初六那天，把新做的粽子赠与亲友，



扒龙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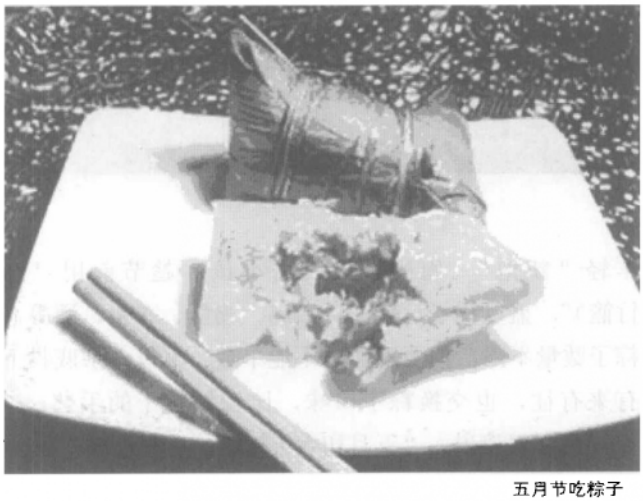
年轻“新抱”（媳妇）们带着小孩，趁节前用“圆笼格（篾织带盖子的竹篮）”，盛以粽子、猪肉、活鸡、鸡蛋、水果、酒等，回娘家贺节；探亲带的粽子数量不限，但要双数，不能单数。父母、亲戚收下一部分，回赠一部分，有来有往，也交换粽子口味，比较做粽子的手艺。

所以民谚说：“五月初六年初四，有粄也去无粄也去。”意思是五月节前后两天和春节年初四，一定要回娘家探亲，哪怕是没有粽子、茶果、糕粄等礼品。以前没有冰箱，正值夏天，吃不完的粽子，泡浸在水里，不让接触空气，就不会馊坏。粽子由糯米做成，粘性大，水浸泡一周不成问题，吃时只要煮开煮透就可以了。

史料中关于粽子的记载，始于东汉。当时的粽子包成牛角状，称为“角黍”。西晋周处《风土记》称：“五月五日，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以象阴阳相包裹，未分散也。”东晋范注《祠制》说：“仲夏荐角黍。”角黍，即角形的粽子。上古祭祀神灵所供奉的三牲，往往以角为贵，角是人神沟通的灵物。早期的粽子角黍，制成角形，正是对动物角的模仿，这种模仿的意义就在于赋予粽子以祭祀功能。由于粽子是用作祭祀的灵物，所以到了南北朝，随着屈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日渐崇高，自然成了纪念屈原的祭品。

吃粽子虽是纪念屈原，但其实是人们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自行调理身体的夏令食品。古时人为防热毒，采用吃、洗、熏、闻等种种压禳的方法，《夏小正》以端午日为“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晋周处《风土记》说

过粽“以象阴阳相包裹”，吃绿豆馅粽、灰水粽确能祛暑。到大江、河海洗“龙舟水”，扒龙舟，能解暑气。熏艾草、挂菖蒲、涂雄黄，去毒避邪。《荆楚岁时记》说：“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云“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贴以艾叶，内人争相戴之。”后世又加菖蒲，剪作剑状，称蒲剑以却鬼。我们小时候挂香包，姑娘们挂包以五色丝线编织，香包中装有檀香、八角、花椒、琉璜等。香包的五彩丝线绝不是随便搭配的花色丝线，而是确定了的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五色丝的五色代表五行，也代表五方位，彼此相生相克。青色属木，代表东方；赤色属火，代表南方；黄色属土，代表中央；白色属金，代表西方；黑色属水，代表北方。以动物为标志，东方为青龙，南方为朱雀，西方为白虎，北方为龟蛇，中央为黄龙，均为灵物。五彩丝，古俗名称避兵缯，朱索等，系在蚊帐、摇篮上的又叫宛转绳、健绳，具有神秘的“驱邪迎吉”作用。



五月节吃粽子

深圳当地用五彩丝还织成小网兜，里面装着个用植物颜料染红的鸡蛋，给小孩挂着去玩，去游水，饿了，就吃红鸡蛋。这个习俗在郊区农村和香港新界一直流传至今。

洗“龙舟水”，扒龙舟

端午节，除了吃粽的习俗外，还具有全民防疫健身的丰富内涵。在辽、金、清各朝历史上，端午节的北方都有契丹族、女真族和以后的八旗将士骑马射柳、打马球的竞技遗俗。南方江河水网纵横，水上竞技活动也历史悠久。唐刘禹锡《竞渡曲》自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民间传说吴国忠良伍子胥被奸臣所害后，天帝怜他冤死，封他为钱塘江的潮神。《曹娥碑》上说：“五月五日，以迎伍君。”江南一带水乡，在每年五月五日伍子胥尸首被投入江中的日子，都要划龙船迎接潮神。

深圳人赛龙舟称为“扒龙船”，700多年前则称“扒皇舟”。相传南宋景炎二

年(1277 年)四月，小宋帝赵昰、赵昺当时被元军前截后追，从福建沿海仓皇逃至新安县九龙土瓜湾(今香港)时，饥寒交迫，幸得百姓雨夜送百家菜，晨日赛民结队迎驾。驻跸月余，恰逢端午节，赵昰端宗王观看当地龙舟竞赛后，以护驾有功，御赐黄缎巨型罗伞给乡民。该罗伞绣字图案甚多，原物久已破烂，村民代代复制，每年端午赛龙舟，必奉御赐罗伞置于龙船之中，这种龙船被称为“皇舟”，由乡绅父老先向御伞叩拜，然后才开始竞渡。据说，如今广东有些地方赛龙舟也在船上设一罗伞，可能源于九龙土瓜湾这个风俗。

上世纪 60 年代之前，河流未被拦截筑成水库，东宝河、茅洲河、西乡河、石岩河、观澜河、龙岗河和流经深圳墟的布吉河，河水满盈，水质清澈，人们在端午节那几天洗“龙舟水”，扒龙船。蛇口、南头、沙头角、盐田、葵冲、大鹏、南澳等沿海村民，就在蛇口海湾、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等海上洗“龙舟水”，扒龙船。“扒龙船”，最负盛名的是松岗、盐田和南澳三地。



热闹的龙舟竞赛

松岗镇属珠江口水系，河涌交错，历史记载原住民多为“水军”、养鸭人和“海盗”。“水军”，是 700 多年前南宋名将文天祥率部在深圳伶仃洋抗元殉国后，流落到新安县松岗、福永、岗厦一带落地生根的后裔、兄弟和一部分属下水军。如今近 10 万的文天祥后裔，沿袭水军习俗，在端阳节期间纪念屈原的同时，还在文氏祠堂祭典文天祥公，到茅洲河举行盛大的龙舟赛，一展水军雄风。1961 年松岗五指耙水库建成后，当地村民在水库举行一年一度的扒龙船活动。1997 年和 2000 年举办过两届“松岗龙舟大赛”，1998 年举办“深圳松岗国际龙舟邀请赛”。松岗传统的龙舟赛习俗，被松岗籍的华侨带到澳洲、欧洲、东南亚等 16 个国家侨居地举办大大小小的赛事。

深圳东部较偏僻、贫困的村子要扒龙船，就临时卸了橹桅、风帆、舵把，挪去仓盖的小罾船，在船头上扎上大红绸带，船头两边画上个圆圆的“龙眼”，装上一面大鼓，精选 20 名精壮汉子，在风平浪静的海湾上比赛，赢输都有奖，奖品为一筐鲜鱼或公鸡 3 只、青菜一担，只不过赢多输少，分量不同，皆大欢喜。盐田、南澳、大鹏、葵冲较富裕的渔村截然不同，他们用三四丈长的坤甸木作龙骨，专门制作龙船。坤甸木质地坚韧，轻便又易划水，但最怕曝晒和北

风吹。故每年龙舟赛事以后，龙头放进村里祠堂，龙船身便将它埋入村边河涌泥底，至次年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由村里长者主祭，才将龙船起出，修整涂油，村中青年利用这20来天操练，这个仪式叫做“出水龙”。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四月八日浴佛，采面荭榔，捣百花叶为饼。是日江上陈龙舟，曰出水龙，潮田始作。”俗谚又谓“四月八，龙船随海滑”。有的地方嫌时间太早，遂改为五月初一才起出龙船。俗语顺口溜：“初一龙船起，初二龙船忍，初三初四游各地，初五龙船比。”初五是赛龙船的高潮，方圆百里，数十支龙舟队竞技，引得上万群众观看，得胜者可获赏全只烧猪与赏银元。能赢只烧猪回来，这是村里最高荣誉，觉得这个端阳节没白过。

“文化大革命”至开放改革前，为做好堵截非法外逃香港的边防工作需要，整个深圳市的扒龙舟活动，被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建立特区后，1988年6月18日端午节那天，深圳市举办“88’深圳首届小梅沙龙舟大赛”，来自深圳、东莞、香港三地的16支龙舟队在梅沙海湾分组进行比赛，期间下了一场大雨，丝豪没有影响划手的情绪，相反选手们在锣鼓声中和3万多观众“加油！加油”的阵阵呐喊声中，越战越勇，经过3个多小时的角逐，有6支龙舟队进入决赛，最后，香港第一旅行社、中国计算机发展（深圳）公司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的龙舟队，分别获前三名。2007年1月松岗街道的“赛龙舟”被深圳市政府批准列入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名录。打从2008年开始，端午节列入我国重大节日假日中，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优秀民间文化——“五月节”习俗，将被永远传承下去。

农耕时代深港一带，姑娘们过“七姐节”很重视沐浴梳洗。因每年七月初七清晨，七仙女下凡洗澡，有“喝其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之说。此水名“七姐水”，这一天鸡鸣时分，到山溪河边或村头古井汲水，一用来淋洗沐浴，“养颜秀发”；二挑回家里，用陶罐密封起来，几年不坏，更不生虫，其他日子哪怕是同一口井汲的水，却没这功效。当地人用“七姐水”，腌制水果瓜菜，味道特好。如果大暑天，邪火上身，咽炎生疮，喝碗“七姐水”，疮消炎退。如果生“痄腮”，用犀牛角和“七姐水”磨之，涂之，立刻有消肿止痛之效。

深圳“七姐节”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深圳有个“七姐节”。也许是广东口音或广东人特爱讲究意头的原因，外省人叫“七夕节”、“乞巧节”，到了这里就称为“七姐节”、“七姐诞”。“七姐节”是姐妹节，女儿节，如今时髦的人爱商业炒作，不冠上“中国的情人节”，生怕吸引不了眼球。旧时的女人笑不露齿，穿不露臂，男女授受不亲，手也不敢拖一下，哪敢叫“情人节”？

不过，“七姐节”是属于女人的一个重要节日，早早筹备，热闹上一两天，“小圈子”过得隆重而温馨，倒是一点不假。

“七姐节”追根溯源，与七仙女下凡有关，更流传着千古委婉、优美动人的牛郎织女民间故事。相传在很早以前，豫鄂交界的南阳城西牛家庄里，有个聪明、忠厚的小伙子，父母早亡，跟着哥哥嫂子度日，嫂子马氏为人狠毒，一年秋天，嫂子逼他去放牛，给他 9 头牛，却让他等有了 10 头牛时才能回家。牛郎无奈，独自赶牛进山，在草深林密的山里，他伤心流泪，心想何时才能赶着 10 头牛回家？这时，有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别难过，在伏牛山里有一头病倒的老牛，你去好好喂养它，等老牛病好以后，你就

可以赶着它回家了。”牛郎翻山越岭，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了那头有病的老牛，就去打来一捆捆草，连喂三天，老牛吃饱了，才抬起头告诉他：自己本是天上的灰牛大仙，因触犯了天规被贬下天来，摔坏了腿，无法动弹。自己的伤需要用百花的露水洗一个月才能好，牛郎不畏辛苦，细心地照料了老牛一个月，白天为老牛采花接露水治伤，晚上依偎在老牛身边睡觉，到老牛病好后，牛郎高高兴兴赶着10头牛回了家。

一天，天上的织女和几位仙女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织女，产生爱意，做了牛郎的妻子。织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蚕分给大家，并教大家养蚕，抽丝，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牛郎和织女婚后，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耕女织，情深意重，生活幸福。但是好景不长，这事很快便让天帝知道，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来，强行把织女带回天上，恩爱夫妻硬被拆散。牛郎上天无路，哭地无门，还是老牛告诉牛郎，在它死后，可以用它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穿上牛皮做的鞋，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追织女，眼见就要追到了，岂知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绝在银河两岸，只能相对哭泣流泪。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对此也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于鹊桥相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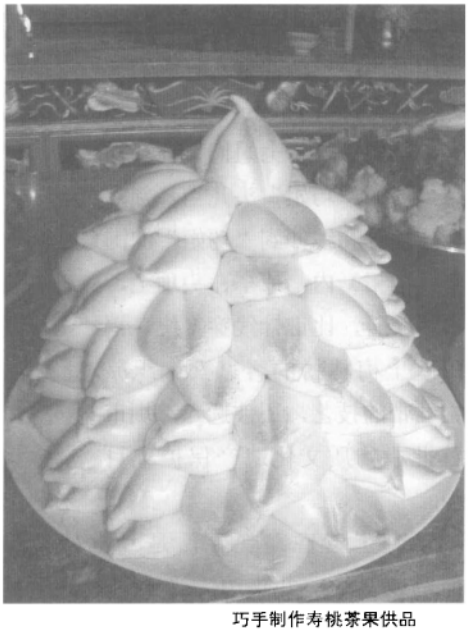
七姐节姐妹迎仙（潘剑明　摄）

后来，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乞求上天能让自己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能有如意称心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也就是深圳人的“七姐节”。

七夕节最早记载见于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后在唐诗宋词中也屡被提及，唐朝王建有诗句“阑珊星丰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千年习俗传至民间经久不衰，延续至今。

农耕时代的深圳和香港新界一带，姑娘们过“七姐节”非常重视沐浴梳洗。因为每逢七月初七清晨，七仙女下凡洗澡，有“喝其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之说。此水取名“七姐水”，也有人称“双七水”，人们在这一天鸡鸣时分，就纷纷到山溪河边或村头古井汲水，一用来漱洗沐浴，“养颜秀发”；二挑回家里，用埕瓮陶罐装着密封起来，很奇怪，就这一天的水，几年不变坏，更不生虫蛆，其他日子哪怕在同一口井汲的水，却没这功效。

当地人用这“七姐水”，腌制柿子、沙梨、黄瓜、芥菜等食物，味道特好，特脆。如果大暑热天，邪火上身，咽炎生疮，喝碗“七姐水”，炎消疮退。如果小孩头长疮疖，特别是生“痄腮”，用犀牛角和“七姐水”磨之，涂之，顿时消肿止痛，几日之内不打针不吃药，自然痊愈。有《广州岁时纪》为证：“即是日汲清水贮于坛内密封之，尝久贮不变臭味，曰七月七水，调药治热性疮疥，极有效果。”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广州人每以七月七夕鸡初鸣，汲江水或井水贮之，是夕水重于他夕数斤，经年味不变，益甘，以疗热病，谓之圣水，亦曰天孙水。若鸡二唱，则水不然矣。”广州竹枝歌云：“七夕江中争汲水，三秋田上竞烧盐。”



巧手制作寿桃茶果供品

这天早上，姑娘们挑完“七姐水”回家后，又陆续来到井边，用铜面盆盛上“七姐水”，首先用此水“湄眉”润发，然后用这盆水当镜子照自己，运气好的可在盆水中看到七仙女飘然下凡。祈求沾染仙气，乞讨智慧和手艺。

到了中午，姑娘们汇集在“七姐屋”（姑娘集居的闲屋或七姐头领独自居住的房屋），把隔天做好的好吃的米糕点心，从各家各户带来，有的做咸，有的做甜，有的蒸，有的炸，一比手艺高低，比谁做得好吃。这环节，山东等北方习俗是吃“巧巧饭”，姑娘们从各家集粮集菜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颗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谁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这“乞巧”，深圳当地视之为“巧妇斗厨艺”。我老婆是广东五华县水寨镇人，她老家一带有七姐节做“药粄”招待亲朋、馈赠亲友的习俗。这种药粄，是用茅根、鸡屎藤、尖尾枫、苎麻叶等七种

青草药，舂碎捣烂以后，用糯米粉、红糖等搓成粉团，压扁做成巴掌大小的糕粄蒸熟，对大暑天有消食健胃，去暑除湿的作用。在深圳五华籍人都保留家乡做七姐药粄的传统，只不过现在农村城市化，好些草药不好采摘，这药粄才少人做，少人吃了。

吃完午饭，整个下午姑娘们就比巧手。深圳一带的姑娘们多数比针线功夫，她们日常穿戴的头帕、围裙（客家人称围身）、头箍、凉帽穗、枕巾、香包、针线包等，用红、青、黄、白、黑五色丝线，架在一个五个齿槽的小木架上，线头绑在自己腰间把线绷直，再拿一只小梭子来回穿梭，一梭一线地编织。分别织成一指宽、二三尺长的做“围身”吊带，两三指宽、四五尺长的做凉帽穗带，巴掌宽、尺把长的做头箍等等。几位姑娘在屋檐下，沐浴着和煦的阳光，看谁织得快，织的图案生动。这些编织出来的丝带，装饰头帕围巾，是当地女人装扮的一大特色。比赛的第二个是针线功夫，姑娘们让“七姐们”公认聪慧灵巧的“巧姐”头儿当裁判，大家把针和线伸到“巧姐”的围身（围裙）内，或举在头顶上，不用眼看，比谁针线穿得快。福田区上梅林村的客家女编织凉帽丝带的技艺，还被选入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呢。



七姐节，姑娘们比赛手工技艺编织的饰物（杨茹　摄）

到了黄昏和晚上，是“七姐节”的重头戏，姑娘们在“七姐屋”门前，或宽阔的井头边，当着月光底下摆上香案和装满一式七份纸制衣服、仙棒等物的“七娘盆”，摆上当地产的红软柿子、菠萝、龙眼、葡萄、杨桃、白榄、油甘子七种时令岭南佳果，供上“五子”：南瓜子、炒黄豆、糖花生、熟莲子以及红枣子、鲜花，大家穿上新衣，戴上首饰，轮流在供桌前焚香跪拜七次，默祷许愿，女人们不仅乞巧，还有乞子、乞寿、乞美和乞爱情的。而后，大家一边吃水果点心，一边饮茶聊天，在眯上眼睛吃到枣的就早日找到相好，吃到莲子的就连生贵子，吃到糖花生就一生甜蜜，吃到南瓜子就荣华富贵……姑娘们星空七拜，谓之“迎仙”。少年活泼的女子，围在一起做“找仙姑”的游戏。客家地区的石岩、龙华、观澜、布吉、龙岗、坪山等姑娘们唱山歌，独唱、合唱或“驳山歌”，讲粤语的南头、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一带唱粤曲、咸水歌，类似歌会，把“七姐节”活动推向高潮。宋朝刘克庄曾有诗句描述“七姐诞”热

闹情景："粤人重巧夕，灯光到天明。"

据《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记载的广东一带"七姐节"风俗："七月初七日，俗传为牛女相会之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初六日陈之庭内，杂以针襄脂粉古董珍玩及花生时果等，罗列满桌，甚有罗列至数十方桌者。邀集亲友，晚招瞽姬（笔者注：盲妹的古称），作终夜之乐。贫家小户，亦必勉力为之，以应时节。初六夜初更时，焚香燃烛，向空礼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礼拜后，于暗陬中，持绸丝穿针孔，多有能渡过者，盖取金针度人之意，并焚一纸制之圆盆，盆内有纸制衣服巾履脂粉镜台梳篦等物，物凡七份，名梳妆盆。初七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礼神后，食品玩具，馈赠亲友。拜仙之举，已嫁之女子不与会。惟新嫁之初年或明年，必行辞仙礼一次，即于初六夜间，礼神时，加俱牲礼红蛋酸姜等，取得子之兆。又具沙梨雪梨等果品，取离别之义。惟此为辞仙者所具。他女子礼神时，则必撤去。又初七日午间，人家之有幼小子女者，咸礼神于：前，礼毕，燃一小梳妆盆，曰拜；前，祈其子女不生疮疥。"

如今，时过境迁，许多高楼大厦的住宅社区，已没有田头水井、浣溪河边，当下女郎时髦穿戴，自然不用编织丝带打扮，更不用乞拜"七仙女"赐美赐福，一样光鲜靓丽。因而，日前广东省文化厅来电，想找一些当年的"巧姐"能手，参加省组织的各地巧姐手艺比赛，我寻访了10多位老朋友、老同学，甚至80多岁的老乡亲戚，她们都摇头，"好久没做了"，抑或摊开双手"没工具没材料做"，很遗憾，没有参加省巧姐比赛手艺。

"七姐节"一些习俗，随着我们日益现代化的生活，逐渐淡去，许多有趣的坊间游戏和民间手艺，也慢慢成为我们珍藏的记忆。不过，挺会创新的深圳人，却利用"七姐节"搞"千人鹊桥会"。锦绣中华·民俗村更是抓住"机遇"，搞"泼水狂欢，情缘七夕"，在民俗村"梦水情谷"泼水广场，近230对情侣参加了泼水狂欢活动，背新娘运水、情侣对泼、送香包、对情歌，在古老的民俗节日里，渗入年青人欢庆娱乐的现代元素，也许这"旧瓶"装了"新酒"，会带给我们一点启示：中国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脆弱，不然，她何以能延续数千年之久？

中秋夜挑选吉时拜祭祖先，是深圳本土传统习俗。春节和中秋，为一年两次祭祖最隆重的仪式。家人出门在外，“千远水路”都赶回相聚，“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亦不肯虚度此夜。”吃过晚饭，当月亮出来时，摆上月饼、花生、芋仔、菱角、红柿、柚子、香蕉、苹果、桃子等食品，在家赏月。清咸丰年史料记载：“八月望日，尝芋食螺。”剥芋仔，意“剥鬼皮”为驱邪之举；开柚子，取“佑”谐音，保佑平安；食花生，祈愿多生子女，养后防老；吃菱角望子聪明伶俐；女人拜月，心底里祈愿青春常驻，像嫦娥般美丽。但俗传：“女不祭灶，男不拜月。”

八月半与孔明灯

农历八月十五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所以称“八月节”，深圳客家人称作“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

深圳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八月十五过中秋，但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却流行八月十六“追月”。香港政府早年制定假日制度，规定八月十五上班，第二天才公众放假一天。八月十五过节那天，人们下班回到家都八九点了，又累又饿，无心赏月；第二天放假了，心情放松，兴致盎然，在八月十六日夜好好赏月一番，沿习俗成，名曰“追月”。相传这个习俗是江浙一带的人带来的，史料载“宁波以十六日为中秋，为宋史弥远所改，至今犹然。”清人陈子厚《岭南杂事钞》序：“粤中好事者，于八月十六日夜，集亲朋治酒肴赏月，谓之追月。”如今广东这一风俗早已淡去，唯独深圳的邻居——香港仍旧盛行。

这样也好，有时间的香港居民，八月十五回深圳和内地家乡过节，八月十六又返回香港“追月”，过足中秋节“瘾”。

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民俗大节。中秋节起源于古代的祭月典礼，古人认为五谷丰收离不开月亮，如果没有月亮赐予露水，没有月亮圆缺以计农时，丰收也是不可能的。先秦时代，就有帝王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据《礼记》载道："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意思是说皇上在春天祭日，在秋天祭月；祭日在早晨，祭月在夜晚。进入唐代，中秋祭月、赏月逐渐成为民间风俗，到了宋代太宗年间，皇帝正式颁旨以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中秋节的习俗活动，顿时在大江南北兴盛起来。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上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前争占酒楼观月。"《新编醉翁谈录》更详细记述宋代民间拜月的习俗："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能自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祭月时，男子多不叩拜，谚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

入了仲秋，金风送爽，玉露凉习，星河皓月，丹桂飘香。人们当空对着月中不断砍伐桂树的吴刚、婀娜文静的玉兔、蟾蜍（月精），联想嫦娥奔月的民间故事，肃然起敬，虔诚祭月、拜月、赏月，甚至玩月、走月和跳月。吃月饼，祝团圆，舞草龙，玩灯笼，"耍乐仔"，"烧瓦塔"等民俗活动，几乎通宵达旦。月光下，尽情表达人们对"花好、月圆、人长寿"的美好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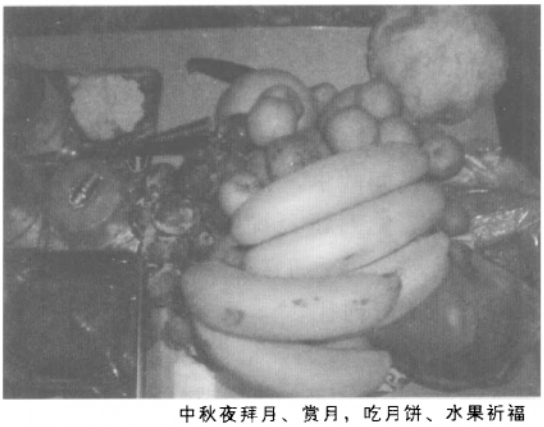
中秋祭月、赏月，最主要的应时食品，当然是月饼了。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馈，取团圆之意。"《中国风俗辞典》记述中国月饼传说起源于唐初。唐高祖李渊与百姓欢度中秋，他兴致勃勃地看着吐蕃（今西藏）进贡上来的味道鲜美的圆饼，指着天上明亮的圆月，高声笑道："应将圆饼邀蟾蜍。"随即把圆饼分与众臣共食之，同庆欢乐，于是吃月饼的习俗开始流传。

吃月饼的习俗，还有另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军，利用中秋节向百姓馈赠麦饼，在饼内夹带字条"八月十五杀元兵，家家户户齐动手"，定于中秋起义。各家各户掰开月饼，按字条拿起菜刀，揭竿而起。从此，中秋节向亲友互相馈赠月饼，中秋夜赏月吃月饼的习俗流传至今。

中秋节挑选吉时拜祭祖先，是深圳本土传统习俗。春节和中秋，为一年两次在家里拜祭祖先神明最隆重的仪式。父母、兄弟凡出门在外的，"千远水路"都赶回来相聚，"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亦不肯虚度此夜。" 先拜祖先，然后早早吃过晚饭，待月亮出来时，摆上月饼、花生、芋仔、菱角、板栗、红柿、柚子、香蕉、苹果、杨桃等食品，在家里院子或阳台赏月。女人们接着拜月。民间传说月光是月神，多由妇女祈月，主持拜月。烧

大香、点红烛，燃“元宝”纸。也许我老家那几个村子的祖先，是来自梅州兴宁、五华一带，许多习俗保留着那里的客家传统。如清道光《长乐县志》载：“中秋荐新芋而去皮，曰‘剥鬼皮’。”剥芋仔，“剥鬼皮”，意在驱邪之举。开柚子，取“佑”谐音，保佑家人平安。食花生，祈愿多生子女，养后防老。吃菱角能让孩子聪明伶俐。女人拜月，心底里祈愿青春常驻，像嫦娥般美丽。旧时，妇女们还要“拜菜篮神”、“拜竹叶神”、“拜扫帚神”、“拜桌神”、“拜簸箕神”和“拜筷哩神”，如今这一代人简化了，只剩下赏月和拜月。男人们呢？赏完月，吃了月饼，去看花灯、舞草龙，小孩子就出去“玩灯笼”、“耍毬仔”、“烧瓦塔”。

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八月十五之夕，儿童燃番塔灯，持柚火，踏歌于道曰：洒乐仔，洒乐儿，无咋糜，塔累碎瓦为之，像花塔者其灯多，像光塔者其灯少。柚火者，以红柚皮雕镂人物花草，中置一琉璃盏，朱光四射，与素馨茉莉灯交映。盖素馨茉莉灯以香胜，柚灯以色胜。”屈大均描述了三四百年前粤人过中秋时“耍乐仔”，点柚灯玩乐情景。我们小时候就玩过，现在中秋仍然习惯吃完柚子，用柚子皮做柚灯给小孩子玩。以前没多少玩具，物尽其用，就把柚子皮镂空成三角、圆形、菱形等形状的洞，里面放盏油灯或点支蜡烛，用棍子提着玩。提着柚子灯跟小伙伴们比手艺。客家人管柚子叫“禾毬”，圆圆的，像车轱辘，所以将“耍乐仔”又称作“耍毬仔”。


中秋夜拜月、赏月，吃月饼、水果祈福

“烧塔仔”，是旧时孩童在节日里最大的娱乐。“烧塔仔”在深圳一些客家地方曾经流行。中秋节下午，孩童们就在村巷空地上，找来一大堆瓦，将塔垒砌成高一二米不等，大的瓦塔还要用砖块砌成底座，约占塔高的1/4，然后再用瓦片叠砌，不用糊泥；塔周搭成许多瓦孔通风，顶端留一个塔口，供投放竹、木、谷壳、柴草进去燃烧，火苗便从瓦片的空隙中熊熊吐射出来。直烧得砖热瓦红，大家便争相撒上盐巴、松香粉，于是“哔哔叭叭”响声激烈，火星飞溅，映红夜空，此为壮观，“最兴”。民间还有赛烧塔仔规例，谁把瓦塔烧得全座红透则胜，不及的或在燃烧过程倒塌的则负，胜的由大人发给小彩旗、糖仔或糕点当奖品。

深圳讲粤语的村落，过中秋还有个吃田螺的习惯。清咸丰年间有关的史料记载："八月望日，尚芋食螺。"民间认为，中秋吃田螺，可以明目。但为什么一定要在中秋吃呢？有人说中秋前后，是田螺空怀的时候，腹内无小螺，因此，肉质特别肥美，是食田螺的最佳时节。如今深圳已没有良田，也没有抓田螺的乡野情趣，只有到市场购买内地运来的田螺，自行炒熟解馋，回味一下旧习遗风。

中秋节放"孔明灯"是非常有特色的节俗之一。小时候，我们每年都放，只是后来据说容易引起火烧山，在实施封山育林的几十年以来，基本上没搞过，偶尔看见香港新界的孔明灯在高空中飘过来，即时唤起我们童心未泯，兴奋了一阵子。

"孔明灯，放上天，吉星照，人团圆。"孔明灯，以竹条扎围，直径约四五尺的竹圈，竹圈外层用纱纸或薄布糊成，高八九尺左右，呈大圆桶状，封住上顶，下面竹围中间用铁丝交织，其中点织一个网兜形的铁丝网，固定一个小铁盆盛上草纸或棉纱，浸透火水（煤油）或茶籽油。放灯时，先将灯的圆顶垂直拎起，然后把灯里铁丝网盆的草纸或棉纱点燃，再由几个后生紧紧按住灯，等到灯内油纱燃烧出来的热气充满纸圆筒，直至强烈感觉往上冲时，指挥者说"放"！大家随即放手，孔明灯就像热气球一样，飘然升空。顿时，大人小孩都翘首欢呼，朝着孔明灯飘移的方向欢快奔跑。

几个村子同时放飞孔明灯，从地面上看去，恰似明月当空的星星。孔明灯燃烧得越旺越久，预示放灯人生命力越旺盛；因而大家竞相比谁的灯好，飘得远，时间久。孔明灯是祈福的，灯壁纸写有祝福的话语，如中秋快乐、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五畜兴旺等，也有人把愿望用几个字写上，把愿望放飞。总之，孔明灯是凝聚村民的心愿、希望、信仰和祝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乡村文化。

这种大型的圆筒纸灯，为什么叫孔明灯呢？相传刘备的军队被曹操围困在山上，不投降的话，就要饿死的。孔明在这危难关头，心生一计，做了许多奇特的灯笼。刚好中秋节到了，曹营沉浸在节日欢乐的气氛中，孔明命人在天刚暗淡下来时点灯，成百成千的灯笼飘离山头。曹兵醉眼朦胧，认为刘备的军队坐上这不明飞行物逃跑，慌忙朝着灯飘去的方向追去，曹操防线出现缺口，刘备的军队就从这缺口迅速撤离了山头。后来，老百姓将这种灯叫做孔明灯，放灯的时候，也忘不了像曹兵那样，拼命去追赶一番。

当孔明灯油尽火灭，灯内热空气渐少，就会掉了下来。由于飞得高，飘得远，飞到哪就降落在哪。降到山林就火烧山，我就见过香港新界的山头被孔明灯烧着。随着政府"禁带火种"、"保护山林"禁令的实施，这种"危险"的放灯习俗活动，才离我们远去。

深圳人过重阳节较为重视的两个习俗，一是秋祭拜山，二是登高爬山。《宝安县志》记载："农历九月初九为头阳，九月十九为二阳，九月二十九为三阳。重阳在宝安为秋祭日，主要是全族公祭祖先，费用由族中公偿田产所得支出。族长及辈分高的老人可乘轿，其余的人步行跟随至墓地。祭品丰盛，祭仪隆重，规矩讲究。祭仪由族长或辈分高的老者主持，众人肃立墓地堂前，拜祭为三献三跪九叩首。拜祭完后将祭品带回祠堂拜祭祖宗灵位，然后分'丁肉'，男人每人可分得猪肉一份。"这就是俗语说的"分太公猪肉，人人有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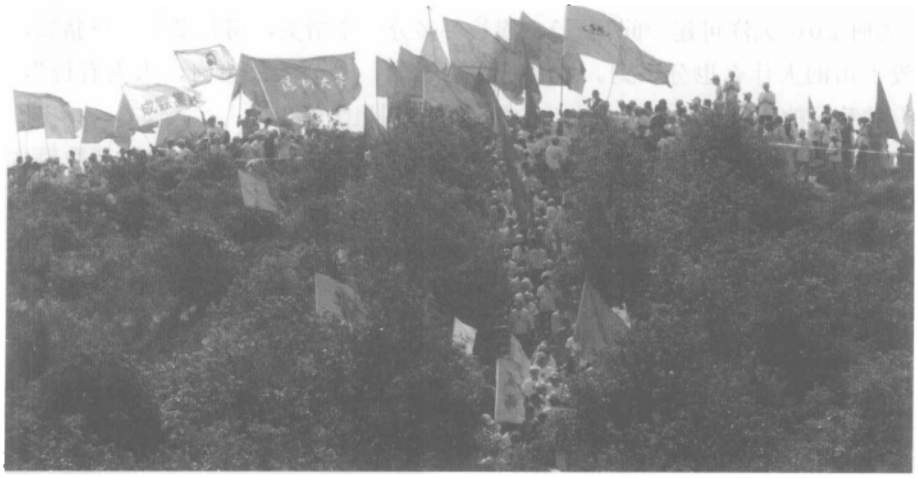
重阳节与爬山

逢农历九月初九，民间称这一天为九九重阳节。

重阳节是一个古老传统的节日，它的由来十分久远。先秦时期，屈原《远游》诗中就有咏重阳的佳句。著名的《易经》古籍，就有"以阳爻为九"等辩证论述。以九为阳，以两九相重称重九；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九月九即被称为重阳节。重阳节古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和登高"的习俗，所以，重阳节除了称为"重九节"之外，还有"菊花节"、"茱萸节"、"女儿节"、"登山节"，近20年又增加称谓"老人节"。

重阳之所以称之为"节"，史料记载始于唐代大臣李泌奏请皇上，被恩准正式确立重阳节，然后官方发布告示：重阳节为"三令节"之一。从此，重阳节为全国汉族民俗大节。

深圳人过重阳节较为重视的两个习俗，一是秋祭拜山，二是登高爬山。深圳人从中原几经迁徙，来到南蛮荒地，数百年艰辛，发展至今天，实属不易。因而，非常敬重祖先，有的宗族在迁徙中还不断背着祖先的骸骨，住到哪葬到哪，葬到哪祭到哪。所以，逢年过节不忘典祖，小节在家中小祭，大节全村全



阳台山万人登高（周光辉 摄）

族祭。乡俗有两大祭，分别为“春祭”和“秋祭”，春祭在清明，秋祭在重阳，如果错过春祭的，还有机会在秋祭补上。

《宝安县志》记载：“农历九月初九为头阳，九月十九为二阳，九月二十九为三阳。重阳在宝安为秋祭日，主要是全族公祭祖先，费用由族中公偿田产所得支出。族长及辈分高的老人可乘轿，其余的人步行跟随至墓地。祭品丰盛，祭仪隆重，规矩讲究。祭仪由族长或辈分高的老者主持，众人肃立墓地堂前，拜祭为三献三跪九叩首。拜祭完后将祭品带回祠堂拜祭祖宗灵位，然后分‘丁肉’，男人每人可分得猪肉一份。”

深圳东门老街，据说是由张姓4兄弟早年开的几间店铺慢慢发展起来的。这4兄弟，就是张思月、张爱月、张怀月、张念月，繁衍成今天的罗湖向西村、湖贝村、水贝村以及后来的黄贝岭村子。这4个村子的张氏家族包括侨居海外、港澳台的，已达2万多口人。这4兄弟开拓东门的深圳圩，少说也有三四百多年，至今东门步行街仍保留“思月祠堂”。如果溯上从河北清河县迁至福建，再到深圳定居（明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的话，张氏抵深圳已有630多年历史。

据该张氏族谱记载，晚清和民国时期，这4个村子的张氏男性，都要在重阳节集中到盐田响地（今盐田港）和香港新界南涌举行“秋祭”。60岁以下的“年轻人”男人必须半夜起床，各自煮早饭吃饱，然后自带裹有咸菜的饭团当午餐，扛上锄头铁铲去墓地。由于交通不便，要走五六个钟头的路程才能到达，

但族长、房长和长辈，不用走路，可以坐轿。上山后拜祭完毕，60岁以上的长辈可留在山上吃盆菜，俗称“吃山头”。其他人走路回到村里祠堂，凭上山扫墓时发的纸签就可以分得一块“金猪肉”、一块生猪上肉和一毫子（当时200大洋可建一间瓦屋）。族长可多分一个猪头，房长多分一只猪脚，没上山的人什么也分不到。这就是俗语说的：“分太公猪肉，人人有份”，有关秋祭的所有费用来源于太公的田地和店铺租金收入。

如今秋祭，不只限男性，妇儒老少均可参加，也不再走路，开数辆大巴来回接送。每年秋祭前两三天，由张氏几个村子轮流做“山头主”。“山头主”主要负责提前上山打扫墓地，翻新碑文，准备好用来烧元宝香烛的“化宝沙盘”，以及公用的祭品。祭毕后以村为单位吃大盆菜，资金来源靠祠堂香火钱、村民认捐和海外宗亲捐助。


重阳扫墓供品

秋祭人越多，场面越热闹，说明族人越兴旺，敬祖感恩之情越浓。

祭祖的人们，借机郊游、登高、爬山，放风筝。香港新界的宗亲还蜂拥到车公庙拜一拜，买个风车转转运。八九十年前，与深圳同属新安县的香港还有个特别的习俗，重阳照“转运照”，也就是照相者不取相片，照相机里也不必装上底片，只装模作样面对镜头，让快门发出“卡嚓”响声就可以了，隐喻来年“照样带来好运气”。

如今“装模作样”照相、插茱萸、喝菊花酒等习俗淡化了，放风筝、转风车、吃菊花糕、登高爬山的习俗仍盛行。古人说的“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和登高”习俗，四样流传到现在剩下两样。大概因为现代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不用佩茱萸防虫防蚊，消毒除疫了；喝菊花酒不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观念，再说想喝酒的人，也等不及到重阳才喝一次酒。因而只剩食蓬饵和登高爬山，实是在情理之中。

那么，“食蓬饵”是什么东西呢？《说文》古籍云：“饵，粉饼也。”饵的原料是米粉，米粉有稻米粉和黍米粉两种，黍米有黏性，两者和合，郑玄的《周礼·天官·笾人》说：“合蒸曰饵。”黍为五谷之长，黍在古代是待客与祭祀的佳品。九月黍谷成熟，人们以黍米为应时的尝新食品，《隋书·五行志》记述的童谣中唱：“七月割禾伤早，九月吃糕正好。”在中国节俗中，节令食品往往占有特殊的位置，人们总是以岁时节日作为向神灵献祭的专门时间，新收获的食物自然是最好的祭品，用新收

获的黍稻做的糕点是重阳秋祭的祭品，也是民众分享神惠的时令佳品。因而，唐人重阳食糕称麻葛糕，宋时已习称“重阳糕”。由于糕面有多种装饰，重阳糕在明清以后多称为“花糕”。糕在汉语中的谐音“高”，糕就成为“生长、向上、进步、高升”的象征。

深圳人许多是由中原分别经粤北、粤东再辗转迁徙过来的，也带来北方以及岭南各地重阳节吃菊花糕的习俗。菊花糕主要原料为糯米粉、白砂糖和猪油搓匀蒸熟，简单易做，软韧香甜；大小如铜钱，糕边压齿印，形如菊花。其实，旧时吃菊花糕是真正用菊花做的。因为古人笃信菊花“辟邪”、“长寿”。《本草纲目》说“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霜雪，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古人从菊花能散风、解热、平肝治病功能，引申到益寿延年，《风土记》说“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神仙传》说“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乃得仙。”唐代更有“无菊不重阳”之风。人们从九月赏菊、头上插菊、香包藏菊、发展到喝水泡菊、做菊花糕、酿菊花酒，从追求怡悦身心，到追求健康长寿。民间流传上千年的饮菊花茶之俗，盖源于此也。


向西村民到祖墓祭祀先人(韦晓东　摄)

深圳人重阳节的另一个习俗，就是盛行登高爬山。

民间传说登高的原意，在于躲避灾难。农历九月，已步入初寒，人们不仅在萧瑟秋风中感受到季节的冷暖变化，而且在夏冬时气的升降中，稍不适应，则会感染风寒。这样，重阳时节在古代被视为危险的时期。在神秘的阴阳观念居支配地位的年月里，九九重阳，意味着阳数的极盛，凡事盛极必衰。因此，九九重阳之日，有如五月五日一样是令人生畏之灾日。古人为了避开这一不吉之日，就采用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行为，以外出登高野游的方式，脱离有可能发生灾祸的日常时空。在古人那原始的信仰里，认为由室内到室外的空间移动，即能化解生存的危机，这种登高避祸的方式，在古代节俗中常常出现，有如正月十五登高等。登高习俗可能最初起源于居住平川的人家，凸显于平地的高山，在原始居民观念中属于神奇之地，登临高处，意味着接近了天神，因此也就易于获得福佑。这种登高习俗，后来随着人口的流动而传播到全国。

九月重阳，秋高气爽，登高极目，无限风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描绘重阳登高之诗句，最为脍炙人口的数李白的“九日天气晴，登高无秋云”、岑参的“强欲登高处，无人送酒来”、邵大震的“九月九日望遥

空，秋水秋天生夕风”等等。深圳古人重阳秋日也有游梧桐山、羊台山、福永凤凰岩等名胜，然后诗兴大发的。现选录一首清康熙《新安县志·艺文》记载本邑知县郑文炳大人的七律诗《秋日游凤凰岩》：

“浮岚飘渺留芳迹，远隔尘环开绝壁，烟光一片接沧溟，万仞芙蓉削天碧。奇情胜概近蓬瀛，石室玲珑紫云盈，松风涧水调丝管，瑶草琪花照眼明。凤翔千仞周八极，一览德辉暂栖息，轩翥宁同凡鸟群，文采欲绚青山色。何时振翼五云边，梧叶秋风漫自怜，只今佳气复缭绕，丹穴应知胜昔年。登临竟日穷幽境，惊风飒飒轻裾冷，菊丛缀玉带晴晖，古峡寒潭照秋影。徘徊展眺物华新，脚踏芒鞋破绿茵，扶笻直上飞云顶，举手不觉摩苍穹。醍醐漫倒和烟吸，带醉狂歌山鬼泣，达人对镜须旷观，牛山何必空于邑。仙岩灵秀岂寻常，英髦接踵争翱翔，赓歌杂还叶韶华，群羡海邦多凤凰。”

200 多年前，除了我们的县太爷秋游凤凰岩外，还有布政司祈顺登高梧桐山，留下古诗《梧桐山》；本邑知县黄成元游蛇口南山，写有七律诗词《赤湾晚眺》等。

重阳节登山再不是权势人的专利，如今已普及平常百姓家。深圳最高峰的梧桐山、七娘山、羊台山，是人们登高爬山的最佳去处，每年市、区、镇都分别在梧桐山、羊台山举办“登山节”。特别是宝安区石岩镇已举办过近 10 届“羊台山登山节”，成为一个品牌。重阳节那天，石岩镇及市、区、周边村镇 2 万多人，云集羊台山脚，比赛攀登 580 多米高的岖崎山峰。连续 3 届成功举办了“羊台山国际攀岩大赛”，国内外近千攀岩高手汇集于此，一比高低，场面火爆。镇政府利用这“登山节”、“攀岩节”的平台，举办石岩山歌擂台赛、群众体育运动会、文艺晚会、名优产品促销会、投资经贸洽谈会、高新技术引进推介会和文化经济专家研讨会等。

深圳市有关部门每年重阳节，也在罗湖区内举办“梧桐山登山节”，10 万群众踊跃登山。青壮年登山，一般群众呢？也在社区附近爬莲花山、笔架山、小南山、塘朗山、马峦山、凤凰山等小山。老年朋友也不甘示弱，每年重阳节 30 多万人一起“夕阳红漫步走”，在莲花山公园摆开舞太极、打木兰剑（扇）、跳秧歌舞、健身操等方阵，一溜排成数公里，老人们穿着休闲运动服，沿山路和表演方阵区中间，健步行走十二三公里。重阳节登高，已成为深圳人健身、亲近大自然的一种时尚。

清道光年间顾禄的《清嘉录》文中云：“十月朔，俗称十月朝。”《宝安县志》有载：“农历十月初一，适秋收已毕，有糯谷收成，便用糯米粉做糍粑吃。有谚语‘十月朝，糍粑碌碌烧’。别无隆重之举。”十月初一，原意过的是“耕牛节”，大鹏古城过的有点特别，叫“神牛节”……

十月朝，糍粑“碌碌烧”

农历十月初一，深圳客家人称之为“十月朝”，“朝”念“糟”音，意为“早”、“初”，也就是在诸多农事节令中，有个“十月朝”这样的节俗。这个民间农事小节，已逐渐被现代都市人渐忘。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之前，深圳还是珠三角以农业为主的沿海县，乡人过“十月朝”这等农事小节，仍是饶有风味的。

清道光年间顾禄的《清嘉录》一文中云：“十月朔，俗称十月朝。”《宝安县志》有载：“农历十月初一，适秋收已毕，有糯谷收成，便用糯米粉做糍粑吃。有谚语‘十月朝，糍粑碌碌烧’。别无隆重之举。”

十月初一，原意过的是“耕牛节”，大鹏古城过的有点特别，叫“神牛节”。把“耕牛”抬高到“神牛”的地位，说明牛在大鹏农民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也许是在600多年前建立的军事古城，边疆戍守的环境形成当地的习俗。当时大鹏所城“三分屯兵，七分屯田”，既要抗倭、缉盗、打击外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又要耕田、捕鱼，自供自给。全城男女老少，指望耕牛吃饭，可见不但不能作贱耕牛，而且还要善待这“神牛”。

“十月朝”这一天，农夫要“祭牛”，为牛隆重“过生日”。在农耕时代，没有农业机械化，即便近代有，小面积耕地，特别是山区丘陵地带，农事仍然离不开牛。一年到头，牛，太辛苦了。农历十月之前，秋收已经结束，十月初一那天，让牛好好休息，使牛像人类过生日、过年那样轻松快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牛年”或“牛生日”。农民在庆丰收的同时，不忘耕牛的辛劳，在牛角上挂红绸，像“劳模”一样披红挂彩，在牛背上贴上祝福的字句和糍粑，用糯米粉做5个“水煮圆”，象征五谷丰登，然后用青菜包着，伴着稀粥灌给牛吃，在“牛生日”前后几天，给牛喂吃精饲料，一连串的高规格“礼遇”，牛，绝对高兴。

在“牛耕农业”中，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对牛有着特殊的感情，除了每年举行耕牛节，给牛休息、吃好睡好之外，还“娱牛娱人”，跳舂牛舞、搞“靓牛”比赛墟集、斗山歌等民俗活动，表达对牛“为人代力”的衷心敬意，唤起全家、全村甚至全社会对耕牛的重视和爱护。



让耕牛“过节”歇一天

这个习俗，不光在深圳、在岭南有之，在贵州等地都有。《中华全国风俗志》之《盘县十月朔之俗》写道：“十月朔，俗传为牛王神生日。乡农各寨，捐资举行‘牛王大会’。爆竹之声，各寨相应，极一时之喧闹。各家并出新糯米制饼（俗名巴巴），先取一团喂牛，一团挂牛角，牵之至河畔饮水。俗传牛饮时于影中见角上之饼，格外喜悦，知人酬其劳也。然后将余饼分送寨内亲友，藉答中秋受其果饼之情，为投桃报李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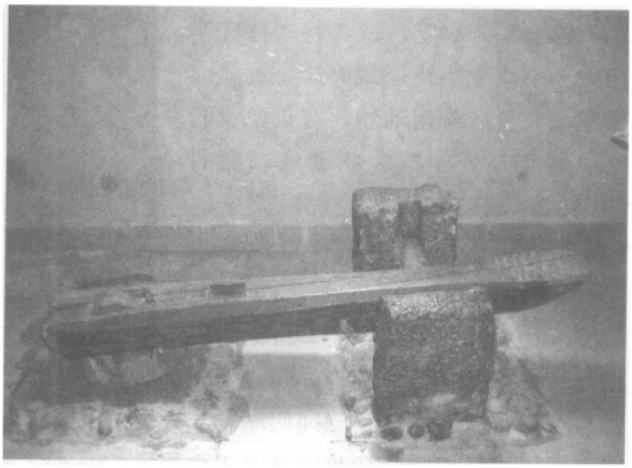
深圳“十月朝”这一天，农民除了犒劳耕牛外，还利用新割的稻谷做糕粄，庆丰收酬谢神明，并祈望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因为糯谷是迟熟品种，其他晚造稻谷在重阳前后收割完毕，唯独糯谷等迟熟品种在农历九月底收获。农家将新割来的糯谷，舂成米、踏成粉，蒸糕做粄。“十月朝”最有特色的糕食，当然是糍粑。

糍粑，是粤人对糯米饭舂打成糕，或糯米粉蒸熟成黏糕点心的俗称。糍粑本身只是一块粉团，没什么味道，只有粘上芝麻、花生和砂糖，用筷子

卷起一坨来吃，才香甜可口。后来，人们觉得用筷子卷成一坨，再要用一个碗盛芝麻、花生、砂糖，有点麻烦，也不好作礼品馈赠，因此就把糯米粉团压成扁形，内包芝麻、花生、砂糖做馅料。如今市场或酒楼卖的糍粑，就是后面的那一种。

糍粑，是近代人的写法。其实古称为“餈糕”，《周礼. 天官. 笾人》有“羞笾之实，糗饵粉餈”。“饵”，《说文》古籍云：“饵，粉饼也。”饵的原料是米粉，米粉有稻米粉和黍米粉两种，黍米有黏性，两者和合，“合蒸曰饵。”那么“餈”呢？郑玄注释为：“今之餈糕”。餈又作粢。今人以糯米作糕，称为粢糕，可见餈糕是糍粑的谐音发展过来的。追溯糍粑的渊源，看来早在周朝已有。

“糗饵”和“粉餈”虽同为糕，但也有分别。饵是将米磨成粉制成的糕；餈则正如粢糕，定将米炊熟捣烂而成的。饵的意义说它是坚洁，餈的意义说它是慈软。如今人们却再也没有那么细分，全都统称为糍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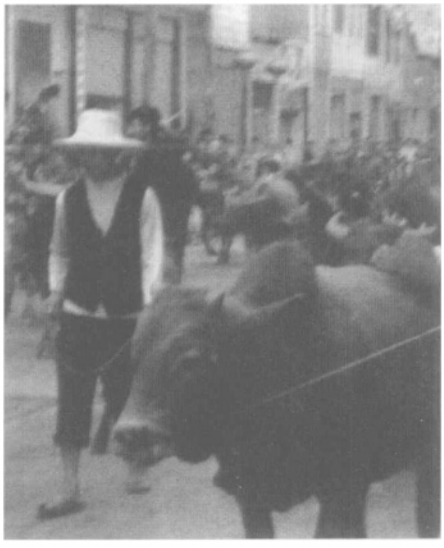
舂米粉做糍粑的碓

我小时候，很盼望过“十月朝”。那天可以帮妈妈“隆（辗）糯谷”，将糯米炊熟后放到碓臼踏，或倒进大瓦盆用粗擂棍舂，硬是把糯米饭打成黏黏韧韧的大粉团，糍粑做成了，就出门和邻居小孩交换着吃，也比较谁家糍粑香甜，糯韧。大家趁热，争着在大碟里“碌”（粘）芝麻、花生、砂糖吃，就是农谚所说的“十月朝，糍粑碌碌烧”。这里“碌碌烧”是非常形象的客家语言，“碌”，是像车辘那样滚动，意思指用筷子卷起糯米粉团，像车辘那样前后上下左右，四周滚动粘上芝麻花生砂糖；“烧”，即是热气腾腾。吃糍粑一要热，二要玩，三要斗（比较），才过瘾，才能体味“十月朝，糍粑碌碌烧”的农家乐趣。

近２０多年，老家没有种田，也没有田种，自然没有糯谷，没有糯谷来“隆”（辗），没有碓来踏糯米饭，做不了“碌碌烧”的糍粑了，渐渐地“十月朝”这个农事节习也淡远了。要想寻找记忆，解解馋，就找间广式茶楼，点一两笼糍粑叹叹茶。偶尔，在小街短巷听见有流动的进城农民小贩叫卖：“糍粑！糍粑！香甜！廉价！”我只有探出头，一望了之，绝

不敢下楼买食矣。天知道它是不是在山坡边屋的臭水沟里“生产”的，弄不好吃坏肚子，拉得趴下，得不偿失。

记得我吃糍粑最有印象的有两次，--次是在吉林延边自治州开会，一次是到云南旅游，尝到了少数民族的“打糕”。吉林开会时，会议安排我们到延边朝鲜族一个村子参观体验，好客的阿妈妮，在长满金达莱花的农家院子里，让我们参与和她们一起“打糕”，年轻漂亮的阿妈妮在欢乐的气氛中，指导下我们怎么“打”，她们的热情和笑声深深感染着我们，我们吃着有份做的“打糕”，心里甜滋滋的。少数民族的“打糕”，有甜有咸，甜的跟我们的糍粑差不多，就是“花生碎粒”换成炒得香喷喷的黄豆粉；咸的呢，就是用没味道的“打糕”，和朝鲜泡菜一起吃，或者将“打糕”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跟肉丝、青菜、小葱、芫荽一起用油炒，有点像我们吃“炒年糕”一样。吃着咸、甜的“打糕”，朝鲜族阿妈妮祝愿大家，“事事高兴”、“年年高升进步”！



“神牛节”那天，村村户户把耕牛披红挂彩，牵到圩集里来比肥壮，彰显牛的主人有能耐

在外地，虽然没有遇上“十月朝”节俗，但可以尝到外地特有风味的“糍粑碌碌烧”，而且十年未忘。所以，我曾与大鹏古城博物馆、龙岗鹤湖新居客家围屋民俗博物馆和我家乡“羊台山登山节”有关主办领导建议过，可多搞些地方民俗特色的旅游项目，其中就能否搞个“民俗小吃节”，天天让游客吃上我们的地方小吃，体验一下“糍粑碌碌烧”的客家风情？

岁时节令民俗是指一年之中随着季节和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传承。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民俗；节日以年度为周期、往复循环之、数千年传承沿袭下来。

深圳岁时节令与民谚

一年分为四时，就是春夏秋冬；根据《礼记·月令》所记，一年四季再分为十二个月、二十四气和七十二候。每月二气，在月首者为节气，在月中者为中气，又每五日为一候。这种气候和节气之分，始于黄帝，后世不断改作和完善，成为阴历，或称农历，使国人在农事中依时令而遵循之。

春季

正月时令有立春、雨水

初一　春节
初二　放牛出栏节
初三　孙正真人诞（药材店供奉之神）
初五　路头神诞（财神诞辰）
初七　人日
初八　谷日，白衣观音诞
初九　天日，玉皇大帝诞

初十　地日

十五　元宵节，上元节

十九　天穿节，门官诞，天尊诞

二十　招财童子诞

廿五　满族仓廒神诞

廿六　司命帝君上天日

二月时令有惊蛰、春分

初二　谷神诞，土地诞（田伯公生日），俗称伯公节

初三　文昌诞

十三　洪圣诞

十九　观音诞

廿六　真武诞

三月时令有清明、谷雨

初一　水上居民（蜑家）“买力”日

初三　前清明节（公历4月5日）

初三　北帝诞，上巳节，许愿节

初七　何仙姑诞

十五　医灵诞

十六　将军诞

廿三　天后诞（渔民称“送大舅节”）

廿九　土地公生日

夏季

四月时令有立夏、小满

初八　浴佛节（佛诞日），深圳“完田节”（贺春耕顺利），尝米面

十七　广州金花诞

十八　华佗诞

五月时令有芒种、夏至

初五　端五节

初八　龙母正诞

十三　关帝诞

六月时令有小暑、大暑

初六　龙母娘娘诞，天贶节（晒书曝衣日）

十六　鲁班节，香港、深圳“三行（木匠、泥匠、铁匠）节”

十九　观音佛祖得道升天日，俗民食斋供祀

廿四　财神诞

廿六　二郎星君诞

三十　围香日

秋季

七月时令有立秋、处暑

初六　康元帅诞

初七　深圳“七姐节”，又称七夕节、乞巧节

十四　盂兰节，俗民做祭仙节田了节

十五　中元节，深圳民间称“鬼节”，地官诞

廿四　城隍诞

三十　地藏王诞（或在廿九）

八月时令有白露、秋分

初三　司命灶君诞

十五　中秋节，龙母润诞

廿五　日娘诞

九月时令有寒露、霜降

初九　重阳节，火神诞

十九　观音诞

廿八　华光大帝诞

冬季

十月时令有立冬、小雪

初一　深圳“十月朝”，耕牛节，大鹏“神牛节”，牛王神诞

十三　五谷神诞

十五　下元节，财帛星君诞

十六　盘古王母诞

十一月时令有大雪、冬至

下旬　冬至节（公历12月22日）

十二月时令有小寒、大寒

初八　腊八节

廿三　小年节，送灶节（官三民四蛋五，即官府以廿三为节，平民以廿四为节，水上居民以廿五为节）

三十　除夕，俗称年三十晚，紫姑神（厕神）诞

民间谚语

当地一首《月令歌》，由一月至十二月把当地的风俗“唱”了一遍：

正月妇娘二月蔗，三月螃蟹四月虾；

五月芦裹粽，六月猪肉蒸咸虾；

七月稻禾熟，水鸭炒姜芽。

八月中秋到，油饼“绑（送）”细茶；

九月重阳节，登高扫墓插萸花。

十月小春到，新鲜糯米舂糍粑；

十一月来冬又到，风干腊肉炒兰花。

十二月来乱如麻，预备糖糕谢灶爷；

多谢神灵常庇佑，一家欢乐笑哈哈。

这首《月令歌》说的非常形象：正月，旧时正是农闲时，女人在家养得肥肥白白；二月没雨水，甘蔗生长了大半年，正是糖分高，适宜“拗蔗”(收获)时节。三月份螃蟹还未产卵，最为肥美，四月海虾河虾均为肉质结实鲜美。五月芦糍叶裹粽香飘上下巷，六月将猪肉和咸虾肉一起蒸熟，在大暑天喝水多，口淡的情况下，用猪肉蒸咸虾“送饭”，很开胃。七月夏收夏种，蟛蜞多，鸭食之长得肥嫩，卤、焖、炒、烤、煲、炖皆美味，尤其著名的是“三杯鸭”，即用生油、豉油、黄酒各一杯焖，香而不腻。八月十五，叹月饼名茶赏明月，乐也融融。九月重阳拜山头插茱萸花，如今不兴了，只兴登高爬山。十月糯谷登场，自然尝新吃糍粑；十一月风高气燥，腊肉腊鸭正当时，西兰花也鲜嫩初成，用以配炒腊味，无以伦比。十二月舂米磨粉蒸糕，办年货，忙个不停，然而为着迎接新年，一家大小不亦乐乎。

有关岁时节令的民间谚语很多，比如“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芒种、夏至季节，荔稻熟，蝉子鸣，夏收夏种劳动强度大，人累发困，懒散，走路需要人搀扶。

“小满小满，小河大河都满。”是说清明、谷雨天，阴雨绵绵，立夏、小满节气，雨季到了，大河小河都满水，农村要注意蓄水。

“不到端阳，棉被不入箱。”深圳气候在农历四月下旬天气暂热，但还有可能“倒春寒”，民谚：“一月冷死牛，二月冷死马，三月冷死耕田嫲（妇人）。”清明插秧，有时会把插秧的妇女冻坏的。所以，到了端阳节，棉被棉衣才能曝晒入笼入箱。

“秋分秋分，日夜平分。”白天与晚上两重天，白天天热，晚上清凉。“一阵秋雨一阵寒。”“过了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秋临夜雨”等等，是说一到秋分，大都是晚上下雨，下一场雨就会一夜凉过一夜。

“干冬湿年”是说冬至那天晴朗，过年期间会下雨，如果冬至下雨，

春节会天气晴明。农谚又说："冬至雨，牛羊会冻死。""冬在初，冷唔多；冬在尾，卖了黄牛来置被。""冬节在月初，做年冷较多；冬节在月中，唔会有霜冻；冬节在月尾，二月冷得北风吹。"按公历算，冬至节是在每月的12月21日至23日，年年如此，相差不过一两天时间；而这个日子在农历中，可能是十一月中、十一月尾或十二月初，民间长期总结出来的规律和预测，非常值得我们参考。

清嘉庆《新安县志·气候·占候附》记载得很详尽："正月，元旦暗有雨，谚云干冬湿年，禾谷满田。又谓正月初六日晴人民安，十六晴有营生，二十六日晴有蔬果。又谓立春晴一日，农夫耕田不用力；立春前一日白雨，则一春皆雨。

"二月，俗以春分社占丰歉，谚云分在社前斗米斗钱，言谷贵也。春分社后斗米斗豆，言谷贱也。又曰雨打惊蛰节，二月雨不歇，三月干耙田，四月禾生节，言无水插秧也。

"三月，俗谓清明晴则诸物丰，蚕少，谚云清明须用晴，谷雨须用雨。

"五月，夏至雨，云洗仓水米贵，又以二十为分龙日，二十五日为回龙日，不雨则歉，曰分龙不下回龙下，回龙不下干哑哑；又以二十六日雨为分龙水，是日晴天片云雨，倾刻至者曰白撞雨。谚云，早禾望白撞，翻蒿望偷淋。偷淋者夜雨也。

"六月，喜初六晴，禾无虫，旱稻有收成。十二日多风，俗呼彭祖忌无风则雨。

"七月，立秋小雨吉，大雨伤禾。谚云天下若逢处暑雨，纵然结实也难收。

"八月，初一日风雨谷贵，人民灾虹见谷贵；中秋月明，产妇安宁。

"九月，谚云霜降值金，一晴一阴。又云重阳有雨重重有，重阳无雨一冬晴。又云寒露风谷不实；霜降雨，米多碎。

"十月，朔晴一冬暖风雨，主旱麻子贵，俗以初一有雾，则明年正月雨；有大风则明年米贵。初二日有雾，明年二月雨，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日皆然；此日无雾，则明年此月无雨云。

"十一月，冬至晴，百物成。

"十二月，小寒晴，旱禾熟；大寒晴，晚禾熟；雨暗则歉云。"

饮食、养生和气候关系的民谚也很精彩："冬吃萝卜，夏吃姜。""晨吃姜，晚饮醋，能活九十九。""男虾女蟹"，"男奶女浆"，即是男人吃虾，女人吃螃蟹；男人喝牛奶，女人喝豆浆，相对有益。

"秋风起，三蛇肥。"当地在进入秋季后，有开始进补的习惯。吃蚝要吃"冬前蚝"，此时蚝肥大鲜美，过了年，雨水多，海水含盐量低，鲜

蚝肚就“起粉”，没那么好吃了。这是千年蚝乡沙井、南头一带蚝民的生活经验。

蚝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善于观察天象，也总结出“朝红风、晚红雨”，“东边闪，雨重重。”“西边闪，太阳红。”“南闪大东风，北闪大南风”、“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及二十三为小潮”这时可否适宜出海作业的民间谚语。以及夜间看见大水蚁（俗称白羽仔）聚集有光源的地方，则预测近日必有风雨等经验，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另外，深圳沿海渔民也摸索出许多生产、生活规律的农谚，也很有道理。比如渔民说：“二八好行舟。”因为二月八月气候温和，没有台风威胁也没有强大的北风，风向时南时北，对南来北往之行舟均适宜。“六月上红云，劝君莫驶船”，如果六月间天上偶有红云，那么三天内就必定有强风或台风，不宜出航。“四月雷，割绳走”，要是四月间发雷，这就警告人们，风暴随后即到，尚在海上捕鱼的渔船，要立即割掉绞绳，急速返港避风。南澳、盐田渔民的谚语有“海水在分路，无风便是雨”、“谷雨是北风，山空海也空”、“只惊七月半水，不惊七月半鬼”、“冬至、上元边，白鱼游来要吃圆（汤圆）”、“大寒交春，鱼虾向外奔”、“海水一日晚五里（半小时）”等等。

《宝安县志》：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被元兵攻陷后，“景炎二年（1277年），宋端宗赵昰偕同太后，太妃及张世杰诸大臣，南逃至大鹏半岛登岸，后转入九龙。次年病死于大屿山。”相传大雨滂沱之夜，九龙官富场寨民忽闻大宋皇帝逃难至此，贫苦乡民慌忙拿出剩饭剩菜集中倒在盆里，招呼饥寒交迫的宋军。自此小宋帝吃过的盆菜，在深港地区一带沿袭成新安大盆菜的风俗。

小宋帝与新安大盆菜

大盆菜习俗的传说

大盆菜，不是一种蔬菜名称，而是用盆来盛菜的一种饮食习俗。这种民间的习俗，一直流传在深圳和香港（古为新安县）一带，今传至东莞、惠州、广州、中山、澳门和台湾等地。

旧时新安县的乡民，大凡在庆典、嫁娶、祝寿、添丁、醮会、酬神、宗亲春秋祭祖、拜山等诸项活动，均广邀亲朋戚友，相聚乡间，围着大盆菜或吃菜联谊，或饮酒庆贺。

这种盆宴酒席，不像现在一道一道上桌的八菜一汤之类菜色，而是自始至终用一个铜（铝）面盆或木（胶）盆盛着满满的一盆菜，足够8至12人吃。盆里菜色多数以萝卜角、牙白菜、茨菇为菜底，往上依次铺叠用煎、煮、炸、炒、烧烤等方法加工熟了的菜胆、粉丝、竹笋、腐竹、炸猪皮、冬菇、蚝豉、五花腩肉、卤鹅、烧鸭、炸鳗鳝鱼、白斩鸡等15种菜饼，一层一道菜，一菜一道味。百桌千席，风味独特，老少咸宜，围盆而吃，煞是热闹。

深圳这个有趣的饮食习俗，却源于700多年前的一个动人故事。

话说南宋末年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丞相伯颜率部三路挥兵南下，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告急，行宫一片慌乱。宋太后及年仅6岁的恭帝赵显，惊恐万分，俯首降元，随即被押送到元大都（后为和尚，不久死于北漠）。宋保康节度使张世杰、吏部侍郎陆秀夫等群臣，奉益王赵昰和卫王赵昺南奔。5月，众臣在福州拥立9岁的赵昰即位，改元景炎。不久，元军迫至福州，宋帝又从泉州、厦门节节退驻潮汕南澳岛、惠州府的甲子门（今汕尾海丰县甲子镇），本应逃往广州，无奈探子回报，广州失陷，景炎二年（1277年）一月，帝舟被迫西航，经新安县（深圳）大鹏湾，在大鹏城王母圩登岸稍息，然后再折至官富场（今香港九龙），驻跸九龙土瓜湾。

在一个大雨滂沱之夜，九龙寨城民早已入睡，忽闻阵阵拍门声，乡人开门，只见有黑压压的大群人挤在门外，盔甲湿透，披残褴褛，面容饥色，疲惫不堪。许久，老百姓才认出是宋军。细问之下，士军海上颠簸数日，粒米未沾，连皇上也没有吃饭。



福田下沙村举办2500席2万多人共吃的大盆菜宴

乡人得知大宋皇帝逃难至此，慌忙通知左邻右里，请大家拿出饭菜来招呼饥寒交迫的宋军。

穷人百姓没有隔夜粮。于是，各家各户把残菜剩饭拿了出来。殷实人家倒剩有肥猪肉、萝卜角，有的煮上刚采回来的蚬蛤、蚝贝，有的把家里生蛋的鸡、鸭、鹅宰杀蒸熟捧来。各家乡亲集腋成裘的食物，全集中倒在宋军的行军盆锅和帽盔里。

一盆盆白家菜，竟然香气四溢，供饥肠辘辘的宋军饱食了一顿。

张世杰、陆秀夫等将士，见乡民危难相助，如此真情，不禁百感丛生。转念朝廷现在的处境，颠沛流离，面对元兵，节节败退，不觉潸然泪下，端宗赵昰因年幼受吓，一路逃命奔波，抵港后偏遇飓风吹袭，溺水，时年11岁染病不治。在哀号声中，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扶助，拥年方8岁的赵昺继位，立为祥兴少帝。少帝昺登基后，常在陆、张两大臣辅助下，登上九龙城马头涌道的一座小山岗远眺。每当日出之时，他照例站在岩石上，目望鲤鱼门海口，冀盼勤

王之师前来救驾。随后，宋军水军十七万人、战船数千艘陆续来到九龙海域驻扎，宋帝昺登临巨石，接受朝内臣子和将士朝拜，重拾信心。

不料，元军继续南侵，企图一举灭宋。景炎三年(1278 年)六月，宋军被迫退至新会县境内的崖山，舟师散泊在珠江口外各岛屿犬牙交错的地方，以崖门险恶的地势，以图固守。随即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 30 间，军屋 3 千间；升广州府为祥兴府，拟保大宋江山。1279 年二月初八，任蒙左汉军元帅的张弘范率四路元军，全面围攻宋水军，爱国将领陆秀夫身陷重围之中。由于御舰被诸船环结，不能携帝乘小舟出走，眼看情势十万火急，陆秀夫不让少帝被俘受辱，便先驱其妻子赴海死，然后身背少帝昺，跳崖自尽，蹈海殉国，成为历史上悲壮动人的一页。

当年小宋帝赵昰、赵昺二王住过的九龙村子，人们称之为二王村。宋帝在九龙城寨栖宿过的巨石洞内，后人兴建了宋王台。宋帝吃过的盆菜，在港九地区的九龙、沙田、大埔、元朗、荃湾、粉岭、上水和新安县（今深圳市）一带沿袭成风俗。



喜吃风味独特的大盆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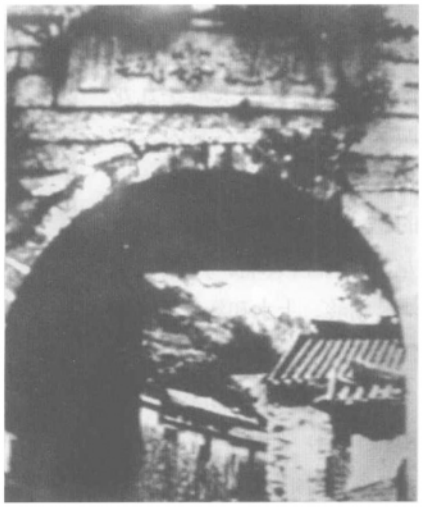
吃大盆菜，在深圳各村镇很普遍，如今酒楼食肆也可以随时预定。但是，要数历史传统保留得最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莫过于深圳福田区下沙村。下沙村全村姓黄，均为唐代工部侍郎、奎章阁学士黄峭山的后裔，南宋期间，下沙开基立村 800 多年来，繁衍成 6 条自然村。每年他们都在春节举办盆菜宴，2002 年春祭，最为隆重。当年下沙村邀请“世界黄氏宗亲总会”各国黄氏族人和亲朋到下沙村参加盛会，舞龙舞狮，燃放鞭炮，演大戏，吃盆菜。原计划办 3800 席大盆菜宴，因来宾人数不断增加，最后增设到 5319 席，赴宴人数达到 6 万人。这次大盆菜宴的举办席数和人数，两项均获颁发“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国内外很多媒体，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都做了报道。大盆菜，在海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

赤湾的宋少帝陵

香港九龙有宋王台、二王村、梅蔚石殿等古迹，深圳呢？深圳大鹏、南山也有宋帝遗迹，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赤湾的宋少帝陵。

宋帝昺的陵墓，是广东唯一发现的一座皇帝寝陵，位于南山区赤湾天后宫西约500米的小南山山麓，离南海岸边约200米的小山坡上。陵墓直径9米多，宽5.6米，枕倚南山，面向伶仃洋，规模虽小，但肃穆壮观。上坡瞥见陵墓前，先见一块“拜谒石”，次为墓堂，两侧各塑一个抱鼓石和一对石狮子。陵墓中央竖有一块大石碑，碑高1.16米，宽0.88米，碑顶面中间雕刻祥云拱日，涂染朱红，后段高0.9米，顶面塑双龙拱日，下有一只飞凤装饰。花岗岩石的墓碑正中镌刻“大宋祥庆少帝之陵”八个大字(按昺帝年号“祥兴”，此碑作“祥庆”，广东话兴、庆音近之误)。碑刻两侧有两行小字为“本山坐子兼癸复卦四爻”，“辛亥岁赵氏三派裔孙重修”。

此陵墓是辛亥年即1911年重修，距今近百年。古陵墓始建何年，暂无碑记。碑首刻一龙两蝠，顶上有一太阳的浮雕。两旁有一副大字对联：“黄裔于今延宋祀”，“赤湾长此巩皇陵”。墓的四周，修竹成荫，清篁生翠，俯临南海，云水溟濛，烟波浩渺。左龙鼓洲，右伶仃洋，一水涵碧，云纡长空，钟灵毓秀，扑面而来。1983年，赤湾宋少帝陵墓被列入深圳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陵墓右侧竖有一座陆秀夫仗剑、背负少帝蹈海殉国的大理石雕像，为宋少帝陵墓增加几许庄严肃穆，与不远处赤湾古炮台、天后古宫相映成彰。



小宋帝驻跸的香港九龙寨城

有人问，宋帝昺不是在珠江口西岸的新会崖门跳海殉难吗？怎么陵墓会葬在东岸的深圳赤湾呢？民间传说，宋少帝殉国消息传来，万民悲痛。一天，赤湾渔民忽见海面波浪滔天，狂风大作，一大群海鸟在海滩上来回盘旋，号鸣着不肯离去。此时，不远处的赤湾天后宫一根横梁突然坍下来，庙祝和乡亲们心惊，问卜，得知小皇帝有难，马上涌去海滩跪拜，发现浅滩上飘浮着穿黄绸锦衣的童尸，赤湾渔民认出是宋少帝，原来那海鸟是前来“护驾”，庙宇横梁是上天送来的棺木。渔民为了避开元兵搜索，悄然移至小南山的赤湾枕坡面海殡葬。此事，赵氏族谱载有佐证：“遗骸漂至赤湾，有群鸟飞遮其上。山下古寺老僧偶往海边巡视，忽见海中遗骸漂荡，上有群鸟遮居，设法拯上，面色如生，服式不似常人，知是帝骸，乃礼葬于本山麓之阳。”

不管是赤湾渔民还是古寺老僧发现，但宋帝昺殉国的经过，有元《经世大典》为载：“张宏范（助元灭宋之蒙军元帅）与陆秀夫等作殊死战。自巳至申，

声震天海，斩获几尽。宋端明殿学士陆秀夫，先沉妻子于水，登帝船曰，官家事危矣，奈何。遂抱帝俱死于水。时宏范操小舟，诣恒（即李恒，元军副元帅）议事。世杰等乘间开南壁，率16舰，夺港门遁去，恒与宏范等追至崖山口，值天晚，风雨骤至，烟雾四塞，诸将尽相失。宏范还，恒独进追之。承宣使翟国秀等，解甲就降，焚溺之余。尚得海舰800余艘。甲申浮水之尸10余万。有卒求物尸间，言见一尸，小而皙，衣黄衣，负印签云：'诏书之宝'。取宝献宏范。宏范问宋人尹都统，曰帝也。又问近侍数人，皆以为然。求之已不得矣。李恒追至高州，得帝尸。"

后人对元《经世大典》中"李恒追至高州，得帝尸"记述表示怀疑，多数史学家认为帝尸已不可得，说赤湾宋皇陵是宋帝昺的衣冠冢。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学者许地山在香港任教时，曾亲到香港大屿山、东涌、大澳、摩星岭、车公洲、梅窝、龙地塘和深圳赤湾等地查访、考察，他认为赤湾"祥庆少帝之陵"内不是帝昺的遗骸，因为帝昺是沉在新会崖山海底的。这陵墓应该是"大宋端宗皇帝之陵"，即是赵昰在香港病死的。是昰是昺？是帝骸是衣冠冢？今人没有开棺考察。700多年来的遗迹，新安人秉承那句老话："宁可信其有。"



帝陵前石灯柱

宋末二帝入新安遗址

宋朝最后两个小皇帝，从赵昰（1276年）十一月登基，到1278年四月死于碙洲；赵昺于同年五月执位，到1279年二月初八在新会跳崖，他俩在广东足有两年零两个月，其中在新安县（香港、深圳）停留时间最长。虽然300年大宋皇朝是在他俩手中结束，但人民一直怀念他们，并留下了许多民间传说。个中原因，恐怕主要是宋都临安失守后，山河破碎，唯浙东、赣南以及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尚为宋土；对外族元军所到之处"血腥屠城"无比愤慨。同时，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爱国将领支持下，南宋君臣渡海南行，入闽中，走广东，一君亡了又立一君，前仆后继，坚决抗元，最后蹈海身亡也不为所俘受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凛然大义的民族气节，为后人代代传诵。

最近，读了康熙年重修的《新安县志》、陈仲微《二王本末》、历史学者简又文的《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和叶灵凤《港九的南宋史迹》等书，又游了一趟香港宋王台和新会崖山等古迹，思古之悠情，不禁慨叹之；对我新安故土有

如此悲壮的历史插曲，亦不禁油然自豪，遁踪叙之。

入粤。

1276 年五月，刚刚在福州即位的赵昰景炎帝，半年后元军追至，众臣奉帝从泉州、厦门进入广东，移驻潮州，是为入粤之始。《潮州府志》云："太子楼在南澳，与云盖寺相近，垒石为楼，旁有行宫及指挥甬道。宋少帝避元兵驻跸处。又名宋帝行宫。山形如蟹，昔海水未泛注，石磉犹存，今弥漫汪洋，不可识矣。"

惠州。

1276 年十二月，昰帝一行至惠州甲子门。甲子门在惠来县与海丰竭石之间的小渔港，其地原属惠州府辖，"有大石壁立上下，各有六十甲子字，故名。"(《通鉴辑览》)



赤湾宋帝昺陵

《宝安县志》："景炎二年(1277 年)，宋端宗赵昰偕同太后、太妃及张世杰诸大臣，南逃至大鹏半岛登岸，后转入九龙。次年病死于大屿山。"《新安县志》说："王母梳妆台，在大鹏王母洞村，前有大石，高数丈，俗传王母梳妆于此。"大鹏寨城两里远有"王母圩"(今大鹏镇所在地)，均为当年宋帝景炎生母杨太后留下的遗迹。

香港梅蔚。

同年二月，帝舟次梅蔚(今为梅窝)。《新安县志》云："梅蔚山在县(今南山区南头古城)南一百里，前护县治，后障重洋，丛生林木。宋景炎帝常驻跸于此。"又曰："景炎行宫在梅蔚山。宋景炎二年，帝舟抵此，作行宫居焉。"

《崖山志》说："梅蔚山在东莞西南(按应为东南)二百八十里，山巅有宋帝石殿尚存，今地隶新安。"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门东，佛堂门西。宋景炎中，御舟驻其下，建有行宫。其前为大奚山，林木蔽天，人迹罕至，多宋忠臣义士所葬。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宫。其西为大虎头门(即今之虎门)。张太尉张世杰奉帝保秀山，即此。秀山之东，有山在赤湾之前，为零丁山。其内洋曰小零丁，外洋曰大零丁。文丞相诗所云'零丁洋里叹零丁'是也。小零丁洋有二石，一乌，一白，对峙中流，高可百余仞。当时以为行朝双阙。今渔人称为双筋。其海一门则曰双筋门，此皆亡国遗迹也。"

梅蔚山今在何处？香港史地学者吴灏陵认为，梅蔚即马湾（今又名汲水门岛）。因“马湾”与江浙“梅蔚”口音相近。马湾与大屿山之间的海峡为汲水门（旧称急水门），为宋帝自东而西必经之水道，有可能在此岛建行宫。屈大均说“其西为大虎头门”，方向相同。其地为交通要道，历史上设“九龙（海）关”于此。考二帝南奔路程，开始想经甲子、深圳沿海直下广州，但至梅蔚后发现广州有问题，乃折而向东南，沿九龙南岸，至官富场而临时驻跸。

九龙官富场。

四月，帝舟次于官富场。《新安县志》：“官富山在佛堂门内急水门之东。宋景炎中，帝舟曾幸此，殿址尚存。旧设巡司，今迁入赤尾村。”又说：“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按此当指官富山，今天香港宋王台一带地方（现已建九龙公园），就是古时官富场。当地一直流传许多民间故事，一是“罗伞龙舟”。宋帝抵达官富场上瓜湾时，夜送百家菜，晨日寨民结队迎驾，以护驾有功，得御赐黄缎巨型罗伞，绣字图案甚多，原物久已破烂，村民代代复制，每年端午赛龙舟，必奉御赐罗伞置于龙船之中，这种龙船称为“皇舟”，由乡绅父老先向御伞叩拜，然后才开始竞渡。景炎帝是四月到土瓜湾的，至六月才离去，当时他才10岁，必于五月初五端午节观看龙舟竞赛。如今广东各地赛龙舟也在船上设一罗伞，可能源于土瓜湾这个风俗。



向西村民做大盆菜（韦晓东 摄）

其次为白鹤山游仙岩的传说。《新安县志》说：“白鹤山在九龙寨西北，上有游仙岩。岩下之三小石，如品字，上盛一巨石，高六七丈，广约三丈余，壁立难登。石顶有棋坪，棋子至今犹存。石北刻‘游仙岩’三字，年第久远，字稍模糊。昔常有白鹤一双，栖止石上，故名。”岩畔有交椅石，有靠背如交椅式。当地乡老相传，宋帝蒙尘到官富时，大臣曾奉之至游仙岩，权作行朝，帝端坐石上，故称“御座交椅石”。另据传说，杨太后当年曾进驻九龙城寨，有平面巨石，为杨太后和宫人梳妆处，故名梳妆石。

第三，据土瓜湾故老传说，当景炎帝驻跸当地时，夜闻野兽叫声，大惧，后问土人是何兽，则以“黄猄”回了话。帝昰听后大吃一惊，天下竟有“令皇

惊恐”之兽，随即生病，幸得“杨二伯公”治愈之。因“黄猄”音同“皇惊”。此鹿不像鹿，狐不像狐的野兽，以后乡间就叫做“黄猄”。

浅湾。

六月，帝舟次于古塔，实为“古石塔”，地处九龙鲤鱼门外南佛堂岛之北端。《新安县志》“佛堂门在鲤鱼门之东南，又曰铁砧门。旁有巨石，长二丈余，形如铁砧，潮汐急湍，巨浪滔天。风不顺，商船不敢行。其北曰北佛堂，其南曰南佛堂，两边皆有天后古庙。北庙创于宋，有石刻碑文数行，字如碗大，岁久漫灭，内有‘咸淳二年’四字，尚可识。”

九月，帝舟次于广之浅湾。

“浅湾”，许多学者和史料都说它在潮州那一带。香港大学著名教授许地山《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中说：“浅湾现作全湾。《潮州府志》、《香山县志》、《马南宝传》和《通鉴辑览》都说在是潮州。《潮州府志》和《通鉴辑览》且指明是潮阳的浅澳，这是附会。试想，元兵已经压到官富，宋帝怎能倒回元兵已占的后方？”

《新安县志》说：“浅湾山在县南九十余里。”距南头县城九十余里的香港西九龙一带，古称浅湾，即浅水港湾之意。其地昔有浅湾村，属官富司客籍村庄之一，现为香港九龙新界的荃湾区。

十一月，元将刘深攻帝昰的行朝浅湾，张世杰战事不利，奉帝走秀山（今虎门），至井澳（澳门西香山县大横琴山岛），贪生怕死的丞相陈宜中借口去占城（在安南之南）请救兵，带走了一部分舟师，但一去不复返。十二月丙丁日，帝舟在井澳遇飓风，舟败，溺水，惊悸成疾。旬余，诸兵士稍集，死者过半。帝昰在香山巨富马南宝家暂居三日，闻广州失陷，又复出海赴井澳。刘深率部袭攻井澳，帝舟只好奔谢女峡（小横琴山岛），复入海，至七洲洋（香山县，今称九洲洋）。

景炎三年（1278年），二月帝舟由谢女峡海道回广，三月广州都统凌震和转运判官王道夫收复广州，帝欲往占城，不果。元军又追至，帝舟又慌忙东折至碙洲。四月帝昰殂于碙洲。五月，弟卫王赵昺即位于碙洲，时年8岁，改元祥兴，碙洲升为翔龙县。母杨太妃同听政。以陆秀夫为丞相，张世杰为太傅，文天祥为太保。过了一个多月，祥兴少帝徙居新会崖山，继续据险抗元，不料八个月后，陆秀夫负帝沉海、杨太后赴海死，各臣及十余万将士均壮烈殉国，宋亡。

碙洲。

《宋史》《二王记》未言及何处，以致历来史家和各地史料众说纷纭。《辞海》（1980年版）“碙洲”条说“今作碙洲或硇州，在广东雷州湾外东海岛东南海中。宋置寨”。《中国通史》（1979年版）也认为碙洲在化州。清《通鉴辑览》

“碙洲”下注云：“在今高州府吴川县南，屹立海中，当南北道。”香港史地学者黄佩佳著有《九龙宋王台及其他》长文，亦认为碙洲在吴川县之广州湾中，属高州府。并力证“碙洲非今之大屿山”。

但反对者所持的论据更有说服力：宋末陈仲微者《二王本末》以亲身经历，说碙洲在东莞县。黄佐的《广东通志》、黄培芳的《香山县志》，都说碙洲在香山与东莞之间。理由是：“然是时景炎奔播，或在井澳，或在谢女峡，或在古塔，或在梅蔚，或在官富场，总不出香山东莞之间，无缘忽至化州也。”“吴莱《南海人物古迹记》以为‘碙洲’即大奚山。端宗入广，盖由虎头门，则先次大奚，其海道固合。陈仲微随二王海上。吴莱，元人，去二王时未远，尤足据信。”

许地山在《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一文中说：“端宗从井澳去谢女峡，又从谢女峡去七洋洲，都是从西方再逃回东方。因为那时崔永已经招降了高州、雷州、化州，所以端宗绝不会走到碙洲去自投罗网。而且景炎三年正月，端宗还在谢女峡，二月从海道回广州，忽然又跑到碙洲去死在那里也来不及，所以碙洲必是距离广州较近的地方。大奚山依《南海人物古迹记》既是碙洲的别名，《二王本末》也说是属东莞县的，无疑是端宗晏驾，与少帝即位底所在。”

简又文根据以上史料，他力主即今香港大屿山之说。他还举出《清一统志》：“大奚山在新安县南，一名大渔山。”《新安县志》云：“大奚山一名大屿山，在县南百余里，为急水佛堂门之障山，有三十六屿，周围二百余里。”另一旁证为据《东莞县志》：景炎三年三月，“东莞人李佳母陈氏命佳从帝于碙洲，佳既行，陈氏赴海死。”如碙洲非东莞南之大屿山，其只身何能乘舟到远隔千里的化州之碙洲乎？

于是之，碙洲在新安县之大屿山，较为可信矣。

《宋书符瑞志》载述："麒麟者，仁兽也。"雄者为麟，雌者为麒，统称麒麟。狮子是地上威猛的动物，麒麟则是天上吉祥的象征。深圳的麒麟舞遍布客家村镇，并且与民间习武紧密结合。客家人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粗犷矫健的肢体，将神话中的吉祥动物演绎为民间舞蹈，穿过数百年岁月顽强地流传下来。

深圳麒麟舞

著名的深圳水库东湖公园旁边，有个叫水库新村的股份公司大楼7楼，每个月的25日，都会响起令村民振奋的锣鼓。随着铿锵明快的节奏，两支队伍的麒麟舞在翻腾、跳跃，麒麟队40多名队员在老师傅指导下，练习麒麟舞的各项套路。眼下这个麒麟队，是水库新村祖上传承下来的第五代，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停止过活动，1999年恢复建队，2001年参加深圳市龙舞、狮舞、麒麟舞比赛，获得麒麟舞第一名。水库新村，古称黎围村，黎围村麒麟舞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民间民俗舞蹈，最近经罗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挖掘整理，上报深圳市政府，被审定并公布为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深圳黎围麒麟舞、观澜麒麟舞、龙岗龙城麒麟舞(统称深圳麒麟舞)，2007年6月入选第二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作。

说起深圳麒麟舞，历史悠久，分布范围遍及整个深圳市的客家地区。

麒麟的传说

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其状如鹿，独角，全身生鳞甲，尾

像牛。多作为吉祥物的象征。亦简称“麟”。《礼记·礼运》：“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椒”，《辞海》又释：“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雄者为麟，雌者为麒，统称麒麟。麒麟性情温和，内在仁厚，表面凶恶狰狞，但不伤人畜、不踏青草昆虫，所以《宋书符瑞志》载述：“麒麟者，仁兽也。”《瑞应图》也说：“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羊头鹿身。”麒麟为“四灵”之首，相传，麒麟舞起源于初唐，当初是以麒麟狂舞，庆贺久经破裂的疆土终于获得统一的一种民间活动。“百姓愁，麒麟走；天下和，麒麟舞。”作为客家文化图腾的麒麟，是几百年前岭南的客家人，从中原大地辗转迁徙带来的民间舞。

这传说中的麒麟神兽，生性活泼、吉祥仁和、极富灵性。广东有句话：“西狮东麟”，也就是粤西流传狮舞，粤东流传麒麟舞。狮子是地上威猛的动物，麒麟则是天上吉祥的象征。深圳地处珠江口东岸，深圳的麒麟舞遍布客家村镇，而且都与民间习武紧密结合。客家人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粗犷矫健的身体，将神话中的吉祥动物演绎为民间舞蹈，穿过百年岁月顽强地流传下来。

世代相传的深圳麒麟舞

深圳的麒麟舞，活跃在客家地区的观澜、龙华、石岩、平湖、南头、布吉、横岗、盐田、龙岗、坪山、坪地、坑梓、葵涌和大鹏等镇。2006年9月29日，我和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的几位同事到观澜街道（2005年全市镇改街道）松元村，找到82岁的陈东财等5位麒麟队老艺人座谈，麒麟队队长陈国明说，他们祖先从北方迁徙到松元建村已有250年历史，建村时就有麒麟队，该村振能族的麒麟队在清代出了陈国宾和陈觐高2名武举人、12名武秀才。陈国宾的师傅就是最负盛名的舞麒麟高手陈德华，绰号“生鸡义”。陈德华青年时到河南少林寺习武，回村后担任松元村方圆数十里村落的总教头，他非常讲究武德，有一年本族与邻村人争田地起冲突，双方都动员了村族力量，青壮年手执木棍、钢刀等在松元马井摆开了厮杀阵势，眼看一场流血事故一触即发，陈德华说：“这样吧，为了避免无故伤害，你们派出3名壮汉，和我对打，如果我战败，就随你们怎么办，如果你们败了，大家就协商解决。”结果对方来了3名人高马大的青壮小伙子，挥舞着刀棍扑上来，被徒手的陈德华打得落花流水，平息了一场宗族械斗。陈德华名声大振，带着松元村麒麟队练武，创新许多高难度的麒麟舞动作。

水库新村麒麟队，从清光绪三十二年至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水库新村原是梧桐山下沙湾河与梧桐河交汇处的村子，因为上世纪50年代末修筑深圳水库而整村搬迁至爱国路。

水库新村古称黎围村，是深圳罗湖、福田一带前往龙岗、惠阳必经之地。清朝末年，黎围村村小人少，为避免周围有些大姓大村欺负，村里有一农妇养育着郑虎臣、郑耀臣两个儿子，兄弟俩从小很喜欢弄拳舞棍，常用竹笠帽当“拳遮”（类似于藤盾牌）练打，不到一个月就打烂十几顶竹笠帽。他们的母亲不仅不生气，还不断买竹笠给他俩练。后来兄弟俩不满足于在村中对打，于是历尽千辛万苦到江西及福建武夷山拜师习武学麒麟舞，跟师傅江湖行走多年，其中一个收获便是得到了麒麟舞的真传。

练成一身武艺的郑虎臣兄弟俩回到深圳黎围村后，传授给村里青年。村里七八岁以上大的男孩都跟着学麒麟舞，大的舞麒麟头，小的舞麒麟尾，形成黎围村上围、下围两伙麒麟队五六十人，以后往下传至四代。村里学武学得最好的是郑宠传，别名叫“生公”，意指麒麟舞舞得“生猛”，功夫也很出名，他可以用手指当锤子，硬把五寸钉打进墙。他耍棍时，可以轻轻插进结成板块的石灰池，稍一用力，一大块石灰块即时被撬起。长棍打得很灵活，“长棍杀转头”是他的绝活。

盐田区三洲田村麒麟队和拳术，曾在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庚子首义活动起过很大作用。三洲田股份公司董事长廖伟星说，早在清末光绪庚子年（1900年）前，深圳市盐田区三洲田村毗邻香港，村人廖毓坤开间“义合小铺”，经常来往香港买卖商货结识郑士良、孙中山等爱国志士，以村里著名的拳馆、舞麒麟为掩护，一个叫阿聪的教头除教大家舞麒麟外，还教他拿手的“五尖棍”和“擂锤棍”。村人在“山高皇帝远”的三洲田村练得一身武艺，1900年10月6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联合三合会、绿林、洪门等秘密反清会党等600多人，祭旗起义，打响了反清反帝第一枪，史称庚子首义。

龙岗区坂田街道杨美村麒麟队，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个身高7尺、武艺高强的青年叫刘照魁，投身广州的反清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宝安革命根据地坂田杨美村，更是在节日利用麒麟舞到各村联络，或参加婚庆活动，利用麒麟掩护深入虎穴，袭击敌人。解放后坂田杨美麒麟队一直坚持活动，2006年5月20日还参加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麒麟舞汇演，荣获二等奖(深圳市观澜街道樟坑径麒麟队获一等奖)。

麒麟舞，在深圳民间节庆中，增添节日气氛；在村落族群里强身健体、增进团结；在战争年月里为革命作过贡献。

竹扎纸做的麒麟需“开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增添过年的节日气氛，每逢大年初一至十五，深圳的文化部门都要分别调布吉坂田麒麟队、观澜樟



麒麟寻青



麒麟采青

坑径和库坑村麒麟队、水库新村麒麟队、石岩石龙仔麒麟队、南头长岭皮麒麟队、龙华龙胜和元芬麒麟队以及龙岗的麒麟队，一天一支队伍到深圳戏院和工人文化宫门口的广场表演。一般逢年过节，文化馆都让家在外地的馆员回去过年，因为我家住在县城深圳镇，组织麒麟舞表演自然就由我和刁冠章老师两人操办。早上10点多，麒麟队30人敲着大锣大鼓，扛着各色武术大旗和棍、刀、栅、戟、耙、擂锤、锐针、拳遮等器具，从东门汽车站（今罗湖区东门中路海雅百货商场）下了车、沿老街解放路、鱼街，东升街舞一圈，一路上跟着不少的男女老少，然后到达深圳戏院和工人文化宫门口小广场时，已围上好几百人看表演了。

麒麟舞除锣鼓、唢呐和武术师傅外，其实舞麒麟只有2人，一人舞麒麟头，称舞师；一人舞麒麟尾，称“尾仔”。麒麟头宽0.8米，高0.7米，小的重6斤，大的重8斤。由民间艺人用黄竹片，一片一片扎成麒麟头框架，然后优质纱纸糊面。麒麟头除独角外，眼睛可转动，下巴能“上下翕动”。纱纸糊面干硬了以后再用上好的油漆画上桃花、牡丹、菊花、蝴蝶、凤尾等色彩艳丽的花纹、图腾，独角前额要装上一面由红绸簇拥着的小铜镜，耳眼鼻周边镶上白棉絮，整个麒麟头鲜丽醒目、威武轻盈、灵气生动。麒麟头连着一张长8米宽1.2米长的被身，被身由黄、黑、红、蓝、灰色布间条，缀以闪闪发光的珠鳞片，麒麟尾有根小竹子在被内可操纵“尾巴”。麒麟头的“脖子”处书写着“风调雨顺”四个大字，接着横叠着黑、白、黄、红、藏青五色的披帘布，舞动起来，灵活飘逸，威风凛凛。



麒麟舞中拳遮与锐针对打

按老传统，新制作好的麒麟，不能马上用，双眼需用红布蒙着，待“开光”后方能舞动。麒麟的“开光”过程，充满民间传统的神秘色彩，首先要挑选吉日的夜半时间，麒麟队员一行扛着麒麟头，抬着金猪（烤熟的全猪）、三牲（鸡鹅鸭）、水果供品、香烛和锣鼓悄声出发。在“开光”前，据说行人需回避，否则这人要行“衰运”，特别是不能遇到孕妇，因为麒麟是个“四不象”，将要“开光”的麒麟等于将要下凡到人世间，撞见孕妇就有可能投胎孕妇中，生出个“四不象”怪胎。麒麟队来到预先选择好的村头三岔口，或有灵气的古树下，焚香，念辞，供品，拜天拜地，

然后由德高望重的麒麟队老者揭去麒麟头上红布，此时，锣鼓大作，鞭炮齐鸣，麒麟“出生”时便见到了青青的树叶，这叫“开光见青”，是吉祥的象征。

麒麟队员在鞭炮锣鼓声中，翻腾滚跃，麒麟队的锣、鼓、钗及武术刀具都要在草地上“磨”三下，接受地神洗礼。老师傅说，“磨”过的草地会枯死，个把月内都不会生长。更奇怪的是“开光”前几十人去村头，村里所有的狗不敢发出半点叫声；“开光”完回村，全村的狗会吠声大作。“开光”了的麒麟一直要使用，直至舞到竹篾散架不能再用才废弃。中途不得转让或卖给任何人，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

麒麟舞的喜、怒、哀、乐灵性

麒麟舞因教头不同，各村各队有个别动作和套路不一样，但大的舞法、步伐和套路没多大区别。麒麟舞全套舞10节，分出洞、挠头、舔脚、耍尾、寻青、采青、醉青、铲脚、拜脚和嬉（游）花园等，表现麒麟的喜、怒、哀、乐、惊、疑、醉、睡等动作神态。旧时全套舞下来要1个多小时，现一般删繁就简，保留精华部分，也得舞30来分钟。男青年舞麒麟头，男少年舞麒麟尾，舞到一半即第6节后，就要换人。如不换人，一个人舞下来，30多分钟累得散了架。

第二个人接上后，麒麟更龙精虎猛，在“摆水”时，只用牙齿咬住麒麟“下巴梁”，整个麒麟头由牙齿固定，双手分别抓住麒麟被，右脚单立，昂首生威，这是麒麟舞最高的技巧。接着唢呐奏起，麒麟“嬉（游玩）花园”，随着悠扬抒情的音乐，卧、伏、翻身、伸腰等动作优美。麒麟舞到尾声前，村长或老板会“打赏”麒麟队员，就把赏钱装在红包里，红包和一扎生菜吊在丈把高的竹杆顶上，考考舞麒麟头的硬功头。只见麒麟头师傅在震天锣鼓和呐喊声中，一鼓作气，单立在“麒麟尾仔”的大腿上，抑或骑在尾仔肩膀上，腾空跃起，麒麟头“咬住了”红包和生菜，夺得了赏钱，立刻引来一片喝彩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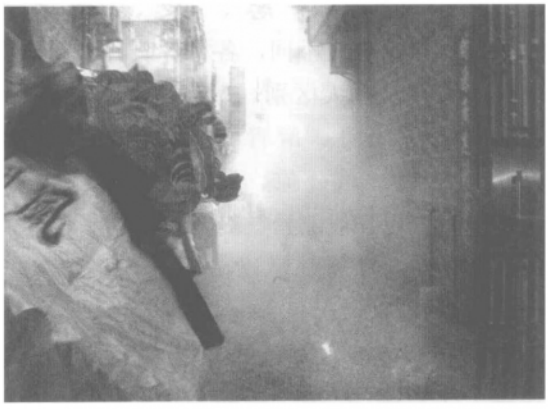
麒麟舞表演完后，武术表演上场。先由麒麟“尾仔”5人对打，祖传6人赤手空拳对打，3人打“三门顶”，1人打“四门闩”，1人打乌鸦散翅，“的哒棍”双打，铁栅对锐针，锐针对“拳遮”，双拳对打，双刀对单拳，打长棍，打“五尖”，打大耙等13套武术。当武艺高强的师傅打完后，教头最后上场表演，然后抱拳致谢，整个表演结束。

麒麟舞的忌讳和风俗

麒麟头的脖子有五块黑、白、黄、青、红色布帘，过去行规首块为

黑布帘的就是“铁颈麒麟”的标志，也就是这支麒麟队教头很出名，队员武艺高强，是方圆一带公认的佼佼者，如果路上相遇到其他麒麟，其他麒麟都要向它礼拜。如果几伙麒麟迎面过来，或狭路相逢，或过独木桥，这时各队的教头就轻轻“揿住”自己的麒麟头，礼让相拜，千万别昂起头来，否则就不服气打起来。

麒麟舞出门表演前，一般在各自供奉的武师神位烧香礼拜。水库新村麒麟队在百多年“拳出一声威似虎，身轻脚快威如龙”的师训下，面对武师燃香拜祭，冀求顺顺利利。据说，凡到一个村落舞麒麟拜年，都要先了解村里有哪几户人家生小孩，凡是有未满月的小孩人家，麒麟上门参拜时要绕过去，这叫“月间”。在村里广场表演麒麟舞时，坐月子的人家会盛碗姜黄酒，洒向麒麟舞表演场地和锣鼓，以祈麒麟队员和武术师傅平安大吉，不出意外。


麒麟向各家各户拜年

麒麟舞表演，在新春佳节特别隆重，他们在本村祠堂祭祀祖宗，然后到各家各户拜年，家家户户燃放鞭炮，摆上供品迎接，这叫迎春送福，“拜柬”的师傅用盒盘接过各家各户的红包，麒麟头就向你家参拜祝愿，这叫做你给我吉祥，我给你钱财。观澜一带的麒麟队收到礼金、糖果、糕点时，在表演场地上拿出部分回敬村民和观众。麒麟队除了在本村拜年表演外，还应邀到周边村镇、同姓宗亲团拜，为重大庆典活动表演，也有为婚姻嫁娶、新宅落成、公司新张舞麒麟助兴。解放前，黎围麒麟队年初一在本村舞，初二开始就舞到深圳圩、横岗、布吉、坂田、南头大沙河、盐田、沙头角、鹿颈村（今香港新界）等，过了元宵节，甚至正月底才回到本围村。观澜镇松元队每年也都经深圳、盐田、沙头角，一路舞到香港去，鞭炮锣鼓迎送，好不气派。麒麟队回到村里，按规矩把沿途去过村子的长老邀请过来，聚餐答谢，同时设坛酬神，庆贺圆满结束。整个活动完了后，麒麟、道具和刀戟器械入库，入库前，拜祭祠堂祖先和武堂祖师爷。来年再表演时，再拜祭武堂祖师爷和祠堂祖先，才出行演出。

深圳甘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钊著《石窟一征》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功樵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檐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障目。”戴客家凉帽，配上客家“围身”(围裙)，围上自己织的丝带；凉帽沿两侧垂下两条装饰性的穗带。按当地风俗，帽穗带的颜色可以区分佩带者是未婚还是已婚。深圳客家凉帽制作最负盛名的是有二百年历史的龙岗区布吉镇甘坑村。

深圳客家凉帽

风韵独特的客家凉帽

深圳地区自古流行一种不同渔民戴的“铜鼓笠”，也不同于潮州和“鹤佬”人戴的小竹笠，更不是梅县五华地区戴的大顶“尖笃笠”；而是造型轻巧、帽沿飘着布帘、美观大方的客家凉帽。据深圳建市前原宝安县权威史料统计，深圳客家村落和人口约占全县分布的54%。这“大部分”地区的客家人，准确地说是客家女人都戴这种颇有风味的凉帽，因为男人是不戴的。

女人戴上这凉帽，帽沿垂下一圈四五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这与古时女人用头帕包住半边脸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帽的顶端，开了个直径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凉帽戴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所以客家凉帽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深受深圳市和周边的惠州、东莞、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欧美一些国家的客家妇女喜爱。

深圳客家凉帽按地域分有甘坑凉帽和大鹏凉帽。甘坑凉帽帽帘为黑布，帽箔(顶)是竹的原色。大鹏凉帽帽帘为蓝布，帽箔(帽顶)漆成红色。据传明清时期，大鹏的水师为“守御千户所”屯守要塞，蓝色的帽帘布是当时军服颜色，

也就是现在的深色海军蓝；帽顶红色是因为清朝军帽的顶部是红色的，大鹏城人都是该城寨世袭军士的后裔，红顶凉帽就这样相传下来。

戴客家凉帽，配上客家“围身”(围裙)，围上自己织的丝带；戴凉帽，除了用丝带系紧下巴外，还有两条装饰性垂在帽沿两侧的穗带。按当地风俗，帽穗带的颜色很“讲究”，它可以区分佩带者是未婚还是已婚。未婚女孩的凉帽穗花带花穗是白色，已婚少妇穗花带花穗是红色，中老年妇女多用青色、黑色或红绿黑间杂色。女孩子出门、下地、赶集，都是拿白色穗带的凉帽，绝不拿其他颜色的，哪怕是临时戴一下，也不敢随便。

我小时候就见闻过一则真实的趣事。我乡下圩镇正逢圩期集市，有一位农村嫂子和未婚的小姑结伴“投圩”赶集，嫂子逛了一会圩市后碰上内急，她上茅厕时把戴着的凉帽摘下，交给小姑拿着。这时有几个农村青年趁赶圩集时找对象，有一位英俊的小伙子相中这位漂亮的小姑，暗中跟了几条街。转悠着时跟丢了，当重新发现了她，青年鼓足勇气凑上前，欲借故搭讪，蓦然发现小姑手里拿顶红色花穗的凉帽，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人家是结了婚的少妇。他收紧张开了的嘴巴，装着若无其事地擦肩而过。这一误会，错过了双方的一段姻缘。

这是有趣的风俗。如今没有那么讲究了，甚至许多人也少了戴花穗这一装饰，因为没人织，也没有人织来卖。原来只有客家女人戴的凉帽，后来靠近客家的广府村落，像公明、西乡、南头、蛇口等镇以及大冲、沙头、皇岗、水围、蔡屋围、罗湖、笋岗、向西、湖贝、黄贝岭等讲“广州话”的村子，女人们都喜欢戴凉帽了。

深圳客家凉帽的历史渊源

深圳市古称新安县，1600 多年前的东晋咸和六年(331 年)建置，属东官郡；郡的范围辖今深圳、港澳、惠州、梅州、潮汕和福建昭安等接壤地区，郡治设在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

深圳甘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钊著《石窟一征》卷四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功樵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檐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障目。”[中国史学丛书编本（台湾）第175 页]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丛谈志·物部》载：“客俗妇女，晴夏皆戴凉帽，制用竹织。其式为圆箔，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既可周遮头面，而长夏操作，可以迎风障目，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

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朝云莳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孔）”的竹笠给她用，“中开一空（孔）”为的是适应

王朝云头上的发髻向上通过不受障碍。（见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东坡谪惠州，携朝云随侍，暇辄令其艺圃莳花，故制此笠，惠州、嘉应妇女群相效之，今大埔、丰顺妇女行之如旧。"）

深圳客家凉帽制作最负盛名的是龙岗区布吉镇甘坑村。甘坑村坐落在深圳罗湖老市区往北15公里的小山坳里。甘坑凉帽村张姓始祖挥公，号王爵，他的后裔从河南迁居福建长汀府宁化县。张挥公的第152代张绅公约于明朝天启年间，再迁徙到今天的深圳甘坑村老围开村建业。张氏第158代张锦超，约在清嘉庆年间从甘坑村老围搬出离村旁两里地的山坑居住，发展成今天的凉帽村。清·姚莹在《康輶纪行》卷十四（同治刻本）记载："余初至广东，过大庾岭，见妇人担负者，首戴帽如草笠，空其顶以出髻，有帷四垂，深约四寸，轩其前，轻其后。嗣至闽中，妇人担负者亦然。"专家考证，文内"闽中"为福建长汀府一带客家地区。

清嘉庆年间甘坑凉帽村的开村始祖张锦超，当年见自己耕种的土地贫瘠，为生计便想多学门手艺，拜师邻村张太婆夫妇。张太婆从祖籍福建长汀府祖传下来一门织凉帽手艺，农闲时织点凉帽自用，但她的绝技不轻易教人。张太婆一次急病时，唤人叫张锦超过来，谁知张锦超去了一趟20多里地远的观澜墟，偏偏传话人又忙忘了，当他回到家里时，夜已很晚。但锦超公知道消息后马上赶去探望，深夜抓药。经过几天悉心照料，感动了张太婆，后来就教会了张锦超织凉帽。张太婆逝世后，张锦超利用这满山遍野的单竹林，把织凉帽的手艺往下传了六代（张氏第163世）的子子孙孙。

甘坑凉帽村，200多年来发展为全村家家户户以织凉帽为生的凉帽村。解放前后几十年，有十来户外嫁女和男人外迁至深圳市龙华、观澜、坪山、大鹏等地，把凉帽手艺带到当地，可是囿于织帽工艺不外传的祖训，只限于甘坑人自己家庭织造。所以，除了甘坑凉帽本村外的甘坑人，其他地方没有群体集中式编织凉帽，全都是单门独户编织零星凉帽贩卖，权作家庭副业。

解放后，甘坑村被正式命名为"凉帽村"。以一种工艺品命名一个村庄，在全国并不多见。50年代期间，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考察省内其他做凉帽的地方，最后将甘坑村定为唯一全省凉帽外贸生产基地，当时甘坑村办起1000多平方米的凉帽工厂，锦超公的第5代传人张庆浩当厂长，生产规模为历史最高峰。凉帽每月生产4500多顶，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地区和英美等国家的唐人街，当地深圳籍的客家妇女都喜欢它，即使不戴，也买一二顶挂在墙上装饰，聊解乡愁。

深圳市石岩镇"郑义和凉帽店"是专为甘坑凉帽村加工凉帽的家庭作坊，祖传四代，也有上百年历史，由于质量上乘，他们加工的凉帽供不应求。1954年，该店的老板郑义和，发明将帽帘打皱褶，并缝纫三行线，使



客家妹戴凉帽

效率大大提高，帽帘美观大方。甘坑凉帽村原来做的凉帽布帘，是用手工一针一线地缝，效率很慢，也不美观。于是郑义和被邀请到甘坑凉帽村传授了一年多经验，使甘坑凉帽村的竹织技艺和郑义和捻褶“弥帽”技艺相结合，织出来的凉帽漂亮、结实、耐用。

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石岩郑义和凉帽店，靠在石岩河边的老树底下，河边也有一间家庭作坊叫李鸿昌织布店，一家人三四台手工织布机，一天到晚轮流地织个不停，织出来的薄纱布专门供给郑义和凉帽店加工凉帽。

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农村逐渐城市化，下田耕作的人越来越少，戴凉帽的人也不多了；加上市场上各色旅游帽冲击，房地产市场的诱惑和村办工厂需要，原来凉帽山大片竹林，被推平建设成住宅区和工厂区。

甘坑凉帽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村只剩张正保一户人织凉帽卖，每顶25元，一家人每月做30顶左右，零星售卖，帮补家计。2002年张正保逝世后，村里已经再没有人织凉帽了。石岩“郑义和凉帽店”廖亚友大娘也已经84岁，早就没做凉帽，廖大娘的4个子女除了郑佛全会做凉帽外，其余都不会；但郑佛全也是60多岁的老人，客家凉帽濒临失传境地。

凉帽制作工艺技术

甘坑村有座凉帽山。此山种有几百亩“单竹”，该竹子很特别，虽七八米长，但竹头竹尾一样粗大，每棵竹节间长1米多，易开篾，而且需要多薄

就能开多薄。制作一顶凉帽的原材料很多，工艺程序也很复杂。主要分两部分，首先是竹织部分的原料："单竹"或青竹，单竹为上好；竹子首层青皮为上等，第二、三层的篾囊依次之；染成竹篾青色的颜料粉、桐油、"吹干"（土药名），以及扎凉帽边框用的水藤。

其次是帽帘、帽穗部分的原料：棉纱布或棉涤混纺（含棉必须70%以上，否则褶皱不起来）的布料，染布的染料、帽蛇（帽顶小圈的包边布）、丝线、穗带、蜜蜂蜡、木薯粉煮成的粉浆等。

客家凉帽制作是典型的手工技艺，整个生产流程有33个工艺程序，分各个工种，由各个师傅完成，较为细腻、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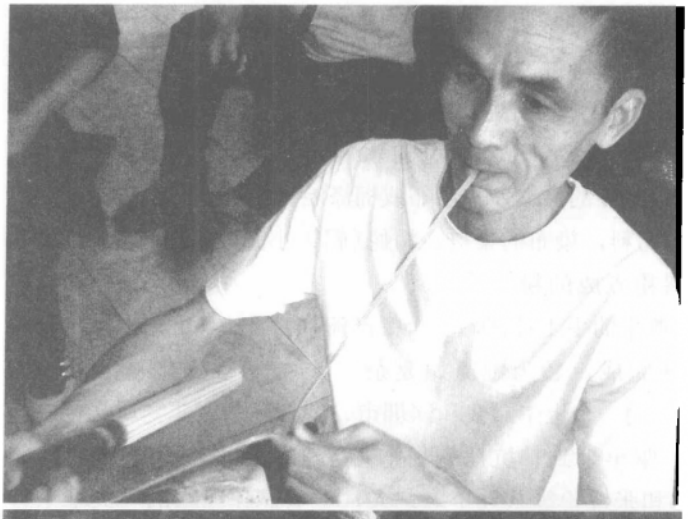
2006年炎热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和深圳市、罗湖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同志，驱车来到甘坑凉帽村，村长张锦维带着张浩庆、张子滔、张航燕、凌福娣和张锐玲等八九个老艺人，对着制作凉帽的一大堆工具和原材料，一一向我们介绍。来甘坑村之前几天，由于不了解我们非物质文化遗迹保护办是干什么的，甘坑凉帽村的干部和老手艺人起初不愿接待我们。推说10多年没做凉帽了，凉帽山被推平建了住宅高楼，凉帽村没有单竹，工具也丢失了，老艺人很难召集等等。

后来，我们先拐个弯去石岩镇，找到"郑义和凉帽店"廖亚友大娘和她的儿子郑佛全，全程采访、录音、录像制作凉帽的详细情况。深圳《晶报》记者随行采写，图文并茂地刊登了大半版报纸，影响很好。甘坑村见凉帽上了报纸宣传，知道是为保护他们的传统工艺，加上石岩镇"郑义和凉帽店"的郑佛全是甘坑村人的女婿，经郑佛全电话再联系，甘坑村同意我们全程调查了解、录音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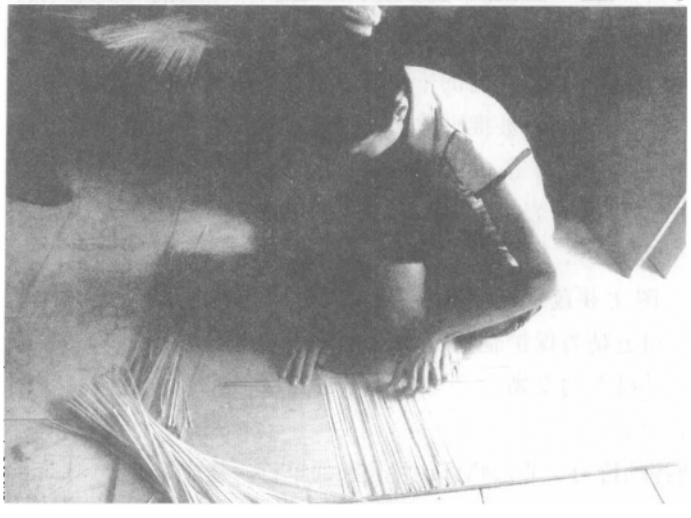
只见张航燕师傅挥动竹刀，非常熟练地将长长的单竹，裁成每节56厘米长的竹筒。为什么要56厘米？因为编织起来就大约为一顶凉帽的尺度。接着用刀把竹筒外层青皮刮去，用青绿色的颜料释稀成水粉涂抹竹筒外层。然后用篾刀破成0.5厘米或0.25厘米宽的两种竹篾条；再把篾条放在有牛皮垫腿上用刀削滑。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篾青、篾囊。张航燕师傅"索索"地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篾青、篾囊，厚度均为0.01厘米，片片像纸一样薄，非常准确。

削完篾条，就用"剑门"刀架削篾框条。破出的篾条片由张锐玲拿去晾晒半个多小时，篾条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心灵手巧的张锐玲蹲在地板上织帽箔，她抓起一把薄纸似的篾条，横摆41条白皮篾囊，用脚踩住，用一条篾青固定中心点。然后织"裁心仔"，诀窍是头青为中心、二青（第二层）间直行、白囊打底。"用白囊篾41皮间12皮二青"来织。织完"裁心仔"织"头碌"，即织帽心外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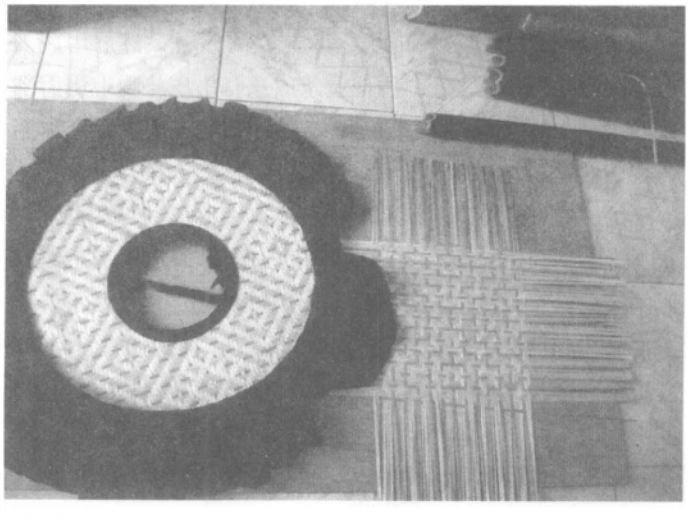
织整个"帽笪"（帽顶）最考功夫的是织花纹图案。一是织"满天



甘坑凉帽绝活——咬篾



织帽箔



甘坑凉帽

星”，二是织“娥眉花”。将帽箕织成直径42厘米至55厘米不等规格的帽箍顶。帽箍顶织成型后剪帽箍内圈和外圈，用小土圆规在帽箍中心划圈，用剪刀剪空心和外边（须先扫桐油，干了才剪，否则竹篾松散）。

帽箍织成要用帽框固定，否则篾条松散，这个程序叫弓帽，这也是做帽的关健环节，弓得不紧，帽子不结实；弓得太紧，帽子冷缩热胀变形。具体是将外圈剪圆、内小圈做好帽蛇的“帽箕”（即帽箍），套在内外2个仅差0.1厘米的帽框里，让内外帽框夹住帽箕边，秘诀是用码横、码间一点一点地夹紧压住，然后用码仔的凹槽固定，这时注意“平、掌、紧”，人蹲在帽箍上“前弓后蹭”，“弓平弓实”。这时候，用带钩的锥子将0.2厘米宽的水藤分39或40段距离，把凉帽外沿四周帽框帽箍扎紧固定。一顶凉帽便有了雏形。

凉帽为防水防蛀、耐用，需涂扫一层桐油。首先将买回的渣桐油，加入“吹干”（土药名）煮稠。煮时注意火候和煮的时间，桐油不能煮得太老，也不能太嫩。煮好的桐油扫两次帽箍顶面，帽箍反面只涂扫一次。师傅们将扫了桐油的帽箍拿到太阳底下晒二三小时，然后用手拈到帽箍桐油有点粘手，马上收回阴干，否则帽箍桐油起一层层皱纹面。

凉帽光有竹篾帽顶不成，帽沿要围上一周布帘。这个程序叫做“弥帽工序”和“上帽工序”：首先将白布成匹染成黑色。将黑布匹泡一下粉浆，将上了浆的黑布晒干。将黑布裁成长340厘米×宽17厘米的布条。将黑布条用水抹湿铺在木板上，然用手指把布条一小行一小行捻成0.2厘米宽间隔的皱褶。口诀：“捻五下，打裙脚。”将褶好了湿布褶，连木板拿去晒干。将晒干了的褶布条缝上三行线，固定皱褶。

然后用细滑绸布做帽箍小圈内的“帽蛇”（即包住竹边的帽编）。将粗线打上蜜蜡，用蜡线将布帘缝在帽箍的外沿帽框上。最后钉扣耳、装穗带，盖上“甘坑凉帽”蓝印章。一顶美轮美奂的客家凉帽做成了。

客家凉帽的特征和价值

甘坑凉帽按规格分，有大、中、小三种，直径55厘米为大号，中年妇女喜欢用；50厘米为中号，老年妇女喜欢用；42厘米为未婚妇女喜欢用。

凉帽按竹篾片的宽度大小分，有两种：一种篾条宽度为0.5厘米的为粗纹凉帽，一般为中老年妇女用；另一种篾条宽度为0.35厘米的为幼纹凉帽，多数为姑娘爱用，特别是新婚女人喜欢用作结婚礼品。

凉帽顶箍按编织的花纹分，有“四皮囊一皮青”竹篾的“满天星”，“三皮囊一皮青”竹篾的“娥眉花”二种；还有的花纹编有“福禄满堂”、“风调雨顺”等字样图案，目前已没有人会编字的了。

深圳客家凉帽由罗湖区调查整理上报市政府，2007年1月被批准为首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关专家认为深圳客家凉帽非常富有地域文化特征：深圳属亚热带地区，夏季时间长，温度高，凉帽因为有圆孔，头顶透气，遮阳凉爽，具有岭南客家文化特色的生活用具。历史文化特征：客家凉帽发明和使用，体现了客家人多次迁徙移民、带来中原和各地刻苦耐劳、发明创造的文化品格。工艺制作特征：凉帽虽然历史悠久，却没有生产技术记载，它的制作工艺全凭师徒传授和实践经验积累。这类手工制作难以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特别是编织花纹图案、捻布打褶布帘和煮扫桐油技术，都有它的口诀、秘诀和独特技艺，手传口授的民间手工艺特点浓厚。地方民间风俗和区域习俗特征非常明显：凉帽只有妇女人戴，凭着配戴帽穗带就能区分出少女或已婚妇女等等。

专家还认为，此项目具有其历史价值：凉帽使用近千年的历史，是当地客家移民的创造发明；同时对研究客家妇女摒弃“女人不抛头露面”的古中原遗风，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文化价值：凉帽的图案花纹编织、师徒传承口诀、凉帽穗带的识别、客家妇女戴凉帽的风韵，特别是舞台艺术（舞蹈、戏剧、歌曲、摄影、美术等）常用凉帽作道具表现，无不透射出客家凉帽的独特韵味。实用价值：凉帽戴在头上遮阳清爽，拿在手上轻盈方便，生活实用性很强。同时，凉帽不仅花纹图案美丽、造型美观，而且戴在女性头上，体现女性美感，富有审美价值。经济价值：凉帽是日常生活用品，又是有地方特色的工艺艺术品，而且海外华人十分钟爱，如果在组织生产内销、出口基础上，再在古代民居旅游景点里，一边手工制作表演，一边公开售卖，经济前景可观。

大鹏所城在明清两朝，是我国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海盗以及葡萄牙、英国殖民主义入侵的重要军事要塞。人口虽说三千来人，但历史上却出了赖氏“三代五将”、刘府“父子将军”等十多个将军。“将军宴”是一种独特的民间宴会，源于清朝期间大鹏海防要塞的将军，打仗凯旋归来抑或者逢年过节，设家宴款待全城将士和周围乡邻。由于当地喝的客家黄酒叫作“将军酒”，将军用“将军酒”宴请，这大型的民间宴会流传至今称之为“将军宴”。

大鹏古城“将军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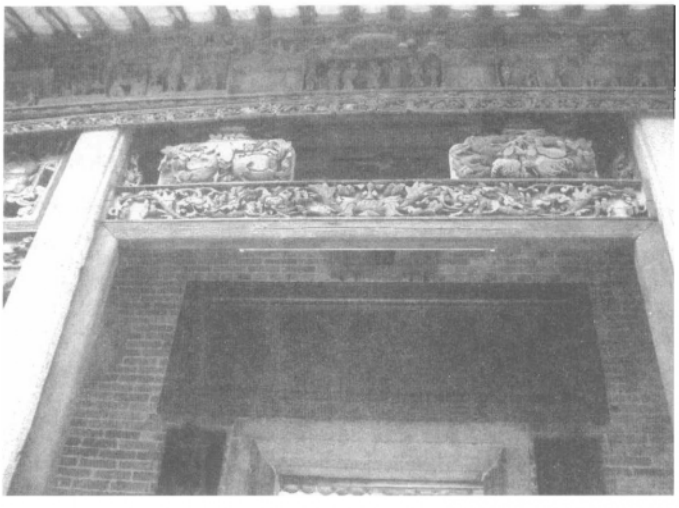
深圳古城——大鹏所城有一种全国独特的民间宴会，就是“将军宴”。

“将军宴”说起来，溯源于清朝期间大鹏海防要塞的将军逢年过节或者打仗凯旋归来时，设家宴款待全城将士和周围乡邻，由于当地喝的客家黄酒又叫“将军酒”，将军用“将军酒”宴请，这大型的民间宴会就称之为“将军宴”。

距离深圳市区60多公里的边远小城，何来将军？套用说书人的常用语——说来话长了。

话说大鹏所城出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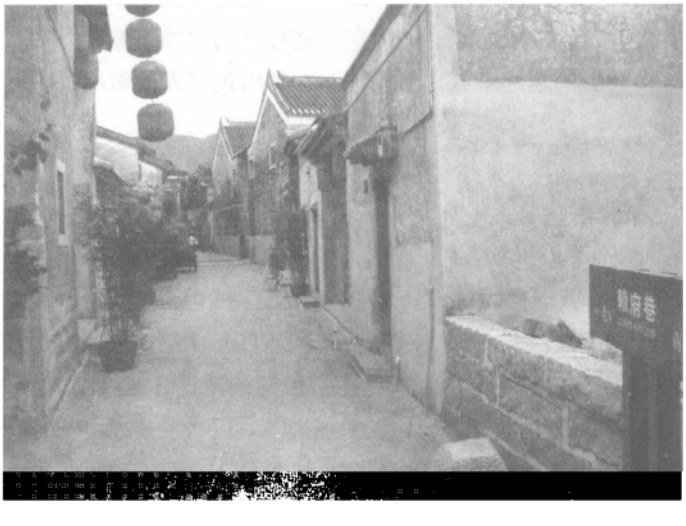
大鹏所城地处深圳东面的大鹏半岛上，明清两朝时，是我国东南海疆抗击倭寇、海盗以及葡萄牙、英国殖民主义入侵的重镇。大鹏所城建立于明洪武二十七年，为守御千户所。“千户所”拥兵一千一百二十人，管辖防区大鹏湾、大亚湾及香港地区，也就是古时新安县的东南部范围。明朝时期军事上创立“卫所”制，明天顺《东莞县志·城池》：“卫所者，分屯设兵，控扼要害错置京省，统于都司而总隶五军都督府。五府无兵，卫所



赖恩爵将军府第



大鹏古城赖府



大鹏古城

兵即其兵，屯操、城守、运粮、番易、仿唐府兵遗意。”卫所里“军士”是一种固定职业，“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家属另立军籍，是为军户，全家一旦入户即世世代代为军，若为军的长子死亡或老病，则由次子或余子顶替为军，若全家死亡或老病，则到原籍族人中找人顶替。这样的军士世袭制度，使大鹏所城居民逐渐形成世代当兵的传统，这种传统直至卫所制度衰弱废除、甚至大鹏所城遭裁撤也没有改变。所以，很多大鹏城人在当地或外出当兵，立了军功当了将军回来就多达十多个，清中叶的大鹏城到达了顶峰。赫赫有名的就有指挥中国水师，在香港水域痛击英国侵略者义律船队的1839年9月“九龙海战”大捷、揭开鸦片战争史上辉煌一页的赖恩爵将军。大鹏城就出有赖氏“三代五将”，即一家三代出了五个将军：赖恩爵祖父赖世超在道光十年被晋封武功将军，御赐蓝顶花翎，正二品。赖恩爵父亲赖英扬在道光十八年，授浙江定海总兵官，晋封振威将军，从一品。赖恩爵叔父赖信扬在道光二十七年，任福建厦门水师提督，晋封建威将军，正一品。赖恩爵在道光二十三年任广东水师提督，晋封振威将军，从一品，道光皇帝御笔赐匾额“振威将军第”。赖恩爵四弟赖恩赐在咸丰六年，任福建晋江镇镇台，晋封武功将军，正二品。因此，当地有“宋代杨家将，清代赖家帮”之誉称。

大鹏所城还有著名的“父子将军”。据大鹏所城新发现的《刘起龙功名碑》记载，刘起龙父亲刘仕开在清朝曾任南澳总兵，晋封武显将军，正二品。刘起龙1772年生于广东新安县大鹏城，在大鹏城入伍，嘉庆八年授平海营右哨把总，以后屡立战功，曾升任虎门水师中右营中军守备，1817年调升南澳镇总兵，封振威将军，1826年升福建水师提督，道光九年（1829年）冬，入见道光皇帝，备荷恩宠。道光十年二月，于巡洋时殉职。道光皇帝“钦赐御葬”，并亲笔撰写《御祭文》，墓葬家乡大鹏城。

人口仅三千来人的大鹏小城，历史上却出了十多个将军，至今保留的除刘起龙将军第、赖恩爵将军第外，还有李姓、杨姓等十多座将军府。在我国“将军县”、“将军乡”，屡有听闻；但一座边陲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竟然出了那么多名将，实为少见。看来大鹏城称之为“将军城”应当之无愧。

将军亲民故事多

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刘起龙，大鹏城人，初行武，任崖州营参将。”清光绪史澄《广州府志》载，刘起龙由原福建南澳镇总兵于“道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升福建水师提督”。刘起龙将军一生致力于巡洋缉盗，抗御倭寇，“前后十八战”，战功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为官清廉，体恤部下，关心百姓疾苦，深得鹏城人民敬仰。大鹏所城近二百年来，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刘将军的传说和故事。

摸夜将军。刘起龙小时见过大鹏城里一些将军耀武扬威，逢年过节从外地回家，护身亲兵提早抵达鹏城，往往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摆台烧香，骚扰居民，也害苦驻城县丞，提心吊胆，处处查巡，唯恐差池，他暗想自己有一天当上大官，绝不扰民。道光三年官至南澳镇总兵的刘起龙，每逢远道回家，从不声张，总在三更半夜进城。有一次，因为三更已过，城门已关。其中一个卫兵叹曰："这回可好了，要打回头了。"刘起龙幽默道："我们军人的武艺哪里去了？爬！"话音刚落，各人施展拳脚，攀越城墙，没等在垛口站稳，就听见一声吆喝："干什么爬墙？"刘起龙见是巡更士兵，连忙悄声说道："回家赶路太晚，只好翻墙进来。"巡更士兵一见是大名鼎鼎的"摸夜将军"，果然身先士卒，不以扰民，不禁佩服跪地。次日，巡更士兵受到刘起龙将军在家便服接见，夸耀他警惕巡城，恪守尽职，并奖赏他十二两银子。

巧训舅父。刘起龙舅父也是一位将军，每趟回家省亲，传丁报信，耍足派头。驻在鹏城一位县丞大拍马屁，家家抽丁派钱，搞得百姓暗暗叫苦。一次，刘起龙为母亲祝寿，冒着雨夜回到家已成"落汤鸡"了。母亲心痛嗔道："你做什么将军，总是偷偷摸摸回家。你看你舅父多气派。不知道是你当将军大还是你舅父当将军大！"这一句话点醒了刘起龙，他心生一计对付这位傲气十足的舅父。母亲生日那天一大早，祝寿的亲朋好友未到之前，刘起龙忽然说有事出去一下，并抱出有点湿的官袍和官靴，要母亲替他放好。母亲不知是计，等刘起龙走后，见袍靴有点湿，就晾在太师椅上，摆在大门内的前庭上晒。不久，客人陆续来了，这时人传舅父来了，大家到门口迎接，只见这位将军大摇大摆，前呼后拥，进了大门，尚未寒暄，高谈阔论，大作训示。忽然他见到庭院上耀眼的袍靴，十分惊讶：这是圣上赐物！见物如见主，当即下跪："万岁！万万岁！"众亲眷大吃一惊，当知道这蟒袍金钱靴是道光帝在刘起龙上京面圣时的御赐，都异口同声赞扬刘起龙事不张扬，谦虚俭朴。舅父此时知道小小鹏城，天外有天，老子并不第一，连外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此行为收敛，不再专横跋扈。

将军井。大鹏古城红花巷内有一眼古井，叫将军井。刘起龙长期在外任职，总忘不了回乡祭祖。有一年刘起龙返乡，适逢大鹏半岛旱灾，庄稼无收，村民饮水成问题。刘起龙一边召集乡亲们商议打井取水，一边仔细探察鹏城村的地貌。乡亲们说近海挖井会挖至咸水，靠山开凿工程大，距离远，且未必有水。刘起龙以军人侦察的双眼，踏遍全村，发现鹏城是依排牙山南麓的大窝山和龙头山而筑，这两座山之间有一干涸的河流，河床潜穿鹏城腹地而过，他逐巷堪查，见红花巷露地土层湿润，就率青壮年和泥匠开挖，掘地丈余，果见清泉溢出。人们就用花岗岩石将这口二丈深、井面三尺宽砌成圆口井，井内直径却五尺有余，井水清冽甘甜，一百七十多年来一直滋润着鹏城人民。就这样，人民把红花巷

里的“红花井”，沿袭至今仍叫“将军井”。

三千人同进“将军宴”

大鹏所城现有三千多人，大部分为过去军人的后裔，赖恩爵第五代孙、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鹏所城博物馆主任赖继良告诉我们，2006 年 2 月 15 日，也就是在丙戌年春节期间，大鹏所城在港澳台地区、国外华侨和国内各个城市工作的大鹏人，纷纷回乡省亲、祭祖。借此机会，鹏城人缅怀英烈，民间隆重举办“大鹏所城千人将军宴”。

鹏城大广场红旗飘扬，张灯结彩，广场入口处装点一个充气拱门，双龙戏珠的大红拱门上书“大鹏所城千人将军宴”，相当醒目、气派。广场四周飘动数个气球，空中飞挂红幅标语，特别是宴会主场几条横额“三代孙将护国定疆清史留正气；六韬三略擅用筹边御旨赞英豪”（这横额是咸丰六年兵部尚书赠给赖恩爵振威将军第的一副对联）、“秀一鹏山开泰运；重班凰阙迓鸿麻”（道光皇帝御旨赖恩爵将军第对联）及“良辰美景全城都热闹流光溢彩；盛世佳节社区共欢腾歌声舞影。”气氛热烈。

宴会场地上，摆满 280 桌筵席，每席十人十二人不等，三千人同吃“将军宴”。“将军宴”旧时喝将军酿造的客家糯米黄酒，亦称“将军酒”；吃明清菜式八大菜八小菜，鸡、鹅、鸭、猪、牛肉、冬菇、竹笋、腐竹等山珍，鲍鱼、海参、鱿鱼、海胆、圣子、海螺等海味。如今精选为 12 美味佳肴。宴会上有文艺演出，舞麒麟、狮子助兴。据说凡是到大鹏古城探亲、祭祖活动，认不认识无所谓，见者有份，坐下就吃，一百多个厨子，煮都来不及供应。有好些找到熟人，得到厨房里的叔伯娘婶关照，才吃到宴，越是这样，好客的鹏城人越觉得热闹。

大鹏所城居民三千多人，姓氏达 60 多个，是古代典型的“移民城”。当年，将军打仗凯旋归来与民同乐的“将军宴”，想不到几百年沿袭至今，“新老移民”同进“将军宴”，除纪念祖上爱国将士外，还营造今天大鹏所城和谐社会环境，不无裨益。

据大鹏古城史料记载："500多年来，天后宫香火鼎盛，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为天后生日，且每隔五年举办一次隆重的'打醮'活动。相传清代名将刘起龙、赖恩爵以及大鹏营的参将、守备、千总等军官常到天后宫拜祭。"通过"太平清醮"大型的祭祀仪式，追念历年阵亡的爱国将士和台风海难中的亡魂，成为大鹏所城的古老习俗。

大鹏清醮探秘

探访大鹏古城

"打醮"是我乡人对举办"太平清醮"的简称，我在50多年前的孩提时见过，国内自解放初"破四旧"至今基本销声匿迹。听说龙岗区有个地方最近连搞了几届"太平清醮"，即时引起我这个喜欢研究民间民俗的人的兴趣。

这个地方，就是距离深圳市区60多公里的大鹏城。

说起深圳，人们印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处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谁也没想到"年轻的深圳"竟有一座距今600多年历史的保留完整的大鹏古城。这座名城，位于我国著名的大亚湾核电站旁边的大鹏半岛上，与香港新界隔海相望。2001年6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一个金秋季节，我受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委托，和国家、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几个人，专程到大鹏古城普查、挖掘和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因为我是深圳当地人，上世纪60年代我在宝安县文化部门工作，迄今为止，到大鹏城去过不下四五十次。所以对大鹏古城比较了

解。

大鹏所城是明朝建立的一座防御倭寇和海盗的军事重镇。元明期间，大鹏古城所处的我国东南沿海，海盗、倭寇（日本海盗）出没不断。明顾天俊《兵垣四编》："日本，从洪武中数为边患沿海。"卢坤《广东海防汇览》载有："崇祯三年艚贼李魁奇寇，参将陈拱死之……南头（今南山区）地方，尽被焚劫；崇祯六年二月，海寇刘香寇新安，闽抚将郑芝龙败之……五月刘香复寇新安……崇祯八年刘香复入寇新安"……到了清朝，甚至出现张保仔、邬石二、郭婆带等江洋巨盗。大鹏半岛"人迹罕至，蛮荒之地"，百姓受尽海寇烧杀掳掠之苦。为抗倭寇海盗，明朝时大鹏设立千户御所，拥兵一千一百二十户，"御所"不同一般千户所，是朝廷设置，直接由都指挥使司管辖，即大鹏守御千户所虽在南海卫的范围内，却由广东都司直属。大鹏所城和东莞所城（即今深圳南头古城）是广东两个扼守南疆的守御千户所，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65个"千户御所"之一。大鹏御所实行军士屯田制度，也就是从北方和福建、广东沿海募调军人。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所带家属另立军籍，是为军户，全家世世代代为军，大鹏所城军人连带家属实有三千余人。由于军士世袭，小小的大鹏所城清代出了10多位将军。大鹏所城历为军事重地，战事连年，阵亡将士众多，常常祭悼爱国亡魂。大鹏所城至今有60多个姓氏，语言为北方话、广府话、客家话混杂，形成独特的大鹏话，又称"大鹏军话"，与深圳甚至广东其他任何地方不同的汉语。大鹏人古代一边守城、打仗，又一边下海打鱼、岸边种田，他们创造出许多独特的民俗文化，比如当地妇女头戴一种像清兵红帽冠的漆顶红色、帽帘围着海蓝色的"大鹏凉帽"。大鹏人用大鹏话唱的"大鹏山歌"，女人出嫁时唱的"哭嫁歌"、死了人唱"哭丧歌"等。这座小城还定期举办"大鹏海节"、"牛神节"、"大鹏将军宴"和"大鹏清醮"等等习俗。

大鹏所城，非物质文化遗产挺丰富。但是哪一种非物质文化形式最能体现大鹏所城古代军人爱国精神？我和省里来的专家反复比较、研讨，决定对祭典爱国将士亡灵、祭祖敬神的"太平清醮"进行探秘。

鹏城北门为"白虎门" 引出大鹏清醮起源

在大鹏街道文体中心和大鹏所城博物馆领导大力支持和具体组织下，请来几位主办过5届"大鹏清醮"祭祀仪式的70多岁老人，在座谈会上向我们讲述了大鹏清醮的起因和醮会的详细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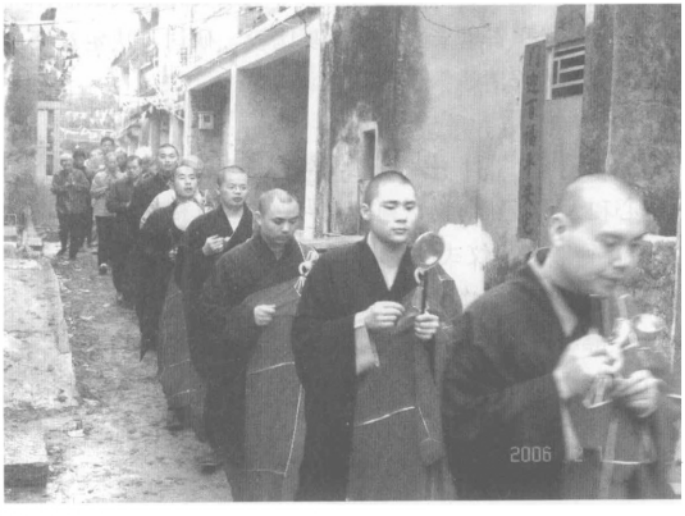
《正一威仪经》曰："醮者，祈天地神灵之享也。"（选自《道藏要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无上黄录大斋立成仪》称："烧香行道，忏罪谢愆，则谓之斋；延真降圣，乞恩请福，则谓之醮。"（《道藏》第9册，文物出版社）南北朝开始，至宋历代朝廷多有建醮祭仪，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逐渐



镇邪驱魔山大佬（赖继良供）



清醮醮坛（赖继良供）



绕大鹏古城“巡香”一圈（赖继良供）

普及民间。“大鹏千户御所”城是为军事要塞，战事频发，大鹏清醮相当一段时期是为超渡阵亡无名将士、解除瘟疫的“瘟醮”，以后太平盛世就做“太平清醮”了。

“大鹏清醮”起因，据说与600年前建城有关。

大鹏所城地处我国边远的东南海疆，海盗、倭寇历来猖獗。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指挥花茂上言，复设沿海诸卫所，分筑墩台，屯种荒田，且耕且守，以备倭寇”，朝廷许之（清嘉庆《新安县志》）。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八月，朝廷“命安陆侯吴杰、永定侯张铨率致仕武官往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官兵以备倭寇”（《明史·太祖实录》）。是年大鹏所城建成“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开筑，内外砌以砖石，沿海所城，大鹏为最，周围三百二十五丈六尺，高一丈八尺，面广六尺，址广一丈四尺，门楼四，敌楼如之，警铺一十六，雉堞六百五十四，东、西、南三面环水，濠周回三百九十八丈，阔一丈五尺，深一丈……”（清康熙《新安县志·地理》）。

今大鹏人、曾担任几届“大鹏清醮”醮委会主事黄福娣（1929年生，清朝福建水师提督刘起龙将军曾孙，小时过继给黄姓人家）说，她10岁时爷爷黄品华（1869年-1945年）告诉她：相传大鹏所城建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开光（使用）后，北门附近几位子民忽然无疾亡故，牲畜发生瘟疫，引起百姓恐慌。建城的头领派人马上请来风水大师堪舆，认为北门是白虎门，开不得。除了堵上北门外，还请来道士“打醮”做法事。

后来为避邪消灾，大鹏人又在北门内侧相继建了武庙（关帝庙）和文庙（孔昌庙）“挡煞”。几百年来，康熙和嘉庆年间四座城门曾两次被飓风毁过重修，但鹏城北门从没开过，1938年11月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从大鹏大亚湾登陆，城里人为逃难，仅开过一回，过后又封堵上。现北门早已荒废倒塌，民国时期在此旧址建立大鹏小学堂，今废。

据纪志龙主编《历史文化名镇大鹏镇》（天地人出版有限公司）写道：“500多年来，天后宫香火鼎盛，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三为天后生日，且每隔五年举办一次隆重的‘打醮’活动。相传清代名将刘起龙、赖恩爵以及大鹏营的参将、守备、千总等军官常到天后宫拜祭。”大鹏清醮已举行过100多次，直到解放后土改至1989年停止了40多年。1986年民间集资重建天后宫，大鹏清醮又开始举办，黄福娣说每届举办都报告上级统战部门同意，至2006年2月已举办了五届，每届参加群众数千至上万人，影响及至周边的东莞、惠州、汕尾等市及附近澳头、龙岗、坪山、葵涌、南澳等镇和街道。

太平清醮仪式一般定期定点举行。但各地没有统一的时限，如香港长洲、吉澳岛每年一次，惠东、龙川3年或5年一次，香港大埔10年一次，香港上水和深圳向西村60年一次，最久的有的地方100年才举办一次。大鹏清醮逢5年

一次，每次在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期间挑拣日子，每次举办时间为期7天。2006年2月9日举办的这一届，由于经费不足，“打醮时间”头尾才举行6天。

大鹏清醮举办前，“鹏城民间醮委会”召开多次筹备会，由群众自愿捐款达10多万元后，其中香港大鹏同乡会乐捐15000元、深圳一位企业家覃先生慷慨解囊5万元。筹措18万元款项后，提前半个月落实请杭州灵隐寺僧人（7人，每人费用1万元。以往都是请附近道家道士，今年城里群众意见改请佛家僧人），马上制作各种纸扎“山大佬”、马、龙、船等模型，布置醮会祭坛等。

设坛开醮

“大鹏清醮”的醮坛，设在鹏城里天后庙门前空地上搭建的大竹棚内。祭坛竹棚长12米、宽6米、高3米，横额书“太平清醮”，两侧对联：“天恩浩荡千载颂赞礼，后德巍峨万寿永无疆。”“神恩浩荡潮鹏海，圣德巍峨溯蒲田。”两联巧将“天后”、“神圣”嵌入联首，表达大鹏海民敬仰妈祖娘娘。天后宫侧街亦搭有一牌楼，亮出大鹏清醮宗旨：“风调雨顺，国泰平安。”醮坛外彩旗迎风招展，醮坛内，将大香炉鼎1座，纸扎马6条，纸扎龙2条，纸扎银鸡、白鹤、凤凰各1对，纸扎凉亭、宝塔各一座，纸扎大船小艇各一条，纸扎花轿6顶，纸扎金库、银库各一座，纸扎金鼓、银鼓各6个，纸扎金斗、银斗各1双，纸扎八仙桌椅一套，纸扎茶壶茶杯饭碗9套，纸扎金萝、银萝一担，纸扎金桶、银桶各1对。摆进棚坛，谓为“进醮”。然后，用松树针叶撒地，曰“铺坛”。

在距天后宫醮坛数十米远，另置一个葵棚，棚中立一个高2.5米的“山大佬”纸人，俗称“山大人”。其造型十分奇特，面如铜铁，眉浓头方，目怒脸长，口宽鼻大，大腹便便，身披甲袍，背插满五色令字三角旗，臂肘强劲，足腿粗壮，大大跨开，穿着高黑靴，整个身躯均以五色纸粘而成（全身躯以竹子为框架），肃穆威严，望而敬畏。据说它能“挡灾降福纳千祥”，小孩若摸摸“山大佬”手中的笔或其肚脐部位，长大会写文章，满腹经纶。

大鹏清醮第一天：迎神坐坛。由7位僧人带着香火、香灰，和醮委会几人及上千群众，举旗扬幡，挑着彩篮，随着锣鼓燃放炮竹，舞麒麟，分别到大鹏所城东山寺请观音，到水神庙请水仙姑，到城隍庙请城隍爷，到天后宫请妈祖，还到太公庙请太公及五显华光诸神，建坛进表。请妈祖时最隆重细心，众人拉紧几匹长的红绸，离地从天后宫请出，安坐在神轿里，然后置放醮坛正中显赫位子。舞狮子、麒麟，燃放炮竹，鼓乐齐鸣。拜“当天”。拜天后。僧人诵经拜忏。僧人身穿红色袈裟，打坐诵经7天。全体吃斋七天。主事黄福娣手擎香烛，代乡亲父老祈祷，口念祈愿神明保佑国泰民安，保国保民，全城老少，丰衣足

食，健康长寿。

主事的黄福娣、吴玉婵、赖鹏发等几位老人，必须要具有公婆健在、家庭兴旺、几代同堂、热心公益的诸多条件，是经村民推选出来的村中贤老。鹏城群众和周边葵涌、南澳、龙岗、深圳甚至东莞、惠州淡水和香港同胞，纷纷前来上香，他们各自带有水果、鲜花、茶果和糕点前来拜祭，酬神。晚上开锣演大戏，专门请广州八和粤剧团演出《八仙贺寿》；在第七天醮事结束时再演一出粤剧“天姑大送子”。

第二、三、四天，早朝幡，礼忏，诵经，拜祭，吃斋菜，拜斗，祭幽（即超渡各类孤魂野鬼），晚朝幡。当地风俗，一家大小来拜祭的，如果小孩身体有问题，就“买契”，“契”神保佑，孩子就没事了。醮事进行到第三天举行“抢包山”，也就是用面粉做成几千个馒头，每个馒头点上红点，依次排列挂在底座2米、高6米的圆锥型竹制竖塔上，形似“包山”。然后由村里挑出几位青年，比赛爬“包山”，谁摘的“包”多，谁就平安多福。上一届在2001年有“抢包山”，因为只有道家才做，这一届请了佛僧，因此没有抢包山这一项。

巡游和放灯

第五天，阿公巡游一天，也叫“行香”。僧人引路诵经，乡村中寿星公、长者贤老带头簇拥天后妈祖等神像，童男童女两人擎着“掌扇”，村人扮作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铁拐李、蓝采和、汉钟离、韩湘子、曹国舅等八大仙人，后随狮子、麒麟，在大鹏城内外5条自然村巡游。从醮坛场地出发，经古城东门，沿城池及附近的校场尾、乌冲、松山等村子，队伍凡经村户人家，家家明烛，户户高香，万头炮仗一排排相接在门前路上，足有上千米。这“超长炮仗”一点燃，炮仗声和锣鼓声震天响，巡游队伍浩浩荡荡，甚为壮观。为及时通知下个村子，旧时巡游时有位穿着古装、佩带长剑、骑着白马提前飞报的人，这个人称之为“报主”，解放后这几届就免了。

第六天，送坛神。僧人诵经，在香烛中将各路神灵护送回寺庙，把包括山大佬等各种纸扎模型请到海边焚烧升天。遣船，又称起船，即是将瘟神请上彩船，举行过法事后将之遣送大海。放灯，村人每人一个红色纸折的小莲灯，点上小蜡烛，成百成千的小莲灯在海上慢慢漂去，同时将斑鸠、麻雀各19只小鸟放飞天空，将99条活海鱼放归大海，把祝福和愿望带给每个亲人。

第七天，醮会结束，开斋吃荤，晚上文艺表演。这一天，杀猪宰羊，宰鸡鸭，磨豆腐，摆上近280多席“将军宴”，全城老百姓都来吃，外地来人亦见者有份吃，几百席近3000人吃，煮都来不及供应，好不热闹。“将军宴”是大鹏所城特有的大型传统宴会，原来是将军打胜仗归来，与民同乐，八大菜八小菜，

全城欢庆的习俗，后来沿袭做完清醮，开斋摆上“千人将军宴”。“将军宴”场地上空飞挂几条大红横幅，“三代五将护国定疆清史留正气；六韬三略擅用筹边御旨赞英豪。”（清皇帝曾颁旨御封刘起龙、赖恩爵等一品将军为“振威将军”），“良辰美景全城都热闹流光溢彩；盛世佳节社区共欢腾歌声舞影。”鲜丽的横幅，给大鹏古城的新春醮事“点睛”，赋予新的时代含义。

大鹏清醮的文化特征和濒危状况

广东、福建和香港地区都有太平清醮习俗，但深圳市大鹏清醮比较其他地方，我认为有其明显的特点。

1．封闭的军事城堡形成独特的文化特征：大鹏所城由于世袭军士制达600年，在一个小城出了10多个将军，如父子将军：刘仕开清朝武显将军和刘起龙福建水师提督将军，获面见道光皇帝恩宠。赖氏“三代五将军”：赖世超被晋封武功将军，长子赖英扬被晋封振威将（正一品）、三子赖信扬晋封安鹭将军（从一品），长孙赖恩爵晋封振威将军（从一品）、四孙赖恩赐晋封武功将军。还有数位李姓、杨姓将军。当地有“宋代有杨家将，清代有赖家帮”的美誉。鹏城子民从小习武、读书勤奋、家教严谨、做人谦虚；赖氏族人祭祖隆重，不忘祖典；将领打仗归来，设“将军宴”与民同乐等。



祭海放灯

2．军士世居的军事要塞形成独特的风俗特征：大鹏所城地处南海前沿，明清时期屡与倭寇和侵略者交战，1839年9月4日中英“九龙海战”，就是大鹏城人赖恩爵指挥大鹏营水师打赢了中国近代史反侵略的鸦片战争第一仗。几百年来，在历次海战中阵亡军士和台风等灾难罹难百姓，大鹏所城形成群众性的大鹏清醮、祭海的海神节、天后庙会等民间风俗。

3．南北杂居的军事城堡形成独特的信仰特征：大鹏所城的军士来自全国各地，语言、风俗、习惯各地方都有，宗族信仰也百花齐放，佛家、道家、儒家有人崇拜，天后妈祖、城隍、关帝有人信仰。小小的鹏城却有9座庙宇：天后宫（海神）、东山寺（佛家）、武庙（关帝）、文庙（孔子）、侯王庙（张良军师）、华光庙（求子）、城隍庙、洪圣仙君庙（水神）和“路步三郎”露天神坛（纪念宋末一名叫路步三郎军官为当地百姓与元军

决战至死之“忠义”。）鹏城人除在各个时节各处拜祭各路神明外，还每5年一次，拣在春节后的时间恭请各路神仙集中一起做太平清醮，让百姓膜拜，辞谢神灵，祈祷心愿，祭典祖先，抚慰野鬼孤魂。

2006年12月，“大鹏清醮”入选深圳市政府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7年6月成为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作。我想“大鹏清醮”入选原因很多，其中应不容忽视的是：

1．历史价值。太平清醮有五六百年历史，尽管朝代不断变更，社会制度屡屡更换，但大鹏所城人通过清醮盛大仪式，传承道家“和”（和谐）、佛家“善”（施予）、儒家“忠和孝”、天后“同舟共济、救死扶伤”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对研究大鹏所城成为著名的“将军城”及古代守城军人“精神支柱”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2．文化价值。太平清醮从制作“山大佬”、纸扎马、龙、鹤、凤等祭品，到整个拜祭、巡游、放生和吃斋过程，是典型的民间民俗活动，各项祭祀物品的寓意和文化形态丰富多彩，对研究地方风俗文化有一定的价值。

3．社会价值。大鹏清醮参加者众多，社会基础深厚；大鹏清醮展示群众各种信仰，排解百姓困惑，舒缓群众心理压力，使大鹏所城几百年来社会稳定，人际和谐，从未发生姓氏宗族冲突和封建械斗，可以说是最早的“和谐之城”。今天我们继续发扬优秀民族传统，特别是祭奠爱国将士亡魂，激发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热情，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社会，具有广泛积极的作用和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濒危状况：首先，大鹏清醮纯属民间活动，经费全靠群众自愿捐款，资金匮乏，使民间醮会活动内容和举办天数逐届减少，今后醮会亦难以为继。其次，大鹏清醮近20年举办五届，只有口头传授示范，没有文献记载。醮委会7名热心长者，比如1929年出生的黄福娣，参加过1944年那一届，当时她15岁；1933年出生的赖鹏发，在1944年那一届当童男，擎过“掌扇”巡游。这些老人均70岁以上，村里青年没有传承下来，濒临后继无人。再次，大鹏所城原居民，陆续搬至鹏城外的大鹏街道中心王母墟镇居住，鹏城内外来人员租住逐渐增多，城内原有许多原汁原味民俗文化慢慢消失，环境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直接冲击大鹏清醮传承和发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醮者，祭也，古代婚娶时用酒祭神的礼；也是一种日常祈祷的祭礼，如道家所谓："僧道设坛祈祷曰醮"。香港流行的太平清醮大致有两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为解除瘟疫的"瘟醮"：如超渡水灾、火灾或人为措施所引致亡魂的"水醮"、"火醮"或驱除瘟疫的"傩"。第二个模式是为感恩出发的，例如源自目莲救母的"中元醮"；有为答谢为黎民请命的父母官的"报恩醮"；有专为神明贺寿的"神诞醮"，以及为酬谢神明庇佑的"清醮"，又称"祈安醮"或"太平清醮"。香港最有名气的清醮要数长洲岛的"包山节"。

香港清醮文化

香港的民间民俗文化很丰富，也保留得原汁原味，特别是清醮文化习俗，在新界和离岛不少村落举办规模之大，活动之隆重，令人大开眼界。这几年有幸见识几处，最有名气的要数长洲岛的"包山节"。

"包山节"俗称"抢包山"，是香港（含深圳东部沿海）渔民们独有的"太平清醮"，是道教的一种祭祀活动。每年农历四月，长洲岛北帝庙内举行为期8天的醮祭，用以酬谢神恩，祈求洁净、赦罪和再生。著名的长洲"包山节"，是整个太平清醮仪式中一个最瞩目的项目。3座各16米高的"包山"，由竹子搭成的圆锥形支架，每个支架密密麻麻挂满由面粉蒸熟的包子，三座"包山"要用数吨面粉、数十万个包子垒叠而成。"抢包山"，由当地选拔出10多个年轻力壮、身手敏捷的后生仔，每人随身系一个布口袋，系好安全带后，听到口令后，在几千人的呐喊、锣鼓声中和几对舞狮助威下，奋登3座"包山"，看哪位青年抢的包子多。据当地风俗，这些点了红点的包子吃了可以纳福，所以谁最快登上包山，谁抢的包子多，自然就福多喜多。

太平清醮的民俗文化，除在长洲外，还在香港吉澳、沙田、元朗、大

埔、锦田、石澳、黄大仙、衙前围、上水等岛屿和乡村盛行。

太平清醮

醮，祭也，古代婚娶时用酒祭神的礼；也是一种日常祈祷的祭礼，如道家所谓："僧道设坛祈祷曰醮。"自南北朝开始，历代朝廷多有建醮的祭仪，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随时日变迁，逐渐普及民间成为各地的一种风俗。有民俗学家说，南方人打醮又叫做"打朝花"，"朝"的客家话音是"醮"，时间久了"打朝花"变成"打醮"。在农耕时代，乡人有春秋两祭，年初开春，祈求年景顺当，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叫春祭；秋收时就答谢神恩，村民共乐是为秋祭，时间为农历九月九，大多族人上山扫墓，祭典先人，祭毕后就地烹煮吃盆菜，俗称"食山头"，吃后，分"太公猪肉"带回家。

香港流行的太平清醮大致有两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为解除瘟疫的"瘟醮"：有为超渡水灾、火灾或人为措施所引致亡魂的"水醮"、"火醮"或驱除瘟疫的"傩"。第二个模式是为感恩出发的，例如源自目莲救母的"中元醮"；有为答谢能为黎民请命的父母官的"报恩醮"或"感恩建醮"；有专为神明贺寿的"神诞醮"，以及为酬谢神明庇佑的"清醮"，又称"祈安醮"或"太平清

香港上水太平清醮会场
乡绅候迎嘉宾



醮”。综述而言，太平清醮是具有酬神还愿、敬祖感恩、驱邪去瘟、消灾求吉、保佑合境安宁为目的之综合性祭祀仪式。

香港上水乡太平清醮60年一次

太平清醮仪式通常定期举行，但没有统一的时限，有每年1次、3年一次、5年一次、8年一次、10年一次、30年一次，甚至60年一次，其中以一年一次和10年一次最普遍。据新界北区上水乡《廖家族谱》记载：“……以历年正月与月友公子孙同为乡傩……”乡傩，也就是上水乡人举行驱除疫疠的迎神胜会，说明上水乡在建立围村之前，已有相类醮会举行，其后渐转用太平清醮之名，且日期由正月改为二月。

新界北区上水乡的太平清醮何以会60年才举行一次？以前由于兵荒马乱，没有留下文献记载，也许有资料都已遗失。据乡中父老所述，相传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该乡的太平清醮原来也是10年一次的，但因每次醮会之后，村内有些长者因病或意外去世，于是在当年那次打醮完后问卜天后娘娘，以掷胜杯形式求问应当每隔多少年举行一次太平清醮，从3年、5年、10年、12年、20年等依次问卜，胜杯都显示不适宜。当时问卜者有些不耐烦，对胜杯顺口说出：“难道要60年一次？”结果这一问却得出胜杯“肯定”，于是便顺应天意，将醮期定为60年一次。

廖氏建上水乡围村600余年

2006年3月恰逢60年一届的上水“太平清醮”活动。60年一届的盛事由新界5大家族之一的廖氏宗族主办，廖氏在香港新界上水定居超过600年。据1990年10月9日上水乡廖族数十人代表前往福建寻根，在厦门大学专家教授和永定县文史等有关部门帮助下，找到永定县花公、昌公、敏公及三十一郎先祖墓地，查阅上杭、永定两地《廖氏族谱》，了解到夏时中原河南唐河县湖阳镇古廖国，国王廖叔安，是一位好国君，又是一位精明的工程师，在大禹时期治理洪水有功，其后代以国为氏，称廖氏。叔安公第88世名花公，宋初从河南迁徙到福建永定，上水廖氏是花公第三孙敏公的第十代廖仲杰又辗转南迁。元朝迁至广东兴宁，元正十年（1350年）由兴宁迁至新安（深圳市古称），初住屯门，再住福田，后在罗湖山双鱼境内，发觉四面环山，有河流可灌溉，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于是定居下来。然后娶附近侯姓女子为妻，生下一子自玉（二世祖）。自玉生有如圭、如璋、如壁、如兴四子，如圭、如璋、如壁留居上水，遂分为三大房。如兴则迁居东莞县樟木头。留居上水的三房兄弟子孙繁衍，逐渐分门立户发展成门口村、莆上村、大元村、中心村、上北村、下北村及兴仁村等8个村子，

因均位于深圳梧桐山下的梧桐河上，故名上水乡。嘉庆年编纂《新安县志》记载，深圳墟、上水石湖墟、大埔墟、元朗墟等四个墟集市，已建有一定商铺规模，形成深圳和新界居民交易产品和交流联络的生活圈。600 多年来，上水乡廖族人口增至 21 世纪的 4000 多人。

上水太平清醮盛况空前

上水太平清醮筹委会主席廖汉强介绍说，本届太平清醮是历史上最好的年景，香港回归祖国，经济繁荣，交通发达，人民安居乐业，感恩敬祖，应为最隆重的一届。60 年前的 1946 年二月初八，刚好日本人投降、香港重光不久，上水乡民生活十分艰难，廖氏家族男丁只得 700 余人，为庆祝新界光复，祈求祥和安宁，原主持乡政的贤老仍坚持前人所定下的传统，成功做了一次太平清醮。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场雨灾，村内严重水浸，保存多年关于上届太平清醮的资料尽数毁烂，而且上届筹组委员“全部唔喺度”(意思是不在世)，给此次筹备工作带来困难。

为使太平清醮成功举办，两年前上水乡长就组织成立筹委会，一方面收集村公所和散落在民间的零星资料，找来 18 位年事已高的父老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他们将 60 年前的往事口述记录；另一方面，筹委会请教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专家，并派员四出参观新界其他围村的所有打醮活动。他们聘请摄制队，从筹备开会至打醮仪式的细节都统统拍摄下来，剪辑制成数码光碟，保存资料留给子孙参考。

2006 年 3 月 7 日农历为丙戌年二月初八，是佛祖释加牟尼诞日、张大帝诞、昌福真君圣诞。从这一天开始，上水乡太平清醮，一连 7 天举行舞龙舞狮及道家酬神法事，迎神登坛。在打醮场地上，最瞩目的就是昂藏五米、面目狰狞的彩色纸扎“大士王”像。它身穿中国古代武将服饰，横张双脚，一手持笔高举，另一手拿著簿子或吉祥语句。其腹部明显隆起，腰带下方有虎型装饰，凸显其威严和勇猛。最特别的是“大士王”的胸前有一个细小的观音像，两者的大小形成强烈对比。“大士王”又称鬼王，在盂兰节的祭祀活动中亦可见到其出现。道教认为，它的作用是镇压来自四面八方的游魂野鬼，以防伤害本地居民。清醮 8 天期间，醮场上近万人参加启坛建醮、打武禁坛、迎圣、分灯、晋烛、祭小幽、祭大幽、放生、酬神等，村民们集会巡游到石湖墟，酬谢有恩于新界原居民的清朝两广总督周有德及两广巡抚王来任(清康熙元年为防止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包括上水乡在内的福建、广东沿海距海 50 里居民一律迁界达 7 年之久，村民流离失所，不胜其悲。幸蒙周总督、王巡抚体察民苦，上奏皇帝恩准回迁复村，为纪念周王二公乡民便在石湖墟建有报德祠)，数千人吃斋盆菜宴，观看香港鸣芝声粤剧



舞狮子



舞麒麟



山大人

团名伶盖鸣晖担纲连演5天日夜共9场的粤剧，参观上水乡及石湖墟新旧风貌照片展览等。

丙戌年（2006年）农历二月初八早上9时，由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军文率领深圳30多人及梅州、陆丰、惠州、博罗、河南唐河、福建龙岩等地的廖氏宗亲，准时通过罗湖海关来到新界上水乡太平清醮会场。能容纳上万人的会场，四周插满彩旗；临时搭起用作开幕典礼、拜祭等几个大棚及牌楼鲜艳夺目；牌楼对联："联四斗以答神恩六十载胜会重开欣此际年逢丙戌，合三房而酹帝德八千春韶光如昨乐尔时节届中和"，意语含蓄。会场三面有十多个数米高二十多米长的花牌，隆重排列，很有气势。

牌楼门外和会场里两条长长的红地毡铺得非常醒目，鲜花簇拥的地毡两侧已坐着由乡村推选出来的80位贤达长老，统一穿戴新制丝绸长衫礼帽，恭迎嘉宾。

9时半，几个狮子、麒麟、金龙分别在锣鼓声中舞进会场，6000村民和嘉宾陆续进场。村民各自从家中带来烧乳猪、三牲、自制茶果、糕点、酒水、糖果、香烛，依次排队上前焚香拜祭。

10时许，上水乡民和嘉宾进入主会场参加太平清醮开幕典礼。会议主持人先介绍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GBS太平绅士、新界乡议局主席刘皇发GBM太平绅士、廖本怀GBE太平绅士、北区区议会主席李国凤、北区地政专员袁耀邦、北区政务专员黄汉豪太平绅士，香港警务处张肇华助理处长、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军文等嘉宾，及请他们和族长、筹备委员会主要成员上台就座，台下响起热烈掌声，放起彩色纸炮，引来众多传媒争相拍摄。

启坛大典首先由大会主席廖汉强致辞，接着香港政府高官孙明扬和乡绅名流刘皇发致辞，随后由族长向主理嘉宾颁发水晶纪念牌，及启坛剪彩，鸣放礼炮。

11时多，族长和嘉宾到场外大坪为狮子、麒麟、金龙"点睛"，顿时，鞭炮燃放，鼓乐齐鸣，龙飞、狮舞、麒麟跃，面积有几个足球场大的会场掌声、喝彩声不断，特别是几对雄狮在梅花桩上翻飞表演，更引起人们热烈欢迎，会场处处人声鼎沸，喜气洋洋。11时半，乡人分批进入千人宴席，品尝斋盆菜。然后在午后、晚上欣赏粤剧《贺寿仙姬大送子》《牡丹亭惊梦》《凤阁恩仇未了情》等名戏。

香港太平清醮文化，不仅蕴涵着中国传统的信仰文化，还充满着生动的民间民俗文化。虽然英国殖民统治百多年，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企图吞并和同化当地文化，但它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完整地传承下去，始终和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持一脉，这也许是我们常说的香港的根，香港人民的魂。

《宝安县志》云："仙姑化石，位于石岩镇内的羊台山的山腰上。此石形似仙姑，朱红色。清嘉庆《新安县志》载：'仙姑化石，在阳台山（即羊台山），石面四时红艳，人呼则应，又名应人石'。今应人石地名尚存，而石不存。"当地流传许多"乌石岩"的民间传说和劝喻与人为善的熊家嫲故事……

乌石岩与熊家嫲

深圳中心区福田往西北六十来里的地方，有座峻拔美丽的羊台山。此山，古称阳台山，也称作羊蹄山。山的西北麓有个小镇，叫石岩镇。

《宝安县志》记载："石岩镇，原名乌石岩，清嘉庆年间建墟。墟内旧有石洞，洞内有观音塑像，中央有大石座，供奉者燃鞭炮掷其上，呈褐色，谓观音显灵，因名'乌石岩庙'。后人修筑为'慈石古寺'，古寺牌楼书'乌石岩'，旧墟因而得名。"

乌石岩有"三多"：石多、山多、山歌多。石岩镇除了浪心一个小村讲"本地话"（粤语）外，其他各村全讲客家话，着客家衫、佩客家"围身"、戴客家凉帽、腌客家咸菜、泡客家咸茶、炆客家狗肉、唱客家山歌……山歌唱到省城，上了电视、报纸、广播，被批准列入为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保护项目。

山多。村村开门见山，我小时候看羊台山，好高，好大。长大后看，也不算小，它在深圳中西部是排老大，高587.3米；可在全市一比却矮了一小截，屈居第三，仅次于梧桐山、七娘山后。但是，这排行"老三"，

丝毫不影响它的雄伟、峻拔、壮丽和神秘。羊台山山峦奇峰、沟谷幽壑、石景洞穴、溪流飞瀑、深潭泉涧，随处可见。森林景观、古木名树、奇花异草、珍禽异兽、遍布山野。深山里长着百年“雪中热带风情”的刺葵，发现不少“植物化石”桫椤，以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动物：如土沉香、白桂木和虎纹蛙、北草蜥、穿山甲、狗獾、野猪和猕猴等。乌石岩还是个水果之乡，盛产李子、酸梅、桃子、荔枝、芒果、杨桃、柿子、沙梨、乌榄等几十种，小有名气的是李子、沙梨和柿子，远销港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乡野顽童，在放暑假时相约进山。过石岩河上石板独桥，走浪心村田段，从山脚下的龙眼山村往上登山。可见百年古藤、龙溪石刻、佛珠石瀑布、石壁滩。穿过阴凉峡谷、嶙峋石涧，在三叠潭中的头潭、二潭、三潭跳水、游泳。山里人都知道“头潭长，二潭深，三潭峭石峻”，往水“扎猛子”二潭是首选，我们常常比谁有胆量谁能在最高最险处往潭水里扎。然后从果林中偷摘沙梨、熟柿子，抛进二潭，泡浸一会后，看谁能潜入水底摸上沙梨、柿子，谁摸到归谁，谁摸得最多奖励谁。尽管大暑天，但在树阴潭边，凉风习习，暑热顿消，捞上来的沙梨、柿子，像冰镇过的一样，清凉可口。这一凉爽可上瘾了，暑期里天天登山、游泳、吃梨、吃柿、吃菠萝，成为我们童年暑假必备的节目。



乌石岩庙牌楼

山多，自然野生动物多，山猪、野狼、箭猪、毒蛇袭人时有发生。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离石岩圩镇边上两里路远的罗租村，有位妇女带着十三四岁的孩子上山砍柴，下山时小孩子发现有棵稔树结出的山稔，又熟又大颗，特诱人。累渴了一天的孩子忍不住上前采摘，不料树底下蜷伏着一条小水桶般粗的大蟒蛇，小孩当即吓得昏死过去。母亲挑了担木柴下到山脚，许久不见孩子下山来，放心不下，拿把柴刀原路折回接应。到了山稔树底下，发现孩子被大蟒蛇紧紧缠着，她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马上跑回村里报告。村干部立刻带领几十个青年上山，发现孩子已断气，蟒蛇也精疲力竭准备吞食小孩。青年们趁蟒蛇不注意，巧计用锄头、木棍把蛇打死，抬回村里，用长梯子把蛇头挂在篮球场的球架上宰杀。几个小伙子抓住蛇尾巴拉直，然后有位勇敢的壮汉登梯从篮球

架上的蛇头往下剥蛇皮。谁知这这条大蟒蛇死而不僵，皮被剥落一半时，蛇身一弓一缩，把抓住蛇尾巴的几个小伙子一把甩在地上，打了几个滚翻。这几个小伙子后来被同伴们取笑没胆捉活蛇，却被死蛇打翻，“没鸟用”。蛇被打死了，仇报了，但羊台山另一面的南山坡麻坳村，经常从深山传来一声声沉闷的怪声。据村里老人说，山北边的石岩镇打死的是条母蟒蛇，山南面的公蟒蛇到处寻找呢。夜深人静，沉闷凄凉的蟒蛇叫声，让村人毛骨悚然。

乌石岩石多。《宝安县志》说：“仙姑化石，位于石岩镇内的羊台山的山腰上。此石形似仙姑，朱红色。清嘉庆《新安县志》载：‘仙姑化石，在阳台山（即羊台山），石面四时红艳，人呼则应，又名应人石’。今应人石地名尚存，而石不存。”

除了“应人石”外，还有仙人脚印、七娘峒、摩崖古刻，《深圳特区报》曾报道过深山里的崖石上“天书”，没有人看得懂的像文字图案一样的符号。有历史意义的石莫过于“吴化明石洞”，该石洞又称石笼鸡岩洞，《宝安县志》：“石笼鸡岩洞，位于石岩羊台山西北侧的一个山谷中，离龙眼山村仅二里地。岩洞由两块巨石碰头并成，周围还堆积许多大石块。洞深10米，宽6米，断面呈三角形，内还分有不同层次的小洞。四面山势险峻，荆棘密布，只有一小道可出入。抗日战争时期，曾有一位因在广西做官失意甚至有才学的吴化明隐居于此，掩护过东江纵队伤员。”



东江纵队在羊台山粉碎敌人围剿

石笼鸡岩洞掩护过东江纵队伤员，石岩“慈石古寺”里还有位和尚是我党地下情报交通员，为革命作过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羊台山是我东江革命根据地，从1940年3月至1942年2月多次粉碎日伪的扫荡和围剿。今从《宝安县志》摘录一节《粉碎日军对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记载：“1941年7月7日，日军纠集400余人，分两路向羊台山革命根据地扫荡。一路从连坳、梅林坳进犯白石龙、望天湖；另一路从乌石岩入侵龙华。第五大队（按1940年9月，根据广东省委的决定，曾生、王作尧两部合并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集中兵力打击入侵龙华一路之敌。战斗一天，敌军败退回南头。入侵望天湖之敌，遭抗日自卫队抗击，恼羞成怒纵火焚烧民房后退出。8月15日晨，日军300人从南头向乌石岩北进。到罗租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径

背、玉律、长圳进犯，一路向乌石岩进犯。第五大队和抗日自卫队分两路抗击来犯之敌。进犯乌石岩之敌指挥官中弹毙命。在径背，双方激战一天，日军伤亡20余人，窜回南头。

“8月16日，驻深圳、布吉之日军400余人，其中骑兵50余，疯狂地向龙华抗日游击区进犯。一路由岗头、大头岭开来，一路由乌石岩、黄猄坑进攻。第五大队一个中队于牛地埔附近与敌激战后，转至弓村、青湖、岗头山地再与敌周旋，另一个中队赶至加入战斗。双方激战至黄昏，日军被包围于牛地埔山上，当晚抗日部队不断地组织小分队袭击被围之敌。次日拂晓，敌人强行突围。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30余人，毙敌战马2匹。

“18日，日军再次出动400余人，骑兵50余，分三路向龙华进犯：一路100余人由分水坳向马鞍塘、坂田等地进犯；一路向岗头进犯。第五大队与抗日自卫队和民兵配合下，分兵狙击敌人。激战一天，敌伤亡20余人，窜回深圳、南头。”



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秘密护送文化人离开港九沦陷区（选自《深圳全记录》）

这只是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场战斗，至解放战争，乌石岩羊台山留下了许多英雄故事，最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就数秘密营救我国文化名人的战斗。1941年12月8日，日军第二十三军三十六师团15000多人从广州出兵攻陷香港。其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在乌石岩、龙华、布吉公路沿线狙击向香港开进的日军后续部队，击毙击伤日军30余人，缴获战马4匹及军用物资一批。

1942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指挥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冲破日军严密封锁，历时200多天，从香港沦陷区秘密解救受困的何香凝、郭沫若、邹韬奋、戈宝权、茅盾、胡绳、柳亚子、成仿吾、萨空了、乔冠华、夏衍、于伶、丁聪等近600位著名民主人士、文化精英、100多位外国友人和1000多名爱国青年学生，历尽艰险，越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分东线水路经九龙西贡的牛池湾到深圳沙鱼涌，西线陆路从新界荃湾、元朗等地经深圳皇岗、梅林坳到达羊台山地区隐蔽，然后再成功安全转送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后来，茅盾在他的《脱险杂记》一书中叙述着这段难忘的经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走过一条很长的小

路，两旁都是茂密的树木。这像是一条甬道，同行的人说到了，到了……我们十来人被欢迎到一所小楼房去。这是上下两层，靠着山坡，四面空旷，洋式建筑，现在却成为游击队司令官曾生将军的临时总部。当然，我忘不了曾生端来的‘宝安香肉’。我们这些人从未吃过狗肉，但是这一餐晚饭，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味更好，永远忘不了。”

劝喻与人为善的熊家嫲故事

羊台山故事多，传说也多。很久以前，这山崇林密，古樟虬曲，怪石屹立，尤以一处天然乌石洞为最。然而美中不足，此乌石洞三面环绕，独缺顶盖一面，乡民皆期望将此石补上。于是人们日日祈祷，天天烧香，忽一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乌石岩轰然撼动，声震四野。次日云开日出，乡民见石洞居然有了巨大块石盖着，像三只鸡蛋上面再顶着一个鸡蛋，惊险之至，造型之妙，堪称一绝。“乌石岩镇”由此诞生，解放后逐渐省去“乌”字，石岩乡、石岩公社、石岩镇、石岩街道办事处便正名至今。清嘉庆《新安县志》对这个传说有文字为证：“乌石岩，在阳台山下，内有石岩三面，东缺一面，顶有大石堪作墙。乡民祝曰惟愿此石可补四面周围无缺矣，是夜神即移石补足，石痕犹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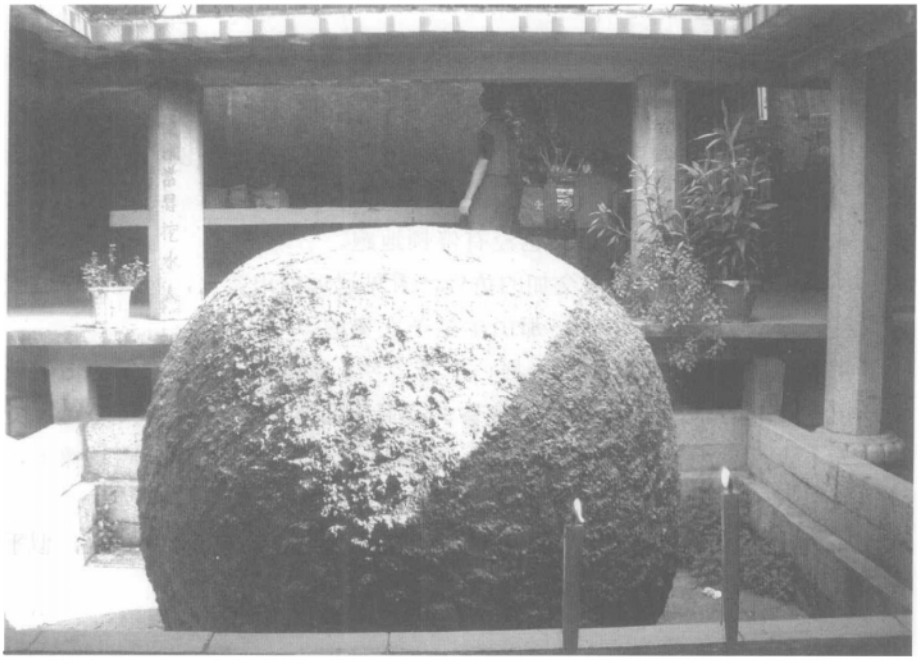
乌石岩一带，民间还流传一个熊家嫲与羊蹄山的故事。那时的羊台山也曾叫羊蹄山。

“熊家嫲”在宝安县，是对那些心肠狠毒、相貌丑怪的妇人的贬称。大凡小孩子不听话，大人往往吓唬说：“你看着，熊家嫲来了！看你往哪里躲。”

说熊家嫲怎么会扯上羊蹄山呢？原来，古时北方某省府有位清官，不与人同流合污，累遭奸人所害，幸得好人向他透露风声，星夜收拾细软，携家南逃。他日藏夜匿，历经无数昼夜，来到南方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乌石岩峒，隐姓埋名，垦荒种地，定居下来。日后，人们称这个村子为官田村。

官人刚稳住脚跟，不料，他的妻子因连遭打击，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不久便辞世。遗下小女一名，与父亲相依为命。小女因羊年出生，取名羊女。父女日子过得一下子像从天上掉到地下，从达官贵人到黎民百姓，艰辛程度，难以形容。后来，村中有一单身熊姓农妇，经村里媒婆多次上门代说撮合，嫁给了官人。

熊妇成为官人继室后，见官人念念不忘前妻，平日又将全部感情倾注在女儿羊女身上，自己反受冷遇，她暗生妒火，久而久之，滋生恶念，常常背着官人谩骂和虐待羊女。年仅十五岁的羊女，秉性善良，怕气坏父亲身子，从不敢把继母的恶劣行径禀告，便背后流泪，把身上伤痕偷偷掩藏。



传说会越长越大的乌石岩庙里的鸡心石

熊妇见状，得寸进尺，背着官人，常常为难她，瞪眼叫羊女砍柴、浇菜、牧鹅，还要她看好屋后果园儿棵结满果子的李树。她果真温顺地小心看护着。一日，突然狂风暴雨，把李树的果子全部打落在地，羊女急得抱树大哭。

羊女大哭，惊醒了栓在不远的牛牯，牛牯与羊女很有感情。平时，都是羊女喂草，早晨牵去放牧，黄昏饮水河边，夜间添草续料，日积月累，牛牯老爱与羊女戏嬉，舔手蹭脚，亲昵撒欢。如今见羊女伤心，竟也“咩咩”叫着淌泪。

那天，官人染病卧床不起。熊妇决意除掉羊女。把晒干的牛蜞（即蚂蟥），剁成一节节，掺在番薯饭里，用芭蕉叶包裹，交给羊女，叫她到泥岗山后放牛。当着官人的面，假仁假义说道：“你放牛渴了，龙眼山有口山泉水；饿了，有这番薯饭团充饥。你千万不能贪玩把牛丢了，这牛是你爹的心头肉……”

羊女细声应许，牵牛出村。趟河水，过岭岗，不觉走了三足里，日头半天高了，牛牯沿着山径悠悠吃草。羊女也感到肚子饿了，便找个树阴底下，坐了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后娘给的芭蕉饭团。吃饱了，喝足了山泉水，没隔多久，突然，羊女捂住肚子，痛得在树底下翻滚。

瞬间，一条条又粗又壮的牛蜞，从羊女的鼻孔、耳窿和嘴巴里爬了出来。羊女痛苦地双手乱抓乱扯，扯不尽，拉不完，随着一声凄厉的叫声，

羊女顿时昏死过去。

羊女一声惨叫，惊动了远处吃草的牛牯。牛牯奔了过来，像懂性一样，用长长的舌头舔着羊女嘴、鼻、耳朵里窜出来的牛蜞。

牛牯见除不尽牛蜞，羊女的肚子也被牛蜞撑得圆圆的，便慌忙用双角撬起羊女，横搁牛背上，驮着她一路猛跑，试图救醒羊女。但是，毫无效果。羊女永远不会醒来，牛牯也没有停顿地跑。

偶然，人们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黄昏，看见远远的山峦上，一头牛牯追着一只飞跑着的山羊，人们说，那山羊是羊女变的。

羊女走过的山，酷似羊蹄一样，于是，乡人就把那座清秀苍翠的山叫做羊蹄山。也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黄昏，心肠狠毒的熊妇，被上天惩罚，变成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熊家嫲”，接着被一场龙卷风卷起，高高摔下，碎尸几段，霎时变成几块紫黑色的大石块，显耻人间。

至此，乌石岩峒那几块大石，仍散落在石岩街道圩镇老街的小山上，似乎在印证一句民间老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宝安县志》记载："火龙（又叫草龙）只流行于南澳镇的渔民区。每年正月初二晚进行表演。"南澳草龙舞最大的特点——从制作草龙至结束焚化，只一天时间，也就是当天割草，当天扎龙，当天舞龙，当天送龙（又叫化龙，即是将龙焚烧送进大海，拜祭升天），俗称舞"一天龙"。

南澳草龙舞

深圳市南澳草龙舞，是我见过诸种舞龙中颇有南方沿海特色的一种民间舞蹈。我听说过西南有竹龙舞、广西宾阳炮龙舞，见识过江南的绸龙舞，目睹过香港的金龙舞，近距离欣赏广东新会纱龙舞和湛江东海岛上的人龙舞表演。这些龙舞的"龙"都是需要较长时间制作，并且可以反复使用；而南澳草龙舞最大的特点——从制作草龙至结束焚化，只一天时间，也就是当天割草，当天扎龙，当天舞龙，当天送龙（又叫化龙，即是将龙焚烧送进大海，拜祭升天），俗称"一天龙"。

龙舞的历史

《辞海》里对舞龙有这样的阐述："龙，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龙舞，也叫'龙灯'，汉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流行于中国很多地区。在传统习惯中，人们把龙当做吉祥的化身。每逢喜庆节日，各地都有'玩龙灯'的习俗。'龙'的形象各有特色，一般用竹、木、纸、布等扎成，节数不等，但为单数。每节内能燃烛的称'龙灯'，不燃烛的，称'布龙'。

舞时，由一人持彩珠戏舞作舞。此外，还有用荷花、蝴蝶组成的‘百叶龙’，用长板凳扎成的‘板凳龙’等多种形式的龙舞。”

龙舞，流传历史悠久，上古黄帝时代一种叫《清角》的大型歌舞中，就有由人扮演的“龙头鸟身”形象。汉代的《春秋繁露》等史籍就有舞龙的记载，到唐宋时期则更为盛行，唐代文学家张说有“龙街火树千灯艳”诗句，南宋词人辛弃疾有“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名句，都是描写节日龙灯的盛况的。宋代吴自牧著的《梦粱录》记载龙舞更为细致：“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

到清代，制作龙灯的技艺更加成熟，舞龙的场面也更加盛大。据清代《沪城岁事》记载，舞龙灯“环竹箔作龙状，蒙以洛，绘龙鳞于上，有首有尾，下承以木柄旋舞，街巷前导为灯牌，必书‘五谷丰登，宫清民乐’”。舞龙发展到今天，据说中国龙舞有110种，常见有地方特色的也有几十种，如纸龙、布龙、竹龙、草龙、绸龙、木凳龙、人龙、火龙、滚地金龙、舞醉龙和铁水花龙。人们用舞龙的方式来祈求人畜四季平安和风调雨顺丰收年景，是我国人民群众创造的聪明智慧的文化习俗。

南澳“蜑民”舞草龙的来由

丁亥年大年初二，我和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几位同事，驱车60多公里来到南海之滨的大鹏半岛南澳镇，观看南澳渔民扎草龙、舞草龙和送(化)草龙的整个表演过程，数千群众围观，一条长街，龙舞之处，鞭炮礼花冲天，春节气氛十分热闹，场面非常壮观。

南澳舞草龙，始于何时？陆地上无半寸土地的渔民，不舞海鱼，不舞豚鲨，唯独舞草龙，何因？我走进南澳舞草龙的老艺人李容根和何连胜等老人中间探访后，略解疑团。

南澳镇，至少有二百多年历史。《宝安县志》记载：“清嘉庆年间有南澳村。因西部海澳（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曰澳）海水蓝绿，初称‘蓝澳’，后以地理位置易名。今镇府驻地旧无圩。从大鹏析置后，沿称‘南澳’。”

南澳渔民，旧称“蜑民”，土称“蜑家佬”。清康熙年间重修的《新安县志》载：“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蜑户，即猺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粤民视蜑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促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

古时南澳渔民，受世人歧视外，还要受海啸、台风的威胁。“渔民对海具有一种既亲切又惧怕的心理，故在出海前要到附近的神庙祭祀后，才扬帆出海；每只渔船都安置海神位，若遇风险便点烛、烧香、祈祷。”（《宝安县志》。新安县、宝安县同属深圳市旧称）渔民崇拜海神除妈祖之外，非海龙莫属。

南澳渔民一出港湾，就是一望无际的南海。旧时无雷达、无气象报告等现代设备，海上突然刮起龙飓风，巨浪瞬间把船翻沉，一家大小丧生大海。因此，每逢初一、十五，渔民在船上架起香炉，燃烛烧纸，朝天跪拜，祈求妈祖保佑平安。当地渔民代代相传有个晚上，妈祖显灵托梦给南澳的一位渔民老人，说每年的正月初二晚上，众人合力用舞龙和香火的方式，压制龙飓风，可保出海安全。渔民把梦当真，当年的大年初二就由有威望的人家，组织青壮年渔民上山割野草，扎成草龙，插满高香，晚上数十人在沙滩上舞动草龙，奉上祭品，随着震天的敲锣和鞭炮声，向海祭拜。

由于他们以船为家，岸上没房没地，只能年初二那天就近到山头割草，稍晒半天，黄昏将草扎成龙，晚上插香舞龙。舞完后不可能把草龙搬回船上贮放，就地在海滩上将草龙焚化，意指龙归大海，希望龙王爷保佑来年风平浪静，四季平安，鱼获丰收。

当天割草，当天扎龙，当天舞龙，当天化龙，俗称“一天龙”的祭海习俗就这样形成了。据陈新娇老人（87岁，1992年去世）说过，她10岁时，大约民国初期(1915年)，因官府征税过多，渔民负担过重，迫于生计，做年他们也要出海。这一年的南澳舞草龙祭海推至正月十五才进行，结果就在这一年内，有一户渔民出海打鱼遭受海难。从此，南澳渔民定在大年初二舞草龙祭海，不敢随便变更。

南澳的舞草龙习俗，全靠口耳传授，没有文字资料传承。据原南澳公社渔民大队支部书记李容根（现年74岁）讲述，他8代前由福建沿海飘泊过来，他父亲说过南澳舞草龙有一百年历史。解放前，在他八九岁时看过父亲（李丁，1872年出生，1944年逝世）舞草龙祭海。记得他母亲还说过他的祖父也是舞草龙活动的人。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李容根他亲自在海边沙滩上舞过草龙；六七十年代渔民新村建起来了，渔民上岸，他当上渔业大队书记时还带领草龙队，在渔村每条小巷为家家户户拜年。现在，他三个儿子都是舞草龙的骨干。三代舞龙，四代相传。

舞草龙习俗，曾经在“文革”时期被迫中断10多年。开放改革后又恢复、建立了新的舞龙队伍，特别是2004年春节，祭海场面隆重，草龙舞得非常热闹，不单本渔村渔民参加，镇上的人参加，许多从香港回来的原南澳籍渔民和镇外面的人，也赶来看热闹，观众熙熙攘攘，人数达到上万。

大年初二扎草龙

南澳渔民，历来重视过年舞草龙的习俗。传统的南澳渔民过年风俗很独特。他们认为春节是神圣日，不能喝粥或饭汤，否则出海遇大风雨。吃鱼忌翻身，担心海上翻船。除夕晚祭祖要吃斋，因为此日弥勒佛坐位。这天

最重要的事是祭海神，拜祖先。吃完年夜饭洗“柚子叶水”，“柚”“佑”谐音。零时放鞭炮，叫做“试年更”，一年更新。渔民过年非常敬重渔船，除“令旗”外，全船重要部位都要装饰一番。船头贴福字，船眼贴“龙睛神采”，主桅贴“顺风得利”，船尾贴“海莫扬波”，舵上贴“万军主帅”，船舷两侧货物进出口处插上系着红线的树枝以驱邪。船舱门贴上喜庆春联、挂灯笼、摆年桔，整船装扮一新。

然而，南澳渔民过年最热闹的莫过于舞草龙。大年初二那天，威风锣鼓敲响，鞭炮此起彼伏，船船户户喜气洋洋。港湾里青壮年渔民不再出海，也不探亲访友，全天做好各项准备，专门晚上耍火龙祭海。

年初二打早，渔民们到三四公里远的山坳割来两种野草，一种叫剑草，较长、较硬，便于稳固“龙节”长度；另一种是净草，较柔软，便于插香，也使香火舞动时不容易散落下来。割好了10多担草挑回村东头，在天后宫门前稍作晾晒。下午5时左右，一百多位渔民们穿上绣着龙图案的黄色唐衫裤，腰束红绸，在一阵阵锣鼓声中来到天后宫门前的路上，一字排开。130多人以三五人为一组，纷纷用咸草绳把野草扎成每节长1.2米、直径25厘（带有弧度），中间穿支小竹子的“龙节”；然后再用一条1米多长带桠叉的小木棍，牢牢把“龙节”撑住。别的地方扎“龙身”9至18节，最长24节。而南澳草龙节数达33节，由33人舞，意指“生生猛猛”。扎的节数不能随意，需按当年村中出生男丁多少而定，最少33节，如果全村有男丁百余人便扎60节以上，但必须是单数，历史上曾扎过60多节。节与节之间用红绳子连接起来，这样形成一条八九十米的长龙。整条草龙由龙头、龙身、龙尾和龙珠组成。最难扎的要算龙头了，需用直径80厘米的大箩筐做底衬，四周扎上密匝匝的草，草龙的眼睛用一大把香火捆扎装点，如今改装两支大手电筒，强光耀眼。龙头额前挂上一个5寸大圆镜子，以作照妖驱邪。龙头还要配上红红绿绿的一堆饰物，使龙眼、龙须、龙角、龙鳞活灵活现。此外，还要用干草扎成圆滚滚的龙珠和三叉形的龙尾。这样，扎成一条上百米的长龙便活灵活现。



草龙头舞得栩栩如生

熄灯舞草龙

南澳“舞草龙”又称“舞火龙”，南澳渔民这个风俗，《宝安县志》就有记载：“火龙（又叫草龙）只流行于南澳镇的渔民区。每年正月初二晚进行表演。”

晚上7时正，舞龙开始。这时天慢慢黑下来，舞龙队主持人何连胜虽已年届花甲，但非常壮实，他带领几位渔村长者，在龙头前方摆上香案、水果供品，点燃香烛、元宝纸钱，向大海合掌祈祷，拜祭天神和海龙王。拜毕，请渔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渔民进行点睛仪式，向龙头三鞠躬，并将作眼睛的两扎香火或手电筒点亮。与此同时，大家一起点燃数10多万支香火，密集插在龙头、龙身、龙尾和龙珠上；一溜长的火龙，顿时烟雾腾腾，香火闪闪，极为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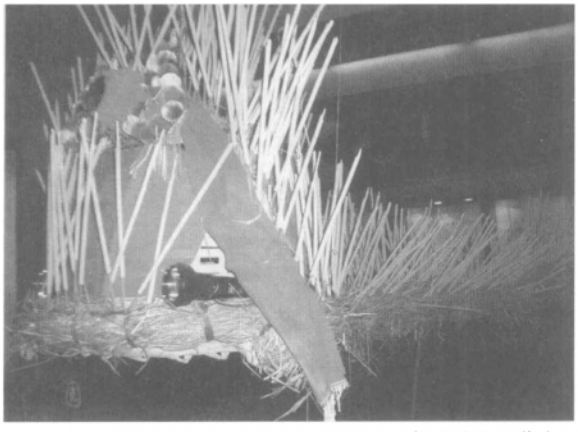
用剑草扎草龙

经精选的130多位渔民汉子，威风凛凛地在草龙旁就位。随着舞龙队主持人何连胜老人一声：“起舞啰！”一百多名队员跟着欢呼，两套大锣鼓敲起，锣鼓声震天，长串鞭炮，火光闪闪，冲天鸣响；接着，一位舞艺娴熟的渔民师傅高擎火龙头，向着天后庙俯首三拜，此时，长3公里多的街灯全部熄灭，一片黑暗中，只见擎起的龙头两眼射出亮光，龙须飘逸，龙身点燃的香火闪闪发亮，形成一条长长的火龙向着渔民村进发（当时渔民村还没有大街，只有一排向海的房子，火龙穿着小巷向家家户户拜年。1962年前未建渔民新村时，便在海滩上舞）。手擎插满香火的龙珠，边倒退边引导火龙头前行。

为引路安全，何连胜等几位壮汉用手拉护着龙珠舞者，同时护送着龙头，跟随锣鼓节奏走八字马步，进三步，停一步；火龙珠引诱着草龙去扑抢、玩耍。戏耍是模仿想象中的蛟龙扑抢宝珠的动作，忽左忽右，忽高忽低，或摇头，或摆尾，或矮步走，或踮脚舞动，舞成蛟龙出水，戏珠漫游，摆尾脱皮，特别是龙珠戏舞，龙头跟着舞动，龙头舞向右，长长的龙尾就摆向左，龙头舞向左，长长的龙尾就摆向右。为使首尾长达百米的舞龙队员听见锣鼓，步伐协调，安排龙头一套锣鼓队，龙尾又一套锣鼓队，全体舞龙者合着锣鼓点，逶迤曲折地舞动前进。

龙头所到之处，临街的渔家门口或商店，各自点燃 1 万响至 10 万响的鞭炮，在鞭炮火光中，龙头趋前拜年，鞭炮越多越响，龙头舞得越来劲。一路鞭炮在近身炸响，毫不畏惧的舞龙头者，以最敏捷的身手和熟练的技巧，左右虎步前行。这优美的舞步、强健的体魄和敏捷身手的龙头师傅，往往被人们视为英雄。

龙头插的香火多，加上本身的重量，足有六七十斤。所以舞龙头者花力气大，需准备 15 人轮换，每人舞 5 至 10 分钟就会气喘吁吁，加上鞭炮浓烟熏焗，必须换人。龙珠准备 5 人换舞。第二节也要配 2 至 3 人，因为龙头插的香火多，温度高，烟雾浓，火龙向前舞动，高温浓烟向后飘，第二节舞的人也十分辛苦。一条焰火闪闪的长龙伴着锣鼓声，且舞且进，浩浩荡荡，不时有大人小孩从龙身底下穿过，以求龙马精神，新年行运。只因为没有街灯，容易发生安全问题，龙岗区公安分局调来 150 名警察，沿舞龙队伍两侧拉起警戒胶带，才没有让大量群众穿插。火龙舞至渔村前街十字街口，龙头转向广场，龙身立即转成一个大圆圈。龙头向南方拜三拜，（传说龙是从南海跃起），接着，再沿沿海码头方向舞去。



插满香火的草龙

本来白天天晴口朗，谁知，草龙一“起舞”时，洒下了毛毛细雨，舞到广场时，雨点变大，但是到海边化龙时，小雨停了。老百姓说“龙”显灵了，龙从海上带出水来，像北方瑞雪兆丰年一样，南澳渔民会获个丰年。主持人何连胜告诉我们，更巧的是有几年眼看着要下大雨，雨水会把草龙的香火浇灭，舞不舞？舞！他们决定风雨无阻。结果，当把草搬出来扎龙时，乌云散开，滴雨未下。

海边送草龙

晚上 8 时左右，舞草龙的队伍来到大海边月亮湾码头，渔村男女老少几千人，围住高高的堤坝围栏，一起观看送龙仪式。

在锣鼓声中，火龙向西北方向拜三拜（传说龙归西北方安身），燃放鞭炮，然后把龙头放在海边码头水泥地板上，一节一节“龙身”依次叠上，

最后龙尾放下时，主持人何连胜领着舞龙队友，一边燃烧纸元宝、蜡烛和龙衣（纸上画的龙衣），一边祭拜。然后点燃草龙。站在海堤上的渔村群众，也把手中各色彩珠、鲜花、祭品抛向大海。刹那间，海边锣鼓威震，草龙燃烧，焰火冲天，鞭炮齐鸣，烟花绚丽，人们欢呼呐喊，祝福新年“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当草龙化为灰烬时，何连胜等老人喃喃细语，轻轻把草龙的灰烬扫进大海，目送着它随那海浪飘向远方。

这时码头、街灯全部亮了起来，舞龙队员和渔民们带着欢乐、吉祥慢慢离开码头。

草龙舞从扎龙、舞龙到送龙整个过程，历时三四个小时。南澳渔民又热热闹闹地耍乐了一个大年初二草龙舞节。

南澳草龙舞的特征和价值



化龙——将草龙焚烧升天

南澳草龙舞，于2006年12月被批准为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迹保护项目，2007年6月入选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认为南澳草龙舞有3个明显的特征：一、源于渔民生产习俗特征：舞草龙习俗源于南澳渔民在海上生活和作业的需要，希望舞火龙能镇住蛟龙，出海捕鱼时风平浪静，合家平安。由于渔民贫困，只能廉价取材，上山割草扎龙；因为渔民船艇如蛋壳般小，岸上又没地没屋，不能大量贮放舞草龙的物资，所以产生了当天割草、当天扎龙、当晚舞龙和化龙的独特舞草龙习俗。二、蕴涵民间信仰习俗特征：当南澳渔民在旧社会无法征服海洋的时候，只有借助神的力量，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就想到龙。通过舞草龙的形式和一整套祭拜程序，祈求海神和妈祖保佑，寻求和激发一种精神力量。三、充满节日喜庆文化特征：南澳舞草龙习俗固定每年大年初二的时间、固定在天后宫至海滩一带的地点，百年不变；既是娱神、娱人的民间狂欢，又使传统的春节，增添龙的图腾和地方祭典风情的民俗文化含量。

今天传承和研究南澳草龙舞，有如下3方面价值，首先，历史文化价值。舞草龙祭海习俗，体现了南澳渔民的传统民间文化，承载着南澳渔民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南澳渔民长期在海上飘泊的历史，和不稳定的生活

环境，通过“一天龙”娱神及祭祀天地神的形式，使古老的渔民文化得以保持和延续。这对研究南海渔民的生产、生活历史演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民间艺术价值。舞草龙祭海活动，是深圳典型的渔民文化风俗，它较突出地反映了解放前渔民的社会地位、文化思想、民间信仰和文化内涵；通过扎龙、舞龙和祭海形式的民间艺术展现，对挖掘和弘扬深圳地区沿海渔民传统的文化艺术，具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再次，社会价值。舞草龙活动固定在春节期间，和中国传统的喜庆大节相结合，除了展示南澳渔民的智慧以外，还给地处边远的渔村营造喜庆热闹的节日气氛；万民同乐，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区流传着用客家方言演唱的民间歌谣。深圳山歌有三特点：一如大鹏、南澳等沿海山歌，靠近广府、香港，吸收了粤曲、咸水歌、渔歌等音乐元素，用带有粤语、客家话、北方话混合成独特的“大鹏话”唱，形成了大鹏山歌。二是盐田、沙头角、葵涌、坪山、石岩、龙华、观澜、布吉和香港九龙的山歌，由于面向海洋，因此山歌的音域多一、两度，唱腔上平实婉转；曲调形式除了掌牛歌、情歌、仪式歌、劳动歌、生活歌外，还有哭嫁歌、哭丧(叫哀)歌和叙事性“仙歌”。三是流行龙岗及周边客家地区的龙岗皆歌，欢快的衬词，快板式的音乐节奏，非常适合节庆和大型歌咏活动。

深圳客家山歌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聚居的地区流传着用客家方言演唱的民间歌谣。“山歌是有音韵的语言”，由于客家人较本地人迁徙晚，多数“客居”山区地带，“开门见山”，衣食住行无不与山有关；他们在山间的劳动和生活岁月中，从胸臆中呼出劳动号子，在大自然的舞台上流出情感丰富乐曲，长年累月创造出璀璨的口头文学，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歌。客家山歌，是我国民歌中较为情浓、放达的一种歌谣。

深圳山歌，和赣南、湘南、闽西、粤东的山歌相比较，从源流上来说，同宗共脉；但是，由于深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有三种当地山歌特点：一如大鹏、南澳等沿海山歌，靠近广府、香港，吸收了粤曲、咸水歌、渔歌等音乐元素，用带有粤语、客家话、北方话混合成独特的“大鹏话”唱，形成了大鹏山歌。二是盐田、沙头角、葵涌、坪山、石岩、龙华、观澜、布吉和香港九龙的山歌，由于面向海洋，因此山歌的音域多一两度，唱腔上没那么高腔嘹亮，唱得平实婉转；曲调形式除了掌牛歌、情歌、仪式歌、劳动歌、生活歌外，还有哭嫁歌、哭丧

（叫哀）歌和叙事性“仙歌”。三是龙岗皆歌，主要流行于龙岗镇和周边坪山、坪地、横岗和惠阳永湖等客家地区，特色在于七言二句或七言四句歌词后面，有一定式的衬词和曲调，衬词如快板节奏，整个音乐跳跃欢快，可对唱、独唱、齐唱和群众一起帮腔衬唱，非常适合节庆、大型歌咏活动，气氛热闹，场面喜庆。

大鹏山歌、龙岗皆歌、石岩山歌，2007年1月入选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6月，其中石岩山歌入选广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大鹏山歌

大鹏山歌用大鹏“军话”演唱，当地称“军话”也叫“千音”，也就是大鹏古城有千户人家千种口音。《宝安县志》载有：“在惠阳专区举办的1956年民间艺术汇演中，宝安客家山歌演唱获奖。”同时载有《大鹏地名歌》：“七娘山上起云头，打落杨梅坑下求，兄弟齐全鹿嘴角，马尿河前见日头，舂白米头系大碓，写字唔成系碧洲，狗猎黄猄（野兽）大岭下，朝朝霞雾半天云，爱饮甜茶鸡公笃，爱见洒莲（即靓女）荔枝山，上洞田脣夹下洞，土洋行出系溪涌，下沙地福王母洞，龙歧对面水头冲，行出布锦系水贝，行过窑坳系乌涌，松山隔离系田心，田心前面系大鹏。”一首地名歌，把大鹏各地地名全串起来了，山歌一唱，亲切，明了。

《大鹏掌牛歌》唱出掌牛仔的辛酸：“掌牛阿哥好凄凉，戴顶笠麻也没框，食入几多笠麻水，淋湿几多烂衣裳。放牛阿哥真吃亏，戴顶笠麻过岭飞，食鱼食肉没你份，生水芋头搏命推（吞）。命中生来苦又苦，打烂犁头篾来箍，牛唔见时头也大，惹炉香火怕煨乌。”（《罗湖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本》1987年）

大鹏情歌男女对唱中，唱到关键时刻，每首第一句由工整的七言简略为三言，加上“妹——”拖腔，使唱起来反驳对方简洁有力。例如女唱：“有歌唔唱沤肚中，有马唔骑烂马鞍，烂了马鞍有得换，莫来沤烂妹心肝。”男唱：“嫁涯好呀嫁涯好，嫁涯单身有‘钱’佬，灶头食饭唔使油灯火，自有明珠屋里照。”女唱：“凉帽烂哟——妹，等哥有钱买顶新，凉帽新来人又靓，赛过当年穆桂英。”男唱：“快的嫁哟——妹，凉帽罗裙件件新，头上有簪手有钏（镯），房中又有解愁人。”大鹏哭嫁歌，虽“哭”，但不悲，是内心欢喜，难舍父母养育之情，同时担心嫁到夫家，不知家婆家公好不好相处，心情难受。这时，在闺女房间由同村好姊妹（未婚青年）陪伴7天（当地俗称“伴坐娇”）里，互相唱山歌安慰、鼓励。这哭嫁歌，把七言四句更加简为三言或五言一句，每句根据情绪用“啊哈——噫”衬词唱成拖腔，如“爹娘好呀……啊哈——噫”，“对我

有恩情哪……啊哈——噫”。唱“噫”时，带深呼吸，发出抽泣的“噫”声，演唱风格很独特。

盐田山歌

盐田山歌，也叫九龙山歌，是流行于盐田、沙头角和香港九龙新界一带。最大的特点是唱腔中有好几节切分音、四分之一休止符和装饰音，好像浪潮涌来时碰到海岸礁石，戛然止住，然后又跟水退、水涨一样，起伏流淌……例如《割草歌》：男唱：“阿妹割草在山岭，阿哥砍柴石壁攀；有心等妹来坐嬲，等妹等到日落山。”女唱：“看白等到日落山，葛藤拦路岭隔岭；阿哥柴担先挑转，你系有心转头行。”“阿妹”和“看白”的第一个字是后半拍起，“割草”和“等到”、“在山”和“日落”的第一个字是切分音，表达语气果断、态度坚决，这种充分表现情绪的山歌唱法，是盐田山歌的独特之处。

演唱盐田山歌最有名气的，是沙头角山歌手薛观带、吴彪、盐田的黄继娣。1958 年盐田村村民薛观带，改编客家山歌剧《刘三姐》并主演男主角，全剧需村民演员数 10 人，参加广东民间艺术汇演获优秀奖。1959 年庆祝国庆 10 周年吴彪、薛官带被选拔参加广东省文艺演出团赴北京演唱山歌，成为宝安山歌唱到北京第一人，在当地传为美谈。吴彪是早年参加我游击队的老战士，在发动群众、鼓舞士气时开口就用山歌宣传，直至解放初期当上深圳镇领导，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大会讲话讲了没多久，没词了，但他很快用唱山歌方法幽上一默：“阿叔年老眼草花，顶高那行看脚下，讲来讲去车车转，大家听到蒙查查……”顿时，大家尴尬全无，会场轻松活泼。薛观带在上世纪 60 年代移居香港，又成为香港新界山歌王。黄继娣也移居英国，把盐田山歌带往海外华人社区。

羊台山山歌

石岩、观澜、龙华、布吉山歌，也叫羊台山山歌，这一带的山歌形式和曲调基本一样，除了情歌、儿歌、生活歌、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外，也有较独特的哭嫁歌、哭丧歌（叫哀歌）和仙歌。

羊台山山高 587 米，比不上梅州阴那山 1297 米高，深圳少崇山峻岭，所以山歌表现的内容、题材也较生活化，少“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之类的描写，山歌唱腔也没有梅州山歌高昂激越。

2006 年 9 月，我和深圳市文化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同事，曾到石岩、观澜、龙岗、大鹏等地和当地老山歌手座谈，采风，见到这几个地方的老山歌手，全都六七十岁。其中 67 岁的“石岩客家山歌王”池官华老人一连唱几个小时山歌，听到我多年未听的原汁原味乡下山歌。原来，池官华的爷爷、爸爸很会唱山歌，爱唱“花笺”（歌册，叙事山歌），旧



采访石岩山歌手



"石岩山歌王"池官华

阵时，他们出门下田时一架（扛）犁耙就唱，收工时一放担竿也唱。池官华为我们唱起原生态的《死同死来生同生》叙事山歌：

男唱：火烧竹头哔啪声，阿妹得病哥着惊，上摆（次）搭声下午转，三日路头一日行。女唱：转到哩，坐紧床边话你知，初一晨早担水转，洒湿衫裙搭坏哩。男唱：阿妹你有病自家知，如今要请医生医，若是阿妹无钱用，阿哥甘愿当（卖）棉被。女唱：阿哥唔冒（不要）医，使了钱银枉心机，将你钱银娶过只，贱命娇莲（自己）耽搁你。男唱：阿妹涯爱医，使开钱银唔计其，我十二街坊寻下转，无只娇莲（女子）当得你。女唱：阿哥唔冒讲柬好，一山还有一山高，番鬼（外国）铜钱冒（无）只字，我介人样哪里冒。男唱：十七十八嫩枝枝，七嫩八生唔冒死浪你，身中怀有细晚仔（小孩子），涯点烛烧香服侍你。女唱：阿哥心莫焦，蛇死路边有人挑，观音菩萨泥作怪，长年月久有香烧。女唱：猪肝好食对折腰，家婆打骂气难消，丈夫怕娘冒开解，黄泉路上有几条。男唱：一脚踏落外间房，听妹讲来真凄凉，爷娘那有百岁命，终归有日做家娘。女唱：阿哥真有情，两人讲话心贴心，早晨洗面共盆水，晏昼（午饭）同挟一菜芯。男唱：阿妹两人好，两人好到白头毛，好到罗浮山转向，好到黄河水倒绕。合唱：新做书桌钉同钉，死同死来生同生，在生两人同枕睡，死了两人共金罂（骸骨装入瓦罐）。

石岩、龙华、观澜、布吉山歌，有七言四句和七言五句两种，第一句起子喜欢用"阿妹——"拖腔，趁拖腔这几秒钟想好下面的唱词，接驳或反驳对方山歌。这种唱法，多数由男人唱，带撩人、挑逗式的，比如："阿妹——要涯唱歌涯就唱，唱出日头对月光，唱出麒麟对狮子，唱出公鸡对凤凰。""阿妹——涯歌多呀涯歌多，床头放便三四箩，唱得涯赢系我嫂，唱涯唔赢做我老婆。"石岩镇罗租村在解放初期至人民公社时期，每逢中秋有大规模山歌会，对歌对

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不过瘾还对到河对面的官田村。1964 年他们新编山歌《嫁错郎》参加宝安县文艺汇演。2004 年 9 月广东卫视专程录制石岩镇“羊台之歌”山歌擂台赛和池官华唱山歌专题播放。

观澜是个著名的侨乡，当地人再穷也要缴子女读书。观澜山歌的修辞手法丰富，樟坑径村山歌手陈瑞强一口气唱了赋体山歌、比喻山歌、起兴山歌、叠字山歌和双关语山歌等。比如《椒妹追后生》：“过了一坑又一坑，看到铺狗（狐狸）逐黄猄（野鹿），看到黄猄逐铺狗，看到椒妹（女子）逐后生。”这是一首直言叙述，层层递进，生动描述的赋体山歌。《行路就像摇船桨》是首比喻山歌：“冤枉凄凉就系涯，嫁只老公脚又跛，行路就像摇船桨，企紧又像马张蹄，睡紧又像奉神鸡。”船桨、马张蹄、奉神鸡都比喻得非常贴切、生动。起兴山歌《吱吱呀呀心花开》：“三间铺头涯唔开，愿跟阿哥挑石灰，左肩挑来右肩转，吱吱呀呀心花开。”“嫁郎唔嫁烧炭郎，锥乌凌炭得人狂，嫁郎要嫁劏猪郎，至少有啖骨头汤。”叠字山歌：“山谷坑山起山坡，山前山后树山多，山间山田渗山水，山民山上唱山歌。”这首叠“山”字烘托“山民山上唱山歌”，重复“山”字，但意思不重，景致不同，意境优美。双关语山歌：“新郎新席新阿娇，新船新桨任哥摇，阿哥摇妹摇出水，阿妹摇哥魂魄消。”“阿哥莫怨妹冒（无）心，上巷下巷眼针针（看着）；灯草拿来绑门板，一出一入系关心。”双关歇后语：“灯草绑门板——关心。”

龙岗皆歌

龙岗皆歌，是龙岗镇一带用客家话唱的一种山歌。

2006 年我和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同志，一起与龙岗区客家民俗博物馆人员，深入了解龙岗皆歌的渊源和传承情况。龙岗皆歌，始于清末民初时期龙岗圩镇周边的“八音仔”的演唱。“八音仔”是由村里会唱歌、弹奏的人组成的音乐队，一般由有钱人家请去为婚宴、寿诞、添丁演唱助兴，祝贺闹气氛。也有人请去为 70 岁以上逝世的“喜丧”善后事吹打弹唱。1950 年在龙岗圩一个叫“老鼠塘”的地方，辟建一个空坪，种上大榕树，后来成为龙岗人聚集唱山歌的小广场。龙东桥背村于 1876 年出生的邱其乐，跟随过龙岗“八音”队大佬林潭四处演唱过“揾食”。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盛行在龙岗圩大榕树头唱皆歌、斗山歌。1953 年龙岗皆歌改编、演唱《半夜鸡叫》参加粤东行政区专员公署在汕头市大同剧场演出，获得好评。《惠阳地区民歌集》选入龙岗镇解放初期描写人民翻身的《皆歌一唱闹洋洋》一曲。《惠阳县志》记载：“1954 年中秋节夜晚，惠阳县文化馆在龙岗区（1958 年以前属惠阳县管辖，1959 年后划归深圳市）举办山歌擂台赛，有竹板山歌、皆歌、渔歌等。”1959 年皆歌《歌唱蔡娇娘》参加了广东省业余民间汇演。

龙岗皆歌是由“八音”调演变而成。最大的特点是第一句歌词后面，接着一句衬词：“金牡丹哪！”第二句歌词后，同样有一句衬词：“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罗咧！”例如：

阿哥有情妹有心（金牡丹哪！），

唔怕山高水又深（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啰咧！），

山高妹会来开路（金牡丹哪！），

水深哥造船载人（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啰咧！）

唱歌唔系比声音（金牡丹哪！），

总爱唱来情义深（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啰咧！），

恋妹唔系论相貌（金牡丹哪！），

总爱两人心贴心（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啰咧！），

鸡嘴就比鸭嘴尖（金牡丹哪！），

阿妹嘴比阿哥甜（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啰咧！），

去年同妹亲个嘴（金牡丹哪！），

甜到今年三月三（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啰咧！）。

皆歌歌词一般七言两句或四句为一段，歌词通俗，押韵，上口，群众易传易唱。唱词后面两句富有特色的衬词，固定不变，紧随变化的山歌唱词后面，特别是在对唱中，引起共鸣的台下群众情不自禁地集体帮腔，同唱衬词“金牡丹哪！”和“牡丹花，一对鸳鸯赛红花啰咧！”现场气氛相当热烈。

龙岗皆歌虽然基本一个曲调、两段衬词，但根据内容和情绪的变化，可变成快板式欢快、激昂旋律，或低沉、伤感、缓慢节奏。由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团，根据龙岗皆歌音乐创作演出的《客家妹嫁老公》舞蹈，该舞蹈较好选用龙岗皆歌哭嫁时的委婉哀怨、出嫁时的欢快跳跃以及抢逗新娘中的幽默谐趣音乐元素，再现了民间民俗文化艺术，受到群众和专家的好评。该节目参加2004年2月“中国梅州首届国际山歌节”和深圳市鹏城金秋艺术节比赛，双双荣获金奖。

沙头角镇2003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鱼灯舞之乡”。沙头角鱼灯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沙头角镇沙栏吓村最早的原居民，在长年的海上捕鱼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它流行于沙头角、盐田及香港新界担水坑、岗下村等地，成为这一带乡民逢年过节、拜神祭祖、喜庆丰收的娱神娱民必备节目，经过300多年的历史沿袭，流传至今。

鱼灯舞与沙头角中英街

独特的民间鱼灯舞

最近，为整理深圳市民间民俗文化资料，偶尔翻到了我保存了近30年的一本工作笔记，里面记载着当时我供职的宝安县文化馆于1978年11月安排一个3人小组，前往沙头角镇调查了解，协助当地文化站搜集整理鱼灯舞，落实不久前广东省文化厅召开全省编辑出版民间文化艺术“三套集成”会议精神。这个小组前后3个月多次到沙头角镇内找到老艺人，终于搜集整理和排练出在“文革”沉寂了10多年的“沙头角鱼灯舞”，春节期间在中英街表演。九十年代初，盐田区文化部门和沙头角镇文化站，积极支持和组织沙栏吓村民，红红火火开展鱼灯舞的群众娱乐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沙头角镇2003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鱼灯舞之乡”。2006年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当年我市唯一入选首批省级文化遗产代表作。2008年又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沙栏吓村，几百年前是个小小的渔村。沙头角鱼灯舞起源于明末清初，是沙头角镇沙栏吓村最早的原居民，在长年的海上捕鱼和生活中，创造出来

的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它流行于沙头角、盐田及香港新界担水坑、岗下村等地，成为这一带乡民逢年过节、拜神祭祖、喜庆丰收的娱神娱民必备节目，经过300多年的历史沿袭，流传至今。现在沙头角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保存着民国时期表演鱼灯舞伴奏用的一个小鼓和两对大钹。

沙栏吓村健在的三名鱼灯舞老艺人吴观球。邱煌生、吴亚九说，鱼灯舞，在大鹏湾一带的渔村很有名气，许多村子包括香港新界的吉澳、西贡、担水坑、鹿颈等村子，每逢重大节庆都邀请他们去表演，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后来鱼灯舞在“破四旧”中逐渐消失，随着老艺人陆续谢世，没有任何乐谱资料和录像资料的鱼灯舞险些失传。

沙头角鱼灯舞是不同于我国其他鱼灯舞的一种颇具岭南特色的民间艺术。它专门在晚上村边晒谷场或祠堂门口的空地上，由二十几个男子手举鱼灯表演。表演场地不用正式舞台，也不需要灯光，只要在场地上竖紧四根龙柱和绕场蓝色水布，以模仿海底世界，观众利用龙柱和鱼灯里的蜡烛光芒，看到“海底”世界里各种“鱼类”在舞蹈。

鱼灯舞里“鱼灯”的道具种类多达几十种，大的有七八米，分好几节，每一都可节以灵活摆动，里面点上蜡烛，由一个人或多人舞动，舞者手举鱼灯以矮步、俯身、曲背运行穿插，时而腾挪跳跃，时而盘旋翻滚，其舞姿既有男子汉的粗犷雄浑，又有岭南渔人的深情跌宕，锣鼓忽儿铿锵起伏，曲调穿插悦耳悠扬，颇具有浓郁的渔村乡土气息。

传统的鱼灯，用竹篾编成各种鱼的形状框架，然后糊上纱纸，用元粉、牛皮胶涂上颜料彩绘，鱼眼、鱼鳞、鱼鳍、鱼须、鱼角、鱼尾都画得很考究，再漆上桐油防损防水，在鱼腹之下固定装一根20厘米长的小木柄，方便表演时握举舞蹈。“大海鲤”是鱼灯舞的主角，其他的角色有丁公鱼、石斑、龙虾、竹壳原等上十种鱼类造型。新造的鱼灯，使用之前必须到“吴氏宗祖堂祠”里“开光”，以求渔家祖先庇佑，传承下来每年正月十五在天后宫前献祭祀天后、拜祭祖先，隆重舞鱼灯表演。鱼灯舞伴奏以锣、鼓、钹为主，配以高低音唢呐、螺号、笛子、二胡等乐器，其中打击音乐的鼓很特别，是长身小鼓，牛皮鼓面，呈旧时军队头戴的头盔状，鼓身高40厘米，鼓面直径有20多厘米。在热闹的鼓乐声中，小鱼小虾鱼贯出场，随着紧锣密鼓声，大海鲤等主角出来狂舞。渔民们利用平时练就的弓步、马步、矮步以及鱼跃虾跳的动作，表演出一套套追鱼、戏水、亲昵、打闹、捕鱼、吃鱼等情景，情节简明短小，情趣诙谐生动，动作十分逼真，充满沿海古代渔家生活气息以及渔民的智慧和想象力。

沙头角一带乡人喜爱观看鱼灯，欢闹舞鱼灯，历久不衰，除了上述祭祀、娱乐的原因之外，还反映了民间的一种心理和愿望，因为“鱼”同“余”谐音，通过自己动手制作鱼灯、赏鱼灯、舞鱼灯，满足了渔人“家家富足、吉庆有余”

的代代期望。

沙头角鱼灯舞起源久远，对研究深圳地区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和民俗文化无疑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十九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使沙头角割裂为中、英两方，沙头角鱼灯舞作为传统的民间艺术，以独特的形式，多年来一直联系着“中英街”两方同胞的情怀。

独特的“一国两制”中英街

沙头角中英街，一边是祖国大陆的沙头角镇店铺，一边是香港新界沙头角乡的民居和小商店，分别所属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1992年，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参观沙头角，称这里为“天下第一镇”，是“世界所无，中国唯一”。



市博物馆展出的沙头角鱼灯舞鱼灯

著名的沙头角中英街，南北弧形走向，全长250米，最宽处4米，街中间双方各自铺水泥，夹缝线自然成为分界线，行人稍稍粗心一点，察觉不出来，就一脚踏过香港。界线最明显的倒是全条街竖有8个界碑。两尺来高的花岗石墩界碑上，凿刻着中英文“光绪二十四年，中英拓界”字样。

别看这界碑上只寥寥几字，却异常辛酸沉重。它浸满了民族的血泪和耻辱，诉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丧权辱国：“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咸丰十年(1860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先后割让、租借香港岛、九龙司、新界给英国。”(《宝安县志》)

新安人民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咸丰八年开始长达40年的反抗和武装起义，特别是光绪二十四年新界锦田、元朗、上水、大埔村数个武装民众组织，进行顽强的反展拓界址的斗争，和深圳河沿线的人民一起，合力奋战，把深圳、布吉等地英国占领军赶回深圳河以南，挫败了英国扩大新界的野心。新界元朗的邓仪石1898在参加锦田、元朗、粉岭反对英国强租新界

和保卫九龙半岛的斗争后，被迫离乡背井，愤慨写下了《河山割裂实堪悲》一诗："河山割裂实堪悲，为避蛮气始徙歧；太息衣冠文物地，一朝瓦解属番夷。极目相关何处是，茫茫东海去云浮；滚滚狼烟何日净？哪堪回首九龙湾！"

1825年以前，沙头角中英街一带不是一条街道，而是个渔村的晒鱼沙滩。周边湾澳的渔民在这渔港沙滩上交易渔货，慢慢形成了东和墟市（沙头角集市前身）。如今中英街是梧桐山水流向海湾的小河溪，后来小河溪改道，河流干涸，淤积成"鸬鹚径"。1898年英人在割占香港岛后勘界，双方是以沙头角河"河道"插旗为界，包括现在中英街所在区域全部属于港方范畴。东和墟老百姓不满英人统治，当晚把"河道"内的旗拔掉，插在现在中英街的位置——那条干涸的河床上。


沙头角中英街界碑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副件的《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专门记载当年堪界情景："北界始于大鹏湾英国东经线114°30′，潮涨能到处，由陆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即土名桐芜墟之西，再入内地不远，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东立一木桩。此道全归英国，任两国人民往来。由此道至桐芜墟斜角处，又立一木桩，直至目下涸干之宽河，以河底之中心线为界线。河左岸上地方归中国界，河右岸上地方归英界。"后来，居民在这河两边建筑民房、商铺，人口渐聚，成为有点规模的商业小街。

香港一位民俗作者在《新界风物与民情》一书中，描述了这奇特的沙头角："再过鸭洲、吉澳而入沙头角圩市。该圩市只有一条街便隔开中港，街的一边属于中国地域，另一边即英国租界，故该街名为'中英街'。两地居民也很融洽，有时可以自由往来，因驻守该地之边防军、本港警队及该市之居民，大家每日都常相见，熟络不拘，况且边区居民之生活，与一般新界人相若，因而毋须偷渡来港也。

"沙头角原是天然渔港，昔日也有鱼栏开设为收发之所，后被政府（按港英当局）之渔市场取代了。鸭洲与吉澳都是渔民栖居之地，中间也有部分客家人。吉澳有天后庙一所，建庙迄今有二百年历史。"

当地人称沙头角“中英街”两边，我大陆这边叫“唐界”，香港那边叫“番界”。上面引述的是香港人从“番界”角度来描述沙头角新界部分。我30多年前多次去沙头角镇，晚上住在镇内时，也在当地人陪同下，有次违规（即没有办理任何过境证件手续）偷偷越过“唐界”，到“番界”那边找新界沙头角的山歌手、民间艺人“聊天”（采风），也略知当地风情。不过，那是“政治边防”年代，两边很少来往，内地的人一到中英街就对对面感到很神秘。晚上，我一踏过界，在对方“番界”的小巷七拐八转时，心里紧张得咚咚直跳，双腿直打哆嗦。偶尔狗咬吠叫，更吓得心惊肉跳。那时，由于双方严格控制进入沙头角，人流稀少，更没有多少人有港币买东西，买得起东西。临“唐界”这边的“番界”街边，只有冷冷落落几间店铺，大部分为新界居民住家民房。由中英街丁字路口向西过去十几米远，才有条两层楼高的“骑楼街”叫“新楼街”，二十来间食品杂货、百货商店专为香港新界居民消费购物。新楼街附近有个巴士站，上车投5毫子港币就可抵达香港上水、粉岭。我那时没有半仙港币，也没有一丝逃港念头，所以，回到县城深圳镇和朋友聊起时，直被人讪笑：“‘蠢过猪头炳’，多少人搏老命翻山涉水偷渡去香港，你却……”

沙头角“唐界”稍微好一点，门店多，正规，因为都是国营商店，负有“对外影响”的任务，所以许多商品都比国内好，比国内多，但不经营进口商品。唯独有一间叫“综合商店”，位于中英街丁字路口，方便对面的“番界”居民来买“爱国货”。你别说，这综合商店的商品全是出口一级货，直羡慕得我们流口水。县机关许多部门都喜欢借机出差沙头角镇，找镇领导特批少量的“紧俏货”，比如一条上海产飞马烟、罐装南洋兄弟烟厂红双喜烟，或一罐曲奇饼干、朱古力糖，或一盒风油精等，用人民币代替港币来买。别小看一条飞马烟，这在国内是买不到的，拿到省里去，可以换到几吨钢材或水泥的指标批文。哪个部门要想得到省批点紧缺物资，非走这窍门不可。我等星斗小民，飞马烟、进口糖果不敢奢望，只能买一两小瓶风油精回来，擦擦脑门，通通塞着的鼻子，一家大小，“掌门备用”。运气好的，被镇领导照顾多批一两瓶，留着像宝贝一样，送给地区专署来的上级部门朋友。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我从沙头角买了一箱香港鸡汁伊面，带到厦门送给一位亲戚，没见过这洋食品的亲戚感恩不尽。过两年我去北京，到沙头角买了几打尼龙丝袜、几扎腈纶布、几包进口味精，分别送给朋友，既体面，又大方。

中英街最辉煌的数八九十年代那阵子，短短的小街两边全变成大大小小的上百家商店，卖腈纶丝涤布匹、卖香港男女时装、卖皮鞋波鞋凉鞋、卖花伞洋伞折骨伞、卖公仔面日清面出前一丁日本面、卖美国新奇士橙日本富士

苹果菲律宾芒果泰国榴梿澳洲士多啤梨台湾莲雾、卖洗头水沐浴液染发剂、卖外国手表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卖黄金白金白银翡翠首饰，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唐界商店全翻新装修，番界住家临街铺面全改作商店，小街铺面不够，再向南北延伸搭摊成一溜百货大排挡，有的在里巷人家也搬上二三楼住，把地面一楼腾出来破墙开店。番界的人见生意滚滚，立马跑到唐界这边租间房子，“投资”开百货超市、黄金首饰行。

沙头角中英街卖的清一色进口货，品种繁多，花样新潮，质量上乘，价格便宜，而且出关全免征税，一下子吸收成千上万的人到沙头角购物旅游。由于沙头角是边防禁区，从内地先要办边防证件到深圳，到了深圳又要在市公安局重办禁区通行证，才能进入中英街。因此搞到一张沙头角通行证很不容易，满足不了外地朋友，当地人人都有意无意地躲着。后来放宽到旅行社可以办证，当地人才松了一口气，但又碰到换港币的麻烦。中英街是使用港币的，买东西没港币，内地来的人只好托朋友偷偷在深圳高价用人民币兑换。即使用高价换成港币到沙头角买东西，也很便宜合算。



沙头角鱼灯舞（谢建伟 摄）

那时，沙头角每天一两万人挤进200来米长的小街，节假日最多的时候达10多万人，从早上7点多桥头海关开闸，到下午5时多关闸（所有商店4点半关门），中英街人流量用摩肩接踵、水塞不通来形容，亦不为过。这“购物大军”，忙坏了穿制服的管理人员，拿着话筒扩音器：“请不要过界买东西，否则罚款！”但汹涌的人潮置若罔闻，天天喊话，天天事倍功半。首次到中英街的内地游客，既新奇又兴奋，一过关见到第一块界碑，或街中间的庇荫两边的百年大榕树，或我方边防军、对方英警等景物非常好奇，偷偷照个相留念外（街内多个牌子明示，边防禁区，严禁照相），马不停蹄去购物。奇怪，那些游人不吃不喝几小时在短短的小街转来转去就不知道饿，原来他们见到那么多的外国水果，买来放开肚皮猛吃一顿。因为水果规定不准过关带回内地。

这条小街足足旺了20年，21世纪新禧年后日渐式微。2007年6月24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组和晶主持人，在沙头角中英街小广场做一期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中英街的传奇》专题节目，邀请中英街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两广总督陶模派王存善为中方划界委员，英方的则是辅政司洛克，两人各带随行人员沿深圳河勘界划线（选自《深圳全记录》）

新界商铺老板何集庆、从“番界”到“唐界”来投资最大的波记百货食品店老板吴来福以及新界北区议员温和辉等嘉宾，叙说中英街的传奇。波记吴老板回味当年他的百货食品店请 30 多个员工，仍不够人手用的情景，慨叹每天从早到晚都排几个圈好几百人来买东西的“旺相”，如今不再。何集庆老板兴奋地说他设在“番界”和“唐界”的金铺，1981 年“番界”店销售黄金首饰 1 千多万，1988 年猛增至 1 亿港元；深圳方的金铺也从 2 千万元，增至 1.5 亿港元营业额。

何集庆老板说他在中英街开店铺已是第 4 代人了。1906 年他的祖父去牙买加做生意，赚了点钱回来开药材店。他 15 岁在香港沦陷时参加我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港九大队，打鬼子，保家园；香港回归那年，特区政府给他们这些当年的抗日战士隆重颁发了纪念章。

何老板、吴老板和温议员说，香港回归了，马照跑，舞照跳，“一国两制”处处得到落实。我们现在的生意虽然少了，但是以前中英街卖的紧俏货，如今内地到处都有，说明祖国在迅猛发展，繁荣富强，在海外的港澳台、华侨，禁不住从内心发出由衷的高兴。

公明镇有个叫水贝(今叫上村)的村子，清康熙《新安县志》里就有记载，属福永司管属村庄。130多年前（清咸丰十年），村里出了一个舍己为人、扬善惩恶的善良女性，据说死后成仙，在公明一带，甚至新安、香港、东莞、增城等地被视作女性的保护神。陈仙姑的故事由当地群从代代相传，成为典型的民间口头文学，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2007年1月列入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公明陈仙姑的传说与古迹

陈仙姑的民间传说

深圳的民间传说很丰富。有地方风物的传说，比如七娘山传说、羊台山传说、梧桐天池绿毛龟的传说、新安大盆菜传说、阿婆髻传说、铜锣径传说、新娘潭传说等；有地方掌故的由来，如宝安名称由来，深圳名称由来，沙头角镇、大鹏镇、乌石岩镇、观澜镇及罗湖村、湖贝村、盐田等村镇名称的由来；更有流传苏轼、宋湘、伦文叙、文天祥、大鹏刘起龙将军、海盗张保仔、八大仙人之一的增城何仙姑、赤湾天后娘娘和公明陈仙姑等等各种人物的民间故事。

流传民间的人物故事，除了文天祥丞相的后人在深圳市内松岗、凤凰、岗厦等地建有祠堂，妈祖林默娘在赤湾、沙头角、大鹏等沿海建有天后宫外，由当地真人成仙后建有庙宇祭拜的，就数宝安区公明镇的陈仙姑庙了。

公明镇位于深圳市的西北方向，与东莞接壤。《宝安县志》记载："公明圩镇18年（民国1929年）建圩。此前曾出现过周家村圩（明朝天顺年间，在今将石附近）、白龙岗圩（清嘉庆年间，在今薯田埔村）、永长圩（在今罗田）、丰和圩（清光绪年间，在原白龙岗附近）。丰和圩最为兴旺，后因宗族纠



陈仙姑祠

纷废。楼村人陈海臣、合水口村人麦晓先，顺从民意，集资于合水口村附近建圩，初名公平圩，取意‘买卖公平’。民国 20 年改名公明，含‘公道光明’之意。”

公明镇有个叫水贝(今公明上村)的村子，清康熙《新安县志》里就有记载这个村子了，属福永司管属村庄。130 多年前，村里出了一个舍己为人、扬善惩恶的善良女性，据说死后成仙，在公明一带，甚至新安、香港、东莞、增城等地被视作女性的保护神。陈仙姑的故事由当地群从代代相传，成为典型的民间口头文学，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2007 年 1 月列入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陈仙姑真名叫陈端和，清咸丰十年正月初二出生在陈昴家族中。陈昴是公明陈氏家族的 115 世孙陈轼从江西迁徙到广东南雄，然后辗转来到宝安公明定居的后裔。陈昴的爷爷陈敏镇守四川，封镇国南唐侯，陈昴的父亲陈忠官至惠州龙川县令。陈端和因为在大年初二出生，按当地风俗，正月也称端月、孟春，春风春日，暖融祥和，故取名为“端和”。陈端和在很小的时候，父亲陈名公和母亲梁氏相继谢世，家里靠哥嫂抚养长大，长年过着衣不裹体、饭不饱腹的穷困生活。8 岁那年，她被迫许配了沙井新桥村一户人家当童养媳。

陈端和自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遇到疑难问题总爱刨根问底。当时，大沘河(今茅洲河)一带少医缺药，乡亲们有疾病而苦于无处求医。陈端和对此铭记心中，她那幼小的心灵里，立志要为父老乡亲排忧解难，济世救人。长

大后，为了寻找治病良方，她不辞劳苦走访了东莞，增城、新安等地方，求教经验丰富的郎中；踏遍羊台山、大岭山等大山采草药，搜集整理了许多民间验方，其中男科、妇科、儿科各100方，还有外科32方、眼科53方，为乡民医治了不少流行的痢疾肚痛、感冒发烧等常见病，村民们无比感激。如今，遗留下来的300多条处方仍有一定医学参考价值，医学界人士曾予以肯定。

当时的水贝村，有一条大沘河，又叫茅洲河，是东莞县与新安县交界的县界河。河床弯弯曲曲，河的两边没有修堤，周围是一片农田。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过着男耕女织的农家日子。而茅洲河传说有一河神叫做二河神，每年春夏季节便兴风作浪，使河水汹涌泛滥。清嘉庆《新安县志·十三卷灾异》载云："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大水时，淫雨连日，倾注治城，高处山麓而泛滥汹涌，渠不能泄，亟开西南二门放水势犹未灭。西南隅水深丈余，民居尽颓塌，人民冒雨四散投生，上下汹汹不得已，乃决城垛二处消水，水势治平，人心稍定，城西西乡村冲决民房百余间，皆漂流入海。西北路燕村（笔者注：今公明镇燕川）、水贝、涌头、黄松岗等处，冲决土寨民房不可胜计。居民皆升屋上，缚竹为筏，浮水而渡，往往溺死，牛畜淹没甚多……"

《宝安县志》又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九月的一天，水贝村一带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顷刻大雨倾盆，连续数日，河水急剧上涨，淹没农田，到处是白茫茫一片。这一年，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原有50多户人家，被迫背井离乡去乞讨的就有30多户。

陈端和看到当时村里遭遇灾害的惨况，想到村民长期以来遭受河水泛滥成灾，水灾过后瘟疫流行带来的苦难，她心中萌生一个念头：立志惩治大沘河二河神，让百姓过上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然而，要想惩治二河神就得有法术，哪里有治河神的法术呢？唯有仙人指点，有了法术，才能降服恶神。果然有一天晚上，仙人托梦给她："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乃成仙之日"，让她这一天在家等待仙鹤送其上天成仙。转眼间，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三日到来了。那天晌午，陈端和上穿桃红色夹甲（形同肚兜），下穿白色裙子。没多久，两只白鹤随着一阵风，裹着一片白云，从天上姗姗飞来，降落在她家天井地上，陈端和手扶白鹤翅膀坐在白鹤身上，白鹤旋即扇动翅膀，一缕青烟升腾，白鹤乘着陈端和飞上天空。这一切全给嫂嫂看见了，着急地高声唤叫："看呀，端和真的升天成仙了！"伴着叫声轰的一声响雷，一道弧光划过（传说是端和的嫂子分娩未满月端着婴儿屎尿盆的秽气所至），陈端和随即从空中摔在地上死去，然而尸体却完好无缺，数日不腐，还香气四溢。对此，陈仙姑庙至今有副楹联为证："德道十年人不信，放香百日众无疑。"

民间传说陈端和驾鹤八天八夜到达天庭，向天官诉说了大沘河二河神作恶

多端的行径，让百姓蒙受灾难，请求天宫给予惩治。于是，天官把二河神撤职查办，并以触犯天条罪被处于死地，同时封敕陈端和为大沘河的河神，让她为民造福。从此，陈端和列入仙班，被称为陈仙姑。

此后，大沘河一带风调雨顺，百姓日子安稳。陈端和生前舍己为人、疾恶行善的美德，在大沘河一带广为流传，乡亲们在她住的地方设立神位，供人参拜。每逢陈端和升天之日，方圆数里烧香朝拜的人络绎不绝，同治年间，人们在水贝村修建了陈仙姑庙。老人们说，当时的陈仙姑庙大小三间屋，中间大屋为正堂，21桁瓦（约4米宽），供奉陈仙姑神真身（骸骨）的塑像；左右两侧为厢房11桁瓦（约2米宽），屋高约4米“人”字形庙宇建筑。



陈仙姑神像



陈仙姑祠全貌

陈仙姑庙建成后，除了陈端和诞辰日（正月初二）和升天成仙日（正月二十三）作为大型拜祭外，过年过节和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当地陈姓、麦姓、梁姓等群众来烧香跪拜，外地远至新安、东莞、增城等百姓也前来拜祭。

建国后，因为“破四旧”运动，庙宇祭祀被禁，陈仙姑神像遭毁，香火渐稀。文化大革命中陈仙姑庙被拆，陈仙姑像被毁，时任镇供销社主任麦伯坚(2006年为75岁)见证塑像内出现陈端和头骨和臂骨残骸。村民便偷偷在原庙旧址的荔枝树下进行拜祭。直至2004年上村村民自发募捐，东莞、增城、香港、潮汕等地亲朋、信众踊跃捐助，集资200多万元，新建一座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的陈仙姑大庙。庙宇建筑精美，气势宏伟，每年在正月初二和正月二十三日进行大祭；焚香、舞狮、放鞭炮、抢彩炮等民间民俗活动非常热闹，以隆重纪念陈端和的恩德，弘扬救死扶伤、舍己为人的高尚精神。

公明镇古迹

公明镇除了陈仙姑庙宇外，还在距离水贝村不远的长圳村有座著名的石室

古迹和玉律村汤泉。

《宝安县志》载有："石室，位于公明镇长圳村附近的大眼山北麓山窝正中。为一天然石室，上面盖一大块砂岩，下有墙基遗存。清嘉庆《新安县志》载：'长圳石室，在长镇村山岭上。有石艇石塔，傍有仙人足迹，有大石香炉，前有石洞仙泉，秋冬不竭。上有神像，人祈祷即应。明万历丙辰鼎建长丰庵，崇祯癸酉知县邬文明重修文昌阁、佛阁。其八景：石洞禅宫、云梯天阁、石塌风云、松台月照、仙人遗迹、先朝遗刹、普渡仙航、菖蒲石涧，皆绝胜云。'旧志长镇即今长圳也。"

长圳村往东几里路有座阿婆髻山，山附近有个玉律村。玉律村古称玉勒村。清嘉庆《新安县志》："汤井，在玉勒村治，温煖如汤，能疗疮疾，秋冬泉有烟气，海防周希曜命砌以石。"

命将"汤井砌以石"的周希曜是谁？《新安县志·宦迹略》云："周希曜，字道升，江南旌德人，由举人崇正十三年知县。事留心民瘼，励志、育材、修练、储备，诸事整理井井有条，其详陈民瘼等事，皆切中时弊，如复鱼、盐以苏上著，平物价以恤行户，并仓储以革陋规，禁投献以绝掳诈，皆善政也。见邑中登科甲者寥寥，以东门外之旧学基坐文冈，而朝杯渡局势宏敞不悭经，始之劳鼎，建学宫，爰是英贤辈出，后人皆受赐云。"



上世纪 70 年代玉律温泉（何煌友　摄）

看来几百年前曾任过广州府海防的周知县是名好官，连离县衙七八十里远的汤泉砌石"小事"都管到。话还是说回玉律汤井，《宝安县志》有载："玉律温泉位于公明镇玉律村前的稻田中。泉口距玉律村仅 200 米。泉眼最高温度达摄氏 67.3 度，每天出水 680 吨，水中含铝、镁、钙等 25 种矿物质。该温泉又称玉勒温泉、汤泉、汤井。20 世纪 80 年代，辟石岩湖温泉度假村，引玉律温泉至度假村。"

我的老家，距离公明玉律村温泉仅三四里路，小时候放暑假去山上打"松果"，把松树的果壳摘回来，交给学校统一上缴县林业局，来年绿化播种用，常常经过玉律村。特别是每年夏收和秋收两个农忙季节，学校组织小学生去玉律村稻田拾谷穗。玉律温泉就在稻田中间，我们趁机洗洗温泉，所以，听说去玉律村拾谷穗，个个小孩子都非常高兴。

玉律温泉由几十条花岗石围砌成长方形的汤池，面积约40来平方米，水面几乎与稻田的水持平，池水清澈见底，一米深左右，没有稻田淤泥气味；近泉眼的几处，烫得放不下脚，要是谁放进几个鸡蛋，不消大半个钟就会被“烫熟”。汤泉周围十几亩田的水，也是“温热温热”的，那时没有人发现和炒作“温泉稻米”这一招商业概念，不然肯定会大发一笔。由于是大热天，没瓦盖遮挡，上晒下蒸，所以泡温泉的人不是很多。到了春冬季节，方圆百里的人过来浴洗，也许是周围空空荡荡，没遮没拦，没有更衣室，不方便，因此来的人也屈指可数。即便来了大多数都是男人，偶尔来三两个女人，都是穿着大襟衫、长裤子裹着身子来泡浸一下，走的时候，被异样的眼神看得很不自在，似乎在说：这几个女人，如果不是得了妇科病，就是有皮肤病……

到了改革开放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敢为天下先的特区人，点子多，动作快，深圳市旅游局首先在玉律村旁边的石岩水库大坝侧，建设“石岩湖温泉度假村”，引玉律温泉过来。当时除广州国营从化温泉宾馆外，开创了国内利用温泉历史资源，结合旅游对外经营服务的先河，一时吸引了大批港澳同胞和内地商贾人士前来休闲度假。石岩湖温泉度假村，成为当年红极一时的深圳“五湖”（石岩湖、西丽湖、香蜜湖、银湖、东湖）“四海”（海上世界、大梅沙、小梅沙、溪涌）度假村旅游景点。后来，深圳其他地方不断开发创新旅游新区，这“五湖四海”风光了10多年，其中石岩湖等好几个旅游点，慢慢地暗淡下来。

古人万万想不到他们说了一句“砌汤井石”的话，竟成为历史文物遗址；陈仙姑舍身为人的举动，她的精神也成为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见，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正逢前古未有的黄金时候矣。

古代中国，由皇帝敕封的天后宫仅三座，一是天津，二为泉州，三便是赤湾。赤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明朝廷曾颁昭文：“凡朝廷使臣出使东南各国，经过赤湾时必定停船祭祀。”明屈大均《广东新语》云：“今粤人出入，率不乏祀海神……其祠在新安赤湾、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数峰，壁立为案，海上一大观也。凡济者必祷，谓之辞沙，以祠在沙上故云。”《新安县志》载明朝天顺八年，翰林院学士判广州府事黄谏先生所作《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一文曰：“赤湾南山下，凡使外国者，具太牢（太牢即供奉的牛、羊、猪三牲，笔者注）祭于海岸沙上，故谓辞沙太牢。去肉留皮，以草实之，祭毕沉于海。”据考，这种“辞沙”祭祀为全国罕见。

“天后宫辞沙”与赤湾

郑和远航“辞沙”还愿

南山区赤湾的“天后宫”我去过多次，特别是在1960年暑假时学校组织去赤湾海滩野营，辉煌的九十九个门的天后宫，刚刚拆卸了木材和琉璃瓦（听说因为当时建设深圳水库及展览馆材料需要），被搞得残墙断壁、面目全非；无法运走的巨大石柱，横七竖八地丢弃在瓦砾荒草丛中，挺像北京圆明园被毁遗址，让人油然顿生的丝丝伤感，那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民间说，天后宫“辞沙”的活动比这个更早，1950年土改“破四旧”中就被破除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辞沙”这个新鲜的词。

后来，读《新安县志》里记载明朝天顺八年（1464年），翰林院学士判广州府事黄谏先生所作《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一文，对赤湾天后宫的“辞沙”庆典活动，有了进一步了解。该文云：“天妃行祠，海滨地皆有，而东莞则有二。一在县四百余里赤湾南山下，凡使外国者，具太牢（按太牢即供奉的牛、羊、猪三牲）祭于海岸沙上，故谓辞沙太牢。去肉留皮，以草实之，祭毕沉于海。永乐年初，中贵张公源使暹罗国（今泰

国），先祀天妃，得吉兆，然后辞沙。天妃旧有庙，公（即张源）复建殿宇于旧庙东南。岁久岿然尚存。去年冬，兵科给事中王公汝霖，行人刘公泰，有占城（今越南）之行，泊州庙下，于神是祷，往返无虞，出钱二万缗，托东莞吴知县于后建正殿四楹，易前殿为享堂……”

这则记载，说钦差大臣、太监张源奉明成祖朱棣之命，在永乐八年（1410年）出使泰国，将庞大的船舰队泊在赤湾港内，远航前，他率领从官将士，在天妃庙内焚香膜拜，举行隆重的辞沙典礼，择得吉日后才扬帆远去。后来他平安归国，就归功于神佑，便在天后旧庙旁边的东南面大兴土木，建筑壮丽华严的天妃庙殿宇。

比张源早5年下西洋经过赤湾港的著名航海家郑和，在赤湾海域曾遇风险，亦求祷于天后。根据《敕封天后志》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钦差大臣郑和等往暹罗国，至广州大星洋遭风，舟将覆，舟工请祷于天妃。和祝曰：‘和奉命出使外邦，忽遭风涛危险，身固不足惜，恐无以报天子。军士生命，息于呼吸，望神妃救之。’郑和祝毕，俄闻喧然鼓吹声，一阵香风飒飒飘来，宛见天妃立于桅端。自此风恬浪静，往返无虞。归朝复命，奏上，奉旨遣官整理祠庙。”

大星洋，就是今天的赤湾附近海域。当年郑和许下大愿，若天后娘娘保佑他渡过这次劫难，便在此地修建天下最大的一座天后宫。

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在奉旨委派张源修建好的赤湾天后宫立下《天妃灵应之记》的碑文，碑文详尽记述了天妃灵应故事和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与经过。《天后志》还生动地记录了郑和在今深圳市南山赤湾海域遇险、天妃救郑和的故事。

在中国，由皇帝敕封的天后宫仅有三座，一是天津，二是泉州，三便是赤湾。赤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明代朝廷曾颁下昭文：凡朝廷使臣出使东南各国，经过赤湾时必定停船祭祀。

天后宫在小南山脚下的海滩上，拜祭的船舶多、人员多，因此就在宽阔的沙滩上搭棚设坛。在沙滩上辞谢神佑，还愿承诺，久而久之形成了大型的“辞沙”祭典习俗。

赤湾“辞沙”盛况空前

《新安县志》载：“赤湾由南山落脉，两翼盘护天后宫殿在焉，前临海，洪涛万顷，一望无际，伶仃数峰，壁立海中，相峙如案，天后神甚灵应，凡船经此，必祷祀之。”

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云：“今粤人出入，率不乏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闻者，祀二

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翻云，祝，大也。融，明也。南海为太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开炎天，故曰祝融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门，东溯汤谷，朝暾初出，辄见楼殿浮浮，如贝阙鲛宫，随潮下上。每当天地晦冥，鲸去鳌掷，飓风起乎四方，雾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号，皆愿少缓须臾之死以请于祝融。其声未干，忽已天日晴朗，飘行万里，如过衽席。而天妃神灵尤异，凡渡海卒遇怪风，哀号天妃，辄有一大鸟来止帆樯，少焉红光荧荧，绕舟数匝，花芬酷烈，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济，又必候验船灯，灯红则神降，青则否。其祠在新安赤湾，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数峰，壁立为案，海上一大观也。凡济者必祷，谓之辞沙，以祠在沙上故云。”

15世纪初，大明王朝是一个海外贸易和海上交通十分发达的国家，与东南亚各国通商频繁，使节往来密切，从赤湾出使外洋的官员和到外海捕捞的渔民们，把自己海上航行的安危寄托在赤湾天后的庇佑之下，经过500多年沿袭的“辞沙”习俗，每年在农历三月十三开始，至三月二十三日举行10天盛典。曾在天后庙供职多年的蔡光福老人(1905年生)回忆道：方圆几百里人称赤湾天后庙为大庙。到天后诞当日，香港九龙、澳门、香山、东莞、惠阳、海丰沿海渔船渔民和东南亚诸国华人数十万人参加，整个港湾数以万计船只旗幡招展，锣鼓喧天，甚是热闹，这种空前盛况的情景直至解放前夕。

过去“辞沙”前几天，在天后宫周围搭起竹棚，临时设立商铺销售香烛和食品；主祭人在祭祀当天指挥各地送来的“太牢”供品，抬至大殿祭天妃，然后移至沙滩，舞狮、唱戏、武术表演、杂耍……成百成千艘停泊在港的船只炮仗齐鸣，威震长空。

1995年赤湾天后宫重光后，由于填海原因，这一习俗由沙滩转移到宫庙举行，亦有数万人参加，“辞沙”的习俗仍原汁原味。活动时间是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举行。

活动开始前，先来200多位妈祖信众，在大殿和祭坛上摆设水果、糕点、牛奶等供品，在油灯放置灯草和添油，然后在天后宫院内的建筑物屋檐下、房屋过道、厅堂等处寻找睡觉的地方。

傍晚，他们先是在山门平台上用竹片搭好人形架子，然后用纸糊了一个4米高的巨型“鬼王”，这“鬼王”右手执令箭，左手托“善恶分明”令牌，腰系大鼓，同时还用纸扎糊了一个类似关公的神像。晚上，他们在大殿举行一个“鬼王”和神像“上位”的拜祭仪式。

次日，大批信众来了，魔男（当地人称做法事的道士为魔男）来了，武术队、舞狮队也来了……大约8点，8位魔男身着道士长袍，敲锣击鼓，吹奏唢呐，诵经念文，在大殿内1000多的信众叩首祭拜，祈祷天后娘娘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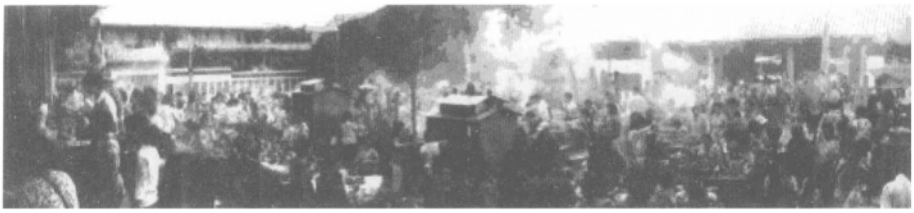


赤湾天后庙

佑他们。信众按领头魔男指挥，下跪、起身，人群就像海浪般起伏，蔚为壮观。许多乡人在拜祭中，把带来家人的一捆衣物，也高举祭拜，因为穿上拜祭天后娘娘的衣服，也能保佑家人出入平安，身体健康。祭拜结束后，人们便围在大院广场上，观看舞狮和武术表演，这是传统的表演项目。也有信众们自己玩的各种“节目”，其中一位“高人”手执一把燃烧的香火，放入嘴中，烟从鼻子里冒出，香从嘴里拿出来仍燃烧着，但竟然安然无事，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彩。

第三天晚上，大家把4米高的“鬼王”抬到沙滩上燃烧，在燃烧前，大家争先恐后去撕“鬼王”腰上挂着的纸鼓，据说带上这纸片可祛邪，瞬间，“鬼王”的纸鼓被大家哄抢一空。接着魔男点燃“鬼王”，嘴里喃喃念着咒人语，大家把纸钱和大米撒向大海，祈望来年合家消灾祛病，好运连连。

第四天，祭祀活动临近结束，8点整举行大祭拜仪式，大家给天后娘娘下跪叩首，锣鼓震天，唢呐声回荡大殿，活动达到高潮。这些天来大家都吃斋，祭祀活动结束的中午则是吃荤了。仪式结束后，一只狮子在锣鼓声中腾空而起，随即用嘴轻轻舐着放在案台上的所有供品，以示吉祥。魔男则抱着两个纸箱，一个是装着红花白花，一个是用来装钱，他们到供品放置的案台旁，逐个分发红花白花，据说白花代表添男，红花代表添女。当魔男将红花白花放到信徒供品或衣服的围兜里时，信徒都要合掌致谢和派利是，但不拘多少，自然那箱子很快就装满了钱。



"辞沙"香火鼎盛，场面热闹

最后，一张红纸写满着参加这次祭祀活动中的人员名单，放在那个像关公的纸糊的人物手里抱着，然后由道士点燃，随着一缕缕的青烟，将把信众的芳名和愿望一起带给了天后娘娘……

赤湾天后宫祭拜马祖规模之大（20 万人参与），影响之广（珠三角、港澳及东南亚），而且用太牢（猪、牛、羊去肉填草，拜祭完沉没海中）在沙滩上祭祀的特色，为全国少有。所以在 2007 年相继被列入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赤湾海港 地位赫然

我有幸三次到福建莆田市湄洲岛上观看妈祖庙和妈祖诞祭拜大典，也到过天津、泉州、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瞻拜妈祖庙。常常被妈祖——林默娘的撼天动地的事迹感动过。

妈祖是老百姓心中的女神，称为天上圣母；宋朝年间被皇帝昭封为天妃、天后。妈祖真人姓林，名默娘，生于宋代开国元年三月廿三日，相传出生时异于常人，引来满室红光，弥漫异香，至满月时仍未闻半句啼声，故称为"默娘"。林默娘一生济世助人、拯救遇险船只无数，她廿九岁那年，在一次狂风大浪中为救人而英勇献身，在乡间湄洲峰升天。历朝人们把她当做海神纪念，后成为生活万能之神膜拜。

清康熙《新安县志》里《重修赤湾天妃庙记》云："天妃之神自宋至我朝，累锡封号，广之有庙建。"明万历十四年任知县孙观海在《重修赤湾天后庙引》中颂诵天后："粤稽典礼，御灾捍患有功于民则祀仰，唯天后尊神，覆盖江海，奠安生民，随地效灵代天布济人利物之功，莫可殚述，是以历代崇封建庙设祀，我朝晋加徽号。刺封护国庇民，灵佑显著，宏仁普济群生，教主太后元君，春秋致祭著为令典而新安赤湾。"

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世界上有近 2 亿人信奉天后，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天后宫（台湾有 1600 万人信奉天后）。2004 年成立了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为会长的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赤湾天后宫在全世界 5000 多座天后宫中被选为 47 个常务理事之一。

赤湾天后宫为什么会有如此重要之地位？

首先为地理位置重要。“赤湾地滨大海，左控罗浮、梧桐之胜，右瞰虎门、龙穴之险。其地秀杰，其神灵异。凡出使外国与占城今越南、爪哇、真腊、三佛齐诸国入贡，悉经于此。宋宣和间给事中高允迪使高丽，使暹罗，乃于此立庙，赤湾之有天后庙自此始也。”

其次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站。“天后庙为省会蕃篱之地，扼外洋要害之冲，护卫虎门、澳门以作保障，汇东北诸海以为归宿，外而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番舶来埠，莫不经由于此，然后就岸望海，若而朝宗荷慈航之普渡，功施丕著，中外蒙庥。往岁盗贼披猖蔓延，滨海郡邑制府百都督童秉钺，南来命师剿捕，维时驻辖赤湾，舟船成市，车骑如流，官弁稽首祷祀于后，将事之日，乘风克敌，转舵登陴，士无伤残，民无瘴厉，守御三年，皆各安堵如故。惟神助顺，惟帝庸功。”（以上均录自《新安县志》）

上述两则史料我们不难发现，赤湾是南中国海的门户，地理位置险要，是广州、虎门之屏障；自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是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海港码头。史书记载，明永乐元年（1403 年），著名的三宝大监郑和八下西洋之前，他率副帅张源从江苏太仓出发，经福建长乐、泉州、厦门、广东南澳、汕尾、赤湾、海南独猪山（今万宁县东南之大洲岛），到暹罗国。这是一次摸底探路之旅，并不担负外交使命，主要调查海岛山形、水文资料、风土人情，积累航海经验，为马上要展开的远航做足准备。第二年，郑和回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造船工程。



赤湾天后庙牌坊

永乐三年（1405 年），郑和第一次率庞大的武装贸易船队从江苏太仓县的刘家港出发。这次远航共有大船 62 艘，每艘长 44 丈，宽 18 丈，载士兵、工匠和各式人等 27500 人，浩浩荡荡驶往南中国海。经赤湾海域遇险祷祀，得天后相救，续航至占城，遍历南洋群岛诸国。返回南京后向朱棣皇帝奏上，说天后娘娘是海上神灵，赤湾是天然避风港，不仅离广州近，还可以颁令当地官府予以补充“粮草”（其时广州及珠江口已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通道）。经御准在旧庙的东南角建起了 99 道门，占 900 亩的天后宫，践约“天下第一天后庙”诺言，方便所有下西洋的使臣到赤湾停泊，举行盛大的“辞沙”祭典，祈求天后娘娘保佑平安返航。郑和第八次是宣德六年 1431 年出发，船队经过福建长乐县南山寺。那里有一个远近驰名的天后庙，郑和在此祭祀后再起程。

可见，赤湾港在明代的地位，与江苏太仓县的刘家港、福建长乐县的马尾港同等重要。到了清代，它仍然是珠江口外一个大型港口，“凡出使外国，与占城、爪哇、真腊、三佛齐诸国入贡，常经于此。”

数百年沧桑，赤湾天后庙宇也经历莫大的变化。鸦片战争时期，赤湾和毗邻的虎门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新安县志》：“康熙年间……大屿山鸡翼角炮台、南头炮台、赤湾左右炮台最为险要”），赤湾的左右炮台，扼守伶仃洋，在林则徐、关天培、大鹏水师赖恩爵等爱国将领指挥下，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展开了多次激烈的海战，赤湾古老的海港和天后宫屡遭炮火蹂躏，渐渐失去昔日繁华景象。全国解放后，我人民海军某部进驻已经凋零的天后庙，扼守南国大门珠江口。后来，经过土改破“四旧”，1960年深圳水库“建设需要”，天后庙的黄瓦绿檐、雕梁画栋不见了，大门楼前的月池、石桥、牌坊和“圣水井”等胜景已经无从寻觅，天后菩萨也“飞天涉海”去了。



天后神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实施，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响，赤湾已建成现代化的大港口，天后庙也在1995年重建，500多年鼎盛的香火又续上，富有地方特色每年拜祭天后的“辞沙”庆典活动，又恢复起来，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真善美、助人忘己、慈悲救世的妈祖文化又传承下来了，并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团结海内外华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沙井万丰村（古称万家朗），素有迎神赛会演戏的民间习俗；每逢村里祭祀、喜庆、宗族活动，演粤剧大戏，是每年必备的庆贺节目。据潘氏族谱载，早在元代潘氏四世祖潘礼敬、后至明代潘樨、清代的潘耀扬、民国时期的潘有声、解放后的潘荣耀等，都在粤剧界小有名气。一个小小的村庄和一个姓氏，历朝历代都出粤剧名伶，据说在全省少有。

深圳也流行粤剧

具有600多年历史的“粤剧村”

粤剧姓粤，由粤语演唱，是我国有名的八大剧种之一。

深圳人爱看粤剧，也喜欢哼上一首半首粤曲。准确地说，是深圳讲粤语的罗湖、福田、南头、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光明、平湖和大鹏地区的人喜爱粤剧；与粤语村镇相近的客家地方，比如石岩、观澜、布吉、盐田、沙头角等地，也接受粤剧；重大节庆和醮诞祭祀活动，也会像讲粤语的村镇一样，包三两场粤剧开锣演唱，个别人也会哼唱一两段《搜书院》《穆桂英》《帝女花》之类的粤曲。至于龙华、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坑梓、葵涌等客家地方，因为讲粤语往往“听唔道”，所以少请粤剧演出，更少人会唱。后来粤剧演出有了字幕，这些客家村镇也看粤剧了。当然，比不上粤语地区的粤剧迷，看传统剧目，剧情、人物、情节都看得烂熟，仍然如痴如醉地合着台上锣鼓、音乐和戏中人物唱腔，击拍和唱。

追溯起深圳人喜欢粤曲粤剧，当属于有600多年历史的沙井万丰村。有据可查的，最早始于元代新安县沙井万家朗（今为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的潘氏四

世祖潘礼敬，后至明代潘楫、清代的潘耀扬、民国时期的潘有声、解放后的潘荣耀等，一个小小的村庄和一个姓氏，历朝历代都出粤剧名伶，不能不说在全省实属罕见。

潘礼敬，号乐静，生于元至正三年(1343 年)，自幼颖悟过人，好学上进，熟读万卷，尤通音律。每每酒酣兴发，常击节吟唱。“倚声度曲，有绕梁之音，听者欢然。”(清咸丰四年《故处士乐静公墓志铭》)

潘礼敬的第五代孙、九世祖潘楫，是个专门研究音乐之人。潘楫，号钟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 年)。他倾毕生心血研究音乐，著有《律吕图说》，有“铎振珠涯”之声誉。时中奉大夫承宣布政使游应乾，对此书评价极高，亲为作序——《律吕图说序》，并赞誉写道：“有真见，可以破千古不决之疑，可以索千古不传之绪。”



粤剧节开幕式(李明辉　摄)

潘耀扬，为清代边疆重臣，官至两广提督，咸丰年间，授三品游击将军。晚年致仕归里，在万家朗村“将军第”(今万丰村仁爱路)之侧，修建了一幢专为唱戏用的“八音楼”，四时召请戏班前来演戏，听粤曲，赏曲艺，娱乐身心。自此，传统的戏曲唱本和音乐，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万丰人，使万丰村潘氏家族男女老幼酷爱粤曲粤剧。万丰村浓郁的粤曲氛围，也影响周边村落对粤剧的传统性爱好。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万丰村又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粤剧演员潘有声。潘有声是万丰三村潘太福之第三子，生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原名潘有成，是万丰潘氏二十二代传人。因家贫困，出生后送给本村人抚养，不久随养父潘永辉移居香港。童年时代就显示出其演艺天才，读了两年书便去学艺，并改艺名为潘有声。潘有声 7 岁时就以“神童”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10 多岁与黄金爱搭档，在香港的“普庆”、“高升”两间大戏院的舞台上扮演女童，13 岁曾与广东粤剧名家新马师曾同台演出，受到观众的关注。

1949 年潘有声随剧团到广州演出，声情并茂，享誉羊城，顿时名声鹊起。后来他曾在多部粤剧中担任主角，并拍成电影，风行国内外，并随团远涉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演出，誉满梨坛。

万丰村历有迎神赛会演戏的民间习俗。每逢村里祭祀、喜庆、宗族活

动，都与演戏相结合，请戏班成为每年必备的庆贺节目。村里的民间艺人和粤剧爱好者，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因此，万丰村的粤剧艺术，经久不衰而流传下来，成为名符其实的“粤剧村”。

1998 年 9 月，应文化部的邀请，万丰粤剧团自己创编的粤剧《大潮》，进京向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汇报演出，受到李瑞环、李铁映、罗干、王光英和吴阶平等领导亲切接见并给予高度评价，李瑞环还亲自给颁发“讴歌改革开放”的奖牌。2001 年该团创作演出粤剧小品《一件羊皮褂》获国家文化部第 11 届“群星奖”金奖。大型粤剧《风雨茅洲河》获第 10 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2004 年万丰村被广东省文化厅命名为“广东省民间艺术（粤剧）之乡”。2007 年 1 月万丰村粤剧被列入深圳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曲折起伏的深圳“粤剧路”

据史载，广东粤剧于明朝中叶开始萌芽，嘉靖至万历年间，吸收流入广东的海盐、江西弋阳腔、江浙昆腔、北方梆子等诸唱腔，同时融合广东本地流行的南音、龙舟、木鱼、粤讴、咸水歌等民间曲调以及广东器乐乐曲，经过三四百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广东化了的、以演唱梆黄为主体的剧种；直至清末民初，逐渐演变为汇集南北、中外唱腔音乐，以广州话演唱的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地方戏剧——粤剧。

粤剧不同于外省戏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属于中国写意派戏剧范畴，又具有轻快流畅、新款善变的个性，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把粤剧与中国最古老的昆剧相提并论，赞誉道：“昆曲是江南的兰花，粤剧是南国的红豆。”从此，“南国红豆”成为粤剧的美称。

粤剧不但深受广东人喜爱，而且受到广西人民和港澳台同胞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粤籍华侨的喜欢，是中国最先走向世界的剧种。

粤剧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鼎盛时期，除了演出传统剧目外，还不断增加新编剧目，创新唱腔曲调多元化，造就了一大批以唱腔著称的名家和流派。具有代表性的是被为称粤剧的“五大流派、四大名旦”。五大流派是有“万能老倌”美誉的薛觉先开创的韵味流长的“薛腔”；名丑马师曾开创的“马腔”，即“乞儿喉”；被称为“小生王”的白驹荣开创的“白腔”；丑生廖侠怀开创的“廖腔”以及“金牌小武”桂名扬开创的“桂腔”。四大名旦是当时誉满省港澳的上海妹、谭兰卿、谭玉兰、卫少芳。



古粤曲戏台



经典粤剧《柳毅传书》



粤剧《驼哥的旗》

粤剧，还吸收各地剧种做功和北派的武打，博采众长，使粤剧表演艺术更加丰富多彩，更臻成熟。在舞台美术、场景布景上又进行了革新，引入声、光、电、化等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增加粤剧的魅力，为粤语地区和族群的千家万户所钟爱。红线女是粤剧界杰出代表，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舞形歌声、独树一帜。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盛誉。她从10多岁在澳门首次登台以来，唱红了珠江两岸，唱红了整个岭南，唱红了港澳和东南亚。1957年以《荔枝颂》一曲荣获匈牙利世界青年联欢节一等奖。她与马师曾创作了《搜书院》《关汉卿》等优秀剧目，培养出一大批粤剧后起之秀，被誉为“国宝级”艺术家。毛泽东主席称她为“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旧时，老一辈深圳人看粤剧大戏曾经是唯一的娱乐方式。名角、名曲、名段一直在粤剧迷之间流传。特别是新春佳节或重大民间庆典活动，早早就搭好戏棚，请来戏班子演它四五场，连看几个晚上，过足戏瘾。深圳有自己的戏班子(剧团)，也有当地人喜欢的当红演员。我记得建国初期，宝安县就有了宝隆粤剧团，由粤剧花旦伍超群任团长，是归属宝安县政府领导的民间职业剧团。该团5年来坚持巡回宝安、东莞、惠阳等地农村，为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农民兄弟演出。

到了合作化的1956年成立万方红粤剧团，梅兰香、何湘子任正副团长。主要演员有梅雪艳、陈志超、廖少文、冯文成、朱子汉等。梅兰香、何湘子在深圳粤剧界中比较出名，我小时候在乡下看粤剧，凡是何湘子出场的

票价要加5分钱。别看只有5分钱，那时看一场戏要花3角(后座)至5角(前座)钱，属高消费了。五年后该团在1960年解散。

1960年，成立宝安青年粤剧团。霍锦全任团长，陈棉新任副团长，曾文炳任政治辅导员。主要演员有霍锦全、陈志超、朱子汉、梁金郎、梁剑华、彭洁冰、梁佩卿、苏小妹，后来又调入何湘子、红光光（吴宝琼）等。该团演员年轻，阵容雄厚，在惠阳、东莞、宝安和佛山等地深受群众欢迎。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在石岩圩镇看陈志超和彭洁冰演出粤剧《刘三姐》，连看两场不够瘾，还独自走了14公里的路程，追着剧团到公明又连看两场，要知道我那年才是十来岁的少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粤剧团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首当其冲受到批判，长期处于半瘫痪状态，1970年5月被撤销，大部分演员被下放农村和分配到砖厂、酒厂、糖厂、农机厂等基层企业劳动。

1974年3月，宝安县文化宣传部门组建宝安县粤剧队。黄志瑞任队长，曾文炳、郑继锋任副队长，梁德先任导演。主要演员有陈志超、梁卓文、王展超、冯刚毅、吴琼玉、朱丽莲、廖依曼、项颂萍、王丽琼和危佩仪等。冯刚毅属于好运气的那种演员，1963年他在宝安县青年粤剧团当学徒学，勤学苦练，慢慢地崭露小生角色特长，被“压担子”，成功塑造过贾宝玉的经典形象。“文化大革命”他有幸留在县粤剧队中，被起用演大型粤剧《沙家浜》主角，和著名文武生陈志超分别担任郭建光AB角色。这样，他的演艺生涯十几年从未停顿过，直到1976年粤剧队改为宝安县粤剧团担任主角。其间，我有个为粤剧团创作大型粤剧的小插曲。1974年初我被派到附城公社莲塘村深入生活创作，了解了边防军民的一系列动人故事后，写了五万字的一个反特电影剧本《边防枪声》，受邀到上海影制片厂学习和修改剧本半年；返深后，1975年和曾文炳合作，创作演出七场粤剧《边防线上》，次年参加广东省文艺调演，获创作和演出优秀奖，同时被国内60多个剧团移植演出，1977年第一期省作协《作品》杂志破例全剧刊载。

1979年3月，在原宝安县粤剧团的基础上，组建深圳市粤剧团，这是深圳市第一个专业戏曲表演团体。这时冯刚毅已成为主要演员，担纲演出《鸳鸯泪洒莫愁湖》，唱腔艺术也形成自己的风格，表演艺术也日臻成熟和细腻。1979年，这出戏在广州连演20多场，场场爆满。冯刚毅一举成名。第一次夺得中国戏曲梅花奖。然而冯刚毅并不满足演《血溅鸳鸯剑》《情僧偷到潇湘馆》《阴阳怨》《何真归明》的传统戏剧，他开始尝试现代粤剧《风雪夜归人》《情系中英街》和著名的《驼哥的旗》等现代粤剧的演出，结果好评不断，其中《驼哥的旗》囊括了中国戏剧节的编剧、导演、演出优秀奖，成为国家重点剧目工程推荐项目。他是深圳唯一的一名两次摘取国家戏剧界表演艺术最高奖项——“梅花奖”的著名演员。大家都把这一荣誉称为“二度梅”。2007年央视新春戏曲晚

会，就邀请了冯刚毅出演《风雪夜归人》的经典片段。

深圳毗邻香港，与省港粤剧交流频繁，多次受邀赴省、京汇报演出和出访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演出。

2003 年 8 月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从 2008 年以后，政府将对粤剧团这个事业单位撤掉每年 500 万元经费，以采购剧目的形成，向粤剧团“购买”演出场次和剧目，这意味着粤剧团将完全走向市场，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吃惯了几十年“皇粮”，一旦“断奶”，难免心慌慌。但是，在全国推行文化体制改革的今天，还期望“吃皇粮”，肯定是死路一条；靠自己找米下锅，深圳粤剧能否再度辉煌？文化官员、文化专家和粤剧迷正在拭目以待。

新娱乐时代的民间“粤曲潮”

深圳是个新兴的移民城市，在普通话占绝对强势语言的都市里，仍顽强地聚居着一个粤语的人群；尽管“蹦迪”、交谊舞和卡拉 OK 风头未过，网络游戏、电影大片、动漫卡通闪亮登场，保龄球、高尔夫、登山游时尚方兴，但他们仍然执着数百年的艺术——看粤剧、唱粤曲。

粤剧折子戏《杨门女将》、《怒劈华山》、《牡丹亭》、《薛仁贵征西》等耳熟能详的粤曲唱段，让这些“粤剧迷”百唱不厌。中老年人爱唱，连 10 来岁的学生也唱得有板有眼。如果说历代粤剧大师把舞台演唱官话改唱为广州白话、把小生唱假嗓高腔改为唱平腔、把西洋乐器引进伴奏等等，使少数人欣赏的“曲高和寡”走向大众，那么，今天粤剧粤曲和卡拉 OK 相结合，使古老的粤曲“大踏步”走进市民娱乐中间。近年罗湖区、南山区、宝安区民间自发涌现出数百个基层粤剧社团，出现了“粤剧大家演、粤曲大家唱”的局面。深圳市有关文化部门因势利导，成立各种粤剧粤曲学会，开展常设的“粤曲大赛”、“粤曲大家乐舞台”和开办“小小粤曲班”，让粤剧“从小抓起”。南山区每年举办“粤剧艺术周”，罗湖区连续几年都举办“粤剧节”，2007 年 11 月升格为深圳(罗湖)首届“粤剧节”，一连四天吸引了来自英、法、瑞士、丹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广州、深圳等地近 40 多个粤剧社团 800 多人汇集鹏城，交流演出。宝安区利用各种艺术节，举办粤曲卡拉 OK 大赛，使民间粤剧社团办得红红火火，他们每年过年在社区演出，还到珠三角地区交流联欢。在传统戏剧受到文化多元化的冲击，许多剧种面临越来越不景气的时候，粤剧在深圳仍有可观的观众群体，特别是越到基层，越到民间，粤剧的观众越多。

同时与深圳“粤曲潮”相辉映的，还有一河之隔的香港戏迷们，每天从香港过关到深圳的消费群体中，有 1000 多人专门来“唱戏”，购物休闲，

过过“粤曲戏瘾”。

因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在罗湖口岸旁边的罗湖商业城、港城商贸大楼、口岸交通楼、华侨大厦等处，聚集63家粤剧曲艺社团，全市达98家，为香港粤剧“发烧友”配乐、伴奏、录制和拍摄VCD。据了解，香港戏迷在香港唱一首粤曲花费400多元，价格昂贵；而在深圳伴奏乐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演出不景气的粤剧团，具有专业水准，收费却低廉。这些曲艺社有“头架”（首席）高胡、扬琴、二胡、琵琶、笛子、低胡、小提琴、大提琴和萨克斯等乐器，有音响设备和录音摄录器材，还有粤剧师傅指导，一个人唱，“豪华阵容”伴奏，专业演出也不过如此待遇，足令香港发烧友过足戏瘾。如果说是4小时的包场伴奏，一般收费在1000元至1300元左右，如按曲子散唱，则按每分钟6至10元的标准收费，录音灌制碟是免费的。曲艺社营业一般从中午1时到晚上10时平均每家每天接待10多名客人，光罗湖口岸一年接待发烧友数十万人，加上借助粤剧培训所带动的戏剧服装制作、化妆摄影、餐饮服务、美容洗脚、旅游购物等行业消费，一年的营业额超过1亿元。



梅花奖两度获得者冯刚毅演出《风雪夜归人》（李明辉 摄）

潜藏于民间那古老的粤剧热情，在时尚的年代转化出一种商机，这令创始粤剧的古人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鹏山歌是该地区用“大鹏话”口头传唱的民歌。“大鹏话”当地人称为“千音”，又叫“大鹏军语”。“千音”是指古代大鹏军事所城有一千二百多户军人，一千多个籍贯，一千多个口音。大鹏山歌在几百年演变中，受周边港澳、广府和惠阳、深圳客家语言的影响，它吸收了除北方方言之外，更多的是广府话和客家话等外来音调，融合本土曲调，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山歌品种。

大鹏千音山歌

我听过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和广东的许多山歌，但听到深圳大鹏千音山歌却与以上山歌很不相同。所有山歌都是以客家话演唱的民间歌谣，而大鹏山歌，却以客家不像客家、粤语不像粤语、北方话不像北方话的“混合汉语”传唱，风格很是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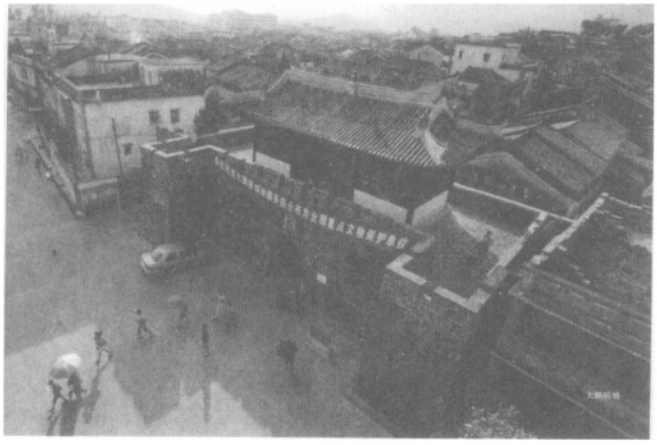
独特的“千音”山歌

大鹏山歌是该地区用“大鹏话”口头传唱的民歌。流传于大鹏街道王母、鹏城、下沙、布新、水头、岭澳、水贝、叠福、大鹏等9个村落社区和南澳街道（南澳以前隶属大鹏）一带，形成了一个有近10万人口讲“大鹏军语”的大鹏山歌民俗文化圈。

“大鹏话”，当地人称为“千音”，又叫“大鹏军语”。“千音”是指古代“大鹏所城”有一千二百多户军人，一千多个籍贯，一千多个口音。

小小的大鹏所城为什么会出现“千音”呢？据说，这“千音”的大鹏话和大鹏山歌的形成与明代大鹏所城建立有关。据清康熙《新安县志》记

载，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为防倭寇、防海盗，朝廷准奏在大鹏修建“守御千户所”军事城池，“分筑墩台，屯种荒田，且耕且守，以备倭寇”。600多年前的大鹏，处在穷山恶岭的“荒蛮之地”。从南头县城去大鹏，“高山峻岭如弁鸟鹰三转，大小梅沙尖、九顿岭等处轿马难走，必步行越，横涌海港无渡，伺潮退以涉，无大风雨四日可至，遇有风雨，高山难越，海潮难沓不退，路期不定”（清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志》）。建立起来的大鹏所城，屯耕的军队和“军户家属共有二三千人”，兵士多半都是从广东、福建沿海招募来的，以讲粤语和客家话等为主，而军官则基本上都是从朝廷派下来的北方人，官兵之间语言难于沟通。来自天南地北的官兵们，在一处偌大封闭的军营堡垒中，内部慢慢形成当时的“普通话”。在古文献中，这种独特的军营专用语话系统，被称为“军语”或“军话”，用现代语言学术语讲，就是这里形成了一个“军语方言岛”。（摘自纪志龙主编，《大鹏镇·大鹏话》，天地人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有600多年历史的大鹏古城鸟瞰

清代著名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之大端也。”

“千音”山歌并不是唱出千种音调，也不是有千种唱法，而是用“千人口音”的大鹏话演唱。古代大鹏御所军士在长期的练兵打仗、屯田耕种中，产生号子和原生态音乐。特别是随着不断补充进来的外地兵员，由于熟悉大鹏地方的需要，就产生“地名歌”，“问答歌”，一方面帮助外地兵了解当地环境，另一方面也让兵营枯燥的生活增添文化娱乐的情趣；随着军队将士打仗阵亡或营防中婚姻嫁娶，也就形成“哭丧歌”和“哭嫁歌”等有特色的民歌。再经数百年演变，民间就流传下如今的大鹏山歌。

古城育出地名歌、哭嫁歌和哭丧歌

大鹏山歌与岭南渔歌、咸水歌和山歌同源，并用带客家、粤语、北方话混合口音来演唱。它既不像高山峻岭的客家山歌那样高亢嘹亮，也不像沿海咸水歌那样低吟缠绵，它平实委婉，易唱易传。

2006年9月，我和深圳市文化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到大鹏街道作大鹏山歌调查采风。世居大鹏的戴坚平老人（女，1930年生）说：她从小就受到爷爷、奶奶的影响，2岁就开始学儿歌，3岁开始学唱山歌，5岁放牛就在山上和人对山歌。戴坚平老人说，她的爷爷（名戴种，1861年生）比她奶奶（名欧阳戴氏，1877年生）大16岁，爷爷奶奶年轻时就是经常在山歌对唱中，互生爱慕，结为夫妻的。戴坚平唱的大鹏山歌原汁原味，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戴坚平老人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嗓音出色，会唱许多山歌，12岁(1944年)被我地方抗日武装部队破格吸收，参加了东江纵队政工队，学文化，打游击，开始了近70年的宣传文艺生涯。如今虽是古稀之年，但她对大鹏山歌及过去对歌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是较全面掌握大鹏山歌种类的传承人。



大鹏古城

1921年在大鹏出生的叶水亮老奶奶，从小喜欢唱大鹏山歌，年轻时被公认为“大鹏山歌后”。她的嗓音洪亮，能即兴编词，即兴演唱，在大鹏的很多民间的对歌擂台赛中都有突出表现。现虽已86岁高龄，山歌还能随口而出，看到什么就能唱什么，想到什么就能唱什么，地名歌、咸水歌、问答歌都能随口唱出。

参加采风座谈的还有欧进兴(1940年出生)老山歌手，他8岁放牛时就向大人学会唱山歌，年轻时被公认为“大鹏山歌王”。他嗓音好，能即兴编词，即兴演唱多种山歌，他有点文化，善于改编大鹏古老的山歌，把文言文、深奥冷辟的山歌句子变得通俗易懂，老少皆能传唱。

大鹏山歌从曲调形式上分有地名歌、问答歌、哭嫁歌、哭丧歌、仙歌5种；从表现内容上分有劳动歌、爱情歌、掌牛歌和生活歌4种；从演唱方法上分有独唱、男女对唱、群唱和尾驳尾斗唱5种；从修辞和句式上分有比

喻、起兴、赋体、叠字和双关语 5 种，句式结构多数七言四句、五言二句和五言一句的散板。

用大鹏军语来唱山歌，整个深圳地区唯大鹏地区独有。据说，中国古代边疆、沿海地区有过 28 个军事守御千户所屯田军人，也有过部分“军语方言岛”，但是几百年世道沧桑，这些“军语方言岛”几乎消失殆尽，而大鹏“军语方言岛”却侥幸保存下来，演变成独特的大鹏话。所以有专家认为大鹏山歌是明清民歌的遗存。

具有大鹏地域特色的地名歌，主要唱大鹏的地名，诙谐而有情趣，往往一首歌能唱出大鹏十几个地名来，主要适用大鹏所城招募来的兵士“外来移民”记住地方名，方便于生产，同时让人在地名中找到乐趣，自娱自乐。地名歌四句一首，有时偶尔会出现一字二音、三音，第二句和第四句有较长的拖腔，衬词多是“啊、呀”为主，没有重复句。地名歌曲调平实有趣，诙谐易唱，往往一首歌能唱出大鹏十几个地名来。例如：“上洞夹下洞，土洋行过是葵涌，叠福下沙王母洞，龙歧对面水头涌。”“沙岗格田有芽山，东西两涌系海湾，狗追黄猄大岭下，风吹霞雾半天云。”这首地名歌歌词里的“上洞、下洞、土洋、葵涌、叠福、下沙、王母洞、龙歧、水头涌、芽山、东涌、西涌、半天云”等都是大鹏（葵涌以前隶属大鹏）的地名，唱多了不仅熟记地名，同时也生发了对这山乡的热爱。



采访大鹏山歌手

问答歌，唱词鬼马滑稽，曲调却十分活泼风趣。主要在山间放牛、田间劳作、打柴割草、或小船出海打鱼，男女相遇问答对歌。以前大鹏还有个习俗，新人结婚的时候，男女双方都事先召集一群人，类似今天男方去女方家接新娘，要“智过”女方姐妹们设下的九道大关，才能进到新娘家把新娘接走一样，在新娘家门口或村口双方对歌比输赢。有的对歌问答持续一天一夜，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听歌。对唱（问答）和轮唱，一对一问或三五成群答唱。问答歌基本上是一字一音，有时偶尔会出现一字二音、三音，四句中第二句和第四句有较长的拖腔，比较规整，都是四句一首。例如：唱问：“乜也（即什么，下同）上岭尾拖拖？乜也石上晒绫罗？乜也着出花衫领？乜也唱出海南歌？”

答唱："铺狗（即狐狸）上岭尾拖拖，鹧鸪石上晒绫罗，斑鸠着出花衫领，画眉唱出海南歌。"唱问："乜也过水脚唔湿？乜人上树树唔摇？乜也造起倒吊屋？乜也架起半天桥？"答唱："神仙过水脚唔湿，蚁公上树树唔摇。黄蜂造起倒吊屋，蜘蛛架起半天桥。"

哭嫁歌，主要是姑娘出嫁时所唱的歌。大鹏地区习俗，新娘出嫁前7天，不能见未婚夫，也不能出家门，待在闺女房间由同村好姊妹（未婚青年）陪伴7天，当地俗称"伴坐娇"，这7天里出嫁女做些针线绣花细活，因为不出门，养得肥白娇嫩准备过门。村里有人来探望，或看新娘，出嫁女要唱哭歌，但一点也不悲伤，唱词全是对父母、兄弟姐妹和好友感恩、感谢的话，唱得多了，出嫁女没词时，"伴坐娇"要轮着启发提供唱词。歌词、曲调只有一个乐句，一字一音，接下来一个哭句即"哑哈"（切分音）。尾句一个高八度唱"噫"。例如：爹娘好啊——哑哈，噫……对我有恩情哟——哑哈，噫……一生报不尽哩——哑哈，噫……来生补你情啦——哑哈，噫……我嫁咗人后——哑哈，噫……会孝敬公婆哇——哑哈，噫……旋律依次反复。

哭丧歌，主要是为死去的家中老人守夜时所唱的歌。古时家里的亲人去世了，一般守夜二至七天，在挑拣吉时吉日下葬前，家人守夜，多是妇女人哭唱，男人哭泣。有人为了尽孝，又不会唱，就花钱请人唱。旋律低沉悠长，凄凄切切。唱的内容都是反映死者老人生前的各种仁义德行、为人处事善行善报等。由于守夜时间长，唱的时间长，随口编的词易上口，也生活化，长期下来形成有歌册唱本，可惜文革被毁。现据戴坚平老人忆唱数句："鸡叫早，三更响，黄鳝提笼甚惨伤，南斗过河北斗亮，北国朝阳还有一更长……"

情趣盎然的爱情歌、牵牛歌和仙歌

仙歌，在宝安其他客家地区为仙婆、仙姑问神卜唱的山歌，在大鹏即为一般歌手唱的叙事歌，可说可唱，夹叙夹议。山歌手多在农闲时节，村人树下纳凉，抑或下雨天下不了地，三五知己聊天休闲时，用大鹏话和快板式的曲调清唱。唱的题材和内容多为叙述古今、当代的名人、名事，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脍炙人口的人物故事等。像85岁的叶水亮阿婆，一口气能唱40多首仙歌。其中"梁祝故事"唱道："我唔上高山唔见天，唔知今日太平年，今下辛劳时运转，打马回朝中状元。状元并非侥幸中，三年苦读寒中窗。人间都说有情缘，你话有缘又无缘，担个书笼去出门，英台遇上山泊兄，一路同行去读书，同桌同房是君子，何为君子你不知，同睡三年各盖被，各人面向各人蘸（蘸墙壁）……

爱情歌，唱词一般四句，也有五句格式；没有规定不变的曲谱，多是根据唱词字句音调清唱。题材可以唱物、唱情、唱景或借事借物暗喻等。一

群年青的男女在山上劳作，利用休闲片刻，各占有利地形，一问一答，妙趣横生。起歌首句多以“妹又好”、“哥又好”为起子对歌，部分村庄亦以“姑妹”、“兄哥”为起子（类似渔歌、咸水歌起句）。情歌多以男女恋情为主要题材，渔家人常以大海、鱼、虾作为比兴和借喻。例如：在山上放牛的小伙儿看见对面山坡的阿妹漂亮美丽，随口唱出：“远远睇妹隔条坑，昨晚听闻亚妹好歌声，你放马过来开金口，一条歌仔我一条还”。如：“哥远睇妹身着蓝，行前睇妹驮女或驮男，驮男返归打颈练，驮女返归打耳环。哥远睇妹身着乌，行前睇妹有丈夫，若无丈夫嫁我好，等我裙仔染蓝衫染乌。”又如：“细细同妹掌过牛，折支油柑插妹头，今日听闻妹去嫁，阿哥在家眼泪流。”表达青梅竹马的阿妹就要出嫁，阿哥心中伤感万分的情景。

劳动歌，大鹏劳动山歌常见有唱农事节令山歌，从正月唱到十二月，每个节令农时耕作口诀、谚语由山歌演唱传承农事技术。也有一首《忆孟姜》从正月唱到十二月，每个月农历时节忆孟姜女，这首山歌较特别，四句式七言，但第一句均为五言，如：“正月是新年，橙柑桔果摆神前，橙柑桔果摆神前，一对鸳鸯摆两边。二月是白花，白花开架满楼台，担梯去望涯（我）英仔，一双飞去两双回。三月是清明，见家见户拜山坟，有仔（子）坟头贴白纸，留一粒被孟姜来……”

掌牛歌，掌牛哥多数在山边唱，音调较哭嫁歌、哭丧歌、仙歌等高，音域也较广，拖音由情绪决定拖音长短。如：“掌牛阿哥好凄凉，戴顶笠麻也无框，食入几多笠麻水，淋湿几多烂衣裳……”

生活歌，日常生活随口入歌来，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充满农村生活情趣和山歌手的智慧；歌词比喻、双关、起兴、叠字运用自如：“歌仔好唱起头难，胡椒好食种唔（不）生，丝线拿来打帽挽，结球容易解球难。”又如：“大路堂堂打酒糠，阿妹为何爱姓张，阿妹姓张哥姓简，‘涧’水流来被妹装。”

大鹏山歌在几百年演变中，受周边港澳、广府和惠阳、深圳客家语言的影响，掺杂了除北方方言之外、更多的是广府话和客家话的成分。大鹏山歌它吸收了外来音调，融合本土曲调，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山歌品种。然而，由于会唱大鹏山歌的歌手年岁已高，后继乏人，加上大鹏语言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当地人讲普通话，外地人听不懂大鹏话，再过十年八年，大鹏千音山歌濒临消亡。

大鹏所城是“大鹏守御千户所城”的简称，而“鹏城”，则是“大鹏所城”的简称，也是深圳的别称，是深圳人的源。大鹏千音山歌历史悠久，加紧挖掘、整理和保护，无论对大鹏还是对深圳历史变化、人文环境变迁、民俗研究，都会有一定的价值。

深圳有咸水歌，因为松岗、沙井、福永、西乡、南头等地属珠江三角洲沙田和河涌水网地区。咸水歌用粤语或“基围话”或“疍家话”传唱的民歌。清康熙《新安县志》载：“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疍户，即猺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疍家人地位卑微，一叶扁舟飘荡在河海上，非常孤独烦闷，他们在长年的劳动中，禁不住从心里随意哼唱曲调，纾解情绪；后来发现对面有船来，就用歌曲问候，用歌声对答，慢慢发展成对唱互驳、斗歌竞唱的一种地域性的民间音乐。也许他们行船、捕鱼、种田都是在咸水地方，所以他们唱的渔歌就叫咸水歌，有的地方也叫“白话渔歌”。

深圳咸水歌与盲佬歌

深圳也有咸水歌

深圳有咸水歌，因为它属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松岗、沙井、福永、西乡、南头大片沙田和河涌水网。咸水歌主要流行于广东中山、珠海、番禺、南海、东莞、宝安等沿海河涌与沙田地区，用粤语或“基围话”或“疍家话”传唱的民歌。

深圳当地人把沿海滩涂围垦的农田称作“基围田”；旧时每年冬末春初，基围田受咸潮影响，俗称咸田地带。因为基围人讲的粤语中，带有浓重的土话，所以称之为基围话。

“疍家话”，是当地人称水上居民讲粤语中的一种分支方言。深圳的水上居民旧时有两种，一种是在河涌、浅海打鱼的渔民，一种是在内河或沿海跑运输的船民；从语言上分，讲疍家话的是疍家佬，讲闽潮话的是“鹤佬”；“鹤佬”实际上是带闽南口音的福建渔民，广东人听福建的“福”字念成“鹤”，“福佬”就说成“鹤佬”了。鹤佬船较长而扁，疍家的船则船身高而短。在无机电动力，又无风扬帆时，疍家船用摇橹行船，鹤

佬船则多用桨。鹤佬船最明显的特征是在船头用漆油画上一双大眼，故称为“大眼鸡”。蜑家船的船尾一般写上“顺风得利”，船后因为住上一家大小，船仓内分设睡房和厨房，所以住宅船仓牢固结实，日晒不着，风雨不侵。这样，蜑家妇女多数皮肤白皙，与鹤佬女人一比就分别出来。

鹤佬船多数在沙头角、盐田、葵涌、大鹏、南澳沿海一带打鱼或搞运输，但不唱咸水歌，唱闽南音的“鹤佬歌”。唱咸水歌的是从南澳至香港离岛、深圳湾的渔民村、渔农村、南头、西乡、福永、沙井、松岗一带或渔或农或运输的水乡居民。

据传咸水歌已有300年的历史。清康熙《新安县志》载：“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蜑户，即猺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粤民视蜑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促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

蜑家人地位卑微，一叶扁舟飘荡在河海上，非常孤独烦闷，他们在长年的劳动中，禁不住从心里随意哼唱曲调，纾解情绪，见什么唱什么，编什么唱什么，随字求腔，自娱自乐；后来发现对面有船来，就用歌曲问候，用歌声对答，慢慢发展成对唱互驳、斗歌竞唱的一种地域性的民间音乐。也许他们行船、捕鱼、种田都是在咸水地方，所以他们唱的渔歌就叫咸水歌，有的地方叫“白话渔歌”。

传统的咸水歌，内容非常广泛，渔民生活、沙田景色、劳动情绪、丰收喜悦、人生劝世、红白喜事、谈情说爱，甚至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曲，也用咸水歌来唱。流行的咸水歌以情歌为主，表现了岭南水乡人民向往美好的生活，反映了珠江三角洲民众的生活特色和时代特征。

咸水歌最大的特点，是用当地方言歌唱，传统的唱法是每段歌词为两句，分上下句结构，每句有五言、七言或字数较多的自由句，一般同段（上下句）同韵，换节可以转韵。

咸水歌的音乐结构有长句，短句两种形式，各有不同的音调和拉腔，而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通常是由上句和下句组成，也就是单乐段体，这种单乐段体多数用在独唱或是问答式的对唱曲中；也有由四个乐句组成的复乐段体；有时，因为歌头、衬词，或者是叙事的需要，会把乐段扩充或延长，从而构成不拘一格的自由体，如“长句咸水歌”，或是叙事形式的长歌，但其结构基本上还是保持在四句为一乐段的复乐段体。衬词用“啊咧”、“啊”，衬句多用“妹好啊咧”、“弟好啊咧”。首句歌词唱完用“兄哥”拖腔，第二句歌词答唱完用“姑妹”拖腔结尾。比如1961年初，我们南头中学文工团创编演出的《咸水谣》节目时，一群男女戴着渔民帽载歌载舞出场，在撑船中唱短句式的，只唱上下两句问答对唱。女唱道：

“嗰（哪）边船上系边个（哪位）呢？兄哥……。”

男唱道：“船头企（站）着你意中人啊哩，姑妹……”

舞蹈圆场后，女唱：“要问出（明）年粮多少呢？兄哥……”。

男唱：“今春肥泥作称砣啊哩，姑妹……”故事缠绵，曲调悠扬。特别是“啊哩，姑妹，兄哥……”的衬句，装饰音唱得真情动人，使我40多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咸水歌又称咸水叹、叹哥兄、叹姑妹，唱起来有低吟浅唱，自问自诉地低声抒情，不像山歌那样隔山对唱，激越高腔。



河湾小艇上的蜑民喜爱唱咸水歌

长句咸水歌，带叙事性的，比如《宝安县志·文化篇》记载的《咸水歌》：（每句唱词都唱衬句，或按词唱装饰音和滑音。）

“（妹呀好啊咧），凄苦呀，好苦凄（好你妹呀罗嗨呀）。

（有情阿哥哩），凄凉唔敢讲人知（啊咧，姑妹）；

（妹呀好啊咧），日里凄凉还过得（好你妹呀罗嗨呀），

（有情阿哥哩），夜里凄凉揽张被（啊咧，姑妹）。

（妹呀好啊咧），十九夜月八分光（好你妹呀罗嗨呀），

（有情阿哥哩），七姐下凡恋六郎（啊咧，姑妹）；



渔民一边打鱼一边唱咸水歌

（妹呀好啊哩），五更四次打三点（好你妹呀罗嗨呀），

（有情阿哥哩），二人同睡一张床（啊咧，姑妹）。

（妹呀好啊哩），你爱断情就断情（好你妹呀罗嗨呀），

（有情阿哥哩），手拿算盘算分明（啊咧，姑妹）；

（妹呀好啊咧），身上衣衫我作价（好你妹呀罗嗨呀），

（有情阿哥哩），手揽孩儿系我人（啊咧，姑妹）。

（妹呀好啊咧），毫子唔当花边（银元）重（好你妹呀罗嗨呀），

（有情阿哥哩），扇扇唔当起南风（啊咧，姑妹）；

（妹呀好啊咧），擎伞唔当云遮日（好你妹呀罗嗨呀），

（有情阿哥哩），丈夫唔当野老公（啊咧，姑妹）。”

咸水歌的节奏，来自水上居民的日常生活。水上居民长年出门要划船，下田、打鱼及回家又离不开船，因为水会打在船身上而使船开始摇晃；所以，咸水歌也是在摇摆或划桨的基本节奏上组成的，以纯五声音阶“54123”的“徵”调式。有时出现的“7”是色彩音，不影响音阶形态。音乐节奏自由多变，常用2/4与3/4混合拍子交替出现，使曲调显得明亮。演唱时常常以正规节奏为主，以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交替使用，又因语言和感情的需要，出现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从而使不正规节奏在对置上起着变化，给人以优美、流畅的感受。

咸水歌的旋律，是以第一、二乐句为基本形态作旋律发展，除了歌头、中间的停顿和歌尾基本固定外，中间的旋律都是围绕主音以二度级进、上行或下行、加花音或减花音来表现；乐句中间的旋律构成多数是“因字落腔”，服从于语言声调的高低，处理比较机动灵活。因此，同是一个唱腔的“咸水歌”，第一段词的旋律和第二段词的旋律就会有所不同，只是它的歌头、歌尾或拖腔不变，这就形成了“咸水歌”随字而唱的民歌特点。



东莞宝安一带流传下来的盲佬歌（木鱼歌）唱本

咸水歌，除了单个自唱、两船对唱外，还发展到几个妇女小合唱，众青年齐唱，以显示一种力量。再后来在庆典活动、婚丧嫁娶中也唱咸水歌。解放后，一些沙田的基围村子为联络感情，逐渐形成了一种对歌酬答的习俗。有实力的村多半在农忙之前或收获之后，搭起歌台，进行比赛；中秋节时，还把船摇至江心，连成“中秋咸水歌擂台”，河水岸边，小艇连泊，基围路上挤满了人，构成一幅独特的沙田水乡景色。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到西乡的三围村、翻身村、劳动村、自由村、安乐村，沙井和平村、福永等沙田地区以及罗湖的渔民村、蛇口渔业一村，听过咸水歌。“文化大革命”期间，咸水歌被中断了10多年，后来渔村环境改变，渔（农）民生活习惯的发生了变化，会唱咸水歌的人已经不多，年轻人基本上都不会唱。两年前，我和罗湖百仕达社区的老年旅游团到开平、江门旅游。旅途中，在巴士上有一位五六十岁的阿婆团友表演节目，她唱了几首咸水歌，原汁原味，让我顿时惊叹一番，只可惜同车上旅游团的朋友大部分来自北方的“移民”，听不明白咸水歌方言唱的是什么。我想，回深圳后找她好好采访录音，谁

知道她中途在虎门下了车，去她女儿家带外孙了，一直没在深圳等着，至今无不遗憾。

松岗、公明盲佬歌就是木鱼歌

深圳的前身新安县，虽然东晋时设置县，但到了唐、宋、元三个朝代几百年间却属东莞县，明万历元年才从东莞析出，恢复新安县治。因此，许多民间习俗与东莞相同。尤其在靠近东莞县的深圳松岗、公明和光明街道的村子，不仅语言带东莞口音、饮食习惯与东莞相近，连唱木鱼歌也跟东莞一样在民间流行。

木鱼歌，又称摸鱼歌或沐浴歌，由广州木鱼歌演变衍生而成的方言歌，属弹词，可阅可唱。唱时多用三弦伴奏，因此又名弹三弦、三弦歌。民间多用小锣鼓，或竹板或敲击一段刳空的硬质木头来掌握节拍演唱。敲竹板如敲木鱼，故名木鱼歌。东莞和宝安一带木鱼歌多是盲人所唱，故俗称为盲佬歌。

木鱼歌，一般认为起源于南朝时期，受佛教宝卷传唱的影响下，结合地方民歌而逐渐形成，早期的作品有《目莲救母》《观音出世》等。“木鱼歌”是广东民间方言歌，松岗、公明的木鱼歌是用类似东莞话的地方语言吟唱。演唱形式简单、活泼，腔调和节奏洒脱自由，悠扬悦耳。唱词基本是七字句，通俗易懂。

木鱼歌的内容大都是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如《仁贵征东》《白蛇雷峰塔》、《金丝蝴蝶》《背解红罗》等，也有《禅院追鸾》《陈姑追舟》等杂锦散曲。东莞文史档案部门现有可查的约有几百部木鱼书，大部分是长篇作品，改编之作也为数不少。《花笺记》和《二荷花史》是木鱼书创作作品中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而《背解红罗》则是改编之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花笺记》写书生梁亦伦与杨瑶仙、刘玉卿两个女子间的爱情故事，全书共五十九回，文笔细腻生动，富有诗意。郑振铎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写“少男少女的恋爱心理，反复相思，牵肠挂肚，极为深刻、细腻”。《二荷花史》共分四卷六十七则，写少年书生白莲与何映荷、裴丽荷两女子历经磨难而终成眷属的故事。作品颇有浪漫色彩，在何映荷、裴丽荷对爱情的忠贞而执著的追求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礼教精神。《背解红罗》又名《背解红罗袱》，由鼓词改编，共十二卷，写汉武帝与皇后苏金定、苗妃之间的恩怨故事，情节曲折，颇能引人入胜。木鱼书也有一些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如《金山客自叹》《华工诉恨》就是反映1905年反对美国欺压华工生活的作品，有较高的现实政治意义。

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有记载：“东莞岁朝，贸食妪所唱歌

头曲尾者，曰汤水歌。寻常男女所唱多用瞽记，其辞至数千言，有雅有俗，有贞有淫，随主人所命唱之。”又云：“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唱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盖太族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

“瞽”古称盲人。摸鱼歌“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旧时松岗、公明、沙井甚至石岩浪心村的粤语乡民，在岁晚农闲时分，或夏日休闲黄昏，聚在村里小巷、祠堂或村头榕树下，大家一起凑钱，请外地木鱼师傅来演唱，抑或会唱木鱼的妇人，也邀众姐妹一起自娱自乐。她们多数从晚饭后开始，大约唱一两个时辰，十点后收场。由于木鱼歌歌词浅白，故事情节耳熟能详，不需要有多少文化知识便能听懂，因此很受村人喜欢，成为当年民间抒发情怀和道德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

每到木鱼演唱时间，狭窄深长的古巷，传来“笃、笃、笃”的木鱼敲击和伴着悠扬的歌声，忠贞报国的杨门女将、缠绵悱恻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因果报应的观世音等故事，在长篇木鱼歌连唱中，深深吸引听众，唱到痴情动人和哀怨处，妇人不禁潸然泪下。在那个年头，农村文化设施奇缺，农民文化生活贫乏，加上妇女被禁锢在封建的生活环境中，唱大戏、听木鱼歌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

木鱼歌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传统的木鱼歌蕴涵着贞忠爱国、行侠仗义、救世助人和真善美的优秀民族精神，对构建农村的和谐社会有一定的作用。解放初期，一些盲人凭唱木鱼书的本事谋生，或利用木鱼歌动人的曲调和浅白易懂的演唱形式，走街串巷，唱木鱼，卖甘榄，很博同情，一时生意不错，也使木鱼歌唱遍街头巷尾，流传城乡。

1965年宝安县农村文艺轻骑队，曾将“盲佬歌”(木鱼歌)形式和旋律，改编成计划生育题材的节目，由二胡、扬琴、笛子伴奏，演员在台上边弹三弦、敲击木鱼，边说边唱，想不到大受深圳西片乡镇粤语观众的欢迎。

后来，木鱼歌在文化大革命后一直中断，加上农村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内容冗长、曲调单一，古老的木鱼歌谣现在已经难觅一见，木鱼歌手也难以寻访，这种濒危景况，不能不令人扼腕唏嘘。

清嘉庆《新安县志·风俗》云："嫁娶重门地，至贫不与贱者为婚……婚姻必以槟榔、蒌叶、茶果之属曰过礼，不亲迎，昏夕即庙见。嫁女不以妆奁相誇耀，犹尚糖梅亲友造新婚家索饮，曰打糖梅，其家速客曰梅酌。"何曰"打糖梅"？屈大均《广东新语》曰："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深圳本地人(俗称广府人，含香港新界)、有"派礼饼"的习俗，"派礼饼"总数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论担计"。一般娶"心抱"不派礼饼，嫁女的一方才"派礼饼"的。所以街坊、朋友、同事收到结婚礼饼，就知道送礼饼者是嫁女而不是娶儿媳妇。

深圳新旧婚俗

深圳自古居有广府（粤语）、客家、潮州三大民系，其婚俗和祖国汉族的许多地方差不多，但也有它的特点；就算是深圳本地区域，这三个方言、习俗不同的民系，它的婚俗也有所区别。盐田、南澳等沿海的疍家婚俗，2007 年 1 月还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哩。

深圳的新旧婚俗，离不开《礼记·昏义》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这么几个婚嫁环节。纳采就是初步商定婚姻意向，问名是问女子的姓名，纳言是卜算婚姻是否吉祥，纳征就是收受聘礼，请期是定婚嫁的日子，最后，男方到女方家迎娶新娘。后人虽然对"六礼"的名称多有并省和改易，但内容未变，全过程中又增加了不少琐碎的细节。纵观历朝的历代婚嫁，其不外乎："说媒、相亲、过礼、择吉、迎娶、拜堂、喜宴、闹洞房、回门"这九项，至今仍大体延续，只不过为适应现代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现代人删繁就简些罢了。

“相睇”与“拣心舅”

在古时传统婚姻中，从订婚到结婚必须请媒人搭桥，只有通过“媒妁之言”，婚姻才能合乎礼教和道德。“媒”古为“谋”的意思，“妁”是“酌”的含义，媒妁即斟酌说合。一方面，古人说：“父母者，人之根本也”，子女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另一方面乡人尊敬传统而守礼教，妇女不惯外出抛头露面，尤其是一般村女闺秀，对男性不敢正视，他乡男性亦不敢过村游荡。倘若不守乡规，惹来皮肉之痛，男女距离颇大，虽为青梅竹马，也受鸿沟之隔。这样，媒妁奔走男女双方之间牵线搭桥，“媒人婆”就应运而生。

当地“媒人婆”有纯粹介绍和职业介绍两种。纯粹介绍者，多属朋友亲戚之辈，不图金钱，对男女某一方认识较深，言谈介绍较客观正确，正所谓有碗话碗，有碟话碟，男家贫富及该男子之品行，女子是否身躯端正，有无缺陷，不敢半点花言巧语，比较容易得到双方信任。另一种为职业性媒人婆，俗称“自古媒婆无真话，十句言来九句假。”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笑话：相传有一家穷人只有一块三升谷种的稻田，而田中又有九块大石，兼有间破屋；媒人婆到女家则吹嘘成是富人家，说拥有九石三升种良田，豪光灿烂的大屋（屋漏夜见星星）。定亲后上门一看，才知道受骗。与另一则“也冒（无）田，也冒地”用广州方言说成有“廿亩田，廿亩地”蒙骗女子上当的笑话一样。



迎亲队伍敲锣打鼓、礼乐齐鸣

经媒人婆牵线游说，如果双方家长同意，便约定时间和地点“相睇”（相亲）。广府人习惯叫相睇，客家人习惯叫“拣心舅”。相睇未来女婿，女家多是由父亲出面，相睇未来“新抱”（儿媳），男家多由母亲同往，这样相亲也较为方便。广府人多数假座茶楼，约齐阿娘、阿嫂、阿婶、叔婆等亲友，对对方问些家庭情况、会哪些犁耙耕种、能否斩柴割草及料理家头细务等等，“帮眼”目测对方相貌、言语举止是否“合眼缘”。客家人约定相会，如果男方到女家会见，叫“拣心舅（未来媳妇）”，如果女方到男家会见，叫“拣婿郎”。很多时候男方进门之后，女方父母先给男青年倒杯热茶，男青年看中了姑娘，就把这杯茶一

饮而尽。然后姑娘的父母同姑娘一起商量，如同意结亲，就留男方和媒人吃饭；不同意就任男方告辞回家，有的父母甚至还托媒人婆将男方带来的见面礼带走。

有的客家地方“拣心舅”时，还有男子要送一个“红包”给女子的习俗，谓之“面花钱”。如果双方合适“发展”须婚配时，女方写好女子出生年月日时辰的“年庚”，由媒人婆送至男方。男方父母接到“年庚”把它放进“米缸”压放7天（有的放三朝时间）。如在7天内，自己家中没有发生不顺意事件，女方年庚即被接受，从米缸取出，连同男子“年庚”一并交由算命先生对“生辰八字”，占卜“夹不夹”，如占卜认为双方命运不会相克，即可择吉成婚。我村里一位朋友曾经让被介绍的女子来看，进门不久，暖水壶无缘无故破裂，开水流了一地，老人一看，这婚事自然是告吹了。

“落订”与“送礼饼”

清嘉庆《新安县志·风俗》云：“嫁娶重门地，至贫不与贱者为婚……婚姻必以槟榔、蒌叶、茶果之属曰过礼，不亲迎，昏夕即庙见。嫁女不以妆奁相誇耀，犹尚糖梅亲友造新婚家索饮，曰打糖梅，其家速客曰梅酌。”何曰“打糖梅”？屈大均《广东新语》云：“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

确定亲事后，就要“过礼”，也称聘礼，通常在迎娶前一百天或两个月给女家送去，也叫“放大定”。聘礼在定婚仪式中占有重要位置，人们历来重视。只要女家收下财礼，即使没有写婚约证书，人们也会认为婚事已定。过什么礼，过多少礼，各个时代、各处乡例都不一样，一般以当地当时标准为基础上下略有浮动。如果过于节俭，就会受到人们的耻笑，有时还会导致婚事告吹。古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聘礼和嫁妆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清代本邑县志里说过礼用槟榔、蒌叶、茶果之类，这是取吉祥之意，看来礼物不在乎数量多，价值高，但要好意头，也要投其所好，切忌触犯对方父母的禁忌。然而，也有不少乡镇人家习惯付定金，以防被另一家“定走”。“相睇”时一见钟情送“面花钱”，也属定金之一。“落定”之后，逢年过节，男方要送礼物给女方，直到结婚为止。送定金，还把定金和子女的出生年月日，再次正式用红纸写上，面交或由媒人婆送去，对方收到聘礼和年庚，也要把自己子女年庚正式用红纸抄写让媒人婆带回。如今，不用媒人的，子女自由恋爱，确定亲事后，则由男方父母亲自上门提亲，商定婚期和婚宴事宜，并随后送去烧金猪、鸡鸭、蚝豉、海参、酒、糖果等。聘金方面几百、几千元甚至几万不等。女方父母收到聘金，从中抽回一千或一百给回男方父

母，以取定金尾数为“九”，图谐音长长久久。

深圳本地人（俗称广府人，含香港新界），有“派礼饼”的习俗，“派礼饼”总数不是几个几十个，而是“论担计”。一般娶“心抱”不派礼饼，嫁女的一方才“派礼饼”的。所以街坊、朋友、同事收到结婚礼饼，就知道送礼饼者是嫁女而不是娶儿媳妇。而女方的礼饼钱由男方出，预先由女方家算算有多少亲戚朋友和街坊，每个亲朋派几个（或一盒包装的老婆饼、核桃酥、蛋圈、蛋糕等），几百位亲朋就需要好几千个礼饼，如此数量需要提前到饼铺定做。如今各人住址分散，不可能一家家去送，改为送礼饼券，或女家在邀请亲朋参加婚宴的请柬里夹送礼饼券，由客人随时到指定的饼店领取。

择吉迎亲与“智娶”



新人向长辈斟茶

结婚乃人生大事，选择什么季节、吉日、时辰举行婚礼，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古代人还有认为秋冬为婚嫁佳期，《孔子家语》亦有“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农耕时代人们主要考虑秋收为农闲后季节，经济又比春种时宽裕，加上天气适宜，多数选择秋冬春三季节完婚，也有“自腊月二十四至除夕，民间纷纷嫁娶，云诸神朝天，百无禁忌”。却很少在夏季。当然，奉子成婚的例外。旧时有种“借吉”的风俗，也就是“热孝婚”或“居丧婚”，即在家中有父母垂危之际希望看到儿女完成终生大事，死后也能含笑九泉。或家中有人逝世办丧事时或居丧服孝期间举办婚事。或利用婚姻大喜来冲疾病凶厄之忧的“冲喜”，促使家人或未婚夫婿转危为安。

择了吉年之后，还要择月、择日、择时。因为人们认为婚姻结合是“天作之合”，所以结婚的日期与时辰应该顺应天时才会有好结果。其实在民间，许多人笃信“坐床喜”，希望新婚之夕能让妻子怀孕，所以最好避开女子的“例假日”，否则，新郎在新婚那几天万一“撞红”，招至“房事病”。

据说古代嫁娶多在晚上，唐宋以后民间风俗逐渐演变，迎娶和举行婚礼一般都在黎明日出前后，最迟不能超过中午 12 点钟。深圳的广府人和客家人迎娶都在中午 12 点之前接到新娘，婚礼一般在下午和婚宴一起举行。不过，深圳的潮籍人还沿袭半夜三四点迎娶，俗称为“夜嫁”。

新娘在出嫁的前日，要请一位好命的至亲叔婶伯姆去给她“掾寒毛”（掾即绞、拔的意思），也就是用两条棉线夹去面毛，修眼眉，谓之“开脸”。梳头之后就不能出门，也不能见未来新郎，由平时要好的几个姐妹陪伴做点针头细活。大鹏、龙岗、石岩、观澜一带的客家地区，出嫁女还唱“哭嫁山歌”，诉说父母养育之恩和嫁到夫家与公公婆婆相处的担忧等等。哭嫁的程序一般先由母女对哭、姑嫂对哭，后由陪嫁姐妹和邻居青年媳妇陪哭。哭者和陪哭者都拿着手绢坐在床上，两人一仰一俯地对哭，其他伙伴低声饮泣，陪哭一个接一个，直至新娘哭倦为止。等到上轿那天，有的地方习俗不能哭，要求新娘忍住，不然会“衰一世”。出嫁前的一夜要与母亲或叔婆伯姆同床睡觉，当夜婉转相教跟夫家的处世之道、和丈夫同房的性教育，特别叮嘱在同房时万一丈夫出现“暴脱症”，可咬丈夫的人中，或用发上银簪悄然在其尾脊椎猛扎一针，可使丈夫转危为安。

“新娘过门”那天，由于有时间限制，所以迎娶工作紧凑而不容混乱，大小事情全听从经验丰富的“大妗姐”安排。新娘要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漱洗、更衣、化妆。天一亮，10 多位伴娘来到新娘家，汇合陪新娘住了几天的姐妹，准备新郎的队伍前来迎亲。

广东民俗专家叶春生教授在《岭南风俗录》一书中，谈到深圳的婚俗：过去深圳的迎亲队伍，有 3 个人物是不可缺少的，担“合篮”（竹织的礼品盒）的迎嫁婆、能言善辩的大妗姐和男傧相，还有一班吹鼓手，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迎娶时间一般在上午，不能超过中午 12 点，否则不吉，晚上在男家宴客。

当迎亲的队伍到达女家时，新娘早被她的姐妹关在房里，不让新郎进去，她们提出许多条件来难为新郎。比如要在屋外草丛中找到新娘的一对鞋，找到后又要在屋前屋后找出新娘的新手帕。找到手帕，几度大门紧锁，每开一门锁要回答姐妹们的问题，答应如何善对新娘，还要新郎给红包利是。“过五关斩六将”后，进了女家，但仍然见不到新娘。新娘在闺房里，由伴娘“保护”着。这时，伴郎和大妗姐就与伴娘姐妹斗智，伴郎假装砸门抢亲，姐妹们紧张得顶住门闩，要求新郎给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的红包从门缝塞进来。新郎早留有一手，早先给的红包从几角、几元、几十元逐次“打通”，这最后一关肯定要“重磅出击”，经多次“讨价还价”，双方把条件折衷，新郎答应给姐妹们每人一个红包后，才让新郎进去接娶新人。姐妹们的“为难”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新娘中午 12 点钟前，必须出门，否则就误了大事。

过去深圳新娘的礼服很特别，黑衣黑裤的唐装大襟衫，还擎把黑雨伞，但黑伞上要系一根红丝带，表示千里姻缘一线牵，伞的繁体字由5个“人”字组成，兆意为“多子多孙、人丁兴旺”；黑衣内要衬一件白底衫，表示夫妇白头偕老。这件白衫三朝回门后就不能再穿了，要留到父母百年归天时作孝服。这一婚一老，一喜一悲，本是不相容的，但在民间却通称“红白喜事”。不过，这套打扮被现代人换成大红唐装和艳丽时尚的婚纱所代替，擎黑伞也改为大红伞了。

新娘烧香拜过祖先，出门后，双脚就不能着地，上轿（上车）都由迎嫁婆背着，并由伴娘打着伞遮挡，不管有无雨或太阳。新娘上了轿，即奏乐鸣放鞭炮，起轿发亲，途中不管道路多么难行，都不能下轿（下单车），中途下轿，就意味着婚姻半途而废。当然，新娘在起轿时，给轿夫塞个红包，以便一路上少颠轿，顺顺溜溜。有的乡俗为了避免中途新娘下轿小解，上轿前新娘要吃碗白果煮鸡蛋或吃猪小肚；同时嘱咐新娘中途遇到某些意外的不吉利之事，只需将一只龙眼捏破，便可避邪化吉。



娶新娘

新娘被迎进村后，男家鸣放几万响的炮仗、奏乐相迎。到了家门口，轿一停，男家请的年轻貌美的伴娘上前掀起轿帘，搀扶新娘下轿，傧相上前礼赞，宾客拥向新娘，抛撒红色和金色的纸花，新娘“披金戴银”进屋。新娘被簇拥进屋后，需用柚子叶煮温水洗手，因为民间相信柚子水除秽迎吉，深圳人又把柚子称为“和碌”，与“和睦”谐音，取个全家和睦的好兆头。接着，参拜天地和祖先，然后一对新人双双跪着向公爹家婆斟茶，公爹家婆饮了这杯“心抱茶”即送上利是，祝贺新人百年好合；按辈分向伯叔姆婶和至亲亲朋敬茶，饮了茶的亲人把带来的金银首饰戴在新娘身上，奉上利是，祝福新人早生贵子。

饮喜酒与“搅新娘”

结婚宴请宾客，深圳人称“饮喜酒”。摆喜酒有男家单独摆的叫“谦客”，女方单独摆的叫“于归”，男女双方一起摆的酒宴叫“联婚”。过去女方摆的酒宴钱由男家出。在乡村摆酒都是大盘大碗，除了给客人吃饱

外，还多煮一些让亲朋带回去，俗语叫“挟食”。

旧俗在婚宴仪式上有双礼及单礼之分。单礼者通常由一名礼生唱礼，一名执事协助。双礼则需礼生2人、执事2人主持仪式。一般礼生在婚礼宴开始时唱的第一声是“放炮”(点鞭炮)，继而唱“擂鼓三通”，随即有三声鼓响。第一声炮竹代表通知各方神灵；三声鼓响，代表三催三请；奏唢呐与横箫，则代表无任欢迎，及请各位神灵上座之意。在这里顺便多说一句，鞭炮不能省，也不能买次品，我有位朋友在70年代末结婚，好不容易走后门买了座3万响的“特价”炮仗，烧至一半“熄火”不响了，原来受了潮，虽然最后烧完，但很不吉利，结果20多年后，这位朋友遇到大灾难，家人后悔莫及。

如今多数婚宴在酒楼举办，司仪也请酒楼有经验的人士代劳。喜筵一般按主、客的尊卑长幼排定座位，排序位的原则是上尊下卑、右尊左卑，客人按其长幼和身份、地位从高到低排列座次。菜色为“八菜一汤”，红烧乳猪、凤筑爱巢 (油炸竽头鸟巢状盛鸡丁)及莲子百合糖水等讲意头的菜色，几十年不变。

《宝安县志》对婚嫁的礼仪习俗有作如下记载：“建国前，宝安县男女婚姻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沿习旧制，送女方生辰八字，相合则下聘金、聘礼(包括礼饼、金猪、酒席等)，择吉日迎娶等。据民国17年(1928年)调查，嫁娶仪式可分三等。上等：结婚皆用仪仗、鼓乐、花轿往女家迓迎，新郎家张灯结彩，铺张辉煌，亲友争相道贺，欢宴三日，结婚费用1400余元。嫁女，先一日运送厚奁、梳妆台、红漆柜、金银首饰、衣服等，次日新娘出阁，随从甚多，亲友争相送礼道贺，亦宴请欢聚。嫁女需妆奁费1000元、酒席300元。

“中等：亦用仪仗、鼓乐；花轿，迎新娘日亦陈设铺张，亲朋戚友前来道贺，欢宴一日或二日，但仪式略简，结婚费用700元。嫁女妆奁略减，约需400元，新娘出阁之日亦有随从和亲友送礼道贺，但仪式比上等减半，嫁女费用600元。

“下等：只用鼓乐、花轿，极为简单，所需300余元。嫁女亲友亦有馈赠，而妆奁除荆钗、布裙外则无别物，但亦草草设馔招待亲友，酒席约需30余元，妆奁及各项费用约需100余元，共需140余元。婚前3至7天，男家派人由媒人陪同送聘礼过女家。过聘后，嫁女开始唱哭嫁歌，并邀知己女友多人陪伴宿夜。出嫁之日，嫁女先由有福的年长妇女替开脸梳头，穿嫁衣，戴头盔首饰，然后上轿，由弟妹送轿至半路。嫁女一路哭唱，直到男家停轿成为新娘为止。有的地方还须新郎亲自到女家去迎娶，女家由妇女多人随后到男家‘送茶’。新娘到男家后，经过拜堂等一番礼仪后再入洞房。晚上闹洞房，俗称‘搅新娘’，一群同村兄弟叔伯到新娘家围坐长桌，逗新婚夫妇唱歌、猜谜或各种对答。罚饮茶饮酒等等，一直闹到午夜方散。第二天清早，新娘端洗脸水见翁姑，接着

是端茶。第三天新郎陪伴新娘回娘家，叫‘回门’。”

“搅新娘”，深圳还有个“抢果子的”风俗，主人事先把米粉油炸成一粒粒圆子，和花生、瓜子、槟榔、贴有红双喜字的椰子、水果糖等撒在新人床上，让小孩拥到床上抢，意思为“抢子”。抢完果子，将上面的脏席子换掉，再铺上新被新席，让新娘新郎休息。

“三朝回门”各村镇的风俗不尽相同。有的第三天回娘家拜望父母，男家带去一只烤“金猪”及其他礼品。娘家将其他礼品和金猪的头、脚、尾收下，猪身作回礼，意思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有的是婚后一个月新娘方可返回娘家，并且只能独自去，不许住夜，当日须返回夫家。新娘初次“返外家”要带猪肉、豆腐和带圆形的麻饼，见到左邻右舍的小孩可以分送给他们。新姑丈上门，则需在有喜事之便，才招请他去。富家则俟新娘“返外家”后，就请新姑丈上门。新郎访问岳父母家，也要送猪肉去。

为什么“三朝回门”要带金猪呢？珠江三角洲一带城乡有个习俗，如果新过门的姑娘被夫家认为“不贞洁”的，则“回门”时是没有“烧金猪”的，这往往引至两家矛盾和争吵，甚至离婚。所以，再穷的夫家，也得备上一头，由两名大汉抬着招摇过市，让街头巷尾的人看见，我娶的是“黄花闺女”。所以，“吃过烧猪没有”成为议论一个妇女是否贞洁的代名词。俞溥臣《岭南杂咏》曾诗载为证：“闾巷谁教臂印红，洞房花影总朦胧；何人为定青庐礼，三日烧猪代守宫。”

当然，现在没有这么随便怀疑是否“黄花闺女”了，但送烧猪肉的习俗，不少的地方仍然沿袭下来。

深圳的丧葬礼俗，是民间民俗一个组成部分，是深入了解当地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深圳当地人，无论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大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他们敬重祖先，不忘祖根，在一次又一次迁徙中，背着祖辈的骸骨一次又一次在迁徙地安放，直至定居下来，才进行隆重的葬葬，这就形成了“二次殓葬”的独特习俗。

坟、墓与二次殓葬风俗

坟与墓的区别

我国丧葬文化源远流长。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地人是一体的、全息的，天上所具有的，人间必然也有，地下同理。人们追求能够藏风、得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世代发展繁衍。这种理念成为5000多来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思维和文化基因。

深圳的丧葬礼俗，是民间民俗一个组成部分，是深入了解当地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

《宝安县志·风俗·丧葬》中载：“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调查，宝安丧葬仪式沿用旧习。丧葬仪式，凡亲视含殓的人，即请僧尼人诵经怡迨，收殓时衣衿必用丝质的袍裤旧制，出殡时，鼓乐、仪仗随送，来执拂的亲戚赠以白袍，其余戚友则赠以白巾，或者持花圈。自死者辞世之日起七日为一七旬，每一七旬雇僧尼诵经忏悔，备办酒席招待亲友，直至七个七旬，丧葬仪式方告个段落。

“死者若是有名望的老人，丧葬仪式隆重、繁琐，祠堂若有三进，吊丧期间尸体置于上厅，其次是中厅。

“除外还有余下习俗。报丧：迅速向亲戚传递死讯。买水：由长子或媳妇一手持哭丧棒，一手拿上着瓦钵，在亲友扶持下哭喊着走到河边，扔些纸钱于河中，顺流盛水于钵中，带回去后为死者洗脸抹身。服丧：一个月内（但各地不同）家人和至亲为死者戴孝。释服（俗称脱孝）：解除带孝，要拜祭，还贴‘昔日除灵添百福，今朝释服纳千祥’的对联。不一而足。”

深圳在上世纪70年代末没有进行殡葬改革之前，乡间凡有亲人逝世多为土葬。乡民传统习俗，落葬完毕，就在坟前堆砌石头，名之曰：“坟头”，多数毋须立碑。逾5至10年后，始开棺将先人骸骨挖起，清理后置入瓦瓮(俗称金塔)，暂时安置于山坡边角落。有经济基础的人就重金礼聘风水先生，登山寻龙探穴，物色佳位，用红土灰沙或水泥麻石，兴建墓地，开庚放水，刻石立碑，安葬先人骸骨，名之为“风水墓地”。

深圳有名的墓址有大鹏城内的刘起龙将军墓、南山赤湾宋少帝陵墓、沙井参山晋代大孝子黄舒墓、南头城东北排榜山明代名将何真之母墓，以及下沙村始祖于南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 建在福田莲花山西北坡的黄默堂墓等，以上古墓，均被省、市文物部门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广府人称为“墓”或“地”的，客家人则多称为“地”，比如太公地、阿婆地，及根据地形者如虎地、蛇地、龟地、蟹地、虾地、田鸡（青蛙）地等。在清明节拜祭者，多为山坟，要除草、培土，即拜祭近亲先人，俗称家庭式拜山。在重阳节拜祭者，则为墓地，也就是同姓同村几十、几百人拜祭太公，俗称祭祖扫墓。

乡间以一个村或几个村同一“房姓”（宗族）的，通常选择一个山坳，用围墙围住，里面按辈分、亲疏分别摆放先人骸骨的“金塔”，这围墙范围内，当地人叫做“阴城”。阴城里的金塔较集中，不像散放在山边地角容易被雨水山体滑坡掩埋，或牛、羊、狗损坏。为重视祖先遗骨，旧时还有人雇请“守城人”，年年月月看护阴城。

“阴城”地处偏僻，较为阴森，一般胆小的人或小孩子单独路过，都要加紧脚步绕道而行。

二次殓葬风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然阶段。有民俗专家说，诞生礼仪是接纳一个人进入社会，丧葬礼仪则是一个人最后离开社会，它标志着人生百年的终结。因而，许多地方的风俗，都把丧葬礼仪办得肃穆认真，环节繁缛；慎终追远，文化意蕴含蓄。

深圳当地人，无论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大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他们敬重祖先，不忘祖根，在一次又一次迁徙中，背着祖辈的骸骨一次又一

次在迁徙地安放，直至定居下来，这就形成了“二次殓葬”的独特习俗。

“二次殓葬”，即是人死后作两次不同方式的埋葬。第一次葬，先将亡人尸身用棺材入殓，做足“送终”、“买水”、“着寿衣”、“烧纸钱”、“治丧”、“穿孝服”、“家奠”、“立神位”、“大殓”、“出殡”、“路祭”、“葬礼”以及回村“哀谢”参加葬礼的亲戚和帮助丧事的“八仙”，摆“白事宴”(只吃七碟菜，地方风俗为喜事上八九样菜，丧事上七个菜)等程序礼俗。也许由于丧事突然，时间仓促或经济不许可等原因来不及细拣“风水地”，所以只好在临时择定的坟地里埋葬。一般人家都不为坟堆立石碑，只在坟头上立一块青砖或竖一块木板，写上死者名字。第二次葬，是在五六年甚至十年后再将骸骨挖出择吉日重葬。

如果是在此地长期定居的，就请风水先生选块风水宝地做墓地，刻石碑；如果要迁徙他乡，就用瓦罂盛装祖先骸骨一同迁徙。直至在居住地找到一块庇佑子孙兴旺发达的风水宝地，才妥为安葬先人。基于这种价值取向，后人都设法给先人安排二次葬，甚至三次葬，即给予找寻风水宝地的二次、三次机会。



山坟

有人说“二次殓葬”拣风水地是封建迷信。我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也太没有智慧。早在1600多年前的晋代时期，郭璞所著的《葬书》里云：“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郭璞简明扼要地点出风水理论的根本：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应该说，这种丧葬习俗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平民百姓固然如此，秦始皇、武则天皇帝陵墓何尝不是这样？甚至埃及法老王的陵墓选址、玛雅文化中金字塔方位，更为考究，真是古今中外毫不例外。有位学者说得好：“相信没有上帝的人可以是科学家，相信需要上帝的人也同样可以是科学家。”

二次葬不一定选在原来的坟址，而是根据堪舆所选择的位置，挑选吉日做墓落葬。堪舆讲究有“气”的吉地，是“山环水抱必有气”，“吉气走曲，煞气走直”，“寻龙捉脉”，找到生气出露于地表并被藏蓄起来的“穴位”。这穴地，也就是坐山的同时要面水，风水学中认为“龙”(指高

大山脉）能迎气生气，“砂”（指小山丘）能聚气藏气，“水”（指湖水河流）能载气纳气。这样优美的景致，建阳宅，让人住得舒心、健康；建阴宅，埋葬先人，先别说它能否庇护子孙兴旺发达，至少能给后人最丰富的心理满足。

开棺捡骨头有一定的仪式，何时动棺不得随意，需要请风水先生翻通书、掐避讳择定。有的地方祖上传下每年农历八月初一适宜开棺时间。开棺那一刹那阴气重，“煞气”大，一般子孙都不敢正面近前观看，旁人更是“退避三舍”。这个活由上了年纪的、从事开棺和捡骸骨的职业者来干。这样的捡骨者乡俗叫“改死佬”，他们开棺时一直要擎把黑伞遮挡，以免“邪气见天”，“阴魂四窜”。所以今人有绝对不在家屋里擎雨伞的风俗，怕的是带来阴魂野鬼。

开棺后，尸体仍未腐烂即落葬后一直没有虫咬，说明这个地方好，是块“养尸地”，则要重新掩土。二次葬开棺捡骨时，若发现棺内有蜈蚣、蛇、塘虱等，不能打死，应放生，让其自由离去。族人说，这些生灵都是死者的灵魂所变。报告人说若棺内有湖鳅的最为吉利，预兆其后裔将出贵人。

“改死佬”所起捡的每根骨头要先用茶水擦洗，后用草纸抹干，再用山茶油拭净，才按先脚后身、头的顺序，在一种长形宽口兼有盖的瓮式陶罐里，叠架成坐姿。这种瓮罐俗称“金罂”或“金塔”。整个捡骸骨的过程也叫“捡金”。“金罂”盖内应写上死者姓名，何地人氏。有的还在金罂内外放些五谷和铜钱，让先人在阴间继续享用。我在近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时，碰到一位民间艺人说起传承族谱，他说很小就死去了父母，长大后一直不知道祖父祖母姓名，几十年后的一次扫墓，偶尔打开“金罂”盖，发现盖里面的名字，这样才知道祖辈姓名，了却一桩心愿：能告诉他的子孙太公太婆叫什么名字、何地人氏。

清人黄钊在《石窟一徵》中写道：“俗父母葬十年，皆议改葬，改葬者以罂易棺，捡骸而置之。”一般开棺的时间不甚严格，但做墓落葬的时辰很严格，仪式也很隆重，为了取个好意头，不仅择黄道吉日，而且还用金猪、鸡鸭、水果、酒水供奉，烧冥纸、鞭炮，让先人“风光风光”。

墓葬又称阴宅、阴居。深圳的墓葬和阴居与岭南各地大同小异，形状前低后高，俯瞰呈椭圆形，小的直径二三米，大的占地几十平方米。椭圆形的墓边，依山镶嵌花岗石或砌水泥的墙，半人高的弧形墙，正面刻有墓碑。常见之碑文，第一段为小引，说明该墓坐落之地方、该坟之象形等，正中直落一行，是先人姓名，一般多是“清显考某公某某府君之墓”之类。写法必须按生老病死苦的顺序，不可胡乱而写。下款竖行多数是子孙名字，如子孙众多，则写几大房子孙同祀，最后才是年月日吉旦。坟墓中央平地下埋着死者遗骸的金塔。

梅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房学嘉，考察了梅州许多阴居构式，认为：“坟墓的整个形状有如围龙屋的缩小，与围龙屋同形同构，从而呈现出阴居与阳居形态惊人相似的文化景观。阴居与阳居同形，都源于对‘道’的符号模拟。死与生本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但是俗民以同形同构的符号来揭示这种生死相联的关系，可谓对人生进行了最高的哲学概括：人生从生到死，不过是出于天道又复归于天道；苍茫人生，千姿百态，不过是从圆形回归圆形的匆匆行程。这种生死关联的哲学意境，也许叫人感情上难以接受，但这在其他文化系统中也可以找到。”

千年丧葬习俗，随着殡葬改革，删繁除陋；但缅怀祖先、不忘根本的传统文化，有幸继承下来，足令人欣慰。

古人云："粤谓野市曰虚。昔者圣人日中为市，聚则盈，散则虚，今北名集，从聚也。南名虚，从散也。"深圳最早建墟的有距今700多年的黄松岗墟、大鹏墟，500多年的深圳墟和400多年的平湖墟；建墟晚一点的也有100多年的龙华墟、南澳墟等。数百年间，墟市或更名，或迁址，或消失，沧海桑田，变化不定；墟集的兴废也是一种历史文化。

乡间墟集也是一种文化

墟集墟集，南方叫墟北方叫集

地名的沿革和变迁是历史文化，乡间墟集的兴废也是一种文化。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重修《新安县志》载，深圳有3乡、4司、7都、8街市、34个墟集、570个本籍村和270个客籍村。数百年间，好些村、乡、镇、街和墟市或更名，或迁址，或消失，沧海桑田，变化万千。就拿墟集来说，史志载的墟集中有沙井墟、和平墟、云林墟、升平墟、清平墟、新墟（沙井村内）、白龙岗墟（今为公明圩）、黄松岗墟、桥头墟、碧头墟、福永墟、深圳墟、乌石岩墟、清湖墟、平湖墟、葵涌墟、盐田墟、碧洲墟和王母墟等。其中在清嘉庆年间就废了的有白灰洛墟、周家村墟、亶家蓢墟、下步墟等，被划入东莞市的有望牛墩墟、永丰墟、塘头厦墟、清溪墟、塘勒墟等，今辖属香港新界的有元朗墟（旧志为大桥墩墟）、石湖墟（现为上水墟）、大步墟（现为大埔墟）及长洲墟等。至于横岗墟、龙岗墟、坪山墟、坪地墟等曾属归善（今惠州市）管辖，1958年11月才划归宝安县。

我们经常说街市、墟市和墟集，它们有何区别？深圳人和香港人叫街市，

就是菜市场。那么什么叫墟？什么叫集呢？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的著作《广东新语》云："粤谓野市曰虚，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故曰虚也，虚即廛也。《周礼注》云：廛，市中空地也，即虚也，地之虚处为廛，天之虚处为辰，辰亦曰蜃，其义一也。叶石洞云：昔者圣人日中为市，聚则盈，散则虚，今北名集，从聚也。南名虚，从散也。商征而市井之租不入于少府，或封君汤沐邑，自开阡陌，岂惟爰田，市亦非县官矣。豪殖之徒，役财兼并，以武断于乡曲，恣睢阖夺，擅管山海之利。故先仁义，后争夺，上教化，下货贿。公利于人而恶其私于己，莫善于东莞之章村。章村有虚，为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有常人无常居。十日为三会，坐肆之租有常，负戴提挈贸于涂者无常，薄取之，岁入若干之强。会民读法，春秋赛祠，问高年，宾髦士，凶荒祈望，一岁经费皆取给焉。粤之虚，立法惟章村善。"

农耕时代，没有现代物流业。在自耕自织、自供自给的传统社会里，农家靠"投墟"（即赶集），卖出自己的山货、渔货或农副产品，换购糖、油、盐、酱、醋、手巾、牙膏、牙刷等日用生活品。因为要出田下海劳动，不能天天趁墟，因此乡人相约成俗：三天一墟，也就是每三天到镇上"投墟"，一个月就有九至十个"墟日"。那么做生意的商贩，不可能卖一天货歇息两天，于是邻近的墟镇就错开日子过"墟日"，比如石岩墟是逢农历的二、五、八墟日，也就是初二、初五、初八，十二、十五、十八，廿二、廿五、廿八定为墟日，邻近的龙华墟就是逢农历一、四、七为墟日，附近的公明墟就是逢三、六、九为墟日。观澜、平湖、布吉或龙岗、横岗、坪山一样如此类推。

"墟日"那天，卖菜的早早到菜地割菜挑去墟市菜场；卖猪鹅鸡鸭的天朦朦亮就喂饱牲畜，以便重称多卖点钱；卖番薯芋头生葱大蒜姜麻或卖柴卖草、卖箩箕筛箩竹木编织的就不用半夜起身准备，天亮才挑到墟镇；然后按牲口、三鸟、禽蛋、蔬菜、干货、鱼肉、水产、农具、竹木工艺等自然分类摊档，在地上摆卖。买猪苗、鸡苗、鸭苗、鹅苗、鱼苗、菜苗的人一遍遍转悠，货比三家才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墟日从早上六七点钟开市，中午十二点钟"散墟"，历时六七个小时，整个墟市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中午时分，买和卖各有收获，然后光顾各色咸甜糕粄小吃、油炸虾饼煎堆油角、粉面粥饭凉草粉果、罗汉果茅根竹蔗凉茶糖水、卤汁牛杂肉丸鱼条鱿鱼摊贩。殷实人家或卖了好价钱、手头松爽的乡民，上趟"高楼"（饭馆）解荤，花一元几毛吃碗狗肉饭或烧鹅饭。袋中有了几个钱的村民，抑或相约到圩镇里老乡家买狗劏宰，红炆狗肉"打豆豉"（聚餐大食会）。酒足饭饱后，按屈大均说的："昔者圣人日中为市，聚则盈，散则虚，今北名集，从聚也。南名虚，从散也。"散墟各人回家。不是"墟日"

那两天，墟镇人客流量明显稀少。

旧时墟日，没空售卖的人要摆卖零星瓜菜或小件工艺用品，可放到街上一个专门“无人售卖区”里，无需看管，只需标出“二角钱一把”青菜，或“一块半钱一只”竹箕、米筛，要买的客人自取一把青菜或一只竹箕筛，把二角钱或一块半钱夹在菜篮里。这种摆卖，不必担心有人拿了东西不给钱，也不会有人去“偷”竹篮里的菜钱。这种朴实的乡间民风，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直至文化大革命“大砍资本主义尾巴”，批判“投机倒把”运动，这“无人售卖区”随着没东西卖而消失。

我记得父辈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了把仅有的柴草、水果、番薯、花生、黄豆等农副产品卖多几个钱，不惜多走几十里路到南头、西乡、深圳墟市卖，然后买回一些海鱼、虾米、咸鱼过日子。甚至相约数位乡民徒步四五十里路，到香港新界石湖、元朗等墟市，卖出后换回火水、火柴、番枧、胶绳、药油和一些洋货日用品，一方面自用，另出后一方面转卖给摊贩，赚点微薄的“水脚钱”。所以，毗邻香港的宝安村镇乡民，普遍有去香港“投墟”的习惯，去的人多了，香港好些商铺，醒目标榜正宗宝安“沙井蚝”、“石岩柿子”、“南头荔枝”、“龙岗鸡”、“松岗腊鸭”、“金龟蜜桔”等土特产销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墟集市场

墟日除农副产品买卖的物资交流外，有些墟集流动着民间艺人表演杂耍武术，比方胸口碎石、生吞毒蛇、睡尖板钉、血口喷火、徒手砍砖等硬功，耍猴卖艺，打“嗡塞”（竹板）说唱；逢上农事节日，村民敲锣打鼓舞麒麟、舞龙、舞狮、舞鱼灯，唱山歌、木鱼歌、“斗歌会”，娱乐身心。青年男女则精心打扮，穿着平时舍不得穿戴的衣裳和围身饰物，三五成群的知心人，一起在“投墟”时物色意中人。

深圳墟集摆卖的物品各地有别，尤其是沿海与山区有明显的不同。沿海墟日多数鱼获海味，山区墟日多为农家山货，长期经营，形成各墟镇特色。松岗墟以鸭市为主，沙井墟以蚝市为主，公明以谷米、薯芋为主，石岩以水果、柴草为主，龙华、布吉以竹木编织为主、观澜以猪苗家禽为主，西乡、南头、蛇口、盐田、葵涌、大鹏以鱼虾蟹为主，龙岗、坪山以猪鸡鹅鸭为主，等等。

深圳各小镇形成墟市特点，广东其他地方亦然。屈大均又曰："东粤有四市：一曰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亦曰洞天药市。有捣药禽，其声玎玎，如铁杵臼相击。一名红翠，山中人视其飞集之所，知有灵药，罗浮故多灵药，而以红翠为导，故亦称药师。一曰香市，在东莞之寮步，凡莞香生熟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亦犹雒阳但称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盛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饷客，杂姜酱食之，味甚甘美，其细珠若粱粟者，亦多实于腹中矣。语曰：'生长海隅，食珠衣珠。'粤东所在，颇多难得之货。"

古深圳的墟集历史久远

古深圳有南头旧市、西乡大庙前市、大鹏城西门等 8 个街市，深圳墟、福永墟等 34 个墟集。最早建墟的距今 700 多年的黄松岗墟、大鹏墟，500 多年的深圳墟和 400 多年的平湖墟；建墟晚一点的也有 100 多年的龙华墟、南澳墟等。

据《宝安县志》记载，南头城是东晋咸和六年置县的县治，同时也是东官郡的郡治，1600 年前县、郡同城。南头正式成为有规模的"城"，始于 1394 年的明洪武二十七年，广州左卫千户所崔皓奉命建筑南头"守御所城"。起因为 1384 年朝廷决定在沿海地区设立卫所，以防卫和抗击倭寇（日本海盗）。粤东地区设南海卫，卫辖二所：一为东莞守御千户所，所城设在南头；另为大鹏守御千户所，所城设大鹏。南头城形势雄伟，城池周长 578.5 丈，城墙高 2 丈，城墙面宽 1 丈，有 4 个城门，今保存完好的为南门"宁南"。南头城是中国南海的门户，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广州、虎门之屏障。1953 年，宝安县县城从南头迁至深圳。

西乡墟，是深圳市西部的重镇，因其地域位于古新安县城南头之西而得名。西乡是珠江口的一个小渔港，乡民历代晒盐、打鱼、养蚝、种田，数来是鱼米之乡。西乡街是条长长的石板小街，街两边密密麻麻排满店铺，墟日更为热闹。如今码头的鱼市仍然繁忙、兴旺。

福永墟，清康熙《新安县志》已有"福永村"记载，嘉庆时则有"福永司"，为县"四司"所在地。地接海滩，古为盐场和盐埠，亦渔亦蚝；滩涂逐年伸展成陆，成为大片沙田，历为宝安县粮仓之一。东莞、中山、番禺、顺德等地有移民集居于此，日渐成墟，取"永远幸福"之意而得名。

沙井墟，沿用古沙井村名。村、墟文字记载始见于嘉庆《新安县志》。沙井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称"归靖"，是个古盐场、蚝场，当地特产沙井蚝闻名省港澳。古时村民挖井取水，井中多沙，因得名。

松岗墟，古称黄松岗，为村为墟在清康熙《新安县志》里有记载，建

圩始于宋咸淳六年（1270 年）。因墟场建于一山岗之麓黄姓村旁，山上有松林，故此得名。黄松岗墟与东莞交界，地处珠江口，河网交错，盛产鱼虾蟹，乡民素有养鸭传统，肥美的鸭子冬天晒成“松岗腊鸭”，饮誉深港地区。大片沙田，土地肥沃，是个鱼米之乡，1950 年改为松岗。

公明墟，最早于明朝天顺年间建周家村墟（今将石村附近）、清嘉庆年间建白龙岗墟（今薯田埔村）、永长墟（今罗田村）、清光绪年间建丰和墟（原白石岗墟附近）等。丰和墟最为兴旺，后因宗族纠纷废。楼村武举人陈海臣、合水口村人麦晓先，顺从民意，于1929年集资在合水口与上村交界处建墟，初名公平墟，取意“买卖公平”。1931 年改名“公明墟”，含“公道光明”之意。

石岩墟，原名乌石岩，也叫石岩峒，清嘉庆年间（1801 年）建墟。墟内有三块天然黑色花岗岩大石叠成石洞，洞内立观音塑像，中央有大石座，供奉者燃鞭炮掷其上，呈褐色，谓观音显灵，因名“乌石岩庙”。后人修筑为“慈石古寺”，古牌楼阳刻的黑魏体“乌石岩”3 字今仍保留，旧墟因而得名。石岩墟地处南头、龙华、公明交界，连接珠江口和阳台山山区，是渔货和山货交流集散地。本墟人多数讲客家话，但接触公明、南头讲白话（粤语）多了，也会听、会说些白话。庙级下是一条石岩河（又叫茅洲河），河床上露出一大片河沙，人称为河沙坝，墟市就在河沙坝上，一行行鸡鹅鸭猪、各种水果、番薯芋头瓜菜、竹木工具等摆卖井然，甚至卖武艺、耍杂技、演大戏也在河沙坝进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松岗盛产水鸭和鸭蛋，松岗腊鸭是深圳著名特产之一。（何煌友　摄）

龙华墟，早在新石器时期，龙华清湖村一带就有人居住。明朝时期，曾有苗族人徙居此地，以后又迁走。清同治（1862 ～1874 年）年间，部分客家人由梅县、东莞等地迁至龙华，成立龙胜堂，并发起建墟，龙华遂逐渐繁华起来。龙华亦由此得名。

平湖墟，始建于明嘉靖元年（1522 年）。早期的平湖包括伍屋围村、大围村、松柏围村。因伍屋围村地形颇像一只螃蟹，大围村地形像一只蚌，松柏围村地形像一只虾，村民们认为這些螃蟹、蚌、虾均是水生动物，必须有湖泊才能成活。据传当时该地区地势较为平坦，一无江河，二无湖泊，水资源较为贫乏，由于对水的渴望，人们遂将此地称之为平湖。

观澜墟，相传在清乾隆年间建墟。建墟前附近村民多到清湖墟赶集。墟址为东莞知县派员勘定。墟市坐落于新安、东莞两县之间，各自于墟内设有地方治所。初名“官难”，讽喻做官者赴清湖“迁道难”。另一说为光绪十四年（1888年），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地理先生叫邓坤，云游到此，在观澜河东岸建了一座观音庙，取庙名“观澜”，后在此地集市成圩，墟名则取之观澜。

布吉墟，得名与俗称“莆隔”有关。300多年以前，在现铁路西侧有个莆隔村，因客家话中“莆”与“布”音相近，至清朝中期，逐渐被称之为“布隔”村。清咸丰二年（1852年）在村南面建丰和墟，此前，这一带村民到深圳、平湖“投墟”。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设“布吉站”站牌，“布隔墟”便成为“布吉墟”。

横岗墟，建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今南塘村。因地形较高，山岗横卧于道，又乡民往来深圳、龙岗必须横过其中，故取名横岗。另有一说，相传明朝刘伯温带兵经博罗时，曾指布吉、横岗、龙岗一带为“龙脉”，横岗为龙之中腹，喻其日后昌隆。清初时已有横岗围村，为新安县县丞属地。民国时期，横岗为惠阳县一个乡，1958年10月，与龙岗乡合并，成立龙岗人民公社，同年11月划入宝安县。

龙岗墟，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一个美丽神奇的传说而得名。相传古代有一头神龙从梧桐山腾起，飞向今龙岗“锅笃潭”浸浴，旋即起飞，降落于一小山岗上（今龙岗墟大王坛古榕树下），化作青烟升天。村民筑坛植榕，以为纪念。乡民商约建墟，择定气候温和，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岗洼适中的上墟垄（今龙岗河畔上墟村）为址，命名“龙冈”（今废）。此后“冈”定为“岗”，龙岗墟沿用此名。龙岗河发源于梧桐山北坡，干流长，流量大，寓水为龙，不无可信。

坪地墟，旧墟建于清嘉庆中期，在岳湖村东北约一公里处，周围地势平坦，客家话谓地“平”为“坪”，因名“坪地”。建国后，墟市渐废，转而至岳湖岗，并一直为区、镇驻地，区划名称沿用“坪地”。

坪山墟，据传，在今坪山围村后，有一宽阔低平的小山岗，名为“东头岭山”。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间，曾、张、黄、戴四姓先后从兴宁、韶关、福建等地移居“东头岭山”周围落户，老围、骆屋次弟成村，继而合为“坪山围”，即今日坪山围村、六联小学一带。乾隆年间，于坪山河东一里多处建墟，因其地势除东南部有较高的田头山外，其余方圆坦荡可见，故名“坪山”墟。

坑梓墟，旧无墟。村民多到淡水、坪山、龙岗“投墟”。区划与坪山几经并析。据传，城内及沙梨园（老）一带村民早年系由老坑村分出，人们便将这一带迁出村民统称为“坑子”，意即老坑村的子孙。又因“子”

与“梓”同音，后人遂改“坑子”为“坑梓”，取义“桑梓”、“梓里”，引申为“老坑是故里”。“老坑”则因三面环山，中间有一条大坑，乡民集密，姓黄的大部分从老祠堂（今坪山江边村）迁来而得名。历史上，坑梓地域常并于坪山。建国初期，坪山、坑梓地区属惠阳县。1958 年 11 月，划归宝安县。

葵涌墟，清康熙《新安县志》里就记载有葵涌墟，至今有 300 多年历史。古时这里河涌交织，盛长水葵。相传最初有女麦氏携二子，徙居过此，一子中暑，采莼（即水葵）服食，暑即解，大喜，遂落脚长住，日久乡民聚居渐多，自成墟街，“葵涌墟”因得名。

历史上，葵涌的行政区域名称多次更易。民国年间，属宝安县第三区，称葵华乡。1958 年 11 月划归宝安县管辖。

大鹏墟，《新安县志》里记载大鹏城西门街市，虽为清嘉庆年间新增，但至今也近 200 年。其实更早的 500 多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 1394 年），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在大鹏半岛建城置设守御千户所城，因辖境内有大鹏山（又名七娘山，今属南澳镇），古传曾有仙女七人游此，以其如鹏踞海，故以“大鹏”名之，大鹏墟亦沿用其名。

南澳墟，清嘉庆（1796 ～ 1820 年）年间就有南澳村。因其三面环海，西部海澳（海边湾曲可以停船的地方曰“澳”）海水特别绿，初称“蓝澳”，后以“蓝澳”地处大鹏半岛最南部，因而取谐音易名为“南澳”。南澳墟是天然渔港，出海渔船捕鱼返航靠岸，为南澳墟渔货交易最畅旺时日。

深圳墟，清康熙《新安县志》载：“在明朝永乐八年（公元 1410 年）建墟。”由于罗湖、水贝、湖贝、上水、莲塘这一带水泽密布，田边又有一条深水沟，广东人称“水沟”为“河圳”，故取名深圳。这条深圳河原名叫“滘水河”，清嘉庆《新安县志》云：“滘水在城（南头县城）东四十里，发源于梧桐右、莆隔（今布吉）左，龙跃双鱼（今香港新界上水古称）诸山，西流曰钊日河，北出曰大沙河，二支分流至滘山合流，而西曰窖水，经黄（皇）岗，逶迤四十里入后海（今深圳湾）。”那时深圳河水深数尺，船艇可从莲塘、坳下等地至驶至罗湖、上埗码头、沙头、沙嘴、南头、赤湾、屯门、元朗、流浮山，远至虎门、番禺、广州、肇庆等地。

四百年前建墟，至清末已具规模，设东门、北门、南门、西门，今四个城门和城墙不见，只保留东门和北门的地名，南门变成南塘村。墟街内有西和街、上大街、北门街、养生街、谷行街、鸭子街、猪仔街、鱼街、南庆街、永新街、陶兴街、东升街、猪仔亭等。墟市买卖成行成市，而且分类细致，听街名就知道是卖米谷粮食花生油盐、猪仔、鸭仔、鱼虾水产、陶瓷缸瓦等商品。上大街以布匹、丝绸、缝纫被服为主的街道，晒布路是小镇上为加工甘坑凉

帽，凉帽的帽檐布都是从皇岗、香港等地挑来，洗染晒干加工，经常晒布的山岭叫晒布岭，岭旁边的路就叫晒布路。油榨头顾名思义是榨花生油、豆油的地方。除此之外，墟镇还“配套”有当铺、炮楼（五座），民乐戏院、雍和堂、义祠、车公庙等。

一般街道只有两三米宽，而谷行街却有十多米宽，那是早期“投墟”集市的地方，每年举行盛大的“盂兰节”，在道家盛会的上元（正月十五）、中元（七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于谷行街搭起高台，演粤剧、木偶戏、潮州戏，一连几天，非常热闹。

由于深圳墟与香港九龙只隔一条河，两地居民自由来往。香港新界人常常过罗湖桥“投深圳墟”，买糖果、食品、缸瓦、谷箩及各类农具。

深圳墟人流多，又属“唐界番界”交接地，两地都不太管。上世纪初，南天王陈济棠在罗湖村（深圳火车站对面的大河滩，今为边防检查总站罗湖桥招待所）开了个大赌场，叫又生公司。

又生公司赌场两层楼建筑，形似画舫，地下水滩与深圳河相连，水深达数尺，故赌场设有小艇，赌客赢了钱，就招妓落艇游河作乐，与当年广州珠江河边和澳门濠江风光无异。

又生赌场二楼陈设华丽，有豪房设备，兼有烟格，还有美女招待、酒筵供应，专为有钱有面之人而设。在楼上可俯视地下赌场，并有专人报告情况，豪客下注，只须用钱箩将投注号码和钱银垂下，便有人代为办妥，不必亲自操劳。

又生公司为招徕客人，经营有术，除有专程火车接送省港赌仔外，雨天还有人担伞挡雨。凡入场之赌客，每人必送香烟一包，如全部输光，也有水脚钱包送回家……

后来，日本仔侵华时，香港、深圳相继沦陷，深圳墟屡遭飞机轰炸，又生赌场无法生存，只好倒闭。直至解放后，革命政权荡涤一切污泥浊水，面貌大变。1953 年宝安县人民政府从南头迁至深圳，深圳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深圳市人民政府

关于批准并公布深圳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通知

（2007 年 1 月 29 日）

深府〔2007〕14 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 号）、《文化部关于加快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通知》（文社图函〔2006〕1389 号）的有关规定，经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评定并向社会公示，现批准将《陈仙姑的故事》等 25 个项目列入我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予以公布。

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我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科学规划，妥善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深入做好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附件：深圳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附件：

深圳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序号	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域或单位
一、民间文学类：1 项			
1	Ⅰ-1	陈仙姑的故事	宝安区公明街道
二、民间音乐类：4 项			
2	Ⅱ-1	石岩客家山歌	宝安区石岩街道
3	Ⅱ-2	大鹏山歌	龙岗区大鹏街道
4	Ⅱ-3	龙岗皆歌	龙岗区龙岗街道
5	Ⅱ-4	盐田山歌	盐田区文化局
三、民间戏剧类：1 项			
6	Ⅲ-1	万丰粤剧	宝安区沙井街道
四、民间舞蹈类：7 项			
7	Ⅳ-1	沙头角鱼灯舞	盐田区沙头角街道
8	Ⅳ-2	龙岗舞龙	龙岗区龙岗街道
9	Ⅳ-3	舞草龙	龙岗区南澳街道
10	Ⅳ-4	龙城舞麒麟	龙岗区龙城街道
11	Ⅳ-5	黎围舞麒麟	罗湖区翠竹街道
12	Ⅳ-6	观澜舞麒麟	宝安区观澜街道
13	Ⅳ-7	福永醒狮舞	宝安区福永街道
五、岁时节令类：1 项			
14	Ⅴ-1	开丁节	福田区梅林街道
六、传统手工技艺类：2 项			
15	Ⅵ-1	凉帽、围裙带编织技艺	南山区蛇口街道
16	Ⅵ-2	客家凉帽	罗湖区文化馆
七、传统医药类：1 项			
17	Ⅶ-1	平乐郭氏正骨医术	罗湖区文化馆
八、民俗类：8 项			
18	Ⅷ-1	黄氏宗亲祭典	福田区沙头街道
19	Ⅷ-2	赛龙舟	宝安区松岗街道
20	Ⅷ-3	“辞沙”祭妈祖大典	南山区天后宫博物馆
21	Ⅷ-4	天后宝诞祭典	盐田区沙头角街道
22	Ⅷ-5	畲家人婚俗	盐田区盐田街道
23	Ⅷ-6	沙井蚝民生产习俗	宝安区沙井街道
24	Ⅷ-7	南澳渔民娶亲礼俗	龙岗区南澳街道
25	Ⅷ-8	大鹏清醮	龙岗区大鹏街道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批准并公布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粤府〔2007〕57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和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粤府〔2006〕70号）有关规定，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评定并向社会公示，现批准将五羊传说等104个项目列入我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予公布。

附件：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东省人民政府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 **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04项)**

分类·代码：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
民间舞蹈（III）	26	凤舞	清远市阳山县
	27	禾楼舞	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茂名市
	28	惠来九鳄舞	揭阳市惠来县
	29	* 麒麟舞	深圳市、中山黄圃镇
	30	五马巡城	肇庆市封开县
	31	* 龙舞（杏坛人龙、龙岗舞龙、荷塘纱龙、花环龙、东莞龙舞、乔林烟花火龙）	佛山市顺德区、深圳市龙岗区、江门市新会区、梅州市大埔县、东莞市大朗镇、揭阳市东山区
	32	* 英歌舞	汕尾市
	33	*狮舞（醒狮、狮艺、高脚狮、席狮、福永醒狮）	东莞市石排镇、江门市鹤山市、茂名市、梅州市、深圳市
	34	* 鲤鱼舞（潮州鲤鱼舞、鲤鱼灯）	潮州市、梅州市
传统医药（IX）	69	潘高寿中药文化	广州市
	70	陈李济中药文化	广州市
	71	平乐郭氏正骨医术	深圳市
民俗（X）	82	赛龙舟（礼乐龙舟、赛龙舟、扒龙舟）	江门市、深圳市、广州市
	83	下沙黄氏重阳祭祖习俗	深圳市
	84	大溪宗祠祭典	揭阳市
	85	三山国王祭典	揭阳市揭西县
	86	“辞沙”祭妈祖大典	深圳市
	87	疍家婚俗（疍家人婚俗、疍家渔民婚俗）	深圳市、阳江市
	88	饶平彩青习俗	潮州市饶平县
	89	忠信吊灯习俗	河源市连平县
	90	疍民过年习俗	深圳市
	91	行通济	佛山市
	92	行彩桥	揭阳市
	93	灯会（乐安花灯会、泮村灯会）	佛山市、江门市
	94	张公庙会	云浮市郁南县连滩镇
	95	六祖诞庙会	云浮市
	96	锣鼓标旗巡游	揭阳市
	97	大鹏追念英烈习俗	深圳市
	98	斗门水上婚嫁	珠海市斗门县

注：项目名称前标有 * 号的项目，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本批增加了申报地区。·本表节录部分项目。

文化部办公厅

《关于公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精神，2007年文化部开展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和评审工作。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要求，文化部组织有关专家按照评审标准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直单位申报的2540个项目进行了审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委员会根据项目价值进行了认真评审和科学认定，提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其中新入选项目564项，扩展进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134项。现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30天。

附件：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III-104	鱼灯舞 （青田鱼灯、莆田九鱼鲤灯、鲤鱼灯、沙头角鱼灯舞）	浙江省青田县
III-125		福建省莆田市
III-130		江西省吉安县
III-199		广东省深圳市
IX-2	中医正骨疗法 （宫廷正骨〈上驷院绰班处〉、罗氏正骨法、石氏伤科疗法、平乐郭氏正骨）	北京市
IX-4		北京市朝阳区
IX-10		上海市
IX-19		河南省洛阳市
IX-26		广东省深圳市

·本表节录部分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连结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

作者／廖虹雷

深圳是著名的侨乡，百多年来，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魂牵梦萦祖国，千里跋涉回乡省亲，这里固然有亲缘血脉的关系，然而植根他们心灵深处的却是悠久的中华文化，和凝聚在他们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情结。

一、 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年轻的深圳城市顽强出现

（一）三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培训班学员，对深圳有没有“非遗”很迷惘。曾几何时，社会上一度流传着深圳是“文化沙漠”以及“没有深厚文化根底”的议论，这恰恰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人20多年不懈努力的原动力。2005年5月开始连续举办三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培训班，3次邀请国内著名教授乌丙安等专家学者前来授课指导，参加学习的学员累计300多人次。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外地毕业来深圳没几年的文化工作人员，有的虽然在深圳也有好些年了，但他们同样在印象中，觉得没有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圳25年创造了一个世界城市建设史，也给历史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留下些许遗憾。当年，特区的建设者们，走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创业路上，被“现代化”的理想和国外高楼大厦景象迷糊了眼睛，忽视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血脉，无意间毁坏了当地许多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环境。有“千年蚝乡”之称的深圳沙井蚝，被污染得无法在海滩养殖，千多亩蚝田被偏废，很有地方特色的养蚝文化、蚝墙文化、食蚝文化、蚝乡婚

嫁风俗等受到严重冲击。编织深圳客家凉帽“竹箔顶”是用优质的单竹做原材料，原来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深爱的这种“甘坑凉帽”，因为编织人员靠做凉帽已难以生存，加上房地产高额利润诱惑，村里把山上种满单竹的那座著名凉帽山，毁了竹林盖起高楼，变成“凉帽村住宅社区”。没有单竹，全村再没有一户织凉帽，流传240多年独特的编织凉帽工艺几乎失传。就这样，深圳许多民间习俗、民间艺术，随着农村改造成为社区，原住民陆续迁出，外地移民入住等环境变迁，弱化了文化存在的基础，有的远离了我们日常生活，有的无法靠自然生存，或者失去流行价值而延续，更有的因为独特传人逝世而没有传承下来。所以，文化遗产“生态场”濒临消失了，成了“遗”产了，成了我们今天的遗憾。

幸亏，深圳特区政府历来重视历史文物保护工作，早在特区创建时的1980年，大梅沙旅游区开发建设中出土新石器时期的石锛、石斧文物。同年在南山后海和沙井中学附近出土一批古陶瓷。1983年初深圳市考古人员，在西乡华宝饲料厂建设工地上发现东晋、南朝墓12座和元、明墓各1座，出土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当年5月30日市政府对“南头古城”、“大鹏城南、北城墙”、“赤湾左炮台”、“大梅沙古遗址”以及“宋少帝陵墓”等7处古迹，正式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和发掘，如今全市地下、地上文物古迹1694处，其中古遗址和古遗物采集点107处、历史建筑1587处；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51处。出土和征集文物超过2万件。考古材料表明，在深圳这座现代文明城市中具有7000年的人类开发史、3000多年的古越族文化史、2000多年的海洋经济发展史、1700多年的郡县史、800多年的广府移民史、600多年的海防史以及300多年的客家移民史和华侨史。

（二）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寻根访祖，解开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困惑。广东省是著名的侨乡，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约有3000多万人，占全国侨界资源的70%。深圳市在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300多万人。每年经深圳口岸入出境旅客上亿人次中，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回乡省亲、旅游、投资、经商的不下几千万，特别是回到深圳寻根访祖、探亲访友的华侨、港澳台同胞，在乡间，和乡亲父老一起拜谒祖堂，焚香祭祖，同时欣赏几场粤剧，听听客家山歌和广东音乐，看看舞草龙、火龙、麒麟、狮子和渔灯舞等民间艺术，饮饮广东凉茶，吃吃家乡风味大盆菜，离乡别井的焦灼心境马上释然；少小离家的家乡情结，在一件件浸润历史的民间活动中，慢慢化开。正是这些乡间习俗和历史生活细节，让华侨代代难以遗忘，千山万水永隔不断，这就是文化遗产对“人”的特殊用处，它像灵魂定位仪一样，为漂泊无依的心灵找到精神家园栖息和定位。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工作的基层文化馆站工作人员，正是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月七的“七姐节”、中秋、重阳、冬至节、开灯茶节、妈祖圣诞“辞沙祭”等节庆中，循着华侨、港澳台同胞热情参与活动的足迹，加深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加快了普查工作的开展。

二、 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华侨心中的锁定

（一）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侨居地仍然保存完好的华人语言、节庆习俗和饮食习惯。深圳的华侨在世界分布得比较广，相对集中的侨居地为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牙买加、日本、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自小在中国长大的华侨和他们的后裔，无论他们的外语说得多么流利，无论华语在侨居地是多么“弱势”，但在华人圈子和他的家庭成员之间，都坚持讲中国方言，有些方言中非常冷僻的语句，在祖国内地已被各地语言杂交或同化了，但在华侨侨居地仍然存在和流行着。日常生活用具，比如用作舀水的木瓢、深圳客家人戴的凉帽、装衣服的樟木笼、割稻禾用的“草织手笼”等等，他们都在坚持使用。特别是过大年点炮竹、闹花灯、做年糕、舞龙舞狮舞麒麟，中秋烧孔明灯、耍碌仔、唱大戏等习俗举办得原汁原味。各个时令节庆、庙神会诞和“太平清醮”做得有板有眼。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真正的生活记忆，更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生命力。这说明了：1. 外国的文化再好，也不能涵盖华侨的精神文化需要。中国人从婴孩出世挂长命锁、“洗三朝”、吃姜醋、派红鸡蛋，到长大后结婚择日、送彩礼、梳头、“抢亲”、过门、跨火盆、拜堂、婚宴，直至生老病死，独特的文化风俗已经融入生命里。像许多华侨喝广东老火汤比罗宋汤习惯，外国手套再漂亮，也没有老家“手笼”方便，外国礼帽再高档，也难比家乡凉帽舒服，这是中国文化的根。2. 中华民族文化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对祖国的情结，不仅是通商贸易等物质方面的连结，而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方面的连结。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成为连结祖国和海外侨胞的精神纽带。

（二）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乐于回乡参加各种文化节庆和民俗活动。深圳市福田区下沙村，南宋时期，由福建邵武市黄氏先祖峭山公后裔黄默堂来到深圳湾海边建村，由于历史原因，800 年来黄氏族人许多移居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为了自我保护，他们在侨居地逐渐自发建立“黄氏祠堂”、“黄氏会馆”和“黄氏宗亲会”，1980 年 4 月在台北成立世界黄氏宗亲总会，深圳下沙村属总会成员之一。世界黄氏宗亲总会的活动在各地影响很大，例如印尼 2000 年成功组织了黄氏宗亲会，争取到印尼议会首脑到会祝贺，从此印尼政府解禁，允许华人可以结社、办华人学校、出版华文出版物。下沙村黄氏宗亲会自建村级民

俗博物馆，展示当地习俗；每年广邀海内外黄氏宗亲回乡祭祖、扫墓、祠堂上灯、吃“大盆菜”、唱粤曲大戏，舞龙、舞狮、打广式纸牌比赛和武术表演等。最有特色和最为隆重的，是2002年元宵节在以上丰富的文化习俗活动的基础上，同时摆了3800席“大盆菜宴”，海内外6万多人同吃“大盆菜”，共闹元宵节，盛会连续狂欢5天，简直不亚于巴西的“嘉年华”。这场“大盆菜宴”，经上海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总部认证为“最大规模民间宴会”。

在深圳零丁洋写下著名诗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宋代名将文天祥，700多年后文氏血脉在深圳松岗、福田等地繁衍成10万之众。当年他护驾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史称宋·祥兴帝），由新安县（深圳市旧称）九龙城（今香港），逃往新会崖门，被宰相陆秀夫背着他蹈海殉国。小皇帝遗骸漂至深圳赤湾海面，被收葬在蛇口海湾的小南山脚，成了深圳唯一的一座帝王陵寝。小皇帝逃到香港九龙城吃过的“百家饭”，沿袭成为今天著名的大盆菜。抗日战争前，海外和港澳赵氏宗亲，每逢清明或重阳节，专程寻根南山，扫墓拜祭。

深圳沿海渔民和山区的客家人，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除创造出当地特色的生产和生活习俗，也创造鱼灯舞、咸水歌、客家山歌、龙岗皆歌、盲佬歌、麒麟舞、舞龙舞、狮子舞、划龙舟等民间艺术，以及水上迎亲、开灯节、七姐节、洗井节等民间风俗。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深圳舞麒麟和拳术，它曾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庚子首次起义活动中起过作用。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深圳市盐田区三洲田村毗邻香港，村人廖毓坤开间小铺，经常来往香港通商结识郑士良等爱国志士，以村里著名的武术拳馆、舞麒麟为掩护，联络三合会、绿林会党600多人，于1900年10月6日（庚子年八月十三日）向清朝打响反帝第一枪，史称庚子首义。三洲田的廖氏家族和深圳、香港、澳门、台湾十多万廖氏宗亲来往密切，2006年1月在香港新界上水乡隆重举行60年一届的“廖氏族人太平清醮”，酬神、祭典、民间巡游、历史展览、看粤剧大戏等一连热闹五天五夜。此外，2006年6月台湾高雄市客家文化交流团148多位乡亲，专程前来深圳进行寻根、研讨，参观全国最大且保护完整的龙岗客家围屋，以客家山歌为媒介，饮客家黄酒，品客家菜，用台湾客人的话说：“梦萦寻找客家人的精神家园。”

三、 基层文化馆站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几点思路

密切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家乡的情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载体之一。新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层文化馆站是一支重要力量，如何普查和保护，国家已公布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作为基层文化馆站普查工作

人员，不妨参考如下几个思路：

（一）借鉴台湾经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找条“活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民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半。”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珍贵的地域文化和本土智慧。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古老国家，绵延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栖附着我们民族历史的灵魂，每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呵护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文化馆站是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长期生活在百姓中间，了解掌握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底，本身有这个文化专业，有责任把一些民间艺术传承下去。面对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农业文明架构下的文化形态和生存方式都在瓦解、消失或变异，正如老百姓说的：“田头山歌没田头，灶头神拜没灶头，凉帽山上变社区，民间艺人难糊口。”要想法让这些民间文化艺术和工艺有“活路”，台湾大学教授曾永义介绍台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有效的保护方式：第一种是让如今无法在社会存活下去的艺术形式，在博物馆里“养”起来，除了图片、影视展示外，让民间老艺人（带徒）现场表演。广东江门市新会区葵博物馆就是这样做，每天由固定工艺师傅向观众表演做葵扇、织蓑衣、编“葵织”等技艺。第二种是对现时有生存能力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家，给予鼓励和支持，如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就是获得支持的一个成功例子。第三种是对于一些具有先锋气质的艺术家，敢于在传统艺术上进行一些激进的改革。这经常引起“保守派”激烈反对。对此我们不必急于扼杀，让它在艺术和市场规律中走下去，往往就能让先锋派发展出新的成功路子。

（二）发挥政府作用，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大凡流传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艺术。深圳客家山歌、民歌、皆歌、咸水歌、盲佬歌、哭嫁歌、哭丧歌等，从草根大众喉咙嘶吼出来的声音，宣泄他们劳作中的喜怒哀乐，述说他们卑微的愿望。这些在街头巷尾、田头海角或在小家庭作坊的艺术家，也许很土里土气，甚至“粗俗不雅”，但他们骨子里透露出对艺术原生态的执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不是“保守”的“守护”，不动脑筋，让它自生自灭；“护”，就要像护林员一样，不让它在外界受到伤害，把“大环境”护好外，还要浇水，护理，施肥。也就是经常关心民间艺人，对列入市、省、全国保护的项目和技师，给予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切实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不再做“损遗不利己”的蠢事。

（三）发挥深圳优势，让更多的人享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经沧桑岁月，积淀在民间社会之中，是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春节、端午、中秋我们一同欢乐，火把节、泼水节、划龙舟我们一起热闹，月饼、粽子、汤圆我们共同品尝，享受着非物质文化成果。俗话

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的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的立体空间。我们保护这些文化遗产在忠实历史、忠实原汁原味外，可否让“遗产”尝试“移”产，加入现代人喜欢的元素移植、复制，也就是像当年“移植样板戏”，让各地老百姓看到富当地剧种的“样板戏”，也如今天美国橙、台湾莲雾移出“原产地”种植，并没有影响原产地生产。但是移步不移形，移形不移神。过去，我们往往对自己传统文化不愿意张扬，本土民间艺术藏在“金闺”、“小巷”、“大山”里无人识。最近，北京有学者提出孔子思想再好，也希望有章子怡演绎推广。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的文化要学会张扬。深圳毗邻港澳，有丰富的华侨资源，完全有可能让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尝试“移产”外地，加强海外交流，扩大影响。像现在我们不用走出国门，在世界之窗非常方便欣赏到巴西桑巴舞、非洲土风舞、泰国脚铃舞和韩国长鼓舞一样，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

（获2006年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主办、中国群文学会、中国文化报社颁发全国“文化馆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一等奖）

后记

(一)

我的家乡在深圳，而且600多年前的数十代就落根深圳。有一首歌叫做《谁不说俺家乡好》，我还想说多一句，家乡的事往往一辈子都忘不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窘迫的岁月中，我曾为我的家乡迷惘过；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日子里，我更多的是为家乡自豪。

深圳很小，小到20多年前几乎在地图上找不到。深圳，原来是宝安县的一个镇，说实话，罗湖桥还比它出名，因为罗湖桥是进入香港一个最大的边防口岸和海关。人们说起深圳，往往把深圳特区与深圳市混淆起来。

深圳经济特区的历史很短。从1980年建立算起，才那么20来年，它由俗称的“二线”分隔开来，面积仅327.5平方公里，辖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行政区域；“二线”关外分别是宝安区和龙岗区。全市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后经卫星重新勘测，为1952.84平方公里，其中，深圳经济特区面积为395.81平方公里）。全市总面积比香港九龙(含新界)总面积大一倍，常住人口达827万，其中户籍人口250多万(刊载《深圳商报》2006年4月27日)，但深圳市(前身为新安县)历史却源远流长。在1600多年前的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就设置县郡治。

据新华社2007年4月8日北京电讯，“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深圳大鹏湾畔的咸头岭遗址荣列其中”。这个惊人的消息，又把深圳一千多年的历史大大地往前推进。距今7000年到6000年的咸头岭新石器遗址，被

国内专家命名为考古学新文化类型——“咸头岭文化”：“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重大学术价值。咸头岭文化是环珠三角区域史前文化的一杆标尺。是珠三角地区最早的文化，表达了这里最早的人类活动。”

曾几何时，人们认为深圳是座年轻的城市，没有多少文化积淀。也难怪别人的误解，我们本身许多人曾经一度只顾经济建设的“轮子”，而忽略了文化这只“轮子”。

深圳20多年创造了一个公认的世界城市建设史，但是也给历史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留下些许遗憾。当年，特区的建设者们，走在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创业路上，被“现代化”的理想和国外高楼大厦景象迷糊了眼睛，忽视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血脉，无意间毁坏了当地许多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环境。有“千年蚝乡”之称的深圳沙井蚝，被污染得无法在海滩养殖，千多亩蚝田被偏废，很有地方特色的养蚝文化、蚝墙文化、食蚝文化、蚝乡婚嫁风俗等受到严重冲击。编织深圳客家凉帽“竹箔顶”是用优质的单竹做原材料，原来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深爱的这种“甘坑凉帽”，因为编织人员靠做凉帽已难以生存，加上房地产高额利润诱惑，村里人把山上种满单竹的那座著名凉帽山，毁了竹林盖起高楼，变成“凉帽村住宅社区”。没有单竹，全村再没有一户织凉帽，流传200多年独特的编织凉帽工艺几乎失传，成为“凉帽村没凉帽”的景况。就这样，深圳许多民间习俗、民间艺术，随着农村改造成为社区，原住民陆续迁出，外地移民入住等环境变迁，弱化了文化存在的生态土壤，有的远离了我们日常生活，有的无法靠自然生存，或者失去流行价值而延续，更有的因为独特传人逝世而没有传承下来。所以，文化遗产的“生态场”濒临消失了，成了“遗”产了，也成了我们今天的遗憾。

有人说，深圳那点仅有的乡土文化和一些文物古迹，以“深圳速度”在流失。细想之下，有点道理，但是过了一点。

我记得，早在特区创建时的1980年，大梅沙旅游区开发建设中，推土机推出新石器时期的石锛、石斧文物。同年在南山后海和沙井中学附近出土了一批古陶瓷。1983年初深圳市考古人员，在西乡华宝饲料厂建设工地上发现东晋、南朝墓12座和元、明墓各1座，出土一批有价值的文物，当年5月30日市政府对“南头古城”、“大鹏城南、北城墙”、“赤湾左炮台”、“大梅沙古遗址”以及“宋少帝陵墓”等7处古迹，正式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和发掘，如今全市地下、地上文物古迹1694处，其中古遗址和古遗物采集点107处、历史建筑1587处；近现代史迹和革命纪念建筑97处。现有市级、省级、还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1处，出土和征集文物超过2万件，据国内专家统计比较，每平方公里的文物和遗迹比率为全国最多。考古材料表明，在深圳这座现代文明城市中具有7000年的人类开发史、3000多年的古

越族文化史、2000 多年的海洋经济发展史、1600 多年的郡县史、800 多年的广府移民史、600 多年的海防史以及 300 多年的客家移民史和华侨史。

国内有关权威专家说，如果今天把深圳的历史文化串了起来，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深圳的文化还是很深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说："深圳拥有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

(二)

近几年，我和几位"老宝安"，有机会参与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调研、搜集、整理、申报项目保护等工作，先后多次到南澳、大鹏、葵涌、坪山、坑梓、坪地、龙岗、罗瑞合、布吉、甘坑、坂田、扬美、观澜、松元厦、石岩、公明、沙井、福永、松岗、西乡、南头、蛇口、赤湾、沙头角、罗湖、福田、下沙、梅林、水库新村等镇、村，勾起我们四十多、五十年前，对深圳民间风俗、民间文艺的集体回忆。上个世纪五　六十年代，当我还在宝安县文化部门供职时，受当地民间习俗和乡间文化的耳濡目染，喜欢上民间文学、民俗文化，后来在工作中无数次采风问俗，寻踪访古，对其中感兴趣的习俗，倒也关注、探究起来，并不间断地对它进行搜集、积累和研究。

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风俗通义》校译序云：古人早就知道风俗以正教化，司马迁说"礼从宜，事从俗"，东汉应劭也公开提出："为政之要，辨风俗为其上也。"古人既然如此看重风俗文化，作为现代人没有理由忽视它。我以为，民俗文化是一种传承文化，它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它最能反映当地原初的生活状态，又体现在每个人身边的多元性文化形态。民俗学是一门极具现实、最能为现实社会所应用的学科。毫无疑问，南头东晋古城、赤湾南宋小皇帝陵墓、大鹏明代城寨、观澜清末民居、沙井千年蚝乡、大鹏千年采珠古迹、宝安千年古盐场、百年罗湖桥、百年小吃云片糕、百年凉帽、石岩山歌、龙岗皆歌、大鹏千音山歌、宝安咸水歌和盲佬歌、黎围(水库新村)和观澜麒麟舞、南澳草龙舞、福永醒狮、龙岗龙舞、沙头角渔灯舞、下沙宗亲盆菜宴、南山天后"辞沙"等等，无不浸润深厚的岭南历史和古朴的民俗文化。它，成为深圳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期间，自 2005 年 5 月以来，我先后五六次听取我国著名民俗学教授乌丙安等好几位专家学者，在深圳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搜集、整理、数字化存档和申报工作等报告与辅导，三年间，在大量调查、访问的基础上，本人有幸撰写了《深圳客家凉帽》《黎围麒麟舞》《大鹏清醮》《深圳麒麟舞》，执笔修改《大鹏山歌》《南澳草龙舞》等项目，成功申报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作，其中还参与两个申报国家级项目

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后来，在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志文、副会长刘耀棠、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胡滨副处长、市文联常务副主席兼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杨宏海、市文化局社文处处长杨素贤、罗湖区文联主席郑钢坚及笋岗街道总工会主席林小松等领导和朋友们的鼓励支持下，翻阅了我珍藏的民俗资料和县志古籍，先写10来篇刊发在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神州民俗》大型杂志和市、区文化刊物上，受到好评后有点信心，便一鼓作气共写了50多篇民俗文章，分“生活习俗记忆”、“节庆习俗传承”、“文化习俗寻踪”三辑，力图把深圳流传的、抑或流传过而濒临消失的、抑或已经不存在的民俗、地方风物反映出来。我知道这样“分辑”不一定科学，但我不希望像教科书那样把衣食、住行、语言、禁忌、信仰、宗教、婚嫁、生育、丧葬、礼仪、节庆习俗、生产习俗和传统文化习俗等，太过严谨细分，也不想一味堆砌史料，让人觉得枯燥无味。因为这本小书毕竟不是“深圳民俗志”，更不是“深圳民俗学”。但“深圳”的地域特征是紧紧把握的，不是深圳的再精彩我也不写，主观上想区别于外地的乡土民情。写作过程中，尽力发挥我熟悉写作散文的手法，把古旧的习俗、民间掌故和陈年史料，用散文的笔调、幽默的语言、甚至带哲理的思考，用生动的文字表述出来。当然，写起来，散文不散，不凭空想象、天马行空，每篇主题明确，叙述集中，史籍翔实，资料可靠。既可对深圳历史、风情、掌故、民俗、特产和民间文化有兴趣的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阅读及深入了解；同时也为可能民俗专业工作者、民俗爱好者的深化研究，提供一些鲜活的、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资料。如果能起到这么一点点的作用，足以达到此书的目的了。

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县，宝安县的旧称是新安县；新安县虽然在东晋设立，但后来在隋、唐、五代、宋、元数朝数代均属东莞县，直至明朝万历元年才析出东莞，又独立置县。我在本书中，有些史料选自《东莞县志》，有些民俗可能与东莞相同。又由于古新安县辖范围远及虎门、惠州、梅州、福建昭安、汀州，明代后的新安县辖区包括今香港、九龙、新界一带，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才被英国占为殖民地。所以我在多篇文章中会带有梅州客家习俗（实际上深圳客家人大多数从福建、梅州移民过来），又有一些篇幅说及香港风俗，个别篇章叙述以香港风情为主，在此顺带说明。

本书承蒙辽宁大学乌丙安教授提笔作序，令本人无不惊喜。乌丙安教授，长期致力中国民俗的研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是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我是2005年5月深圳市文化局在大梅沙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普查工作会议上认识乌教授的，以后四次点评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文本中，面对面

请教于乌教授。乌教授对全国各民族民间民俗非常熟悉，对深圳的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倾注满腔热情和关爱，对晚辈更是悉心辅导。如今，他在百忙中，为本书给予指点和重要评价，这是对作者的厚爱，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同时海天出版社胡小跃、深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全民、罗湖区剧协主席梅玉文、罗湖区作协副主席汪朝晖、罗湖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韦晓东等老朋友，对作者和本书热情支持鼓励和提出宝贵意见，使本书如期在第三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跟读者见面，在此一并谢意。

此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罗湖区委书记刘学强和区常委、宣传部长刘石磊等领导的支持，专此鸣谢！

鉴于作者水平、视野和时间所限，本书肯定有不少疏漏、片面和谬误之处，敬请各位宝安乡亲、朋友、读者和民俗专家批评雅正。

廖虹雷

2007年9月27日　上海　初稿

2008年3月15日　深圳　定稿

[本书的照片，得到何煌友、黎德奎、韦晓东、李明辉、廖碧兰、周光辉、谢建伟、赖继良、潘剑明、杨茹等朋友以及深圳市博物馆、罗湖区文化馆等部门的热情支持，在此致谢！]

参考书目

1. 清康熙二十七年重修《新安县志》
2. 清嘉庆二十四年重修《新安县志》
3. 黄佐编纂《广东通志》
4. 清《通鉴辑览》
5.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6.《深圳全记录》(2000 年海天出版社)
7.《宝安县志》(1997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8.《民间传说》(冯骥才主编，2004 年河北少儿出版社)
9.《中国风俗》(胡朴安著，2007 年九洲出版社)
10.《中国地域文化》(蒋宝德 李鑫生主编，1997 年山东出版社)
11.《客家民俗》(房学嘉著，2006 年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2.《岭南风俗录》(叶春生著，1988 年广东旅游出版社)
13.《深圳掌故》(彭全民著，1989 年香港新闻出版社)
14.《新界风物与民情》(邱东著，1992 年香港三联出版社)
15.《细说万物由来》(杨荫深著，2005 年九洲出版社)
16.《广东民俗大观》(刘志文著，1993 年广东旅游出版社)
17.《大鹏镇》(纪志龙主编，天地人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8.《沙井镇志》(2002 年吉林摄影出版社)
19.《老街》(廖虹雷著，1993 年海天出版社)
20.《热土流苏》(廖虹雷著，1993 年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